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2月(下) 总第192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分析

王利明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乡村治理的协同逻辑与实践进路

张扬南 高 影 刘 冲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分析

谢英霞

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中小农户康养模式构建路径探索

李 英 常艳梅 李阳阳 李福林

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朱 颖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分析

苏圣婷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6 年 2 月下
总第 192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2 月 28 日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眸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万沣毅 / 马贵荣 / 马强 / 王守红 / 王红 / 王坚松 / 王国权 / 王政 / 王保峰 / 王哲
王德立 / 邓富友 / 石恒平 / 布宏雷 / 布朋印 / 卢莎 / 田野 / 田瑞建 / 白浩扬 / 冯军伟
朱红艳 / 任璐 / 刘长鹏 /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漩 / 闫新勇 / 孙明 / 苏芬芬 / 李永华
李军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梓英 / 李斌 / 杨扬 / 杨同喜 / 杨会民 / 杨雨 / 杨威 / 杨航 / 杨高磊
肖玲 / 吴春华 / 何书一 / 何宗尉 / 谷学亮 / 辛福 / 张冬 / 张汉英 / 张金霞 / 张鼎 / 张燕蕊
陈承 / 陈勇 / 邵佳 / 范娱艳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赵燕成 / 胡刚 / 侯军旺
侯俊勇 / 秦一杰 / 耿庆山 / 柴宏 / 徐志昌 / 高云辉 / 高蕾 / 郭保生 / 郭晓利 / 黄玉海
黄洪松 / 曹耀文 / 联凡 / 蒋红超 / 惠熙玲 / 鲁兵库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臧忠燕 / 裴旭峰
裴凯峰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王熙元 /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6 年 2 月 下
总 第 192 期

基层党建

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思考与探索……林云芸　刘素红　01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路径研究……郑海燕　唐海标　方焕新　04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符　娟　07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进展和趋势分析……蒋　兵　孙明敏　10
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路径研究……陈　瑶　葛　戈 *　13
“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路径研究……陈　丽　杨　浩　陈逸璇　石君太　王金凤　16
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分析……杨正协　陈立灿 *　陈燕燕　19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构探究……王尊博　张　鹏　张　雨　贾乔驿　隋玉萍 *　22
教师党支部建设对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提升的作用路径研究……王鑫焰　25
党建引领驱动下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专业能力培育路径研究……孙　波　陈姚琼　28
公立医院党建引领企业健康服务模式探索——以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核双驱”为例……毛雅琴　马明祥 *　31
改革精神引领下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研究……江　斌　34
基于“互联网 + 党建”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构建研究……刘欣妍　蒋　琳 *　37
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分析……王利明　40
医院党建工作与柔性管理的融合实践……李洪忠　43
以扎实的党的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王怡娴　46

案例分享

健康中国视角下医务社工服务现状和问题研究——以 D 医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服务为例……刘珍瑜　刘芸杰　刘怡辰　49
疾控体系改革背景下党建引领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以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为例……许德民　黄　芸　陈文俊　朱伟敏　56
西部生态法治视域下生态环境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优化路径——以甘肃省为例……纪林君　59
新形势下沿边地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构探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王彩基　62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重构研究——以内蒙古开放大学为例……王　贺　树　花　李胜男　65
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校史馆数智化重塑——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李　营　杨怀超　孙　颖　68

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路径研究——以杨浦区孕妇学校为例……王黎黎　朱　纪　71
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失范行为的德育协同干预实践调查报告——以淮安工业中专为例……吴　龙　74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赵淑娟　77
组织赋能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三感”提升的二级工会职能创新研究——以中山大学生态学院为例……
……包　童　陈怀海　赵文嘉　刘姗姗　罗　燕　80
历史比较法下的青年家国情怀培育机理和实践进路——基于“两弹一星”事业亲历者与Z世代青年的对比分析……
……曹珊珊　方　舟　黄　凡 * 83
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江苏妇联组织为例……张景平　86
“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及培育机制研究——以浙江省内部分高校为例……韩　栋　余川夏　89

百家争鸣

广州特色社区医养结合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构建研究……李毅彩　李叶红 * 92
大学生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研究……王芃举　康　晶 * 96
基于“四下基层”理论的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路径研究……田　辉　郑中仁　99
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新理念探索……王　芸　王彦涛 102
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黄　茜 105
八步沙精神蕴含的优良家风特质及其对新时代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万积平 108
专业与性别的融合：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与启示……索　欢 111
国企改革背景下天然气管道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的优化路径研究……龙美勤 114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权的三维嬗变……邵引印 117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娜日娜　高丽萍 120
高丽萍党旗指引下高校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边玉洁 123
提升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力“微策略”实践研究……李　艳 126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分析……谢英霞 129
权益平衡视域下弥合“银色数字鸿沟”的法律保障——基于“一带一路”国家信息立法的启示……
……曹格睿　郑徐蓉　韩　笑　李光升　王晓峰 * 132
广东市域矛盾纠纷化解：阶段划分与经验借鉴……李晓燕 135
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网络分析：性别差异及教育启示……张　雪 138
从失序到调谐：萨提亚模式对夫妻互动系统的干预效能研究……陈妍君 141

教学研究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姜　喆　刘福森 145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评价及应对策略研究……夏文杰 148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究……王　平 151
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协同构建策略研究……蒋　莹 154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发展的价值转向……刘诗慧 157
新医科背景下药学人才培养的创新驱动实践研究——以多校药学课程创新改革为案例……
……张　华　王小娟　陈　钏 160
“课、岗、证、赛、研”融合视角下课程标准的制定——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为例……刘永华 163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下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承德模式研究……李欣竹　李　强 166
审核评估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芮　彧 169
教育家精神视域下高校师范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张星雨　张　林 172
高中数学如何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教学……唐延文 175
“大思政课”视域下粮食行业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构建研究……宋树梅 178

社会治理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家庭照顾机制优化与实践成效研究——以天门市困境儿童服务项目为样本……
……陈兰兰　童声成 181
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下的基层安全隐患多元共治机制探析……徐飞飞 185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乡村治理的协同逻辑与实践进路……张扬南　高　影　刘　冲 188
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风险挑战与推进路径……李　婷 191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三维分析框架的基层治理研究……朱逸雨　陈冠宏　朱建一 195
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卓赟　马献力 * 198
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中小农户康养模式构建路径探索……李　英　常艳梅　李阳阳　李福林 201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成效研究……张姝妍 204
德江傩文化与乡村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研究……刘金标 207
信访社会工作的多元功能解析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贺云鹏　张华春 210
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体制机制优化路径研究……李智军　严爱芳 213

思政论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刘　军 216
少子化背景下高职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常楠静 219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与社会教育力融合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陈姝娅 222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研究……邓天淋 225
价值引领视域下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构建……苏卫涛 228
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朱　颖 231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晋中市为例……田　琦 234
心理关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路径分析……陈晓雨 237
“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在应用型高校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与路径…… 王春艳　双海燕 * 240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地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以忻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杨　柳 243
新时代心理育人理念下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创新研究——以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为核心……张　扬 246
论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原嘉清 249

学海探骊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创新研究……殷洁如 252
婚俗文化对大学生廉洁文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曹高煜　程晓东 255
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的“三进”路径与实践研究……赵静雯　李慧明　陈雪洁 258
“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司晓霞　侯伟男 261
“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 ……马文清　苏　霞 264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鲍　晶 *　王逸远　刘桂文 267
表达性艺术疗法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的治疗效果分析……刘嘉文 270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策略研究……马丹丹 273
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教育应对……张　丹 276
构筑三维融合的育人新空间：“一站式”学生社区硬件、制度与平台的系统构建研究……邵希砚 279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分析……苏圣婷 282

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林云芸　刘素红

摘要：“一站式”学生社区是集学生教育、生活、成长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作为高校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载体和“三全育人”的核心实践阵地，具有凝聚广大青年学生的独特优势，是开展全方位育人工作的关键平台。随着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试点建设由点及面逐步铺开，部分高校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特色经验，但在多样化实践基础上，办学定位与学生特点找准建设路径，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本文通过梳理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共性经验，剖析当前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结合保山学院建设实际，重点探讨学校在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体系化建设不深、协同机制不强、育人实效不足等具体难题，提出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资源整合、深化品牌培育的实践路径，旨在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方位覆盖的育人新生态，切实提升学生社区的育人实效，为边疆地区高校“一站式”社区建设提供实践参考，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更优质的环境。

关键词：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三全育人；边疆高校；实践探索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由来及核心优势

社区在国外已经有上百年发展历史，在我国始于1986年民政部门倡导的社区服务[1]，学生社区是社区中的一种形式，是指包含各种服务设施的学生共同生活与交往的独立地域。随着时代发展，新时代高校教育由以前重知识到知识与人的全面发展并举，因此学生社区的管理模式也随之从以前重管理到如今管理与育人同步，高校学生社区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以及协同育人的功能。2020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推进党团组织、管理部门、服务单位等进驻园区开展工作，把校院领导力量、管理力量、服务力量、思政力量压到教育管理服务学生一线，将园区打造成为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2]。2021年，教育部在全国思政工作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明确：要扩大“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创新试点范围，推动“领导力量、管理力量、思政力量、服务力量有序下沉学生社区”[3]，并明确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覆盖。从2021年的100所试点高校，到2022年的1000所试点高校，再到2023年全覆盖，教育部联合七部委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进入规模化、规范化发展阶段。各高校依托自身办学特色与优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建设实践。自2025年以来，建设态势呈现生态化、个性化发展特征，社区功能从单一的“事务办理”向多元的“全人培养”转型，成为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开放，自我意识鲜明，学习能力较强，对大学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这也为“一站式”学生社区功能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许多高校将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学生实践等工作延伸至学生社区，有效凝聚育人合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搭建良好平台。结合实践来看，“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核心优势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将学生党支部、团支部下沉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思想育人作用，牢牢把握学生政治方向；二是平安校园建设的关键载体，通过整合学生事务服务设施，精准对接学生生活需求，加强学生社区归属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三是协同育人的重要平台，通过整合院系、学工部门、教务等多方力量，明确权责分工、凝聚育人合力，助力良好校风学风培育；四是自我管理的实践舞台，通过深入学生基层、营造特色校园文化，完善学生自治体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培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最终构建起以党建为统领，各育人要素深度整合、育人实效充分显现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自2019年教育部遴选10所高校开展试点工作[4]

以来，各高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一院一特色品牌，截至2023年实现全国高校全覆盖。但在规模化推进过程中，如何结合办学定位、学生特点找准自身发展方向和实践理路，成为各高校共同面临的课题。梳理各地高校建设经验，结合保山学院实践调研，当前“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理念与定位存在偏差，育人内涵挖掘不足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实践中，部分高校对功能内涵的理解与学生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偏差。当前建设过程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备受关注，但在软件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信息化技术与育人功能的深度融合仍需加强。这导致部分改造后的空间资源未能充分发挥效用，使用效能有待提升。同时，思政教育力量下沉过程中，与社区学生动态化、多元化的发展需求衔接不足。部分高校现有党建工作模式多以传统组织架构为基础，在回应学生学业发展、职业规划等个性化需求方面，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亟须进一步增强社区思想引领与育人功能的实际效能。

（二）育人要素整合不深，力量下沉不够到位

由于育人资源下沉力量不到位，导致场域作用难以发挥，如：专业教师、职业导师、心理指导力量多集中于传统学习区域以及部门，学生社区人员配备仍停留在传统的宿管人员，难以提供个性化服务，覆盖率远远不足。

（三）学生社区信息化服务水平不高，智慧育人支撑不足

学生对于信息平台提供的快速、便捷服务需求较迫切，新时期高校各项工作开展以及学生各项事务办理，利用信息平台开展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又节省了较多的人力资源，线上办理选课、报名、培训、校园活动等已经是高校发展的常态化，学生社区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线上完成日常的生活需求，完成相关事务的预约办理等，同时也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自主生活的常识。但部分高校在学生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上缺少建设，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在学生社区信息化平台上缺少资金以及相关技术支持，以至于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学生社区的认同感较弱。

（四）服务供给与需求适配度不高，育人实效有待提升

1. 活动形式创新不足

当前一些高校学生社区开展的活动以传统讲座、志愿服务等形式为主，在内容设计和组织形式上的创新性有待加强。活动吸引力不足，导致参与度不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贴近学生兴趣与需求的活动形式，提升活动实效性。

2. 学生自治体系不完善

虽然多数高校已按要求建立学生社区自治组织，但部分高校目前组织成员结构相对单一，以学生干部为主，普通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有待激发。需要进一步优化自治组织运行机制，拓宽学生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充分发挥学生自治的作用。

三、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以保山学院为例

保山学院作为边疆地方高校，紧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边疆人才培养定位，于2021年底启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经过3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建设路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贴合地方高校实际的具体困境。结合学校建设实践，进一步探索优化路径，可为边疆地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一）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现状

保山学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党建为引领，开创学校党建与学生社区党建协同发展新格局，构建学生党组织覆盖、全辐射的新体系，经过3年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24年获评云南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A级单位。

1. 组织架构创新，推动党建力量下沉。学校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整合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处等9个部门及二级学院力量，成立12个跨学院、跨专业的党员先锋队（覆盖492名学生党员），打破传统以专业划分党支部的局限，推动党建力量下沉至学生宿舍楼栋。例如，梓苑4栋党员先锋队通过主题党日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区实践。

2. 深化“四进工程”，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学校构建“思想引领、管理服务、阵地建设、自我管理”四进工程，打造“特色队伍、活动、文化”三特色。例如，疫情期间，党员先锋队参与校园防控巡查、隔离学生服务，发挥“防火墙”作用；由团委牵头在社区内设置茶艺体验、汉服表演、东南亚文化节等美育空间，推动文化浸润。

3. 凝聚育人合力，形成特色育人模式。经过3年实践，学校逐步形成“143”育人模式，即以党团群联动主线，以“四进工程”为支撑，以“三特色”建设为抓手，初步实现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社区服务、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有效提升了社区育人实效，为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面临的具体困境

1.“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规划的深化拓展

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决定了具体工作开展的长期性与系统性，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借鉴诸多高校建设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方案》，在方案中指明了目标任务，努力把学生社区打造成为党建引领的示范阵地、文化育人的学习园区、自我管理的教育平台、

全面发展的实践课堂、师生共享的生活空间，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党员先锋队两个组织机构，明确了各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二级学院的主要职责。但随着师生生活学习方式的改变，对于高校集成式管理服务需求越来越明确，学生社区的建设除了在宿舍“一站式”服务提供指导以外，对智能化、数字化的智慧服务平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在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宿舍先锋队组织机构的建设下，还需要明确下一步智慧服务平台的开发以及平安社区的构建工作，从而保证服务资源下沉社区到位。学校已制定相对科学的建设方案，明确建设目标和职责分工。随着师生需求的不断变化，在完善现有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谋划智慧服务平台建设和平安社区打造，以满足师生对智能化、数字化服务的新期待。同时，在思政教育力量配置方面，可进一步细化专业教师、院领导等群体的参与路径和工作要求。

2.“一站式”学生社区工作机制的完善提升

《关于组建保山学院学生社区党员先锋队的通知》工作要求中提到将建好党员先锋队作为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的重点任务；工作过程要充分考虑党员实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到既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又避免造成过重的负担。保山学院目前设有 12 个二级学院 48 个本科专业，学生党员 492 人，学生党支部 23 个，权责划分不够清晰，建设方案需明确二级学院领导、专业教师等思政力量下沉的具体要求，目前党员先锋队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但随着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在二级学院层面的协同机制、各先锋队的运行保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通过细化权责划分、完善工作规范，可以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队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工作实效性。

3.“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机制的优化创新

建设方案中关于工作职责部分明确要求了党群服务中心、各职能部门以及二级学院的具体职责，各部门、学院在社区建设中的协同联动有待加强。虽然已明确各单位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可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业务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党建工作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

4.“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实效的持续提升

当前社区育人活动形式和载体仍有创新空间。通过引入智能化手段、丰富活动形式、扩大参与覆盖面等方式，可进一步增强育人活动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更好地实现思想引领、阵地建设等育人目标。

（三）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优化路径

学生社区是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是最易于开展思想引领以及实践育人的阵地，但也是最容易暴露问题的生活园地，为了打造集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更好地发挥学生社区协同育人功能，针对保山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从学校到学院层面，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一站式”学生社区模式：

1. 制定三级联动，多方协同配合的运行机制

校—院—楼栋协同，校党群服务中心统筹规划，二级学院成立“社区党建专班”，楼栋设立“党员责任岗”，明确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职责，形成“政策制定—执行—反馈”闭环。

2. 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新路径

开发社区智慧平台，整合报修、活动报名、心理咨询等功能，实现服务“一键触达”提升线上平台使用效率。

3. 强化力量下沉与资源整合

思政力量嵌入做实，邀请思政课教师、心理咨询师入驻社区，开展“红色微课堂”“心理沙龙”等活动；招募学生志愿者协助先锋队，形成“专业教师 + 学生骨干”双轨服务。

4. 加强社区育人阵地的丰富性

校地协同实践，深化与保山咖啡产业、乡村振兴项目的联动，打造“社区创客空间”，推动“科研赋能 + 农户增收”，如联合开发咖啡包装设计大赛。

5. 完善制度保障与考核激励

细化考核标准，将社区建设纳入二级学院党建目标考核，对先锋队活动频次、学生参与度、成果转化等量化评估，与辅导员绩效挂钩。

6. 品牌化培育

推广全国样板支部经验（如“人文之光”先锋队），打造“一栋一品”文化品牌（如民族文化主题楼栋），形成示范效应。

7. 深化五育融合与社区治理

场景化育人：在社区设置“非遗工坊”“乡村振兴展销角”，将美育、劳育融入实践活动（如傣族织锦体验、咖啡烘焙课程）；网格化管理：以楼栋为网格单元，实行“楼栋长—层长—宿舍长”三级管理，结合学生行为数据动态调整服务策略（如消费数据分析精准帮扶困难学生）。

四、结语

“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高校加强党的领导重要载体和“三全育人”的实践阵地[5]，具有凝聚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全方位育人工作的独特优势，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保山学院作为边疆地方高校，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中，以党建为引领，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学生特点，探索形成了“143”育人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面临顶层设计不深、协同机制不强、智慧建设滞后等现实困境。

党建引领是“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紧抓基层党组织育人主线，以楼栋党员先锋队为主力，凝聚思政力量、管理力量、服务力量、专业力量，深化顶层设计、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培育特色品牌，才能充分发（下转 04 页）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郑海燕　唐海标　方焕新

摘要：本文通过探索高职院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的方向与路径，充分发挥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优势，主动融入社区教育实践工作。在实践中，建强社区教育示范基地，组建高质量理论宣讲团，发挥专业特色科普技能，以及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等，努力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深入社区开展党建+技能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服务关系，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教育支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提升，为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贡献高职院校力量。

关键词：高校党建资源；社区；终身教育；志愿服务

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该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于社区终身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具体政策上，国家也出台了多项措施以促进社区终身教育的发展。比如，加强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建设，完善中小学、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机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等。此外，国家还鼓励建立健全社区、家庭科普教育网络，积极推进终身学习机制的建立，鼓励各级政府加强社区民办教育宣传和管理等。

可见，社区终身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全员终身教育、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举措。国家在政策和措施上对社区终身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具体的实践需要更广泛地参与和发

（上接03页）

挥学生社区的场域育人作用，破解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困境。未来，保山学院将持续立足边疆地方特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定位，不断优化建设路径，补齐工作短板，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提质增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生态，同时为边疆地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切实发挥学生社区育人实效，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更优质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方婷. 我国高校学生社区管理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展望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01):101-103.

[2] 王懿.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问题与实践理路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02):107-111.

[3] 张钦 , 佟以轩 , 林爽 . 高校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的创新研究与实践探索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04):22-25.

[4] 刘凤娟.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下“双创”教育研究 [J]. 河南教育（高教）,2025(03):26-27.

[5] 罗煜湘 , 刘广锋 , 温佳莉 .“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下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实践与成效分析 [C]//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4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珠海科技学院 ,2024:376-38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年度保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视野下边疆地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实践研究”（22BYSY17）。

（作者系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远征路保山学院教育学院讲师）

力，才能够进一步全面推进社区终身教育。

高职院校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党建资源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理想信念的坚定、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而教育资源则可以帮助社区居民提升技能、掌握新知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具有服务全民终身教育的职能，可以将学习者个人与学习型社会及学习型城市建立更牢固的连接[1]，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层次的教育服务和全面的社区建设支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二、高职院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方向

充分发挥学校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优势，主动融入社区教育实践工作，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高职院校通过开展红色教育、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等方式，深入基层。采用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党的先进理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社区居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引导居民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形成健康的社会价值观。

（二）提供高职院校专业教育资源服务

高职院校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及优秀的教师团队，因此要破除高职院校服务全民终身教育的“两难境地”[2]，敢于走出去：一方面可以运用校内实训场、红色教育场所等教学资源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理想信念教育、技能培训、继续教育等；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居民特点深入社区送课送技能到社区，以适应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多样化需求。让社区居民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实现知识与技能的不断更新。

（三）促进社区教育现代化

高职院校可以与社区合作，发挥教育资源共享作用，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更为完善的终身学习制度，帮助社区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推进社区教育现代化。同时，高职院校也可以联合企业推动产教融合新模式，建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适应区域发展协调，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定制化的培训和教育项目，帮助社区居民提升就业竞争力和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

（四）推进高校社会服务实践

高职院校服务全民终身教育的形式多样且一直在变化，可以是专科生这种常规教育，也可以拓展到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补偿教育层面[3]。因此高职院校要鼓励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科研项目和社区服务，积极参与社区终身教育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与社区居民交流的能力。推进高校社会服务实践，让社区居民感受到高校作为社会主流力量的力量和温暖，营造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三、高职院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路径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高职院校党建资源服务社区终身教育路径，建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实践与推广—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党建＋技能科普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创新党课形式，挖掘常识技能科普内容，结合社区特色，送课到社区，送活动到社区，送服务到社区等，着力促进社区居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坚定理想信念，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帮助社区居民提升技能、掌握新知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建强社区教育示范基地，促进社区党建交流

以全国党建“样板支部”、全国党建“标杆院系”建设培育为契机，依托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党建＋技能科普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建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实践与推广—社区教育示范基地”，打造了一个具备教育、研学、参观功能集一体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面向周边社区开放参观交流。培养一批形象好、气质佳、能力强的党史长廊展览讲解员，服务社区终身教育事业，引导社区居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道路，读懂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筑牢信仰之基。

（二）组建高质量理论宣讲团，引导居民坚定理想信念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社区、居民党课需求，邀请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优秀教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共同组建高质量理论宣讲团，研讨党课主题，创新党课形式，如线上微党课、党课移动课堂等，制作一批优质的党课课件，送党课到社区，引导居民坚定理想信念，筑起社区爱国主义教育高地。

（三）发挥专业特色科普技能，助力居民掌握常识技能

发挥学校水电专业特色，依托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省级专业群建设，结合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立项项目《居民地质灾害防范意识调查研究》，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常识技能科普教师团队，制作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科普知识课件，深入社区举办防灾减灾特色讲座、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讲座，开展防诈防骗宣传活动，开展节水服务进社区等科普教育。

（四）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服务居民享受幸福生活

党建带团建，党总支牵头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主动开展高职院校党建资源服务社区终身教育工作，协助社区搭建社区教育平台，整合资源，建立信息系统，帮助社区提高教育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推进社区教育现代化；同时，依托市政工程学院党团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茶艺、摄影、书法、舞蹈等体验活动，寓教于乐，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高职院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的目标与成效

（一）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辐射力强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学校基层党组织及相关院系建设成绩突出，入选广东省第二批党建“样板支部”、教育部第二批党建“样板支部”、教育部第三批党建“标杆院系”。学校因地制宜建设党建文化示范基地，打造一个具备教育、研学、参观功能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街道办、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市政监理有限公司、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乡村振兴培训班等单位基层党组织合作，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建工作交流 35 次，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示范效应和辐射力影响。

（二）以基地建设为突破口，夯实学校与社区合作服务关系

学校项目《党建 + 技能科普社区教育示范基地》获省教育厅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立项，学校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学校大力推进社区示范基地建设培育，市政工程学院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主动与学校周边社区开展党建 + 技能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派出优秀党员教师、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发挥专业特色深入社区开展防灾减灾、节水科普、植物识别、老年人防诈骗等技能普及志愿服务活动 10 余场。

（三）全面推进党建资源、技能科普服务社区终身教育改革和实践

学校常年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2020 年初由广州市从化区教育局（从化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挂牌认定为从化区“社区学校”，成为学校周边社区教育服务的典范。学校联合从化区西宁社区创建党建 + 技能科普社区教育示范基地，至今已经得到了学校周边街道、社区的认可，社区也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居民参加基地社区教育活动，基地工作人员还结合周边社区的需求深入社区开展技能科普教育，提升居民生活技能。下一步，基地将继续凝练特色，形成品牌，面向更多社区开展基地示范教育，并将优秀成果推广服务更多社区居民。

五、高职院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实践经验启示

学校通过充分发挥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优势，主动融入社区教育实践工作：通过建立社区教育示范基地、组建理论宣讲团、发挥专业特色科普技能等措施，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增强学校与社区合作，营造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引导居民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形成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为他们的终身学习提供良好支持，帮助社区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推进社区教育现代化。通过这些努力，提供了多层次的教育服务和社区建设支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本案例为其他高职院校在社区终身教育发展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些经验与启示：

（一）发挥高职院校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优势

高职院校具有丰富的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可以通过融入社区终身教育发展实践，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技能化的教育服务，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4]。在推进社区终身教育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办学的优势，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计划和措施，推动党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融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

（二）加强理论宣讲和教育科普

在新时代思想政治建设融入社区教育发展实践中，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开展党课、理论宣讲和科普教育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同时，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提供相关的常识技能培训和科普知识，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质量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工作已经逐步从学历教育转向了非学历培训，这一转变也已经成为业内共识 [5]。因此，高职院校与社区之间应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强沟通与协作，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共同开展教育活动和项目，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和优势，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共同推动社区终身教育的发展。

（四）关注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在推进社区终身教育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关注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的教育需求和学习意愿，因地制宜地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 [6]。同时，要与社区居民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调研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他们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和优化教育服务。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新时代高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发展实践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高职院校将继续在社区终身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高职院校的不断努力，将新时代高校党建资源融入社区教育发展实践，让社区居民能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树立坚持跟党走的理念，遵纪守法，打造和谐文明的现代化社区。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教育支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提升。

参考文献

[1] 郑润廷，陈勇．大学的第四项职能：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J]. 成人教育 ,2023,43(03):1-7.

[2] 祝怀新．终身学习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继续教育职能探析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3,34(34):58-62.

[3] 贾小鹏．高校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 [J]. 中国高等教（下转 07 页）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符　娟

摘要：目前，司法行政系统持续推进组织设置规范化、制度执行流程化、活动设计融合化和管理考核指标化，有效强化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升了服务能力。党建标准化不仅限于操作层面的统一要求，更在于推动组织运行方式的重塑和政治属性的嵌入。文章依托基层单位的典型实践，梳理当前标准化建设的路径做法，提炼出可复制的推进经验，并结合治理逻辑提出进一步深化的机制思路。党建工作要从条文要求迈向内生动力的塑造，在融合中生成实效，在规范中形成自觉，为构建高效协同的基层司法治理体系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关键词：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党建标准化；组织力；融合机制；制度执行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面向群众的法律服务、刑罚执行、法治宣传、依法行政等重要职责，其组织体系的稳定性与运行效能直接影响法治建设的基层根基。党建作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的核心工作，在司法行政系统中的作用不应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应嵌入到日常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标准化建设为解决党建工作碎片化、薄弱化提供了方向。它不仅限于操作流程的统一，更在于构建一套可落地、可监督、可持续的运作机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标准体系、工作流程与业务条线的匹配性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变量，而制度建设、数字支撑与激励反馈又共同构成标准化的内生驱动。

一、党建标准化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中的实践路径

（一）健全组织体系推动支部力量有效覆盖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托编制结构与人员分布，完善党组织设置，确保实现横向全域覆盖、纵向有效延伸。以南京市江宁区司法局为例，司法所、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大调解中心、法治督察等部门普遍建立了独立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使组织架构与业务体系同步推进[1]。在组织形态上，推动“党支部建在业务线上”，将党组织直接设在调解室、法律服务窗口或司法所，有效延伸党建触角。探索“党支部＋党小组”双层结构，根据实际任务灵活设立了东山司法所党支部两个党小组、淳化司法所党支部三个党小组，使党组织力量延伸到末梢岗位。党支部设置标准明确党员人数下限、组织架构形式与报批程序，使党组织设立有据可依、运行有章可循。围绕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同步制定党务职责清单与任务指引，细化书记、委员、党小组长等角色职责边界，书记抓统筹、委员抓分工、党小组抓落实的责任机制逐渐常态化，使党组织结构具备支撑任务协同的能力，依托组织网络嵌入日常管理，实现党务与业务在结构上的互联互促。组织保障同时依赖于活动空间与管理资源的同步配套。司法行政系统推动党群阵地达标建设，落实“有标识、有制度、

（上接 06 页）

育 ,2020(18):52-53.

[4] 张捷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党建融合路径分析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0,33(14):114-115.

[5] 袁德东 , 刘理 . 新形势下高校继续教育转型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8(12):107-111.

[6] 马成 , 马国力 . 终身学习背景下高校社区教育融合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38(01):84-8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东省 2022 年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类项目“党建＋技能科普社区教育示范基地”（JXJYGC2022GX342）。

（作者：郑海燕、方焕新，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唐海标，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

有图板、有资料、有设备”的硬件标准，为组织生活、集中学习和党建宣传提供实体支撑，党支部活动室不再是独立场所，而是成为业务运行与政治生活融合的功能平台，增强了组织生活的现场感与实效性。

（二）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工作流程标准执行

制度是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根本支撑，是确保党组织工作有序推进的关键。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围绕组织生活、决策程序、监督运行等关键环节，逐步构建内容完整、流程清晰的制度体系。党组议事制度同步标准化，可制定“党组会议议题分类清单”，明确业务类、党建类、重大事项类的分级审批流程。议事程序从议题提出到集体决策设定逐级责任，避免“一言堂”或“程序倒置”。在组织生活方面，制定统一的“三会一课”实施细则，明确频次要求、组织方式与会议流程。配备会议记录模板和工作提示清单，依托“任务＋台账”的方式实现留痕管理，将组织生活会与年度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同步纳入制度日程，提前安排计划、事后归档材料，使党的组织生活从“被动应付”转变为“制度自觉”。责任分工制度细化书记主持、委员参与、纪检监督等环节，确保组织运转在制度轨道上有序推进，制度执行不依赖个人习惯，而是依托机制保障落实到岗、责任到人。建立制度执行督查机制，由组织委员牵头，定期对制度执行情况开展台账核查与实地反馈，发现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由党支部限期整改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使制度由“纸面效果”逐步转为“行动规范”。为了增强制度适应性，还应结合本地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形成“基础通用＋岗位细化”的制度套件，基层部门可在上级模板基础上微调部分执行方式，如对调解事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重点业务领域制定个性化党务规则[2]。

（三）丰富活动形式增强党建工作的融合质效

活动形式的规范化与多样化是党建标准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增强政治功能与业务协同力的关键路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普遍制定主题党日活动计划，实行“一月一主题·普法月月行”的组织方式。活动内容围绕重大节点、业务重点与群众需求动态调整，使组织生活真正贴合司法服务主责主业。其一，在日常组织活动中，依托“固定党日＋集中学习＋志愿服务”的模式，把党内教育与普法宣传相结合。比如开展“法治社区行”“小司普法课堂”“益起普法”等系列活动，使党员在岗位履职中实现政治训练与服务实践同步嵌入。党支部将学习计划与活动清单联动安排，使教育内容、服务对象、反馈机制形成闭环；其二，在业务融合层面，党建活动逐步打破“党建归党建、业务归业务”的割裂状态。党支部结合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社区矫正、复议应诉等实际任务设定活动主题，使党员职责与岗位要求高度契合，如在法律服务工作中，某司法局以“法治助企”为主题组织“党员干警＋党员律师”进企业活动，将党员服务带入法治护航企业发展现场，增强党建功能的外化表现；其三，在联建共建机制推进中，推动党支部以“法治＋网格”“法治＋社区”为平台，与村居党组织、司法协理员、法律顾问等力量联合开展“法治大讲堂”“4·8司法日”“法援惠民生”等活动。活动方案统一模板、实施过程统一流程、总结反馈统一规范，确保共建活动从“拼凑式”迈向“机制化”。同时还推动共建资源线上整合，建立党支部共建“菜单库”，供普法联盟单位按需对接、动态调整。党员教育形式也在向体系化迈进，构建“集中轮训＋岗位研学＋实地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架构，既安排日常学习，又设立专题教学模块[3]。依托“学习强国”平台设立积分通报制度，并定期组织交叉观摩、支部共训、线上测评，使教育活动进入可比可查的量化轨道。对教育方式的系统设计，有效增强了党员队伍对组织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四）考核评价标准化作为党建落地抓手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围绕“考什么、怎么考、怎么用”三个维度逐步建立规范考核机制，使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落在实处。考核不再仅限于任务总结，而是成为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与发现问题的重要载体。第一，在考核内容设计上，以量化指标为主线，结合条线业务实际明确评价方向。基础项涵盖组织生活开展、学习教育完成、会议记录归档等常规任务，突出落实率与规范性。拓展项则聚焦党员履职表现，将法律服务参与率、群众满意度、调解案件成功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使党建与主责业务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第二，在考核方式安排上，采取日常打分与集中考评相结合的模式，兼顾全面性与重点性[4]。日常检查依托组织委员、纪检委员按月开展，查看资料台账、出勤情况与学习平台使用数据，集中考评多安排在半年末或年底，组织交叉检查、实地抽查和座谈访谈，从工作实绩和群众反响中提取真实信息，避免单一打分模式影响准确性；第三，在结果运用上，推进“考核反馈—整改落实—复查跟进”闭环机制。考核排名靠后的党支部需提交问题清单与整改措施，并设定销号期限，整改情况由上级组织进行“回头看”。对于年度考核连续靠后的党支部，开展约谈提醒，对党支部书记和具体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置提示，增强考核的约束力与震慑力；第四，为增强考核的客观性与透明度，引入数字化管理工具，将党建考评纳入平台监管模块，平台设有考核事项上传口、台账留痕区与指标自动汇总表，党支部工作完成率、党员参与数据与整改时限一目了然。

二、党建标准化推进中的经验提炼与逻辑思考

（一）推进过程呈现体系化运行特征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党建标准化建设逐步实现由局部规范向整体协同转变，形成以组织设置为基础、制度规则为支撑、运行机制为纽带的系统推进格局。

党组织覆盖范围与机构职能相适应，职责链条逐步理顺，组织网络在结构上实现“横向延展、纵向贯通”。日常工作不再依赖临时安排，而是依托任务计划、节点管理与责任督导推进，增强了工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在制度执行方面，各项规定逐步模块化、流程化，会议制度、教育制度、监督制度之间衔接紧密。不少单位将“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与党支部议事规则进行一体化清单管理，有效避免了党建运行中的脱节和重复。任务推进由“经验推动”转向“制度牵引”，工作状态可视、可评、可复核，形成较强的治理内循环。党支部不仅承担政治教育任务，还统筹推进司法行政主责主业与法律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使党组织由“组织存在”迈向“功能嵌入”。

（二）成果转化路径促进党建价值外显

标准化不仅限于党建工作的规范开展，更在于将组织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5]。党支部依托政治功能引领服务行为，在群众工作、队伍建设与治理协同中逐步嵌入关键环节，增强了党组织的功能实效。第一，在服务端口方面，党支部将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工作制度化推进，使党员在本职岗位中承担政策讲解与群众引导双重职责。党小组与业务团队协同运行，将组织优势延伸至服务末端。第二，在队伍管理方面，将党员日常履职情况与考核积分、民主评议直接关联起来，推动教育培训、谈心谈话与实践锻炼同步嵌入干部成长链条，组织评价指标不再局限于政治表现，还需结合岗位担当、群众反响和办案质效，增强了管理的针对性。第三，在治理融合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积极参与网格治理、村社共建和多元解纷体系建设，初步形成“党支部引领 + 条线支撑 + 属地协作”的联合机制。

（三）差异适配理念推动策略分类实施

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形态与职能差异较大，推进标准化不能套用“一种模板”，而应建立在差异适配基础上进行策略分层。各司法所因地制宜、因岗制宜，构建“统一标准 + 个性执行”的实践路径，有效避免“看齐式推进”导致资源浪费或执行困难。以某司法局为例，小型所如谷里司法所党支部、麒麟司法所党支部多采用“精干型支部”的运行结构，强调功能集成与事务合一。而中大型所，如东山司法所党支部、淳化司法所党支部则结合业务线设立“条线 + 区域 + 党小组”的组织模式，保障组织延伸与责任细分同步展开。在制度上，全区将共性条目与岗位模块相结合，既确保制度统一，又保留适配空间。评价机制也根据任务密度、服务半径与人岗匹配度进行分档赋分，使不同单位考核内容更具针对性。

（四）数字赋能与激励机制构建双向驱动

党建标准化建设要在制度化推进的同时注重机制自驱，信息化工具与激励反馈制度逐步构成相互支撑的双重路径。技术赋能并非简单地替代人工记录，而在于构建起党支部运行的“实时响应机制”和“全景可视结构”，使党组织行为更具整体感与流程性。数据在平台中沉淀，行为在系统中留痕，推动党建任务由事件导向走向过程调控，平台系统不只是“工具”，更在于对组织逻辑的重构，它使任务发布、参与记录、考核提醒等功能成为组织治理链条的一部分。司法行政机关可依托平台开展趋势预警与节点跟踪，依托数据反馈分析发现工作薄弱区，推进党建管理向前瞻性、结构化方向发展。在长期运行中，平台沉淀的数据资源还将用于构建党建质量评估模型，为精准施策提供支撑。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积分考评、动态排名、荣誉激励等机制，依托设定多维度评价指标，将日常行为转化为结构性积分成果。制度设计不仅限于末端奖励，还在于在学习反馈、岗位晋升、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实际牵引，可持续的激励机制在平台系统支持下建立反馈闭环，使支部工作动力从“外部推动”逐步向“组织自驱”转变。

三、结语

党建标准化建设不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组织力、执行力与融合力的深度重构过程。基层司法行政机关需依托制度牵引、技术支撑与激励机制形成闭环，推动党建工作由“任务推进”走向“结构驱动”。标准化不是终点，而是以规范促治理、以治理促融合的持续演进过程。其价值不仅限于内部建设的完善，又在于基层治理格局中组织引领力的稳定释放。唯有将标准植入逻辑、将制度转化为自觉，方能使党建成为贯穿基层司法体系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 潘毅琴 . 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引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机关党建研究 ,2022(11):29-32.

[2] 杜秀清 , 杨茜渊 . 创建党建品牌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21(01):15-19.

[3] 马立娜 , 魏琨 , 丁若愚 . 讲政治抓党建强业务 以党建工作提高首都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 [J]. 中国检察官 ,2020(13):7-9.

[4] 孟悦 . 新时代基层公安机关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J]. 武警学院学报 ,2021,37(05):77-83.

[5] 戴丽萍 . 检察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的基层探索 [J]. 中国检察官 ,2022(17):25-28.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进展和趋势分析

蒋　兵　孙明敏

摘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是党建工作的关键环节，其质量关乎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为系统把握该领域研究脉络，本文运用文献统计和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工具进行文献分析，梳理该研究领域进展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国内高职院校在学生党员发展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深入研究的学者。研究主题主要围绕问题、对策、质量保障体系、优化提升路径等方面。研究背景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具有时代性。同时出现了新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新兴热点涉及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的路径。未来，需立足职业本科教育，建立动态质量评价体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多层次立体化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运行机制，为实现党员队伍“质”“量”并重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进展；关键问题

高质量学生党员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提升学生党员培养质量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加快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共发展党员213.3万名，其中学生党员81.2万名，占比远超1/3[1]。截至2024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中高职（大专）学校占比超过一半[2]。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高职教育作为肩负着培养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任务，党建育人工作至关重要。在高职院校中，学生党员发展是学校党建工作的关键环节，是新形势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当前，随着高职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入党学生数量显著增加，如何保证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和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呈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其知识结构与演进规律，探索该领域的关键问题及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文献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检索主题中选择“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相关文献，时间跨度为200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进一步筛选、去重、整理，最终得到文献数量为464篇。

CiteSpace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信息可视化工具。其凭借着主题词、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突现分析、发文作者、研究机构、文献共被引分析、文献耦合等鲜明的功能来呈现出科学知识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探索研究前沿热点。本文采用CiteSpace6.4.R1软件进行分析，结合文献梳理方法，对20余年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进行了动态可视化分析。

二、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动态可视化分析

（一）发文作者与机构分析

在发文作者、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中，节点及标签字体的大小反映的是作者、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多少。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郑莹、卢小松、葛慧发文量较多。有研究发现，作者之间连接线较少，反映出作者合作次数少，文章以作者个人独作居多；普通期刊发文量较多，核心期刊发文量少，缺乏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对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发文量较多。从发文机构上看，高职院校在该领域研究的活跃度不高，且缺乏院校之间的合作研究关系。综合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分析，学生党员发展课题在高职院校开展的研究较为薄弱。

（二）时序分析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与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按照年份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以呈现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领域的研究趋势。图 1 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文献数量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3—2008 年，文献数量较少且出现稳步增长阶段。这个时期，主要围绕学生党员发展存在的问题，针对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并展开对策分析；对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创新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究。第二阶段为 2009—2015 年，文献数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该阶段文献主要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考核体系、保障机制构建进行了相应探究。也出现了针对民办、民族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研究。第三阶段为 2016 年至今，相关研究发文量和趋势相较之前虽有所下降，但该研究的整体热度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该阶段文献主要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考评量化体系和质量提升路径做了相关研究。出现了互联网 + 模式下、大数据赋能、新媒体时代、基于 PDCA 理论、舒伯生涯发展理论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域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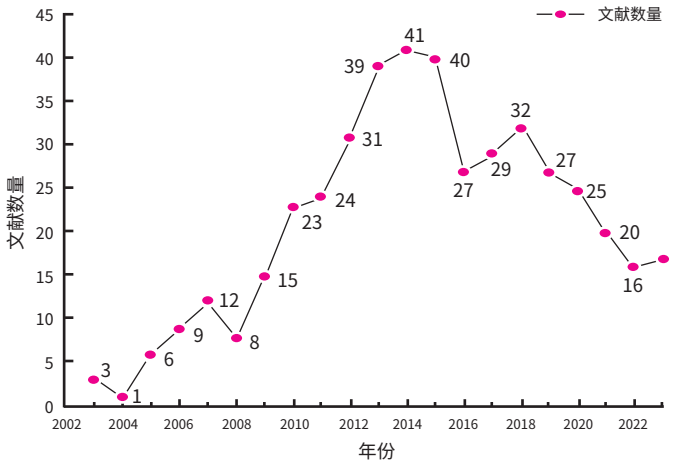


图 1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三）关键词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反映了文献的中心主旨和主要内容。本文采用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描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动态。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党员发展、发展质量、对策、问题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分别达到了 269、185、57、37、29、20 次，表示现有文献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问题及相应对策做了较多的研究。字号的大小也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出研究的关键词频次，保障体系、教育管理、顶岗实习、新时代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从中可以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及教育管理模式得到了发展。针对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的培养需求以及顶岗实习阶段，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共现进行 K（Keyword）聚类分析，采用对数似然率（LLR）为聚类指标，提取聚类标签词，绘制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2）。从图中可以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聚类模块主要有高职院校、高职、党员发展、问题、培养质量、发展、质量保障、学生等。整体而言，各个模块联系较为紧密，每个模块内部也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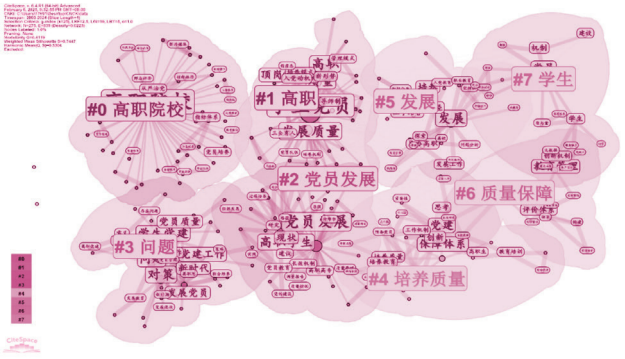


图 2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为了深入分析聚类模块中的内容，统计出关键词聚类内容。从高职院校和高职聚类内容看，研究视域“全面从严治党”“三全育人”“新形势”“新常态”“新兴媒体”等与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体现出了时代性。对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出现了“民办高校”“医学高职”等。“产教融合”“顶岗实习”作为职业院校独特的育人模式，而学生党员是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在此模式下研究学生党员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从党员发展和问题聚类内容上看，“现状”“对策”“建议”“质量管理”“路径”“长效机制”等构成了核心内容。针对培养质量和质量保障，出现了更加细化的研究，利用“大数据”“积分量化”“准警务化”等研究工具建立考评体系，通过“校企联动”“工学结合”“人文关怀”等措施，创新系列“教育管理”模式，形成了“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 [6-8]。

从聚类时间线图中，可以清晰地显示不同研究内容随时间发展变化的情况。通过 Citespace 软件将关键词聚类分析转变为时间线条，可以直观呈现关键词聚类的演进方向。从图 3 中可以发现，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规范化、实证研究、量化考评、考核指标、质量管理、

三全育人、大思政、大数据、提升路径等研究正在兴起。

图 3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中，主要列出了关键词出现和结束的年份、强度等信息。关键词在短期内发生突变，其突变强度可能是新的研究热点兴起的标志。这里，“新时代”以 3.8 的突变强度保持第一，出现的时间主要是 2018—2022 年；“质量保障”“质量提升”“发展质量”紧接其后。2018 年，我国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提升学生党员的发展质量不仅关乎学校的教育质量，更是与国家的发展大局紧密相连。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的发展质量，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不仅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更是对教育事业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积极响应。“三全育人”“量化考核”也位居前列，“三全育人”强调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和全方位覆盖，“量化考核”聚焦高职学生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科学化、规范化，构建一个过程化、全覆盖、多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学生党员发展管理体系。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2003—2024 年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相关文献作为分析对象，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进行了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研究的动态可视化研究，探索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的知识结构、演进规律及热点研究方向，结果表明：

第一，从发文作者与机构上看，文章作者以个人独作居多，单一作者发文量不高，缺乏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普通期刊发文量较多，核心期刊发文量较少；单一高职院校发文量也较少，且缺乏院校之间的合作研究。总体上看，学生党员发展课题在高职院校开展的研究较为薄弱。

第二，研究主题包括问题、对策、质量保障体系、优化提升路径。开展了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研究。研究背景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如全面从严治党、三全育人、新形势、新常态、新时代等，体现出了时代性。同时出现了新质方法和新颖研究视域，如大数据赋能、大思政融通、新媒体技术、互联网 + 模式下、基于 PDCA 理论、舒伯生涯发展理论等。

第三，新兴热点涉及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的发展质量路径，聚焦高职学生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科学化、规范化，构建一个过程化、全覆盖、多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学生党员发展管理体系。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发布，高职院校迎来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新阶段，开始了新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探索和实践。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立足未来职教本科生培养，聚焦学生党员质量提升，针对目前党建工作存在的“梗阻点”，探索学生党员提质赋能工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学生党员发展教育管理举措，提前为职教本科育人下的党建工作进行探索和实践。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一，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各阶段动态质量评价体系。根据党员发展流程，因受各支部要求标准、发展环节、工作实施部门不同等影响，存在明显的发展党员质量参差不齐、各个阶段评价指标无明显差别等问题，需通过规范统一的发展考评标准，加强考核评价指标、权重设置的科学性，建立细化、进阶、量化的指标体系，以此完善党员质量端建设。

其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多层次立体化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运行机制。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提档式实施开展、闭环型优化路径，形成职教本科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和教育管理新模式，系统性创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质量工程建设路径，实现高校党建“质”与“量”并重和党员队伍全面提质提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组织部 .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EB/OL].(2025-06-30)[2025-07-10].https://www.12371.cn/2025/06/30/ARTI1751251405925189.shtml.

[2] 教育部 . 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EB/OL].(2024-06-21)[2025-01-20].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406/t20240621_1136990.html.

[3] 王建霞 . 大数据赋能高职学生党员高质量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 [J].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2(03):81-84.

[4] 王莉 . 新时代高职院校“精智化”学生党员发展模式探析 [J].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4):76-78.

[5] 张翠英 , 姜颖祯 . 铁道类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过程与舒伯生涯发展阶段契合研究 [J]. 交通科技与管理 ,2024,5(04):179-181.

[6] 王蓉 . 高职院校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J]. 黑龙江科技信 （下转 13 页）

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陈　瑶　葛　戈*

摘要：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政教育、学业发展与日常生活，既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要求，也是构建系统完善的思政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然而，受教育环境的多样化、高校改革不断深化等因素影响，当前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内外部多重挑战。本文结合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与管理工作实践，探析二者深度融合的现实意义、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融合路径，旨在推动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协同发力、相辅相成，以党建引领管理效能提升，助力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高校党建；高校管理；深度融合；立德树人；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具体到高校教育领域，党建工作将有效补充管理工作的缺陷和不足，在彼此融合、相辅相成的过程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水平，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对于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与管理工作呈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但是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产业化及社会化凸显，给党建与管理工作的融合带来了挑战[1]。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牡丹江医科大学立足自身办学特色，推动党建从多维度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将党建工作触角延伸至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思想建设各领域，为大学生应对学业、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提供科学指引，助力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长为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

一、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融合的意义

高校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党员、党员发展对象及入党积极分子，帮助其深刻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牢记党的使命、履行党员义务。牡丹江医科大学管理工作以大学生为核心导向，通过完善各项管理措施，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保障大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最终实现高校育人目标。青年时期是人生价值观塑造的关键阶段，该阶段的价值观将会影响人的一生，凸显了价值观培育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牡丹江医科大学推动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科学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党性教育质量，牢牢把握课堂、校园、社会“三大阵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为其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奠定坚实基础[2]。

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是高校教书育人的重要抓手，二者的融合成效直接影响高校教育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校党建为管理工作明确前进方向。党建工作是“三全育人”的核心与灵魂，牡丹江医科大学的管理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党建工作展开。依托党建引领

（上接 12 页）

息 ,2012(24):177,251.

[7] 杨七娣 , 张小丽 . 依托学生社区党员工作站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探索 [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2(02):35-38.

[8] 段艳艳 , 李少欣 .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量化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J].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4(02):29-3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数字化赋能职本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025Y17）；2025 年度金华市教育系统党建工作调研课题“数字化赋能职本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研究”（DJ202507）。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大学）

作用，精准找准管理工作着力点，在充分保证工作效率与专业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建优势，持续提升管理效能，确保管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

二是管理工作为党建工作搭建实践平台。牡丹江医科大学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管理工作内容涵盖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因此党建工作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工作水平。在充分保证大学生党员思想觉悟水平的基础上发挥其模范作用进而提升党建工作水平[3]。

三是二者内在关联性为深度融合提供前提条件。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作为高校日常工作的核心内容，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均以大学生作为工作对象与实施载体，均以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共同目标，这种目标的一致性与工作的关联性，为二者深度融合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融合的实践现状与存在问题

在高等教育改革工作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其社会化及产业化趋势日渐显著，这就给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和考验。原本，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紧密配合、相得益彰，但目前许多高校却将两者割开，分属不同部门负责，其中党建部门负责党建工作，学工部承担管理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使得各项工作有专人推进，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与管理工作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党建管理协同联动，筑牢育人发展根基

在具体实践中，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的负责部门与管理工作的负责部门分属不同的组织架构，导致两者之间无法实现及时、全面的沟通与协调。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学生在参与党建及管理活动时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衔接断层的情况，更会出现党员在高校内的示范作用降低的现象。牡丹江医科大学将党建工作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连，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撑。举个例子，党建部门与管理部门携手开展校园志愿服务活动，按照彼此分工的原则，党建部门主要负责社区义诊、健康宣教相关工作；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整个活动开展的各项事宜，如经费安排，人员安全等。这类活动的开展有利于高校文化建设的开展，也为高校学生逐步养成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提供活的土壤[4]。另外，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员发挥其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自身为准则引领周边同学，从而推动高校文化建设和发展。

（二）党建管理融合并进，护航学子成长之路

分工过于精细化可能会导致党建工作、管理工作出现脱钩情形，影响了高校教育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牡丹江医科大学将党建与管理科学结合，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优势，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将两者紧密结合，合理科学地平衡了大学生思政教育、学习与活动等多个方面。这种平衡不但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育人目标的实现。改变以往党建与社团管理各自为据的现状，通过思政教育融合的方式打破其壁垒：其中党建部门主要开展前期的工作，如实践调研、红色主题学术研讨活动等，引导学生走向田间地头调研，让思政教育长出“双脚”，使之成为活的教育。社团管理负责后期活动的实际开展，如活动秩序、学生安全，这样思政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平衡教育要素资源、高校学生学以致用之间的不足，使得当下的高校学生有信仰、有毅力、有朝气投身到紧张而充实的学习当中去。

（三）党建管理协同统筹，优化资源赋能发展

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分开，将对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部分高校职能部门在开展相关活动时，会产生活动重复、资源浪费和资源短缺等问题。牡丹江医科大学将二者深度融合，合理协调党建与管理部门，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最佳利用。如一起开展“红色思想引领月”活动，在场地资源、师资调度、现场互动环节方面做好前期预设、中期调度、后期反馈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各项活动有序进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高校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三、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结合牡丹江医科大学党建与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高校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推动二者从“表面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转变，实现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一）强化统筹引领，提升党建与管理工作协同性

高校教育各教育主体需提高思想认识，充分重视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树立“协同发力、相辅相成”的工作理念，推动二者协调一致，同向同行，不断提升高校教育管理水平，切实履行优秀人才培养职能。

一是在将党建工作融入管理流程。在日常管理环节，牡丹江医科大学遵循党建指引科学原则，在大学生培养全过程科学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确保党建工作的核心地位。具体到教育教学环节，牡丹江医科大学发挥党建工作的先进作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和引导，对其日常行为进行科学约束，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确保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二是重点加强学生党员培育工作。学生党员是党的青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牡丹江医科大学聚焦学生党员培育，健全完善党员发展渠道，强化党性教育与政治引领，提升学生党员的政治敏锐性与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其

先锋模范作用，以点带面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引导全体大学生健康成长、奋发成才。

三是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廉政建设净化校园政治生态，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保障作用，推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健全完善廉政工作制度，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同时加强廉洁教育，培育大学生廉洁自律品质，营造积极健康、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四是完善管理制度保障。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将直接影响党建工作、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近年来，牡丹江医科大学不断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为各项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和有效保障，确保了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二）创新工作模式，提高党建与管理工作实效性

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高校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对党建与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牡丹江医科大学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创新工作模式与方法，提升二者融合的实效性，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一是依托信息技术赋能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创新党建与管理工作内容与方法，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基于在线平台的党建体系能够实现线上、线下教育资源的科学整合与高效利用，发挥大数据等技术的优势作用对学生需求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明确党建工作目标和任务，确保相关工作与学生需求的一致性；二是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将先进的理论成果贯彻落实到实践环节，为大学生创造和提供必要的社会实践机会，确保党建与管理工作的积极开展，在培养大学生必要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升其政治素养。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高党建与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新时代背景下，牡丹江医科大学不断提升党建与管理工作专业化程度。一是，强化党员教育培训。在健全完善教育培训机制的基础上提升培训水平，确保学生党员的思想觉悟水平和业务能力。借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提升学生党员的思想认知水平，坚定其社会主义理念，培养其良好的综合素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二是推动工作协同融合。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的壁垒，实现教育资源的科学共享与高效配置，从而提升党建、管理工作水平，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与协调一致，实现大学生健康成长；三是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开展质量需要通过相应的考核评估机制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成为工作创新的重要依据，实现党建与管理工作的持续创新和优化改进。监督评估也是工作经验的重要总结与评价工具，是管理制度优化改进的内在动力。同时，牡丹江医科大学重视对年轻干部的选拔，补充党建与管理工作的队伍力量。

（四）健全考核机制，强化党建与管理融合保障力度

考核评价机制是推动党建与管理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牡丹江医科大学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绩效考评机制，通过量化考核指标、规范考核流程，对党建与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估[5]。此外，牡丹江医科大学制定明确具体的考核机制与工作流程，充分保证考核工作的公开性与公平性，发挥党组织、教师、学生等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确保考核工作的客观性与有效性，这样才能得到师生的认可和支持，为绩效考核工作提供积极助力。在具体考核环节，牡丹江医科大学科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保证考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党建、管理工作水平，真正体现党建、管理工作科学融合的先进作用，全面提升高校运营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

四、结语

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推动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是高校实现创新发展、落实育人使命的必然选择。二者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培育更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合格人才，还能激发大学生参与高校发展的主体能动性，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党建工作与管理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二者的深度融合是高校人才培养职责的内在需求，也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高校需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立足办学特色，积极探索党建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不断优化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工作水平，推动二者协同发力、提质增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高校力量。

参考文献

[1] 萧早荣.“一引领、双驱动、三创先”的党建与学生工作体系构建与实践[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5(24):10-12.

[2] 陈琳颖,陈登宇.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互动研究[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3,4(08):19-21.

[3] 黄克强.高职学生党建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融合路径研究[J].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18(01):32-34.

[4] 李红飞,刘钊,徐滋琪.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学生管理深度融合机制探析[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06):8-10.

[5] 郭立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中州学刊,2019(03):10-13.

（作者：陈瑶，牡丹江医科大学研究实习员；通信作者葛戈，牡丹江医科大学研究实习员）

“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陈　丽　杨　浩　陈逸璇　石君太　王金风

摘要：智慧党建是近年来党建工作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为提升党建效能、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当前“智慧党建”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评价标准，导致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成效难以科学衡量。基于此，本文聚焦“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先剖析了“智慧党建”的内涵与目标特征，为评价体系奠定理论基础。接着从党建责任制落实与组织建设、平台功能与应用成效、党员队伍数字化素养与参与度、保障机制与安全管理四个维度进行评价模型与指标分析，然后提出明确核心目标与原则、采用多元方法筛选指标与确定权重、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结果反馈与应用机制的构建路径，希望为“智慧党建”建设的科学评价提供有效参考，推动“智慧党建”工作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智慧党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党建工作也迎来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机遇，“智慧党建”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将信息技术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为提升党建工作的效率、质量和扩大覆盖面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智慧党建”建设过程中，如何科学、全面地评价其建设成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构建一套完善的“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客观反映智慧党建建设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还能为优化建设策略、推动智慧党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一、“智慧党建”的内涵与特征

（一）“智慧党建”的内涵

“智慧党建”是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党建工作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党建模式，它并非简单地将党建工作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对党建工作的理念、方法、流程和载体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革新。从本质上来说，“智慧党建”以党的建设为核心，以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党建工作为宗旨，借助数字化平台整合党建资源，实现党建信息的高效共享、党建活动的便捷开展、党员管理的精准化以及党建决策的科学化。其内涵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展理论学习，让党员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通过在线组织生活，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运用大数据分析党员的行为和需求，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针对性的依据等。

（二）“智慧党建”的目标特征

“智慧党建”具有鲜明的目标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其与传统党建的联系，又凸显了其在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创新之处。高效化是“智慧党建”的重要目标特征之一，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简化党建工作流程，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例如，在线上完成党员信息登记、组织关系转接等工作，相比传统的线下办理，大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行政成本。精准化也是“智慧党建”的显著特征。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掌握党员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和实际需求，从而使党组织的工作更具针对性，可以根据党员的不同岗位、年龄、兴趣等特点，推送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活动信息，提高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积极性。智能化是“智慧党建”的核心目标特征，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党建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比如，智能客服能够及时解答党员和群众的疑问；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党建工作中的异常情况进行及时提醒，便于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实现全覆盖是“智慧党建”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将党建工作延伸到各个角落，覆盖到每一位党员，无论党员身处何地，都能便捷地参与党组织活动，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有效解决了传统党建工作中存

在的覆盖不到位问题。

二、“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模型与指标分析

（一）党建责任制落实与组织建设情况评价

在党建责任制落实方面，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责任体系的健全性、责任落实的有效性和考核机制的完善性。责任体系的健全性体现在是否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智慧党建”建设中的具体职责，是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责任落实的有效性可通过检查各级党组织是否按照职责要求开展“智慧党建”建设工作，是否取得了实际成效来衡量。考核机制的完善性则要看是否建立了针对“智慧党建”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的考核制度，考核指标是否科学合理，考核结果是否得到了有效运用。组织建设情况的评价指标涵盖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党组织活动的规范性和党组织凝聚力的强弱。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是指在“智慧党建”背景下，党组织的设置是否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是否能够有效覆盖党员群体。党组织活动的规范性体现在活动的计划制定、组织实施、记录归档等环节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能够利用“智慧党建”平台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党组织凝聚力的强弱可通过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来评估。

（二）“智慧党建”平台功能与应用成效评价

“智慧党建”平台是“智慧党建”建设的重要载体，其功能与应用成效直接影响“智慧党建”工作的开展。在平台功能方面，评价指标包括功能的完整性、易用性和安全性。功能的完整性指平台是否具备党员管理、学习教育、组织生活、信息发布、互动交流等基本功能，以及是否能够根据党建工作的需求不断拓展新的功能。易用性体现在平台的操作界面是否简洁明了，操作流程是否简便易懂，是否便于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使用。安全性则要看平台是否采取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如数据加密、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等，以保障党建信息的安全。应用成效的评价指标主要有平台的使用率、党员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率的提升程度。平台的使用率是指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使用平台开展工作和参与活动的频率，使用率越高说明平台的应用越广泛。党员的满意度可通过问卷调查、意见征集等方式了解党员对平台功能、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工作效率的提升程度则通过对比使用平台前后党建工作的完成时间、成本等指标来评估，看是否通过对平台的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党员队伍数字化素养与参与度评价

党员队伍是“智慧党建”建设的主体，其数字化素养与参与度对“智慧党建”建设的成效起着关键作用。党员队伍数字化素养的评价指标包括数字技能水平、信息获取与辨别能力和数字安全意识。数字技能水平指党员是否具备使用计算机、智能手机等设备以及“智慧党建”平台的基本操作技能，是否能够熟练进行在线学习、信息查询、互动交流等操作。信息获取与辨别能力体现在党员是否能够通过“智慧党建”平台快速获取所需的党建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有效辨别。数字安全意识则要看党员是否了解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是否能够在使用“智慧党建”平台过程中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党建数据安全。党员参与度的评价指标涵盖参与党建活动的频率、参与互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学习的深度。参与党建活动的频率是指党员参加线上线下党建活动的次数，反映了党员对党组织活动的参与热情。参与互动的积极性体现在党员在“智慧党建”平台上是否积极发表言论、参与讨论、提出建议等。参与学习的深度则通过党员的学习时长、学习进度、学习成果测试等指标来衡量，看党员是否能够深入学习党建知识，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

（四）“智慧党建”保障机制与安全管理评价

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安全管理是“智慧党建”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对其进行评价不可或缺。保障机制方面，评价指标包括组织保障、人员保障和经费保障。组织保障体现在是否成立了专门的“智慧党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是否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是否能够协调各方力量推进“智慧党建”建设。人员保障指是否配备了足够数量且具备相应专业素质的党务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以保障“智慧党建”平台的正常运行和维护。经费保障则要看是否有稳定的经费来源，经费投入是否能够满足“智慧党建”建设的需求，经费使用是否合理规范。安全管理的评价指标包括数据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数据安全管理体现在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对党建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传输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防止数据泄露、丢失和篡改。系统安全管理指是否定期对“智慧党建”平台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和修复系统漏洞，防范网络攻击等安全风险。应急处置能力则要看是否制定了完善的应急预案，当发生安全事件时，是否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

三、“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路径

（一）明确评价指标设计的核心目标与原则

明确核心目标是构建“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首要环节。核心目标应围绕推动“智慧党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确保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智慧党建”建设的实际情况，为党建工作的改进和优化提供方向。核心目标包括引导“智慧党建”建设符合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员的满意度和参与度等。在明确核心目标的基础上，

还应遵循一系列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涵盖“智慧党建”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片面性。科学性原则强调评价指标的设置要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能够准确反映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针对性原则指评价指标应根据“智慧党建”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设计，突出重点，避免泛泛而谈。动态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能够适应“智慧党建”建设的不断发展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二）采用多元方法开展指标筛选与权重确定

指标筛选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步骤，需要采用多元方法确保筛选出的指标具有代表性和有效性。可以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关于“智慧党建”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已有的成熟指标，运用问卷调查法，广泛征求党员、党务工作者、专家学者等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对“智慧党建”评价指标的看法和需求。此外，还可以采用实地调研法，深入基层党组织，了解“智慧党建”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筛选指标。指标权重的确定同样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从而计算出指标权重。也可以运用德尔菲法，邀请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经过多轮反馈和调整，形成最终的指标权重。在确定权重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指标在“智慧党建”建设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确保权重分配的合理性。

（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党建发展需求

“智慧党建”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评价指标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动态调整，以适应党建发展的需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需要定期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和审视，分析其是否仍然符合“智慧党建”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以根据党建工作的新政策、新要求，及时调整评价指标的内容和权重，当“智慧党建”平台出现新的功能和应用时，应将其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以全面反映平台的发展变化，结合评价结果和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评价指标进行优化和完善，删除不适用的指标，增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此外，还应建立信息反馈渠道，鼓励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对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四）完善评价结果反馈与应用机制

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是“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完善评价结果反馈机制，要及时将评价结果以书面报告、会议通报等形式反馈给各级党组织和相关部门，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反馈过程中要注重沟通和交流，确保各级党组织能够充分理解评价结果，认同改进建议。评价结果的应用应贯穿于“智慧党建”建设的全过程，将评价结果与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相结合，作为评优评先、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以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重视“智慧党建”建设工作。根据评价结果，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责任人和整改期限，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优化“智慧党建”建设规划和策略的重要参考，为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推动“智慧党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四、结语

总之，“智慧党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对于推动“智慧党建”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智慧党建”内涵与特征的剖析，从党建责任制落实与组织建设、平台功能与应用成效、党员队伍数字化素养与参与度、保障机制与安全管理四个维度进行评价模型与指标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构建路径。在实际应用中，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根据“智慧党建”建设的不断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以确保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智慧党建”建设评价工作，充分运用评价结果指导实践，不断优化“智慧党建”工作模式，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为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贡献力量。相信随着评价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应用，我国的“智慧党建”建设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杨易，童莹.“智慧党建”视域下公立医院党员队伍建设实践与探析 [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25,36(07):1039-1041,1052.

[2] 党建引领智慧社区建设 赋能城市基层治理 [J]. 党员干部之友，2025(06):13.

[3] 崔群. 国有企业智慧党建平台建设的实践探索 [J]. 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27(02):18-21.

[4] 崔紫君. 信息化建设背景下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发展策略研究 [J]. 办公室业务，2025(05):142-144.

[5] 梁博，路程.“互联网 +”智慧党建模式在提升教师党支部建设工作中的作用 [J]. 人生与伴侣，2025(06):94-96.

（作者：陈丽，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中级工程师；杨浩，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副高级工程师；陈逸璇，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中级工程师；石君太，国网白银供电公司中级工程师；王金凤，国网张掖供电公司中级工程师）

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分析

杨正协　陈立灿 *　陈燕燕

摘要：目的：探究党建引领的医教协同模式在住院医师规培中的具体实践策略与应用成效，评估该模式对住院医师临床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及职业认同感的提升作用，为优化住培体系、提高培训质量提供实践参考。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随机将 40 名住院医师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运用党建引领下的医教协同模式，对照组采用普通的培训模式。通过问卷调查和技能考核对学员培训效果进行评估，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实验组的培训合格率为 95.0%，较对照组（80.0%）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平均分（87.0 分）较对照组（75.0 分）提升 12.0 分，思想政治素质评分（90.0 分）较对照组（76.0 分）提升 14.0 分，职业认同感评分（4.8 分，5 分制）较对照组（4.2 分）提升 0.6 分，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员反馈，党建相关活动有效增强了自身职业使命感、团队协作意识及职业归属感，医教协同模式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结论：党建引领下的医教协同模式可有效整合医疗与教育资源，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显著提升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临床能力及综合素养，该模式具有明确的实践可行性和推广价值，可为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医教协同；党建引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能力；思想政治素质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堪称医学教育的关键阶段，意在培育具备高临床水平和综合素养的医务人员，来满足当代医疗服务的需求 [1]。对于全球医学教育体系而言，住培被公认为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基础，我国住培面临着培训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医教协同不足的情形、学员思想政治素质培养薄弱的问题等 [2]。伴随医疗教育改革有序推进，党建引领成了推动住培工作的关键力量，《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需渗透到医疗教育各环节，基于这样的背景，医教协同模式随之诞生，实现医疗机构与教育机构资源的整合，造就多方协同、携手育人的有效机制，为住培工作赋予新活力。医教协同不只是优化培训管理的关键办法，也是带动学员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党建工作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及发挥组织管理能力，给住培工作提供思想支撑以及组织保障 [3]，该模式可解决传统培训当中管理和教学分离问题，增强学员的政治素质与职业认同感。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全面挖掘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在住培中的实践路径与功效，研究从理论层面延伸到实践，分多个层次开展，力求具备科学性与严谨性。

（一）文献调研

采用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检索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检索用的关键词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教协同”“党建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等，筛选的文献发布时间接近十年，涉及住培制度相关建设、医教协同相关模式、党建引领相关实践等主题；优先从高水平期刊和会议论文里选取来源，进行文献调研，本研究整理出医教协同模式以及党建引领在住培中的理论基础，为后续开展的实证研究提供科学佐证，认准国内研究的薄弱地带，即党建工作与住培实践具体的结合办法以及量化评估手段。

（二）问卷调查

对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医师做随机对照实验，把 40 名住院医师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两个组，实验组采用党建引领的医教协同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住培模式开展相关工作，从临床能力、思想政治素质、职业认同感三个维度去评估两组学员的培训成果，问卷采用 Likert 式五级量表，并采用开放性问题，将学员就培训模式给出的评价与建议量化。

（三）数据分析

待所有问卷收集工作结束后，采用 SPSS 26.0 软件做

统计的相关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对两组学员基本情况及各指标总体表现加以分析，采用 t 检验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培训效果的差异，证实党建引领模式的有效性。

二、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路径

（一）党建引领

党建引领是实施医教协同模式的要点，利用党组织牵头的工作机制，把党建工作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紧密贴合，党组织充当核心角色，对培训目标的实施进行监督，也借助专题党课等活动增强医师对职业的使命感。

（二）资源整合和协同优化

资源整合和协同优化是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医院与高校实现资源共用，合作开发课程体系，继而实施双导师体系，增强医师的专业技能与思想政治素养，拟定一套综合考核体系，从各方面考核学员能力，以考核结果为依据调整培训内容。

三、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成效

（一）定量评估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员的培训效果展开对比，党建引领下的医教协同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培训整体质量与学员核心能力。

表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效果的定量比较

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提升幅度
培训合格率 (%)	95	80	+15%
临床技能考核平均分	87	75	+12 分
思想政治素质评分	90	76	+14 分
职业认同感（5 分制）	4.8	4.2	+0.6 分

由表 1 可知实验组的培训合格率达到 95%，较对照组的 80% 提升 15 个百分点。这一提升不仅体现培训管理的规范化，更凸显党建引领在保障培训质量中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党组织通过统筹资源、监督流程，确保培训计划的严格执行，减少学员因管理松散而导致的脱节现象。此外，实验组学员的临床技能考核平均分达到 87 分，较对照组提高了 12 分。这种提升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医教协同模式下双导师制的有效实施。临床导师专注于技能指导，党建导师则强化职业素养，两者的协同使得学员在操作规范性、病例分析能力和应急处理水平上均取得显著进步。尤其在复杂病例的决策能力上，实验组学员表现更为突出，这与其接受的系统性培训密不可分。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同样令人瞩目。实验组学员的评分达到 90 分，较对照组高出 14 分。党建活动的融入如专题党课、红色教育基地参观等，不仅丰富了培训内容，还深化了学员对职业使命的理解。职业认同感的提升进一步佐证这一点，实验组的平均分达到 4.8 分（5 分制），高于对照组的 4.2 分。这种认同感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学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规划，许多人表示党建活动帮助其更清晰地认识到医生的社会责任。

（二）定性分析

除了量化数据，访谈和开放式调查也揭示了在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的深层次成效。学员普遍反映党建活动不再是形式化的任务，而是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生动教育。例如，通过参与社区义诊、抗疫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学员不仅锻炼了临床技能，还深刻体会到医者仁心的内涵。这种体验式学习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职业热情，许多人表示在活动中找到了从医的初心。

双导师制的优势在访谈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临床导师与党建导师的互补性指导，使学员在专业技能与职业发展上均获得支持。学员提到“党建导师帮助我明确了长期职业目标，而临床导师则教会我如何一步步实现它”。这种双向指导模式不仅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还缓解了学员在职业迷茫期的焦虑情绪。此外，党组织定期组织的座谈会和心理辅导，为学员提供表达诉求的渠道，进一步增强了归属感。

（三）对培训体系的整体促进作用

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学员个体层面，还对整个培训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通过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医院与高校的资源整合更加高效。例如，联合开发的课程体系既满足了临床实践需求，又融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其次，党建活动的引入丰富了培训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性。案例讨论、情景模拟等互动方式，让学员在参与中学习，显著提升了培训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了可复制的管理经验。通过量化评估和持续改进，党组织能够动态调整培训策略，确保资源的精准投放。例如，针对基层基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党建联动机制推动了远程教学和师资共享，缓解区域差异。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改进方式，不仅优化了当前培训，还为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四）长期影响与推广价值

从长远来看，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的影响将超越培训本身。学员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的提升，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受访者表示，党建活动中培养的团队协作和奉献精神，已成为其日常工作的行为准则。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四、存在问题与优化建议

（一）存在问题

1. 基层党组织参与力度不足

虽说党建引领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起到重要指

导作用，可部分基层培训基地的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参与力度依然不够[4]，这一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层面：党建活动形式极为单一，缺乏多样变化与创新亮点[5]。还有部分党组织对住培学员需求的了解不够透彻，住培学员身为特殊的受教育团体，思想的动态情况以及职业发展的需求具备一定复杂性[6]。

2. 医教资源分配不均衡

医教资源分配不均成为影响住院医师培训质量的关键要点，基层培训基地因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管理模式的限制，较难拿到充足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分布不均，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着不少优质导师，基层基地难以招到优秀导师，减少了学员得到高质量指导的机会，培训经费分配不合理，基层基地经费存在缺口，不易组织起学术交流并提供相关学习资源，制约学员知识更新以及临床实践能力发展。

（二）优化建议

1.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参与力度

为解决基层党组织参与方面力度不足的问题，需进一步夯实党组织在住培方面的领导地位，保障党建工作在基层住培中实际落地开展，一是应构建起党组织与培训基地的联动机制，厘清党组织在住培中的责任与权力范围，构建常态化、可延续的监督支持体系。二是切实加大对基层党组织的培训力度，采用定期开设党建工作培训班或经验沟通会，增强党组织成员的综合素养，帮助其更恰当地指导住培相关工作。三是使党建活动形式多样化，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7]。

2. 完善医教协同管理机制，推动资源均衡化

就医教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而言，应强化医教协同管理机制，把资源配置进行优化，推动培训质量做到均衡发展[8]，提升政策支持的强度，开办全国统一的医教资源调配平台，做到资源跨多个区域共享，好比采用远程教学、移动教学设备等方式，把优质资源输送至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基地。支持高校跟医院建立更紧密的协作同盟，借助联合培养项目、双导师共用机制等途径突破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障碍，增大对基层培训基地的财政支持规模，尤其在硬件设施、师资进修和学术互动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以提升整体培训水平，探寻构建基于绩效的资源分配方式，对在住培工作上表现优秀的培训基地给予政策资金支持，鼓励基层单位积极改进培训管理。

五、结语

党建引领下的医教协同模式，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以医教协同为重要抓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临床技能培训深度融合，有效解决了传统住培中“重技能、轻思想”“医教脱节”“资源不均”等问题，显著提升了住院医师的临床实践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认同感，优化了住培体系，提升了培训质量，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本次实践研究表明，党建引领下的医教协同模式不仅具有明确的实践可行性和显著的应用成效，还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能够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培育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该模式在基层应用中仍存在基层党组织参与不足、医教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需要在后续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未来研究应重点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开展不同级别、不同区域医院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模式的差异化研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优化实践路径；二是完善“党建 + 医教”一体化考核体系，细化考核指标，提升评估的科学性和精准度；三是深化医教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解决基层住培资源不足的问题，夯实党建引领的长效机制，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医疗教育质量优势，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邓会岩，吴偲，刘宏博，等. 河北省临床病理科住培专业基地学员现状调查及分析 [J].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2024,40(12):1336-1339.

[2] 黄陕州，陈汝福，王劲松，等. 积分绩效考核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4,32(06):798-804.

[3] 戴琪，陈钢，薛晓方，等. 党建引领助推住培质量——建立住院医师临时党支部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2023,7(11):842-845,850.

[4] 朱一艺，骆茵，杨永嫦. 医院住培党支部党建工作探究 [J]. 中国卫生人才，2023(08):49-53.

[5] 薛凌，张玲玲. 公立医院党建工作与红色文化融合的价值诠释与实践路径 [J]. 现代医院，2024,24(11):1677-1679,1682.

[6] 雷飞宇，唐大龙，冯湘雨，等. 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绩效评价现状及对策研究 [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22,33(08):1113-1117,1132.

[7] 李娜，张贺昌，黄雁琳. 基于矩阵式管理的公立医院党支部建设探究 [J]. 现代医院，2024,24(12):1835-1838.

[8] 魏丽娜，吴红斌. 医教协同对医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分析——基于全国临床医学本科生调查数据和水平测试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高教探索，2024(05):75-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筹经费科研项目“党建引领下医教协同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研究”（Z-D20241599）。

（作者：杨正协，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主任医师；通信作者陈立灿，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主治医生；陈燕燕，梧州职业学院讲师）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构探究

王尊博　张　鹏　张　雨　贾乔驿　隋玉萍 *

摘要：当前教育体系深化改革，高校学生社区已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交流的主要领域，学生社区党建是扩展党组织覆盖面、增强党组织活力的有效途径，积极构建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可以丰富高校党建理论，满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阐述了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的意义，分析了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组织领导体系、教育管理体系、服务平台体系、队伍建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工作体系；高校；社区党建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对于引领学生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中，应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工具进行宣传，增强吸引力。此外，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高校还应深化理论武装，组织系统学习推广活动，并注重实践锻炼，开展项目化实践，加强队伍建设，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质量。

一、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构的价值

（一）提高政治认同

高校学生社区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主要场所之一，建立健全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可以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党组织在学校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有效开展多种形式的理论学习和主题教育活动，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而提高学生的政治认同，还能够为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三全育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设，能够充分落实该理念，使教职工成为育人的主体，并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多样化的主题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促使更多同学加入到追求卓越的行列中，培养学生遵守纪律、诚实守信等良好品质，推动形成良好学风校风[1]。

（二）优化校园治理结构

高校建立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可将学校党组织、宿管人员、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等各方力量有效整合，通过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协调各方在学生社区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应用于学生社区的重大事项决策，在制定社区发展规划、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符合社区实际需求。党建工作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的平台，促进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人力等资源的流通与共享，还可以深入了解学生在社区生活中的需求和困难，如学习辅导、生活设施改善等，进而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此外，党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监督学生社区治理中的各项工作，定期评估治理效果，并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和互助行动，营造团结友爱的良好社区氛围，使学生更加愿意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形成良性循环。新时代背景下完善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创新管理模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党建工作网络平台，提高了党建工作的效率。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当前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的构建，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该环境下可以为学生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培养出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的构建，可以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

化氛围，党组织鼓励学生参与文化艺术、志愿服务等各类实践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加强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热点现象，通过多种实践活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而且还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和支持，可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2]。

二、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构的路径

（一）深化理论武装

高校学生社区是党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关键阵地，高校应完善教育管理体系，深化理论武装，改变传统的党建教育模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高校应制定详细的年度、学期理论学习计划，明确学习时间、要求等，基于不同年级、专业学生的需求，设计差异化的学习内容和方式，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针对低年级学生，可以侧重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普及；针对高年级学生，应引导其关注时事热点并进行深度分析。当前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在教育管理体系优化过程中，还应创新学习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线上学习平台，鼓励学生下载使用“学习强国”App，将其作为日常学习的重要平台；还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学习资料，开设网络课程，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教师应改变以往单向传输的教学模式，积极采用案例分析、项目驱动、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也可以以小组讨论的方式，针对当前时事热点，围绕某一政治话题，鼓励学生展开积极讨论，做好引导工作，促进学生思想的碰撞，并挖掘身边优秀党员、先进典型的事迹材料，使学生感受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积极向上[3]。

（二）强化组织领导

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中，应明确党委对学校社区党建工作的全面领导责任，可以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担任组长，积极将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规划，加强对功能型党组织的支持和指导，鼓励其在特定领域发挥独特作用。高校应设立学生社区党工委或党总支，明确相关责任人，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强化组织领导过程中，还应依据学生社区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合理设置党支部，理清党委组织部、员工部在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中的职责，确保每个楼层及整个社区都有党的组织覆盖，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4]。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应积极制定和完善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充分结合时代发展需求，细化校党委院系、党组织相关部门的职责，完善学习教育制度、党员发展志愿服务等制度，确保党建工作有序开展，同时还应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及时解决党建工作中的问题。在工作机制完善方面，还应建立科学的党建工作评价体系，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工作的深度融合，将党建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定期检查评估党建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三）创新活动载体

高校学生社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阵地，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中应创新活动载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线上党史馆、红色文化 VR 体验厅，使学生在沉浸式体验场景中深化情感共鸣。高校应结合专业特色设计主题党日活动，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策划开展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志愿服务等活动，使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并通过红色经典阅读计划、情景剧展演等，强化学生的使命担当意识。高校应建立学校党委社区、党工委、党支部三级管理体系，开发智慧党建系统，集成党组织监测、党员动态分析等功能，定期推送党的相关政策、解读优秀党员事迹等内容，使党建工作更加贴近学生实际。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还应注重文化建设，在社区设立党建文化长廊，展示党的伟大成就、优秀党员先进事迹，还可以打造党员示范宿舍，发挥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举办红色文化节，组织开展书法、绘画展览等活动，充分融入党建元素，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增强对党的归属感[5]。

（四）加强队伍建设

队伍建设体系中，高校应坚持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突出政治标准，明确学生社区党建工作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服务者、管理者，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党建工作全过程。高校应加强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招聘兼职党务工作者，鼓励优秀辅导员、政治课教师兼任社区党建指导员，大力培养一批工作能力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学生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党小组组长等。高校还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党章党规党纪等方面的专题培训，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丰富培训内容；引入最新案例，针对党建工作实际需求设计活动，策划心理辅导、公文写作等方面的技能培训项目；还应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将社区党建工作成效纳入考核标准。高校应通过挂职锻炼、项目攻坚等方式，让党建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增长才干，积极培养学生党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能力，鼓励党建工作者深入学生宿舍、网络空间等，把握学生的思

想动态和现实关注，结合不同的学科背景、年级特点等，培育特色品牌项目，并注重反思总结。

（五）注重实践锻炼

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完善过程中，应注重实践锻炼，使学生党员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深刻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情况；在参与扶贫调研、文化传承的实践项目中，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高校应积极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设立党员先锋岗，安排学生党员参与图书馆管理、校园环境维护等志愿服务工作，在日常工作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积极围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设计具有影响力的实践项目，与周边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社区共建活动，使学生在义务家教、文艺演出进社区等项目中，扩大学生党员的服务半径。学校应结合社会热点和社会需求，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垃圾分类推广项目，紧扣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织学生到高新技术企业参观学习，积极对接企业、农村等基层单位开展实习实训、乡村振兴调研等实践项目，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深入了解国情、社情，感受不同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挑战。在项目实践过程中，高校应将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就业创业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建立项目进度汇报制度，要求学生党员定期向党组织汇报事件进展情况，利用照片、视频记录等方式，收集数据资源，全方位掌握项目动态，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良性循环，使学生自觉树立起投身社会实践、报效祖国人民的志向追求[6]。

（六）搭建服务平台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构建中，还应注重条件保障体系的完善，设立专项党建工作经费，用于党组织活动开展、阵地建设等方面，改善硬件设施，配强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同时探索通过校企合作、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党建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确保经费投入的稳定性，加强经费使用管理和监督，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高校应根据学生社区的规模和党员人数，合理规划和建设党员工作阵地，加强对党员工作室、红色书屋等设施的管理，配备办公设备、学习资料档案，为党员开展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高校在服务平台体系搭建方面，应注重思想引领平台、学业知识平台等的完善。在思想引领平台中，积极设立党员先锋岗、红色读书角，开展理论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积极举办线下专题讲座、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党员志愿服务平台中，应设置志愿服务岗位，包括社区环境整治岗、学校辅导岗等，鼓励学生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周边学校、敬老院开展志愿活动，不断践行党的宗旨。在生活服务平台中，关注学生实际困难，解决学生的住宿、心理、就业等问题，打造“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中心。

三、结语

综上，构建科学高效的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可以提高党校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增强党员教育的感染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应注重优化教育体系，开展系统性的学习培训工作，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党建内容的传播力，并建立健全党组织架构，细化责任分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使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增长才干。此外，高校应注重队伍建设，定期举办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建立激励机制，树立典型示范，积极围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项目化实践，将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就业创业紧密结合，使学生在服务过程中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 马芳兵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困境反思与路径重构——以齐鲁师范学院为例 [J]. 吉林教育 ,2025(20):91-93.

[2] 冯梅 , 李伟东 . 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典型模式、实践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广东省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实证分析 [J]. 高校后勤研究 ,2025(02):73-75.

[3] 陈利 .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构探究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02):138.

[4] 黄青青 . 高职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研究——以学生社区党员互助化实践为例 [J].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3(05):115-119.

[5] 袁翔 , 洪月娥 . 场域理论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探索——试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现状调查 [J]. 高校后勤研究 ,2024(07):51-53.

[6] 裴树东 , 姚莉 , 张志平 . 高校学生社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育人模式构建——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 [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31(06):123-1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牡丹江医科大学第二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党建研究课题立项”（2024-MYDDJ-ZD05）；牡丹江医科大学“心海”辅导员工作室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王尊博，牡丹江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副书记；张鹏、贾乔驿，牡丹江医科大学学生处科员、助教；张雨，牡丹江医科大学学生处公寓辅导员、助教；通信作者隋玉萍，牡丹江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辅导员、助教）

教师党支部建设对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提升的作用路径研究

王鑫焰

摘要：青年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关乎高校教师队伍的稳定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当前部分青年教师在职业成长过程中，面临职业价值认知深化、职业发展能力提升、职业支持体系完善等方面的提升空间，需通过系统性举措助力其构建坚定的职业认同。本文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聚焦学院党委副书记具体的工作实践，以教师党支部建设为核心抓手，从思想引领、成长平台、关怀机制三个维度，构建场景化学习、分层分类能力提升、全周期支持构成的系统性实践方略，探究党支部助力青年教师强化职业认同的有效路径，为强化青年教师的职业归属感、激发职业活力、夯实高等教育发展根基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教师党支部建设；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

教育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持续深化，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学科研的生力军，这个群体的职业认同感直接关乎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与教育使命传承。当前青年教师正积极适应职业发展新阶段，在价值认知、发展提升、支持保障等方面有着多元化需求，亟须针对性引导与支撑以进一步强化职业认同。

教师党支部是引领青年教师成长的基层堡垒，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工作为党支部功能发挥提供重要支撑。本文立足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聚焦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构建中的重点提升方向，探索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赋能路径，为提升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助力其职业成长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

一、党建引领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时代语境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教师职业发展需求日趋多元，党建引领成为提升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关键抓手。青年教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正经历从“初为人师”到职业深耕的角色转换，职业认同感受生涯适应力、数字素养等能力要素影响，也离不开职业价值认知与组织归属感的支撑[1]。党建工作以政治引领为核心，契合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诉求，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职业认知，助其明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切实解答其内心的价值困惑；依托党组织平台整合数字教学资源、搭建跨学科渠道，适应数字化对数字素养的要求，助其积累职业成就感；凭借“传帮带”机制与组织关怀，缓解职业适应压力，强化发展路径认知。党建工作为青年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筑牢思想与实践根基，实现政治引领与职业成长深度融合。

二、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构建中的重点提升方向

（一）职业价值认知的深化空间

青年教师在职业初期处于职业价值认知的完善阶段，部分青年教师虽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在将“立德树人”教育使命与职业实践深度融合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AI、虚拟仿真等技术为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新可能，部分青年教师在技术应用与教育本质的融合认知上有待深化，需进一步树立“技术赋能教育价值”的核心理念。据相关调研显示，近 30% 的青年教师在职业初期会关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发展目标，对教师职业本身的育人价值、社会价值的挖掘与践行可进一步加强，需通过正向引导推动其形成全面、深刻的职业价值认知，避免价值认知的单一化[2]。

（二）职业发展能力的提升需求

青年教师对职业发展有着强烈的提升诉求，核心集中在发展通道的优化与综合能力的适配性提升两个方面。当前高校正逐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部分青年教师希望进一步优化考核导向，加大数字化教学成果、育人实践成效在核心考核中的权重，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教学创新、育人实践的优势。教育数字化转型对青年教师的数字素养与跨学科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同学科青年教师均有针对性的能力提升需求：文科青年教师希望加强数据建模、科研数字工具应用等方面的能力，理工科青年教师则需要提升数字化教学资源整

合与应用能力，需通过分层分类的培育举措，满足青年教师的差异化发展需求，助力其畅通职业发展路径。

（三）职业支持体系的完善诉求

青年教师在职业成长过程中，对职业支持体系的精细化、精准化有着明确诉求，主要体现在资源供给的适配性与关怀服务的针对性两个方面。部分高校已搭建数字教学平台、科研资源库，但部分资源与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仍有衔接空间，通用型数字工具库难以完全满足学科专属教学需求，跨学科协作平台的完善可进一步推进。青年教师在职业初期面临角色转换、科研与教学协同推进等任务，对常态化的指导帮扶、心理支持有较强需求，希望“传帮带”机制更加精准高效，心理疏导与组织关怀渠道更加畅通，同时期待通过多元化的人际互动提升职业归属感，进一步强化职业支持体系的支撑效能[3]。

三、以党支部建设破解职业认同感提升难题的实践方略

（一）强化思想引领，深化职业价值认知

1. 构建场景化思想学习体系

聚焦青年教师职业价值认知的深化需求，建立“理论 + 实践 + 数字化”三位一体场景化学习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每月举办“数字时代育人使命论坛”，邀请党员教学名师结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AI 辅助个性化辅导等实操案例，分析技术应用与育人价值的内在关联，避免职业价值窄化为科研指标或技术操作。根据学科差异设计实践场景，组织青年教师参与“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项目，通过制作思政科普短视频、开发线上研学课程感知教育的社会价值；引导青年教师对接“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走进企业研发一线了解教学与产业需求的衔接点。借助党支部线上平台推送“育人先锋微故事”，以身边党员教师的真实经历为参照，让职业价值认知在具象化场景中落地生根。

2. 建立一对一思想帮扶机制

落实“党员导师—青年教师”结对帮扶制度，依据“学科相近、优势互补”原则，为处于职业初期的青年教师匹配党性强、经验丰富的党员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帮助其深化职业价值认知，每季度开展两次以上的访谈，解答青年教师在“科研与教学平衡”“数字转型压力”“评价体系认知”等方面的疑问[4]。针对部分青年教师对职业发展目标的认知偏差，导师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解读“教学相长”的逻辑，分享课堂育人成效转化为职业成就感的路径；针对青年教师在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出现的适应困惑，导师引导其建立“技术为育人服务”的认知，助力其实现技术应用与育人价值的有机融合。为每位青年教师制作“职业价值导航手册”，使其认识到个人发展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明晰“个人成长—教育使命”的价值闭环。

3. 搭建凝聚职业价值共识的载体

搭建多元载体凝聚职业价值共识，使得青年教师在集体参与中强化认同。每学期举办“青年教师职业价值辩论赛”，围绕“数字化时代教育核心价值”“科研与育人优先级”等议题思辨，在思想碰撞中厘清价值内核；组织举办“育人成果展”，鼓励青年教师展示学生成长故事、教学创新案例、社会服务成效等非量化成果，打破“唯论文、唯项目”的单一价值导向。党支部牵头成立“青年教师育人志愿服务队”，带头参与乡村教育帮扶、社区科普宣讲等公益活动，青年教师在服务社会中可直观感受职业的公共价值与社会意义，凝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业共识。

（二）搭建成长平台，畅通职业发展路径

1. 打造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提升平台

联合教务处、应用技术研究院，依托党支部组建“数字教学创新党员攻坚队”，针对不同专业青年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需求，搭建分层分类的能力提升平台。面向青年教师开设“教学数据可视化 + 数字化思政教学设计”专项培训，技术骨干党员手把手指导 Python 基础、Tableau 图表制作等实用技能，助力科研成果转化为数字化教学资源；为青年教师搭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开发平台”，党员技术帮扶小组提供虚拟实验课程设计、科研数据数字化分析等实操指导。每学期组织“数字化教学成果党支部擂台赛”，设置专项奖项，推动获奖案例纳入绩效考核加分项、职称评审参考内容，打通“能力提升—成果认定—职业晋升”闭环，助力青年教师提升职业发展竞争力。

2. 搭建资源对接与协作发展平台

建立“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资源库”，整合跨学科科研团队、校企合作项目、国家级教学资源平台及学术交流会议等优质资源，根据研究方向提供发展机会[5]。针对科研能力提升需求较强的青年教师，由党员学术骨干带领其加入“数据驱动型科研团队”，共享文献管理工具、学术社交平台资源与项目申报经验，助力完成科研转型；对于在教学创新方面表现突出者，可推荐其参与国家级数字化教学改革项目、跨校教研协作共同体，与兄弟院校的优秀党员教师联合备课、共创成果，提升教学成果认可度。党支部牵头成立“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议事会”，搭建青年教师与学校职能部门进行座谈的平台，反馈考核评价、晋升制度中“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推动建立“教学创新 + 科研成果 + 育人成效”三位一体评价体系，畅通公平发展路径。

3. 构建阶梯式职业成长培育平台

紧扣青年教师“入职—成长—晋升”阶段，依托党支部搭建阶梯式成长培育平台，精准匹配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新入职教师参与“党员领航入职适应营”，党员导师带领其熟悉教学规范、数字工具使用及科研申报流程，缩短适应周期；成长中期，教师可申请“科研教

学创新专项基金”，开展数字化教学改革与跨学科探索，党支部组织推进会，党员专家提供阶段指导与成果打磨建议；临近晋升期，教师可加入“职称评审帮扶小组”，已晋升的党员分享经验，协助其梳理教学科研育人成果，提升晋升成功率。党支部定期举办成长分享会，邀请优秀党员教师分享成长经验，主导建立成长档案，动态追踪进度、调整策略，保证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清晰可见。

（三）完善关怀机制，筑牢职业支持防线

1. 构建全周期职业适应支持机制

完善“入职—成长—晋升”全周期职业适应支持机制，破解青年教师在职业初期的适应压力与发展困惑。针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实行“双导师”制度，除学术导师之外，党员骨干教师兼任“职业适应导师”，指导教学科研实操，聚焦角色转换焦虑、平衡工作与生活、人际关系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每周谈心、每月进行工作复盘，帮助青年教师梳理职业适应难题，制定个性化适应计划[6]。党支部设立“青年教师职业适应专项基金”，覆盖数字工具培训补贴、科研启动经费、教学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支持；针对面临异地入职、新婚生育等特殊情况的青年教师，协助协调解决住宿、子女入学、产假期间工作衔接等实际问题，解除其职业发展的后顾之忧。每学期开展“职业适应成效评估”，通过问卷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掌握青年教师的适应状况，优化支持措施，确保职业适应支持高效落地。

2. 建立多维心理与情感关怀机制

建立“线上＋线下”多维心理与情感关怀机制，为青年教师缓解职业压力、增强归属感提供支撑。党支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承载“心理关怀驿站”的功能，定期推送与压力管理、情绪调节、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等有关的文章与短视频，开通匿名诉求反馈渠道，及时回应青年教师的心理困惑；联合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提供免费心理测评、一对一咨询服务，每学期开设“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职业倦怠应对”专题讲座，助力青年教师提升心理调适能力[7]。支持党支部牵头成立学科兴趣小组、文体俱乐部等组织，定期开展跨院系青年教师联谊、户外团建、学术沙龙等活动，促进人际互动与情感联结。党委副书记参与青年教师的教研、文体活动，倾听他们的工作困惑与生活诉求，营造“亲如家人”的组织氛围，提升他们的职业归属感与幸福感。

3. 建立精准化资源供给保障机制

青年教师职业支持体系存在资源供给与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依托党支部建立“需求调研—资源整合—供给—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见图 1）。每学期通过问卷调研、座谈交流了解不同学科青年教师在数字教学资源、科研协作平台、职业培训、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党支部整合校内优质资源，联动校外企业、兄弟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学科专属资源包”，涵盖教学工具、科研数据、案例库、培训课程，经党支部平台定向推送；开通资源使用效果反馈渠道，收集满意度评价与改进建议，优化资源供给内容与方式[8]。推动将满足青年教师的资源需求纳入学院年度工作重点，争取专项经费支持，确保资源供给持续有效，为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图 1 精准化资源保障全流程示意图

四、结语

教师党支部建设是提升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核心支撑，可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需求。本文提出的构建“思想引领—成长平台—关怀机制”三维实践路径，贴合学院党委副书记工作实际，直面青年教师的职业价值认知、发展路径、支持保障等核心诉求，以具有可行性的具体举措助力青年教师提升职业认同感。实践证明，党支部凝聚思想共识、整合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为青年教师职业成长筑牢根基。未来需深化党支部建设与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融合，动态优化实践举措，激发青年教师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崔小雨 . 生涯适应力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承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5,39(02):81-89.

[2] 费红军 . 高职院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J]. 科学咨询 ,2025(18):19-22.

[3] 崔小雨 . 岗前培训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23,39(04):40-47.

[4] 杨子均 . 高职院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状况及其提升思路 [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30(06):108-113.

[5] 宋松 . 青年教师特长挖掘与职业认同感提升策略 [J]. 山东教育 ,2024(Z6):67-68.

[6] 肖明玉 . 探讨民办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及提升 [J]. 科技视界 ,2021(14):178-179.

[7] 张晓晨 . 试论教师党支部在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J]. 党史博采（下）,2020(18):62-63.

[8] 王雅平 . 高校青年教师党建双线建设路径探究 [J].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21(02):88-91,97.

（作者单位：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党建引领驱动下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专业能力培育路径研究

孙　波　陈姚琼

摘要：当前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在思政教育阵地建设、价值引领等方面成效初显，但仍存在党建与专业教学衔接不紧密、育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等现实问题；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AI 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层次较浅，课程体系割裂、技术应用碎片化等短板突出；专业能力培育面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教学内容与行业岗位需求脱节等困境。究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师资与课程建设薄弱及评价体系不完善。对此，民办高校需构建“观念顶层设计”等五大融合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能力培育的多元素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助力其更好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党建引领；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数据 AI 融合；专业能力培育

现阶段大量民办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遇到诸多挑战与制约，需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与建设、制定相关激励政策、采用创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校园创业综合服务体系，以推动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有效开展。

一、党建引领下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党建引领民办高校教育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当前，民办高校多数将党建工作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在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通过主题教育强化师生党员理想信念，将党建与校园文化结合营造积极氛围，部分学校还推动课程思政建设以引领学生价值观塑造[1]。然而，民办高校党建仍有明显短板，党建与教学“两张皮”现象突出，停留在形式层面，未融入核心教学环节；引领实效性不足，在办学方向、资源协调等方面作用有限，尤其在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等领域，党建引领力、组织力亟待提升。

（二）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现状

随着创新创业教育被纳入高等教育改革重点任务，民办高校积极响应政策要求，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搭建孵化平台、举办创业大赛等推进工作。部分学校设立创新创业学院，组建专职教师队伍，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学生创业项目数量有所增加。在数据及 AI 技术应用方面，民办高校受资金与技术条件限制，融合程度整体较低，少数学校在计算机等专业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基础”等课程，尝试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部分学校建设简易智慧教室，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评估教学效果，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基于 AI 的创业项目评估系统，为学生创业计划提供数据分析支持。但整体来看，两者融合仍处于浅层次阶段：一是课程体系割裂，缺乏协同设计，未能形成“理论技术实践”的融合链条；二是技术应用碎片化，多用于教学管理辅助，在培养学生利用 AI 技术解决创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投入不足；三是实践平台建设滞后，缺乏兼具创新创业孵化功能与数据及 AI 技术支撑的综合性平台，学生难以获得沉浸式的融合实践体验[2]。

（三）专业能力培育的现存问题

民办高校专业能力培育以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应

用型人才为目标，但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及“双创教育数据 AI”融合滞后的双重影响下，显现出一些薄弱环节。从能力结构来看，学生专业能力呈现“三重三轻”特征：重理论知识记忆，轻知识应用与转化能力；重单一技能训练，轻跨学科整合与创新思维；重标准化考核成绩，轻实践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从培育过程来看，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未能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及区域产业需求制定差异化方案，尤其在党建引领价值塑造方面，未能将红色基因、工匠精神等融入专业能力培育，导致学生社会责任感与职业素养不足。从产出效果来看，学生专业能力与行业需求脱节，据调研，超过 60% 的用人单位认为民办高校毕业生在创新意识、技术应用及团队协作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二、党建引领下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在党建引领的融入实践与技术融合的理念深化上，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在党建引领意识方面，部分民办高校管理层对党建工作的价值定位仍需深化，对党建凝聚共识、整合资源的作用挖掘不充分，基层党组织推动教改的主动性有待提升，党建目标向人才培育举措的转化路径尚需畅通。在技术融合理念上，部分主体存在两类认知偏差：一类将数据及 AI 局限于辅助工具，缺乏深度融合动力；另一类过度放大技术效能，实践中偏离能力培育核心，且对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研判不够全面。思想认识局限是制约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对党建把握办学方向、凝聚育人合力的作用理解不透彻，党建引领效能未能充分彰显；另一方面，技术融合推进存在畏难与短视心态，前者因顾虑门槛高、投入大而观望，后者将融合视为短期任务，忽视长期价值。此外，部分教师担忧 AI 影响自身教学角色，学生更关注短期就业技能，对融合能力培养积极性不足，相关工作呈现“上热下冷”态势。

（二）协同工作机制的运转效能与保障体系的支撑力度，尚有提升空间

体制机制层面，协同联动机制的不完善，成为影响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民办高校内部党建、教学、科研等部门及校企合作单位间的联动衔接仍需加强，跨部门协同的常态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比如党建思政活动与教学双创课程未能充分贯通，企业技术资源也难以转化为教学资源，一定程度存在信息壁垒 [3]。保障体系建设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专项经费支撑不足，资金来源单一，制约党建阵地建设、数据及 AI 设备采购、双创项目孵化等工作推进；二是复合型人才储备欠缺，懂党建、教育规律与数据技术的专业管理团队尚未成型，对融合工作支撑乏力；三是长效机制不健全，多数院校未将融合发展纳入绩效考核，教师参与主动性不强，项目持续性难以保障。此外，内部部门缺乏以学生能力培育为核心的协同目标，跨部门合作易因资源分配、责任划分陷入僵局；校企合作目标与诉求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度合作的推进。

（三）从师资与课程来看，相关融合能力的积淀和体系的完善优化还需持续推进

师资队伍是融合培育的核心支撑，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专业教师的党建素养与思政教育能力有待强化，多数教师未系统掌握数据及 AI 相关知识，在技术融合创业实践指导方面存在不足；专职双创教师以理论型人才为主，企业实战经验相对欠缺，行业导师参与教学频次有限，难形成稳定的融合教学团队。课程体系建设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内容更新节奏有待加快，对数据及 AI 前沿知识、创新创业最新成果的吸纳不够及时；教学模式较为传统，多以“教师讲授 + 案例分析”为主，融合教学创新力度不足，评价方式相对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融合应用能力。受资源配置与用人机制影响，民办高校在吸引兼具党建素养、双创经验与技术技能的高端人才方面面临挑战。现有教师培训侧重专业知识更新，缺乏系统性的融合能力提升方案，考核激励机制对融合教学的倾斜不够，教师参与改革的主动性有待激发。

（四）专业能力培育的评价标准设定与反馈机制建设还需持续深化

评价体系专业能力培育的重要导向，当前民办高校的评价机制仍存在诸多待完善之处。评价标准方面，对学生知识掌握、技能熟练的考量占比偏高，针对创新精神、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党建引领下价值表现的量化评价指标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能力培育的方向指引。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以校内评价为主，企业、行业协会等外部主体参与度不足，评价结果难以贴合市场实际需求，比如学生创业项目评价多由校内教师完成，缺乏企业导师结合实际运营数据的专业评估。同时，评价反馈与培育方案调整衔接不够紧密，因缺乏动态监测和快速响应机制，评价发现的问题无法及时反哺教学环节，易形成问题反复、整改低效的局面，且评价结果的应用重视度不足，未充分发挥其优化培育路径的关键作用。

三、党建引领驱动下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专业能力培育路径构建

（一）党建引领下的“观念顶层设计”融合路径

强化党建政治引领，树立“党建双创 AI”融合培育理念，通过理论学习、“三会一课”等形式，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引导师生认识到党建引领是确保融合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数据及 AI 是提升双创教育质量的核心引擎，三者融合是培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必然路径[4]。将融合目标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政治铸魂、技术赋能、创新强基”的培育目标，在政治铸魂上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以培养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在技术赋能上要求学生掌握相关基础技能及运用技术解决创业问题的能力，在创新强基上构建“发现问题—设计方案—实践验证”的创新思维培养链条。

（二）“课程教学”融合路径

构建“三位一体”课程体系，以党建课程为价值引领层，开设“党史中的创业精神”“红色企业文化”等特色课程，挖掘革命精神与创新创业的内在联系；以双创课程为能力核心层，设置“创业管理”“商业计划书设计”等课程，培养创业基础能力；以数据及 AI 相关课程为技术支撑层，开设“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课程，提升技术素养，同时在专业课程中嵌入融合模块。创新融合教学模式，推行“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的混合模式，以真实创业项目为载体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理论与技术。在主题项目中，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利用 AI 技术设计方案并结合红色资源开发特色产品，借助 VR/AR 技术打造虚拟创业场景，让学生体验全流程。开发融合型教学资源，建设“党建双创 AI”共享资源库，包含红色创业案例库等；与企业合作开发活页式教材动态更新内容；邀请党员企业家等录制线上微课分享经验与前沿动态。

（三）“师资团队”融合路径

打造 “双师双能” 复合型教师队伍：引进兼具党建经验、企业创业经历与数据及 AI 技术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现有教师，通过 “思政研修班企业挂职技术培训” 提升融合教学能力；聘请党员行业专家任兼职导师参与教学与指导。建立跨学科教学团队，由党建工作人员、双创教师、数据及 AI 技术教师及企业导师组成，共同负责课程设计等。完善激励机制，将融合教学成果纳入职称评聘等，支持教师参与课题研究与成果转化。

（四）“实践平台”融合路径

建设“红色创客空间”一体化平台，整合党建活动室、双创孵化基地与数据及 AI 实验室功能，建设“红色教育区”“技术研发区”“项目孵化区”，分别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创业研讨、提供技术设备、为项目提供场地等活动与服务。深化校企协同实践，与地方政府、科技企业共建联盟和校外实践基地，企业提供项目与数据，学生参与开发，党员师生与企业党员共同指导，形成协同育人格局。举办融合型实践活动，定期开展“红色创业大赛”，组织“AI 技术进社区”志愿服务，实施“党员先锋项目”培育计划。

（五）“评价反馈”融合路径

构建动态评价体系，建立“四维评价模型”，从政治素养（思想汇报、公益服务等）、创新能力（项目创意等）、技术应用（数据及 AI 技术解决问题效果）、实践成果（项目落地等）维度评价，纳入教师、企业导师、学生互评及 AI 系统评分实现多元评价。利用数据及 AI 技术优化评价过程，开发能力评价分析平台，采集学生课程学习、项目实践等行为数据，用算法生成能力雷达图呈现优劣势，如通过分析 AI 工具使用频次等评估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轨迹。建立快速反馈与迭代机制，每月召开分析会研判问题，据此调整教学计划、为学生提供提升建议，形成“评价反馈改进”闭环。

党建引领在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数据及 AI 融合的专业能力培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通过解决当前民办高校面临的资源、课程、校企合作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打造“党建数智产教”协同育人模式，利用数据及 AI 技术创新教学场景与实践平台，完善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能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能力培育路径[5]。需通过不断探索创新，优化专业能力培育路径，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数据 AI 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孙波，陈姚琼，王卫平，等. 新时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 [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25(03):83-85.

[2] 郑丽娟. 信息化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数据利用教育研究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0):169-172.

[3] 马英敏. 党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探索 [J]. 四川劳动保障，2025(11):133-134.

[4] 何晓燕，刘闯. 高校党建工作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协同发展 [J]. 就业与保障，2025(02):13-15.

[5] 白翊暄. 深化“聚力党建”品牌建设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J]. 现代企业文化，2025(05):119-1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5 年课题“数据素养与 AI 技术融合：民办高校学生服务业高质量就业核心能力培育模式研究”（ZMX2025B018）；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 2025 年课题“党建引领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路径研究”（2025B04）。

（作者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公立医院党建引领企业健康服务模式探索
——以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核双驱”为例

毛雅琴　马明祥 *

摘要：随着“健康中国战略”不断深入推进，公立医院开始从“以治病为中心”逐渐向“以健康服务为中心”转型。文章主要以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为样本，思考党建引领公立医院企业健康服务的“一核双驱”模式。借助党委统筹、党支部落实以及党员带头打造出可靠的组织保障，将健康专员制度充当核心执行载体，并且创新建设医企协同机制。实践结果表明，该模式能够将健康服务覆盖率提高至72%、员工满意度达到94.66%，企业职业病防治讲座实际参与率可达到78.72%。结论认为，该医院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健康服务模式可以有效破解企业健康管理存在的痛点问题，并且能够为公立医院转型提供可靠的参考范式。

关键词：公立医院；协同机制；党建引领；健康专员；企业健康服务模式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应该进一步强化健康促进职能，但是企业健康管理工作当前普遍存在服务碎片化或者针对性不足等问题。有关调查显示，仅20%企业员工对当前的健康服务满意，大部分制造业员工由于职业特点迫切需要相对更为精准的健康服务保障。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常德二医院”）将党建工作充当核心引领，实施了“健康服务进企业”活动，实际覆盖区域内185家企业，构建了特色服务模式。因此有必要对该模式具体实践进行研究，评估成效，从而为公立医院深化开展医企协同工作提供可靠支持，为打造高质量“医企政”健康生态进行助力。

一、现状分析：公立医院转型与企业健康服务的诉求分析

（一）公立医院转型压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公立医院必须从“治病”快速向“健康管理”进行转型，应该主动下沉健康服务。相关法治思想也进一步指出公立医院党组织应该将政治优势转变成服务效能。但现阶段转型存在较大的现实压力，比如企业员工健康需求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尽管常德二医院的调查研究显示已经有大约62.67%的企业员工正式参与健康讲座，并且94.66%对服务满意，但是仍然有较多的企业以及员工并没有享受到优质的健康服务，怎样突破服务覆盖局限、更加精准地对接员工健康需求，开始成为公立医院贯彻落实战略定位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

（二）企业健康管理的现实痛点

结合常德二医院的调研结果来看，企业健康服务目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痛点：

一是需求多样化以及服务同质化矛盾问题，比如对于制造业通常需要重点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但是服务业一般侧重心理健康服务，而目前常面临“一刀切”的统一化、同质化的健康服务；二是员工整体参与度低以及资源浪费问题，一些健康服务由于形式单一成为比较棘手的“鸡肋”，无法吸引员工参与，导致很多投入白白浪费；三是短期投入以及长期效益之间失衡问题，企业本身对健康管理缺乏良好的战略性认知，比较重视短期成本，忽略了长期健康效益。根据常德二医院的调查数据来看，在其服务的企业当中，制造业实际占比约为38.67%，属于主要服务企业，超过10年工龄员工占比约为32%，进一步凸显了企业职业健康干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党建引领的破局价值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针对公立医院面临的转型压力以及企业面临的健康服务痛点，党建引领成为破局的关键。比如党委统筹编制“一链一策”的企业健康服务方案，可以实现不同行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有助于破解服务同质化问题；对于党支部通过实施“一企一支部”包干制，打造需求台账同时落实好动态跟进，可以解决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党员带头打造“示范岗”，在健康讲座以及随访等环节持续深耕细节，可以进一步提高服务精准度和质效[1]。

二、模式解构：“一核双驱”服务模型的三维实践

（一）党建引领：打造三级组织保障体系

在“健康服务进企业”活动中，常德二医院将党建作为核心引领，打造“党委—党支部—党员”三级组织体系，实现责任的层层压实，以此保证服务可以精准落地。具体做法如下。

医院党委负责牵头打造一个专项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班子成员分片负责开展相关工作，先借助“班子成员带队访企”机制，针对经开区装备制造以及食品加工等五大产业链共计 23 家重点企业进行走访，以此摸清不同行业当前存在的健康需求痛点，比如对于制造业员工来讲，其需要长期伏案、操作各类机械设备、所处环境烟尘较大，需重点做好尘肺预防、腰颈防护等工作；服务业员工通常直面客户，主要需提供情绪疏导以及压力管理等健康服务。据此党委编制了“一链一策”方案，为制造业配套打造职业病防治培训服务以及卫生健康应急手册；对于服务业开展各种心理健康实践活动等，以此从顶层设计上防止服务出现“一刀切”问题。

将全院 11 个党支部合理地划分至各企业，重点推行“一企一支部”包干制，并且配套打造“需求—资源—项目”三台账，其中需求台账主要由党支部党员负责收集；资源台账需要整合党支部医疗特长（包括临床党支部普外科擅长急救、中医科、康复科擅长养生等）；对于项目台账用来明确具体的服务时间以及责任人。此外，党支部每月需要召开碰头会开展台账对账“销号”工作，比如骨科、疼痛科在与 3 家制造企业进行对接时，针对员工高发的一系列职业病问题，如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问题，组织党员医生开展康复手册的编制工作（以图文形式明确步骤，并制作 5 分钟短视频教程），另外每季度驻企实施至少 1 次康复指导工作，以此保证员工健康服务需求可以得到及时解决处理。

全院打造 28 个“党员健康服务示范岗”，强调党员医护均应做到“戴党员徽章、亮身份以及亮承诺”，不但主动承担周末义诊以及晚间健康讲座等一系列“非工作时间的健康服务”（实际全年累计加班健康服务达到 800 小时）；还在服务中深耕细节问题，比如健康讲座完毕后应该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供企业员工后续开展相关咨询、随访过程中借助通俗语言详细解读体检报告等。结合调研数据来看，党员参与的一系列服务项目实际满意度超过 98%，相较于整体活动大约 94.66% 的满意度超过 3.34 个百分点，表明党建可以有效带动健康服务质量提升 [2]。

（二）专员服务：构建全周期执行载体

以党建为引领，为提高企业健康服务水平，常德二医院将健康专员充当服务落地的关键抓手，借助“党员带头、骨干支撑”的方式，打造出覆盖企业员工全周期的高质量健康服务体系。具体如下：

1. 精准选派健康专员

主要聚焦经开区产业链，精选共计 53 名健康专员，在这些专员中党员实际占比达到 80% 以上，均为该医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业务骨干，然后贯彻落实“一企一专员”制度。所有专员岗前必须参加“党建 + 健康服务”相关培训活动，强调以“党员标准”落实“三定”职责：（1）每月至少开展 1 次上门需求调研工作，很多党员专员主动放弃休息积极蹲点负责的企业车间；（2）根据需求定制针对性服务方案，比如为制造业企业的员工打造职业病防治学习资料等；（3）定向跟踪服务效果，对于党员专员应该打造“服务台账”，要动态记录员工反馈 [3]。

2. 闭环服务流程设计

常德二医院在党建引领下，专员服务打造了“预防—诊疗—康复”的闭环全链条服务流程：（1）预防环节，党员专员负责牵头组织企业员工开展职业病筛查工作，并且宣讲党员医生编制的相关《职业健康手册》；（2）诊疗环节，党员专员专人负责对接“三优先”通道，为企业的急病员工协调优先进行挂号、优先检查以及优先住院，使得企业大约有 62.67% 的员工享受到了此“三优先”服务；（3）康复环节，党员专员负责带头开展出院后 1 周的回访工作，不但详细告知康复注意事项，还进一步收集改进建议，实际回访及时率超过 90.74%[4]。

3. 特色服务创新

主要围绕企业员工急难愁盼问题，由党员专员负责主导提供一系列特色服务。比如对于子女健康问题，党员医生负责充当寒暑期活动志愿讲师，在开展视力筛查工作期间手把手教孩子如何做好眼保健操，实际参与率提升至 48%，对于视力筛查参与率超过 94.44%；对于企业当中超过 10 年工龄的一系列资深员工，党员专员负责为其编制有针对性的慢性病管理套餐，并且每月坚持上门开展 1 次随访活动，相较于普通员工多提供 1 次健康评估服务，并建档动态跟踪 [5]。

（三）医企协同：构建多方联动机制

1. 阵地共建共享

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与各企业联合打造“健康服务站”，形成“统一标识、固定场所以及标准设备”共识，配足配齐基础诊疗工具。比如常德二医院于制造业企业当中打造职业病咨询点，整体服务窗口辨识度超过 98.11%，员工通过自己的工牌便能够顺畅享受健康服务。

2. 需求动态响应

常德二医院打造了季度座谈机制，主要由党委成员负责带队针对企业进行走访，结合反馈合理调整服务。比如对于企业提出的急救技能需求，党委统筹安排将相关讲座场次提升大约 30%，实际参与率超过 57.45%；为进一步提高员工子女活动参与率，党委还规划了“亲子健康课堂”，进一步提高了服务实效。

3. 资源整合增效

常德二医院党委主动联合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打造出“医企政”协同体系。比如通过与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合作，将健康服务设定为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的关键内容；通过与工会进行合作实施“健康企业”评选活动，推动健康服务从以往的“被动提供”转变为企业“主动参与”[6]。

三、成效评估：三维度评估模式价值

（一）社会效益

健康意识增强。大约 62.67% 的企业员工参与过该院开展的健康科普讲座，尤其是职业病防治主题活动参与率达到 78.72%，同时大约 95.74% 的员工认为内容“非常实用”。

服务覆盖面扩大。该院“入院即关怀”服务实际覆盖大约 72% 的受访者，大约有 77.78% 可以完整收到“健康暖心包”；此外寒暑期活动使得企业 48% 左右的员工子女受益，实际健康筛查专业性赢得 100% 好评。

医患关系优化。党员示范岗以及党员专员的贴心服务提升了信任度，员工对健康服务活动满意度超过 94.66%。

（二）经济效益

减少企业运营成本。借助职业病预防与及时干预，合作企业员工病假率有效下降 25%，其中某制造企业估算年因此可减少停产损失接近 50 万元。尤其是“三优先”服务可以大幅度缩短员工就医时间，可以间接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医院营销成本。医企协同，企业员工在该院门诊量当中占比从以往 15% 提高至 28%；同时健康管理套餐等一系列创新服务可以提升医疗收入，构建“公益 + 效益”这一良性循环机制。

（三）生态效益

一是医院党建品牌增值，当前“健康服务进企业”已经成为该院党建特色品牌，获取到常德市卫健系统推广，辐射带动多家兄弟医院推行该模式。二是打造的“需求响应矩阵”正式纳入区域健康服务指南，能够为当地 200 余家企业提供可靠参考与支持，尤其是数字化健康管理系统试点经验赢得省级肯定。三是政策衔接顺畅，由于服务内容和当前的“健康中国战略”以及职业病防治法等多项政策高度契合，所以获取到政府专项支持[7]。

四、经验与展望

（一）可复制经验总结

一是党建引领应遵循“三原则”：分别为“守正创新”“选准载体”以及“内外兼顾”，使得组织优势可以转变为服务能力；借助党支部包干、党员示范等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确保服务精确落地。二是服务设计要点：应该将需求充当导向，比如依照行业定制服务包；将便捷视为核心，精简服务流程；将效果充当目标，打造满意度以及健康指标等多维度评估体系。三是协同机制建设“三关键”：政府层面应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企业层面应该加强需求对接；医院自身应该持续优化资源配置。

（二）未来展望

扩大服务覆盖，针对当前 52% 未能有效参与子女活动以及 29.33% 未能灵活使用“三优先”服务的企业员工，应充分发挥党员“宣传员”作用，积极深入企业车间以及班组，借助现场讲解等措施提高知晓率；针对建筑业以及信息技术等空白行业，可以建立“党支部包干拓展制度”，委派专业党员对接企业党组织，使得空白领域健康服务做到“从无到有”。

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由党员技术骨干以及临床党员医生等，共同打造适配移动端的健康平台，完善预约、咨询等多种功能；尝试着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用来实时监测健康服务效果，由党员专员及时进行干预，提高健康服务精准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常德二医院的实践研究表明，党建属于公立医院提高企业健康服务工作成效的关键驱动力。借助“一核双驱”模式，达到了组织保障、执行落地以及机制创新的高效协同与统一，不但满足“健康中国战略”要求，同时也解决了企业健康管理存在的痛点问题。因此，有关医院应进一步加大对公立医院党建引领企业健康服务模式的研究力度，切实结合自身实际，思考和探索企业健康服务模式的建设路径与方法，从而推动企业和医院真正地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蕾，杜孟凯，孙琳，等.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健康科普传播实践研究 [J]. 中国医院，2023,27(07):19-22.

[2] 何冠琏. 医院党建对文化建设引领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3,14(04):81-84.

[3] 韩维玮，徐屠恩. 党建共建机制推动医院健康服务的实效分析 [J]. 抗感染药学，2023,20(02):220-222.

[4] 孟庆超，姚秋月. 党建引领下文化建设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探索 [J]. 现代医院，2023,23(05):687-689.

[5] 陶子奇. 医院党建引领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实践探索 [J]. 秦智，2023(08):18-20.

[6] 李忠萍，钟勤佳. 互联网医院服务运作模式研究：医院独立运营与医院企业共同运营的比较 [J]. 管理工程学报，2024,38(06):168-186.

[7] 王洪国，金哲. 健康云驿站在健康企业建设中的应用与探索 [J]. 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24,35(03):339-341.

（作者：毛雅琴，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师、中级政工师；通信作者马明祥，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正高级卫生管理师）

改革精神引领下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研究

江　斌

摘要：在新时代教育改革进程中，民办高校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其党建与思政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质量。改革精神作为党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重要精神财富，为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思想指引与实践动力。本文阐释改革精神的核心内涵与价值意义，分析民办高校在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以价值引领、制度保障、资源整合与实践创新为核心的实现路径，力图为提升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水平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改革精神；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思政教育；协同创新

民办高校于高等教育布局中扮演着越发关键的角色，既承担着人才培养工作，又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使命，部分民办高校开展党建与思政教育时存在目标发散、机制不完备、协同性欠缺等情况，造成育人效果不佳。改革精神倡导解放思想、奋勇向前且与时俱进，能给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提供稳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导向，把改革精神融入民办高校党建和思政教育协同创新中，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之举，也是促进教育体系完善和实现社会价值的关键行动。

一、改革精神的内涵及其对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

（一）改革精神的核心要义

改革精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推进期间逐渐凝练形成，是党经过长期探索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更是推动社会与教育事业不断向前的动力源。就内涵而言，改革精神涵盖解放思想、积极实践、崇尚创新和展望未来这四个维度。解放思想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与管理方面破除思维惯性，大胆创新开辟新思路。就民办高校而言，需打破对传统模式的依赖，探寻契合自身发展的教育途径，实践的要义在于强调理论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学校开展党建与思政教育时要持续探索新形式和新机制。创新追求是改革精神的核心，它促使高校在课程规划、育人思想和制度完善上不断拿出新举措，让教育始终焕发蓬勃生机，需要学校既立足当下又洞察发展走向，造就拥有长远视角与社会使命感的人才。

从教育实践层面而言，改革精神不只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行动指引。与公办院校相比，民办高校要保持竞争力，更得靠自我革新，唯有凭借改革精神的引领，才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中实现突破。民办高校借助治理结构、课程体系和育人方式的革新，可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此环境不仅可激发师生的创新能力，还可为党建与思政教育创造创新契机，由此将精神内涵转化成发展动力[1]。

（二）价值引领的深刻意义

改革精神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民办高校党建及思政教育明确了方向指引。党建工作中，它促使党组织健全制度体系，增强政治引领效能，党组织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体现，要真正起到核心引领作用，成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和思政教育深度推进的重要力量，依托制度创新及活动策划，党组织能有效发挥凝聚作用，使党建与学校发展策略相匹配。

思政教育工作中，改革精神的价值彰显于方式与内容的创新，传统讲授模式难以唤起学生兴趣，而改革精神所推崇的探索与创新，可让课堂焕发生机，在教师讲授理论时，可融入社会变革元素并结合学生实际体验，引领学生领会国家发展动力与个人成长间的关联，经由研讨、调研与案例分析，学生在思考过程中达成价值认同，在实践中深化责任意识[2]。

尤为关键的是，改革精神为党建和思政教育的协同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往部分高校存在党建活动与思

政课程脱节现象，党建活动与思政课程衔接不足，致使整体成效欠佳。改革精神突出制度创新和实践的突破，为解决此问题创造了可能，依靠跨部门协同与平台信息共享，党建与思政教育能在目标、内容及评价方式方面实现协同，凝聚整体力量。

从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来看，改革精神的价值同样凸显，民办高校不能仅关注学生的知识能力，还要关注其理想信念与社会责任感，在党建和思政教育中切实贯彻改革精神，学校可助力学生培养家国情怀与创新精神，让他们步入社会时立场坚定，这种培养模式既契合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也契合社会对青年担当的期望。

改革精神依托实践导向与创新特性，为推动民办高校党建和思政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行动方向，它既为理念革新与制度构建指引方向，又为教育模式和育人宗旨增添动力。民办高校只有透彻理解且灵活运用改革精神，才能在协同创新中收获实效。

二、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的社会价值

（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工作的价值归宿。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中，既要传授知识和技能，更要重视学生的思想塑造与价值养成。党建工作能够从战略方向上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实保证，借助系统深入的理论学习与科学规范的组织建设，助力学校始终保持正确定位稳步前行。思政教育则承担着价值观引导的重要作用，通过课程教学、讲座和校园文化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学生的认知与行为中。协同创新让两者形成合力，把制度优势与思想引领结合起来，使立德树人真正落地。

这种协同不只是体现在课堂教学方面，还贯穿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践的整个过程。诸如在社会调研和志愿服务开展时，党组织可给予制度支撑，思政教育能给予理论指引，二者融合助力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责任的认知，增进价值肯定，逐渐形成稳定的人生与价值观念。

（二）推动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

教育质量为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鉴于民办高校起步时间滞后，教学资源、师资配备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存在欠缺，更需借助党建和思政教育协同提高发展水平。党建在制度建设和组织管理方面给予保障，让办学理念更为规范；思政教育在课程体系搭建和人才培养进程中给予价值指引，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相互交融。两者配合共同推进，有利于打造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推动学校迈向质量导向之路。

协同创新可进一步促使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实现优化。党组织深度介入学校治理进程，可为学校决策提供科学引导，助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思政教育稳步推动育人目标达成，可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该协同创新模式不仅优化了民办高校教育的系统性，还极大提升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促使民办高校在竞争中维持发展动力。

（三）促进社会思想共识的凝聚

高校不仅是培育人才的摇篮，还是传播社会思想的重要阵地。民办高校借助党建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可培育更多有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的青年，步入社会后，会将校园中树立的价值理念运用到工作与生活里，进而在更大的范围释放更多正面效应。

从社会维度方面来看，这种协同创新的价值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稳定筑牢思想根基，学生于校园期间树立的正确价值观，能助力其维持清晰的判断力，防止陷入价值误区；二是为发展提供精神驱动力，青年人才投身国家建设与社会服务时，以积极的姿态和笃定的信念助力社会发展，这种从校园拓展至社会的价值传播，凸显了协同创新的深刻意义。

总而言之，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创新，是提高育人质量的必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举措，它凭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内涵式的发展以及增进社会共识，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迈上新台阶、社会进步开启新征程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协同机制不完善

在不少民办高校中，党建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仍停留在形式层面，缺乏系统化的顶层设计。部分学校虽设立机构，但实际运作中沟通不足，资源分散，目标不统一。党建侧重组织建设与制度落实，思政教育强调课堂与价值引导，两者缺少互动，导致协同效果有限。考核体系也常将二者分开评价，忽视联动价值，使一些活动流于表面，缺乏长效机制。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制度层面推动改革。民办高校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协同的格局，并在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中明确共同目标，使协同创新真正落到实处。

（二）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教师是推动协同创新的关键力量，但部分民办高校在师资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一方面，专职思政课教师数量有限，学术水平不高，难以支撑高质量教学与科研；另一方面，部分专业课教师在政治素养和价值引导方面欠缺，课堂中难以自然融入思想教育，加之信息化教学经验不足，使协同创新缺乏有效支撑。

这一困境与办学基础薄弱、教师培养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部分学校缺少系统培训与激励机制，教师发展空间有限，导致思政教育缺乏人才支撑。部分教师对党建与思政教育认识不足，将其视为附属任务。破解之道在于加强思政课教师培养与引进，提升专业

课教师政治素养，并通过激励机制推动科研、教学与思想引导形成合力[3]。

（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资源不足是制约协同创新的重要瓶颈。部分学校经费紧张，党建活动与思政课程资金有限，教学设施和校外实践基地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学生需求。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硬件上，还体现在师资、教材与科研支持上。思政课程在课时与资源上常被边缘化，缺乏应有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协同创新往往停留在活动叠加方面，缺少内容与机制上的突破。个别学校甚至重视经济效益、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利于协同推进。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策支持和学校内部管理双向发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专项支持，缓解经费压力；学校则要合理配置资源，将党建与思政教育置于核心位置。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才能为协同创新提供坚实基础[4]。

四、改革精神引领下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价值引领与理论武装

价值引领构成党建与思政教育的核心要素，为使改革精神贯穿全程，就需在思想上筑牢根基，借助系统化的理论学习，让学生在学习时领会改革精神包含的信念与担当。学校可定时开展专题讲座与理论宣讲活动，邀约专家学者或杰出校友解读改革精神和国家发展的关联，提升学生理论认同，在课程建设时，需将改革精神与专业、实践课程相融合，促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政治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这有助于学生在价值抉择时明确方向。

（二）健全制度体系与协同机制

改革精神突出制度创新，民办高校开展党建与思政教育需把制度建设当作关键切入点，学校要在校党委统筹规划下，搭建跨部门协同育人体系，让教务、学生、科研等各环节围绕育人目标保持步调一致，制度衔接的要点是将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归入同一目标体系，且在考核评价中贯彻协同思想，只有把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都纳入系统的评价框架，协同创新方可真正常态化。

学校应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借助数据共享及智能分析，为党建和思政教育协同提供技术支撑，如此操作不仅可提升工作效能，又可为制度落实提供可量化参考，助力协同机制持续改进[5]。

（三）提升师资素养与创新能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达成协同创新的关键支撑，民办高校要依靠校内外的培训及实践锻炼，持续提高思政课教师和党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培训内容需涵盖政治理论、教育学原理和信息化教学方法，助力教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融合。同时，需引导专业课教师于教学期间主动开展价值引导工作，借助案例教学、学术研究和课程思政建设，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洗礼。

在激励机制方面，学校可借助科研课题立项、职称评审以及绩效考核，把党建与思政教育成果列为重要指标，如此做不仅有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还可在校园中营造出重视思想教育的环境，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协同创新方能真正落到实处并产生应有的效果。

（四）整合资源与拓展实践载体

资源整合和实践拓展是民办高校落实改革精神的关键步骤，学校要充分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深度整合，扩大党建与思政教育的覆盖广度，搭建数字化学习空间与智慧校园，学生可随时获取学习资料，且在互动交流中强化对改革精神的认知。

对于校外实践活动，学校要主动搭建实践平台，助力学生投身社会实际，参与社区服务、企业实习和社会调研活动，学生可于现实场景中体悟社会变革与责任承担。此类实践体验不但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质感，又助力学生在服务社会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资源整合涵盖了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凭借搭建长期协作机制，学校能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撑，拓展思政教育的实践途径，助力学生在多元平台达成价值认同与能力提升。

五、结语

改革精神是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想驱动力，对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意义重大，依靠加强价值引领、健全制度架构、提升教师素养和拓展实践平台，才能切实推进协同创新的深入实施。这样，民办高校既能提高自身教育水准，又能为社会输送更多有理想信念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以实现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积极互动。今后，民办高校仍需在资源整合及评价体系创新等领域持续用力，使改革精神真正贯穿于教育全环节，促使协同创新取得长效，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本。

参考文献

[1] 陈明宇 . 民办高校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现状与改革策略 [J]. 江苏高教 ,2024(11):49-54.

[2] 何林智 , 陈华 .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36(06):1-3.

[3] 谢淑芳 . 高质量党建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 [J]. 时代报告 ,2024(10):37-39.

[4] 马明菲 . 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组织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J]. 大学 ,2025(09):173-176.

[5] 曾盈 . 高校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探索 [J]. 高教探索 ,2025(S2):69-71.

（作者单位：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基于“互联网 + 党建”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构建研究

刘欣妍　蒋　琳 *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互联网 +”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在医疗健康领域，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速，而党建工作作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领，也亟须与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合，以提升工作效能、强化政治功能。本文立足于“互联网 + 党建”理念，探讨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的构建路径。通过分析当前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瓶颈，阐释建设智慧党建平台的重要性，并从平台开发、思维转型、安全机制与技术应用等维度提出具体策略，以推动党建工作向智慧化、规范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从而为公立医院持续健康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健康事业。

关键词：互联网 + 党建；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党建信息化

一、引言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与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与社会责任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成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将“互联网+党建”模式融入医院管理与党建实践，有助于构建资源整合、流程优化、覆盖全面的智慧党建平台，实现党建信息共享、组织管理协同与党员服务精准化，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增强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能，为新时代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二、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开展的特征

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存在着明显的行业特色，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业务与党建工作的融合性；二是信息技术与政治要求的适配性。

针对党员的特点，医务人员临床任务繁重，科室事务繁杂，在党务工作上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受到限制，因此，党建工作中存在着“时间碎片化、学习分散化”的问题，常因急诊手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中断学习，很难确保学习的连续性和系统性[1]。另外，大部分党员干部身为医务人员，具有良好的自身素养和较强的科技接纳度，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普及率达到 100%，这为“互联网 + 党建”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发展基础来看，目前公立医院已具备相当的信息化水平，电子病历、智慧门诊等相关软件得到较为完善的应用，这为构建党建平台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体系和运营模式，使其更易在服务流程设计、界面交互优化等领域有效落地。基于这一特点，智能党建平台需围绕“轻量化、便捷化、一体化”的核心需求，整合党务管理、党员学习、意识形态宣传、监督考核等功能。在管理方面，可实现党费交纳、组织关系转接、党员信息维护等全流程线上办理；学习方面，通过集成各类教学资源，实现远程教学、网络测试及学习过程追踪；对外传播方面，实现基层党组织动态、党建信息和政策解读等功能；监管评价层面，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工作业绩进行定量管控，推动管理、培训、教育和宣传工作深度融合，使党建工作走出“阶段性突击”的模式，建立持续化、长效化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的工作效能[2]。

三、基于“互联网 + 党建”打造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的必要性

（一）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通过“线上 + 线下”的互动方式，突破传统党建工作的“实体界限”，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范围，推动组织建设向扁平化、互动化方向发展。在实践中，该

系统可利用信息技术对“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进行量化管理，对入党申请、培养教育至转正审批的全过程进行规范管控，实现党员参与度、党组织生活完成率等各项指标的自动采集，使党建工作由“定性描述”转向“定量分析”，有效突破“重形式轻实效”的桎梏，整体提升党建工作的标准化水平和实践质量[3]。

（二）提高党务工作效率

“智能党建平台”可将传统“纸质”账簿转化为“电子账簿”，实现跨部门、跨医院的党建信息共享，“一键”完成组织关系转接、公文发布、通知传达等繁琐业务，同时及时更新党员信息、党费交纳等数据。此举将大幅缩短人工登记、层层上报的耗时，例如将原本 3~5 个工作日的办理流程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党务人员无需反复录入资料，工作量降低 40%，让管理工作更精准、便捷。与此同时，平台可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力，挖掘广大党员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为后续工作调整优化提供依据，提高党组织服务群众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优化考核评价机制

通过智能党建系统，实现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化与标准化，为考核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奠定基础。该平台可依据党员教育培训时长、主题党日参与率、学习考试合格率、志愿服务时长等多维度指标，每月进行定量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及各部门开展统计分析，有效克服以往“只看印象、凭资料”的传统评价模式[4]。党组织可根据考核结果开展针对性培训与提升工作，不仅能优化党组织生活质量，还能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激发党员主动投身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四）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当前，化解医患矛盾、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而党建工作作为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建立良性运行机制、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互联网 + 党建”理念指引下，智慧党建平台的建设以高效便捷的方式增强医护人员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也是对广大基层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的有效手段。可将党建工作与医疗卫生服务紧密结合，例如设立“党员先锋岗”在线申报、志愿服务预约、患者满意度测评等功能，让党员在基层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5]。在实现高效信息流转与资源配置的同时，强化党的领导能力，从根本上适应卫生体制改革需求，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四、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开展现存问题分析

（一）党建与业务融合不够紧密

公立医院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应对医改挑战，但目前部分医院的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未能深度融合，出现“两张皮”现象。主要体现在：党建工作与临床工作脱节，活动设计与医疗服务关联度低，例如主题党日多以理论学习为主，未结合临床难点和患者需求设计实践内容，导致部分党员将党建工作视为“额外负担”，甚至出现“突击完成任务、应付检查”的情况。这一问题直接影响院方与医疗业务部门的协作，例如党建工作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关联不够紧密，导致党员参与党建工作的热情不足，进而影响党建在医疗改革、学科建设等中心工作中的引领作用，难以实现“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的良性互动。尽管部分医院已尝试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考核，但考核指标缺乏定量依据，致使融合成效不明显，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并亟待解决。

（二）党建方式单一，吸引力不足

目前，部分公立医院的党建工作仍停留在“表彰先进”“集中培训”“主题党日”的传统模式，形式固化、内容繁琐，缺乏与时俱进的吸引力。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党员交纳党费仍依赖现金或线下转账，未真正实现“无纸化”；党建资料分散于各部门，难以即时共享更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主要依靠传统纸质介绍信，不仅耗时费力，还易丢失，造成党员身份滞留、信息脱节等问题。这种传统方式不仅加重党务工作负担，还导致党员参与热情下降。青年党员更习惯线上化、碎片化的参与形式，而传统集中学习模式难以适配其工作规律，例如集中培训常与临床值班冲突，导致参与率不足 60%，影响党员教育管理的覆盖率与实效性。

五、基于“互联网 + 党建”打造公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的策略

（一）开发数字平台，实现精细化管理

公立医院亟须构建契合医药行业特征、以“精准化、便捷化、一体化”为核心的“智能党建”平台。在空间治理层面，建立医院三维数字化数据库，该数据库需精准呈现医院各党支部地理位置、党员人数、负责人及联络方式，同时关联党员构成（年龄、职称、科室）、活动开展记录（近一年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考核评价结果等数据，支持通过立体柱状图、热力图等形式可视化呈现，方便党委统筹掌握各支部动态[6]。在此基础上，借助系统精准定位与信息查询功能，实现对特定院区或部门党员信息的快速检索，提升管理效率。针对公立医院夜班党员、急诊党员等特殊岗位群体，平台新增“错峰学习提醒”功能——系统根据党员提交的月度值班表，在非值班日的早间、晚间时段推送学习提醒，避免与临床工作冲突；同时设置“学习进度补偿机制”，若党员因紧急医疗任务错过学习计划，系统自动延长学习周期并减少后续单次学习任务量，确保党建学习与临床工作灵活适配，进一步提

升党员参与的便利性。

宣传学习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党员群等媒介平台，及时推送党内政策、会议精神、党建资讯及医药卫生领域先进典型；整合党员学习记录、活动参与情况及考核结果，实现线上学习、线上考试、组织生活登记等功能。通过签到打卡、学习积分排名、优秀经验展示等方式，激发党员学习积极性。

服务政务方面，通过研发专属手机 App，重点优化多院区服务：设立“跨院办理”模块，党员可线上预约组织关系转接、党费交纳、证明开具等业务，自主选择就近办理网点，App 自动规划导航路线，并提前告知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及办公时间；增设“多院党组织联动”功能，支持各院区党支部联合开展线上主题党日活动及跨院志愿服务协作 [7]。

（二）强化“互联网 +”思维，搭建党建融合平台

在“互联网 +”背景下，公立医院需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实现党建工作由“网络化”向“智慧化”转型。党员管理方面，将党员发展全流程信息化，从入党申请、培养考察至转正审批均在平台完成，关键环节自动记录并形成培养档案，确保流程标准化、可追溯。党员教育方面，充分利用网站、App、短视频平台等多元媒介，整合适配医护人员碎片化时间的学习内容，例如将党建理论、政策解读等制作成 5~10 分钟的微视频、音频课程，便于党员在值班间隙、通勤途中学习。

创新联动模式，搭建“党建 + 业务”融合平台，设立“诊疗难题研讨”“患者需求反馈”“党员先锋岗申报”等模块，方便党员在线分享临床工作中的党建感悟、提出业务改进建议；党组织可围绕学科建设、医患沟通、公益服务等主题发起线上投票、话题讨论，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同时，引入线上评分、服务点赞等机制，将党员服务群众成效与考核挂钩，充分激发党员服务热情，密切党员与群众联系，为群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健康服务。

（三）健全网络安全机制，规范平台运行

鉴于平台涉及党员个人信息及党内敏感信息处理，需建立“制度 + 科技”双重安全机制。制度层面，制定平台使用规范及信息保密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发布审核流程与管理标准，严禁擅自泄露党员个人信息；制定严格言论准则，禁止发布恶意中伤、谣言等不良内容，对违规言论实施预警与追责，强化线上党员教育引导。

技术层面，采用分级权限管理模式，依据党委领导、党务工作者、党员、群众等不同身份，赋予对应操作权限。例如，党委领导可查阅平台全部数据，党务工作者负责信息维护与公开，党员仅可查看个人相关信息及公开内容。通过加密存储、定期备份、安全审计等手段防范数据泄露与篡改；建立“党员意见反馈机制”，充分保障党员知情权与表达权。同时，强化政治理论与网络安全培训，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与安全意识，确保平台安全规范运行。

（四）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增强党建互动性与实效性

借助信息技术拓展传统党建工作边界，解决当前党建工作与信息化建设适配不足的问题。活动形式上，利用直播、视频会议等技术突破空间限制，开展线上主题党日、跨区域党建共建、专家讲座等活动，例如邀请外地党建专家线上授课，或组织多院区党员联合开展线上公益义诊。

党建与业务融合方面，进一步深化信息化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党员志愿服务参与情况、临床一线表现等数据，自动生成《党员先锋指标》，为评优评先提供依据；联动“患者满意度评价体系”，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评价纳入党组织考核，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卫生服务深度融合。同时，运用物联网技术在党员示范岗、志愿服务点设置打卡终端，自动记录服务时长与内容，实现党建工作成效定量评价，提升党建工作互动性与实效性，最大限度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智慧党建平台可与医院 HIS 系统（医院信息系统）联动，党员参与社区公益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后，系统自动从 HIS 系统抓取服务对象信息（脱敏处理），生成“党员服务台账”，避免重复录入；同时，平台根据党员近 3 个月的临床工作量动态调整学习任务量——临床值班频次高的党员，系统自动缩短单次学习时长至 15 分钟以内，并推送音频类学习资源，适配其碎片化时间，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与医疗业务的适配性。

六、结语

在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积极践行“互联网 + 党建”模式，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构建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智慧党建平台，是提升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与影响力的关键路径。通过平台重构、思维转变、机制完善与技术赋能，公立医院能够进一步激发党建活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实现从“业务型”党建向“智慧型”党建的跨越，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与人民健康事业的扎实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武启峰，郭舒婕，王玮，等. 大型公立医院智慧党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思考 [J]. 中国医院管理，2023,43(06):78-80.

[2] 项海峰. 大型公立医院智慧党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思考 [J]. 电脑爱好者（电子刊），2020(07):587-588.

[3] 冯萍，卓兹泽，冀术明，等. 基于微信的大型公立医院党建平台构建 [J]. 中国医院，2019,23(10):48-50.

[4] 李萌. 基于微信构建公立医院党建平 （下转 40 页）

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分析

王利明

摘要：当代社会治理体系不断革新，基层组织建设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党员管理作为加强基层治理的核心环节，其效能发挥直接关系到组织活力与执行力。文章以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党员管理在强化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以及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与发展机遇，提出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突出先锋模范作用、创新党建工作方法等应对策略，旨在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科学化、规范化与现代化，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党员管理：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

当前，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党组织建设中党员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强党员管理不仅关乎党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更是提升基层单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故而深入研究党员管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剖析存在问题并探索有效对策，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提升服务水平以及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作用机制

（一）强化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现代党组织建设中，作为基层单位核心工作的党员管理机制，通过规范化考核与监督的管理过程，使每位党员在日常实践中自觉践行应尽职责并内化为个体自觉行为准则，不仅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更在思想层面构建起纯洁性屏障以确保党员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其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转化为党组织优势，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整体能力提升与社会形象改善，最终为基层单位党组织赢得更广泛认同与支持[1]。

（二）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

通过有效的党员管理体系为基层单位党组织注入活力以增强其整体应对挑战能力，借管理过程强化党员间纽带联系，使分散个体形成有机整体共同应对外部压力与内部变革。深入推进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专题讨论等形式深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促使个体自觉向优秀榜样看齐。因基层单位党组织凝聚力提升带来内部协调性增强、各项决策更有效落实、创新思想获得更广泛支持而从根本上改变党组织面貌，让基层单位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与生命力。

（三）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基层网络，形成了覆盖各领域的党组织架构，为基层单位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机制促使基层单位党组织深入群众，广泛联系各方，成为联系民众的重要桥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层单位党组织通过定期

（上接 39 页）

台 [J]. 青年时代 ,2020,71(34):45-46.

[5] 贾思宁 , 李楠 , 常诚诚 , 等 . 某大型公立医院智慧型党建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J]. 办公室业务 ,2023(01):182-185.

[6] 杜楚源 , 白燕 . 以医联体党建平台为抓手加强公立医院监督体系建设 [J]. 党政论坛 ,2022(03):37-38.

[7] 刘佳 .“学习强国”平台助推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探究 [J]. 办公室业务 ,2021(24):28-29.

（作者：刘欣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办公室干事、研究实习员；通信作者蒋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会议、民主生活会等制度，确保各项决策符合大众期待，实现了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堡垒作用的发挥使基层单位党组织成为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各项发展任务在基层单位党组织引领下得到有序推进，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实现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2]。

二、党员管理在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中的发展机遇

（一）数字化转型赋能党建新模式

当前数字化技术迭代为基层党组织党员管理提供全新支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破传统管理的时空限制，推动党员管理转向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模式。基层党组织借助数字化平台可实时采集党员参与组织生活、学习教育等多维度数据，通过数据建模精准掌握党员思想动态与工作表现，实现个性化管理与精准化服务。如专属党建 App 让党员随时参与线上学习、提交思想汇报，党组织则能通过平台数据监测党员参与度，及时调整管理策略，这种模式大幅提升管理效率，推动基层党建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为其注入新的技术活力。

（二）融合发展深化党建工作价值

新时代党建与基层单位中心工作、社会治理的融合趋势，为党员管理拓展了实践空间，使其不再局限于党组织内部，而是与单位业务发展、群众服务紧密结合。基层党组织可将党员管理与业务考核、志愿服务等结合，让党员在参与单位重点任务、解决群众问题中发挥作用，同时在业务工作中嵌入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等载体，使党员管理成效体现在单位业绩与群众满意度上。这种融合模式让党员管理更具实效，推动党建从“务虚”走向“务实”，切实提升党组织核心价值[3]。

（三）多元协同激发党建创新活力

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形成协同联动格局，为党员管理创新提供丰富资源与平台。基层党组织可联合社区开展党员共建活动，组织党员参与社区环境整治、矛盾调解，还能借助企业技术资源与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为党员提供多样化培训与实践机会。如与企业合作开展技能培训，让党员将技能应用于工作与服务；与公益组织合作帮扶困难群众，强化党员宗旨意识。这种多元协同模式打破党建封闭性，整合资源，激发党员参与热情，推动党员管理创新。

（四）制度创新优化党员发展路径

党内法规完善与基层党建制度创新，为党员管理提供科学规范的制度保障，也优化了党员发展路径。党员发展入口环节，新修订的细则明确标准与程序，基层党组织严把质量关，确保新党员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党员教育管理环节，积分制管理、评议制度等创新，让管理有章可循，也为党员搭建清晰成长路径。党员可通过参与活动、提升能力、服务群众积累积分、获得认可，在评先评优、晋升中获得机会，这种路径优化提升管理规范性，调动党员积极性，为党组织储备优秀人才。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措施

（一）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强化组织运行保障

在基层单位组织建设过程中，制度规范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是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根本保障，它不仅为组织运行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更为党员行为设定了清晰边界，使整体工作在规范化轨道上持续推进。

一是构建完整的制度体系，将组织建设各环节纳入规范化管理范畴。这需要基层单位全面梳理现有制度，找出漏洞与盲区，进而制定覆盖组织生活、党员管理、工作考核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形成闭环管理模式。例如，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机制建设中，可明确列出必须经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事项清单，包括年度工作计划、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同时制定详细的议事规则，规定会前材料提前三天发放，与会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二方可召开，表决需超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等，确保决策过程规范透明。二是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规定不流于形式。基层单位应建立制度执行情况定期检查机制，对执行不力的问题及时纠正，对违反制度的行为严肃处理，营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氛围。可以建立制度执行“红黄牌”警示机制，将制度执行情况量化为 100 分制，90 分以上为绿灯区，75~90 分为黄牌警告区，要求限期整改，75 分以下为红牌区，直接与季度绩效挂钩，扣减 20% 的绩效工资，连续两次红牌者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这种刚性约束机制能有效提高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党性修养水平

在思想建设中，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它对组织纯洁性与凝聚力有着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当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极其重要，因为它同基层单位的向心力、战斗力直接相关，对每一位党员的行为取向、价值判断也存在影响。

一方面，通过摒弃基层单位传统说教式、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充分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和教育手段，以专题讲座、观看影片、情景模拟、体验式学习等多种形式创新教育形式，使抽象理念变得生动具体，从而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及实效性。比如，设计包含参观历史博物馆了解组织发展历程、实地走访资深党员听取经验分享、重温入党誓词强化身份认同、分组讨论交流感受心得等环节的“信念之旅”体验式学习活动，全程记录参与者情绪变化和认识提升，

活动结束后撰写心得体会并交流分享，以这种沉浸式体验达成比单纯理论学习更显著的效果[4]。

另一方面，基层单位应鼓励党员将理论学习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理论认识，增强理想信念的实践基础。比如，可以开展“我与基层共成长”主题实践活动，要求每位党员结合自身工作撰写月度心得体会，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体交流研讨，每半年编印一期优秀成果汇编，年终评选十佳实践案例并进行表彰，形成常态化的理论联系实际机制，使理想信念教育落地生根，真正转化为工作动力和精神支撑。

（三）突出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组织战斗活力

在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提升整体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关系到组织形象的塑造，更直接影响着群众对组织的认同感和信任度，是提升基层单位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一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动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的积极性。基层单位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纳入评价指标，与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等直接挂钩，形成正向激励，同时还应营造崇尚先进、学习榜样的良好氛围，通过定期表彰、事迹宣讲等形式，扩大优秀党员的影响力，使模范带头成为组织的普遍追求。例如，建立“模范积分制”激励机制，为党员在技术创新（每项创新成果积 10 分）、服务群众（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积 3 分）、组织建设（每完成一项组织任务积 5 分）等方面的贡献量化计分，季度积分达到 50 分可获得“季度模范”称号，年度积分达到 200 分可获得“年度标兵”荣誉称号，积分还可兑换专业培训机会、学习考察名额、带薪休假等实质性激励，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激励效果。

二是搭建党员才干展示平台，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基层单位应根据不同岗位特点和党员特长，设立多种形式的岗位创新、技能比武、志愿服务等平台，使党员有机会展示才干、实现价值，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体现先锋模范作用。比如，建立“三级责任区”工作机制，即组织责任区、小组责任区和个人责任区，每位党员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和工作目标，如负责本部门 5 名新党员的培养指导，每月至少进行 2 次一对一辅导，每季度组织 1 次集体研讨，半年内使新党员能够独立完成基本工作任务，年终根据新党员成长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这种责任明确、任务具体的工作方式能够激发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在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基层单位组织建设工作亟须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采取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评价机制，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升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使组织建设工作由“软任务”变为“硬指标”，真正融入基层单位整体管理体系。因此，基层单位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平台，实现组织生活、学习教育、考核评价等各环节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例如开发“智慧组织”移动应用平台，整合组织通知（实时推送功能）、学习资料（分类检索系统）、活动报名（一键参与机制）、成果展示（作品集展示区）等功能模块，党员可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查看组织动态、参与线上学习、交流工作经验、上传工作成果，系统自动记录每位党员的参与频次和活跃度，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这种信息化平台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大大扩大组织活动的覆盖面并提高并提高参与度[5]。

此外，基层单位应打破传统评价方式的局限，结合工作实际，建立科学的量化考核体系，设计科学合理的量化指标，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客观地评价组织建设工作成效，使组织建设工作成效可测可评。例如建立“1+X”考核模式，“1”代表组织建设基础工作指标（占总分的 40%），包括组织生活出勤率不低于 95%、学习教育完成率 100%、制度执行无违规等基本要求；“X”代表特色工作指标（占总分的 60%），基层单位可根据自身特点自主设计 3~5 项特色工作并设定相应权重，如创新项目（20%）、社会服务（15%）、文化建设（15%）、人才培养（10%）等，每季度进行一次评分，年终汇总形成总体评价，与绩效考核和资源配置直接挂钩，形成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评价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党员管理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发挥模范作用和创新工作方法，能够有效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推动信息技术与组织建设深度融合，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1] 徐文国 . 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分析 [J]. 电脑校园 ,2020(11):11225-11226.

[2] 李劼 , 刘侦 , 胡祎 . 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员教育管理的实践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30):92-94.

[3] 高静 . 对基层单位党员教育工作的思考 [J]. 中国科技投资 ,2024(35):139-141.

[4] 欧述俊 , 任宓娜 , 夏可 . 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J]. 水文化 ,2022(06):8-10.

[5] 陈玲玲 . 试论党员管理对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促进作用 [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2017(02):93-94.

（作者单位：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医院党建工作与柔性管理的融合实践

李洪忠

摘要：党建工作是公立医院不容置疑的首要政治任务，柔性管理作为管理技术，必须服务于党建、从属于党建。本文立足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实际，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借鉴党建与思政协同育人、党建引领文化建设等相关经验，探索柔性管理在医院党建中的融合路径，从思想引领、队伍建设、医患沟通、文化浸润四个维度，提出可落地、接地气的实践策略，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引领”转变，以柔性管理赋能党建提质，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关键词：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柔性管理；融合实践；人文关怀

党建工作是公立医院刚性政治任务，地位不容置疑且必须放在首位，柔性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技术，始终服务于党建、从属于党建。柔性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摒弃“命令—服从”的单一逻辑，注重情感共鸣、价值认同和个性化引导，与党建工作“以人为本、凝聚人心”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将柔性管理融入医院党建工作，不是弱化刚性制度的约束作用，而是实现“刚柔并济”，让党建工作既有制度的严肃性，又有人文的温度，依托柔性管理的技术优势，更好彰显党建引领作用。

一、医院党建工作与柔性管理的融合逻辑及实践导向

理解医院党建与柔性管理的融合逻辑，首要前提是明确二者核心定位：党建为根本引领，柔性管理为技术支撑，柔性管理的运用始终围绕党建工作展开、服务于党建目标。既要认清柔性管理对党建工作的赋能作用，也要坚守融合过程中的核心原则，始终突出党建首位度，让柔性管理成为党建工作的有益补充。

（一）强化思想认知，锚定融合核心导向

公立医院党建工作者需精准把握党建与柔性管理的定位关系，明确党建首位地位，同时深化对柔性管理的认知，树立“党建引领、柔性赋能”的理念。党建工作的核心是落实上级任务、遵守规章制度，完成“三会一课”、党员发展等硬性指标，同时借助柔性管理的优势，强化人文关怀和情感联结。党务工作者应主动树立柔性管理理念，开展党建工作时，在坚守党建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柔性管理方式，加强与党员职工的沟通交流，精准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推动党建工作与职工需求深度契合。

（二）丰富融合举措，提升实践针对性和实效性

公立医院在推进柔性管理与党建融合过程中，需立足党建引领，丰富融合举措，突破表面化融合模式，让柔性管理深度服务于党建工作，贴合党员职工和患者的实际需求，提升融合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队伍建设方面，结合党建工作要求，推行个性化柔性管理举措，结合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需求的党员职工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培养和激励方式，兼顾青年职工的职业发展需求、老年职工的身心健康需求、临床一线职工的压力缓解需求。比如，医院党建培训可在集中授课基础上，增加针对临床医护人员的碎片化培训、针对性指导，贴合医护人员工作繁忙、时间紧张的实际情况，让党建培训更具实用性。

（三）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深度融合的长效支撑

柔性管理与医院党建的深度融合，需以完善的保障机制为支撑，始终围绕党建引领目标，健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融合工作持续推进、落地见效，充分发挥柔性管理对党建的服务作用。一是强化人才保障。党务工作者是党建与柔性管理融合的核心力量，公立医院需健全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对党务工作者的培训，让医学专业出身的党务工作者系统掌握柔性管理知识，让非医学专业的党务工作者熟悉临床业务，能够结合临床实际开展柔性党建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柔性管理相关培训，提升党务

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能力，更好发挥柔性管理服务党建的作用。二是强化经费保障。合理调配党建工作经费，在保障刚性任务落实的基础上，加大对柔性管理相关工作的经费投入，支撑情感疏导、个性化培养、文化建设等柔性举措落地，让柔性管理更好服务于党建工作，助力党建提质增效。

二、医院党建工作中柔性管理的融合实践路径

立足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实际，坚守党建首位原则，让柔性管理全程服务于党建、从属于党建，从思想引领、队伍建设、医患沟通、文化浸润四个维度，推动柔性管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柔性管理的技术优势，赋能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柔性引领思想，破除认知误区，凝聚价值共识

思想引领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在坚守党建刚性原则的基础上，采用柔性化方式，推动党建理念入脑入心，凝聚党员职工的价值共识，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要创新思想教育形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摒弃“念文件、读报告”的单一模式，结合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实际，采用“微党课、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柔性方式开展思想教育。依托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开设“柔性党建”专栏，推送党史知识、先进典型事迹、人文关怀案例等内容，让党员职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增强思想教育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动态监测，精准开展情感疏导。建立党员职工思想动态监测机制，通过支部谈心谈话、问卷调查、一对一交流等方式，及时了解党员职工的思想动态、工作压力和实际需求，建立思想动态台账，对存在思想困惑、工作压力较大的职工，开展针对性的情感疏导和心理辅导。比如，针对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工作繁忙、压力大的问题，定期组织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缓解其心理压力；针对青年职工职业迷茫的问题，开展谈心谈话，了解其职业规划，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

此外，还应该强化价值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将柔性管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培育相结合，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引导党员职工树立“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理念，增强党员职工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1]。

（二）柔性培育队伍，激发内生动力，夯实党建基础

党员队伍是医院党建工作的核心力量，柔性管理与队伍建设的融合，始终围绕党建工作要求，关注党员职工的职业发展、个性化需求，通过柔性培育、激励保障，激发党员职工的内生动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人文情怀深厚的党员队伍，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一是推行个性化培养，助力职工成长成才。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实施“头雁工程”“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和“双培养”机制，结合党员职工的岗位特点、职业规划，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于临床一线党员职工，重点加强业务技能培训，鼓励其进修学习、开展科研项目，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对于党务工作者，重点加强党建知识、柔性管理方法的培训，提升其党建工作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对于青年党员职工，实施“党建导师制”，安排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担任导师，一对一指导其成长成才，助力青年职工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党员先锋。

二是完善柔性激励机制，激发工作积极性。打破“唯学历、唯职称、唯业绩”的传统激励模式，建立多元化、柔性化的激励机制，将党员职工参与党建工作、践行柔性管理的成效，与职称评审、绩效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比如，对积极参与党建活动、主动开展人文服务、化解医患矛盾成效显著的党员职工，给予表彰奖励、优先晋升；设立“党建创新奖”“人文关怀奖”等专项激励，鼓励党员职工创新柔性党建举措。

三是优化队伍管理，营造宽松和谐氛围。摒弃“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注重个性化管理，尊重党员职工的工作习惯和个性化需求，在不违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工作方式，为职工提供便利[2]。比如，针对哺乳期女职工、老年职工，合理调整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针对临床一线职工，优化排班制度，缓解其工作压力。同时，加强支部建设，推行“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鼓励各党支部结合学科专长，开展特色党建活动，增强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营造宽松和谐、团结协作的工作氛围。

（三）柔性化解矛盾，优化服务举措，践行党建宗旨

践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医院党建工作的根本宗旨。柔性管理与医患沟通的融合，始终以党建为引领，将人文关怀延伸至患者，通过柔性服务、情感沟通，化解医患矛盾，提升患者满意度，践行党建宗旨、彰显医者担当。

一是构建柔性医患沟通机制，缓解医患对立情绪。建立“党建 + 调解”协同机制，在临床科室设立党员调解岗，由党员骨干担任调解员，负责医患沟通、矛盾排查和纠纷调解工作。党员调解员要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和意见，用温和、真诚的态度解答患者的疑问，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拉近医患距离。同时，推行“叙事医学”理念，引导医护人员倾听患者的故事，理解患者的痛苦和需求，增强医患之间的情感共鸣，构建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医患关系。根据相关实证研究，推行党员调解岗后，调解员介入纠纷的平均时间从 4.2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调解成功率从 61.3% 升至 83.7%。

二是优化柔性服务举措，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结合患者的就医需求，优化服务流程，推行一系列便民

惠民的柔性服务举措。比如，打造“党员先锋岗”“医德示范岗”，党员带头推行“一次挂号、首诊负责、零元续诊”模式，解决群众“一次就诊、多次挂号”的就医痛点；在门诊、住院部设立党员服务台，为患者提供导诊、咨询、代办等便民服务；针对老年患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帮扶服务，优化就医体验。同时，加强出院患者随访工作，党员带头开展随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提供针对性的康复指导和健康咨询，让患者感受到持续的关怀和温暖。

三是健全风险防控体系，防范医患矛盾发生。依托“互联网＋党建＋智慧医疗”平台，构建医患矛盾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患者投诉、网络舆情等数据，及时捕捉医患矛盾隐患，提前介入、精准防控，避免矛盾升级[3]。同时，组建以党员骨干为核心的“医患调解快速反应小组”，建立“日常培训＋实战演练”能力提升机制，确保纠纷发生时能够迅速、专业地介入调解。

（四）柔性浸润文化，厚植人文底蕴，赋能高质量发展

柔性管理与医院文化建设的融合，始终围绕党建引领目标，将柔性理念融入医院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浸润、氛围营造，厚植医院人文底蕴，让柔性管理成为医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成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补充，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一是构建柔性文化体系，明确文化内核。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结合医院党建工作要求和自身发展实际，构建具有人文特色的柔性文化体系，明确医院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将“以人为本、刚柔并济、人文关怀”的理念融入医院文化建设的全过程[4]。设计院训、院歌、院旗，让文化理念植根于每一位党员职工心中，成为推动医院发展的精神动力。

二是营造柔性文化氛围，增强文化感染力。依托院报、网站、文化长廊、道德讲堂等平台，宣传柔性管理理念、人文关怀案例、先进典型事迹，营造“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的柔性文化氛围。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比如职工运动会、读书会、文艺汇演等，丰富党员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是推动文化与业务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将柔性文化与医疗业务、学科建设、精细管理等核心环节深度融合，引导党员职工将柔性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优化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比如，在学科建设中，鼓励医务人员加强协作、互帮互助，推动学科协同发展；在精细管理中，注重人文关怀，优化医院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行效能；在医疗服务中，推行人文服务，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5]。

三、结语

综上，柔性管理与医院党建的深度融合，核心是坚守党建首位原则，让柔性管理这一管理技术全程服务于党建、从属于党建，是新时代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理念叠加、举措拼凑，而是要实现“刚柔并济、相辅相成”，让党建工作既有制度的严肃性，又有人文的温度；既坚守政治引领的根本方向，又注重人心凝聚的核心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柔性管理与医院党建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公立医院，其党建工作基础、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融合过程中，要结合自身实际，灵活调整、创新完善，探索适合自身的融合模式，让柔性管理更好服务于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霄宇. 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与创新策略研究 [N]. 山西市场导报 ,2025-12-30(15).

[2] 杜晨 , 卢添林 , 李鸿浩 , 等. 公立医院党建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 华西医学 ,2025,40(12):1930-1935.

[3] 张敏敏 , 戴亚文 , 张慧 , 等. 党建引领下基于麦肯锡 7S 理论的公立医院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J]. 现代医院 ,2025,25(12):1827-1829.

[4] 杨吉羚 , 李中兴 , 刘园园 , 等. 医院党建工作在化解医患矛盾中的效能现状及对策研究 [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25,36(12):1817-1820.

[5] 袁成 , 张翠 , 王艳 . 公立医院党建与思政工作协同育人的四维审视 [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6(04):21-26.

（作者系湘乡市人民医院医患沟通办公室政工师）

以扎实的党的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

王怡娴

摘要：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对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通过扎实的作风建设，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能够有效推动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师资队伍素质全面提升，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强化产教融合深度发展。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工作方法与建立评价监督机制，构建作风建设与职业院校发展的有机融合机制，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党的作风建设；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政治保证；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保障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撑。当前，职业院校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面临着提升办学层次、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建设等重大任务。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作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扎实的作风建设能够为职业院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发全校师生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确保各项改革发展任务落地见效，推动职业院校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一、把握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作风建设是推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职业院校必须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见表 1）。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

党的全面领导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职业院校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办学方向正确，作风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全面领导能否有效落实，关系到职业院校能否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职业院校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

表 1　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框架

根本要求	具体内容	实施路径	预期效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强化政治建设，完善决策机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建工作融合	确保办学方向正确，提升组织凝聚力
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强化师德师风，营造育人环境，推进课程思政	完善育人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德技并修人才，提升育人质量

良好的作风是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作风端正能够带动全校师生员工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得党的各项决策部署能够在职业院校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同时作风建设能够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干部通过作风建设能够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职业院校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通过这种制度安排，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能够在职业院校得到全面贯彻，使得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够落地生根。作风建设还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党建引领发展的良好格局，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职业院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职业院校因此能够在复杂且多变的发展环境中保持正确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1]。

（二）贯彻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风建设为立德树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精神动力，确保职业院校始终坚持正确的育人导向。立德树人体现了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作风建设直接影响着育人环境的营造，教师队伍作风过硬能够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管理干部作风优良能够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这种环境熏陶对学生品格塑造具有深远影响，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确价值观引导。作风建设还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师生在良好的环境中相互影响并共同成长进步。

职业院校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传承工匠精神和职业操守，作风建设还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得立德树人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课程思政建设得到加强，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能够成为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通过坚持立德树人，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抓实作风建设推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作风建设必须与职业院校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关键环节上精准发力，通过抓实关键环节，推动作风建设取得实效，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以作风建设引领治理体系优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风建设为治理体系优化提供了内在动力，推动职业院校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优良的作风能够激发干部队伍的工作活力，增强组织执行力和战斗力。

作风建设直接影响着治理效能的提升，干部队伍作风扎实，能够深入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和师生需求，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执行更加有力有效。同时作风建设强化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推动各级干部主动作为，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干部队伍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攻坚克难，形成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职业院校通过作风建设，能够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权力运行机制，作风建设促进了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执行，使得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这种制度化管理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作风建设还推动了信息公开和民主监督，增强了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各级组织和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自觉接受监督，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职业院校因而能够形成权责明确，协调有序的治理格局，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

（二）以作风建设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职业院校发展的核心要素，作风建设为师资队伍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良好的作风能够引领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强化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作风建设对师资队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优良的作风能够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使得教师更加专注于教学科研工作，作风建设还强化了教师的职业操守，提升了教师的师德水平和专业素养。这种内在品质的提升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同时作风建设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了互学互鉴的良好氛围。

职业院校通过作风建设，能够建立健全师资队伍培养培训机制，作风建设推动了教师发展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得教师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进步，同时作风建设促进了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为教师提供了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教师在企业实践中提升了专业技能，增强了实践教学能力，作风建设还推动了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有机结合，完善了教师评价激励机制，职业院校因而能够汇聚更多优秀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

（三）以作风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改革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作风建设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和组织保障，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扎实的作风能够保证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并看到效果，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作风建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干部教师作风过硬能够勇于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这种改革精神推动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使职业院校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作风建设还要强化质量意识与创新意识，推动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教师敢于尝试新技术与新方法，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并提高教学效果。

职业院校通过作风建设能够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风建设促进与企业的深度对接，使得专业设置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教学内容与方法因而更加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作风建设还推动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教学设施和实训基地的使用效率，课程体系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持续创新且评价机制日趋科学，职业院校通过持续的改革创新，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3]。

三、建立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是作风建设持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职业院校必须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一）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根本保障，职业院校必须建立健全作风建设制度体系，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规范干部教师的行为，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直接关系到作风建设的成效。

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系统谋划与统筹推进，职业院校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与实施细则，这些制度涵盖干部选拔任用，教师队伍管理与学生工作开展等各个方面，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着作风建设的实际效果。制度建设还需要注重系统性与协调性，避免制度之间的冲突与重复。

职业院校通过健全制度保障体系，能够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推动作风建设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使得作风建设不再是一时之举，各级组织与个人都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开展工作，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制度体系还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对违反作风建设要求的行为给予严肃处理，这种制度约束使得作风建设成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动，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制度保障体系的完善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实基础，来确保作风建设取得长期稳定的效果[4]。

（二）完善监督评价机制

监督评价是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职业院校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有效的监督评价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改进，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作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职业院校应当建立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格局，内部监督包括党委监督，纪检监督与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外部监督则包括上级部门监督、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等，这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能够有效防止作风问题的发生。

职业院校通过完善监督评价机制，能够推动作风建设的深入发展，监督评价机制促进了作风建设的量化管理，使得作风建设成效能够得到客观评判，评价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教师考核评价与绩效分配等紧密挂钩，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监督评价还推动了作风建设经验的总结推广，促进了先进典型的培育选树，这种正向激励机制激发了全校师生参与作风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为作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确保作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见图 1）。

（三）构建协同推进格局

协同推进是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职业院校作风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层面，必须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与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协同推进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协同推进格局的构建水平直接决定着作风建设的整体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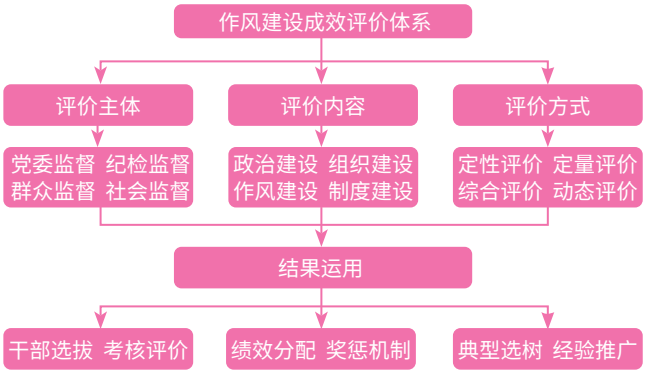


图 1 作风建设成效评价体系框架图

协同推进格局的构建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职业院校党委应当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统筹推进作风建设各项工作，各职能部门应当明确责任分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同时协同推进还需要加强与校外相关部门的联系配合，形成内外联动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格局的构建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职业院校通过构建协同推进格局，能够实现作风建设与事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协同推进格局促进了作风建设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工作的深度结合，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还推动了作风建设成果的转化应用，使得作风建设真正成为推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协同推进格局的完善为作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确保作风建设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职业院校因而能够在新时代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5]。

四、结语

党的作风建设与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扎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职业院校党建工作的政治任务，也是推动职业院校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职业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把握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抓实关键环节、健全长效机制，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突破。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作风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注重统筹兼顾，将作风建设与职业院校各项事业发展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下转 49 页）

健康中国视角下医务社工服务现状和问题研究
——以D医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服务为例

刘珍瑜　刘芸杰　刘怡辰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本研究以北京市D医院康复科为例，深入剖析医务社工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服务中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目前，D医院的医务社工已开展音乐疗愈、个案干预等专业社工服务，在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提升康复信心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仍存在多主体协作困境、社区衔接断层、服务能力结构性缺陷、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本文从政策制度创新、服务模式升级、协作机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及整合式服务体系建设等多个维度，提出适合健康中国理念的优化路径，为完善脑卒中患者全周期康复服务、推动医务社工融入医疗核心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脑卒中；康复；健康中国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1. 背景

在当今社会，由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频发，脑卒中患者数量不断增加。作为一种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疾病，其康复过程不仅涉及身体功能恢复，更需心理支持、社会适应及家庭照护等多维度干预。脑卒中患者面临的不仅是肢体功能障碍，更可能因角色丧失、社会支持断裂而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然而，当前医院服务以生理康复为核心，对患者心理状态、出院后与社区衔接等需求难以作出系统性回应。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战略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建设[1]，并强调了社会力量在健康领域的参与，标志着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2]，构建全方位、全周

（上接48页）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思，刘保庆，席凯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理路[J].中国军转民，2025(07):111-113.

[2] 张坤，程向晖，杨敏，等.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地方医学院校本科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路径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5(02):16-18.

[3] 张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艺术院校高质量发展——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J].北京教育（高教），2025(01):54-57.

[4]《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为人民而歌 中国音乐学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艺术院校事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24(Z2):2.

[5] 郑爱娟.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究[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02):43-46,7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度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双高党建专项课题）“扎实党的作风建设保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以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ZY2023-58）。

（作者系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医务社工作为连接医疗服务与社会力量的重要桥梁，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应该成为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关键部分。然而，医务社工的服务现状与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目前，我国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但还没有完全普及，而且医务社工服务并没有纳入医院核心服务体系，其服务范围也局限于心理疏导、志愿服务等边缘性医疗工作，与医疗团队的协作较少。这种协作的脱节直接导致医务社工难以融入医疗核心流程，无法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所倡导的“全周期健康管理”目标。

2.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北京市 D 医院脑卒中患者康复过程中的医务社工服务进行深入分析，为政策制定提出建议；聚焦脑卒中患者康复全过程，分析医务社工在患者康复不同阶段的服务缺口，如心理支持、社会资源链接等方面的不足，为医院完善脑卒中患者康复服务流程提供具体路径；探讨医务社工在整合医疗资源、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中的角色定位，提炼符合健康中国理念的服务模式，以期同类医疗机构提供参考。

（二）核心概念界定

1. 脑卒中患者

脑卒中（cerebral stroke）是一种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脑血管突然破裂或血管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急性发作性脑血管疾病，包括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以缺血性脑卒中较为多见 [3]。主要临床表现为肢体瘫痪、言语障碍、认知功能下降等，常留有严重后遗症，需要长期康复干预。相关流行病学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3300 万例脑卒中病例，预计到 2030 年，脑卒中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有 240 万人，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将成为脑卒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4]。

2. 康复

康复，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职业、教育、社会、医学等手段，对残疾者进行训练及再训练，减轻致残因素带来的不便，提高其生活能力，促使其达到生活基本自理的标准，重新参与社会活动 [5]。对于脑卒中患者，康复不仅包括肢体功能恢复，还涉及言语、认知、心理及社会功能的全面重建，是一个贯穿急性期治疗、住院康复、社区随访及家庭照护的长期过程。

3. 医务社工服务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在卫生健康领域，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专业方法，帮助患者及家属预防、缓解和解决因疾病所导致的情绪、心理和社会问题，提升医疗效果，促进公众健康的职业活动 [6]。其服务范畴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医患关系调适、志愿者管理等，核心目标是通过专业的社工介入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促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落实。

（三）研究方法

1. 深度访谈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以 D 医院康复科、老年科、社工部门的医务人员及社工为主要深度访谈对象（见表 1）。访谈内容围绕医务社工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服务内容、协作机制、现存问题及发展期望展开。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整理总结出 D 医院康复科医务社工服务现状。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称呼	性别	部门	职位	工龄
01	丁老师	男	社工部	主任	14 年
02	王老师	男	社工部	社工	5 年
03	潇潇老师	女	康复科（高压氧区）	护士长	20 年
04	王老师	女	康复科（病房区）	护士长	20 年
05	阮老师	女	康复科（病房区）	护士长	20 年
06	马老师	女	康复科（病房区）	护士	7 年
07	马老师	女	康复科（康复区）	康复师	4 年
08	汤老师	男	康复科（康复区）	康复师	2 年
09	王老师	男	老年科	主任	20 年

2. 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以社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 D 医院康复科日常社工服务，观察医务社工在康复科小组活动、个案服务等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同时也观察脑卒中患者在院内康复过程中的生活和康复训练情况，患者与家属、护工及医护人员的互动等方面，从而能更加真实全面地了解脑卒中患者康复的情况，为本文研究提供真实材料。

二、D 医院脑卒中患者康复阶段社工服务现状

（一）D 医院康复科及社工部门概况

1. 康复科

D 医院康复科主要承担脑卒中、脊髓损伤、骨折术后等患者的康复治疗任务，分为高压氧区、康复区、病房区三个区域。服务团队由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护士及社工共同组成，开放床位 40 多张，康复治疗下设物理治疗（PT）、作业治疗（OT）、言语吞咽认知治疗（ST），以及物理因子、康复工程及高压氧治疗。

科室自 2020 年后正式引入医务社工，初期主要依赖实习生开展陪伴服务，近年来逐步发展出专业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

2. 社工部

D 医院社工部成立于 2016—2017 年，是北京市较早引入医务社工的医疗机构之一，服务内容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资源链接等。目前，D 医院社工部门共有专职社工 2 人、兼职社工（含实习生）5~8 人，服务覆盖老年科、康复科、肿瘤科等科室。

（二）医务社工在康复科服务内容

1. 小组

（1）绘画疗愈小组。该小组于 2022 年发起，初期由专业的心理老师主导，采用“房树人”绘画分析等心理技术，通过患者的绘画作品评估其心理状态并提供干预。心理老师离职后，小组转为社工主导，延续了绘画形式，但更强调“优势树”等社工理念，通过绘画引导患者发现自身优势，增强康复信心。小组每周开展 1 次服务活动，每次约 60 分钟，参与者多为意识清醒、具备基本沟通能力的脑卒中患者，典型活动包括“我的康复旅程”主题绘画、“家庭支持树”创作等。

（2）音乐疗愈小组。该小组由康复科护士长主导，她通过自学非洲鼓与音乐治疗技术，将音乐元素融入康复干预。小组的参与者为康复科有相同康复需求和生理特点的患者，该小组每周开展 1 次服务活动，每次约 40 分钟，主要针对脑卒中患者的言语障碍与肢体协调性问题，利用非洲鼓、摇铃等便于上手的简易乐器，通过敲打节奏、演唱歌曲、乐器合奏等方式，在患者放松心情、建立社会支持的同时进行一定的康复训练。例如，通过“歌词接龙”活动训练患者言语的流畅性，通过“节奏传递”锻炼患者肢体的配合能力，通过分享“康复心得”建立社会支持。

2. 个案

（1）音乐陪伴。服务对象为不排斥音乐的患者，社工根据患者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不同的音乐陪伴方案。活动服务过程需要两位社工配合完成，其中一位社工携带便携乐器进入病房进行现场演奏，另一位社工负责观察患者的反应，并对患者的反应及时作出回应。例如，引导患者跟着音乐拍手，鼓励患者跟着音乐一起演唱；当患者对音乐有强烈反应时，社工会询问这首歌曲对患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故事。此服务活动可以通过音乐释放患者的康复压力，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

（2）手工制作。服务对象以康复科幼年患者为主，或者是表现出对手工有明显喜好的患者。社工在服务活动开展前与患者、患者家属或护工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患者对于手工的喜好，与患者及其护工 / 家属约定具体的服务活动时间。服务活动实施时，社工携带手工材料进入病房，使服务对象在活动中放松心情，同时训练服务对象的肢体功能及沟通能力和认知能力等，增强其康复自信心和价值感。

（3）情绪疏导。社工针对脑卒中患者常见的抑郁、焦虑情绪，开展一对一陪伴服务。合理利用“同理心”“倾听”“澄清”“自我披露”等专业社工技巧，分析服务对象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再通过“叙事疗法”“优势视角”等方式设计服务方案，如讲述励志故事，与患者梳理出院后的“愿望清单”，帮助患者重建康复信心，最终使其主动配合治疗并顺利出院。

3. 其他

社工部门定期组织志愿者为脑卒中患者提供生活照料与情感支持，包括理发、读报及举办病房音乐会等。社工还可以为患者提供出院结算代办服务，包括票据整理、医保报销指导等。

三、社工服务的问题及分析

（一）现存问题

1. 多主体协作困境

（1）医生角度。多数医务社工缺乏必要的基础医学常识，致使医生质疑其专业性。社工部丁主任坦言：“医生几句话就能问清的家庭支持，社工却需耗时半天”（01）；康复师马老师指出：“社工看不懂偏瘫患者功能障碍，无法理解康复禁忌。”（07）

同时，部分临床科室对社工的专业角色存在认知局限，倾向于将其功能简单理解为解决非医疗问题。例如，心内科在处理失独老人因高血压反复入院的情况时，科室更侧重于解决患者安置问题，未能将心理社会因素诊疗纳入协作流程，导致医社协作停留在事务性对接层面。老年科王主任也反馈：“科室初期对社工的理解更偏向于协助处理复杂病例，对其专业价值的认知的确有待深化。”（09）

事实上，医务社工在链接社会资源、申请专项救助基金及对接政策性支持方面具备专业优势，但目前临床科室对此类功能的知晓率较低，导致该功能未能充分激活。社工部丁主任指出：“部分临床科室对社工资源链接能力缺乏了解，这使得一些本可通过社会资源支持开展的项目，因缺乏多元资金渠道而难以持续。”（01）

（2）护士角度。社工获取患者需求主要靠护士口头转述或微信零散留言，缺乏制度化共享机制，导致信息传递依赖偶然性。如某位康复科患者因 OT 训练被批评后情绪低落，护士发现后未及时通知社工，3 天后才偶然提及。

在跨科室协作中，由于对专业边界和职责分工的认知尚不清晰，部分科室和护士有时会出现将社工视为潜在“影响力竞争者”的现象。例如在肿瘤科推进安宁疗护工作时，某部更侧重于突出本科室的专业贡献，担心外部介入可能影响本团队的工作凸显度，从而对深度融入社工服务存在顾虑。

基础事务由社工承担，但心理护理等交叉领域职责不清。护士阮老师认为“社工在心理支持上比护士更得心应手”（05），却因分工模糊导致真正心理存在问题的患者未获及时干预。

另外，当社工通过小组活动提升患者配合度后，康复师称赞“社工有办法”，却忽视了护士日常的情绪疏导。同时，小组活动多在下午举行，恰逢护士集

中执行医嘱、输液高峰期，无法协同。

（3）康复师角度。大多数 ST 患者因课后未坚持练习导致康复周期延长。康复师期望社工监督训练，但当前协作仅限“活动室借场地”。

康复师与社工缺乏共同干预机制。面对康复抵触患者，康复师与社工各自为政。社工通过小组重建信心，但未与康复师沟通调整训练方案，错失行为矫正窗口期。

2. 衔接断层

当患者跨出医院大门，他们携带的不仅是医嘱和药袋，还有未被满足的心理社会需求——失独老人的哀伤、偏瘫患者的居家改造诉求、言语障碍者的社区融入困境。然而，这些需求在进入社区真空地带后迅速湮灭。社工王老师的叹息道破残酷现实：“社区哪有社工，社区有社工也在忙着。”（02）这句话背后，是北京仅约 1/4 社区设立专业社工服务站，提供系统化服务 [7]。而外地患者返乡后，这一比例趋近于零。

断层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社区服务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即便在北京，社区工作者也普遍缺乏医疗协同能力。居家环境改造沦为纸上谈兵，社会融入支持停留于口号。康复师马老师表示，“目前康复工作虽在进行，但真正落实得较少，如环境改造，特别是神经康复患者因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照料。若患者能在出院前完成居家环境改造，包括满足其需求，利用交流面板提高与家属沟通效率，可大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06）潇潇护士长提及的评残资源错配更显得难以理解：“患者辗转奔波于医院与残联之间，只因社工不知骨科掌握着评残申请的核心资料”。（03）

（二）问题分析

1. 政策层面

（1）国家层面。根据《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8]，国家明确要求医疗机构“丰富医务社工服务内容，协助开展医患沟通”，同时要求三级医院建立医务社工体系，但未明确具体配置标准。而北京市地方标准《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创新性规定：“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团队宜增加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工作者”[9]，首次将社工纳入核心医疗团队。而 D 医院作为三级机构，具体实施存在政策断层。这种政策执行偏差导致社工团队长期处于“草台班子”状态，“目前的问题还是大众性的问题，就是医院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来做这项社会工作”。（01）

（2）医院层面。医院层面存在双重矛盾：一方面国家政策要求建立社工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实际资金和人员投入严重不足。政策执行不力直接导致社工团队陷入“无米之炊”困境，“如果有专业的社工，专业的人能留下来，我们这个科室的工作做得就更专业更正规啊。”（02）

2. 服务能力层面

（1）专业能力结构性缺陷。社工团队存在三大能力短板：其一，医学知识匮乏导致服务浅表化，如社工部丁主任指出，“医生几句话就能问清的家庭支持，社工却需耗时半天”（01）；其二，干预方法单一，目前开展的服务方案未采用生态系统理论等专业方法；其三，跨专业协作能力缺失，康复师马老师指出：“社工看不懂偏瘫患者功能障碍，无法理解康复禁忌。”（07）这种能力断层使社工沦为“活动执行者”，而非专业服务提供者。

（2）人力资源配置失衡。当前 D 医院社工服务体系的人力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失衡，具体表现为专职社工数量严重不足、转岗社工职责错位以及实习生资源低效利用三重矛盾。关于三级医院专职社工的标准配置，目前国家层面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标准文件，但部分省市已通过地方标准或政策文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湖北省 2024 年发布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规范》[10] 明确规定：“二级、三级综合性医院，每 300~500 张床位宜配置 1 名社工；专科医院，每 100~300 张床位宜配置 1 名社工。”以 D 医院 1200 张床位计算，至少需配备 4 名专职社工，而实际仅有 2 名，缺口率达 50%。

转岗社工的职责错位问题尤为突出。虽然北京市政策明确要求转岗社工需通过系统培训及实务督导方可上岗，但 D 医院个别现存转岗社工尚未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与“持证上岗”的政策要求尚有差距。并且其工作聚焦打印、后勤等行政事务，与政策要求的“心理社会支持、资源整合”等核心职能有所脱节。

实习生资源的低效利用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源危机。尽管《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11] 鼓励通过项目合作引入实习生，但 D 医院的高校实习生存在明显断层现象，导致每届实习生需重复开展基础培训。这种“培训—流失”的恶性循环造成服务连续性断裂，大多数干预方案因实习生轮换而无法持续，专业积累难以形成。

3. 资源整合层面

（1）社区服务网络断裂。社区资源整合存在三重障碍：其一，制度性障碍，如“北京仅约 1/4 的社区设立专业社工服务站”；其二，能力性缺陷，社区工作者普遍缺乏医疗协同能力；其三，信息孤岛现象，患者转介时“社区哪有社工，社区有社工也在忙着”。这种断裂导致绝大多数出院患者无法获得连续性服务。

（2）跨部门协作机制缺失。医院内部资源整合存在三大断点：一是物理空间分隔，社工部与护理部、康复科分属不同楼栋；二是系统断层，HIS 系统未与社工服务模块对接，导致社工掌握患者信息延迟，评

估数据可能需重复采集；三是考核机制错位，社工工作成效未纳入科室绩效考核，有极大概率形成“多做多错”的负面循环。

4. 其他

（1）角色认知偏差。医护人员存在两类认知误区：其一，工具化倾向，如个别部门将社工视为部门利益冲突的潜在对象，认为其介入可能挤压本部门的评优空间；其二，能力质疑，医生认为“社工在我这里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主体作用不够强”。（09）

（2）患者认知空白。患者端存在双重认知障碍：其一，功能混淆，绝大多数住院患者不知晓社工存在；其二，需求错位，知晓者中仅有少数会主动寻求服务。这种认知缺失形成恶性循环：社工越不活跃，患者越不了解；患者越不了解，社工越难开展服务。

四、健康中国导向下的社工服务优化路径

我国当前的医疗模式正经历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日益凸显。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依靠的是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这一类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不仅仅指医疗器械质量、医院环境、医护人员技术，更有人文关怀和精神安慰服务，而这一类别的服务就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但在此阶段，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面临着“认同难”“发展慢”“能力弱”[12]的情况，与健康中国战略所提倡的理念并不能很好地融合以推行高水平医疗服务发展。因此，笔者从政策制度创新、服务模式升级、协作机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和结构体系建设五个维度，深入探讨社会工作服务在健康中国战略导向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构建更加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建议。

（一）政策制度创新

1. 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

2024 年 7 月 30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在京召开“健康中国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发展交流会”。会上签署了《健康中国社会工作新质生产力发展合作协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携手共建健康中国社会工作体系，通过跨部门协作机制打破了政策壁垒，让社会工作服务更加便利化、精简化。事实上，此举措是延续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也为医务社会工作甚至社会工作融入国家健康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证实了其合法性与必要性。实践创新表明，只有将顶层设计与地方经验相结合，才能构建起既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又适应地方实际的政策生态系统。

从医院角度出发，如今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情况，而有限的住院时长并不能满足病患从患病到康复的整个流程需求。医务社工需要一定时间与患者、家属甚至康复师进行交流，了解患者及家属现有的需求并提供相应服务。一个完整的“接案—结案”过程往往难以全面达成服务目标，或者存在推进仓促的问题，社工只能寄希望于轮转周期延长。目前部分省份率先尝试预住院模式，允许患者在等待床位期间完成术前检查，费用按住院医保比例结算。这为社工提前了解患者情况及患者需求提供了便利。其中需要注意社工的作用、明确他们的参与路径，不能让便利的医疗服务缺少一角。

2. 社会福利嵌入与保障升级

在岗位保障方面，全国各地正陆续推进社会工作者的广泛招募工作，并给予其相应的政策支持，一些地区还将社工纳入医院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序列，推动编制留存。另外，对社会工作者的持证情况有了约束性指标，例如福州市规定社区持证社工比例不得低于 50%，对持证考生实施“笔试加分 + 优先录取”政策。此类制度设计将福利与专业资质强绑定，显著提升职业吸引力。

薪资待遇上，一些地区较为重视证书和津贴，对通过全国性社工考试的人群予以补助，对有一定工作年限的资深社工予以奖励。另外，社工机构积极探索绩效奖励方式，通过服务转化和项目分成刺激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积极性，使社工认识到自己的服务是被看见、被认可的。

社会工作者容易出现“内耗”与“情绪劳动”问题，两种情绪的过度出现会损害社工自身的情感，亟须对其进行压力排解与心理支持。例如，北京宣武医院开发“情绪地图”工具（事件 → 感受 → 需求 → 行动分析框架），帮助社工应对患者崩溃大哭等高压场景[13]。还有一些地区则推行强制休假制度，或通过运动、音乐减压让社工放松。

（二）服务模式升级

1. 社工档案建立与整理

在医疗机构的现有模式中，每名患者在就诊时都会获取一份医疗档案。在这份档案中仅有患者大致信息，对其家庭情况、心理状况和其他需求是无法得知的。因此，建立一个除医疗档案外的专业社工档案是必要的。D 医院医务社工部王老师提出建议：入院时社工可以先建立社工档案，有了这个档案就可以大致知晓患者的需求状况，而后便可以制定个性化的社工服务内容。社工档案不同于医疗档案，在于它能更好地反映患者及其家属的个性化需求，可以使社工对服务方向快速做出判断，及时链接内外资源，协助患者解决现有问题。

2. 全周期干预与协作

在服务大方向上，可以将医疗过程划分为三部分：预防、康复及安宁疗护。在预防环节，参考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构建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自我准备”

三位一体干预框架，将医务社工的角色从治疗延伸至预防领域。在康复方面，数据表明医疗专业仅占康复要素的 25%，而 75% 的工作（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家庭支持网络强化、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升）需要医务社工主导完成。在完整的康复流程中，康复课程只占据一小部分，更多的需要患者自身锻炼。因此，这就需要社工及时对接康复师与患者双方，在康复课程结束后督促患者进行自身训练。D 医院社工部丁主任强调了社工与医护团队交流协作的重要性，医护人员比患者自身更清楚其康复情况，加强与医护人员交流也是促进医务社工融入医疗团队的重要推手。

3. 社区融合与资源链接

在社区融合方面，D 医院社工部王老师提出建议，希望社工可以在患者出院或转院后对其继续跟踪，也借此机会督促患者自行康复。患者回到所在社区后，医院的社工可以直接对接社区社工协助患者继续康复。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签约项目，是医务社工与社区社会工作的融合产物。它通过专职医生搭配医务社工直接对接的方式，在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精神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开展协同服务，为一些不方便出门的人群提供上门服务，有效提升了基层服务的温度与精度。在资源链接层面，对一些有经济困难的患者社工还可以帮忙联系相关慈善基金会，帮助患者家庭减轻负担。

（三）协作机制完善

1.“双工”联动与医社协同

“社工 + 志愿者”的“双工”联动机制成为当下医院社会工作部开展工作的主要遵循。专业化与大众化的结合让医务社工的工作更加为人熟知和易于接受，同时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的联结在一定程度上使社区、公益资源与医疗有机连接起来，构成三维联动，让专业服务能够得到高效运转，使志愿者从单纯的志愿劳动力转变为服务的共同创造者。

2. 医护社共同查房

医务社工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信息传递者，也可以说是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桥梁的搭建者。在 D 医院的实践中发现，有社工入驻病房后，一些有关康复课程时间、流程等并不复杂的问题患者会选择直接询问社工，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递流程，减少了部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紧张感。高压氧科张老师对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她很推崇社工在固定时间跟着医生护士查房，在医生询问患者问题时，社工也可以捕捉到许多有用信息，可以根据情况确定案主或了解当下问题并给出建议。

（四）专业人才培养

1. 学历教育

在基础社会工作相关知识教育下应划分相关方向，根据研究或事件方向开展特色课程。“三个融合”模式很好地完善了这一目标，即医学课程与社工专业融合，如开设基础的医学课程；理论教学与医院实训融合，一些学校已开始针对学生实践展开培训；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融合，设置如哀伤辅导、叙事医学、艺术疗愈等课程。

2. 再教育

医务社工有许多人是“半路出家”，他们的理论学习并不充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办的医务社会工作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极具代表性，其课程内容涵盖了国内外先进经验交流、专业技术和职业伦理困境应对及分领域的专项工作坊。专业的再教育方式对于专职医务社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们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深耕课程，学习最前沿的理论知识，并通过他人的经验交流获取信息，将它们更好地运用到未来的服务中。

（五）体系建设

1. 层级化改革

层级化有着由点到面、逐级精细、环环相扣、全域覆盖的特点。从省市上看，主要需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发布规定和标准并予以行动指导；从区级上看，就是要将区域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筹起来，构成联动网络；从医疗机构和社区机构上看，就是要根据政策与上级规定开展各项服务工作，实现政策落地，有效服务于人民。

2. 质量评估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推动建立的本土化健康社会工作体系建设标准，首次提出服务质量的四维评价框架：结构指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过程指标（服务规范、伦理遵守、档案管理）、结果指标（健康结局改善、医疗费用控制、患者满意度）、社会影响（健康素养提升、医患关系改善、社区支持增强）。这对于社工的服务与行动给出了标准，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工作发展确立了目标，指引了方向。另外，还需要建立并坚持督导制度，由资深督导为一线社工提供情感支持与专业指导。

3. 可持续发展

社工服务并不是只强调付出，特别是医务社工体系的建设需要得到“回血”。在各种实践探索中，各地都有着自己的“造血”方式。例如，浙江宁波某社区探索公益性与市场化结合路径：基础服务由政府购买，增值服务如私人医生、康复训练按成本或时长收费，同时培育社区社会企业承接运营。这样的方式不仅联合了政府部门，加强了上层对社会工作特别是医务社会工作的重视，同时也让社工服务不再被贴上“廉价”“无效”的标签。只有将医务社工从“附加服务”转变为“核心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中国的人文内涵。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D 医院医务社工虽然通过专业服务为患者提供了心理支持，但对长期康复规划等深层需求回应有限。医院专职社工数量少，社工专业医疗知识不足，并且资金来源依赖项目资助，缺乏稳定保障。社工服务被视为边缘性工作，医护人员对社工存在认知偏差，导致协作治疗难以实现。患者出院后，社区社工覆盖率低，居家康复指导等需求无法延续，违背“全周期服务”理念。

（二）研究局限

研究局限于北京市 D 医院康复科，未涵盖不同等级医院、不同疾病，结论普适性受限。研究方法以访谈和观察为主，缺乏数据支撑。

（三）未来方向

强化政策保障与资源投入。推动政府将医务社工服务纳入医院核心预算，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严格落实三级医院专职社工配置标准，完善岗位晋升与薪酬体系，解决“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

提升服务专业性与本土化融合。加强社工医学知识培训，结合本土医疗特色，探索“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全周期康复模式，将服务从生理、心理干预延伸至社会功能重建。

依托互联网构建“信息平台”。医院内，建立患者的“社工档案”，并将社工服务模块与医院 HIS 系统对接，实现患者信息实时共享；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案，对患者各个阶段准确评估，以便医护社协作制定患者康复计划，避免重复评估与资源浪费。医院外，推动社区社工服务站全覆盖，建立医院与社区的转介机制，通过出院随访、资源对接，保障康复服务的连续性，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

参考文献

[1] 许莉，王喜益，陈菡芬，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脏运动康复依从动机的质性研究 [J]. 军事护理，2024,41(01):23-26.

[2] 蒋义．县域医改该何去何从——关于深圳罗湖医改和茂名高州医改的调研启示 [J]. 财政科学，2020(03):101-105.

[3] 朱金莉，刘建浩，黄淼，等．夹脊穴为主的针刺疗法联合早期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疗效 [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0,38(05):169-172.

[4] 韩晓妍．延边地区老年脑卒中患者家庭功能、心理韧性与自护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D]. 延吉：延边大学，2020.

[5] 彭丽延，徐娟．综合康复训练护理模式在糖尿病合并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及影响分析 [J]. 糖尿病新世界，2017,20(20):15-16.

[6] 刘晓倩．组织趋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北京市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D].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22.

[7] 皮磊．北京召开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 [EB/OL].(2023-06-19)[2025-07-10].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shenghuigongzuo/2023/06/24243.html.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等．关于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的通知 [EB/OL].(2024-09-29)[2025-08-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0/content_6979036.htm.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WS/T 683—2020[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20.

[10] 湖北省民政厅．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EB/OL].(2024-01-05)[2026-02-15].https://mzt.hubei.gov.cn/ywzc/ywzc/cssg/202401/t20240105_5029677.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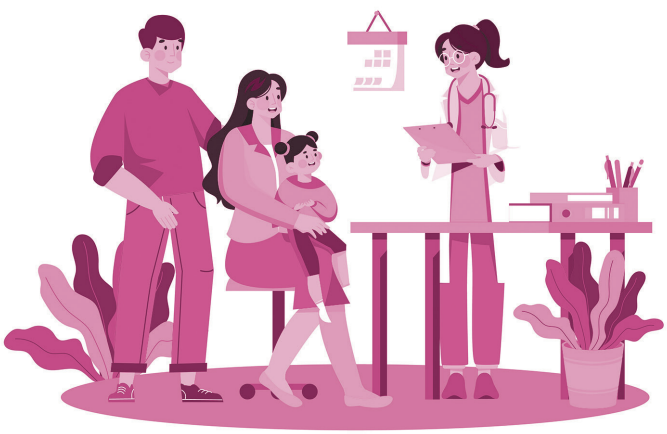
[11]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 [EB/OL].(2020-10-23)[2026-02-15].https://wjw.beijing.gov.cn/zwgk_20040/zxgk/202010/t20201023_2118891.html.

[12] 李松珊，崔瑞兰，江丽丽．健康中国战略下医务社会工作的主要功能与实现路径 [J]. 社科纵横，2020,35(08):82-85.

[13] 刘东．将医务社工与社会学研究结合探索社工发展新路径 [EB/OL].(2023-03-03)[2026-02-15].https://health.ifeng.com/c/8NrZ1xvsxJq.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健康中国视角下慢病患者健康管理的社工服务现状研究——以北京 D 医院为例”（25xjx050）。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疾控体系改革背景下党建引领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以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为例

许德民　黄　芸　陈文俊　朱伟敏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疾控事业正面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格局深刻变革、国内疾病谱持续演变等多重挑战。如何以党建为引领，将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疾控体系改革的创新动能和服务效能，实施政治动员、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奋进力量，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既是新时代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疾控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根本政治保障。

关键词：党建引领；疾控事业；体系改革；路径探析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1]，是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前沿堡垒，每一项工作都承载着党的决策部署和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对疾控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疾控体系改革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党建为引领，将党的领导贯穿疾控事业改革发展全过程，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成为保障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近年来，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在党建引领事业发展领域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可借鉴的经验。

一、党建引领疾控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明确疾控事业发展的政治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为疾控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遵循，指明了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必须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党的领导是疾控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通过党建赋能体系改革，确保疾控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为筑牢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二）构建防控协同应对的新体系

重大传染病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防控需要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作战。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实现全局统筹、资源整合与高效调配，以顶层设计谋划卫生健康战略布局，实施政治动员、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应对传染病挑战的整体合力，从而提升防控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三）塑造疾控队伍的精神内核

疾控事业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专业精湛的队伍。党的建设是确保队伍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能打胜仗的根本保证，将党的先进性融入队伍的价值观，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集体意志，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转化为疾控人员的行动自觉和职业信仰，为疾控队伍提供持久的精神指引。

二、党建引领疾控事业发展的路径探析

（一）构建政治引领长效机制

疾控事业兼具民生属性与政治属性，必须以党建为根本政治保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卫生健康工作，通过构建“第一议题”学习机制，健全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机制，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贯穿始终，不断夯实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充分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并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线上载体，提高组织生活质量，指导实践行动，使党建工作更贴近实际、贴近时代，引导党员

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压实党建主体责任体系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3]。夯实基层根基，要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党组织书记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支部贯彻落实、党员示范带动”的责任链条，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将重大传染病控制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时率等核心业务指标纳入党建考核体系。同时，选优配强基层组织带头人，推行“双带头人”模式，由业务负责人兼任党支部书记，实现党建与业务的协调统筹，在业务工作中融入党组织的管理、教育和监督功能，激发两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4]；同时，建立“政治能力 + 专业能力”双培养机制，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确保“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三）夯实为民服务思想根基

党建的核心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凝聚人民力量，其本质是树立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思想与行动导向。通过党的思想教育，坚定党员及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解决其思想层面的深层次问题，帮助其站稳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确保疾控中心始终保持政治正确[5]。因此，以深入开展党的主题教育，强化“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厚植为民服务的情怀，锤炼党性修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党的初心使命融入日常工作，将“预防为主”的理念转化为疾控人员的政治意识与责任担当，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四）打造疾控特色文化品牌

疾控文化建设是建设和谐疾控中心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期疾控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核心是树立单位价值观和群体意识，提升凝聚力、激发创新活力[6]。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深入挖掘疾控发展历程中的红色资源，提炼重大疾病防控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新冠疫情、抗震救灾等）中的先进事迹，丰富疾控文化内涵。通过主题展览、荣誉室、短视频等多元载体展示疾控发展成就，讲好疾控故事、弘扬疾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增强职工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激励新时代疾控人砥砺前行，为疾控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五）锤炼严实过硬的工作作风

疾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风好坏、纪律严松直接关系到队伍的战斗力和公信力。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将“科学精准、快速高效、担当为民、严谨务实、公正廉洁”融入日常工作，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提升干部职工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技术能力，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营造崇尚实干、勇于作为的良好氛围，使疾控队伍永葆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三、党建引领疾控事业发展的实践成效

（一）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推动党建与业务发展精准对接。2024 年 3 月，完成了疾控机构重组，整合疾控与卫生监督职责，成立党总支部委员会，实现人员平稳过渡及专业技术与监督执法工作的有机衔接。确立“防控体系现代化、监测预警精准化、应急处置高效化、医防融合纵深化、健康服务普惠化”的目标，成立了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心和国家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网络实验室，挂牌成为新疆第二医学院附属疾控中心，构建“监测预警—协同联动—快速处置”三位一体医防协同体系，在疫情防控、疾病干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研项目等领域形成“抓党建不离中心工作，抓业务不离党建引导”的良性闭环。

（二）提升疾控综合防控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7] 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以“党建 + 业务”融合为路径，完善联动考核评价机制，用党建优势推动业务发展，用业务成效检验党建成果，使疾病监测预警更灵敏、应急处置更高效、慢性病防控更精准、卫生监督更规范，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与 2020 年相比，2024 年克拉玛依全市疾病综合控制率同比下降 39.67%，健康综合服务率提升 24%（详见表 1、表 2）。在全国及自治区级疾控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党员干部表现突出，1 人获全国流调竞赛个人优秀奖，3 个团队获自治区级团体一等奖，10 人获个人奖项；7 个科研项目获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及市级立项，3 项发明获实用新型专利，彰显了疾控事业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构建协同高效防控格局

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以党建联建为纽带，以科学防控为准则，与公安、交通、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与医疗机构形成医防协同与融合模式，与社区辖区单位联建“社区大党委”，组建社区居委会公共卫生委员会，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急结合”的应急响应体系，明确了部门职责，压实了“四方责任”，形成传染病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以此提升了“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能力，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疾控格局，在区域疫情防控、免疫规划、疾病管理、健康教育宣传、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表 1　疾病控制工作成效

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	2020 年	2024 年	同比(%)
传染病预防控制	传染病总发病率(1/10 万)	723.41	540.33	–25.31
重大传染病防控	结核病患病率（1/10 万）	29.35	17.24	–41.26
慢性病预防控制	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13.75	10.08	–26.69
疾控综合控制				–39.67

表 2　健康服务工作成效

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	2020 年	2024 年	同比(%)
国家免疫规划	儿童疫苗接种率（%）	92.62	99.23	7.14
健康状况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5.63	37.74	47.25
健康管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89.27	98.75	10.62
卫生应急处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时率（%）	92.4	100	8.25
实验检验能力	检验检测项目数（项）	643	885	37.64
社会评价	社会公众满意度（%）	83.2	96.6	16.11
健康综合服务				21.17

（四）锻造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以“党建 + 业务 + 文化”三维融合模式创新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强化党的理论思想与组织文化建设，带动业务能力提升。打造“疾先锋”“医心向党”等一批党建品牌，形成“老党员带新职工”传帮带工作机制，实施“党员骨干培养工程”，打造“双强型”人才梯队。每季度评选“学习标兵”“工作标兵”“党员先锋岗”等，鼓励党员在工作中勇挑重担，带动全体职工共同进步，树立“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岗位就是一份责任”的意识。同时成立了党员突击队，确保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志愿服务活动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目前，中心 76 名职工中党员占比达 62%，1 名党员获自治区级先进工作者，3 名获市级优秀党员，6 名党员被评为市级“油城英才”，3 名党员被评为市级医学专家，建立 2 个优秀党员名医工作室，培育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疾控铁军。

四、结论

（一）党建引领是疾控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党建工作是引领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红色引擎”，为疾控事业提供政治方向、组织力量、价值引领、资源整合和人才支持等全方位保障，确保疾控工作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凝聚战胜风险挑战的强大合力，为疾控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思想与组织基础。

（二）党建与业务融合是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党建通过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提升组织效能、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为业务发展提供方向引领、动力源泉和保障支撑，做好党建工作也是一种生产力 [8]；业务工作则是党建的实践平台和成效检验标准，脱离业务的党建会沦为空谈。党建与业务工作相互依托、相互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三）党建是疾控队伍思想建设的核心动力

党建工作不仅包含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更是将党的先进理念、宗旨意识融入实际工作，转化为发展动力，为党员发挥先锋作用奠定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解决“信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想根源，推动思想向行动转化，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确保疾控队伍在思想上与党同心、行动上跟党同行。

五、展望

党建引领疾控事业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格局重构、国内疾病谱变化等复杂挑战，全面提升疾控能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的建设为保障，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疾控体系的创新动能，推动党建与业务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让“党旗飘在一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使党建“红色基因”融入疾控血脉，以科学专业的“疾控力量”守护人民健康，为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J]. 中国农村卫生 ,2024,16(01):8-10.

[2] 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 .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0,41(04):453-460.

[3]《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编写组 . 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M]. 北京 :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7.

[4] 张明辉 . 新形势下做好疾控中心党建工作的思考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6,16(A1):171.

[5] 安徽省司法厅课题组 . 破解“两张皮”拧成“一股绳”[J]. 机关党建研究 ,2020(06):47-50.

[6] 袁苏安 . 加强疾控文化建设 促进疾控事业发展 [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9(04):141-142.

[7] 赵姗姗 , 花蕾 , 顾斌 . 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丰富党建内涵——以南京市疾控中心为例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0(04):47.

[8] 王英 . 做好党建工作也是一种生产力 [J]. 四川党的建设 ,2020(14):1.

（作者：许德民，新疆克拉玛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任医师；黄芸、陈文俊，新疆克拉玛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治医师；朱伟敏，新疆克拉玛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医师）

西部生态法治视域下生态环境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优化路径
——以甘肃省为例

纪林君

摘要：西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脆弱，面临着艰巨的生态保护任务和巨大的保护压力，而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价值相契合，突出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以甘肃省作为西部地区的样本，结合甘肃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甘肃省生态环境犯罪案件轻刑化的特点，并分析现有恢复性措施适用情况，以彰显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恢复性措施适用的法律基础不牢固、恢复性措施定位不准确等困境，从厘清恢复性司法内涵特性、夯实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基础、完善恢复性司法协同配套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探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优化路径，为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法治支撑。

关键词：环境犯罪；恢复性司法；实现路径

在2024年4月召开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部地区要坚持以高水平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部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屏障，是大江大河的重要发源地，虽生态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面对重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恢复性司法理念能够优化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方式，将生态保护和修复放在重要的位置。

一、理论先导：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涵

（一）恢复性司法的含义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古已有之，在近代随着打击犯罪的压力和刑事政策的影响逐渐发展为一种制度。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巴内特在《赔偿：刑事司法中的一种新范式》中首次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概念。英国学者马歇尔对恢复性司法概念的解释推动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发展。他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与特定犯罪有关的当事人走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1]。联合国的官方文件将恢复性司法定义为：“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平衡社区、受害人和侵害人之间的需求而对犯罪行为做出回应的方式。”[2]目前，对于恢复性司法的含义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不同学者对于恢复性司法的定义进行合并同类项可知，恢复性司法的主要几个方面构成其框架性定义：一是程序性内容，即在被害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协商；二是具体内容，即就相关利益等方面进行协商；三是目的性内容，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填补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损失。这三个方面是对恢复性司法的解构，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对其适用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二）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含义

生态环境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在对相关利益造成损害的同时，更是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有学者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生态环境犯罪领域的主要目的是，在实现对犯罪人惩罚教育的同时，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是生态环境犯罪人在真诚悔过的前提下，积极承担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力求达到实现刑罚功能、挽救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的效果[3]。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不同于一般的恢复性司法。首先，针对生态环境犯罪对象可能没有具体受害人的特殊性，犯罪人可以主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或者在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引导下，积极主动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相对于被动地进行生态修复，这种方式更能充分体现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和教育改造程度。其次，在目的上，生态恢复性司法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在实现刑事惩戒、教育犯罪人的基础上，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以实现三者的共赢。

二、现实基础：西部地区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

（一）甘肃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恢复性司法理论相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4]。甘肃省作为西部重要的生态建设省份，对于西部生态环境以及全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法律层面，近几年甘肃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积极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保护，如 2022 年颁布《甘肃省草原条例》、2023 年颁布《甘肃省水土保持条例》《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多领域的立法为甘肃省生态环境全面保护提供依据，并彰显出在法治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层面，2021 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甘肃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恢复性司法 + 社会化综合治理”的审判结果执行机制，这为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进一步开拓空间。“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法治保障、政策支持、督察考核、促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二）轻刑化的发展趋势与恢复性司法的适用不谋而合

在裁判文书网上对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发生在甘肃省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案件判决书进行检索，共得到 119 份裁判文书。对甘肃省生态环境犯罪案件量刑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见图 1），总体上甘肃省生态环境犯罪量刑较轻，刑罚最重的案件也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并处罚金，甘肃省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呈现出轻刑化、轻罪化的发展趋势。并且，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践推进，甘肃省近三年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制度适用频率极高，基本能够全覆盖。结合甘肃省生态环境犯罪案例统计来看，绝大多数案件能够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并且能够积极采取措施修复生态环境。极个别案件虽然没有适用认罪认罚程序，但是能够主动自首并及时修复受损的行为，也存在从轻或减轻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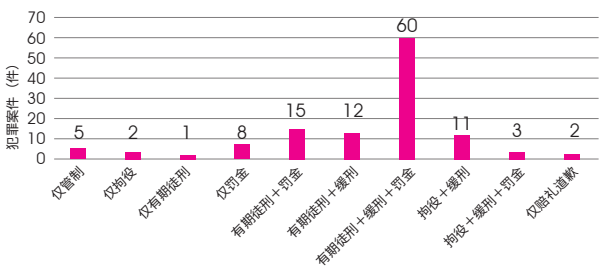


图 1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生态环境犯罪案件量刑分布情况

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较轻的案件，加害方和受害方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阻力相对较小，受损的社会关系更容易得到修复，这为使用恢复性手段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对生态环境犯罪进行刑事处罚的原因之一。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之中，既顺应了当前刑事犯罪轻刑化的趋势，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的宽容精神，也彰显了刑事诉讼的人文关怀，更是对中国古代宽平慎刑理念的承继。

（三）甘肃已适当引入恢复性措施以修复生态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以生态修复守护绿水青山。甘肃省结合本省自然生态环境特点、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特征适当引入恢复性司法措施以修复生态环境。结合统计数据来看，适用恢复性司法措施的案件占总数的 38% 左右。例如，金昌市金川区检察院通过提起诉讼或要求违法行为人以补植复绿、代替性修复等方式进行生态补偿，消除或降低其行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5]。当前的恢复性措施主要有植被修复（包括异地补种、补植复绿、草地恢复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等。由于生态环境修复的专业性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适用较多。此外，综合甘肃省近三年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统计以及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情况，由于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基础薄弱和恢复性司法措施定位模糊等原因，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存在底气不足的问题。部分案件中将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认定为量刑情节，在量刑时考虑从轻或减轻其刑事责任。而部分案件中将其作为责任承担的内容，以判决结果的形式要求犯罪人进行生态修复。当前，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犯罪中的应用仅是依据地方的规范性文件、生态环境审判改革政策文件等，由此引发恢复性措施的法律性质争议[6]。考虑到与其他责任形式的交叉，确定恢复性措施的功能定位需要从整体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出发。

三、优化完善：生态环境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实现路径

（一）厘清恢复性司法的内涵特性

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全面进行需要对其进行统一的规范界定，厘清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的独特内涵，这能够为后续立法及实践扫清障碍。根据恢复性司法的一般程序，犯罪人与利益受损方在第三方主体指导下的自愿协商程序必不可少。但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利益受损方往往难以确定，若坚持传统的恢复性司法程序，将难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所以，结合我国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特点对恢复性司法理念进行扬弃。恢复性司法中的协商程序可以作为选择性要件，具体分析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选择适用。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恢复性司法重在强调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以此对于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生态性优化，使之更加符合生态环境修复的需要[7]。

（二）夯实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基础

异地补种、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恢复性措施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颇有成效，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恢复性司法作为办理此类案件的重要抓手。但是追根溯源，这些恢复性司法措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均没有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规定。目前司法机关所实施的恢复性司法措施仅可以将其认定为司法创新的产物，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所以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为恢复性司法措施“正名”。

本文认为，将恢复性司法措施作为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更能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主要理由有：第一，刑罚处罚措施的完备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所规定的几种主刑和附加刑已经完全适应我国治理刑事犯罪的需要，并且这几种刑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适用率较高。如果单将生态恢复责任纳入主刑或附加刑中可能会导致整个刑罚体系与罪名体系的不融洽。第二，传统刑罚与恢复性措施侧重不同。传统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惩戒犯罪人、预防犯罪的发生。而恢复性的措施强调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恢复原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两者侧重的保护法益不同，在同一体系中并存的法理基础不足。第三，置于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法律可能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非刑罚性处置措施适用存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前提条件。换言之，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适用是由犯罪情节是否轻微以及是否能够免处刑罚处罚而决定的。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具有轻刑化的趋势，并且从案件类型来看，对于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其犯罪情节以轻微为主；对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应当依法适用刑罚。所以从法律上讲，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与刑罚并行不悖，不存在相互交叉矛盾的情形。可见，将恢复性措施置于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之中符合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基于以上几点，可以将恢复性司法措施通过立法的形式纳入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之中，并称之为生态修复责任。具体的责任承担形式可以通过司法创新不断增加，经过试点可以作为长效机制存在，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固定。

（三）完善恢复性司法协同配套机制

生态环境犯罪案件适用恢复性司法需要多措并举，各方力量协同配合才能确保生态环境的顺利修复。完善恢复性司法协同配套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检察机关作为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公诉人，对于案件的办理需要全面地感知。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不同于其他犯罪行为，其危害结果存在隐蔽性以及潜伏性，对于生态环境的损害若不能及时有效采取相应的措施，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永久性损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主动了解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协同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第二，行政机关监督执行。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实施成效，需要有专业的机关进行指导和监督。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作为专业部门可以与法院执行机构协同配合，对犯罪人实施恢复性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确保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第三，鼓励生态修复机构的加入。简单的生态环境犯罪行为如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可以通过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形式进行修复，修复过程相对简单且不会改变生物多样性。但为修复部分生态环境犯罪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综合性损害，需要引入生态环境修复专门机构，犯罪人只需要缴纳相应的修复费用即可。为保证修复结果符合生态要求，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与法院共同检验修复结果，以实现生态修复。

四、结语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之下，西部地区承载着自己的时代任务。面对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在生态环境犯罪行为发生之际，更应该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修复。通过对恢复性司法内涵的深入剖析，结合西部地区的现实情况，发现在生态环境犯罪中恢复性司法适用的可行性。并且在对恢复性司法措施逐步运用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优化，使之成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利剑，以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拱卫整体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 格里·约翰斯通，丹尼尔·W·范内斯，等. 恢复性司法手册 [M]. 王志亮，狄小华，吴啟铮，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2]WORMER K V,WALKER L.Restorative Justice Today: Practical Applications[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Inc.,2013:8.

[3] 曾睿.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践创新与制度完善——以福建省为例 [J]. 理论月刊，2019(02):100-106.

[4] 新华社.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 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EB/OL].(2019-08-22)[2024-05-16].https://www.gov.cn/xinwen/2019-08/22/content_542355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5]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金昌金川：聚焦重点领域以公益诉讼检察守护群众利益 [EB/OL].(2023-08-11)[2024-06-03].http://www.gansu.jcy.gov.cn/info/1002/34035.htm.

[6] 王树义，赵小姣. 环境刑事案件中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探索与反思——基于 184 份刑事判决文书样本的分析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03):102-110.

[7] 杨红梅，涂永前. 环境恢复性司法：模式借鉴与本土改造 [J]. 国外社会科学，2021(03):71-82,159-160. （下转 62 页）

新形势下沿边地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构探究
——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王彩基

摘要：在全球化进程加快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云南德宏州作为沿边地区，面临的突发事件的复杂性与频发性明显增加，使得应急语言在突发事件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文以语言多样化的德宏州为例，通过对德宏州目前的语言环境、语言需求与现有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分析，探讨德宏州现有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构建一个涵盖普通话、汉语方言、当地语言、缅甸语的德宏多语种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以提升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能力，保证沿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应急语言；德宏；体系建构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跨国交流日益密切，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步上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纵深推进过程中，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人文交流、人员往来等活动日趋活跃。这一态势为沿边地区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提升、复杂程度显著提高。新形势下，应急管理工作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载体，其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德宏州地处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沿边地区，语言环境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涵盖普通话、本地方言、本地傣语、景颇语及缅甸语等语种。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沿边地区边民经济合作交流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同时边境纠纷、跨国犯罪等风险隐患有所增加，给维护沿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严峻挑战[1]。在多语种共存区域，日常交流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语言障碍往往成为制约应急处置效能的关键瓶颈。无论是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抑或是跨国犯罪、疫情防控等紧急事态，信息的精准传递与高效处置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的应对成效[2]。当前，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专业翻译力量相对薄弱、语言资源统筹调配机制缺失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撑多语种应急处置需求。因此，亟须探索建立符合德宏州情、具有沿边特色的本土化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边境地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本文立足德宏州实际，紧密结合区域语言环境特征与应急管理工作现状，梳理当前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构建路径。文章提出应急信息传递、专业化人才培养、跨境合作及科技应用等优化策略，旨在提升德宏州及同类沿边地区的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切实保障应急管理工作高效实施，为维护沿边地区的安全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一、德宏州现有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现状

（一）德宏州语言现状

德宏州位于我国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该州政府机关、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等公共领域以普通话为主要工作用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普通话普及率持续提升[3]。但部分偏远地区的年长者仅掌握当地

（上接61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法律机制构建研究”（21YJA820004）；2024年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检察协同机制研究”（GSJC2024-34-01）；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度重点课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执行的困境检视与纾解进路”（GSFYKT2025A06-3）。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

汉语方言，少数地区仅使用本民族语言。

德宏州的多语言环境在丰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给公共管理、合作交流和应急响应等工作带来挑战。当前汉语与缅甸语虽是跨境沟通的主要媒介，但傣语、景颇语、德昂语等民族语言仍在本地广泛流通。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语言的多样性易导致信息传递时效性不足、准确性难以保障，已成为制约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效能的突出瓶颈。如何在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效提升跨语言沟通效率，是德宏州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

（二）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现状

目前德宏州的语言服务主要依靠汉语和缅甸语双语人才和傣语、景颇语、德昂语等当地翻译人员，目前这种模式能够满足中缅两国之间的日常合作和常规合作需求，但由于德宏州内的翻译人才短缺，懂这些语言的翻译人员数量较少，没有办法做到全州覆盖；其次，德宏州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形成，致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临时抽调翻译人员和志愿者，存在翻译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足，无法及时高效地翻译出实际情况的问题[4]。最后，沿边地区的跨国走私、人口贩卖和非法越境等犯罪行为往往需要两国执法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然而语言沟通障碍及两国合作深度不够常常影响执法效率。因此，在应急情况下，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跨境事件等复杂场景中，德宏州目前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显得相对薄弱。

二、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需求分析

（一）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递需求

信息传播效率直接关系应急管理应急响应的成效[5]。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确保公众能够迅速了解事件动态及科学的防范措施，做好自我防护，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应区分不同受众的特点，精准调整发布信息，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必须将公众情绪疏导工作摆在关键位置。第一时间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和风险预警，增强公众应急避险的意识，提高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疏导公众情绪，防止恐慌情绪蔓延。日常工作中要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公众风险辨识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技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6]。上述特性充分表明，应急信息传递不仅在于提供基础资讯，更在于支撑科学决策、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引导公众有序响应[7]。因此，应急管理信息传播不仅是信息通报的过程，更是确保响应高效运转、减轻灾害损失、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关键。

（二）专业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

当前，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工作主要依托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临时调配翻译人员与志愿者的方式提供语言协助。但该方式存在明显的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短板，没有专业化运行管理体系。具体表现为：沿边地区翻译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精通当地民族语言的专业翻译力量严重匮乏，制约了语言服务的覆盖广度与应急响应时效。

此外，民间志愿者组织虽在紧急状态下提供语言支持，但因缺乏相应的培训与管理，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无法保证翻译工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在全球化纵深推进与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培养具备专业化素养的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十分重要。此类人才既须掌握高水准的语言转换能力，又须具备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应急处置技能，以保障在紧急状态下能够及时提供精准高效的语言服务[8]。应急语言服务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除日常翻译工作外，还涉及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医疗救援等场景。这要求人才队伍除语言能力外，必须同步掌握应急处置方面的基本要求。尤其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人才队伍需精准把握政策用语与应急广播用语；在医疗救援领域，人才队伍需掌握基础医疗术语；在灾害抢险现场，人才队伍则须具备指挥协调用语的专业转换能力。

（三）跨境合作的语言服务需求

德宏州因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灾害、跨国犯罪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频发。地震、山体滑坡等灾害在山区频发，救援行动亟须邻国双方紧密协作。在跨境应急合作中，语言障碍成为信息顺畅传递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无论跨国灾难救援还是其他突发事件，保证信息交流及时有效，是提升应急响应效能的关键。语言服务能够为双方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及当地社区之间精准传递与高效执行重要政策指令提供必要保障，进而提升应急响应效率与质量[9]。

语言服务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社会习俗下的两国民众在合作中相互尊重与理解。尤其在跨境人道救援、难民安置等敏感领域，文化适配与语言沟通为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关键性支撑作用。

三、新形势下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建立应急语言服务平台

针对德宏州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实际，亟须构建多层次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是有效提升本地区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关键举措，有利于保障信息高效准确传递，最大限度规避因语言障碍引发的误判误传风险。通过建立覆盖普通话、汉语方言、当地民族语言及缅甸语的多语种服务机制，能够切实保障跨国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区域协同应对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为推进此项工作，一是要在国家层面组建应急语言服务统筹协调机构，整合全国语言人才资源，制定突发事件多语种翻译力量快速调配制度；二是要在地方层面实体化运行德宏州应急语言服务中心，专项储备精通普通话、汉语方言、当地语

言及缅甸语的专业化翻译队伍，确保应急语言服务即时响应；三是要在社区层面夯实基层应急语言服务网络，依托德宏州各乡镇、村寨基层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力量，重点培养掌握缅甸语及当地民族语言的应急翻译志愿者队伍，切实提升社区应急处置效能[10]。

（二）建设应急语言人才队伍

德宏州尽管具有普通话、汉语方言、当地语言、缅甸语等多语种人才，然而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仍显短缺且全州覆盖不足[11]。为此，德宏州应着力推进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专业化应急语言人才库。德宏州政府要依托本地高等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等平台，储备兼具应急管理能力的双语或多语人才，科学制定应急语言人才队伍专项培训计划，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切实提升语言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应急反应能力。同时组建多语种志愿者队伍，广泛招募并动员地方志愿者积极参与，打造一支具备多语言能力的应急服务团队。还需深化与相关教育机构的合作，定期开展规范化培训课程及实战化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应急语言服务的响应效能。

（三）建立跨国应急语言合作机制

德宏州要与缅甸方面建立常态化的跨境应急语言合作机制，并制定详细的应急联动预案。在发生跨境突发事件时，双方要立即启动应急协作，依托联合演练与信息共享提升语言协同效能，确保信息传递准确畅通。同时，德宏州要与缅甸相关部门建立稳固的联系协调机制，定期组织双边应急演练，着重在沿边多语言区域模拟应急语言服务需求及处置流程，检验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实际效果，及时发现信息传递延迟、翻译误差等潜在问题，切实消除实际处置中的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协调能力与响应效率。此举将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应急协同效能，为各项应急处置措施的高效落实提供坚实保障。

（四）引入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应急语言服务创造了新的机遇。德宏州应着力构建应急语言服务智慧系统，积极引入智能翻译系统、语音识别技术等先进工具，为应急语言服务人员快速翻译和传递多语言信息提供技术支撑。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显著提升服务效率，更能在突发事件中有效补充语言服务人员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翻译可能产生的延误和误差。同时要运用科学技术构建多语言应急信息发布平台，该平台须覆盖汉语、当地语言及缅甸语，具备短信、微信、广播等多渠道传播功能，确保不同语言群体能够及时获取应急信息。平台建设要突出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各语言群体第一时间能够接受精准的应急指导。

四、结语

应急语言服务与日常翻译工作具有显著区别，要求从业人员在紧急事态下迅速响应，并精准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术语。针对德宏州的特殊情况，建立高效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必须高度重视专业化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切实破除突发事件中的语言沟通障碍。作为我国西南沿边关键地区，德宏州在新形势下面临日益严峻的应急管理与语言服务挑战。因此，需通过建设应急语言服务平台、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库、应用智能技术、加强跨境合作等举措，科学构建覆盖普通话、汉语方言、当地语言及缅甸语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该体系既能为沿边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又能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时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丽红.中缅边境地区缅籍跨境流动人员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J].大理大学学报,2024(09):135-137.

[2] 张莉.后疫情时代应急语言服务本地化策略研究[J].榆林学院学报,2024(01):189-191.

[3] 韦钰,钱颖.新时代我国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7):85-87.

[4] 王春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应急与社会治理[J].社会治理,2020(03):120-123.

[5] 魏笑梅.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急语言服务提升策略研究[J].现代交际,2022(02):74-80,123.

[6] 王辉.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及建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210-211.

[7] 张敏,覃凯莉,陈彪,等.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应急语言服务平台研究与设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9(01):94-104.

[8] 张伟芳.广西民族地区应急语言服务调查研究——以某县突发疫情为例[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23.

[9] 王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语言应急能力研究——以保山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44(02):116-119.

[10] 2024年度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应急语言服务发展论坛召开[J].语言战略研究,2024,9(06):97.

[11] 郭亚杰.边境民族聚居村应急语言服务需求及模式探析——以云南田蓬镇为例[J].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3(10):94-1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6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边疆安全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中缅跨境务工数字化管理研究”（2026J2304）；2024年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中缅边境跨境务工群体培训需求及路径优化研究”（2024XJ31ZX）。

（作者系德宏师范学院讲师）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重构研究
——以内蒙古开放大学为例

王　贺　树　花　李胜男

摘要：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开放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责正经历重大变革。本文以内蒙古开放大学为例，剖析其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根基与发展脉络，着重分析数字化为社会服务能力在扩大覆盖范围、丰富服务内容及提高服务效能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呈现其运行逻辑引发的结构性变革。并围绕平台建设、服务模式改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多方协同联动等层面提出系统性重塑策略，着重指出区域型开放大学要借助数字化环境健全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服务职能全面升级，为边疆地区的教育公平与社会进步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内蒙古开放大学

教育数字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推动全民学习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开放大学作为继续教育与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更体现了教育理念与运行机制的深层调整。在信息化条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职业技能培训、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但受区域数字鸿沟、师资能力不均衡、特色资源不足及跨部门数据壁垒等因素制约，社会服务效能仍存在差距，难以充分回应边疆地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学习诉求。

一、数字化转型与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概述

（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不只是技术工具的迭代，更凸显了教育理念与运行模式的深度调整，依托高速网络、云平台和人工智能，对传统教学、管理与服务流程进行重构，打造出贯穿资源供给、过程管理和效果反馈的全流程体系，显著特征是打破时空限制，让学习随时可开展；借助智能推送与学习分析，提高服务的个性化水平；依托平台化运作，实现资源与数据的集中整合，由此构建的数字化生态，既提升了教育运行效能，又为社会服务开辟了新途径与新契机，促使教育在更大范围实现普及化与精确化。

（二）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与构成

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体现为向全社会提供多层面、多类别教育服务的综合本领，其内涵已超越单纯学历教育的范围，而是拓展到职业技能培训、社区教育、老年学习和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既包括课程与资源的持续提供，又涉及跨领域（区域、行业）的资源整合，还包含模式与机制的创新性探索，依靠师资与制度等保障因素，凭借这些要素的相互配合，开放大学可在城乡及不同群体间实现教育机会的拓展与共享，打造兼顾公平与公共属性的服务体系，培育并强化此项能力，是新时代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二、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影响

（一）服务覆盖范围的拓展

凭借数字化转型，内蒙古开放大学克服了地域分散、人口分布不均的阻碍，服务范围由城市逐渐延伸至农牧区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凭借数字化学习平台和 5G 通信条件，学校基于原有的盟市分校构建起全面覆盖的网络布局，让教学资源得以跨越草原、戈壁及牧场，从核心城镇拓展至边远牧区[1]。覆盖方式的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为服务的人群数量增多，更重要的是教育服务的触达逻辑从“中心辐射”变为“网络贯通”，让农牧民和老年群体在当地就能获得教育服务，进而显著改善了区域性教育机会的不均衡状况，有力推动了教育公平。

（二）服务内容的多元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促使内蒙古开放大学的社会服务从单一学历教育迈向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学校借助

数字平台，将职业技能培训、农牧业技术普及、社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融入服务范畴，使课程设置不再仅围绕基础学科，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区域特色领域、国家通用语言课程和北疆文化课程的推广，展现了数字化环境下服务模式与各民族群体的契合度。这种语言维度的扩充让教育边界由普遍供给迈向差异覆盖[2]。培训模块依托“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和“新型产业工人能力提升”项目，增加了食品智能加工、现代农牧业经济管理等内容，表明服务内容已从传统学习向生产实践与文化保护方向拓展。这一转变显示数字化改变了课程设置的内在逻辑，使其可依据区域发展需求重新组合，形成多元并行、彼此补充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局面。

（三）服务效能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让内蒙古开放大学的管理机制和服务流程出现深刻变化，推动社会服务能力从传统的集中式供给转向实时化与个性化供给。在教学组织时，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入学习进程，可识别学员个体差异，为不同学员提供分层帮扶；在教育云平台进行资源配置时，教育云平台助力学习资料跨校区同步，降低了地域差异引发的供给不平衡状况[3]。在学习认证环节，区块链与信息化手段的引入革新了传统人工审核模式，使认证从静态、周期性转变为动态、连续性。这表明服务效能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运行逻辑的革新而非结果数量的增长，数字化转型推动学校从“依靠人力支撑”迈向“依靠数据驱动”，对服务效能与运行体系产生持续性的结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服务迈向智能高效。

三、数字化背景下内蒙古开放大学服务能力重构策略

（一）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

稳定高效的数字平台是实现社会服务能力重构的关键，此平台不仅是资源汇集的载体，也是多层级学习点协同运转的核心，平台搭建可分成三个步骤：在技术架构方面，打造覆盖范围广的网络支撑，依靠数字化学习平台以及 5G 网络，连通盟市分校、旗县学习中心与社区教学点，实现农牧区、城乡和边疆地区的全域连接。在功能体系中，搭建学习账户、成果认证和资源匹配三个子系统，学习账户借助区块链技术让学分数据不可被篡改，使学习过程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在认证流程方面，借助线上闭环形式，与政府数据库以及行业协会进行对接，保障成果认证既权威又高效；在资源匹配阶段，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勾勒学习者的特征画像，按照职业、年龄和地域的差别动态推荐合适的学习模块。

在运行机制中，融入安全防护与智能运维手段，构建应急备份体系并落实周期性功能升级机制，杜绝因技术故障或安全漏洞引发服务中断，此平台既能满足学历教育要求，还可提供职业培训、社区教育及文化传承等多维度服务，逐步打造覆盖全区的数字化教育环境。为增强平台适配性，可于不同层级学习点配置智能终端，实现跨终端的一致操作感受，保证不管是牧区居民还是城市学员都可便捷接入教育资源，老年人或者是对设备不熟悉的人，也能在简单的指导下顺利操作，避免因技术障碍被排除在学习之外。例如，推进内蒙古开放大学“互联网 + 智慧学习中心”建设，开展智慧教室改造与数据平台搭建工作，促使分校与学习点实现互联互通，此举措显著扩大了远程教学的覆盖范围，让城乡及牧区的学习中心达成同步接入，解决了边远地区的接入难题。

（二）优化服务内容与模式

平台搭建完毕，服务内容与模式的重新构建成为关键，课程供给要根据学习群体的差异情况搭建分层体系，涵盖在职人员的学历提升、农牧区居民的技能培育以及老年群体的生活类学习，课程开发可采用模块化设计手段，将知识内容分成基础理论、虚拟仿真、现场实践等三个阶段，依靠线上课程和学习中心的线下活动实现全程衔接。牧区可开设农业和畜牧相关的实践课程，城市社区可深化文化、健康和信息化学习内容，使课程体系适应区域特点，教学方法宜强调线上线下结合，让虚拟实训与实体操作协同运作，打造既灵活又有沉浸感的学习体验。

为强化学习的持续动力，可设立积分与学分的挂钩体系，学习者完成课程即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更高层次的学习机会或职业培训资质，以此形成激励循环，模式优化不仅反映在学习形式上，还涵盖支持系统的优化升级，如在学习中心安排数字化学习指导员，助力低数字素养群体完成课程挑选与操作流程，缩小数字差距，这些指导员的存在并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支持，更像是一种陪伴，他们通过耐心引导让学员逐渐熟悉系统操作，减少挫败感，从而增强学习的连贯性和投入度[4]。优化的核心在于持续调整课程模块，使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配，以此保证教育资源供给兼具前瞻性与实用性，例如，内蒙古开放大学直属学院实施全程管理，把教学服务、质量监控及反馈融入课程设计与授课环节，实现课程供给与服务模式的深度融合，该模式的推行切实增强了课程体系的完备性与教学服务的标准化程度，保障了学习过程的可控性。

（三）加强师资队伍数字化建设

重构社会服务能力，需要有数字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支撑。建设路径可围绕培训体系搭建、能力培育以及激励机制构建这三方面来推进。培训体系需分层实施，基础阶段要涵盖全体教师，关键是让教师掌握数字平台操作、虚拟课堂管理和数据化工具应用；可开设专项工作坊，与国内知名院校或企业开展合作，培育一批可独立开展微课开发、虚拟仿真资源

建设和双语课程设计的骨干师资，这类教师须具备将区域特色与数字工具相融合的能力，如在课程设计中融入牧区生活场景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提高课程的本土化与数字化融合水平。

能力培养需着重构建“双师结构”，教师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应熟练运用多媒体、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开展教学与认证工作。为助力教师不断成长，应搭建可量化的激励体系，把数字化课程开发、资源共享以及社会服务实践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并为其赋予学术与职称评价的对应权重。同时，设立教师数字账户，让培训成果和学分认证相挂钩，保证职业发展路径明晰。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并不是孤立地接受培训，而是通过互帮互学逐渐形成团队氛围。很多年轻教师在前辈的带动下敢于尝试新工具，也更愿意把课堂设计得灵活有趣。这种成长过程往往比单纯的培训更能激发积极性。从更长远角度考量，应促进区域内外教师的交流互动，倡导校际协作与教学成果的分享，使教师在更宽广的网络环境中不断进步。经过这一重构流程，师资队伍不再单纯是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可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资源开发、课程实施与学习指导的多技能人才。以此强化内蒙古开放大学的社会服务承载能力。例如，内蒙古开放大学举办“数字教育创新能力提升培训”学习分享会，以线上与线下融合形式，为教师开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教学方法专项培训，该举措提升了教师群体的数字素养与技术运用能力，助力教学方式实现多元化与智能化变革。

（四）强化与社会各方合作

社会服务能力的再构建也依托政校企社多主体协作机制的再塑造，从而保证服务体系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5]。合作的路径可分成四个环节：政府需搭建开放大学和教育、农业、人社等部门的数据对接通道，让学员学分、职业资格与公共服务平台相互打通，进而提高成果认证与就业推荐的精准度；从行业和企业角度出发，需搭建起数字化实训平台，把真实生产数据与市场案例融入课程，促使学员在模拟场景中掌握职业技能，尤其是像农牧电商、文旅产业这类符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方向，此类合作不仅可提升学习的实用价值，还能助力学员在学习时更快速地融入就业与产业链。

在社会组织维度下，可借助共同搭建数字资源库和社区学习点，拓展老年教育、文化传承及志愿服务的覆盖广度，开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崭新局面；从科研和高校角度出发，需推进区域文化研究成果转化，转化为面向全区居民的普及课程，合作机制要有效运行，需明确各方面分工，成立长期协作委员会，定时评估合作项目成果，借助数字化平台公开数据，保障透明度与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合作不能只停留在签订协议层面，还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像在课程开发、资源共享和学员支持过程中都要有具体举措。学员在参与时能真切地感受到各方力量的支撑，这样的体验会增强他们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要探寻长效合作机制，如和地方龙头企业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基地”，或者与社区组织创建“学习共同体”，促使服务模式更稳定、更具长效性，经过这一流程，开放大学可在教育、产业与社会发展间构建稳固联动关系，让服务功能更为完备，还能在边疆地区打造出具备示范效应的教育合作新范式。例如，内蒙古开放大学和国开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就“终身教育网”建设与数字平台功能升级开展协作，借助该举措，学校提升了课程资源共享水平、拓展了技术应用范围并提高了服务触达效率，为多方合作模式下社会服务能力的重构筑牢了实践根基。

四、结语

数字化变革成为增强开放大学社会服务效能的核心动力，内蒙古开放大学借助网络与平台搭建，达成了区域内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在课程提供、教学模式及学习支撑等方面逐步构建起数字化体系。在数字化时代中，社会服务能力不只是体现为技术条件的健全，还体现在服务模式的重塑与供给内容的改进，且要求师资队伍拥有数字素养，可支持个性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依靠政校企社之间的协同协作，教育资源共享与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体系的开放性和适配性不断得到强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毛明斌，姜宽．新时代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J]. 河南教育（高教），2025(05):12-14.

[2] 卢会兰．“互联网 +”背景下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探析——以柳州开放大学为例 [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3(04):49-54.

[3] 张冠华．内蒙古开放大学服务区域发展，建特色高水平开放大学 [J]. 在线学习，2022(09):44-47.

[4] 魏银霞．地方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研究 [D]. 厦门：厦门大学，2021.

[5] 张婴婴．开放大学社区教育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与实践探索——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 [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31(06):63-6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内蒙古开放大学重大攻关课题“转型发展背景下，内蒙古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建设路径研究”（EZDGG202301）；2023 年度内蒙古开放大学重大攻关课题子课题“内蒙古开放大学三级办学体系建设困境与路径探索”（IMOU-EZDGGZ2305）。

（作者单位：内蒙古开放大学）

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校史馆数智化重塑
——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李　营　杨怀超　孙　颖

摘要：立德树人是大学的立身之本，校史馆则是铸魂育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与“五育并举”综合改革的重要阵地。新时代背景下，大学校史馆普遍面临展陈空间受限、运维管理成本偏高、展陈形式单一、个性化供需错位等现实困境。本文系统梳理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校史馆的功能定位与育人价值，以中央财经大学建校75周年校史馆数智化升级实践为样本，探究打造具有高参与度、高传播力、高教育价值校史育人平台的路径，为高校校史馆转型、充分释放育人效能提供实践借鉴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大学校史馆；立德树人；数智化；育人效能；中央财经大学

五育并举，德育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这一论述为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而校史育人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载体。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更迭，为教育变革注入了强大动力，教育逐渐向智能化、个性化、泛在化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2]，凸显了强化校史校情教育、发挥校史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意义。校史馆作为承载校园文化、弘扬大学精神的核心场所，是校史校情教育的主阵地，也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素材库与能量源。但长期以来，传统校史馆受限于时空格局、更新成本、展示形式等因素，存在观感不佳、育人成效不突出等问题，难以适配新时代受众的认知特点和体验需求。基于此，本文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中央财经大学数智化建设实践，探究大学校史馆数智化重塑的有效策略，助力校史馆充分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

一、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校史馆的本然属性与价值定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史馆的功能内核

学界已对大学校史馆的功能和定位展开诸多探索，形成了多元认知。张淑锵认为，校史馆是大学校园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空间，是大学历史发展缩影，兼具历史性与展示性，既是领导人表达关切的重要场所，也是大学服务国家、服务社会重要课堂，对凝心铸魂聚力、提高声誉美誉、事业发展建设具有重要影响[3]。其场所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具象化呈现，是高校的精神殿堂。刘百秋等指出，校史馆本质上属于博物馆范畴，兼具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功能和研究院史料研究属性，通过史料收藏、学术研究、展品陈列、主题展览等活动，汲取弘扬精神、积淀创造文化、激励师生成长，是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场所[4]。秦嘉煜在研究中分析，校史馆除一般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外，还能够对高校学生与群众起到教育宣传作用，以及联系校友情感的重要作用[5]。

立德树人的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校史馆承载了一个学校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地方发展史等在一所大学中的具体化展现，是大学以德树人、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资源高地和重要阵地，是学校开展对外宣传与合作的重要窗口，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一所大学的根与魂的精华之所在，是大学中人的精神故乡。在这里，“人”是核心，要以“人”为一切考虑的出发点。“馆中有史，史中有人”，校史馆的参观过程实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此实现知识习得、文化传承、精神激励等目标，使观者产生荣校之情、归属之感与价值之认同。

（二）校史馆数智化重塑的核心逻辑

校史馆数智化应该在遵循建馆的基本逻辑和原则、充分发挥校史馆育人功能的基础上解决传统校史馆的

发展困境。校史馆建设需遵循五大核心原则：秉持博物馆专业思维、依托可信的文史资料、挖掘鲜活的校史故事、设置多元互动装置、塑造感染力强的文化气质。以此为前提，数智化重塑需紧扣四大逻辑：以传承弘扬大学精神为核心导向，以历史育人、文化育人为根本目标，以学校发展成与红色基因传承为叙事线索，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导向，以数智技术为实现路径，重构校史馆展陈新样态。通过技术赋能，改变受众的观看模式、参与形态与思维方式，打造沉浸式、个性化的参观学习体验，强化校史文化的传播力与感染力，提升育人成效，让校史精神真正入脑入心、滋养精神。

二、中央财经大学校史馆数智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在建校 75 周年之际对校史馆进行升级拓维，遵循“内容为王、主辅相承、数智赋能、沉浸体验”的原则，全面展现学校发展历程。以数智强大的信息载量弥补空间局限的不足，让“以人为本”的宗旨贯穿整体的设计构思，充分开展调研分析，全力打造能联通、有链接、强联结的校史育人主阵地。

（一）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剖析转型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中央财经大学深刻践行这一要求，在校史馆的规划设计中将问题和需求分析作为首要任务，精准回应师生的期盼。

1. 原有校史馆亟待解决的问题。数智化升级需既补短板又提质效，直指原有校史馆的核心症结，对痛点、难点、堵点、盲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除、解决、疏通、排除。原有校史馆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展陈空间受限，学校校史馆展陈空间局促，展示形式传统单一，信息承载效率较差，导致学校历史脉络呈现不清晰，阶段发展和办学成就都无法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如何巧妙地将局促的空间从视觉上变得更宽阔，并在美观适宜的基础上能使有限空间内加大信息载量，进而将故事讲透彻讲生动是首要问题；二是运维管理成本偏高，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校史馆是需要动态更新的，但空间有限，只能反复地压缩原有内容，可谓之“打补丁”的艺术了，更新维护难；同时校史馆多媒体设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控制分散，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日常管理难。因此如何能够实现容易更新、方便维护、轻松管理是基础问题；三是个性化服务缺失，随着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也对校史馆服务产生了更高的期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观者希望参观活动更加便捷高效，同时也更追求沉浸感、互动式的观展体验，校史馆建设如何“以人为本”，精准对接与日俱增的个性化需求，打造良好的参观体验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高校校史馆数智化建设的共性问题。当前许多高校都对校史馆数字化进行了探索，在确定基本叙事逻辑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传统多媒体、全息投影、光影秀、互动系统等，适时地给迷失在图集文海中的受众一些感官刺激，强化互动参与。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与形式未得到有效权衡。目前校史馆的数字化建设多进入两个极端，一种是只要拥有不求出彩，通常是仅仅在图文展示的基础上配以动态画面呈现，并未对内容的展示效果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种是求多求新求丰富，以频繁强烈的刺激紧抓眼球，让受众时刻保持注意力聚焦，虽趣味十足却容易脱离主线。实质上就是展陈内容和展陈形式没有得到合理匹配，内容的主体地位迷失。二是设计形式同质性较高。在校史馆多媒体设计看似多样化的背后实际还是以播放动态视频为主，辅以合影留念、校友查询等互动项目，多数高校在数智化建设上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同质性较高，特色不够突出。

（二）坚持以人为本，精确施策破解困境

1. 系统集成管控，实现降本增效。做好系统集成，进一步降低校史馆运维的时间和人力等成本，是打造良好参观学习体验的基础。一键系统开关，实现所有硬件设施集中高效控制；多重模式设置，根据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设置参观模式，调整灯光效果、多媒体展项、扩声方式等；快速内容更新，集中内容分发，在后台便捷地进行各展项数据更新。

2. 多感官场景营造，强化沉浸体验。学习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人置于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氛围之中，以第一视角来获得真看真听真体验真感受，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叠加刺激触发情感。通过全息、AI 等技术助力，与实体展项展品相结合，复现学校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节点，呈现校园历史风貌的互动沙盘，结合 3D 打印、AR 等技术复刻历史场景和文物，伴随着校歌的悠扬旋律，将受众置身其中，在校园的古今变换中穿梭。

3. 强化交互设计，凸显主体地位。强交互性强化参与感，个性化体验更突出人的中心地位。AI 财宝儿数字人恭候在校史馆第一站，随时为受众贴心解惑；设置学科和机构发展脉络树，在拖划点触中看到学科专业的发展全貌，了解学校机构变革的前世今生；实现师资和校友的查询功能，回溯往昔岁月留下的点滴记忆；设置合影签名互动区，与学校历代标志建筑合影，观展留痕留念。每一处交互体验的设置都旨在让每个人的参观都有专属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4. 搭建虚拟展馆，突破时空局限。中央财经大学打造了网上虚拟校史馆，实现了从实地行走到云端沉浸式漫游的体验升级，既能够将校史馆每一次更新换代永久保存，也能够与实体校史馆形成内容和参访体验的有机结合，更能够突破此时此地的限制，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展，满足个性化的参访需求，让校史文化的传播更具有广度和温度。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校史馆数智化重塑的启示与路径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实现“立育人之德、树有德之人”的有机统一。因此在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校史馆数智化重塑要充分考虑“人”这个重要主体和“展陈内容”这个关键要素。

（一）充分做好对象分析是基础

在明确校史馆功能定位，确定观展目标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受众的需求和特征进行分析，确定每一类人群的认知特点、学习目的、需求、兴趣点等，从“人”出发，一切的设计就都有了方向和靶点，更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优质观展服务，进而产生良好的教育和宣传成效。例如新生主要是要了解学校的历史发展成就、学校的精神文化，他们对学校的起源、知名校友格外感兴趣；校友则是回到校史馆寻找在校时的记忆痕迹，重温青春岁月；合作单位更多是要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办学成就，作为深化合作的重要参考。

（二）保持价值理性是基本原则

多媒体技术“乱花渐欲迷人眼”，但仍要坚持“内容为王”，理性运用技术工具。在有价值内容和多样化展示形式上找寻平衡，内容过密则觉枯燥乏味，难以厘清核心脉络；形式过盛则显空泛花哨，易消解历史本身的厚重感。根据校史展陈大纲的内容，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数智化介入：有交互需求时、内容载量过大时、有动态展示需求时、参观节奏上需要刺激时以及其他通过传统方式无法充分表现时。遵循要“赋能”不要“主导”，要“灵动”不要“花哨”的原则，让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校史内容的表达与传播。

（三）灵活运用通感是重要技巧

通感，也叫“感觉挪移”，是感觉条件反射中感觉器官相互作用的一种现象，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价值，其正确应用能够有效增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和表现力，拓展精神内涵和审美维度。过长时间调动单一感官容易产生感觉麻木、注意力涣散等问题，而多感官的互相作用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牢牢抓住受众的注意力，才能够进行内容的有效输入。同时多感官调用营造出的沉浸式氛围令人身临其境，以多维的感知牵引带动认知，让校史知识深入脑海、刻入心底。注意灵活运用通感是校史馆数智化升级的重要且有效的实施技巧。

（四）虚拟校史馆打造是必然趋势

建设虚拟校史馆，推动校史校情教育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智能化、泛在化、个性化学习体验，已成为新时代校史文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使实体校史馆和虚拟校史馆相辅相成、协同发力，既能够扩展校史馆的传播半径，让厚重的校史文化触达更广泛的受众，也能够进一步实现反向引流效果，实现良性循环、双向促进。未来结合 VR、AI、游戏开发、数字孪生等技术，进一步打造纵贯学校发展历程、兼具沉浸感和交互性的大学元宇宙也会成为校史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向。

四、结语

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数智技术加速迭代，深刻驱动教育领域的变革创新。在这一背景下，知识供给和获取模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从单向传输转向了多向互动、共建共享的新形态，这也对高校开展校史育人、场馆育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传统校史育人阵地的诸多限制，高校需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以人为本”的核心导向，坚守“内容为王”的价值底线，以数智技术为赋能手段，充分调动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其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从浅层感知进入深度思考，全方位改变受众的观看方式、参与形态和思维模式，打造沉浸式个性化的参观学习体验，进一步提升育人成效。

中央财经大学的实践表明，校史馆数智化重塑不仅能够破解传统场馆的发展困境，更能激活校史育人的内生动力，强化校史文化的传播力与感染力。未来，随着大学元宇宙的持续构建与深化，校史馆需进一步推动数智技术与校史育人、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等的深度融合，完善全方位育人体系，让校史中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成为滋养师生成长、凝聚校园力量、服务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张烁 .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EB/OL].(2022-04-25)[2025-05-3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204/t20220425_621698.html.

[3] 张淑锵 . 论校史馆建设的定位与原则 [J]. 浙江档案 ,2023(04):51-54.

[4] 刘百秋 , 邓浩 . 探析在校史馆建设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J]. 活力 ,2013(12):20.

[5] 秦嘉煜 . 大学校史馆研究 [D]. 北京 : 清华大学 ,200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教思政厅函〔2024〕）；2023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后真相时代高校融媒体中心主题宣传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研究”（23XCF0201）。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

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杨浦区孕妇学校为例

王黎黎　朱　纪

摘要：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党建引领是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以杨浦区孕妇学校为实证研究对象，聚焦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的核心命题，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孕产妇对孕产期健康服务的需求痛点，剖析当前党建引领下妇幼健康服务孕产妇的实践困境，探索“党建＋妇幼服务”深度融合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孕产妇对孕妇学校认知、课程需求、授课体验等方面存在明显诉求，党建引领不足、资源整合乏力、服务模式单一等问题制约服务能力提升。基于此，结合杨浦区孕妇学校实践探索，从联动机制、师资建设、课程优化、品牌打造四个维度构建提升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服务试点经验，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切实保障母婴安全，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关键词：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孕产妇服务能力；孕妇学校；杨浦区

一、问题的提出

妇女儿童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妇幼健康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对妇幼健康事业的领导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1]。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妇幼健康服务指明方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实现“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明确妇女平等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健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2]，这些部署均凸显了孕产妇健康服务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

公立医院作为妇幼健康服务的核心载体，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2018 年《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强化公立医院党建引领作用，2022 年《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在《党的基层组织》这一章中首次将医院纳入基层单位类型，为基层妇幼健康机构党建工作筑牢制度根基。基层妇幼健康机构党支部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整合资源、优化服务，破解孕产妇健康服务中的痛点难点，成为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3]。

杨浦区妇幼保健所党支部始终坚守“母婴安全、儿童优先”理念，旨在推动党建服务能力提升，打造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同向共推的良好生态。杨浦区孕妇学校是由杨浦区妇幼保健院（所）开设的，旨在帮助孕产妇安全度过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教授一定的哺乳知识和技巧。党支部通过杨浦区孕妇学校的业务开展，积极探索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的路径。本文以该案例为切入点，系统探索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的方式方法，为基层妇幼健康服务提质增效提供实践参考。

二、杨浦区孕妇学校服务孕产妇的实践调研与现状分析

杨浦区孕妇学校由辖区十二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行组织，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理位置相对分散，每个街道的分布人数不均匀，组织孕妇学校开展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后因疫情暂停。疫情结束后，2022 年末正式由杨浦区妇幼保健所党支部重新启动，整合全区资源，节约医务人员人力成本，加强社区联动，建立专家库，统筹设计课程内容，线上线下开展孕妇学校课程，多渠道健康科普，打造党建品牌等途径，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拓展服务新模式，提升服务孕产妇能力[4]。

（一）孕妇学校目标群体调研

孕产妇，即从怀孕妊娠开始到产后 42 天的妇女。本次调查选取 2024 年辖区内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在孕妇学校为孕产妇提供动态、连续性的健康服务中，通过量化指标，从孕产妇满意度、自我保健认知程度、参与度、服务内容需求等，结合问卷分析，了解孕产妇需求与实际存在的差距，明确能力不足原因分析，找到解决症结有效途径。

此次有效问卷共计 484 份，25 岁以下占 2.27%，25 至 35 岁占 71.9%，35 至 40 岁占 21.69%，40 岁以上占 4.13%。孕早期（小于 13 周）占 60.12%，孕中期（13 至 27 周末）占 22.73%，孕晚期（28 周至 36 周末）占 3.72%，足月 37 周及以上占 2.07%，已经分娩占 11.36%。初产妇 78.51%，经产妇 21.49%。参加过孕妇学校的占 22.73%，没参加过孕妇学校的占 72.11%，对孕妇学校不感兴趣的占 5.17%。

（二）孕产妇被动参与孕妇学校的原因

1. 了解途径中宣教不充分

孕妇学校是向准爸爸、准妈妈普及孕期知识的重要课堂，目前孕产妇主要知晓的杨浦区孕妇学校课程信息是从建册社区医院医生宣教中获取，通常是在需要去所在社区医院办理建册手续并与医生面对面的机会中了解，但对于孕妇学校概念性质及其具体内容并不能有效在有且仅有一次的上海市孕产妇健康手册（俗称建小卡）的宣教中充分了解，时间上的仓促加上宣教内容的单一，使得孕产妇容易走过场记不住，更不用说加深对相关宣教知识的记忆和理解[5]。

2. 缺少权威性的授课专家

专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决策提供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知识的受众更广。孕妇学校作为获取专业知识的渠道，授课专家的权威性也紧密关系着广大孕产妇的信任度，产科医院权威专家通常在其专业领域内拥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科学依据和可靠性建议，更能获得孕产妇的信赖，帮助准爸爸准妈妈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在历年的孕妇学校授课老师邀请过程中，邀约对象只是有一定经验的医生，并没有突出专家的权威性[6]。

3. 上课形式及课程内容单一

上课形式有助于激发孕产妇获取相关知识的兴趣及提高其听课耐心，杨浦区孕妇学校采取线上孕妇学校及线下孕妇学校两种形式。孕产妇在对生理性反应克服的前提下选择去孕妇学校进行学习，除了能让孕产妇获取专业知识，缓解焦虑情绪，还能提高保健知识知晓率，促进自然分娩，母乳喂养教育，以及获取产后护理知识，能帮助孕妈妈们安全顺利地度过怀孕的每个重要时期，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健康。此次调查中，显示吸引孕产妇的课程内容中，自我胎儿监护 73.64%，孕期营养指导 75.6%，孕期体重管理 55.56%，孕期心理护理 51.2%，孕期瑜伽及孕期有氧体操 50.11%，准爸爸体验活动 44.23%，孕期控糖操 41.83%，分娩体验营 36.6% 等。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孕产妇的参与程度。课程没有整体规划及预告，孕产妇的需求内容无法事先了解匹配，就不容易提起其参与的兴趣。

4. 当前孕产妇人群的态度趋势不明朗

本次问卷调查中，视情况而定占 37.19%，比较乐意参加占 30.37%，非常乐意参加占 26.24%，不太感兴趣占 4.55%，完全没兴趣占 1.65%。从当前孕产妇人群的态度趋势中不难得出，对于激发孕产妇主动参加孕妇学校的积极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孕妇学校整体的内容及发展设计的规划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有效开展科普宣教，设计规划吸引力不足，宣教内容的专业深度与孕产妇实际需求未紧密结合，没有起到很好吸引孕产妇的参与兴趣，在进一步呵护母婴健康，提升服务孕产妇的能力尚不足。

三、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的困境分析

（一）党建引领力度不足，融合深度不够

此前，杨浦区孕妇学校缺乏党建统筹引领，1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散运营，党支部未能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导致党建工作与孕产妇健康服务“两张皮”。党建引领多停留在表面，未能将党建工作融入服务规划、课程设计、师资建设等全流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未充分发挥，难以形成服务合力。

（二）资源整合能力薄弱，服务供给不足

一方面，专家资源整合乏力。产科、营养科、心理科等权威专家资源多集中在大型产科医院，基层妇幼保健所与产科医院缺乏党建联建机制，难以有效联动专家资源，导致孕妇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服务专业度不足。另一方面，社区资源联动不充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妇幼保健所的协同机制不完善，宣传、服务、随访等环节衔接不畅，难以满足孕产妇的全周期健康需求。

（三）课程规划缺乏统筹，服务针对性不强

线上课程模式以其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的优势，能满足现代孕产妇对孕产期相关专业知识的需求和专业指导的期待。线下课程模式以其直接面授、互动式体验等优势，能满足现代孕产妇对直接解决困扰自身问题的办法。而课程内容作为每次孕妇学校的主题贯穿整个孕产期的知识重点，如何增强孕产妇自我保健意识，饮食、营养、睡眠、分娩准备、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等等一系列专业知识，在整体规划课程上还

未能让受众群体一目了然，直指需求。

（四）品牌影响力不足，传播效能有限

杨浦区孕妇学校重启后，没有进行大规模宣传，知晓率偏低，品牌辨识度不高，缺乏鲜明的品牌定位与特色服务，未能形成口碑传播效应，孕产妇多处于被动接受宣教的状态，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未被充分激发。同时，宣传方式较为传统，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不够充分，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有限。

四、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机构服务孕产妇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基于杨浦区孕妇学校的探索

（一）强化社区医院联动机制，合作形成合力

杨浦区妇幼保健所党支部与区域内十二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合作，2025 年将最新版本的孕妇学校科普宣教手册及相关宣传品发放到基层妇保科医生，让孕产妇及时获取孕妇学校课程信息，满足孕产妇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为孕产妇的积极参与打下良好基础。同时，通过加强社区妇保科医生培训，用专业的知识和有温度的服务推动孕妇学校理念在基层深入孕产妇心理，织密孕产妇安全保障网，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二）联建产科医院党支部，强化专业师资及开拓服务新模式

逐步与产科医院党支部进行党建联建，以党支部共建为桥梁，整合产科医院专家资源，每位专家有各自不同侧重点且造诣深厚的学术领域，每个产科医院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合作，针对当下孕产妇关注话题，社会热点、临床遇到的实际常见问题等，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健康宣教。党建联建整合师资资源，实现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优质的服务、专业的领域知识为全区的孕妇提供更加优质、舒适、便捷的孕产期健康宣教，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保驾护航。

（三）丰富课程内容，以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为抓手扩大宣传

做好前期调研，结合课题调研及产科医院提供的常见孕产妇需求的基础上，2025 年杨浦区孕妇学校精准选题，每月围绕一个主题，开展线上直播科普讲座及线下主题内容体验，设计课程内容包括围孕期体重管理、妊娠哺乳期用药、盆底康复、新生儿常见皮肤病及胎记、孕期常见身体不适及处理、妊娠期糖尿病、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认识无痛分娩、妊娠期心理、母乳喂养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新生儿护理、产后妈妈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事等。同时，杨浦区妇幼保健所党支部运用微信公众号科普、推广相关活动信息及预告内容等，扩大孕妇学校的知名度，及时让孕产妇掌握课程时间、内容，激发孕产妇自主参与的兴趣。

（四）打造党建品牌，激活孕妇学校品牌影响力传播

2025 年杨浦区妇幼保健所党支部将孕妇学校品牌命名为“五色光”，以“孕产妇妊娠风险分级管理”的理念为基础，根据孕产妇不同时期情况进行评估分级，评估分类包括红、橙、黄、紫、绿五色预警。“五色光”孕妇学校就像一条“彩虹”，链接产科医生和孕产妇，彼此互相了解、互相配合，共同降低围生期风险，确保孕产妇和宝宝的健康和安全。孕妇学校为孕产家庭提供更多支持，传递科学孕育理念，通过科学备产，为孕产妇答疑解惑，缓解焦虑、寓学于乐轻松掌握知识、专业守护迎接新生命。“五色光”孕妇学校将持续深化医患互动，通过“线上云科普 + 线下实体验 + 健康微课堂”的方式深入人心，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

五、结语

党建引领是推动妇幼健康机构提升孕产妇服务能力的根本保障，也是破解基层妇幼健康服务痛点、难点的有效路径。杨浦区孕妇学校的实践表明，通过党支部统筹协调、资源整合、品牌打造，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分散、师资薄弱、服务单一等问题，推动孕产妇健康服务提质增效。本文基于该案例，构建的“联动机制 + 师资建设 + 课程优化 + 品牌打造”四维提升路径，实现了党建优势与妇幼服务效能的深度融合，为基层妇幼健康机构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对妇幼健康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建引领妇幼健康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持续拓展，需总结提炼试点经验，形成标准化的服务规范，为更多基层妇幼健康机构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孕产妇服务能力提供参考，切实保障母婴安全，推动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小斌，夏伟，张慧慧 . 全力打造孕产妇医疗保健服务新模式 [J]. 人口与健康 ,2024(10):59-60.

[2] 高晓慧，曾文婷，胡乐怡 .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孕妇学校教学中的应用 [J]. 名医 ,2024(07):180-182.

[3] 周玲，梁必会，吴文秀，等 . 以“党建 + 妇幼健康”新模式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J]. 办公室业务 ,2023(07):100-102.

[4] 黄其美 . 以党建融合引领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J]. 新湘评论 ,2024(12):42.

[5] 李斯娜 . 党建引领助推妇幼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梅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建为例 [J]. 办公室业务 ,2024(09):152-154.

[6] 赵倩倩 . 贵阳云岩区多措并举助推健康云岩建设 [N]. 中国食品安全报 ,2024-03-30(C03).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妇幼保健院〈所〉）

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失范行为的德育协同干预实践调查报告

——以淮安工业中专为例

吴　龙

摘要：本报告以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淮安工业中专”）102 名一年级学生为样本，对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中职学生的失范行为特征及德育干预策略开展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学生群体中存在较为普遍的数字化行为失范现象：82% 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从事与学习无关的活动，42% 的学生曾在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31% 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字伦理认知缺失或行为偏差。此类行为的成因具有复合性，主要涉及学生个体数字素养不足、家庭教育在数字行为引导上的缺位等，据此提出构建数字化自我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德育模式、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等策略，为中职德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失范行为；德育协同干预

一、引言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网络素养、职业伦理等数字化时代核心素养融入育人全过程 [1]。在此背景下，新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聚焦网络行为规范等新兴领域，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也为德育创新提供技术支撑。然而，中职教育面临“普高热”与“就业难”的双重挤压，数字化浪潮更使中职学生日均网络使用时长超 4 小时，网络游戏成瘾率较五年前上升 12 个百分点，虚拟社交越界等新型失范行为频发，传统德育模式亟待革新。本调查以淮安工业中专 102 名在校学生为样本，旨在探索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失范行为的德育协同干预路径。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本次调查的目的

本次调查旨在通过抽样调查，全面且精准地掌握中职生失范行为现状，深入剖析学生各类失范行为的发生比例，挖掘学生对自身失范行为的归因认知。期望通过系统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为优化中职教育策略、完善育人环境、提升中职生综合素质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调查对象

选取淮安工业中专 2024—2025 学年在校一年级学生 102 人作为调查对象，覆盖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专业。其中，男生 59 人、女生 43 人，农村户籍 86 人，住宿生 75 人，样本具有较强代表性。

（三）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设计《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行为规范调查问卷》，涵盖学习行为、网络使用、日常习惯等维度，发放问卷 102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回收率 98%。

访谈法：选取 5 名具有典型失范行为特征的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同时与 2 名班主任、5 名家长开展深度访谈。

观察法：对课堂教学、校园活动、网络社群等场景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实地观察，记录学生失范行为表现。

数据分析法：整合学校政教处 2023—2025 年违纪记录、心理咨询室个案资料及智慧德育校园平台网络行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四）本次调查的时间

本次调查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启动，历经问卷设计、预调查、正式发放回收、数据录入与清洗、访谈实施等环节，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完成全部数据收集与初步整理工作，确保调查时效性与数据质量。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失范行为的数字化特征分析

1. 网络依赖与学习失范的关联性

调查显示，82 名学生存在上课使用手机现象，其中 47 人用于浏览短视频、社交聊天，导致课堂注意力分散。考试作弊行为中，2025 年利用电子设备作弊的人数 34 人。同时，71 名厌学学生承认日均网络娱乐时间

超过 3 小时，网络依赖与学习动力不足形成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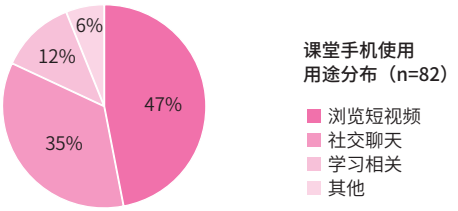


图 1　课堂手机使用用途分布图

2. 虚拟社交中的行为越界

在网络社交方面，42 名学生曾在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29 人参与过网络谩骂，18 人遭遇过网络谣言误导。值得注意的是，12 名学生将网络暴力游戏中的行为模式迁移至现实，模仿游戏角色语言侮辱同学、更有 3 名同学以江湖义气为由参与打架事件，反映出虚拟与现实行为的混淆 [3]。

3. 数字伦理缺失现象突出

31 名学生承认曾未经允许使用他人账号，25 人存在网络抄袭行为，19 人有过泄露他人隐私信息的经历。在网络消费方面，18 人存在非理性消费，其中 6 人曾参与网络赌博、浏览色情网站等相关活动，数字伦理教育亟待加强。

4. 学生看到自己的失范行为总是比周围同学的少

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在自我与他人失范行为认知上存在显著偏差（见表 1）。63% 的学生承认自己考试作弊，而 82% 的学生认为周围同学存在作弊现象；50% 的学生承认有乱扔垃圾的习惯，75% 的学生认为周围同学有此问题；86% 的学生承认讲过脏话，93% 的学生认为周围同学讲过脏话。这种认知偏差可能源于自我保护心理，学生倾向于降低对自身错误行为的关注度，而放大他人的不当表现。

表 1　学生对自我与他人失范行为认知对比表

失范行为类型	自我承认比例（%）	认为他人存在比例（%）
考试作弊	63	82
乱吃乱扔	50	75
讲脏话	86	93

5. 学生的失范行为呈现出时代的特殊性

在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职生失范行为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14% 的学生赞同中职阶段可以恋爱，部分学生坦言恋爱动机为排解无聊、追求新鲜感；25% 的学生赞同上学使用手机，22% 的学生存在晚就寝使用手机现象，11% 的学生承认对手机存在依赖。此外，9% 的学生承认参与过打架事件，19% 的学生在遭遇同学矛盾时不愿向老师求助，反映出师生信任关系的薄弱（见图 2）。

（二）失范行为的成因分析

1. 个体认知与数字素养不足

中职学生批判性思维平均得分 52 分（参照《青少年数字素养标准》），难以有效辨别网络信息真伪。63 名学生缺乏明确的网络行为边界意识，认为“网络世界无需完全遵守现实道德规范”，自我管理能力薄弱导致失范行为反复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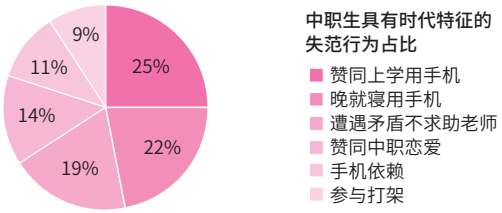


图 2　中职生具有时代特征的失范行为占比图

2. 家庭数字化教育缺位

73% 的家长表示缺乏数字素养教育能力，仅 12% 的家长能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网络。在留守家庭中，58 名家长通过网络红包替代情感沟通，形成数字代沟。家庭数字化教育的缺失使学生在面对网络诱惑时缺乏引导，如 85% 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家庭中，家长从未对其游戏时间进行有效管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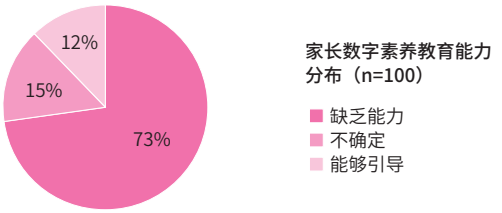


图 3　家长数字素养教育能力分布图

3. 学校德育协同机制不健全

传统德育模式难以适应数字化需求，学校数字素养课程开设率仅 34%（34 人接触过相关课程），且内容多停留在工具使用层面。校企协同德育方面，企业导师参与德育比例不足 15%（仅 15 人接受过企业导师德育指导），未能将行业职业规范有效融入教学。此外，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数字化沟通平台尚未完善，信息共享不及时，导致德育干预滞后。

4. 社会数字化环境的负面影响

短视频平台算法推送使中职生日均接触负面信息时长超 47 分钟，校园霸凌、网络炫富等内容的推荐概率提升 230%。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也加剧了学生自我认同不足，48 名学生认为“中职生在社会上不受重视”，进而通过网络失范行为寻求关注。

（三）德育干预的现状与问题

1. 干预手段的数字化程度不足

学校现有德育手段中，数字化工具应用率仅 28%（28 人接受过数字化德育工具干预），仍以传统说教为主。虽然建立了心理咨询平台，但线上咨询使用率不足 10%（仅 10 人使用线上咨询），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在应对网络失范行为时，62% 的教师仍采用没收设备、批评教育等传统方式，缺乏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引导。

2. 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学校与家庭的数字化沟通主要依靠微信群，信息反馈不及时且缺乏系统性。与企业的协同多停留在技能培训层面，德育协同仅占合作内容的 8%（校企合作中仅 8 人接受过德育相关内容）。社会力量参与德育的渠道有限，社区未能为中职学生提供专门的数字化实践基地，导致德育资源分散。

3. 评价体系缺乏数字化指标

当前德育评价仍以传统的操行评分、教师评语为主，缺乏对网络行为、数字素养的量化评估。智慧校园平台虽采集了部分网络行为数据，但未建立科学的分析模型，无法为德育干预提供精准依据 [4]。

四、德育协同干预的实践策略

（一）构建数字化自我教育体系

开发数字素养课程。将《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大纲》融入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数字身份管理、算法认知与批判性思维等模块，通过 VR 模拟网络场景开展沉浸式教学，提升学生数字素养 [5]。

实施数字成长护照计划。建立包含网络行为、学习数据、志愿服务的数字档案，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每学期生成个性化发展报告，引导学生自我反思。

打造网络文明社团。组织“青芒”网络文明社团，开展短视频创作、网络舆情分析等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网络自律意识，优秀作品在校园数字平台展播，形成正向引导。

（二）推进产教融合的德育模式创新

重构数字化课程体系。将专业课程与智慧场景结合，如数控专业开发数字化车间伦理模块，学前教育专业开设智能教育设备使用规范课程，实践教学占比提升至 70%，在技能培养中融入职业伦理。

建设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联合企业搭建 VR 实训平台，使学生在模拟场景中强化职业规范意识。如汽车维修专业通过虚拟车间训练，培养学生安全操作、环保意识等职业素养，减少因职业认知模糊导致的失范行为。

实施双导师德育制。企业导师每月开展职业素养讲座，学校教师同步进行行为规范指导，构建“职业认知—行为养成”一体化培养模式。建立双导师沟通平台，及时共享学生在学校和企业的表现，形成德育合力 [6]。

（三）完善数字化家校社协同机制

构建家校协同育人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家校 App 等工具，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沟通平台。定期推送家庭教育知识、学生在校表现，及时反馈学生动态，实现家校信息实时共享 [7]。

开展家长培训活动。每学期组织 2—3 次家长学校培训，邀请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围绕家庭教育方法、青少年心理特点、家校合作策略等主题开展讲座与交流活动，在沟通过程中，教师应该正面引导，表扬学生的优点和进步，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帮助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掌握科学教育方法。

实施家访与定期回访制度。班主任每学期至少对每位学生进行一次家访，深入了解学生家庭环境与成长背景，让家长有机会全面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与家长共同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对重点关注学生进行定期回访，跟踪教育效果，及时调整教育策略。

建立校企社协同平台。联合企业、社区建立数字化德育协同平台，企业提供行业职业规范案例，社区发布社会实践活动信息，学校整合资源推送给学生。如组织学生参与企业数字化车间参观、社区网络文明宣传等活动，拓展德育渠道。

构建数字化德育评价体系。在智慧校园平台中增加数字素养评价模块，从网络行为规范、信息甄别能力、数字伦理等维度进行量化评估。建立德育大数据分析模型，为每位学生生成德育发展曲线，及时发现失范行为苗头并干预。

五、结论与展望

本调查揭示了数字化时代中职学生失范行为的新特征与成因，提出了德育协同干预的实践策略。通过构建数字化自我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德育模式创新、完善数字化家校社协同机制，有望提升中职德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结合智慧德育等数字化技术，深入探究网络环境对学生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为数字化德育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撑。同时，应加强对新兴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在德育中应用的研究，持续完善协同干预策略，助力中职学生在数字化时代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徐永稳 . 基于互联网传播媒体的数字化改革趋势研究 [J]. 移动信息 ,2025,47(04):120-122.

[2] 杜晓东 . 信息网络时代云计算技术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J]. 移动信息 ,2024,46(12):261-263.

[3] 王湲惠 , 张柠 , 秦二强 , 等 . 互联网视域下青年群体网络热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07):212-215.

[4] 董占峰 , 王凯旋 .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网络载体的建构路径 [J]. 社会与公益 ,2024(12):89-91.

[5] 姜一 , 胡珊 . 网络社会支持缓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定性研究 [J]. 时代青年 ,2025(05):91-93.

[6] 周艳 , 陈露露 , 宣富君 , 等 .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产教融合模式教学改革探索 [J]. 大学 ,2025(07):12-15.

[7] 徐姝 . 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各方职责与教学关系研究 [J]. 大学 ,2024(16):10-13.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信息工程系副主任、助理讲师）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赵淑娟

摘要：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本文指出了目前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存在与产业需求脱节、新兴专业不足、传统专业改造滞后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调整与优化专业的策略与方法。本研究结果对推动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改革，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农业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优化策略；江苏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农业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其专业设置直接关系到农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适应性。然而，当前农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快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专业调整与优化成为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江苏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和职业教育强省。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探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问题，旨在为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实地调研等方法，全面客观地分析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现状和问题，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与方法。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指的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群和新型生产力形态[1]。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主要表现为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绿色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2]。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3]。从生产端的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到加工端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及保鲜技术，再到流通端的农村电商与冷链物流，全链条呈现出技术密集、效率提升、附加值增高的鲜明专业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使得行业产业对人才需求提出新的要求[4]。农业类高职院校作为农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合理的专业设置不仅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还能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5]。重新审视涉农专业设置，及时调整并优化专业设置，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转型升级[6]，以高技术驱动、绿色低碳、高效能发展为特征，相对应地对农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以下要求：

（一）技术创新导向

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的引领作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要求农业高职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培养掌握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课程体系需系统涵盖农业传感器应用、农业数据分析、智能装备运维等核心内容，扎实锤炼人才专业能力，保障其高效适配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

（二）产业融合需求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农业高职院校需优化专业设置，培养适应产业融合的高素质人才[7]。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跨界融合，对既通晓农业生产规律，又具备加工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农业高职院校需优化专业结构、突破传统专业壁垒，增设农产品电商运营、乡村旅游管理、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交叉专业，培育适配产业融合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绿色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绿色低碳已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绿色食品生产及循环农业推广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愈发迫切，农业高职院校需布局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专业，培育具备环保理念与生态技术的专业人才，助力农业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实现转型。

三、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现状

江苏省现在的涉农高职院校有 10 所，开设涉农专业共有 56 个，涵盖了传统农业、农业技术、畜牧兽医、园艺技术、农业经济管理、水产经营等多个领域。

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江苏省围绕“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强调聚焦新质生产力，进行一系列举措持续优化农业高职院校的专业布局。

2024 年 5 月，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4 年全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审核结果，新增了 125 个专业点，其中包括多个与现代农业相关的专业 [8]。同时，江苏省的一些农业高职院校积极调整专业设置，逐渐撤销了部分非农专业，进一步聚焦农业主业；2024 年 12 月，江苏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农业高职院校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调整和新设相关专业 [9]；随后，江苏省建立了专业设置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学校对照《江苏省重点产业对应职业教育部分紧缺专业目录》，增设产业发展急需的现代农业等专业，同时调控部分相对过剩专业。

目前，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通过新增专业点、优化专业结构、强化产教融合等措施，积极推动专业设置与新质生产力需求相适应，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体现了如下特征：

（一）专业设置与农业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江苏省高职院校在涉农专业的设置上，努力与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相适应，以满足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农科专业较多，2024 年聚焦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领域，增设了生态环境修复技术专业；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新增了云计算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这些新专业紧密联系新质生产力，以适应农业产业链中的生产链、供应链、信息链的需求。

（二）多元协同与产教融合

2024 年，江苏省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通过校企合作、学科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措施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例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企业共建“苏州市农业遥感估产联合实验室”和“农业大数据协同创新应用中心”，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同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探索打造“金专业、金课程、金教师、金基地”。

（三）专业优化与特色发展

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注重专业优化，重点打造特色专业群，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地处苏州，打造园林技术专业群；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畜牧兽医、动物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等专业，以凸显农牧特色专业优势。

（四）创新创业教育

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在专业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将“创新创业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组织开展“创响江苏”、中国国际“互联网 +”“创客中国”“中国创翼”等赛事，发掘优秀创业项目、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

（五）服务“三农”与人才培养

江苏省高职院校积极推行“订单班”“定制村干”等培养模式，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农民培训达到每年 4 万—5 万人次，以解决农业人才的选拔、引进和留存问题。同时，鼓励农业人才返乡创新创业，将先进农业技术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

随着产业的快速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很多农业高职院校尚未及时调整和升级专业设置，使得专业设置与快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从专业分布来看，传统农业类专业仍占主导地位，新兴农业类专业如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物联网技术等专业开设院校较少，且招生规模有限 [10]。部分农业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同质化现象，即不同院校的专业设置在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上存在极大的重合性，与已开设专业区分不明显。

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方面仍有很大改进空间。部分专业设置与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脱节，如对江苏特色水产养殖、花卉园艺等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新兴农业类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难以满足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传统农业类专业改造升级缓慢，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未能及时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传统农业类专业改造升级进程迟缓，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未能同步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实践教学与企业实际生产场景脱节，致使学生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存在偏差。

四、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优化策略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应当逐渐形成涵盖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农产品经营等领域的专业体系。专业调整与优化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一是前瞻战略性原则，专业设置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以战略的视角预测未来农业发展趋势；二是本土特色化原则，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应体现本土区域农业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是融合复合性原则，专业设置应注重农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培养融合复合型人才；

四是机动灵活性原则，专业设置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度，能够根据产业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基于以上原则结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应采取以下策略和方法：

（一）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增设新兴专业。增设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物联网技术等新兴专业，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鼓励院校之间差异化发展，避免新兴专业同质化布局。

改造升级传统专业。对作物生产技术、畜牧兽医、园艺技术等传统农业专业实施改造升级，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与新工艺，增设智能装备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及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课程模块，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二）优化专业结构

重点发展特色专业。重点发展符合江苏区域农业特色的专业，如水产养殖技术、花卉园艺技术、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等，形成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农业特色专业群。

调整专业布局。根据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布局，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全面优化课程体系。升级课程教学大纲，构建适应“农科 +”“工科 +”的系列特色课程模块，如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机械学基础等。

深化动态专业调整政策。各学校要积极响应和利用专业设置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合力完善健全引导性专业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响应农业产业发展新需求，审慎论证，适时调整优化专业设置。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质生产力要求突破性、颠覆式创新，对农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从业人员应通过跨领域交叉、多元协同创新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争取政策支持，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如设立重点实验室、提供专项招生指标等。通过推进产教融合、强化实践教学等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和培养复合型教师，鼓励跨学科的课程和项目设计以培养具有跨界整合与知识融合能力的人才；继续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12]。加大“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鼓励和支持高校聘用企业技术人员、农林科技专家等兼任耕读教育师资。

五、结语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案例，探讨了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存在与产业需求不配套、新兴专业严重不足、传统农业专业改造滞后等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本文提出了紧密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基于产业升级及时优化专业结构、多元评价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优化策略。本研究结果将对推动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改革，更好地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农业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农业高职院校应当持续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及时动态调整与优化专业设置，更好地培养高素质农业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 高国庆，李云霞，李佳宁.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形成历程及发展路径 [J]. 商业经济，2025(03):1-4,33.

[2] 孟珂.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破资源约束天花板 [N]. 证券日报，2025-02-25(A02).

[3] 马晨晨. 首提农业新质生产力一号文件释放新信号 [N]. 第一财经日报，2025-02-25(A01).

[4] 李云飞，张政利. 农业高职院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推进路向 [J]. 教育与职业，2024(11):22-30.

[5] 周霞，鲍越.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01):76-78,81.

[6] 彭琳，黄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N]. 南方日报，2025-02-24(A02).

[7] 刘敏. 新质生产力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 [J]. 山西青年，2024(20):92-94.

[8] 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4 年全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审核结果的通知 [EB/OL].(2022-09-05)[2025-08-25].http://jky.jsou.edu.cn/2024/0605/c7054a176289/page.htm.

[9] 江苏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 [EB/OL].(2024-12-05)[2025-09-15].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4/12/5/art_58320_11438951.html.

[10] 张明远，李红梅.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改革研究 [J]. 职业教育研究，2023,15(03):45-52.

[11] 王立新，陈思远. 江苏省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匹配度分析 [J]. 高等农业教育，2022,37(04):78-85.

[12] 吴建国，林晓芳. 农业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策略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 [J]. 职业技术教育，2023,44(02):33-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优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24SJYB1119）；第六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产业升级的农业高职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ZDZC11）；2024 年度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创新团队专项资助（CXTD202405）。

（作者系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组织赋能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三感”提升的二级工会职能创新研究

——以中山大学生态学院为例

包　童　陈怀海　赵文嘉　刘姗姗　罗　燕

摘要：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深化改革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二级工会职能创新对赋能青年教师发展及责任感、荣誉感、幸福感协同培育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组织赋能理论，提出构建“价值引领—专业支持—人文关怀”三维服务体系。即通过主题教育与榜样示范强化价值认同、搭建跨学科平台提升职业荣誉感、提供精准服务增强归属感。研究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打通教师发展支持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工会主导、多元协同的新型组织保障范式，借由基层治理单元创新强化立德树人组织支撑，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优化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组织赋能；高校工会；青年教师；“三感”；职能创新

在“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青年教师已成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然而，教学科研双重压力、职业发展通道狭窄、情感支持薄弱，使“责任感淡化、荣誉感弱化、幸福感缺失”成为普遍现象[1]。组织赋能理论强调，基层治理单元应通过制度、资源与文化的系统供给，激活个体潜能并反哺组织效能，高校二级工会恰是距离青年教师最近的制度节点。本文聚焦工会主导下青年教师责任感、荣誉感、幸福感协同培育，通过价值重构、路径设计与机制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方案，探索工会职能从福利保障走向发展赋能、再到生态营造的迭代路径，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样本。

一、价值重构：工会职能的时代转向

（一）从福利保障到发展赋能

传统高校二级工会长期扮演“后勤部长”角色，以节日慰问、困难补助、文体福利为主要抓手。伴随“双一流”建设对青年教师科研与教学的高阶要求，工会必须完成从“物质供给”到“能力供给”的范式迁移，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工会以“发展赋能”为导向，将资源重心从“事后补偿”转向“过程支持”：一方面，搭建跨学科青年学术午餐会、人才培养经验分享会、教学创新工作坊等多元平台，形成“问题共研—经验共享—资源共用”的可持续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名师—青椒”导师帮带制度，以项目制方式签订成长契约，变“输血”为“造血”。

（二）从活动组织到生态营造

传统“健步走打卡—月末抽奖”的单一文体活动已难以匹配青年教师的专业节奏，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工会以“学科—生活”双螺旋理念重构活动，将健步走升级为“绿径科研行”，通过步道亲植植物附二维码科学介绍、运动里程兑换科学书籍等，实现健身与学术双重激励；妇女节举办“指尖上的生态”插花工作坊，邀请园艺专家讲解花材生态寓意，作品可装点办公室并在微信公众号展示，让节日关怀与美学教育同步发生，让学科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在一次次沉浸体验中深度交融，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成长生态[2]。

（三）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引领

传统“等问题上门”的模式往往让工会服务慢半拍。高校二级工会可建立“需求前置”机制，首先，在教代会提案系统之外，嵌入一条“青年教师微通道”，工会定期梳理成“即办、协办、转办”三类清单，办理进度在学院公共区域公示。其次，把“院长下午茶”改为小型圆桌会，话题由青年教师票选，现场不设主席台，院领导与教师围坐，围绕职称评审、科研压力、教学创新等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再次，成立“青年教师理事会”，成员由全体青年教师差额直选产生，真正做到“青年事青年议”，让青年教师从“被服务者”转为“共同治理者”。

二、实践路径：“三感”培育的三重维度

在组织赋能理论视域下，青年教师的责任感、荣

誉感与幸福感并非孤立的心理变量，而是可被制度设计激活并持续强化的职业认同要素，高校二级工会需将“三感”培育嵌入日常运行机制，使其成为基层治理单元的内生动力[3]。

（一）责任感培育机制

1. 师德涵养工程：生态育人讲堂

工会以“教室—实验室—野外台站”为流动载体发布主题清单，如“‘双碳’目标与课程思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叙事”，邀请校内外教学名师、行业楷模担任主讲。青年教师在教研室公开说课，工会通过随机听课、学生问卷、同行互评三种途径收集反馈，将优秀案例直接纳入校级示范课资源库，形成师德建设与教学改进的闭环。

2. 教学能力提升：跨学科工作坊

依托教师发展中心，工会建立“课程设计工作坊”，每季度聚焦一个真实教学难题（如“如何在生态学导论中融入遥感大数据”等），提前征集志愿教师，现场抽签组成跨学科小组（理工+人文+信息），采用“世界咖啡法”在两小时内完成课程微设计，并由教学督导即时反馈。工作坊结束后，工会将修订课件、教学反思上传云端，供全体教师二次调用。

3. 学术共同体建设：青年教师创新团队

工会将“青年创新团队”视为科研育人的最小作战单元，教师自由提出研究方向，工会组织“5分钟电梯演讲”，现场投票产生若干主题团队；学院给予场地、经费、研究生指标等“起步包”，工会负责对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与校外实践基地。运行一年后，工会联合科研处举办“团队开放日”，成员以海报+微视频展示成果，既促进交叉合作，也强化公共责任。

（二）荣誉感塑造路径

1. 多元评价体系：让每一束光都被看见

工会与教师发展中心共同制定“新锐教师成长积分”，教学竞赛、教材建设、慕课上线、指导学生获奖、社会服务案例均可折算积分。年度积分领先者授予“金穗奖”，其余按区间授予“银星”“铜叶”证书。积分与职称评聘、公派研修推荐挂钩，使荣誉即时转化为发展资源。

2. 创新表彰形式：“教师新锐”公众号系列

工会联合教师发展中心运营“教师新锐”公众号，每学期定期推送，每期聚焦一位青年教师：以图文故事讲述科研初心，留言区开通学生、同行、企业导师的多方评价。推文上线一周后，工会把阅读量、点赞数、精选留言整理成“数字名片”返还给教师，作为个人成果库的鲜活素材；线下同步布置“荣誉走廊”，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3. 强化社会连接：跨界实践之旅

工会组织“企业参访+社会服务”双周行动：首周走进行业龙头企业，了解技术需求；次周深入乡村或保护区，开展科普讲座、生态调研，把论文写在大地上[4]。活动结束后，教师需提交“服务—科研”对接表，工会择优资助后续联合课题，让社会声誉反哺课堂，学生亦因教师的鲜活经历而增强专业认同。

（三）幸福感提升策略

1. 成长支持：“青苗成长计划”

教师发展中心与工会联合设立“青苗成长计划”，面向刚入职的青年教师。流程分三步：个人自评+导师面谈生成“成长画像”；依据画像匹配校内外导师，签订帮带成长契约；工会举办“成长路演”，形成二次辅导。计划结束颁发“成长证书”，记录培训学时、项目经历、获奖情况等。

2. 生活保障：校地联动机制

针对子女教育、住房安居、父母就医三大高频需求，工会牵头与地方政府、兄弟院校、企业园区共建“15分钟服务圈”，切实减轻教职工在流程手续方面的沟通压力，并且落实教师大病医疗慰问制度，使教师群体及家属真实体会组织温暖。

通过以上路径，高校二级工会不仅实现了从福利保障到发展赋能的职能升级，也为青年教师铺设了一条可持续、可感知的成长阶梯，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层样本。

三、机制创新：工会工作的生态化转型

高校二级工会的生态化转型，是把传统“活动型组织”升级为“治理型枢纽”，让青年教师在高强度、不确定性的职业场域中获得持续、精准、柔性的支持[5]。生态学院工会以“需求—资源—情感”三螺旋模型为框架，在流程再造、资源耦合、文化浸润三个层面展开系统实验，已形成一套可验证、可复制的基层治理范式。

（一）需求导向的活动设计：从“我有什么”到“你要什么”

教代会是基层需求的第一关。生态学院工会在教代会闭会期间，将提案收集功能前移，设立“青年提案快线”：教代会代表把青年教师集中诉求提炼成简明议题，工会秘书处按月汇总，形成可视化“需求池”。随后启动“提案—实施—反馈”闭环，青年教师从“被动点菜”变为“共同下厨”。

近两年，学院工会依托该机制，先后向校工会申报并获批两项“精品活动”：“学思践悟——大屏障森林公园生态主题互动教育”，把科研样地变成亲子课堂；“生态美学之旅：莲花山与关山月美术馆自然艺术探索”，把审美体验转化为科研配图提升训练，保证活动内在品质，传递“工会永远在场”的理念。

（二）专业资源的整合模式：从“单打独斗”到“平台枢纽”

经验表明，工会的角色应由“主办方”升级为“平

台枢纽”。内部端口，工会与科研管理部门等签订“一张表”备忘录：共享场地档期、专家库、培训课程，教师一次报名即可同步获得三类资源支持，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统计。外部端口，工会与地方科协、行业学会、龙头企业科协建立柔性合作框架：地方科协开放科普基地与差旅通道，行业学会定期发布技术难题清单，企业科协提供中试平台与真实案例；工会负责遴选教师“揭榜”，项目完成后复盘“需求—投入—产出—可移植节点”，存入内部知识库，形成持续迭代的标准模板。通过“平台枢纽”角色，工会把分散的师资、设备、数据、场景整合为可流动的“服务包”，实现“工会搭台、多方唱戏”，既减轻自身行政负荷，又放大协同效应[6]。

（三）文化浸润的情感联结：从“组织归属”到“身份认同”

在文化层面，学院工会与校生物博物馆联合推出生态主题文创：水獭、候鸟化作徽章、帆布包等，用于青年教师、学生及校友的公益申领与活动纪念。学院成立“生态学院发展基金”，帮扶困难教师及学生，让文化关怀与制度兜底并行，温暖直达人心。

在空间层面，生态学院某楼层电梯间被改造成“光合驿站职工小家”：工作日中午是静音阅读区，周五傍晚切换为沙龙模式，灯光、音乐、咖啡一键可调；学院老师自发打造深圳特色溪流缸，构建了微型生态景观，对研究物种进行科普展示，一举多得，提升了空间的人文温度。

当需求导向、资源整合与文化浸润形成闭环，高校二级工会便完成了从福利保障到治理枢纽的生态化跃迁。

四、经验启示

（一）把握三个结合原则

1. 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将教育强国、科技自立、绿色发展等宏大叙事转译为可感可及的学术议题与课程案例，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同频共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双向奔赴[7]。

2. 集体需求与个体差异相结合

建立“分层分类、一人一案”的服务矩阵：面向入职三年内的教师推出“教学启航包”，三到五年的重点配置“科研加速包”，五年以上的提供“交叉融合包”；同时保留“绿色通道”，对孕哺期、突发家庭变故等特殊情况给予弹性支持，确保公共政策不忽视个体尊严。

3. 传统载体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保留恳谈、沙龙、合唱等传统载体的温度，同时开发“工会小程序”，把“面对面”与“键对键”融合为“心贴心”。

（二）构建长效发展机制

第一，建立“工会主席联系青年教师制度”。主席团成员每人定向联系若干名青年教师，每学期至少一次深度访谈，形成“问题台账—责任清单—整改报告”闭环，将访谈结果纳入工会年度述职。

第二，完善“双代会”提案落实评估体系。设置“绿黄红”三色预警：绿色即办、黄色督办、红色销号，办理情况在学院网站公示并与二级单位考核挂钩。

第三，固化成熟经验。将“青苗成长计划”“午间心灵驿站”等做法写入学院规章，每三年复审一次，确保制度与时代同频、与实践共进。

五、结语

组织赋能视域下的高校二级工会职能创新，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实践。本研究以青年教师“责任感—荣誉感—幸福感”协同提升为抓手，通过价值重构、路径设计、机制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方案，实现了工会组织从“福利部”到“发展部”再到“生态部”的迭代升级。未来，还需进一步运用大数据精准画像、AI 智能推送等新技术，持续优化“需求感知—资源匹配—效果评估”闭环系统，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具普适意义的“工会方案”。

参考文献

[1] 包童 . 浅谈高校青年教师的评价改革与自我革新 [J].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 (教师版),2022(49):105-107.

[2] 吴昊芳 . 高校新建区域基层工会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以清华大学昌平科研基地为例 [J]. 高校后勤研究 ,2025(06):68-71.

[3] 黄飞 , 邢傲然 . 高校工会赋能教职工职业生涯发展的新动力 [J]. 山西青年 ,2025(11):70-72.

[4] 朱夏云 . 高校工会服务质量对教职工获得感影响的量化研究 [J]. 科教导刊 ,2025(13):82-84.

[5] 余正昊 , 陆永康 . 精细化管理视角下高校工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探索 [J]. 科教导刊 ,2025(13):100-102.

[6] 李天博 . 新时代高校工会管理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J]. 才智 ,2025(09):189-192.

[7] 李谦 , 肖雨微 . 新时期高校工会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2):129-13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中山大学校工会课题“青年教师‘三感’指数及提升策略研究”；2024 年度广东省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多学科多途径融合创新促进《古生物学》课程改革高质量发展”（粤教高函〔2024〕30 号 -417 号）；2024 年广东省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体两翼四支撑’推动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优化升级”（粤教高函〔2024〕9 号 -456 号）。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历史比较法下的青年家国情怀培育机理和实践进路

——基于“两弹一星”事业亲历者与Z世代青年的对比分析

曹珊珊　方　舟　黄　凡*

摘要：Z世代青年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原生数字一代，其群体特征与前世代形成显著差异。当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群体中持续渗透，甚至对其精神文化构建产生消解效应。如何重塑Z世代青年的精神价值认知，已成为亟待破解的育人问题。“两弹一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曾激励和鼓舞了无数国人砥砺前行。基于历史比较法，本文通过系统对比“两弹一星”亲历者和Z世代青年的群体特征，从爱国主义、文化认同、责任意识、家风传承四个维度构建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解读模型，从“国家、民族、家庭、个体”提出了Z世代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家国情怀；“两弹一星”精神；思政育人；Z世代青年

一、研究背景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信息爆炸式增长，知识迭代周期显著缩短，Z世代青年（通常指1995年—2010年出生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逐渐消解了精神文化在青年认知建构中的作用，Z世代青年对于家国情怀的认知缺乏，已然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亟须解决的问题。“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二十四个字[1]，不仅是“两弹一星”亲历者用生命践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更丰富了家国情怀的时代内涵。随着“两弹一星”亲历者名单逐步公开，青年群体开展“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实践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两弹一星”精神的现代化解读，在传承弘扬科学正确的家国情怀、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推动铸魂育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此，以“两弹一星”亲历者为例，深入探讨青年家国情怀培育机理与实践进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研究新时代家国情怀的思想内涵，梳理新时代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现状和价值，从而明确Z世代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可行路径，不仅有助于家国情怀的赓续传承，更有利于激励青年自觉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二、问题的提出

研究重点在于如何从“两弹一星”亲历者和“Z世代青年”群体对比分析中构建家国情怀内涵的青年解读模型，提炼出青年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探究Z世代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实践进路。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而提出实践进路，旨在以更合理有效、可复制推广的方式帮助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为祖国复兴添砖加瓦，增色添彩。

研究难点在于如何耦合青年家国情怀解读模型与“两弹一星”精神，形成可推广范式。本研究以质性分析为方法，在数据来源和构建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与偏颇。因此，需在明晰家国情怀内涵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精准把握二者内在联系，构建兼具青年适配性与普适性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

三、历史比较法下青年群体的异同分析

历史比较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索发现历史规律的一种史学方法[2]。研究采用纵向比较，对比“两弹一星”研制时期与Z世代青年群体的社会环境、成长背景差异，分析家国情怀培育要素，探究“两弹一星”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培育效力。

（一）时代殊途，使命同归

“两弹一星”研制时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基础弱，资金、技术、物资匮乏。国家以“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调整经济，逐步实现稳定增长。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环境，青年一代毅然投身科研与国

防事业，以坚定信念扛起国家发展的千钧重担。当前，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Z 世代青年的生活条件和眼界有了显著改善，但依然面临“泛娱乐化现象”“历史虚无主义”等负面信息侵扰，青年如何提升自身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3]。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是一种能够提升 Z 世代青年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便在于青年的接续奋斗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教育差异，抉向齐趋

在“两弹一星”研制时期，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稀缺且分布失衡。1963 年起，国家推进中小学与高等教育改革，但受限于经济和社会条件，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依然突出。即便如此，青年们仍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青年便是典型代表。如今，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教育资源愈发丰富，Z 世代青年们正基于自身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等特征在各个岗位上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4]。

个体与社会相互依存，尽管时代变迁，青年始终面临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如何结合的命题。青年作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强化家国情怀教育意义深远，深化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5]，更能激发他们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三）国势不同，勇担重任

国防力量是决定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两弹一星”研制时期，中苏关系逐渐破裂，西方国家施加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国家安全形势愈加复杂。此后，我国明确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两弹一星”的自主研发成为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而 Z 世代青年面对的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国内外环境，但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地区性冲突频发，对于我国而言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多重安全挑战。

两个时期的青年，虽面临不同的国防环境，却同样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的使命。新时代青年应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到国家安全涵盖军事、文化、科技等多领域，以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发展。

（四）韬略更迭，青衿同擎

在“两弹一星”研制时期，我国以谋求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捍卫国家安全为战略核心，将科技自立作为破局关键。青年们挺身而出，甘做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主力军，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信念投身科研，众多青年科学家放弃海外优渥条件归国，为技术突破作出巨大牺牲。Z 世代，我国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与“两弹一星”研制时期的目标相比，国家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突破外部封锁，而是涉及各领域的全面提升。尽管不同时期目标差异显著，但青年始终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Z 世代青年虽面临多元发展任务，却与“两弹一星”研制时期共享民族复兴的使命。

表 1　历史比较法下青年群体的异同特征点

时期	“两弹一星”研制时期　“Z 世代”	
社会经济	共同点	人口问题 丨 环境问题 丨 资源供给 丨 转型发展
	不同点	经济基础 丨 体量规模 丨 物资资源 丨 经济结构
教育水平	共同点	高等教育 丨 区域间教育资源 丨 教学水平
	不同点	教育资源 丨 高等教育 丨 教育改革
国际地位	共同点	国际安全形势 丨 军事国防战略 丨 科技实力
	不同点	国防力量 丨 国际地位 丨 国际环境
宏观战略	共同点	国家自主权 丨 外部制约 丨 发展目标
	不同点	国际地位 丨 国家安全 丨 世界和平

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群体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地位，但他们始终肩负着国家发展的重任，始终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跨越时空，青年对国家发展的责任一脉相承，这印证了家国情怀培育的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必要性。“两弹一星”精神凝聚着先辈爱国奉献、自力更生的精神内核，至今仍对青年价值观塑造具有深远教育意义。因此，深入挖掘该时期青年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与培育机理，对当下 Z 世代青年家国情怀培育实践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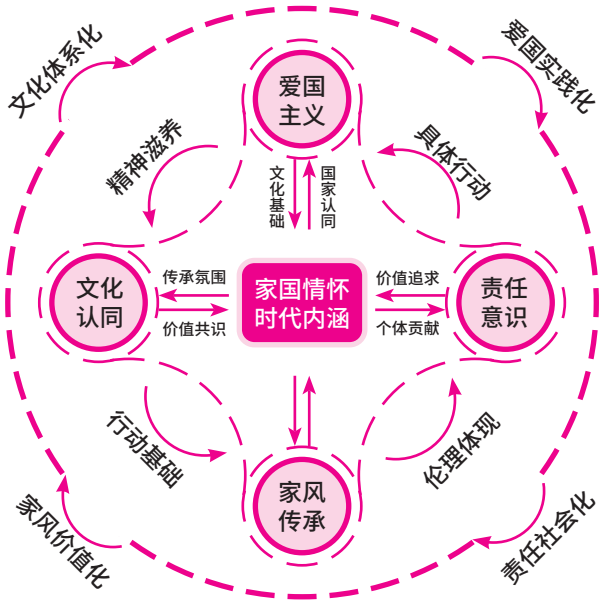


图 1 青年家国情怀培育的解读模型

四、培育青年家国情怀的实践进路

（一）以宣传为阵地，丰富内容建设

推进文化教育，探赜创新思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家国情怀精神资源，需以创新形式激活

传承。可依托“两弹一星”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创意文案短片等多元创作，突破传统教育模式。同时，整合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线上渠道，打造家国情怀教育专题板块，系统输出文化知识；建立数字化资源库，以案例集等形式支持青年自主学习，助力其深刻认识新时代建设者的使命。

搭建媒体矩阵，拓展传承渠道。“传统 + 互联网”的融合模式为新媒体时代家国情怀的传承与传播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蓬勃活力。借助新媒介平台开展家国情怀文化教育，不仅能够有效赓续红色血脉，更有助于引领广大网民树立正向价值观，为在新媒介环境下凝聚家国情怀的价值共识奠定坚实基础。可以将“两弹一星”亲历者的访谈剪辑并发布于各大媒体平台，充分发掘全媒体信息传播高效快捷的潜力，使家国文化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悄然浸润青年心灵。

（二）以教育为抓手，融入民族文化

发挥民族优势，紧跟时代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借鉴吸收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始终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五千年中华文化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不断传承。“两弹一星”亲历者的话语中，深刻体现出在家国情怀教育中要重视国情教育，使青年参与到理解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来。

立足民族根脉，强化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之于国家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民族凝聚力是青年主动投身家国建设的精神动力。目前青年的家国情怀教育，在文化自觉培育模式下，缺乏对民族认同感的重视，当下青年生活的物质条件改善，精神信仰却不够坚定。“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也是我们要始终思考的问题，保持民族自强、自立、自觉，才能坚定民族自信[7]，不仅要保持文化自觉的培养，也要重视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才能激励青年持续投身家国建设。

（三）以家风为依托，注重家庭教育

厚积家教家风，提倡言传身教。家庭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互为映照。家长应主动探寻家族记忆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言传身教，在家庭中树立崇高的家风典范，营造爱国爱家的浓厚氛围，让青年在优良家风的熏陶和培育下，逐渐成长为心怀家国、志在四方的新时代青年。

聚合家校力量，共创良好氛围。学校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场所，许多“两弹一星”亲历者正是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影响下做出了人生选择，家庭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生活支持，学校给予他们知识和文化教育。目前学校教育在传承家国情怀方面仍有不足，学校教授内容与其家国情怀认同需求存在偏差。因此，教育体系改革应当坚持理论认知教育和情感认同教育并重[8]。学校、家庭、社会要架起桥梁，聚合三方力量，共同为青年实践提供机会与路径。

（四）以情感为纽带，增强家国认同

健全理论认知，增进情感认同。青年投入家国情怀实践的前提是健全理论认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个人享乐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两弹一星”亲历者们都拥有着丰富的理论认知，深厚的知识积累让他们能够实现自身价值，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而坚定的情感认同又给予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在艰难的条件中坚持下来，最终参与并见证了这一伟大事业。

增强实践能力，投身家国建设。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促进国家发展的责任，在实践中实现人生理想。家国情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青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投身于家庭和国家的建设[9]。青年应该主动了解国情，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增强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个人理想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五、结语

“两弹一星”精神在“两弹一星”研制事业中铸就，在历史与时代的锻造中历久弥新，凝聚着民族力量，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实践，充分说明了青年的家国情怀是需要基于国家发展的大背景展开培育的。家国情怀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深度认识和践行家国情怀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民族的需要。

然而，在当下家国情怀的传承与宣传教育中，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一些挑战与困境。传播内容与形式的陈旧、青年学习与传承动力的不足、行动与实践意愿的欠缺，这些问题如同一道道屏障，阻碍着家国情怀在青年群体中的深入传播与有效内化。因此，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构建符合青年精神需求的家国情怀培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参考文献

[1] 杨玢，任聪 .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两弹一星”精神传承与践行的时代指向 [J]. 青海民族研究 ,2023,34(04):74-78.

[2] 詹姆斯·马汉尼，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 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 [M]. 秦传安，译 . 上海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3.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47-48.

[4]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 ,2018-09-11(01).

[5] 李蒙，陈昊宇 . 全面加强青年学生家国情怀培育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2):79-81. （下转 86 页）

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江苏妇联组织为例

张景平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返乡创业大学生日益成为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力量。群团组织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性、群众性、枢纽性优势，在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本文以江苏省妇联组织为例，深入剖析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现实逻辑、多维困境及系统性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群团组织通过赋能个体、营造生态、服务大局，形成多层次服务逻辑；但亦面临精准服务不足、平台协同不力、长效保障欠缺等困境，需要群团组织强化个体精准赋能、构建协同生态、优化制度环境，以期提升群团组织服务效能，激发返乡大学生创业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群团组织；返乡大学生；创业；服务效能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突出高校毕业生群体，持续推进就业创业促进、基层成长、青年见习等计划，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在“双创”推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下，大学生成为农村创业的主体之一。

当前，有关返乡大学生创业的论著或是围绕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进行探讨[1-3]，或是研究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内部个人困境及外部环境困境[4]，或是探索返乡大学生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5-7]，又或是探究返乡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优化[8]。但是鲜有从群团组织角度解读返乡大学生创业。妇联等群团组织是返乡大学生创业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构成主体。以妇联组织为例，探讨群团组织赋能返乡大学生创业，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优化乡村人才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逻辑机理

返乡大学生作为兼具知识储备、创新思维与乡土情怀的新生力量，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然而，其创业之路往往面临经验缺乏、资源匮乏、环境制约等多重挑战。妇联等群团组织作为党联系服务特定群体的桥梁纽带，具有组织网络广泛、贴近创业者群体需求、整合社会资源的天然优势，在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中肩负重要使命。

（一）政治定位奠定服务功能根基

一方面，群团组织要服务大局。在返乡青年工作领域中，群团组织积极传递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价值与政策导向，将返乡创业嵌入国家发展宏图，帮助返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乡土观，强化投身乡村建设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近年来，江苏各级妇联开展

（上接 85 页）

[6] 习近平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1.

[7] 陆玉林 .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

[8] 冯刚 , 张晓平 , 苏洁 . 中国共产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1.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2019-03-19(0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导辅协同育人项目“红色赋能，双课引领”导辅协同育人、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R408A052）；2025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新媒体视域下科学家精神的价值阐释与传播路径”（GJ20250449101）。

（作者：曹珊珊，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方舟，浙江工商大学本科生；通信作者黄凡，浙江工商大学教师）

导师进校园、女大学生看家乡、女企业家“三走进”等常态化活动，吸引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组织巾帼大宣讲 2.6 万场次，传播党的强农惠农富农好政策；开展新闻媒体环省行活动，讲解乡村振兴中巾帼新农人奋进故事，凝聚乡村创业女性。另一方面，群团组织要服务群众。针对返乡大学生创业需求，各地群团组织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将服务精准送达创业者。近年来，江苏省妇联充分利用 300 个省级女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基地，组织女大学生系列专场招聘、导师带徒就业见习等活动，探索了巾帼科创导师校园行、巾帼融创空间女大学生创业孵化营、巾帼红主播计划等创新实践项目，为 2.7 万名女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二）组织吸纳强化群体认同与归属

群团组织适应新时代要求，其结构体系和功能内涵在不断健全与优化，使其具备了吸纳、凝聚高质量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强大能力，成为返乡创业青年寻求身份认同、价值实现和情感归属的“引力场”，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组织认同感与归属感。群团组织的组织网络下沉与拓展，为吸纳返乡大学生提供了物理空间和组织载体。江苏各级妇联着力发现培养推荐基层女性优秀人才，注重挖掘女性人才，在巾帼龙头企业、巾帼家庭农场、巾帼农业专业合作社、巾帼电商服务站、巾帼科技示范基地等女性骨干群体中发现、培养和选拔女性能人，做好高校女毕业生等优秀女性的推荐工作。群团组织通过建立致富带头人联盟等平台，有意识地识别、吸纳和凝聚返乡创业中的佼佼者，将他们纳入组织体系，赋予荣誉或职责，不仅增强了这些精英个体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更通过他们的榜样力量，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带动更多优秀青年返乡。这种对高质量人才的吸纳，本身就是组织社会资本的一次重要扩容。江苏省妇联在女性创业就业相对集中的领域，引导成立省巾帼电商联盟、民宿女主人联盟、巾帼手工产业联盟三大联盟，助力返乡创业女性资源互补，共谋发展。

（三）社会动员赋能创业者提质发展

群团组织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组织网络，具备桥梁优势，可形成连接党政部门、市场要素、社会力量的资源网络，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流、资源流和机会流，构成了群团组织自身强大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群团组织能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市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围绕返乡创业项目形成合力。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协同，极大增强了群团组织为返乡青年赋能的有效性。例如，为了策应江苏省委、省政府“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行动，省妇联联动省级 50 多个厅局、单位、行业协会，在全省开展“万企联万村慧创融万家”活动，立足“三农”发展，促进结对帮扶和村企融建。对于返乡创业大学生而言，群团组织亦是其嵌入本地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通过参与群团组织的活动、项目、协会，返乡创业大学生得以建立信息桥，打破信息壁垒和融入障碍；便捷地接触到政策信息、贷款渠道、市场机会、技术支持等关键创业资源；建立基于共同规则和互惠预期的本地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在协同项目中学习和成长，弥补市场经验、管理知识、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创业胜任力与抗风险能力，增强创业信心与韧性。

二、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现实困境

（一）服务供给“精准性”不足

目前，群团组织的创业培训一定程度上出现内容同质化、理论化，与乡村实际产业需求、返乡大学生的具体创业项目痛点结合不紧；导师资源有限，匹配度不高，持续跟踪指导不足；政策信息传递碎片化、滞后性明显，个体难以高效获取和利用，如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人社部门的创业培训补贴政策、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政策之间，缺乏信息共享与联合执行机制，致使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脱节现象，返乡大学生难以同时享受多项政策扶持。江苏省妇联组织虽有“巾帼贷”等资金支持，但规模有限、门槛较高、申请流程复杂，难以满足多样化具体需求；技术、市场等关键资源对接渠道不稳定，差异化支持措施不够完善，影响服务成功率。由于返乡创业大学生普遍存在创业韧性不足，亟须创业失败后的心理疏导和再就业 / 再创业帮扶。虽然江苏省妇联成立了江苏省莫愁心理咨询公益联盟，但专门针对创业者的心理咨询业务板块缺乏。

（二）平台功能“协同性”不力

整体而言，群团组织作为枢纽型服务平台，在基层的力量相对薄弱，对分散的返乡创业者覆盖不全；已建立的创业联盟、协会等组织活跃度参差不齐，活动形式单一，难以持续吸引成员深度参与，凝聚力有待提升；线上平台信息更新慢、互动性不强、资源整合度低；线下孵化基地尚存在重硬件轻服务、重引进轻培育现象，专业化运营能力不足。而且群团组织间的服务平台缺乏有效整合与共享。此外，群团组织与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常态化协同机制不健全，信息壁垒、资源分割现象依然存在，“政企社”多方联动的服务合力尚未完全形成。

（三）长效服务“保障性”欠缺

江苏部分地区乡村产业基础薄弱、链条短、层次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和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配套支撑，难以承载高水平创业项目，限制了返乡大学生的施展空间，降低了创业成功率。涉及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分散于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存在交叉重叠或空白地带，群团组织在推动政策整合、协调部门行动方面能力有限，基层群团组织在政策执行上存在偏差或“最后一公里”梗阻，创业者获得感不强。群团组织的返乡创业服务往往采用项目制，依赖阶段性活动资金或专项资金，缺乏稳定、长效的经费保障和人员配备机制，导致服务难以持续深化；对服务效果的评估机制不健

全，难以科学衡量投入产出比和持续改进服务。

三、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的优化路径

（一）深化精准赋能，提升返乡大学生创业韧性

一方面，提供需求导向的精准培训与长期辅导。妇联等群团组织可建立返乡大学生创业能力与需求动态数据库；联合高校、专业机构开发模块化、阶梯式、实战化的培训课程体系，聚焦乡村特色产业、电商运营、财务管理、品牌打造、风险管理等核心技能；深化“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创业导师制，遴选匹配度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技术专家、投资人担任长期导师，推广“田间课堂”“靶向课堂”“云端课堂”等沉浸式学习模式，提供伴随式指导。另一方面，强化针对性的专项支持。妇联等群团组织可设立区域性返乡创业服务“窗口”或专员，提供线下咨询代办服务；发布针对返乡大学生的专项贷款金融产品，强化专项资金支持；将创业心理辅导纳入服务体系，提供压力疏解、债务协调再就业推荐等帮扶和韧性建设课程，降低返乡大学生创业失败成本，保护创业热情。

（二）强化协同联动，优化返乡大学生群体创业生态

一是强化基层群团组织建设，实现社群活动多样化。妇联等群团组织要支持返乡女大学生创业协会（联盟）等自组织的成立发展；设计资源对接会、项目路演、跨界交流等高频次、高质量、多样化的社群活动，增强成员归属感与互助氛围。

二是整合优化现有线上线下平台，升级平台功能与运营能力。打造集“信息发布、资源对接、项目孵化、在线学习、社群互动、数据监测”于一体的智慧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政策智能匹配推送、融资产品在线申请、技术需求精准对接、市场信息实时共享；提升线下众创空间、孵化基地的专业化运营水平，引进专业运营机构，提供法律、财税、知识产权、市场推广等深度服务。

三是构建“服务共同体”。一方面，在党委领导下，推动妇联、工会、共青团、科协等群团组织的服务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深化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媒体的战略合作，明确各方职责，形成政策、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要素顺畅流动的“服务共同体”。

（三）优化制度环境，夯实乡村发展根基

一是推动政策优化，提升落地实效。妇联等群团组织要担当“政策顾问”角色，发挥桥梁作用，积极调研、汇集、反映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的政策诉求，推动地方政府整合各部门政策资源，出台更具系统性、操作性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包”。利用群团组织贴近基层的优势，监测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情况，及时反馈问题，以完善政策。

二是发挥组织优势，助力乡村产业筑基升级。群团组织服务应紧密围绕当地乡村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进行规划，积极引导返乡创业项目融入地方产业集群。妇联组织可利用妇联资源发展乡村手工业、直播带货等特色产业，推动建立区域性农产品公用品牌和电商平台。

三是健全长效保障与评估机制。妇联等群团组织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建立科学的服务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重点考察创业企业存活率、发展能力、带动就业人数、对乡村贡献度等核心指标，依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服务策略和资源配置。

四、结语

群团组织服务返乡大学生创业，是连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宏图与青年人才个体价值实现的关键纽带。当前面临的困境，本质是服务精准性、协同性、长效性不足在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破解之道，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群团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赋能返乡创业大学生个体、构建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生态、助力优化制度产业环境。唯有如此，群团组织方能有效激发返乡大学生的创业潜能与活力，推动返乡大学生创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吴叶林，徐涵 . 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6):131-143.

[2] 鲍锐，王睿，蒋雪伟，等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涉农专业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实证研究 [J]. 江苏农业科学，2023(24):239-244.

[3] 费倩倩 .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提升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措施探讨 [J]. 农业经济，2024(01):130-131.

[4] 金秋实，邓超楠 . 乡村振兴视域中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时代困境与现实出路 [J]. 农业经济，2024(12):113-115.

[5] 冯筱娣，莫志超 . 大学生返乡创就业与乡村振兴耦合新路径——以广西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S1):133-135.

[6] 别远刚 .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与农村经济提升的互动关系研究 [J]. 农业经济，2023(11):130-131.

[7] 王卓，任雪琪，李宝庆 . 乡村产业振兴何以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06):117-125.

[8] 杨伟明，粟麟，李鑫 .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评估与优化策略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02):155-16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群团组织赋能返乡大学生创业的路径创新研究”（22SHB006）。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及培育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内部分高校为例

韩　栋　余川夏

摘要：本文基于对浙江省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探讨“躺平”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情况及培育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近七成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躺平”倾向；“躺平”程度与政治认知呈正相关，与政治态度、政治实践及总体政治认同呈显著负相关，反映出该群体“认知明确但态度消极、行为回避”的认同困境。进一步研究发现，可从社会结构性压力、防御性悲观心理与网络亚文化影响三个维度剖析困境成因。由此，本文尝试从制度减压、教育赋能和人格塑造三个方面提出系统化的政治认同培育机制，以促进政治认知向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演变，使“躺平”青年转变成奋斗青年。

关键词：“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结构性压力；实证研究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青年群体的重要性。然而，“躺平”之风逐渐兴起，“放弃”“努力也得不到”等成为青年大学生的“口头禅”。“躺平”原意是指躺下使身体变平整，逐渐演变成形容青年“不作为”“不反抗”“不努力”。本文将“躺平”青年概括为那些态度上“低欲望”、缺乏上进心，行为上不作为、不“内卷”、缺乏活力的青年。“躺平”青年不仅影响其个体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人才战略和国家政治认同构建。

政治认同是个人对现有政治体系、制度理念及治理效能所产生的认知认可、情感归属与行为支持，是构成现代国家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1]。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高素质群体，其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国家政治文化传承、社会长期稳定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2]。

已有文献从多个维度剖析“躺平”现象与政治认同存在密切关联，但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剖析两者关系，也缺少本土化理论建构。此外，“躺平”群体的政治认同特征缺乏深度刻画，鲜有从认知、情感、行为断裂的角度开展实证研究。从现实层面看，“躺平”心态的蔓延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形成了多方面的冲击，部分大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显著降低，表现出政治冷漠与疏离；在价值观层面，也存在意义感缺失、奋斗精神弱化等倾向。因此，亟须构建一个内容充分、结合本土、可推广的解释模型。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认知—态度—行为”断裂视角，构建一个“躺平”青年的政治认同困境解释模型，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引导“躺平”大学生重塑价值信念，培育政治认同感，助力其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

为深入剖析“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困境成因，基于上述研究问题，确立了下列变量。

（一）变量确定

结果变量：本研究以大学生政治认同为结果变量，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实践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解释变量：本研究以大学生“躺平”程度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政治认同产生的影响。

控制变量：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躺平”程度和政治认同情况的关系，选择学生政治面貌、职业规划为控制变量。

（二）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变量，拟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大学生越“躺平”，其政治认同感越低。

假设 2：大学生越“躺平”，其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实践水平越低。

（三）研究设计

2024 年 10 月以来，在已有文献资料基础上，设计了问卷及访谈提纲，以半结构式访谈形式，对浙江省内部分高校教师、学生开展访谈，样本主要集中在杭州，包括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高校，专业覆盖了人文社科、理工科、农科等。2024 年 11—12 月，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在浙江省内各大高校发放问卷，包括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丽水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2025 年 3 月底，开始整理文件数据，借助 SPSS 24.0 软件开展数据分析。

二、“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与困境分析

（一）问卷调研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浙江省内高校 532 位同学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01 份，其中男生 243 人，女生 258 人。年龄层次方面，18~22 周岁 150 人，占比 29.9%；23~26 周岁 200 人，占比 39.9%；26 周岁以上 151 人，占比 30.1%。从学业状况来看，在读本科生 150 人，占比 29.9%；在读研究生 200 人，占比 39.9%；在读博士 50 人，占比 10%；已就业 101 人，占比 20.2%。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 82 人，占比 16.4%；共青团员 245 人，占比 48.9%；群众 136 人，占比 27.1%；其他 38 人，占比 7.6%。350 人的“躺平”程度计分高于平均值，占比 69.9%，近七成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躺平”程度较高；151 人的“躺平”程度计分低于平均值，占比 30.1%，仅三成大学生在校较为努力。295 人政治认同的倾向高于平均值，占比约 58.88%，其余 206 人政治认同感较低。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后，对问卷数据开展信效度检验（见表 1）。

表 1　信度与效度检验表

检验类型	检验指标	检验结果	项数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α	0.925	41
KMO 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90	41
Bartlett 检验	近似卡方	17217.707	41
	df	820.000	41
	Sig.	0.000	41

由表 1 可知，本研究所用问卷共包含 41 个题项，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5，该值大于 0.9，符合问卷可信度常规要求。借助因子分析检验问卷中各变量有效性，KMO（Kaiser-Meyer-Olkin）测度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发现，KMO 值为 0.99（高于 0.8），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Sig. ＜ 0.001，表明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效度可以得到认可。

（三）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2 可知，“躺平”程度对大学生社会参与影响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902，p ＜ 0.000），表明“躺平”程度越高，政治认知越明确、越积极；“躺平”程度与政治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0896，p ＜ 0.000），这意味着“躺平”程度越高，政治态度越消极，情感归属感越低；躺平程度与政治实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905，p ＜ 0.000），表明躺平程度越高，学生政治实践参与意愿越低，缺乏行动力。从政治认同整体而言，大学生“躺平”程度与政治认同总分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805，p ＜ 0.000），即“躺平”程度越高，政治认同感越低。

表 2　大学生“躺平”程度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实践、政治认同的相关性分析

维度	相关系数（Spearman’s ρ）	Sig.（双侧）	样本量
政治认知	0.902**	0.000	501
政治态度	–0.896**	0.000	501
政治实践	–0.905**	0.000	501
政治认同总分	–0.805**	0.000	501

注：**p ＜ 0.01（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假设 1 成立：大学生“躺平”程度与政治认同呈负相关，即大学生“躺平”程度越高，其政治认同感越低。假设 2 不成立：大学生“躺平”程度与政治认知存在线性正相关，与政治态度、政治实践存在线性负相关，即“躺平”大学生往往有明确的政治认知，但政治态度消极，政治实践参与意愿也较低。

三、“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的生成机制探析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躺平”大学生往往有明确的政治认知，但政治态度消极，政治实践参与意愿也较低，导致整体政治认同程度较低。为何会出现这种困境？本文结合访谈情况，构建了“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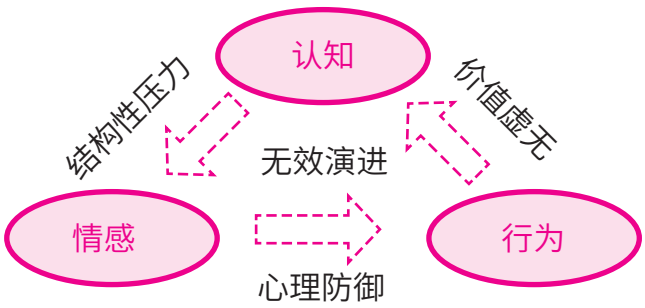


图 1 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的生成机制图

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思政教育通过师资强化、课程创新和技术赋能实现了跨学段

有效衔接[3]，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政治认知水平。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思政教育方式更加多样化，加之家庭环境、社会氛围及传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普遍对国家政治制度了解更加深入透彻。因此，不论大学生是否选择“躺平”，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基本认知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然而，结构性压力导致政治认知无法向政治情感层面有效演进。在面对高房价、高竞争和低社会流动性等结构性压力，部分大学生采取“躺平”这一标签作为心理缓冲和行为回应，更将这种消极态度延伸至政治领域[4]。结构性压力导致他们无暇顾及政治事件，因而对政治参与持“不自愿”甚至“回避”态度，在态度和情感上呈现出显著的疏离特征，进而形成一种“认知不差、态度冷漠”的局面。

政治认知不仅无法有效向政治情感转变，而且政治情感在向政治行为转变过程中，由于大学生的“心理防御”，也严重制约其政治参与意愿和实际行为。大学生普遍具备较强的自我意识与敏感的自尊心，他们往往对传统思政教育中“灌输式”和“命令式”的教学方法表现出心理排斥[5]，而在当前“再努力也难以改变结局”的情感驱动下，他们逐渐形成“参与无法影响结果”的消极判断。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使他们从不关心校园中的小事，逐渐演变成不关心国家、社会大事，陷入“低参与—低成效—更不参与”的负面循环。

此外，政治行为还受到了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失去了了解我国政治制度的兴趣。网络亚文化所具备的独特“魅力”以及网络上的“意见领袖”通过煽情化、戏谑化甚至对抗性的话语策略，反而获得了部分大学生的“青睐”，弱化了他们的主流价值观、政治信任和社会责任感，进而使他们丧失了对政治制度的关心与兴趣。

综上所述，“躺平”不仅是个体现象，更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反映。而“躺平”大学生政治认知度高、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低的困境悖论，也揭示出当前思政教育不能仅靠学校、教师，更需在制度、教育、心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回应，重新塑造青年对“奋斗—回报”关系的合理预期，筑牢其政治认同的现实基础。

四、“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培育机制构建

针对“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困境，本文尝试构建系统化的培育机制，从制度环境、教育模式和人格塑造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引导其走出消极状态，形成积极理性的政治认同（见图 2）。

首先，通过制度减压，构建“反内卷”的社会支持体系。当前，结构性压力、“内卷化”竞争是导致部分大学生选择“躺平”的重要外因。因此，想要使“躺平”大学生走出政治认同困境，需要从制度层面减轻结构性压力，提供替代“躺平”的可行路径。从政策层面而言，政府应强化就业政策，健全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遏制就业歧视和过度学历竞争，破除“996”工作制等隐性加班机制，保障青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6]。从教育层面而言，应推动高校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弱化绩点对学生发展的约束，拓宽多维成才通道，帮助学生实现多样发展[7]。从社会福利层面而言，应为青年提供基础性保障，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供兜底保障。通过这些制度性减压手段，为大学生提供可预期的未来发展路径，从而增强其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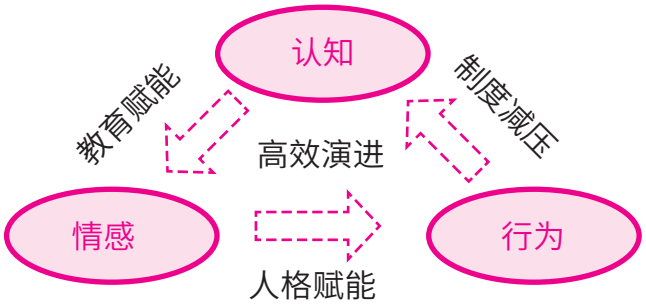


图 2 “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培育机制图

其次，通过教育赋能，推行情感化、交互化的思政教育模式。传统的灌输式思政教育难以有效回应“躺平”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亟须向情感化、叙事化转型。思政教育可以充分借助 VR 等技术手段再现历史场景和改革历程，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8]，在感受过程中培育大学生爱国精神。此外，教师应转变角色，从“理论传授者”变为“情感引导者”，关注学生的现实困惑，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实践等体验方式，将宏大政治叙事与个人生活体验相结合，化解对政治参与的疏离感。

最后，通过人格赋能，培育积极理性的自强型人格。“躺平”本质上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消极心理防御机制，培育“躺平”大学生政治认同感的根本仍在于重塑大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对于高校而言，可以加强对“防御性悲观”的识别和干预，通过认知团辅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自我评价体系和抗逆力。在日常交流和课程建设中，引入积极成功案例，引导学生建立“努力—成效”之间的理性联结，避免陷入“习得性无助”[9]。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树立一批榜样大学生，发挥朋辈引领作用，通过结对帮扶，让更多“躺平”大学生尝到“成功”的滋味，进而获得成就感，增强其政治认同的决心和毅力，推动其由“被动躺平”向“主动作为”转变。

总之，“躺平”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困境，是社会快速转型期个体应对结构性压力的一种表征，其化解是一项涉及制度设计、教育创新和心理建设的系统工程。唯有通过制度减压切断消极情绪的源（下转 92 页）

广州特色社区医养结合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构建研究

李毅彩　李叶红 *

摘要：广州日益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终末期患者照护需求激增的挑战。当前服务模式包括医院、社区、医养结合及居家四种类型，但存在孝道观念阻碍、宣传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医保支付不完善等关键问题。社区是实现安宁疗护服务的主要依托点，本文提出构建广州特色社区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四大对策：资源整合，建立“三甲—社区—居家”协同网络，推动医养机构嵌入社区服务；制度优化，落实服务收费价格，优化医保；强化多专业人才培养，定向培养医护与社工，完善职业激励机制，减少人才流失；宣传创新，破除“放弃治疗即不孝”的认知误区。该模式通过多主体协作、政策保障与公众教育，提升临终患者生命质量，减轻家属照护负担，为普惠养老提供可复制的广州经验。

关键词：广州特色；社区医养结合；安宁疗护；智慧医疗

一、普惠养老视域下构建广州特色社区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安宁疗护需求极大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期，广州市海珠区、荔湾区等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比例均已超过 30%。老年人因慢性疾病、生理功能退化，平均约 8 年会遭受疾病困扰。高龄患者多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靠他人照料。患者身心受折磨，家属也受影响，他们渴望优质的安宁疗护服务，注重患者临终期的生命质量，而非仅关注末期治疗。

（上接 91 页）

头，借助情感化教育重塑政治认同的感性基础，并通过人格赋能提升个体的主动性和抗逆力，方能引导“躺平”大学生走出政治认同困境，使“躺平”青年向奋斗青年转变。

参考文献

[1] 胡建 . 政治认同的理论解读：内涵、结构及功能 [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12):108-113.

[2] 方旭光 . 政治认同——政治实践的范畴 [J]. 兰州学刊 ,2006(09):98-100.

[3] 朱光辉 . 新时代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的内涵、挑战与对策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36(04):89-93.

[4] 张爱军 . 内卷、躺平、焦虑：政治权利的自由逻辑进退及其回塑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02):40-47.

[5] 洪明，范兆雄 . 大学生自尊、自我妨碍、防御性悲观和成功恐惧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29(03):230-235.

[6] 钱叶芳，徐顺铁 .“996 类工作制”与休息权立法——资本与法律的博弈 [J]. 浙江学刊 ,2019(04):56-67.

[7] 赵婷婷，胡艳婷 . 能为与应为：从本科生成绩单看绩点制的功能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03):22-30.

[8] 崔建西，白显良 . 智能思政：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10):83-88.

[9] 杨月荣，郝文斌 .“00 后”大学生受网络亚文化影响情况分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04):135-13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重点课题“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与培育机制研究”（21224137）。

（作者：韩栋，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余川夏，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本科生）

（二）安宁疗护的概念及其实质

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照料与人文关怀的服务，可控制痛苦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其护理理念是靠专业团队，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生理、心理方面的帮助，减少疼痛并关注患者的内心与尊严。它以“无效医疗”为前提、“全人照护”为内容，契合善终理念。

二、安宁疗护服务的国内外研究

（一）安宁疗护的起源及国内外发展

现代临终关怀始于1967年英国桑德斯博士（Dame Cicely Saunders）创建的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St. Christopher Hospice），强调为濒死患者提供身心精神全方位照护，并抚慰家属。安宁疗护服务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发展，均以提升患者终末期生活质量、维护尊严为核心，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1988年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安宁疗护的兴起。我国目前已开展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覆盖185个市（区），形成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多主体供给。广州作为国家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已构建“全生命周期照护体系”。2024年实施《广州市安宁疗护服务四类规范》，首次明确居家服务标准，要求社区医护每周至少上门一次。目前11个区设多个试点单位。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动二级医院开展“舒缓医疗”。

（二）国外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研究

国外学者聚焦安宁疗护概念、制约因素、实证与路径，研究比较成熟。（1）概念界定，从生理照护到全人关怀。Daniel Hui等（2019）提出安宁疗护的姑息性本质是通过疼痛管理提升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1]。（2）制约因素，Nicholas Christakis（2000）指出个人意愿与市场机制是主要限制[2]。（3）实证研究，Timothy Quill(2020）教授通过混合研究方法，系统记录不同患者群体的服务过程[3]。（4）实践路径，John Ellershaw（2011）提出服务质量实践的核心评估指标[4]。

（三）国内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研究

国内研究侧重于试点城市的居民认知调查、服务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及实践案例分析等。（1）重点区域发展研究。以上海为标杆，赵渊宇等（2021）分析上海市居民的安宁疗护认知现状[5]，吴玉苗等（2022）分析上海的“政府主导、社区－综合医院－社会机构联动”安宁疗护服务模式[6]。其他试点区域的发展研究逐渐增多，如宫芳芳等（2021）分析“深圳罗湖模式”，从服务体系、服务内容、工作机制、制度保障、队伍建设五个方面提出建议[7]。（2）服务模式创新。张秀华等（2022）进一步构建“医院－社区－居家”三级联动体系，推动资源下沉[8]。孙若楠（2021）重构“多方位、多元融合、多学科协作”的安宁疗护模式[9]。（3）专业团队建设、角色困境与心理支持。高煜辰等（2022）基于上海案例，揭示医生、护士、社工的协作困境[10]；左倩倩等（2022）聚焦护士的替代性哀伤问题，呼吁加强死亡教育以降低焦虑[11]。（4）实践案例分析。孙玉雪等（2022）论述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安宁疗护的实施现况、安宁疗护内容[12]等。

三、广州安宁疗护服务的社会认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认知整体薄弱，群体分化明显

通过对广州市区及近郊居民及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者等进行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的调研数据来看，广州民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度整体偏低，且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1）认知分层：26%的民众从未听说，40%的民众仅模糊知晓，仅2.3%的民众清晰理解其内涵；社区老人知晓率不足6.11%。（2）群体认知差异明显：年龄越大，越需要关注安宁疗护，但这个群体认知度很低且对此持排斥态度；学历和收入越高的人群及家庭，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和接受度更高。体验过安宁疗护的患者及其家属对安宁疗护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高达76%。（3）认知误区：不少居民将安宁疗护理解为“放弃治疗”，传统孝道观念影响显著。（4）信息渠道：主要通过网络新闻宣传（34.3%）、电视台或电台（21.3%）、医务人员的宣传（11%）、图书馆报刊（19.3%）等获取相关信息。（5）费用分担：超过60%的居民认为费用应由多方综合承担。

（二）广州安宁疗护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1. 传统观念与认知误区阻碍接受

“孝道误解”和“救治优先”等观念根深蒂固：广州有80%的市民认为安宁疗护服务对象是“不能治愈的重症患者”，但多数子女因“不愿被视为不孝”，坚持对终末期父母进行创伤性治疗；家属隐瞒病情的情况普遍存在，导致患者丧失选择安宁疗护的机会。同时，民众对服务存在片面认知，低于10%的市民认为安宁疗护需“身体关怀”，只有12.70%的市民关注“心理关怀”，严重忽略了患者需要亲朋好友心理支持的需求。

2. 宣传推广力度严重不足

广州市作为第三批安宁疗护服务试点城市，政府与机构对安宁疗护的宣传缺乏系统性。超半数民众不知晓相关服务，甚至部分医务人员也未接触过安宁疗护知识；广州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安宁疗护的理论研究较少，进一步制约了理念普及。传统的“死亡禁忌”观念加剧了宣传困境，曾出现路人拒绝领取安宁疗护宣传手册的情况，民众普遍存在“避谈死亡”的心理。

3. 服务资源供给失衡且质量待提升

一方面，服务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上海246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占比 94.25%[13]。广州截至 2024 年底只有 13 个安宁疗护试点单位，一半在社区医院。且社区机构如海珠区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医保结算标准低于床位成本”的亏损问题，人文关怀服务依赖志愿者，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专业人才短缺，如上海仅有 27.54% 的医务工作者参加过安宁疗护专业培训。广州同样存在安宁疗护医护人员面临心理压力、职业晋升难、收入低致流失等问题；医务社工岗位缺乏职业保障，无法满足“全人照护”需求。

4. 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

医保支付是制约安宁疗护服务开展的核心瓶颈。以往价格体系不健全，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服务缺乏收费标准，制约服务规范化发展。广东省医保局 2025 年 5 月拟新增“安宁疗护”项目，全省拟定最高限价 260 元 / 日，涵盖病情评估、心理疏导、疼痛管理、临终关怀等十余项服务。该标准不与住院诊查费、分级护理费重复收取。但若无法纳入医保报销，高昂的自费费用也会让普通民众无法承受。

四、广州现有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广州现有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分析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仍以医院为核心，社区与居家服务在政策推动下逐步发展，但整体占比相对较低，尚未形成“医院－社区－居家”协同互补的均衡格局。我国三批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覆盖 185 个市区，试点机构中医院占比超 60%，是当前服务供给的主要载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院占比约 30%，居家依赖社区延伸服务，不足 10%，且多集中于上海等试点成熟城市。

1. 医院模式：专业度高但覆盖有限

以三甲医院为核心，提供住院照护与多学科协作，如广一院设病区建立联动机制，上海部分医院设小组处理症状。优点是医资集中、团队全，能控急性症状适配复杂病情；缺点是床位少、周期长，成本高且集中在城区，偏远地区可及性差。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模式：便捷性强但资源薄弱

以社区为载体，结合居家与机构服务，如上海超七成社区开展居家服务，广州红山街实施“四元联动”。优点是贴近居民、能满足“居家离世”需求，成本低、覆盖广；缺点是资源与专业能力不足，部分社区面临亏损、缺人才的困境，服务质量分化。

3. 医养结合机构模式：整合性好但认知度低

依托养老机构融合医养服务，如广州老人院融合生命教育，上海部分养老机构设安宁疗护病房。优点是实现“养老－医疗－临终关怀”衔接，适配失能老人，团队全且有人文服务；缺点是知晓率低，服务集中于公办机构，民办机构难以参与。

4. 居家模式：个性化强但保障不足

以家庭为核心，医护上门服务，上海、广州社区均有提供，家属承担基础照料责任。优点是符合“在家离世”意愿，服务灵活，减少家庭压力；缺点是对家属能力要求高，医疗支持有限，无 24 小时应急保障。

（二）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

1. 个体特征因素：年龄、学历、健康与收入决定认知水平与接受度。高龄、高学历、健康水平低或患慢性病者更易认可；高收入家庭接受度高，超六成市民视费用为首要考量。

2. 社会文化因素：传统生死观与孝道观导致家属对放弃治疗有抵触心理，家属怕担“不孝”名；多数老人缺乏生死观教育，加剧其精神焦虑。

3. 制度与政策因素：政策知晓率低、保障不足，依赖试点；医保支付与报销范围有限，高需求与低报销的矛盾突出，经济条件不足成为低收入群体的主要障碍。

五、构建广州特色社区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安宁疗护是一套系统的社会服务，本研究整合借鉴黄埔区红山社区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以病人为中心，以社区为主导，组建多学科协作团队，整合街道居委、三级医院等多方资源，通过提供症状控制、舒适照护、人文关怀三方面的安宁疗护服务，建立三甲医院－社区－养老－居家“四元联动”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同时从医疗、护理、人文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推动实现服务标准化、操作规范化和管理闭环化。

（一）深化资源整合，构建协同网络

1. 医社联动：以“三甲－二级－社区”为基础，参考黄埔红山街经验，社区承接轻症患者居家照护，复杂病例转诊三甲医院控症后转回；三甲医院专家定期到社区开展培训，提升社区处置能力。

2. 医养融合：社区与养老机构签约，嵌入安宁疗护。设立社区咨询窗口，提供评估、疼痛管理、医护上门监测等服务，实现“养老、医疗和临终关怀”无缝衔接，覆盖独居老人。

（二）完善制度保障，破解支付难题

1. 优化医保：严格执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2025 年颁布的“安宁疗护”服务单独定价制度，将模糊公益转变为可量化、可操作的医疗服务；参考“支付延至 4 个月”，为居家患者设阶梯报销制度。

2. 设立市财政专项补贴：补贴社区的设备采购与人文服务成本，强化安宁疗护专业团队人员培训，支持志愿、社工机构开展工作，缓解人文服务难持续问题。

（三）加强人才建设，打造专业团队

1. 培养体系：联合医校开设定向课程，将毕业生

分配到社区；依托护理学会基地培训医护人员；与高校合作设立社工岗，明确编制薪资，破解社工短缺难题。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和多学科团队建设，不断提升安宁疗护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

2. 激励机制：为服务人员建立工作绩效考核机制，依据人员的服务态度、患者满意度为他们提升薪酬水平，减少人才流失，提升他们的职业荣誉感。

（四）创新宣传，提升认知

1. 社区科普：街道联合社区积极举办“生命教育”活动，用情景剧、家属分享等方式打破传统的认知误区；志愿者为老人进行一对一讲解。助力患者实现“生命心愿清单”，为患者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和照护技能培训等。在深圳，试点安宁疗护病房后，患者家属的抑郁、焦虑发生率下降了 35%，实现“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的目标。

2. 媒体宣传：政府、街道办联合媒体开设专栏，报道沙园、红山街等案例；例如越秀区肺癌患者陈伯通过安宁疗护实现“无憾离世”的案例被广泛报道，凸显服务对生命尊严的保障价值；积极通过官微推广指南、科普视频，社群答疑等方式，增强生命教育。

（五）社区互联网 + 智慧医疗云平台的构建推动安宁疗护的便捷实现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便捷预约与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 + ”搭建智慧云平台系统，患者可通过手机端预约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安宁疗护的可及性。（2）线上科普教育，线上开展宣传，在“社区直播间”，专家科普膳食、疼痛管理等知识、照护要点，助力公众理解安宁疗护。（3）远程医疗指导与监测，借助远程技术支持居家服务，如针对各种疾病设立专项服务并远程指导；使用智慧守护仪 24 小时监测患者数据，实时反馈以优化诊疗，强化医疗支持。（4）建立医患及家属沟通渠道，将患者健康报告与告警信息及时告知家属，增强家属的参与感与信任度，保障“无陪护”模式下服务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HUI D,BRUERA E.Palliative ca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and standards[J].Current Oncology Reports,2019,21(11):92.

[2]CHRISTAKIS N A.Factors limiting the provision of hospice care:A 150,000-case follow-up study[J].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0,342(12):889-896.

[3]QUILL T E,QUINN H A.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non-cancer diseases:a population-based matched cohort study[J].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20,370:2528.

[4]ELLERSHAW J.Developing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hospice care quality assessment[J].Palliative Medicine,2011,25(02):189-197.

[5] 赵渊宇，王晨怡，孟恺，等. 上海市市民安宁疗护认知现状调查及对策探讨 [J]. 广东药科大学学报 ,2021,37(06):138-144.

[6] 吴玉苗，李水静，杨超，等. 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提供现况调查分析 [J]. 上海医药 ,2022,43(08):11-13,18.

[7] 宫芳芳，孙喜琢 . 安宁疗护发展的“罗湖模式”现状与展望 [J]. 现代医院管理 , 2021,19(04): 9-12.

[8] 张秀华，张翠红，李怡玮，等. 晚期肿瘤患者三级联动安宁疗护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J]. 中华护理杂志 ,2022,57(14):1676-1682.

[9] 孙若楠 . 中国老年人安宁疗护模式的比较与重构——基于试点城市（区）研究 [J].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19(04):67-72.

[10] 高煜辰，郭晴，马贝戈，等. 上海社区医院安宁疗护团队的工作困境质性研究 [J]. 医学与哲学 ,2022,43(04):26-30.

[11] 左倩倩，曾文捷，廖敏怡，等 .199 名安宁疗护护士职业悲伤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护理学报 ,2022,29(04):46-52.

[12] 孙玉雪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安宁疗护研究现状 [J].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2022,15(03): 421-424.

[13] 彭玥 . 从生命尽头到关怀起点 [EB/OL].(2025-12-25)[2026-02-28].https://mzj.sh.gov.cn/lnb-xw/20251225/4f67bf894cdd44089b44e8f2156322c3.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校级科研课题“普惠养老视域下构建广州特色社区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研究”（2024RW11）；2023 年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普惠养老视域下构建广州特色社区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研究”（B2023269）；2021 年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校级科研课题“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社区老人智慧医疗云服务平台的设计研究”（2021RW01）。

（作者：李毅彩，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李叶红，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研究

王芃举　康　晶 *

摘要：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大学生群体的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与成人依恋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大五人格问卷（简版）评估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严谨性和开放性人格维度，MMCS 多维度—多归因量表测量能力、努力、情境（背景）和运气归因倾向，以及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评估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通过对全国 269 名大学生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揭示了个体将事件结果归因于外部情境或背景因素（即背景归因）在特定人格特质与依恋焦虑关系中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表明，背景归因在神经质、外倾性和宜人性人格特质对依恋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背景归因在严谨性人格特质与依恋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人格特质；归因方式；成人依恋；中介作用

大学生人际适应困难凸显其心理健康挑战。成人依恋水平作为关键影响因素，与个体稳定的人格特质及对事件的归因方式密切相关[1]。为深入理解这些核心心理变量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群体，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人格特质（五大维度）、归因方式（内 / 外控）与成人依恋（回避 / 焦虑）的关系[2]，并重点检验归因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干预提供依据。

人格特质是构成人格的基础元素，也是评价人格的基本单位。人格特质是指在主动构成人格的各个元素中，能主动引发和引导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并且使得个体在面对不同的心理刺激时都能主动做出相同行为反应的心理结构。

归因方式亦可以称作归因风格，指个体在过去的实际经历以及目前期望的基础之上，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事件或者行为发生的原因侧重于用一种近似或者惯常的形式采取推理的过程。

成人的不同性别和依恋在其行为心理模式中确实应该同时存在两种基本的心理维度，即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得分高的个体，倾向于担忧伴侣是否可及和回应，害怕被抛弃，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过度渴求和不安。而依恋回避得分高的个体，则倾向于抑制亲密感，不主动表达出自己的依恋和感情，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距离。得分低的个体则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感到安全，能够舒适地依赖他人也乐于被他人依赖。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样本选择为全国大学生。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网上发布，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问卷 300 份，其中有 31 份问卷经分析不可使用，最后得到 26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9.7%。样本量 n=269。

（二）研究工具

1. 大五人格问卷（简版）

该问卷含有 60 个问题，经检验有很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64（宜人性）~0.814（神经质），平均为 0.793；间隔 10 周的重测系数为 0.672（宜人性）~0.811（开放性），平均为 0.742。与其他大五人格问卷具有中度以上相关。该问卷共包含 5 个维度，即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严谨性，采用 5 级评分方式，1~5 依次表示为“十分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中立”“比较赞同”“十分赞同”。

2.MMCS 多维度—多归因量表

该量表由 Lefcourt、Von Baeyer、Ware 和 Cox 等在 1979 年编制，本研究采用第 5 次修订的版本。该量表有 48 个题目，其中 24 个题目是关于学业成就的，24 个题目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每部分又包括成功和失败各 12 个题目。根据归因的内外性、稳定性、可控性将量表分为 4 个方面，即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其 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 0.570、0.692、0.701、0.633，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方式，1~5 依次表示为“非常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不确定”“比较赞同”“非常赞同”。外控型得分减去内控型得分表示总分，分数越高表明相应的外控型表现越明显。

3.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这个标准的成人依恋量表由 Brennan 等编制，采用 7 点评分法，共有 36

个题目。其由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分量表组成，各包含 18 个题目，依恋回避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1，Cronbach，sα 系数为 0.82；依恋焦虑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2，Cronbach，sα 系数为 0.77。

（三）数据处理和分析

为了使得出的结论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本文使用了 SPSS 22.0 和 SPSSAU 软件，将所得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并重点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二、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人格特质状况分析

大学生人格特质状况总体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学生人格特质状况总体分析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神经质	269	17	53	38.506	5.132
外倾性	269	25	51	41.498	4.299
开放性	269	28	51	35.818	2.927
宜人性	269	23	51	32.086	5.223
严谨性	269	26	55	41.688	4.407

由表 1 可知，以平均值为准样本的严谨性维度得分（41.688）最高，外倾性维度得分（41.498）次之，神经质维度得分（38.506）随后，接着是开放性维度得分（35.818），而宜人性维度得分（32.086）最低。

（二）大学生归因方式状况分析

大学生归因方式状况总体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学生归因方式状况总体分析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能力	269	3	24	16.011	4.501	16
努力	269	0	24	15.952	4.473	16
背景	269	2	24	16.208	4.368	16
运气	269	3	24	15.967	4.672	16

由表 2 可知，以平均数为准样本的背景维度得分（16.208）最高，能力维度得分（16.011）次之，运气维度得分（15.967）随后，努力维度得分（15.952）排在最后。4 个维度的中位数都是 16，其中归因外部因素有背景维度和运气维度，归因内部因素有能力维度和努力维度。总的来说，归因外部得分高于归因内部得分。

（三）大学生成人依恋状况分析

大学生成人依恋状况总体分析及依恋类型分布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大学生成人依恋状况总体分析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回避	269	1.944	4.778	3.977	0.324	4
焦虑	269	2.278	6.667	5.033	0.907	5.056

由表 3 可知，以平均值为准样本的回避维度得分（3.977）明显低于样本的焦虑维度得分（5.033），这说明样本在亲密关系中回避现象要少于焦虑现象。

表 4　依恋类型分布

依恋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安全	1	0.37%
恐惧	204	75.84%
专注	53	19.70%
冷漠	11	4.09%

由表 4 可知，样本的依恋类型中恐惧型占比（75.84%）最高，专注型占比（19.70%）次之，冷漠型占比（4.09%）随后，安全型占比（0.37%）最低。

（四）大学生人格特质、归因方式、成人依恋的关系

1. 大学生人格特质和归因方式的各维度相关分析（见表 5）

表 5　大学生人格特质和归因方式的各维度相关分析

维度	神经质	外倾性	开放性	宜人性	严谨性
能力	0.626**	0.590**	−0.256	−0.733**	0.529**
努力	0.505**	0.705**	−0.208	−0.680**	0.639**
背景	0.606**	0.640**	−0.232	−0.783**	0.514**
运气	0.640**	0.633**	−0.145	−0.763**	0.615**

注：* $p < 0.05$，** $p < 0.01$。

由表 5 可知，神经质、外倾性、严谨性与能力、努力、背景、运气呈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能力、努力、背景、运气呈显著负相关；开放性与能力、努力、背景、运气无相关性。

2. 大学生人格特质和成人依恋的各维度相关分析（见表 6）

表 6　大学生人格特质和成人依恋的各维度相关分析

维度	回避	焦虑
神经质	0.171**	0.501**
外倾性	−0.065	0.562**
开放性	−0.008	−0.111
宜人性	−0.214**	−0.661**
严谨性	0.009	0.447**

注：* $p < 0.05$，** $p < 0.01$。

由表 6 可知，呈显著正相关的有回避与神经质，焦虑与神经质、外倾性、严谨性；呈显著负相关的有回避与宜人性，焦虑与宜人性；无相关性的有回避与外倾性、开放性、严谨性，焦虑与开放性。

3. 大学生归因方式和成人依恋的各维度相关分析（见表 7）

表 7　大学生归因方式和成人依恋的各维度相关分析

维度	回避	焦虑
能力	0.112	0.696**
努力	0.052	0.699**
背景	0.134*	0.683**
运气	0.099	0.680**

注：* $p < 0.05$，** $p < 0.01$。

由表 7 可知，呈显著正相关的有回避与背景，焦虑与能力、努力、背景、运气；无相关性的有回避与能力、努力、运气。

4. 大学生归因方式在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 5、表 6、表 7 分析可知，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归因方式显著相关，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显著相关，归因方式与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显著相关，显示三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这里我们假设三者之间，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为因变量，人格特质和归因方式其中之一为中介变量发挥中介效应，将数据进行中介作用检测。

中介效应分析共涉及以下 6 个模型：

焦虑 =2.103+0.039× 神经质 +0.066× 外倾性 -0.015× 开放性 -0.062× 宜人性 +0.029× 严谨性

能力 =13.114+0.087× 神经质 +0.155× 外倾性 -0.143× 开放性 -0.351× 宜人性 +0.228× 严谨性

努力 =4.741+0.177× 神经质 +0.167× 外倾性 -0.067× 开放性 -0.290× 宜人性 +0.220× 严谨性

背景 =-2.106+0.162× 神经质 +0.186× 外倾性 +0.008× 开放性 -0.239× 宜人性 +0.281× 严谨性

运气 =5.586+0.165× 神经质 +0.153× 外倾性 -0.104× 开放性 -0.317× 宜人性 +0.278× 严谨性

焦虑 =1.620+0.025× 神经质 +0.051× 外倾性 -0.008× 开放性 -0.035× 宜人性 +0.006× 严谨性 +0.028× 能力 +0.027× 努力 +0.029× 背景 +0.008× 运气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可知，神经质人格、外倾性人格、宜人性人格通过背景归因部分影响焦虑水平；严谨性人格通过背景归因间接影响焦虑水平。

表 8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	c 总效应	a	b	c′ 直接效应	检验结论
神经质 => 能力 => 焦虑	0.039**	0.087	0.028	0.025**	中介作用不显著
神经质 => 努力 => 焦虑	0.039**	0.177**	0.027	0.025**	中介作用不显著
神经质 => 背景 => 焦虑	0.039**	0.162**	0.029*	0.025**	部分中介
神经质 => 运气 => 焦虑	0.039**	0.165**	0.008	0.025**	中介作用不显著
外倾性 => 能力 => 焦虑	0.066**	0.155*	0.028	0.051**	中介作用不显著
外倾性 => 努力 => 焦虑	0.066**	0.167**	0.027	0.051**	中介作用不显著
外倾性 => 背景 => 焦虑	0.066**	0.186**	0.029*	0.051**	部分中介
外倾性 => 运气 => 焦虑	0.066**	0.153*	0.008	0.051**	中介作用不显著
开放性 => 能力 => 焦虑	−0.015	−0.143*	0.028	−0.008	中介作用不显著
开放性 => 努力 => 焦虑	−0.015	−0.067	0.027	−0.008	中介作用不显著
开放性 => 背景 => 焦虑	−0.015	0.008	0.029*	−0.008	中介作用不显著
开放性 => 运气 => 焦虑	−0.015	−0.104	0.008	−0.008	中介作用不显著
宜人性 => 能力 => 焦虑	−0.062**	−0.351**	0.028	−0.035**	中介作用不显著
项	c 总效应	a	b	c′ 直接效应	检验结论
宜人性 => 背景 => 焦虑	−0.062**	−0.239**	0.029*	−0.035**	部分中介
宜人性 => 运气 => 焦虑	−0.062**	−0.317**	0.008	−0.035**	中介作用不显著
严谨性 => 能力 => 焦虑	0.029**	0.228**	0.028	0.006	中介作用不显著
严谨性 => 努力 => 焦虑	0.029**	0.220**	0.027	0.006	中介作用不显著
严谨性 => 背景 => 焦虑	0.029**	0.281**	0.029*	0.006	完全中介
严谨性 => 运气 => 焦虑	0.029**	0.278**	0.008	0.006	中介作用不显著

注：* $p < 0.05$，** $p < 0.01$。

三、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大五人格得分在严谨性和开放性维度得分最高且相差不大。受时代背景影响，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加之国内社会环境稳定，居民生活安乐，使得现阶段大学生人格在开放性维度上的得分呈上升趋势；同时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其严谨性维度得分也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高校大学生诚信可靠、充满朝气，喜欢与人交流，积极向上，乐观豁达，并且在交际场景中，充满自信且勇于展现自己。该研究结果与闫妍 [3] 的《大学生归因方式、人格特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不同，可能与地域文化、时间跨度有关 [4]。

本研究结果显示，全国高校学生在归因方式的各维度得分相差不大，归因外部因素（背景、运气）比归因内部因素（能力、努力）平均得分高 0.212 分，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的内归因得分逐步升高，外归因得分逐步降低，这是因为大学生的学识、技巧和能力在不断提升，心智逐渐成熟，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更加具有辨别能力和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不会因外界的变化产生心理内部的变化，逐渐变得更加自信 [5]。

人格特质在归因方式和成人依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归因方式通过人格特质间接影响成人依恋水平。归因方式的得分越高，人格特质的得分也越高，成人依恋的得分就越低。这一结论有助于对大学生归因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进行解释。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背景归因是连接人格特质与依恋焦虑的重要桥梁。其中，它在严谨性人格影响焦虑的路径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人格影响焦虑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产生原因可能是这一代的大学生承受来自社会、家庭及学业方面的多重压力，加之自尊心较强，使其容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导致成人依恋水平相对偏低 [6]。

通过对样本的数据分析，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当代大学生神经质维度、外倾性维度、严谨性维度都与归因方式为正相关关系，开放性维度与归因方式没有相关关系，宜人性维度与归因方式为负相关关系。

当代大学生神经质与依恋水平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外倾性与依恋水平的回避部分没有相关关系，与焦虑部分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开放性与依恋水平没有相关关系，宜人性与依恋水平为显著负相关关系，严谨性与依恋水平的回避部分没有相关关系，与焦虑部分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当代大学生归因方式与依恋水平的焦虑部分显示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背景与成人依恋的回避部分显示显著正相关关系。

当代大学生人格特质在归因方式和成人依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归因方式通过人格特质间接影响成人依恋水平。

（下转 99 页）

基于“四下基层”理论的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路径研究

田　辉　郑中仁

摘要：“四下基层”理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范式，为新时代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群众工作面临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形态复杂化等挑战，传统方式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党校党员应依托“四下基层”理论，通过践行群众路线拉近党群干群关系，以问题导向提升服务群众实效，借矛盾化解巩固执政根基。具体路径包括：创新基层思想教育形式、构建群众需求分析长效机制、完善矛盾调解体系、优化问题解决流程、强化群众工作能力培训等，以推动联系群众工作落地见效，提升服务效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关键词：四下基层；党校党员；群众联系；工作路径；服务实效

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工作面临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形态复杂化等挑战，亟须探索符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路径。“四下基层”理论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工作方法，涵盖政策宣传、调查研究、信访接待与现场办公四大核心环节，为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提供了系统性方法论支撑。202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1]。“四下基层”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又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且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对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基层群众需求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特征，传统联系群众方式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亟须以“四下基层”理论为指导，探索适应基层实际的工作路径。本研究聚焦其理论内涵，剖析工作重要性，提出具体实施路径，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实践深化，密切党群关系，提升服务效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四下基层”理论内涵

“四下基层”理论是党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工作方法体系，其核心内涵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

一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要求党员深入社区、乡村等群众聚集区域，将抽象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群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表达，当群众对政策存在疑惑时，党员需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细致解读，使政策精神能准确传递至基层每一个角落。

二是调查研究到基层。强调党员带着具体问题走进基层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需求，通过梳理分析这些第一手信息，为后续工作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确保决策能贴合基层实际情况。

三是信访接待到基层。倡导党员主动前往矛盾纠纷多发的基层站点，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在与群众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化解矛盾，避免问题积累扩大，让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在基层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维护基

（上接 98 页）

参考文献

[1] 李丹 . 大学生内外向人格、生活满意度、学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D]. 北京 : 北京林业大学 ,2020.

[2] 刘小磊 . 大学生归因方式、孤独感及冲动性对手机依赖倾向的影响研究 [D]. 新乡 : 新乡医学院 ,2016.

[3] 闫妍 . 大学生归因方式、人格特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D]. 哈尔滨 :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5.

[4] 张自强 . 大学生归因方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研究 [D]. 成都 :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5] 李宇琼 .“90 后”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人格特征和专业承诺的关系研究 [D]. 南昌 : 江西师范大学 ,2015.

[6] 于燕 . 大学生归因方式与抑郁焦虑的关系研究 [D]. 荆州 : 长江大学 ,20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 2022 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区心理实践多生态层次模式研究”（22SHE412）。

（作者：王芃举，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康晶，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是现场办公到基层。要求党员针对基层存在的具体事务性问题，在基层现场制定解决方案并推动落实，减少工作流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能高效得到处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基于“四下基层”理论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一）践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党校党员主动深入基层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在倾听群众日常生产生活诉求与想法的过程中，打破存在于党群之间的信息壁垒，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切，进而使党群干群之间的心理距离逐步缩短，为后续各项工作获得群众理解与支持筑牢情感基础。如此直接接触的方式能让党群干群关系在长期互动中保持紧密状态，避免因沟通不畅导致隔阂产生。

（二）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为切实解决群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难题，党校党员以“四下基层”理论为指引，带着问题意识走进群众，在与群众共同分析问题成因、探讨解决思路的过程中，将理论知识与基层实际情况相结合，逐步掌握应对不同类型群众诉求的方法与技巧。当面对群众提出的复杂问题时，凭借在基层积累的经验能快速找到问题关键节点，从而使服务群众的能力在实践打磨中得到系统性提升，为后续更高效处理群众问题提供能力支撑[2]。

三、基于“四下基层”理论的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路径探索

（一）理论宣讲下基层，创新群众思想教育方式

在推进理论宣讲下基层工作中，党校党员需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构建与群众需求深度契合的互动式宣讲体系[3]。其一，党校党员可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固定阵地，定期开展“理论微课堂”活动，在活动筹备阶段需提前与基层党组织沟通，了解该区域群众关注的政策热点与思想困惑，从而确定每次宣讲的核心主题与内容侧重点，确保宣讲内容能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其二，党校党员应转变宣讲语言风格，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群众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案例与表述，当面对农村地区群众时，可结合乡村振兴、农业政策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展开讲解，借助本地发展实例让理论知识更易被理解和接受，当面对城市社区群众时，则可围绕社区治理、社会保障等话题进行阐述，增强理论与群众生活的关联性；其三，党校党员可利用线上平台搭建理论宣讲延伸渠道，通过录制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开设线上答疑专栏等方式，为无法参与线下宣讲的群众提供学习途径，同时安排专人定期维护线上平台，及时回复群众留言，保证线上宣讲能持续发挥作用，为群众思想教育提供全天候支持，通过上述多维度举措，党校党员能将理论宣讲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创新群众思想教育方式方法，提升群众对理论知识的接受度与认同度，进而强化与群众的思想联结。

（二）调查研究下基层，构建群众需求分析长效机制

党校党员开展调查研究下基层工作时，需以构建群众需求分析长效机制为核心目标，打破阶段性调研局限，形成常态化、系统性调研模式[4]。第一，党校党员需建立调研前的基层对接机制。在每次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前，须与乡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进行至少两次的沟通，首次沟通明确调研时段内基层群众可能关注的核心议题，如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二次沟通细化调研对象的选取范围，确保覆盖不同年龄、职业、收入层次的群众，避免调研样本单一导致需求分析偏差；第二，党校党员应采用多元化调研方法组合，除传统座谈会外，可运用入户走访、田间地头访谈、线上问卷等方式收集群众需求信息，当面对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众时，入户走访需提前告知走访时间并携带便于记录的纸质调研提纲，在与群众交流过程中注重倾听群众原生态表达，不刻意引导群众回答方向，同时做好现场记录与音频备份，待调研结束后及时整理形成需求原始台账，当面对年轻群体时，线上问卷需简化填写流程，控制问卷题目数量在 15 题以内，且题目表述需简洁明了，确保年轻群体愿意参与并真实反馈需求；第三，党校党员需搭建需求分析与反馈闭环机制，每月定期对收集的群众需求信息进行分类梳理，联合基层党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需求研判会，明确需求的紧急程度与解决责任主体，形成需求分析报告并反馈至基层群众，同时跟踪需求解决进展，每季度向群众公示需求解决情况，通过这样的闭环运作，能让群众需求始终处于动态监测与响应状态，进而构建起稳定且有效的群众需求分析长效机制，为党校党员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联系群众工作实效奠定基础。

（三）信访接待下基层，完善群众矛盾调解体系

党校党员推进信访接待下基层工作时，须以完善群众矛盾调解工作体系为根本导向，打破传统信访接待的被动模式，构建主动介入、多元联动的矛盾化解格局[5]。首先，党校党员需建立信访接待前置排查机制，在每月固定下沉基层开展信访接待前，需与村（社区）网格员、人民调解员进行深度对接，全面掌握该区域内近期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潜在矛盾，如邻里纠纷、政策落实争议等，对排查出的潜在矛盾进行分类登记，明确矛盾涉及主体、核心诉求与风险等级，为后续精准开展信访接待奠定基础；其次，党校党员应搭建现场信访接待与即时调解融合机制，在基层信访接待点设置专门调解区域，当群众前来反映信访问题时，党

校党员需先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做好详细记录并梳理问题核心症结，若问题属于可现场协调解决范畴，需立即联系涉及的基层组织或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到场，共同与群众沟通协商解决方案，若问题较为复杂无法当场解决，须向群众明确告知问题处理流程、责任主体与预计反馈时间，避免群众因信息不透明产生不满情绪；最后，党校党员需建立信访问题跟踪回访与长效预防机制，对已受理的信访问题定期跟踪处理进展，待问题处理完毕后及时对群众进行回访，了解群众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与后续需求，同时将信访问题处理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与制度漏洞进行汇总分析，形成专题报告反馈至相关部门，为完善基层治理政策、减少同类信访问题发生提供参考，促使党校党员在信访接待下基层工作中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群众矛盾得到高效化解，进而完善群众矛盾调解工作体系。

（四）现场办公下基层，优化群众问题解决流程

现场办公下基层要求党校党员突破传统办公场所局限，将办公地点直接设立在群众生产生活集中区域，通过优化全流程服务提升群众问题解决效率与质量。一是在办公前开展需求摸排与资源整合工作，党校党员需提前与基层党组织建立对接机制，借助基层党组织熟悉辖区情况的优势，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住房保障、医疗服务、就业扶持等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同时联合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明确各自在问题解决中的职责边界，确保携带充足政策文件与资源支持前往现场，当群众提出具体诉求时能快速匹配对应解决方案。二是在办公过程中构建多方联动协作机制，党校党员应在现场设立专门接待点位，采用“一对一咨询 + 集中会商”相结合的方式处理群众问题，对于单个群众的个性化诉求，党校党员可直接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与办理指引，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问题，党校党员须组织各部门代表开展即时会商，明确问题解决的步骤、时限与责任主体，避免出现部门间推诿扯皮导致群众问题搁置的情况，为群众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以减少问题流转环节。三是在办公结束后建立跟踪反馈与流程优化机制，党校党员需对现场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进行详细记录并录入专门信息台账，定期与责任部门沟通了解问题推进情况，同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向群众告知问题解决进度，当发现某类问题在解决过程中频繁出现流程堵塞时，党校党员需及时总结原因并向相关部门提出流程优化建议，形成“摸排—处理—跟踪—优化”的闭环服务模式，确保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妥善处理，切实增强群众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五）教育培训下基层，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水平

教育培训下基层以党校党员为实施主体，聚焦群众工作核心能力，通过搭建系统化、场景化培训体系，助力基层党员干部掌握高效沟通、精准服务的专业方法。一是课程内容紧扣基层实际。党校党员深入分析基层群众工作中政策传递不畅、需求响应不及时等问题，将群众工作心理学、政策解读技巧、矛盾纠纷化解等纳入课程，还结合区域特点设置差异化模块：面向农村党员增加乡村振兴政策实操课，面向社区党员强化社区治理与便民服务流程课，让培训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助力基层党员快速理解转化。二是教学形式注重互动体验。采用“理论讲解 + 模拟演练 + 现场观摩”模式：理论环节用案例剖析解读群众工作原理；模拟环节设置群众诉求、政策异议等场景，组织基层党员角色扮演实战，党校党员即时点评；现场观摩环节带领学员走进优秀基层点位学习经验，避免单向灌输，提升参与积极性与学习效果。三是建立培训成果跟踪机制。培训后党校党员定期与基层党员沟通，了解知识应用情况，通过线上答疑、线下走访解决应用难题；同时组织阶段性成果交流，让基层党员分享应用经验，形成“培训—应用—指导—交流”良性循环，确保培训切实助力基层党员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推动基层群众工作质量提升。

四、结语

本研究围绕“四下基层”理论与党校党员联系群众工作的融合，明确了该理论对党校党员联系群众的方法论价值，通过剖析理论内涵、阐述工作重要性，从思想教育、需求分析、矛盾调解、问题解决、能力培训的五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为党校党员开展群众工作提供系统性指引。未来，党校党员需持续深化“四下基层”理论应用，结合基层治理新态势优化工作路径，加强与基层多元主体协同，推动群众工作从“有效落实”向“优质高效”升级，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1] 盛林，何晓岳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密切联系群众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遵循 [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5,5(03):26-35.

[2] 李族放 . 健全党员干部联系与服务群众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4):41-44.

[3] 卢迪 . 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升路径研究 [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24,37(01):16-22.

[4] 张克兵，梁道刚 . 增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内生动力的三维审视 [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2(03):35-42.

[5] 付春华 . 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实践策略 [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1(02):27-31.

（作者：田辉，上蔡县委党校讲师；郑中仁，上蔡县委党校馆员）

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新理念探索

王　芸　王彦涛

摘要：本文从业务场景出发探讨了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理念，旨在提高管理与业务水平。首先分析了学术类社会团体的对外和对内业务场景，包括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以及会议管理、财务管理等，并指出信息化建设的切入点。接着，梳理了智慧党建、知识库构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化经验在社会团体中的应用。最后，提出了具体的信息化建设举措，包括建设综合 OA 系统、对外信息平台、行业知识库，并深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以促进学术类社会团体的信息化转型。

关键词：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建设；业务场景

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法人。学术类社会团体是以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促进学科人才成长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在团结凝聚学术工作者、促进学术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学术领域国际合作、促进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事业单位纷纷采取各种信息化手段来提高机构运行效率、提升业务能力。学术类社会团体也要充分吸取信息化建设经验，应用信息化手段提高自身管理与业务水平。

本文立足于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的实际业务场景，针对学术类社会团体面对的共性问题，在对企事业单位相应场景信息化经验的归纳基础上提出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建设新模式新理念。

一、业务场景分析

本文对学术类社会团体的 4 类对外业务场景和 4 类对内业务场景进行分析，从工作出发，找到信息化建设的切入点。

（一）对外业务场景

1. 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术交流是学术类社会团体所开展的主要业务内容之一，包括举办和参与学术类论坛、讲座、研讨会以及进行合作项目等。此类业务场景的信息化需求主要在交流合作平台的建设方面，同时可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对会员参与情况和专家资源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需求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

2.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学术类社会团体另一主要业务内容，包括开展研究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参与编写专著、在受认可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报告等。此类场景的信息化应用途径包括在线学术平台的建立、领域知识库的构建等。数据分析工具可以在领域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方面起到作用，帮助找到研究方向、聚焦研究切入点，同时更好地为专家、会员提供研究服务。线上咨询服务平台可实现需求提交、服务派单、进度查询到成果交付的全流程线上闭环，整合行业优质数据库与实战案例库为大语言模型注入高质量语料，让初步方案更具专业质感且精准贴合实际需求，同步建立科学的咨询服务评价体系，实现服务质量的长效管控。

3. 组织培训

社会团体需定期为个人及单位会员组织专项培训，及时传递领域内的最新政策、技术动态与行业资讯，助力会员精准把握行业发展前沿，帮助会员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信息化技术能帮助建立线上学习平台和学习系统，对培训会议进行线上分会场同步以及发布培训相关信息、材料等内容。同时可通过培训场景建立如在线学习社区等行业社群，增加影响力。进一步还可考虑领域知识大语言模型的引入，实现虚拟化、智能化培训。数据分析工具可对培训成效、学员反馈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及时调整培训策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率。线上学习平台可增设课程打卡、在线考核及学分认证功能，实现培训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结合直播、录播与微课等多元培训形式适配会员碎片化、个性化学习需求，依托领域知识大语言模型搭建智能助教模块，

为学员提供实时答疑、学习规划等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4. 咨询服务

学术社团可提供的咨询服务包括科研设计、管理诊断、政策仿真、投研尽调等。当前咨询服务开展的模式主要为“订单—交付”与“预约—座谈”，沟通成本高、效果差，往往需要反复修改方能契合客户需求。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大幅度提高了服务实效，如大语言模型等可代替工作人员完成需求澄清、资料预筛与初步方案生成，实现用户需求的实时效果反馈，在提高沟通效果与效率的基础上降低人力成本。线上咨询服务平台可打通需求提交、服务派单、进度查询至成果交付全流程线上化，整合行业数据库与案例库为大语言模型提供高质量语料，提升初步方案专业性与适配度，建立咨询服务评价体系，实现服务质量闭环管控。

（二）对内业务场景

1. 会议管理

会议管理是学术类社会团体开展对内对外工作的主要场景，对内包括内部会议室的预定、审批管理，对外包括组织的公开或非公开会议的查询、参会注册、人员管理、费用管理等内容。理想的会议管理信息化系统应能实现上述内容的一站式服务，同时可与微信小程序等第三方软件配合，实现便捷的参会缴费、注册等移动服务。

2. 财务管理

社会团体的财务工作涉及资金的筹集、支出的管理、财务报告的编制等重要工作，需有效管理会费收入、赞助款项、活动经费等财务资源，确保财务运作合规、透明，并为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研究表明，社会团体的经营项目多，资金流水多，对财务管理的质量要求较高[1]。人工财务管理在预算编制、账务核对、财务报告分析等复杂环节，可能面临财务数据管理不规范、审计流程烦琐等挑战，需要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提升财务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任何类型的社会团体均应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整合财务数据录入、预算控制、报销审批等功能，实现财务流程的数字化管理。通过系统化的财务管理平台，可以实现财务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提升财务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引入电子化的财务审批流程，加强财务数据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也能对降低财务管理风险起到积极作用。

3. 档案管理

社团档案涵盖工作中产生的各类文本、声像及多媒体记录，品类杂、跨度大，易遭遇载体老化、权限失控与灾害损毁等多重风险[2]。同时电子化的档案信息也存在数据来源广、结构差异大的特点。针对以上现实问题，信息化工具可从备份、信息安全、信息检索三方面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在备份方面，信息系统较其他传统方法更易实现异地容灾备份；在信息安全方面，应用国密算法等方式可提高安全保护水平；在信息检索方面，结构化、统一化的数据存储模式可有效提高检索效率，并为数据挖掘及支撑大语言模型的语料库建设打下基础[3]。

4. 成果管理

成果管理包括围绕团体标准的管理、围绕课题的管理两方面。团体标准是由团体按照团体确立的标准制定程序自主制定发布，由社会自愿采用的标准。对于研究性社会团体而言，团体标准是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内容。围绕团体标准衍生了内容梳理、团标申报等具体工作，需要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审批人员多方协作完成。课题管理则包括课题立项、执行、监督和总结等环节，以及课题申报、经费管理、研究进展跟踪等工作。课题与团体标准的最后环节都落脚于成果，因此，为有效跟踪和记录学术成果的产出、活动效果的影响以及组织发展的进展情况，以便及时评估和调整组织的发展方向和策略，信息系统的配合尤为重要。建立合适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团体标准与课题信息的集中管理、分配和监控，实现团体标准与课题申报流程的电子化、进度的实时追踪和成果汇总的自动化，促进团体标准与课题执行的规范和高效。同时，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既往团体标准、课题成果的数据集中管理和分析，形成内部知识库，有利于实现对社会团体内部知识的有效利用。

二、信息化经验分析

（一）智慧党建

我国党建信息化工作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先后经历了推行电子党务、建立党建网站、党建信息化即时化时代等三个阶段，已被证明能创新党建平台、拓展党建空间、丰富党建形式、提高党建效率[4]。另有研究构建了包括实时化的价值传播、感知化的组织活动、智能化的电子党务、立体化的远程教育、互联化的公共服务、回应化的网络问政六个方面的智慧党建框架[5]。对社会团体来说，智慧党建的重点应放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效利用好上级党组织配发的智慧党建工具开展党建工作。

（二）知识库

学术类社会团体通常掌握了一定行业或领域内的基础与前沿知识，知识体系完善。知识库是一种可支撑多种应用模式的知识组织方法，由学术类社会团体主导构建的行业知识库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能更好地发挥知识价值[6]。行业知识库是指由一个行业内的组织者建立的、面向行业内企业服务的知识库，在这个知识库中搜集、整理、组织、存储了各类与行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且提供各种应用手段来有效地传播、共享和利用[7]。知识库的构建是对复杂知识进行有效表示的过程，通常需要先建立知识本体，再形成本体化知识模型，最后按一定的结构模型映射匹配机制搭建而成。高质量行业知识库可为社团开展科研与咨询等业务提供有效依托。

（三）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捕获、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据集，通常具有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价值性和真实性[8]。大数据技术在结构化数据分析、文本分析、Web 分析、多媒体分析、社交网络分析和移动分析等方面展示出较强的效果，在企业、物联网、社交网络、医疗健康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学术类社会团体的一大工作是团体标准的评审、评价及立项发布等内容，而大数据技术已在团体标准管理方面实现应用。同时，基于知识库、知识图谱的大数据技术也可应用于广大学术类社会团体所活跃的各个领域中。

（四）人工智能应用

近年来，人工智能（AI）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是指基于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大量数据学习和模型训练，根据输入的指令，生成文字、图像和音频等相关内容的技术[9]。在学术类社团的各个职能方面，AIGC 均提供了成功的参考：在知识服务方面，已有 AIGC 赋能的智慧健康知识服务模式，可利用 AI 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健康知识服务；在咨询服务方面，已有图书馆应用 AI 技术，创新性提出了“引导 + 反馈”的交互服务模式；在宣传发布方面，AIGC 技术已被证实可应用于包括影视宣传片在内的众多场景。

三、信息化建设举措

综合业务开展情况和各方面信息化建设经验，学术类社会团体可采取的信息化建设具体举措如下。

（一）建设功能完备的综合 OA 系统

理想的适合学术类社会团体采用的 OA 系统应在一般功能齐全的基础上，依照本文所述要点，整合会议、课题、档案、财务、成果、权力执行与监督等管理子系统。

（二）建设易用的对外信息平台

学术类社会团体应在自身官方网站的基础上，整合线上学术交流、学习培训、科普教育、咨询服务、团体标准以及信息整合与发布平台。

（三）着手建立行业知识库

学术类社会团体可结合自身能力，着手整合行业或领域知识，巩固行业共识，实现知识资源的组织利用。

（四）深化新质生产力赋能

社会团体可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实现数智化转型。

四、总结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积极响应民政部于 2024 年发布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政策的要求，推出“业务场景—能力缺口—技术赋能—治理迭代”四步闭环，为学术类社会团体信息化提供了从理念到落地的完整方案，把学术交流、会员服务、智库研究等高频事项进行拆解归档，把信息化从一次性项目转为持续迭代的组织能力。在多方协助下，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形成了“党建引领业务、知识驱动服务、数据优化决策”的三维融合模型，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的全流程覆盖。然而，现有模式仍存在“三轻三重”的现象——重内部管理轻外部生态、重数据汇聚轻价值变现、重技术移植轻学术特色，导致跨社团互信不足、数据要素收益不清、智能化应用深度不够，难以支撑学术社团在全球知识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

未来，学术类社团信息化将沿“智能—平台—价值—生态”四级台阶跃升：一是引入多模态大模型，对会议、论文、专利、政策进行语义关联，实现一键生成白皮书与智能政策包；二是构建“学术链”联盟，把会员身份、成果版权、培训证书进行统一存证，形成信息检索互信平台；三是建立“数据要素 × 知识服务”收益分成机制，向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输出指数报告，让数据变资产、知识变资本；四是联合基金会、出版集团、高校、科技企业共建“学术公益云”，打造开源社区、低代码平台与共享算力池，最终形成可持续的数字公共平台，助力我国学术型社会团体在全球知识治理体系中发出更大声音。

参考文献

[1] 田小辉 . 试析社会团体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 [J]. 现代商业研究 ,2023(02):9-11.

[2] 阳东丽 . 社会团体组织档案安全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J]. 办公室业务 ,2022(24):127-129.

[3] 阳东丽 . 社会组织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剖析与解决对策 [J]. 黑龙江档案 ,2022(06):115-117.

[4] 曲值 , 张振 . 数字党建：概念界说、历程考察与核心向度 [J]. 治理研究 ,2023,39(06):113-129,160.

[5] 马静 . 以信息化推进党建发展的路径思考——评《智慧党建》[J]. 领导科学 ,2022(12):143.

[6] 袁磊 , 张浩 , 陈静 , 等 . 基于本体化知识模型的知识库构建模式研究 [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6(30):65-68,104.

[7] 钱卫列 , 侯贵平 . 行业信息化知识库系统知识库设计 [J].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8(14):3719-3722.

[8] 孟小峰 , 慈祥 . 大数据管理：概念、技术与挑战 [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3,50(01):146-169.

[9] 罗锦钊 , 孙玉龙 , 钱增志 , 等 . 人工智能大模型综述及展望 [J]. 无线电工程 ,2023,53(11):2461-2472.

（作者：王芸，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医学信息专员；王彦涛，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合规管理部主任）

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黄　茜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推进背景下，传统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分隔的现状亟待改善。本文首先阐述妇幼保健机构两类服务的组织架构、职能分布及协同机制现状，接着剖析二者在架构、机制等方面存在的脱节与不足问题，最后从组织领导、协调机制、人才培养、数字化建设、服务拓展、评估体系六个维度，探讨促进二者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为优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对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服务；临床服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一、引言

在全方位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进程中，妇幼健康作为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完善其服务体系意义非凡。传统妇幼保健机构存在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长期分隔状态，致使资源配置不合理与服务环节断裂，而研究探索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相互融合发展道路，对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有着十分关键的实际意义。

二、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的现状分析

（一）组织架构与职能分布

目前，不少妇幼保健机构在组织架构方面，依旧维持着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服务分开设立的“双轨并行”管理方式。在此架构下有关公共卫生的部门，以履行群体健康管理的职责为核心要点，其工作涵盖妇幼健康状况监测、公共卫生项目施行、健康教育传播、健康促进活动开展等众多方面，凭借宏观层次政策规划及资源统筹安排与调配努力，达成保障所在区域内妇幼群体整体健康水平的目标。在妇幼健康监测工作中，需定期收集分析区域内妇女儿童疾病发生率、营养状态、疫苗接种比例等各类数据，为公共卫生政策拟定提供科学依据支撑。在公共卫生项目推进过程中，要组织落实“两癌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民生项目，从群体角度降低疾病发生风险。

至于临床科室工作，主要围绕个体疾病诊断和治疗展开，借助专业医疗技术手段为妇女儿童提供精准诊疗服务，从妇产科孕期护理、分娩协助到儿科常见疾病诊断治疗、危急重症抢救等临床服务，采取“一对一”模式解决个体健康问题，着重关注疾病针对性干预措施及康复实际效果。

这样的职能划分从某个角度讲，虽对单个领域专业程度起到一定保障作用，但也使这两类服务在服务流程衔接环节、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信息互通与共享等方面产生结构性脱节状况。比如，公共卫生部门收集的群体健康相关数据无法及时反馈到临床科室，进而导致临床诊断治疗缺少群体健康发展趋势参考依据；临床科室察觉到的疾病流行迹象，同样无法迅速传达给公共卫生部门，影响疾病防控及时性。

（二）协同机制现状

在协同机制建设推进过程中，不少妇幼保健机构存在着机制不完善、协同成效欠佳的现实难题。就目前而言，现有的协同工作多凭借临时性任务安排或项目带动形式开展，尚未形成一套系统且能稳定日常运转的制度架构，虽然有些机构尝试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或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推动协作，但因权力与责任划分不清、协同工作规范缺失，实际运转时常出现职责界限不明、相关人员互相推脱状况。比如，实施儿童肥胖干预项目时，公共卫生部门与临床营养科会因“谁来主导干预方案制定”“谁负责随访管理”等问题产生职责争议，致使项目推进效率不高。

缺乏激励机制进一步降低了医务人员参与协同工作的热情。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与临床工作人员在绩效考核体系、职业发展路线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临床岗位以诊疗数量、手术难度等为考核重点，职业晋升注重临床技术职称评定；公共卫生岗位则把群体健康指

标改善、项目覆盖率等作为评价要点，职业发展方向多偏向公共卫生管理或科研。这种差别使双方共同开展协同服务时缺少内在工作动力，易陷入“各干各的”状况。

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因协同机制不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服务在资源整合上也暴露明显不足，如公共卫生部门的健康宣传教育资源无法与临床科室的诊疗资源联动，导致健康干预措施难以从“预防”到“治疗”形成完整环节，既影响服务连贯性，也限制了妇幼保健机构整体服务成效提高[1]。

三、促进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的发展路径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融合发展责任与目标

加强高层组织引领，是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进程的核心必要条件。首先，要组建以机构主要负责人员为领头的专门领导小组，对公共卫生和临床业务通盘协调，拟定融合发展的长远规划及短期任务，确保政策贯彻落实的持续性；其次，要细致化各部门、各岗位在融合工作中承担的职责，按责任清单清晰明确分配任务，将融合实际成效归入绩效考核机制，营造“领导着重抓、全体人员都参与”的工作局面；最后，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处理融合过程棘手难题，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发展策略为融合发展奠定稳固组织基础。

以某省妇幼保健院为例，组建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由院长出任组长，分管副院长及公共卫生、临床、行政等多部门负责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经深度调研后制定《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构建全方位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总体性目标，并细化为年度性指标，如孕产妇健康档案电子化比例提升、高危儿童随访比例提高等。同时，领导小组建立季度例会制度，针对融合进程中遭遇的诸如信息系统对接不通畅与科室之间协作积极性不够高等一系列问题，及时调配资源加以解决[2]。

（二）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与奖补政策支持

妇幼健康服务关联卫生健康、教育、民政、财政等诸多部门，突破部门间行政阻碍方能达成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运用。其一，需构建长期稳定跨部门沟通渠道，通过定时举办联席会议、开展联合办公等强化部门间信息互通与合作并一同出台融合发展政策办法；其二，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妇幼健康服务融合工作资金扶持力度，专门设立奖补资金以奖励融合工作中成绩优异的机构和个人，激发各方参与融合主动性；其三，要整合不同部门项目资源，使服务内容有机对接，从而为妇幼群体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健康服务。

某市妇幼保健院在跨部门协调机制构建方面成果突出。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财政、教育等部门组建妇幼健康服务融合发展协调小组，定时开会探讨并解决融合进程中实际问题。协调小组促使财政部门设立妇幼健康服务融合专项奖补资金，以奖励实施创新服务模式，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在实际操作中，市妇幼保健院与教育部门协同合作，将儿童入园体检和生长发育监测、预防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相结合，由保健院给予技术支撑、幼儿园负责组织落实，达成服务紧密衔接，同时财政部门给予该项目资金补贴保障其顺利推进[3]。

（三）完善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

完备的人才培育及引入体制，可以给予融合发展稳固智力支撑。人才培育环节需搭建多样化培训体制，借内部培训、外部深造、学术沟通等形式，提高医务人员公共卫生及临床综合服务能力，倡导参与跨学科研习以培育“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引进方面要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着重引入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等专业人才，并创造优良工作环境与发展空间；还需构建科学人才激励机制，将医务人员综合服务表现归入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等评定体系，以激发人才队伍创新活力。

某地妇幼保健院就人才培养与引进积极摸索，与当地高校携手开办“妇幼健康管理定向培养班级”，推选院内出色医务人员开展公共卫生与临床知识系统学习，课程涉及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学、临床诊疗技术等多领域，还邀请高校专家及院内资深医生共同授课。同时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对公共卫生专业博士给予安家费用、科研启动资金等扶持，并提供独立科研平台与发展契机。在人才激励层面将医务人员参与融合服务项目数量及质量纳入绩效考核，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表现出众的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四）推进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实现数据互通与智能管理

借助信息化技术，达成公共卫生和临床数据相互流通与共同享用，进而为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有力的数据基础。推动相关工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构建一套统一的数据标准及规则体系，确保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有效对接，并实现跨平台共享，防止因数据格式不一致而出现“信息孤岛”状况；其二，研发功能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对公共卫生服务数据、临床诊断治疗数据、居民健康档案等多类数据资源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从婚前保健、孕期监测、儿童保健，直至疾病诊疗的妇幼健康信息全方位闭环式管理；其三，运用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针对海量健康数据开展深层次剖析，为制定疾病预防策略及临床诊疗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使服务模式从传统“经验推动”转变为“数据推动”的全新模式。

以某大型妇幼保健院集团为例，其在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领域已具行业示范成效。该集团专门投入资

金打造的“妇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信息平台”，通过统一公共卫生和临床数据采集标准及格式，实现了孕期保健、儿童保健、疾病诊疗等业务数据的实时交流与共享。平台依靠大数据分析模型，可自动识别高危孕产妇及儿童群体，并精确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给负责医生，助力临床团队及时采取干预举措，同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问诊、健康风险评估等，依据患者个人健康数据生成个性化健康引导，显著提升服务精准程度与可获取性[4]。

（五）拓展服务内容与方式，满足妇幼群体多层次健康需求

拓展服务内容及实施方式，是妇幼保健机构达成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有机融合的关键目标。在社会不断进步下，妇女儿童群体对健康服务需求愈发朝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唯有持续丰富服务内容与创新服务模式，方可更妥善契合广大群众实际需求。就服务内容来讲，应从仅局限于疾病诊断与治疗朝预防、保健、康复等完整流程服务延展，以构建覆盖妇女儿童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架构体系。在服务方式方面，要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手段，推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服务模式，如开展远程诊疗、健康咨询、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项目，提升服务的便捷性。还要加大健康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妇女儿童群体健康认知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达成从“以疾病治疗为核心”朝“以维护健康为核心”的转变。

某市妇幼保健院通过拓展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切实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推出“一站式孕产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将孕前检查、孕期保健、分娩服务、产后康复等一系列环节，整合为一套一体化服务套餐，为孕产妇从准备怀孕至产后阶段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务。同时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开展线上问诊、远程胎心监护、营养指导等多项服务，患者借助手机 App 就能随时获得相应医疗服务。除此之外，还组建专业健康宣传教育工作团队，通过线上直播及线下举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孕期保健与科学养育幼儿等相关知识普及推广活动。

（六）完善指导评估体系，强化督促落实与绩效考核

健全的指导评估体系，对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融合工作的持续开展起着关键保障作用，借助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全方位、客观评价融合工作，以迅速察觉存在问题、归纳经验，来为后续改进工作提供切实依据。首先，要制定包含组织管理、服务质量、资源运用、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多维度评估指标，力求评估全面科学；其次，要打造常态化督导机制，定时检查指导融合工作，及时找出处理现存问题；最后，要将评估结果与机构财政补贴、评优评先等事项关联，强化绩效考核引导效果，以激发机构及工作人员主动开展融合工作的热情。

某省卫生健康委构建的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融合评估体系颇具示范意义。该省卫生健康委从组织管理、服务供给、信息管理、质量把控等层面，设立四大类共 20 项具体评估指标，并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估办法，每年针对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在评估过程中，由相关专家通过实地考察、资料查看、与患者交流等形式，对机构融合工作实施全面检查，还针对发现问题给出整改建议。同时将评估结果与财政补助资金分配紧密联系，对评估成绩优异机构予以奖励，对未达标机构限定时间整改并跟踪复查[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的深度融合，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6]。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创新协同机制、推进数字化建设等路径，可有效打破服务壁垒。但实践中仍面临政策落地、区域差异等挑战，未来需持续深化理论研究，探索更具普适性的融合模式，助力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瑜，万宇辉，阙敏，等. 安徽省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J].中国妇幼保健,2013,28(01):5.

[2] 李善鹏 . 区县级预防保健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合作研究 [D]. 济南 : 山东大学 ,2012.

[3] 梁志江，祝新红，马远珠，等. 广东省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及障碍调查分析 [J].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 ,2017,28(04):4.

[4] 方俊群，杨文珍，王华，等.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幼公共卫生项目管理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J]. 中国妇幼卫生杂志 ,2019,10(01):4.

[5] 孙昂 . 我国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大部制改革状况研究 [D]. 北京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6] 孟晓微，顾霞，郭蓓蓓，等. 基于财务视角的我国妇幼保健院发展变化研究 [J]. 中国医院 , 2024,28(02):29-32.

（作者系江苏省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八步沙精神蕴含的优良家风特质及其对新时代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万积平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在40多年与风沙的较量中形成了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为核心的八步沙精神，其中蕴含勇毅担当、为人诚信、修身律己、忠孝礼敬、见贤思齐、习劳习苦等丰富的优良家风特质，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生动范本。本文从剖析八步沙精神中所蕴含的优良家风特质出发，进而提出其对新时代干部家风建设的具体启示，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参考。

关键词：八步沙精神；家风；特质；启示

优良家风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涵养社会文明、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发展，干部家风建设早已超出个人私事与家庭琐事的范畴，成为关乎党风政风建设的大事。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的“六老汉”——石满、张润元、郭朝明、罗元奎、程海、贺发林，于1981年以联户承包方式挺身而出，组建起了八步沙林场，开启了治沙之路。此后40多年里，三代人父死子继、子承父志，在黄沙漫天的荒漠中筑起坚实的绿色屏障，累计治沙造林28.7万亩，封育管护面积达43万亩，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他们用行动铸就的八步沙精神，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标杆，更蕴含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深入挖掘八步沙精神中的优良家风特质，探究其对新时代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八步沙精神蕴含的优良家风特质

（一）勇毅担当体现守护家园的责任特质

“弘毅”源自《论语·泰伯》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意为“弘大强毅”，是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具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也是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古浪县八步沙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生态开始不断恶化，沙漠也在不停地在移动和扩大，最终变成了将近7.5万多亩的流沙，严重威胁了当地10多个村庄共2万多亩的耕地，以及当地3万多名群众的生产生活。面对这种情况，时任土门公社漪泉大队村主任的51岁老党员石满老汉，率先挺身而出。随后，他又带动郭朝明、贺发林、张润元3名党员以及罗元奎、程海2名社队干部一同加入。最终“六老汉”毅然按下红手印，以联户承包的形式建设起了八步沙林场。林场建设之初，他们便立下“黄沙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的铮铮誓言。他们吃在八步沙，住在八步沙，用行动诠释着“守护家园”的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通过家庭传承成为家风核心。这种弘毅担当的家风，体现了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高度责任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优良品质。

（二）为人诚信凸显坚守承诺的准则底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六老汉”在八步沙林场建设之初便共同立下口头约定：不管以后治沙条件有多苦、多累，每家都必须出一个继承人把八步沙的林子好好管下去。这是比合同还有效力的承诺，成为三代人坚守的“精神契约”。这种诚信体现在“言出必行”的行动中。1991年春天，贺发林临终前，将治沙任务托付给儿子贺中强。贺中强后来表示：“老父亲临终前把八步沙交代给了我，我就一定不能把八步沙丢掉。”[3]贺中强在父亲去世后，扛着被褥来到八步沙驻地，接过治沙担子；次年，石

满老人弥留之际，不仅要求儿子石银山完成未竟的种树任务，还嘱托他照顾好全家人。石银山不仅完成了父亲未竟的造林任务，更将绿色希望延伸到十二道沟等更远的地方；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则放弃土门供销社的稳定工作和丰厚待遇，主动接过父亲的铁锹，成为第二代治沙带头人，后来罗元奎的儿子罗兴全、程海的儿子程生学、张润元的女婿王志鹏，纷纷放弃相对较好的工作或城市生活，积极加入治沙队伍。他们用40多年的行动证明了这种“守一不二”的诚信精神，成为八步沙家风的重要底色。

（三）修身律己展现修德守矩的基础追求

修身律己是传统家风的核心内容，八步沙“六老汉”虽无高深的家教理论，却用行动诠释着修身之道。他们的修身首先体现在“心存敬畏”。对八步沙的草木、对治沙的责任，“六老汉”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为防止火灾，他们每到清明、春节期间都要等群众祭奠完毕，把火消灭后才离开；为了防止种下的小树苗被周围农户的羊吃掉，为了防止周边的农户偷偷去铲草，“六老汉”只能住在沙漠里，半夜还要在沙漠里巡逻。其次体现在“谦虚好学”。为了提高治沙成效，“六老汉”主动向林业局的技术人员请教，改进治沙方法。最后体现在“勤俭持家”。治沙初期，治沙经费严重不足，“六老汉”不惜卖掉自家口粮来填补，这种“俭而不吝”的行动传承着勤俭节约的美德。

（四）忠孝礼敬体现子承父业的坚守内涵

“孝”是中华传统家风的核心。八步沙家风中的“孝”，不仅是赡养父母，更是继承父母之志。“六老汉”及其后辈在八步沙林场建设过程中，体现了“忠孝两全”的品质，对国家，他们落实“三北”防护林工程任务，守护西部生态安全，是“忠”；对父辈，后辈接过治沙的担子，完成未竟之业，是“孝”。郭万刚主动放弃供销社的稳定工作，毅然决然接过父亲手中的铁锹；石银山用行动完成父亲的谆谆嘱托；贺中强虽曾犹豫，却在“嘱托重于山”的信念下坚守八步沙。这种“子承父业”的坚守，不仅是对父辈的“孝”，更是对治沙事业的“忠”，将“忠孝礼敬”融入家风，成为三代人不变的信仰。

（五）见贤思齐围绕接续奋斗的追求方向

“见贤思齐”意思是看到贤能之人便向其学习，这是家风传承中“向上向善”的重要动力。八步沙家风中的“见贤思齐”，既体现为后代对父辈的学习，也体现为外部力量对八步沙精神的认同与追随。从内部传承来看，第一代治沙人的“贤”激励着第二代、第三代接续奋斗，2016年，郭朝明之孙郭玺加入进来，成为第三代治沙人，他用行动延续绿色梦想。从外部影响来看，八步沙精神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大学生陈树君在了解“六老汉”的事迹后，放弃创业，自愿走进八步沙林场，引入科研合作与公益资金；大学生董树涛、王讷、王文娜等相继加入八步沙林场，参与治沙实践与纪念馆讲解。此外，八步沙林场还积极带动社会力量参与治沙，使当地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0%以上，建成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带，保护周边10万亩农田。这让八步沙家风从“家庭传承”扩展为“社会认同”，使八步沙精神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六）习劳习苦践行沙漠播绿的使命实践

“习劳习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40多年的治沙历程，正是“习劳习苦”的生动实践。治沙的艰辛远超常人想象，夏天沙漠气温高达40多度，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地上放一个鸡蛋一会儿就会被烤熟。冬天沙漠里天气很冷，身上背的水一会儿就冻成冰块。风沙大时，住的沙窝子都让沙子填埋了。刚栽下的树苗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却从不放弃。从“一把铁锹、一头毛驴”到“细水滴灌、地膜覆盖”，从“地窝子、干炒面”到“产业化发展”，三代人始终不放弃。这种“习劳习苦”的精神融入家风，让“沙漠播绿”成为三代人的共同使命，也让八步沙精神更具感染力。

二、八步沙精神对新时代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一）知感恩需坚持忠诚立家的家风方向

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也是家风建设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3月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4]八步沙三代人“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家园”的坚守，启示党员领导干部要将“忠诚”融入家风，做到“三个忠诚”：一是忠诚于党，将“两个维护”作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家庭成员听党话、跟党走，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二是忠诚于国家，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大力弘扬爱国精神，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坚决抵制任何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和行为。三是忠诚于家庭，秉持孝道，教育子女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营造爱党爱国、报党报国的家庭氛围。

（二）知敬畏需落实从严治家的家风要求

纪法是家风建设的底线，党员领导干部家风不正通常是导致其最终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诱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八步沙人对治沙心存敬畏、对责任心存敬畏的态度，启示党员领导干部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一是严于律己，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为家庭成员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二是严管家人，对配偶、子女、亲属从严要求、从严管理，对别有用心者的“围猎”要保持高度警惕；三是严守家风，制定家庭“廉洁家规”，明确不谋私利、

不搞特殊化的底线，守护家庭廉洁港湾。

（三）知大德需践行修身齐家的家风准则

《礼记·大学》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5]。”八步沙人“恪尽职守、谦虚好学、勤俭持家”的修身实践，启示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慎初、慎独、慎微、慎友”四个方面加强修养。慎初即不忘初心，切实系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纽扣”，主动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蚀，从源头上杜绝思想松懈与行为失范的可能。慎独即在“无人监督”时仍须具备较强的责任与纪律意识，做到高标准约束自己，始终保持“人前人后一致、工作生活统一”的自律状态。慎微即注重小事、小节，从管好家庭成员、约束身边人员等具体事务入手，在细微处守住底线，避免因忽视小节而逐步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慎友即主动净化个人交往圈与朋友圈，坚决抵制利益裹挟下的不正当交往，防止因“交友不慎”引发作风与纪律问题。

（四）知方向需倡导耕读传家的家风内涵

“耕读传家”作为中华传统家风的核心要义之一，其中“耕”象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读”则指向求真求知的学习态度。八步沙三代人在实践中积淀学识，在学习中探索创新的奋斗历程，为党员领导干部将“学习”融入家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带头学习，通过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借助精神力量滋养家风，让家庭价值取向与时代要求同频共振。二是营造氛围，在家庭内部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生活习惯，以书香氛围涤荡浮躁风气、塑造家庭成员良好品德。三是学以致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能力，深耕本职领域、钻研业务技能，努力成为岗位上的行家里手。通过“耕读传家”，培育向上向善、崇德尚学的家庭风尚。

（五）知艰辛需坚守勤俭持家的家风传统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6]八步沙人吃着干炒面、喝着凉水的勤俭生活，卖掉口粮填补林场治理经费的无私奉献之举，对干部摒弃不良作风、筑牢廉洁防线具有深刻启示。一是坚持勤劳立家，筑牢思想防线。党员领导干部应引导家庭成员在日常点滴中培育劳动意识，通过正向引导杜绝因好逸恶劳滋生的惰性思维，进而防范贪腐念头的萌发。二是坚持以节俭持家，涵养道德自觉。从日常践行出发，帮助家庭成员真切感知资源的珍贵与劳动的艰辛，将勤俭节约从简单的生活习惯，升华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与践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的消费观与追求奢华的享乐观。实践反复证明，唯有将“勤俭持家”的理念深度融入家庭建设与权力行使全过程，才能切实守住廉洁从政的底线，以清正家风赢得群众的真心信赖与支持。

（六）知担当需秉持实干兴家的家风理念

从家国治理到家庭建设，“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理念始终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家庭而言，实干是支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内核；对干部而言，实干则是履行岗位职责、践行初心使命的核心要求。八步沙三代人以“接续躬身治沙、双手改造荒漠”的实干实践，在戈壁中筑起绿洲，这一历程为党员领导干部以实干精神引领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一是以自身实干立标杆，践行履职担当。主动将工作重心聚焦在服务群众需求、破解民生难题、推动区域发展上，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察民情底数、解民生痛点、谋发展实效的具体行动中，让自身的实干行动成为家风建设的直观示范。二是以家庭引导树导向，培育实干品格。注重引导家庭成员树立“空谈无益、实干为要”的价值观念，教育家人无论是个人成长中的学业精进、技能提升，还是事业发展中的目标达成、突破创新，都需靠实际行动去实现，让实干成为家庭成员的行为自觉。三是以精神传承固根基，厚植奋斗基因。将“实干兴家”的理念融入家庭文化传承，通过讲述治沙精神、奋斗故事等方式，让家庭成员深刻理解幸福源自奋斗、成就出于实干的道理，推动实干精神代代传递，引导家人以实干态度面对人生挑战、以奋斗姿态实现人生价值，让实干不仅成为家风的重要标识，更成为家庭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81.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7:18-19.

[3] 贺中强. 八步沙：三代人的绿色接力 [J]. 人民周刊，2019(21):44.

[4] 习近平. 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N]. 人民日报，2021-03-04(01).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65.

[6]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EB/OL].(2019-03-07)[2025-10-29].http://www.bjzx.gov.cn/ztzl/ztxx/xxqglhjszl/xxxzsjzyjhjs/201903/t20190307_17845.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八步沙’精神融入新时代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研究”（2025YB046）。

（作者系中共武威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专业与性别的融合：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与启示

索　欢

摘要：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指注重女性处境，强调女性独特生活经验及社会位置，重视个人即政治的社会结构分析以及平等关系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女性主义的引入，不仅为社会工作开辟了性别与压迫的专项议题，更批判性地带动了社会工作在理念和实务取向上、服务模式上的全面转型，即“问题的结构化”“实践的情境化”“关系的平等化”。那么，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服务范式与传统社会工作的认识与方法有何不同？对于仍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妇女社会工作的理论视野拓宽、专业性培育以及实践性深化有何启发？鉴于现有的妇女领域研究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融入性别视角、理论和赋权理念、厘清妇女社会工作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式、注重女性独特的经验和声音应是妇女社会工作发展的未来转向。

关键词：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融合；启示

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社会工作学科内部逐渐形成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子领域，进而催生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诞生和发展。从微观实践到宏观政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多元视角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诸多层面获取了话语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仍然在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加之社会变革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以女性为轴心的社会问题，这对传统的妇女社会工作应对理念、模式、方法等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以国家大力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契机，立足本土实际，积极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建构本土化、多元化的妇女社会工作架构，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女性福祉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内涵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指以女性生活经验为分析的出发点，专注女性社会位置与其个人困苦间的联结，回应“她”的独特需要，创设工作者和“案主”间的平等关系，并探讨结构上的不平等的一种社会工作实践[1]。这种社会工作实践注重“案主”的个人生活处境，强调女性的独特生活经验和社会位置，通过倡导平等关系的建设帮助女性处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

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性以及独特性，立足于性别视角和社会位置，探讨女性的社会身份与其个人生活困境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社会参与；鼓励自我实现；重视和挖掘人的潜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与社会工作在价值层面存在高度的契合[2]。二者的结合，以女性的独特生活经验为基础，倡导出一种新的社会工作服务逻辑，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有着社会关怀的服务基础。概括来讲，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焦点包括：（1）关注女性的境遇，即揭示和呈现女性的生活处境，提升女性经验的可见度，凸显社会性别维度的重要性。（2）以女性为中心的实践，在女性服务实践中，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关注女性的特殊需要并予以回应。（3）倾听女性不同的声音，女性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语言以及对自我、对社会关系的不同体验，是自身经验的言说体。（4）关注多样性，承认女性的多样性，尊重差异，尊重多元[3]。

二、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女性主义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和观点，关注焦点广泛，内容也比较庞杂，但是说到底，它始终围绕女性主义同时也是社会工作的两个根本问题展开讨

论：一是如何理解女性；二是如何理解女性的社会处境。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对女性自身独特生活经验和成长需求的解释，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理解则呈现了性别社会的结构和特征。因此可以说，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就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考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4]。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者在实际服务中开始意识到女性在私人领域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与她们的社会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试图从更为开阔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关怀的角度理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女性主义的引入，让社会工作开始重新思考案主和问题的本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这一特定名词也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出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协会，倡导在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引入女性主义的相关课程，把女性主义视角和原理运用到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

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与此同时，在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开始重新反思自身的多元化需求，重新思考女性身份建构以及女性需求的多样性、变动性的特点，逐渐放弃以往的追求单一化的行动逻辑，采取多元化视角，进而形成了多元化的服务逻辑。

当前，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影响从具体独特的领域扩展到一般主流的服务领域，如社会工作的临床服务、弱势人群的社区照顾以及社会歧视的消除等，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基本理论视角之一。

三、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性别化理念与实践

从发展历程看，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始于社会工作者帮助女性服务对象的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人们重新思考女性身份的建构特征和女性需求的多样性，进而形成了对传统社会工作的批判和再审视。丽娜·多米内利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打破了传统社会工作的“性别盲点”[5]，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新定义了社会工作的研究范式与服务范式，推动了专业与性别相融合的性别化理念与实践。

第一，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吸收了女性主义“个人即政治”的看法，把个人身份认同与特定场景中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人即政治”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找到了内在的关联，将微观与宏观紧密结合。正是基于对社会处境的社会结构分析，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看到了传统社会工作只关注个人困扰分析的问题所在，将个人命运放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进行检视，使社会工作拥有一种关注社会公平的反歧视的批判立场，才能够接纳社会处境中的个人独特性，认同“服务对象自决”的原则，真正实现女性的增能。

第二，倡导性别视角。长久以来，传统的社会工作无视男女之间的差别，采取一种无性别的、普遍化的理论建构方式，表面上看，只是忽视了女性的独特经验，但实际上女性自然成了男性的附庸。之所以倡导性别视角，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工作塑造了一种普遍化的、科学的服务逻辑，容易使社会工作者看不清具体服务的社会处境。引入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倡导尊重女性、认可女性的价值、承认女性生活经验的独特性以及由女性自己做出决定等原则。

第三，早期社会工作采取的是一致化的思维方式，将女性视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要求的群体，目的是消除男女之间的性别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认识到女性之间也存在差异，开始放弃一致化的思维方式，采取多元化的分析视角。显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逐渐探索出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逻辑，即注重生活的多样性，在一致中寻求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视角，传递出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即“不同的声音”应该受到尊重和礼遇，这将是平等的基础。

第四，社会性别关系往往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寻求建立并维系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在参与和沟通的方式上有意识地采取“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建立平等的互动和沟通结构，实现个人表达和参与自由。这种平等关系的倡导，其核心是反对传统社会工作所秉持的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反对把普遍化一致化的思维逻辑作为服务的唯一标准。相比于单纯地强调平等理念，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更鼓励在注重平等关系的同时重视女性知识和体验。这是一种观察视角的转变，其核心不是尊重他人，而是尊重他人的生活经验。

四、对中国妇女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妇女社会工作的推进和建设。近年来，本土的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制度与实践体系初步成型：一是各级妇联组织和邻里帮扶的群众组织；二是新兴的吸纳国外理念的专业社会工作组织[6]，不论是制度政策还是个人帮扶层面，均有力地提升了广大女性的福祉。但由于发展薄弱，理论和实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裂和局限。在社工实践中可以发现，妇女服务形式多是群众“喜闻乐见”型的[7]，妇女不同于男性的处境和需求常常被忽略掉，或者“无形”中将女性所处的处境视为理所当然，这就导致很难真正对女性面临的问题做出有效回应。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专业发展不能仅停留在被

动解决问题、简单回应需求，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妇女群体的潜能挖掘和权益维护，因而强化服务的性别敏感，从“问题为本”转向“社会权利为本”，不仅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的需要，也是回应新时代需求的需要。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让传统社会工作开始重新思考案主和问题的本质，对于中国开展妇女社会工作的本土探索和构建具有启发意义。

（一）厘清妇女社会工作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式

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女性为服务对象的领域主要涉及女性社会工作、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其中，女性社会工作最为传统，偏重物质帮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则基于性别视角和结构视角，强调赋权和行动；家庭社会工作注重家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而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女性往往和婚姻、家庭紧密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实践领域中也习惯性地将这三个系统叠加在一起，很难精准地定位服务范畴。主流观点的看法是，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焦点是家庭系统，以纠正病态的家庭结构、重塑家庭系统功能为抓手解决妇女问题。也有一些看法认为，妇女社会工作应关注女性本身，以家庭系统为中心的介入模式很容易压制或忽视个体的真实需求，且容易衍生新问题。如何看到妇女生活的复杂性并致力于满足其真正的需求？恐怕需要从源头上重新定义。而衍生于欧美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已经经历了由非专业到高度专业化的过程，不论是在理论还是技巧方面，均有值得吸收借鉴之处。但是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框架，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水土不服”[8]，因此，推动本土经验与欧美经验的优势互补，厘清妇女社会工作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式，对于搭建系统的社会工作架构尤为必要。

（二）强调性别理念和平等关系的营造

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建构及规范的影响，即使社会工作实践原则是性别中立的，但其产生的认识和逻辑依然潜移默化地遵从这样的规范。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妇女社会工作服务范式中，女性需求往往以“隐而不显”的方式遭到漠视，也容易使社会工作者盲目或偏颇地把社会的“非常态”当作“常态”[9]，进而在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时，往往会忽视女性的处境，如传统社会工作认为，女性更多扮演的是家务劳动者和照顾者的角色。正是囿于传统社会工作理论基于“性别”的本质区分，使得许多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探索存在局限[10]。因此，纳入社会性别视角非常必要，尤其是在关注处于贫困、边缘家庭等不利处境中的女性时，不能将女性与家庭进行捆绑，应致力于生成更趋于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11]，创造更加有益于该群体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与声音

尽管以往的妇女服务实践对于女性处境的改变及女性能力建设均有显著的贡献，但在一些实践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忽视女性独特的个人生活经验，女性服务容易流于表面化，进而陷入“一般化”的服务陷阱，尤其是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而言，实务的回应是非常有限的。必须对统一的、一元化的服务模式保持警惕，其原因在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很难用一个普适化的范畴来对待千头万绪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重视女性独特生活经验，从个人经历去体察其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倡导一种新的社会工作服务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服务不是关注女性案主共同的、普遍性的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独特的、个性化的、多元化的服务，运用女性服务对象自身的经验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改变，通过情境化的实践理念实现对服务对象的增权。

参考文献

[1]LENA DOMINELLI.Betrayal of Trust: A feminist Analysis of Power Relationships in Incest Abuse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1989(19):291-307.

[2] 何雪松 . 社会工作理论 [M]. 上海 : 格致出版社 ,2017.

[3]JOAN ORME.It is Feminist Because I Say So! Feminism, Social Work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the UK[J]. Qualitative Social Work,2003,2(02):131-153.

[4] 童敏 . 社会工作理论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5] 黄丹 . 破除社会工作中的“性别盲”——《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 理论与实践》评介 [J]. 社会工作 ,2016(05):120-124,128.

[6] 卫小将 . 融合与拓展 : 中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研究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02):52-56,126.

[7] 丁瑜 . 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反思 : 基于性别与结构的视角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06):86-98,109.

[8] 卫小将 . 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检视与建构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05):85-96.

[9] 林川 .“缠足女性”调查研究对中国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启示——基于山东省沂源县缠足女性质性调查研究 [J]. 社会工作 (下半月),2010(09):50-53.

[10] 吴越菲 . 从身份政治到话语政治 :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的当代转向及其影响 [J]. 社会工作 ,2017(06):41-52,111.

[11]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 王思斌 .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企改革背景下天然气管道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的优化路径研究

龙美勤

摘要：2019 年 12 月 9 日，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油气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国有企业，天然气管道企业的纪检监察工作肩负着特殊使命：既要通过强化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在投资建设、生产运营全流程中实现保值增值，又要以精准执纪保障党的方针路线在企业经济活动中落地生根，更要通过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筑牢企业健康发展的纪律防线。当前，随着国企改革持续深化、能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天然气管道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趋复杂，既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利益协调难题，也有跨区域管网运营中的廉政风险挑战，更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型违纪违规行为的隐蔽性考验。在此背景下，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以创新思维优化监督机制，以系统观念提升执纪效能，通过精准履职、主动作为，将监督贯穿于管网建设、调度运行、市场开拓等全业务链条，为企业在深化改革中防范风险、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

关键词：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改制途径；加强对策

一、导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国企转型的加速，天然气管道企业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业务模式革新、利益格局调整、治理体系重构的复杂局面。纪检监察监督作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力量，在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改革落地、维护企业稳定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责任与历史使命[1]。当前，天然气管道企业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多重挑战：制度体系与改革进程的适配性不足、监督力量在层级化管理中存在协同壁垒、对专业化业务领域的风险穿透力有限、传统监督手段与数字化转型需求存在落差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监督效能，更可能制约企业改革的深度推进。基于此，本文以天然气管道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企改革的时代要求，探索纪检监察监督体制的优化路径，旨在为企业构建“权威高效、全面覆盖”的监督体系提供实践参考，推动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

二、国企改革期间纪检监察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意义

天然气管道企业具有业务特殊性：覆盖范围广（跨区域管线、场站）、技术密集（管道安全运营、工程建设）、资金规模大（项目投资、物资采购），其改革涉及混合所有制转型、市场化业务拓展、安全生产机制完善等关键领域，纪检监察监督的价值在此过程中尤为凸显。

（一）保障改革方向的“政治锚点”

国企改革的根本前提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天然气管道企业的纪检监察监督通过强化政治监督，可精准对标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对做到“两个维护”、执行重大改革政策（如管网公平开放、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例如，在管道工程招投标改革中，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全程介入，可防止因利益输送导致的“暗箱操作”，保障改革在合规轨道上推进[2]。

（二）防范廉洁风险的“防火墙”

改革期往往伴随着权力运行方式的调整，新业务、新流程可能滋生新型廉洁风险。天然气管道企业的纪检监察监督能够针对高风险领域（如长输管道建设、设备采购、特许经营权审批）建立动态监测机制，提前识别风险点。例如，针对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资产交易”“智慧管网运维外包”等新场景，通过监督流程规范，可防范数据泄露、利益输送等隐蔽性问题，为改革中的资产安全与合规运营筑牢防线。

（三）维护企业稳定的“平衡器”

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天然气管道企业基层场站多、职工队伍分散，若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或利益保障不力，易引发不稳定因素。纪检监察监督通过联动

信访维稳工作，既能推动解决职工关心的职业发展、安全生产保障等问题，又能及时化解改革中的矛盾（如岗位调整、薪酬体系改革引发的纠纷），避免局部问题升级为系统性风险，为改革营造稳定的内部环境。

（四）提升治理效能的“助推器”

监督与治理相辅相成。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梳理监督中发现的管理漏洞（如基层场站“小微权力”滥用、跨部门协作中的流程冗余），可推动企业完善内控制度。例如，针对管道巡检中的“考核形式化”问题，监督结果可直接反馈至管理层，促进考核机制优化，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提升”的闭环，助力企业在改革中构建更高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三、天然气管道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面临的风险挑战

结合天然气管道企业的业务特点与改革实践，当前纪检监察监督体制的风险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监督专业性与业务复杂性的适配风险

天然气管道企业的核心业务（如管道完整性管理、应急抢修、高压管网运维）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廉洁风险常隐藏于技术壁垒中。例如，工程建设中“材料质量与价格不匹配”“施工工艺违规掩盖成本超标”等问题，需监督人员兼具纪检监察知识与行业技术储备。若纪检监察队伍中缺乏懂工程、通技术的专业人才，极易形成“监督盲区”，导致对专业化领域的风险识别滞后。

（二）层级化管理中的协同壁垒挑战

天然气管道企业多采用“总部—分公司—场站”三级管理模式，监督力量分散在各层级。实践中，基层单位可能因“重业务、轻监督”的倾向，对上级纪检监察部署存在“选择性执行”，如问题整改避重就轻、线索移交不及时；而总部监督资源有限，难以覆盖所有偏远场站和野外作业点，导致“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困境。这种协同不足使得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问题（如跨区域管线项目中的利益输送）难以被有效查处。

（三）传统监督手段与数字化转型的落差风险

随着天然气管道企业推进“智慧管网”建设，业务数据化、管理信息化程度显著提升，但纪检监察监督仍较多依赖人工检查、定期审计等传统方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不足。例如，无法通过分析物资采购数据与管网运维成本的关联性发现异常交易，也难以利用管道巡检的物联网数据追溯基层人员履职漏洞，导致监督效能滞后于企业数字化发展步伐。

（四）监督体制与改革进程的动态适配不足

国企改革的深化使企业经营模式持续创新，如天然气管道企业参与的“风光气储一体化”项目、混合所有制公司的股权运作等，均对监督规则提出新要求。若纪检监察体制仍沿用固化的流程（如侧重事后追责、忽视过程防控），未能及时更新监督清单、调整监督重点，将难以应对改革中出现的新型问题，出现“制度空转”现象。

四、天然气管道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挑战，天然气管道企业需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为目标，从体制机制、监督方式、队伍建设等多维度推动纪检监察监督革新，构建与改革进程相适配的监督体系。

（一）巩固拓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强化制度协同

深化体制改革是提升监督效能的基础。天然气管道企业应紧扣党的二十大关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部署，以制度创新打破壁垒，推动监督体系系统性升级。

1. 构建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明确党委对纪检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上级纪委监委—企业纪委—基层纪检组”的垂直管理链条，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业务领导（如线索处置、立案审查以上级纪委批准为主），破解“同级监督软”问题。同时，将纪检监察工作纳入企业改革总体规划，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业务板块调整中同步设置纪检监察机构，确保监督“不缺位”。

2. 完善“大监督”协同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整合纪检监察、审计、法务、财务等监督力量，建立“监督协作区”制度。按管道沿线区域或业务板块（如工程建设、管网运营、市场开发）划分协作区，由企业纪委统筹调配跨区域、跨部门监督资源，实现“室组地”联动监督（如总部纪检室 + 派驻组 + 地方分公司纪检力量联合办案）[3]。例如，针对跨省管道项目，可通过协作区机制统一调取物资采购、施工监理数据，避免因地域分割导致的监督碎片化。

3. 健全动态化制度体系：结合改革进程修订《纪检监察监督工作手册》，及时将新业务领域（如碳交易、氢能管道试点）纳入监督范围，明确监督标准。同时，建立制度“废改立”机制，定期评估现有制度与改革需求的匹配度，如针对“三项制度改革”中市场化用工的廉洁风险，新增《劳务派遣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填补制度空白。

（二）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提升专业化与数字化水平

针对天然气管道企业的业务特点，需推动监督方式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增强对专业领域的风险穿透力。

1. 建立专业化监督清单：围绕高风险环节制定分类监督清单，如工程建设领域聚焦招投标（防止围标串标）、设计变更（防范利益输送）；管网运营领域突出巡检记录真实性（避免虚报瞒报）、应急抢修资金使用（防止挪用）；物资采购领域重点核查供应商资质与价格合理性（防范“质次价高”）。清单需明确监督指标（如招投标废标率、巡检问题整改率），实现“按单监督”。

2. 深化数字化监督应用：建设“智慧纪检”平台，

整合企业 ERP 系统、物资采购平台、管道运维物联网数据，开发廉洁风险预警模型。例如，通过算法分析供应商与企业员工的资金往来、同一施工队承接项目的中标价格波动等数据，自动识别异常线索；利用管道巡检 APP 的定位与轨迹数据，核查巡检人员是否按规定路线履职，实现“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

3. 强化过程性监督：将监督关口前移，对重大改革事项（如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转让、重大项目投资）实行“嵌入式”监督，从方案制定、决策审批到执行落地全程参与，重点审查程序合规性（如是否经党委前置研究、是否履行资产评估）。对高风险岗位人员（如分公司“一把手”、项目负责人）推行“廉政档案动态管理”，记录个人事项报告、信访举报、审计问题等信息，作为任职调整、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三）提升纪检监察队伍专业化素养，夯实人才支撑

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监督效能，天然气管道企业需打造一支兼具政治素养、行业知识、执纪能力的专业化纪检监察队伍。

1. 优化队伍结构：通过内部选拔与外部引进相结合，吸纳工程管理、法律、审计、信息技术等专业人才，形成“纪检 + 业务”复合型团队。例如，从工程建设部门选拔熟悉管道施工流程的人员充实纪检队伍，提升对工程领域风险的识别能力。同时，明确纪检监察人员任职资格（如 5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杜绝“安置性”任职。

2. 政策理论与复杂案件查办，针对基层纪检人员侧重业务知识与实操技能（如管道专业术语、信息化工具使用）。定期组织“以案代训”，选派基层纪检人员参与总部重大案件查办，学习线索分析、证据固定等技巧。

3.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纪检监察人员待遇保障（如与同层级经营管理人员同等薪酬），建立“监督成效与考核挂钩”制度，对发现重大风险、挽回企业损失的给予奖励；对监督不力、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确保队伍“敢监督、善监督”。

（四）深化党风廉政教育与群众监督，筑牢思想防线

监督的根本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需将教育引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1. 分层分类开展廉政教育：针对领导干部，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廉政专题党课强化“一岗双责”意识，利用系统内违纪违法案例（如某分公司经理在工程招标中受贿案）开展警示教育；针对基层员工，结合岗位特点（如巡检员、采购员）编制《廉洁从业口袋书》，通过“班前 5 分钟”“案例微视频”等形式普及纪律要求，明确禁止基层人员收受施工队礼品、虚报差旅费等“微腐败”行为。

2. 拓宽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企业官网、信访平台、热线电话等渠道，建立“一键举报”平台，实现信访线索“线上受理、全程追踪、闭环管理”。同时，定期开展“纪检监察开放日”活动，邀请职工代表、用户代表参与监督检查（如抽查基层场站考勤、物资领用记录），增强监督透明度。对群众举报属实的，及时反馈处理结果并保护举报人信息，消除“不敢举报”的顾虑 [4]。

五、国有企业改革期间纪检监察监督的保障措施

为确保上述路径有效落地，天然气管道企业需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保障体系，形成“制度—执行—反馈”的闭环管理。

（一）压实“两个责任”，强化责任传导

1. 明确责任边界：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将党风廉政建设与改革任务同部署、同考核，党委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定期听取纪检监察工作汇报；纪委履行监督责任，聚焦主责主业（监督执纪问责），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例如，在管道项目改革中，党委负责审定廉洁风险防控方案，纪委负责监督方案执行。

2. 健全考核机制：将“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对发生重大违纪案件的单位，取消班子评优资格，并约谈主要负责人。同时，细化考核指标（如问题整改完成率、线索处置及时率），通过“季度督查 + 年度考评”确保责任落地。

3. 严肃追责问责：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依规依纪追责，如对瞒报线索、压案不查的领导干部，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典型案例在企业内部通报，形成“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震慑。

（二）加强廉洁风险全流程防控

1. 动态排查风险点：每季度组织一次廉洁风险排查，重点关注改革中新增业务（如天然气期货交易、跨境管道合作），通过“岗位自查 + 部门互查 + 纪委督查”的方式，更新风险清单。例如，针对“智慧管网”建设，排查数据招标、系统运维中的泄密风险。

2. 建立预警机制：对风险点实行“红黄绿”三色管理（红色为高风险，需立即整改；黄色为中风险，需限期防控；绿色为低风险，需持续关注），通过“1+X”专项督查（纪委牵头 + 业务部门配合）推动整改。例如，对红色风险点（如某分公司采购审批权过于集中），由纪委牵头制定分权制衡方案，限时完成制度修订。

3. 强化结果运用：将风险整改情况与干部任用、绩效薪酬挂钩，对整改不力的单位或个人，暂缓提拔任用并扣减绩效，倒逼责任落实。

（三）完善纪检监察工作保障体系

1. 保障必要权限：明确纪检监察部门的检查权（调阅财务、业务数据）、调查权（对涉嫌违纪人员进行谈话函询）、处分权（按权限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确保监督“有权威”。例如，在查处管道工程腐败案件时，可依法冻结涉案账户、封存工程资料，不受其他部门干预。

2. 加强信息化保障：投入专项资金建设“智慧纪检”平台，配备数据分析师、信息技术专员，为监督数字化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与外部专业机构（下转 117 页）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权的三维嬗变

邵引印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教育话语结构，推动传统教育观念与传播方式变革。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教育以宏大叙事为主，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易与年轻群体产生疏离，难以实现情感共鸣。本文基于话语权与叙事学理论，沿着“主体—内容—效果”路径，探讨 AI 技术驱动下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转型：主体上从教育者单一话语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建构；内容上由宏大叙事转向情境化、互动性与生成性表达；效果上从被动接受转向追求情感认同与共鸣。同时，研究也关注生成式 AI 可能带来的认知偏差、价值观误差与内容管理风险等问题，进而提出提升教育者 AI 素养、强化技术价值导向、构建伦理监管框架等对策，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权；叙事嬗变；教育创新

一、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技术的快速演进与深度渗透，教育领域正经历由技术革新引发的结构性转型。生成式 AI 具有自然语言生成、情境构建与智能交互等特征，在重塑教育信息传播方式与知识呈现形式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将其引入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不仅推动教育传播手段的更新，更引发教育话语权结构与互动机制的再造。长期以来，传统爱国主义教育依托宏大叙事范式与单向灌输模式，由教师或权威机构占据话语主导地位，而受教育者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这种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暴露出传播效能不足、意义生成单一、情感连接乏力等局限，难以有效回应 Z 世代学习者自主化、多元化与参与型学习需求。在此背景下，借助生成式 AI 实现教育叙事逻辑优化与话语权结构重构，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路径 [1]。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引入话语权理论与叙事学视角，构建“主体－内容－效果”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生成式 AI 参与下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演化机制。在主体维度，研究聚焦教育者、学习者与生成式 AI 之间的权力关系重组，分析由单向支配向协同共建转变的逻辑基础；在内容维度，探究教育叙事从宏大

（上接 116 页）

合作，开发符合行业特点的监督算法模型（如基于管网生命周期的成本异常识别模型）。

3. 强化文化引领：将廉洁文化融入企业精神，通过“廉洁标兵”评选、廉洁主题征文等活动，营造“崇廉尚洁”的氛围。在管道场站、办公区域设置廉洁文化墙，以漫画、标语等形式强化纪律意识，使廉洁从业成为职工自觉行为 [5]。

六、结语

国企改革为天然气管道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对纪检监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纪律部队”，纪检监察部门必须顺应改革大势，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监督难题，以专业化、数字化提升监督效能，以责任落实和群众参与筑牢廉洁防线。未来，天然气管道企业的纪检监察监督需进一步聚焦“国之大者”，将监督工作与能源安全、国企改革、数字化转型等重大任务深度融合，在动态适配中不断完善体系，最终实现“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目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鸣川 . 强化纪审协同监督以监督实效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J]. 水文化 ,2025(06):19-22.

[2] 丁茂瑶 . 国企党建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融合探索 [J]. 中国金属通报 ,2025(06):222-224.

[3] 李梦兰 , 赵鑫 . 财会监督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5(11):131-134.

[4] 任敏 . 严把“四道关口”建强国企基层纪检队伍 [J]. 企业文明 ,2025(05):131-132.

[5] 徐文辉 , 吴维仕 , 甄武警 . 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大监督”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J]. 通信企业管理 ,2025(05):46-49.

（作者单位：国家管网集团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

抽象向情境化、生活化与个性化表达转型的内在机制；在效果维度，揭示教育实践由“理念灌输”转向“价值共鸣”与“内生认同”的范式变革。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阐释，本文旨在揭示生成式 AI 对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的重塑作用与运行机理，探索其提升教育实效性、增强价值认同深度与拓展教育交互边界的路径选择，为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2]。

二、生成式 AI 与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权嬗变的理论基础

生成式 AI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依托大规模语言模型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自然语言生成、语义理解与多模态交互等功能，其应用正不断渗透到教育领域并重塑教育传播机制。从教育话语权的视角看，生成式 AI 不仅改变了教育信息的生产方式，还推动教育主体间的话语结构重组。教育话语权不仅体现语言表达控制力，更关系到教育内容解释权与意识形态引导权。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中心－边缘”式话语结构，教育者和制度主体掌握话语主导权，学习者长期处于被动接受位置。生成式 AI 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封闭格局，使教育内容生成由单中心垄断转向多主体协同，技术由工具属性延伸为参与知识建构的话语主体，同时赋予学习者通过智能交互参与表达与意义共建的可能性，从而推动教育话语权由单向掌控走向互动分配与协同生成 [3]。

从理论根基看，生成式 AI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话语权重塑的机制，可以在话语权理论与叙事理论框架下得到阐释。福柯强调话语是权力运作的形式，表明教育话语不仅传递知识，也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教育话语具有社会整合与身份建构功能，为理解教育话语权结构提供了解释基础。在叙事学视角下，AI 对教育内容进行结构化重组与情境化表达，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参与的碎片化表达，通过智能交互增强学习者的理解深度与情感投入，实现教育传播由单向讲述向沉浸式体验转型，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路径 [4]。

三、主体维度：教育者— AI —受教育者的权力流转

（一）教育者：从单一主导向引导与协同的角色转型

在生成式 AI 深度介入的情境下，爱国主义教育中教育者的话语角色由“单一主导者”转向“价值引导者与协同共建者”。以往依托课堂讲授与教材解读形成的单向传播与解释垄断，已难以适配开放、互动的智能化生态。AI 的加入重塑了话语生产机制，促使教育者从“内容输出”转为“价值把关与过程调控”，在信息整合、语义审辨与情境设计中统筹技术与理念，确保 AI 生成内容与爱国主义核心价值相一致并符合意识形态安全要求。由此，对教育者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标准：既需跨学科的技术理解与数据判断能力，也需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完成价值甄别、意义建构与质量监督。

（二）AI：从辅助工具到教育叙事的中介权力

生成式 AI 正逐渐介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过程，它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工具，而是在教育表达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明显的话语参与者角色 [5]。它能生成内容，这让它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影响力。不过这股力量并不是完全透明或安全的。一方面，它确实拓展了表达方式，比如可以根据学习者的理解水平、情绪反馈或兴趣方向即时生成不同形式的学习内容，使教育表达更加灵活、有弹性，避免过去那种“一种话讲给所有人听”的单调传播方式。但另一方面，AI 并没有价值中立的底色，它所依赖的算法、语料来源和训练逻辑中藏着隐形的倾向性，这些东西一旦进入教育领域，就可能在悄然之间改变教育的应有方向，甚至为意识形态表达带来潜在偏移。技术如果缺乏价值引导，就可能削弱教育原有的立场与使命，这也是为什么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建立清晰的规范边界，让 AI 始终服务于教育，而不是让技术重新制定价值标准 [6]。

（三）受教育者：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与共建

生成式 AI 的加入改变了学习者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位置。过去，他们大多只是听众，现在却逐渐变成了参与者，甚至能和教育者一起“写入”教育内容。学习者不再必须被动接受统一内容，而是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理解节奏，甚至情感倾向去深入探索，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反馈、提问、修正内容，甚至参与共创。这种学习方式打破了传统教育“单向输出”的局面，使教育过程增强了互动性，同时也增强了参与者的情感投入。

四、内容维度：宏大叙事—碎片叙事—交互叙事的演变

（一）宏大叙事的坚守与局限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导的教育过程讲究大格局大叙事大事件，包括民族奋斗史、英雄模范事迹、国家记忆等不同方面，目的在于筑牢学生的基本价值观，进而形成国家认同与感情，它是一个大处着眼和具有权威性的整体，主要的讲述和呈现方式是教材教授式的课堂讲授，尽管相对完整但缺少与受教育者的直接交流，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表达。宏大叙事具有价值引导作用，但是没有融入实际情境，无法促进人的心灵世界的触动，从而也不能在实践中让价值观念真正发生内化，不能突破“认知在场而情感缺席”的局限，无法形成感知－相信－认同的过程，这是宏观教育发挥作用受限的原因之一。

（二）碎片叙事的兴起与挑战

引入生成式 AI 技术，让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形式从单一线性展开的整体描述转向多种维度同时切入的内容构造，由此形成更具弹性的形式结构；依托于算法生成、多模态表达的特点，AI 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和认知程度等特点生成相应的内容片段，如简单易懂的知识卡片、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多感视听素材相

结合的学习资料等，但并不是说进入教育生产的过程中可以让教育者离场，而是应该强化价值把关功能，对生成的内容加以提炼概括，使爱国主义教育仍然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和逻辑性。

（三）交互叙事的生成与价值

相比于以往的灌输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成式 AI 对于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注重互动性，以前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单方面地向学生灌输。但在使用 AI 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在其中不断地参与，从而逐渐形成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再借助情景生成以及对话交互的能力，AI 可以设计出诸如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大家眼前、制作出现实版的数字展厅、提供适合不同学生的更具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推荐等一系列学习模式。交互式叙事使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认知体验相对接，柔性化的价值传播方式使人的情感更多融入其中，能够使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五、效果维度：灌输—共鸣—参与的范式转换

（一）灌输模式的延续与不足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灌输式的，在过去的教育里更多的是课堂教育，主要是通过教材内容开展教育，以及通过一些仪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优势在于统一导向，形成重要的话语权威。但因为缺少了互动性的体验，仅能带给学生知识层面的印象。

（二）共鸣模式的生成与深化

基于情感、情境的生成式 AI 可以给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另一条提升情感共鸣的技术化路径，从提供内容、根据对话内容采用多模态方式构建个性化的内容生成，可以了解学习者所感兴趣的内容以及其当下的情绪，进而帮助教育者把当前的讲授性教学转换为体验性教学。比如：借助 AI 模拟还原历史人物对话，或者生成一些有关红色故事的情景等，可以让学生在沉浸式的互动场景中形成一定的真实体验，让学生成为情感的感知者而不是单纯地做一名听者，最终实现从对知识的认知到感受，再到具体的情感认同。

（三）参与模式的建构与价值

生成式 AI 参与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从灌输式向参与式转变，运用 AI 共创平台和互动式学习平台，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在亲身接触相关素材的基础上，自己主动参与到有关内容的生发和表达上。比如，教师可以借助 AI 自动生成学习笔记、参加历史情景模拟、组织虚拟社会实践活动等，将本身具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纳入教育教学中来，实现从单向的灌输到多向互动的建构，让学生产生价值认同感，使爱国主义教育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认同”。

六、对策建议

要让生成式 AI 真正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是偏离方向或带来风险，仅靠技术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教育者、技术治理和制度规范之间形成合力。首先，教师的角色需要升级。他们不再只是知识的讲授者，也要学会驾驭 AI，具备技术判断与价值把关能力，能够筛选和引导 AI 生成合适的内容，使教学始终保持正确的价值方向。其次，技术平台本身也需要“守纪律”。AI 开发机构必须把内容安全和价值导向写入算法逻辑，在模型训练中强化历史真实性审查，避免娱乐化加工或虚构叙事削弱爱国主义教育的严肃性。第三，制度层面的监管同样重要，需要制定适用于教育领域的 AI 使用规则，明确责任边界，建立内容审查、风险预警与动态监管机制，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与此同时，还要推动教育方式创新，比如将 AI 应用于课堂讨论、研学项目、红色文化体验等教学场景，让技术真正嵌入教育实践，形成“技术 + 育人”的融合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在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让生成式 AI 成为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的助力。

七、结语

生成式 AI 的融入重构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权格局，使教育主体由单一权威走向多元协同，内容表达由宏大叙事转变为碎片化与交互式并存，教育成效由灌输式传递转向共鸣与参与并重。其技术赋能为教育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与情境化传播路径，但同时也伴随着算法偏差与价值异化等风险。未来需在教育者 AI 素养提升、生成内容价值规范与制度监管完善等方面协同推进，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释放技术优势，使生成式 AI 成为增强青年群体国家认同与价值认同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N]. 人民日报 ,2025-01-20(01).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5-04-27(01).

[3] 朱清华 . 全球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跨文化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J]. 科技传播 ,2025,17(04):27-30.

[4] 申峥峥 .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J]. 理论月刊 ,2024(05):141-149.

[5] 陈阳 , 李文俊 . 虚拟现实技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 传播与版权 ,2024(16):88-91.

[6] 康玉洁 , 曾雪兰 . 高校“Z 世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进路探赜 [J].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38(03):27-3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人机协同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内容创制与传播能力提升研究”（2025GXSZ157）。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娜日娜　高丽萍

摘要：立足大历史观视域，本文重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命题，跳出静态孤立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剖析窠臼，将中华文明置于长时段演进与多维度互动脉络中，探寻其文化基因数千年时空更迭里维系动态稳定、实现适应性迭代的深层机理。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只依托核心价值的恒常坚守，更在与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技术条件及外部环境的碰撞交融中，彰显出深厚涵容特质与创新转化张力，这种“变”与“常”的辩证统一，这正是其当代实现“双创”的深层历史逻辑与资源根基。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一、引言

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局限于特定朝代、具体事件、单一思想流派，便难以了解整体脉络、长程发展动力。大历史观核心为将人类历史放于宇宙演化时空下，深入分析多尺度进程关联融通、长时段结构性变迁。把大历史观融入文化研究，绝非单纯拉长考察时限，关键是以“深时间”为标尺，循着文化现象穿越地质变迁与文明起落的漫长轨迹，探寻其生发扎根、沉淀积累，进而顺势完成转化与跨域延展的内在理路[1]。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过，可帮助传统文化大历史考察，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内核是在漫长文明进程中经过反复筛选、试错、调适沉淀的文化基因，与特定自然禀赋、生产生活模式、社会组织形态联系较大，可共同构成稳定格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核心本质为在全新历史时空下调试千年文化基因，使其与变革技术、经济格局、全球文明生态展开新一轮对话，完成创造性重构。

二、中华文化核心架构的稳定性与弹性

中华文化核心为孕育“内核恒定、外延灵动”的立体架构，这一架构既保障中华文明连续性，也为大历史观下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支撑——内核为锚定根脉守本真，外延为顺应变局拓维度，两者共铸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华文化核心架构的稳定性，立足于深层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主要体现为千百年历史凝聚的精神共识，“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和“和而不同”等理念贯穿了历代文明实践，奠定了民族认同精神根基[2]。在制度文化领域，尽管大一统理念、科举取士模式、礼治与法治互补的治理思路具有不同的呈现形态，但核心诉求均为“家国同构”“天下为公”，逐步形成了贯穿历代、维系治理秩序的制度内核。

中华文化核心架构的天然弹性，立足于对多元文化元素的包容吸纳能力，以及在时代变革中的顺势调适能力，这一特质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关键所在。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内多元涵容，在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中坚守自身底色，主动汇入中华文化主干，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二是对外开放兼容，善于吸纳古今外来成果，将其融入自身肌理，蜕变为本土文化，汇入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对时代变革的动态适配能力贯穿古今，从古代“重农抑商”导向、明清商品经济兴起倒逼的文化转向，到近代救亡图存的道路求索、当代深耕“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始终循历史脉络调适表达与路径，于变局中守本、在适配中迭代生长。

三、传承与创新的动态机制

（一）空间维度上的涵容与整合

文化在空间维度的涵容与整合，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路径，其本质是文化在不同地域、族群、文明语境中碰撞、融合，进而完善自身、拓宽价值边界的过程。在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在空间层面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可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3]。

以“大一统”理念为核心，国内空间维度的文化涵容与整合逐步推进，串联起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脉络。黄河、长江流域两大文化核心区，与巴蜀、楚、燕赵、岭南等地域文化相互浸润滋养，在器物打造、制度搭建、思想积淀与艺术创作中，淬炼出兼具共性底色与个性锋芒的文化形态。建筑文化是这份传承的鲜活注脚，北方四合院的规整对称、南方园林的精巧灵动与西南少数民族吊脚楼的实用适配，虽地域风貌迥异，却均扎根“天人合一”营造理念，于空间布局与材质选用上贴合自然本真、适配生活需求，沉淀为中华建筑文化体系中个性与共性兼具的重要部分。中央与地方的文化互动可推动全国文化整合，历代王朝通过礼乐制度、文化典籍、人才跨域流动在各地域文化脉络中融入核心价值理念，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共识。这种整合不消解地域特色，以核心共识凝聚力量，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连续性。

跨文明空间的涵容与整合，底色是开放包容。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文明对话的重要纽带，不仅实现了东西方商品互通，更推动了不同文化理念、艺术样式、科技成果深度交融互鉴，促进中华文化、外部文明相互滋养成就[4]。中国丝绸、瓷器及造纸术、印刷术西传，潜移默化融入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佛教、伊斯兰教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元素东传后，经中华大地本土化浸润打磨与融合重塑，褪去外来印记，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跨文明涵容与整合绝非外来文化的简单堆砌，而是扎根自身文化土壤，对异域文明元素甄别、改造并赋予本土价值意涵，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拓展新边界的同时锚定文化主体性，最终走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创新路径。

（二）时间维度上的损益与跃迁

从时间脉络来看，文化传统的损益、文化形态的跃迁，在中华文化守护根脉、焕发生机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与大历史观下连续性与发展性辩证关系相契合，可依据时代变革实现执行突破，两者相互支撑可促使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以损益、跃迁相辅相成的动态逻辑坚守精神根脉、传承核心基因，根据时代进程发生演变，在古今交融中传承创新。

时间维度损益机制的本质为辩证承接传统文化，在筑牢文化根脉、坚守核心基因中甄别优劣文化，剔除与时代脱节、不符合当下需求内容，推动传统文脉在适配现实中生长。以损益为依据时代需求、文化核心价值不断优化文化形态，在坚守传承根基时主动适配当下的语境，使文化传承具备扎实内核、灵活应变能力，实现中华文化的根脉永续、活力新生[5]。

文化“跃迁”是依据时代变革实现的质性跨越，促使文化形态、传播路径、价值表达升级。中华文化在遭受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外部文明激荡时可突破固有范式，实现突破、跨越式发展，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传统美学的传承、创新相辅相成规律，可通过发展脉络清晰印证，唐宋诗词沉淀意境之美、明清书画彰显笔墨韵味、当下数字艺术为传统元素赋能新表达，其核心均为“意境交融、情理共生”，将文化传承载体从笔墨纸砚、书卷转化为数字画面、虚拟场景，持续传承自然的传统美学。文化跃迁是在扎根传承、坚守核心下的突破，可在顺应历史脉络下适配时代发展，彰显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韧性、鲜活生机。

四、在文明对话与未来指向中创新

（一）文明对话中的主体性阐释

文明对话并非单向输出、被动承接，而是基于平等尊重的双向互鉴，其核心为立足于文化主体性，采用科学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价值，增强创新活力。在大历史视域下，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清醒认知、对核心价值的坚定坚守，可以在文化对话中守住特质、实现价值共存。文化主体性丧失后，可能导致文明对话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误区，或表现为表面文化模仿，导致文化创新失去支撑。

构建自主文化阐释体系在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具有重要作用。西方仅采用片面标签解读中华文化，未深入了解精神内核、核心要义。立足于大历史视角，遵循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脉络、实践历程、理论逻辑构建文化阐释框架，可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话语霸权[6]。聚焦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独特气质进行文化阐释，深入挖掘“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当代价值，帮助世界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应融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立足五千多年文明史梳理脉络，结合当代中国实际解读内涵，杜绝脱离语境的空洞议论与碎片化拆解。

主体性阐释以核心目标为依据平等对话促进不同文明价值的共生，坚守文化主体性主要为在双向交流中践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主动传递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精神特质，避免闭门自守、拒斥外来经验，汲取其他文明中的精华，并完成良性互动，促使文化创新。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构建与中医核心理论相匹配的国际认知习惯阐释框架，避免归为“替代医学”、盲从学习西方医学标准，通过现代医学研究方法强化中医药理论、实践革新，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纽带。该对话模式依据文化主体性核心，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形成良性互动桥梁，立足于自身文化根基，吸纳多元养分完成传统文化创新，推动文化传承、革新，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技浪潮下的伦理调适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持续迭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注入鲜活底气，搭建起适配多元需求的特色载体与高效通路，却也暗藏诸多伦

理隐忧——技术滥用稀释文化表达的深层内涵，数据安全漏洞威胁文化资源存续，算法推荐的闭环效应固化文化认知圈层。立足大历史视野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务必坚守伦理边界不越线，借由中华文化内生的伦理智慧完成精准校准，让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深度相融共生，以科技之力筑牢文化根脉根基，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增效。

以中华传统伦理智慧筑牢科技伦理根基，方能坚守文化创新伦理底线，“天人合一”“中庸适度”“敬德修业”理念，为破解当下科技伦理难题提供了本土文化支撑。在数字文化创新实践中，“天人合一”理念可平衡技术应用与文化本真，有效规避文化核心内涵被稀释、消解的问题；“中庸之道”为技术创新划定合理边界，摒弃形式化创新，杜绝歪曲历史传统的行为；“敬德修业”强化从业者责任担当，让数字文化产品兼具扎实技术支撑与深厚文化温度。

以伦理调适破解技术应用梗阻，方能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拓开通路。数字技术催生的文化浅表化问题，需锚定价值本源引导技术沉潜于文化内核传播，摒弃逐流量、重形式的功利误区；文化资源数字化伴生的数据安全风险，需依托伦理共识与法律体系筑牢防线，厘清产权归属以规避泄露滥用；算法催生的文化圈层固化，需植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质优化逻辑架构，打破传播壁垒。古琴艺术的数字化传播，恰是这份伦理与文化、科技相融的鲜活印证。数字技术将其技法、传世乐谱及核心审美转化为线上课程与虚拟演奏场景，始终锚定“清微淡远”的审美底色与“口传心授”的传承根脉，未因技术改造消解其独特精神质感，实现了技术赋能与伦理坚守的共生共赢。

（三）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性转化

以大历史观为底色审视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未来探索，关键在于立足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人类文明进步诉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基因深植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生活肌理与话语体系，涵养出扎根本土文化根脉、兼具时代特质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转化从来不是古今元素的生硬拼贴与表层勾连，而是锚定历史积淀、现实需求与未来期许的深层关联，对传统文化施以契合时代脉搏的现代性重塑，使其真正成为牵引未来文明笃定前行的重要力量。

面向当代多元实践诉求推进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核心从不是空泛的理论叠加，而是要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核，真正浸润到当代社会政治建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生态治理的实践之中，转化为可落地、可感知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能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低碳的实践遵循，为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厚植文化根基；将“和而不同”“讲信修睦”理念融入社会治理，凭多元共治、柔性化解矛盾的思路凝聚共识，“仁义礼智信”亦为当代道德建设赋能，为核心价值观注入传统文化养分，引导公民树立正向价值取向。

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传统文化的未来创造性转化需深挖内核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以鲜活表达回应和平发展、生态保护、文明共存等人类共同时代课题，在锚定人类共同未来的过程中彰显其独特世界价值。“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深层理念，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文化根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取向能消解文明认知隔阂、滋养多元共生生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底蕴，则为人类抵御风险挑战、探寻永续发展路径提供绵长精神支撑。这样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核心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沃土、筑牢精神根基，同时逐步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阶的重要力量，在未来文明迭代进程中，悄然释放其无可替代的独特文化价值。

五、结语

站在大历史维度回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就是绵延数千年未曾断裂的文明实践，其底层基因自带的动态稳定性与强时空适配力，正是它守住核心价值本真、随历史语境流转不断自我革新、丰盈完善且完成再创造的关键所在。身处民族复兴与世界百年变局交织激荡的新境遇，唯有摸透这一长程历史逻辑，方能以从容不迫的创造性实践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焕新，为民族复兴夯实精神根基，亦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丰富文明宝库奉上独特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1] 秦承明 .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2):54-60.

[2] 欧庭宇 .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分析 [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5,34(01):49-56.

[3] 史敏 , 鲁梦 . 大历史观视域下“第二个结合”的主体性向度——基于主体自觉、价值引领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J]. 甘肃理论学刊 ,2025(05):47-55.

[4] 张杰克 . 大历史观视域下“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的三维透视 [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2):11-20.

[5] 刘欣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内涵、实践进路及其当代价值 [J]. 劳动哲学研究 ,2023(02):322-333.

[6]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多维透视研究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05):1-7.

（作者：娜日娜，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高丽萍，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旗指引下高校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边玉洁

摘要：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华章之时，新时代青年不仅要脚踏实地，更要拥有敢于拼搏的精神。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高校大学生作为民族未来事业的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关键是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的培育。党旗是方向的象征，也是吾辈心之所向。文章首先阐释了青年担当与使命的逻辑内涵。其次，分析当前高校在党旗领航下培育大学生使命担当的现状。最后，本文重点从榜样示范、知识引领、使命铸魂、信仰筑基四个维度，构建党旗指引下高校大学生践行使命与担当的多元化路径，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及引领学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理想信念；使命意识；红色血脉；榜样示范

一、“青年担当”与“大学生使命”的逻辑内涵

（一）概念界定

“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党的方向、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1] 关于大学生使命担当的内涵，“使命”是指个人或群体被时代、国家和社会所赋予的重大责任和任务。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的使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勇于担当，竭力提升自己，做时代新人，不负时代，不负党和人民的殷殷期盼。“担当”则是指愿意承担，并具有能够肩负历史使命的勇气、力量和行动。它要求大学生不仅要有民族忧患意识，更要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践品格，在学习和未来的工作中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2] 民族复兴需要每个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去支撑我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

（二）领航青年

“党旗红”引领“青春蓝”。党旗是大学生确立使命担当的“心之所向”。党旗所指引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广大青年学生标记了成长成才的青春坐标，使他们牢记为国为民的使命。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青年教育的突出位置”[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饱含深情地留下激励亿万青年的名言。

党旗领航是培育大学生担当意识的“力量之源”。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辉煌史诗。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红色基因、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疫精神、红岩精神等，是激励大学生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大学生能够扛起历史责任，不忘来时路，坚定信心跟党走。大学生的使命担当是党旗领航效果的“实践之基”。特别是大学生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自觉融入日常学习和未来事业中，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领域踔厉奋发，便是“党旗”开花结果的生动体现。大学生的主动担当，反过来又为党旗增添了新的青春底色。

二、党旗领航下大学生使命担当意识培育的现状

近年来，各高校在“党旗引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加强学生党建工作、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广大青年学子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然而，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此项工作依旧面临多种挑战。

（一）主要成效

初心如炬，党建引领理想信念教育主渠道不断巩固，学生党建工作质量稳步提升。学生党员的发展、教育和管理日益规范化，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育人功能得到重视。通过举办红色文化节、榜样人物评选、理论宣讲等活动，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高校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其价值取向、政治觉悟和担当精神，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更好引领高校大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明确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并坚定付诸实际行动，成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的育人体系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青年，用党的优良作风影响青年。本研究立足于破解这一现实问题，以使命责任为落脚点，系统阐述在党旗的指引下，如何有效激发和培育高校大学生的担当精神。这不仅具有深化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内涵价值，更具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现实意义。

（二）价值意蕴

青年担当何为？新时代青年应当赓续红色血脉和传承好党的优良作风，以身作则，更应练就过硬本领，坚定理想信念，把对先烈的敬仰转化为奋斗的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4] 多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把党课融入实践之中，也是加强党性教育的基本途径。学生参观红色纪念馆时，通过工作人员生动的讲解让他们仿佛穿越时空，从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到军民同心的坚守奋战，从根据地建设的艰辛探索到革命先辈的热血担当，使学生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在重温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的过程中，红色精神在每一位学子心中深深扎根，凝聚起青年一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使命担当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5]。青年思想活跃，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党旗指引下的青年使命担当意识能够激发青年的责任感，使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大学生还应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青春和汗水践行新时代青年学子的责任与使命。“高校应当站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高度，发挥大熔炉作用，用主流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生头脑，让青年一代从理想信念上、思想道德上、行为方式上辨得清是非、经得起检验，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6] 要增强党旗指引下大学生的使命责任感，必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塑造”与“实践引领”的转变，构建“榜样示范－知识引领－使命铸魂－信仰筑基”多元路径。

三、党旗领航下高校大学生践行使命与担当的路径

（一）榜样示范：坚持崇高的价值追求感党恩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参观革命遗址和烈士故居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就没有使命担当的自觉和执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高校大学生应该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向优秀榜样自觉看齐。采用“问题链 + 专题化 + 提问式”教学模式，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课堂辩论赛等方式，将党的科学理论讲深、讲透、讲活。学习那些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的英雄模范的光荣事迹，引导青年学子在理论认同中坚定信仰，勇于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在追求个人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团、举办经典文献读书会、排练党史舞台剧、参观革命旧址等，让历史“开口说话”，让史料活起来，不断增强党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学生在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中，深刻理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而自觉赓续红色血脉，涵养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传承红色精神，更加系统了解党的历史和性质。

以“历史脉络小切口”撬动“实践品格大成效”，使高校学生进一步理解党的科学理论，增强对党的尊重和信仰，让党课更能入脑入心。高校青年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才能以实际行动实现人生价值。

（二）知识引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心向党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是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人以学而立，立以德为先。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要求青年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以适应知识更新迭代和技术发展。“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要实现从知识讲授到精神内核的转化，提高青年内心认可度。通过共产党员网进行党的相关理论的学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关键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重要任务，花时间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理论学习上，要学懂弄通做实，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要学而信、学而行、学而用。让

学习成为生活习惯，让拼搏进取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的才干成为青春激扬的能量。

以文化人，润物细无声。校园文化环境是培育使命担当意识的沃土，可设计开展“党旗领航·青春告白”等红色主题教育。挖掘校史馆资源和创建党建文化长廊，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创作贴近学生自身实际、形式多样化个性化的红色文化产品，使“党旗红”成为校园文化的底色。青年既是理想路上的追梦者，也是圆梦人。利用“学长进课堂”的形式，宣传身边青年榜样，引导学生发现身边可学习的优秀榜样，如三好学生、自强之星、优秀党员等。通过“榜样力量”宣讲活动、优秀事迹报告会等形式，用同龄人的故事鼓励同龄人，营造“崇尚榜样、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进取之心。为使学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引导他们通过“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面对新时代对大学生提出的新要求，青年学子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培养问题意识。

（三）使命铸魂：追求高尚的人生目标听党话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实践是检验和深化理论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练就过硬本领的课堂。要艰苦奋斗就要做到吃苦耐劳，也要实干和拼搏，肩负时代使命同样需要奉献精神。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要学习艰苦朴素的精神，加强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引领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远大理想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奋进潜力，给予大学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雨的精神动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7] 完成时代使命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经历挫折、困难是不可避免的，青年在知行合一中善于担当，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依托“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创新党课内容和形式，组织学生参观革命老区、博物馆、附近社区，开展深入乡村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眼中所见、路上所闻、亲身感知，感悟新时代，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明确自身肩负的责任。鼓励和支持学生党员、团员带头组建项目团队，围绕生态保护、扶贫助农、社区治理、科技创新等社会需求，开展志愿服务和创新创业活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实现从“担当何为”到“自觉担当”的转变。

（四）信仰筑基：锻造求真务实的作风跟党走

补足精神之钙，砥砺复兴之志。在学生群体中发挥学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可通过手抄党章，更好地理解党的章程，增强使命感。以初心敬党心，学生党支部不仅成为发展党员的平台，更成为凝聚青年、联系青年的核心组织。党性强则作风硬。回顾百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走向天安门，从兴业路迈向复兴路，历经磨难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彰显了千千万万党员初心如磐的政治本色。高校青年学子不论是投身于脱贫攻坚还是在乡村教育中发光发热，去锻炼和奋斗都是为了心中最初的信仰。

讲好党史故事。高校青年学子一方面要认真刻苦学习，以青春守好盛世之中华，另一方面更要以强国为己任。要注重培养学生坚韧的意志，让他们能够在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同时，改革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引入思想品德、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考核内容，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激励机制。这些举措能够培养大学生不怕艰难险阻的乐观精神，使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事。

青年有担当，国家就有希望。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高校大学生使命在肩。青年群体是国家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力量。相信在党旗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必将在新的征程上越走越远。新时代青年应当在奋斗中筑牢信仰之基，以青春之力书写时代篇章，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展现身为青年的担当作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2] 孔祥慧 , 李新仓 .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09):134-138.

[3] 段妍 . 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与现实启示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08):9-14.

[4]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N]. 人民日报 ,2019-11-13(06).

[5] 吴铁坚 . 知行合一视域下增强大学生使命感教育路径探析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1(10):21-26.

[6] 邹德文 . 论高校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使命担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J]. 党政干部论坛 ,2014(07):14-16.

[7] 田震 . 论新时代大学生使命教育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0(05):29-3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建专项课题“专题二：面向未来，领航青年——党旗的指引”（ZHDJKT2022002）；2023 年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课题“湘籍早期革命先驱事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ZHKT2023-001）。

（作者系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提升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力“微策略”实践研究

李　艳

摘要：目前，中小学校普遍推行校长负责制，而在此体制背景下学校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力缺失已经成为阻碍党建和教育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力较弱，致使党组织参与学校治理的功能削弱，制约了教育发展与政策执行。实现党建和教育深度融合需要增强学校党组织书记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保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校内得到切实落实。为此，研究主要集中在“微策略”的执行途径上，系统设计了涵盖政策研修、思想引领和执行优化等维度的五项轻量化策略方案。研究发现，这样不仅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创新能力，而且进一步确保了中小学党组织书记在政治领导方面的持续进步。

关键词：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微策略；实践研究

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念养成的重要阶段，中小学党组织书记在基层治理中处于核心引领地位，其政治领导力直接影响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成效。目前传统领导力提升模式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对基层治理现实情境结合程度不高。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一个“情境化微策略”框架，目的是通过实际的操作场景，有效地解决中小学党组织书记在提高政治领导能力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期对中国特色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支持。

一、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要素

（一）坚持现代化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现代化办学方向指引下，中小学党组织书记的政治领导力建设必须以国家教育方针为指导，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具象化为办学实践。书记在规划“五育并举”和“双减”政策教育改革措施时，不仅需要紧密结合国家的战略需求，还需要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去寻找具有特色的教育发展方向。在执行层面，书记要主导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炼到课程建设、教师培养以及校园文化的具体维度上，保证党的教育主张能够深入贯穿教育教学过程。如通过建构“大思政课”，推动思政课程和学科德育及社会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健全全员导师制度来达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的目的[1]。这一方向把控不仅要有宏观视野支持，更要考验书记是否能把政策要求落实到教育行动中去。

（二）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认识

理论武装工程为增强政治领导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中小学党组织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要以统一思想共识为核心任务，努力建构系统化学习机制，促使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师生群体的学习理念。具体来讲，要构建多层次学习架构：针对党员干部群体要进行专题研讨与系统化理论培训以加强他们理论素养的培养；针对教师这一特定群体，我们应当组织一系列以“理论加实践”为核心的研修活动，以推动他们在教育和教学方面更新观念；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群体，我们可以组织以“青言青语”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并用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解释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就创新学习方式而言，党组织书记要重视寓教于乐，以情景模拟党课、理论辩论赛为互动方式，增强学习活动吸引力。同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广大师生把理论知识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本领。

（三）增强组织执行力，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组织执行力作为政治领导力检验的现实标准，需要书记建构科学有效的决策执行机制以保证党的教育方针深入人心。因此，书记应建立“目标分解—责任落实—过程监控—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体系。书记在设定教育目标时应将学校发展目标与党建工作目标有机融合；在落实责任时应明确党组织会议与行政办公会的议事边界，形成“党政分工协作”的良好格局；在过程监控环节建立重点工作台账，并对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特别是在危机应对中，书记应发挥主心骨作用，建立平急结合的应急机制，通过日常演练提升队伍应急能力，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形成“决策—实施—反馈”的响应链条。比如对校园安全和舆情处置中存在的风险点预先做出分级响应预案以保证关键时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行。

二、政治领导力提升的“微策略”体系设计

（一）把握教学方向，强化政策学习

中小学党组织书记在教学方向上处于引领地位，需要借助精细化和场景化政策学习机制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可操作性教学实践中，以把握教学方向。“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微日志”是书记日常政策学习的工具。日志设置“政策研读”“形势研判”“决策校准”三大专栏，形成“学—析—练”的动态循环[2]。在“政策研读”部分，书记需要详细记录当天学习的党的教育政策的原文和核心内容，特别是与学校实际情况紧密相关的部分，例如“双减”政策中对作业管理的明确规定；在“形势研判”栏目中，书记应综合区域教育动态，师生家长的反馈以及其他外在信息对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如课后服务资源匮乏和教师工作量过载；在“决策校准”栏目中，书记根据研判的结果，提出教学管理调整的方向，包括优化课后服务的课程结构和确立教师弹性坐班制。

另外，“红色灯塔”微课堂为书记和所有教师提供了一个政策解读的平台。书记要用好每天十分钟的晨会，用好“1+1”的模式：前面五分钟学习最新的教育方针，后面五分钟结合校园案例分析政策内涵。例如，在解读《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这篇文章时，书记可以选择本校的“校园责任田”项目作为研究案例，探讨将政策中“劳动教育融入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要求转变为“栽培—经营—采收—共享”的完整课程结构。书记设计微课堂时应遵循“三贴近”，即贴近教学场景，精选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碰到的典型问题；紧贴师生需要，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预先搜集政策理解中的困难，比如教师在“思政课整合建设”中存在的疑惑；紧贴发展实际，把政策要求和学校每年的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比如把“教育评价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的优化联系起来。通过高频率和短时间的沉浸式学习，教师逐渐消除了对政策的理解盲点，从而为教学方向的控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开展思想教育，组织集体备课

考虑到各个学科和学段的独特性，书记可构建一个“学科融合课—实践拓展课等”的双层备课结构，从而确立理论的层次化渗透途径。在学科融合环节，构建“理论+学科”的双主题备课活动。由教研组负责，每学期需要开发至少两个跨学科的融合课例。例如历史组和美术组可准备“长征精神”专题课程，历史教师阐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美术教师引导学生制作“新长征”专题版画等，做到了价值引领和学科素养两方面的提升。在实践拓展课中，可与校本课程、社团活动相结合，开发“行动化”的理论教育模块。如思政教师和劳动教育教师一起准备“乡村振兴研究”课题，引导学生到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进行参观，从实践中领悟“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班主任与心理教师设计“青春向党”主题班会，通过情景剧演绎“请你放心强国自有我”的青春誓言[3]。

创新“党政干部+学科骨干”双导师机制，通过“理论导师讲方向，学科导师授方法”的协作模式，破解理论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难题。理论导师，如党组织委员提前解读党的最新政策，标注与学科教学的关联点。例如在备“生态文明”主题课时，理论导师提供“双碳”目标政策文本，学科导师，如地理教师可据此设计“校园碳足迹测算”实践活动。双导师共同设计教学目标和评价量表，如在备“法治教育”单元时，理论导师明确“依法治国”理论要求，学科导师则构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法律条文的运用”三层教学结构，确保理论要点转化为可观测的学习行为。

（三）优化执行步骤，前置民主讨论

针对“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重要干部、重大项目、大额资金事项，设计“三步闭环”议事流程图，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步骤。第一步是议题提出：由科室或教师代表递交议题申请并填写《议题申报表》，以清楚事项的来龙去脉、预期目标和对风险的初步评估。比如在申报更新校园安防系统工程的时候，需要附上已有的设备故障率资料和预算依据等。第二步是风险评估：建立以法律顾问、财务人员和教师代表为主体的评估小组对《风险评估报告》进行符合性、经济性和可行性三维度评估。如在学校审查“课后服务收费”的过程中，评估团队注意到原有的方案可能与“双减”政策中的“公益属性”相违背，这促使了方案向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向进行调整。第三步是民主讨论：召开专题论证会，按“提案人的陈述—参会者的询问—自由辩论”三个环节展开。如讨论“校服购买计划”时，家长代表提出“提高环保面料的比重”的建议，经辩论后被纳入最终方案。

为了防止书记的“先入为主”态度对民主讨论产生不良影响，学校可制定书记“末位表态”原则。在决策会议上，书记必须在其他成员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才能进行发言。如在学校讨论“职称评聘计划”的过程中，有5名教师代表首先提出了“加大班主任工作的权重”等多项建议，书记在综合各方意见后，最终提出了“分类评价”的改进方案。书记的发言必须涵盖“意见汇总”“争议焦点”和“决策建议”这三个核心要素，并且不能直接否定之前讨论的成果。

如在审议“研学的行程”时，书记汇总家长“安全顾虑”、教师“教育价值”等观点，提出“按年级进行线路设计”的折中方案。对书记末位表态形成的决策，建立“谁决定，谁担责”的追责制度[4]。如在执行“智能化教学设备的购置”决策时，出现了兼容性问题，因此书记需要在教代会上明确提出改进方案。

（四）加强团队合作，建立反馈机制

为了解决教师队伍在政治修养和专业技能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可构建“书记 + 年轻教师”和“书记 + 学科组长”的双向配对机制，以实现思想导向和专业成长的双重提升。书记与青年教师建立“1+N”结对关系，通过月度政治理论共读、季度职业规划面谈、学期教学现场指导、年度师德案例讨论、结对期成果展示等措施来强化思想引领。例如，书记在结对中发现青年教师存在“重教轻育”倾向，通过组织“教育的初心”主题沙龙，引导其将思政元素融入物理实验教学。书记与学科组长形成“课程思政共建小组”，重点破解“学科教学和思政教育相脱离”难题。在结对的过程中，书记负责提供政策的解读和价值方向的控制，而学科组长则负责具体的教学设计。例如，在书记的指导下，语文学科组长将《岳阳楼记》的教学与“家国情怀”的培养相结合，开发了“经典诵读—历史溯源—当代价值”的三阶教学模块。

为破解学校治理中意见反馈不畅、响应不及时、闭环不足等问题，借鉴多元联动经验，构建覆盖学生、教师、家长的“线上 + 线下”多渠道痛点反馈机制，通过“多元收集—分类处置—公开反馈”实现闭环管理（注：当前系统暂未自动归类，需人工梳理）。线下设实体意见箱、定期开展师生面对面交流，开设意见信箱接收书面及电子反馈；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家校通开通匿名通道，畅通学生提案渠道。由书记牵头联合各部门，将诉求人工归为即办类（7 日内解决）、规划类（纳入学期计划）、解释类（10 日内反馈），明确责任与时限。每月通过公告板发布《痛点解决情况》，公开问题、方案及进度，接受监督，确保诉求处置透明可追溯。

（五）依托名书记工作室，深化传帮带赋能

以“广东省名书记工作室”为核心引领，联动天河区各名书记工作室，以“传帮带”为核心抓手，整合优质资源、搭建实践平台、聚焦能力提升，通过个性化、精准化培育举措，破解中小学书记政治领导力提升瓶颈，推动书记队伍专业化成长，实现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名书记工作室坚持“理想共生、智慧共融、成果共享”理念，立足“示范高地、创新工坊、孵化中心、辐射源头”四大定位，将传帮带工作贯穿书记培育全过程，精准匹配书记发展需求，实现个性化赋能。

例如，天河区某名书记工作室实施“1+N”个性化带教机制，由工作室主持人对工作室学员书记开展“画像”问诊，精准掌握其特长、短板与发展需求，量身制定个性化成长方案，开展一对一精准指导。针对新手书记重基础培育、骨干书记求突破提升、资深书记强示范引领的差异化需求，工作室邀请教育领域党建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围绕党建与教育教学融合、学校治理等难点问题“把脉问诊”，明确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同时，搭建“学—研—践”闭环体系，由工作室牵头组织书记参与专题学习、跨校调研、联合党建等活动，带领书记走进工作室成员校开展实地指导，在真实治理场景中锤炼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各名书记工作室聚焦党建实践难点，构建精准化问题解决机制，通过集体会诊、项目孵化等方式，破解书记在党建融合、校园治理中的困惑[5]。工作室邀请专家导师开展专项诊断，针对不同学校书记提出的党建品牌创建、青年教师培养、非遗课程传承等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书记在破解难题中提升政治引领能力。此外，由天河区某名书记工作室牵头搭建校际联动与资源共享平台，组织书记开展“点对点”深度互访、项目共建，挖掘培育内部典型，举办经验分享会，推广可复制的党建工作经验，形成“传帮带、共成长、同提升”的良好生态，切实通过天河区名书记工作室的辐射引领，全面提升中小学书记政治领导力，筑牢党建引领教育发展的根基。

三、结语

中小学书记的政治领导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落地见效，本文提出的“微策略”兼具低门槛、高适配的显著优势，可进一步迁移应用于小规模学校党建、民办学校党组织建设等不同场景，成为党建引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施抓手。未来研究将聚焦 AI 技术在党建工作中的赋能应用，同时深化名书记工作室的辐射引领作用，通过定期开展主题沙龙、专题汇报、经验交流等活动，整合优质党建资源、凝聚书记成长合力，推动中小学书记政治领导力建设提质增效、迭代升级。

参考文献

[1] 李政涛 . 教育强国建设，中小学书记校长何为？[J]. 人民教育，2024(Z2):17-18.

[2] 于维涛 . 新时代中小学书记校长政治能力生成发展的五重逻辑 [J]. 人民教育，2024(Z2):19-23.

[3] 管杰 . 提升中小学书记校长政治执行力的路径思考 [J]. 人民教育，2024(Z2):33-35.

[4] 褚宏启 . 中小学书记校长需要提升五个领导力 [J]. 中国基础教育，2024(04):1.

[5] 司晓宏，魏平西 . 中小学党组织书记领导力的价值意蕴、构成要素及提升路径 [J]. 中小学管理，2023(07):9-13.

（作者系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建干训部副部长）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分析

谢英霞

摘要：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产业体系跃升与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重组的重要技术力量，其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上，更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再平衡、要素组合方式的重塑与创新生态的加速形成之中。随着算法性能不断强化、数据要素加速聚集、算力基础持续扩展，产业链关键环节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延伸，经济增长模式也呈现出由粗放向精细、由量扩张向质提升的深刻转向。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间形成协同效应，使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为坚实，并推动整体社会系统迈向更加包容、高效与可持续的未来，展现出更强发展韧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协同路径

一、引言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产业组织方式与经济社会运行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其触达范围由生产端扩散至消费端，再延伸至治理端，促使要素结构的调整更为迅速，产业链条的联动更具弹性，而发展动力也由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以技术积累与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模式。经济体系在智能技术的牵引下形成新的增长曲线，社会服务体系亦呈现出更高的精准度和包容度，治理机制因数据流动的加速而更加敏捷。人工智能融入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既引发新的制度需求，也带来结构性挑战，但其推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已日益清晰。

二、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发展基础

（一）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内生机制

人工智能在产业体系中的渗透，使原本固化的结构呈现出更高的灵活度与适应性，生产要素由此获得重新组合的契机，资源流动也不再受限于传统模式，而是在算法、数据与算力的联合作用下呈现出更加高效的配置格局[1]。企业在智能分析的辅助下能够更快识别价值洼地与潜在风险，产业链条因预测能力的提升而更加稳定，供应体系因智能调度而减少波动；由此形成的结构调整不仅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也加速行业由低端加工迈向智能制造与高端服务的轨道，使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得以强化。

（二）人工智能重塑生产方式与技术体系的驱动力

在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孪生技术的支撑下，生产方式出现显著变革，流程管理由线性结构向动态结构转向，制造过程的响应能力因实时感知而显著增强，质量控制也因智能识别而更趋精准。人工智能介入研发环节，使创新过程呈现更高效率；介入制造环节，使设备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介入流通环节，使供需匹配更具时效性。生产体系在这种多维度重塑中形成新的技术框架，柔性化、绿色化、智能化的特征不断凸显，为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三）人工智能促进产业创新生态构建的系统条件

围绕人工智能形成的创新生态，往往以数据资源为底座、以人才结构为支撑、以资本投入为牵引，再由技术平台将多方力量编织成协同网络，使创新活动摆脱单点突破的局限，转向复合式共进的结构[2]。科研机构的理论探索、企业的场景应用、平台的资源整合在互动中形成正向循环，新技术得以快速转化，新模式得以扩散应用；这种生态的成熟，使产业具备持续升级的能力，也使智能化发展不再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依托整体系统的联动来保持长期活力。

三、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逻辑

（一）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协同机制

人工智能在经济系统中的嵌入，使增长动力的生成方式出现深层转变，传统依赖资源消耗与规模扩张的模式逐渐让位于技术驱动、知识密集与效率导向的结构，产业活动因智能推演而更具前瞻性，企业经营

因数据洞察而更为精细，市场运行因信息水平提升而展现更稳定的节奏。资源要素在算法引导下向高效部门与高附加值环节集中，生产率水平在多维度优化中不断提升；行业内部的分化格局随之调整，具备创新与数字基础的主体更易形成竞争优势，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取向进一步凸显。宏观结构的演进伴随微观效率的提升共同展开，使人工智能成为引领经济形成新增长曲线的重要力量，而这种增长并非量的累积，而是结构跃迁与能级提升交织而成，展现出更强的可持续性。

在关键产业领域，人工智能的介入提升生产链条的耦合度，能源、制造、物流、交通等行业在智能技术支撑下形成新的运行范式，预测能力增强了产业链韧性，调度能力的提升减少资源浪费，价值链的延展带动上下游协同创新。综合效应随之显现，使经济系统运行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加多元，质量效率导向愈加突出，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逻辑

社会治理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出现新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模式，信息在空间与部门间的流动速度加快，社会需求的识别更加及时，公共资源的配置因此更具针对性，使治理体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敏度与适应度[3]。治理主体在智能分析的辅助下能够捕捉风险的早期信号，也能够对多层级、多场景的社会问题形成更清晰的结构性判断；数据链路的贯通，使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逐渐弱化，协同决策与联动响应得以高效运转。治理体系的科学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随之提升，社会运行的秩序更趋稳定，治理效能也因技术介入而呈现持续增强的态势。

在人口流动、城市管理、公共安全、民生服务等复杂场景中，人工智能以其感知、识别与学习能力构建起新的治理工具体系，使社会系统在不确定环境下能够保持动态平衡。智能预警减少风险扩散，智能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度；城市运行管理因数字底座的强化而更具透明性，基层治理因智能平台的推广而更具包容性。治理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也在技术推动下变得更为顺畅，公众参与的路径更加多样，治理过程更加开放协同，使社会运行呈现出更高水平的有序性。

（三）人工智能促进公共服务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协同效应

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使优质资源的流动更加自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覆盖度随之提升，民生体系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教育领域在智能技术辅助下形成多元化学习渠道，学生的学习节奏与能力结构能够被更准确识别，资源配置由粗放转向精细，教学质量因此更具稳定性；在医疗场景因智能诊断与辅助决策的加持而提升效率，基本服务的普惠性与可及性显著增强；在交通与公共管理中，智能调度使运行体系更加顺畅，公共体验因此更加安全便捷。

公共服务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不仅获得功能上的扩展，也呈现出结构上的再造，服务体系从单向供给向交互式链接转型，服务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形成新的匹配关系，民生福祉的改善由点状突破扩展为系统升级。随着智能场景不断丰富，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等过往难以充分触达的对象也能获得更加平等的资源，社会整体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因此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所形成的这一系列积极效应，使公共服务体系迈向更高的质量层级，也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基础。

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

（一）构建智能产业体系引领产业链高端化路径

智能产业体系的形成，是产业升级迈向高端化的关键支点，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4]。人工智能被嵌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使技术、数据与生产要素能够产生更紧密的耦合，进而催生新的生产模式和价值增长点；当智能制造、智能装备与智能材料形成协同体系时，产业体系的结构不仅更具韧性，也展现出更强的延展能力。许多行业在迈向智能化过程中逐渐形成面向高端环节的战略布局，研发环境更加开放，生产体系更加敏捷，企业竞争力也因智能技术的嵌入而持续提升。

为使这一高端化趋势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需要在关键产业深耕智能装备与平台体系。例如，有制造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中引入分布式控制平台，使原本分散的设备能够在统一调度下协调运行，生产节奏因智能调控而更为均衡；与此同时，引入的预测性维护系统依托设备数据构建模型，使潜在故障得以提前识别，保证生产线长周期稳定运行。这一模式不仅减少维护成本，也提升产品一致性，为企业向高端市场拓展提供可靠支撑。又如某先进材料企业在智能设计平台上搭建材料数据库，通过学习算法对多种配方组合进行推演，使新材料的实验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周，研发效率显著提升，产业链上游能力由此得到强化。类似实践说明，智能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推动产业链迈向高端化的重要路径，也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替代的增长引擎。

（二）完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支撑经济社会智能化路径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要素。要让人工智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带动作用，建立规范透明而又灵活高效的数据治理体系至关重要。数据在采集、存储、开放、使用、交易等环节中涉及多主体、多场景，其流动方式直接影响智能系统的性能，也影响产业、

治理与民生体系的整体运行质量。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数据价值得以充分释放，同时保障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与制度稳定性，为智能化发展提供制度底座。

在数据要素治理的实践中，更可见其对智能化水平提升的现实牵引作用。某数字经济示范区在构建数据治理平台时采用“一体化采集、分级式共享”的框架，用以解决跨部门数据壁垒问题；平台对不同主体的数据权限进行动态调整，使高频业务能够快速调用所需数据，同时在敏感数据处理上增加加密与访问审计功能，确保安全边界清晰。借助这一体系，区域内企业在供应链协同中的预测能力明显增强，公共服务部门的响应速度也显著提升，智能化治理的整体效率由此跃升。又有地方探索数据要素市场，通过为企业建立数据资产评估、流通与定价机制，使数据真正具备“可交易”的属性，企业在研发与运营上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数据价值的释放而大幅提升。这些实践说明，数据治理体系的完善不仅关涉技术管理，更关涉制度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智能化进程的重要路径。

（三）构建跨领域协同创新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路径

跨领域协同创新体系的塑造，是人工智能引领产业升级并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核心意义在于打破行业间的技术壁垒，使科研力量、产业资源与公共部门形成具有流动性与延展性的共同体，使创新活动由分散走向聚合，由局部改良迈向全局优化[5]。随着数据要素的广泛流动与智能平台的不断扩展，创新体系愈发呈现网络化、开放化的特点，既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更短周期内完成试验验证，也使产业应用的扩散速度显著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所承担的角色介于枢纽与引擎之间，一方面连接着不同领域的能力要素，另一方面推动协同结构不断生长，使产业结构、治理结构与服务结构在动态调整中走向更高水平。

在产业实践中，跨领域协同的成效已经显现。例如，有装备制造企业在推进机器视觉技术落地时，依托高校算法团队构建试验验证平台，将复杂的视觉识别任务拆解为多个可并行优化的模块，并在实验线反复迭代后形成稳定的模型结构；企业再借助自身对生产场景的理解，对算法模型进行针对性压缩与重构，使系统可以在约束的硬件条件下高效运行。模块化重构完成后，企业将其嵌入质量检测环节，借助设备的实时采集能力与模型的快速推演能力，使检测精度显著提升，生产节奏更加顺畅，维护成本亦因预测功能的加入而大幅下降。此类经验表明，跨领域协同不仅提升技术成熟度，也创造出面向高端环节的新增长空间，使人工智能真正融入产业体系的深层结构。

随着智能时代的持续演进，这一协同体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落地的速度与深度，也体现在其对产业链韧性、治理体系适应性与社会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中。人工智能在多领域交汇处形成的复合能力，使产业升级不再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依托多主体互动与多资源融合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使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为厚实、路径更为清晰，也使经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展现出更强的弹性与生长性。

五、结语

人工智能的持续深化，使技术进步、产业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关系，高端化与绿色化趋势在智能驱动下不断显现，创新动力也因多领域要素的汇聚而愈发充沛。随着智能体系的完善、数据结构的优化与协同机制的成熟，经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展现出更强的韧性与扩展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秩序亦由此更加稳固。未来，在开放共享的创新环境中，在制度保障与技术革新的共同支撑下，人工智能能够推动更深层次的结构跃迁，使产业与社会走向更加协调、包容与富有创造性的增长轨道。

参考文献

[1] 邵春堡.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J].党政干部论坛,2025(1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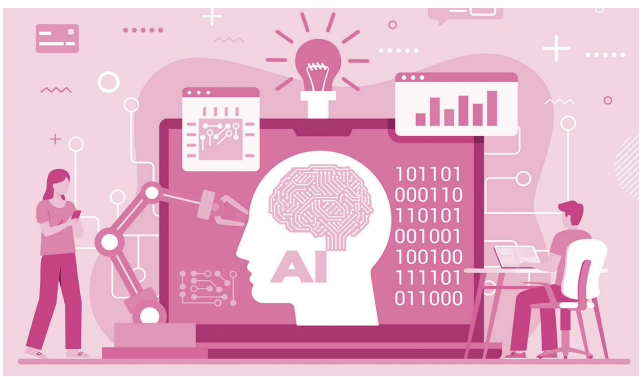
[2] 程风雨，陈奕栋，黄磊.人工智能驱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阐释与机制建构[J].新经济,2025(12):54-68.

[3] 唐任伍，范晓彤.人工智能赋能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产业链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J].改革,2025(12):51-64.

[4] 刘纬华，叶欢.城乡协同与产业升级：“十五五”时期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现路径[J/OL].改革与战略,1-10[2026-02-02].https://link.cnki.net/urlid/45.1006.C.20251111.1439.002.

[5] 张晓莉.应用大数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的思路[J].经济研究导刊,2021(31):1-3.

（作者单位：河南南阳市委党校）



权益平衡视域下弥合“银色数字鸿沟”的法律保障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信息立法的启示

曹格睿　郑徐蓉　韩　笑　李光升　王晓峰 *

摘要：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与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并实现“权益平衡”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而老年群体在数字化适应上具有多重困境，尤其在个人信息保护中易被忽视。本文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信息立法保护经验为参照，提炼其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制度创新，如自愿网络保险降低经济损失风险、数据访问控制服务与信息通知机制减少数据滥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度现状与南通市老龄化实际需求，提出智龄时代下老年人信息安全保护的优化路径，促进从风险防范向权益平衡的转型。

关键词：老龄化；数字鸿沟；个人信息保护；权益平衡；“一带一路”倡议

一、研究背景

（一）全球老龄化趋势下的数字鸿沟挑战剖析

智能技术虽为老龄化社会带来了医疗监测、远程照护等创新解决方案，但老年群体“数字排斥”现象不仅削弱了老年群体获取公共服务的能力，更从宏观层面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斯坦福大学数字素养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老年群体在静态信息判断力方面与青年群体并无显著差异，其主要问题在于动态防御机制的薄弱[1]。此研究表明，老年人数据安全问题日渐突出，有关数字权利制度设计的缺失致使老年人信息保护的目标落空。因此，完善数据保护的路径，是探索数字时代实现权益平衡的有效举措。

在全球老龄化的趋势下，开展国内外信息保护制度比较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发展阶段上，中国正处于“未富先老”的特殊时期，而“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在网络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领域起步较早、制度设计较为成熟，并形成了市场驱动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可为我国提供可借鉴的域外经验。在地缘战略层面，我国与相关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智慧养老、数字治理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空间，相关立法经验具有较强的借鉴适配性。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双重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承载着风险规制与权利赋能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在个人数据立法中创新性设置自愿网络保险等条款，为数据主体与处理者提供了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在立法技术与治理措施上形成可借鉴经验。我国现有的涉老法律框架仍然沿袭着“消极保护”的传统范式，将老年数字鸿沟简单地归类为“数字弱势群体”的子集，却忽视了老年群体在信息验证模式、技术采纳行为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本研究旨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度现状与南通市老龄化实际需求，借鉴成熟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经验，以更好地适应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促进从风险防范向权益平衡的转型。

二、权益平衡的法学内涵

（一）权益失衡的生成逻辑

在传统民事法律框架中，权益平衡往往建立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默认民事主体具有对等协商能力。然而数智技术的深度社会化应用正在解构这一理论预设，如果民事权益完全由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来安排，弱势个体的权益不可避免面临显失公平[2]。这种失衡在老年群体与网络平台的互动中尤为凸显：一方面，平台通过智能设备采集、算法分析形成数据垄断优势；另一方面，老年人受制于数字素养局限，既无法有效主张知情同意权，也难以规避自动化决策风险，导致其个人信息控制权实质让渡于技术强势方。

（二）权益平衡的现代法理

权益平衡的法学内涵强调从消极的形式正义转向积极的实质正义重构。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法律制度的倾斜性配置，矫正因技术权力不对称导致的权益分配扭曲。《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虽确立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但尚未针对老年群体建立差异化保护标准，反映出制度供给与实质平衡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因此，现代法意义上的权益平衡应是包

含技术适配、能力补足与风险防控的复合治理系统。

三、我国老年人信息权益保障的现状

（一）国家立法体系的建设

目前，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第1034至1039条构建起个人信息民事保护的基本框架，同时还专门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建立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此外，我国还以专门立法来进一步突破信息治理的壁垒。《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立法，引入“告知—同意”的核心原则，确立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构建起以“敏感信息特别保护”为特征的分级保护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建立了数据分类分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强化了特定场景保护，形成“1+N”法律体系架构，确立了三元归责体系。

（二）南通市的地方实践创新

南通市作为老龄化典型城市（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0%），以创建国家网络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构建“制度+技术+场景”三位一体的数据保护体系。制度层面出台地方标准，细化个人信息3级4类分级保护。技术层面搭建隐私计算平台，应用联邦学习、动态脱敏等技术。例如，在智慧医疗数据保护方面，采用电子病历授权机制，在市属医院推行“分科分段”授权模式；在科研数据沙箱方面，建立医疗科研专用环境。针对智慧养老监护，为独居老人配备体征监测设备时，采用“去标识化+边缘计算”技术。

四、老年人信息权益保障的困境

本研究以“数字化时代老年人信息安全保护调研”为主题，基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在南通市随机社区、养老院和老年大学，随机选择老年人作为访谈对象。

（一）老年人专项立法保护的适用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其中的信息处理规则虽涉及了自然人死亡与未成年人，却并未明确规定老年人的信息处理规则。在访谈中，许多老年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保障并不了解。李女士提到：“我平时不太清楚这些法律，也不知道有专门保护我们老年人信息的法律。”王先生也表示：“我们老年人主要关心的是生活保障和健康，谈到信息泄露也不知道要去找谁。”

事实上，作为数字生活的特殊群体，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有着相似的生理境况，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与自我认知的不足，对其构建有效完备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二）适老化安全防护机制的不足

适老化安全防护机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不足，使老年人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缺少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数字保险与信贷安全保护。多数老年人仅将信息安全的保障归结为政府宣传或基础监控措施，对针对性安全服务缺乏了解。王先生提到:“国家反诈中心App会提醒来电是诈骗电话，但保护个人信息的市场化应用我还没听说过。”老年人对数据泄露保险、适老化访问控制等定制化服务一无所知。二是“知情—同意”制度的异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虽确立了以“知情和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该模式暴露出诸多问题，致使其可操作性大打折扣[3]。李女士说道：“装软件时弹出来的协议全是密密麻麻的字，还有‘数据共享、生物识别’这些词，我们根本看不懂。”信息收集者所使用的各种App中有关个人信息和隐私收集的条款，往往使用大量专业词汇，并缺乏重点标明有关收集个人重大利益信息的设计，当条款复杂度远超群体认知水平，且缺乏简明解释与风险提示时，“同意”行为仅代表对服务使用权的妥协，而非真实意愿的表达。三是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信息安全需企业、政府、社区等多方共同参与建设，但现实中各方责任划分不清，协作效率低下。林先生提到：“总接到推销电话，对方连我的工号都知道，我也不清楚对方怎么知道的。这种问题光靠个人警惕没用，我还是觉得应该全社会一起管。”这表明部分企业过度收集信息、监管缺位及社区支持不足。

五、老龄化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域外制度经验借鉴

（一）市场参与对风险分担的优化

部分国家通过立法引入市场机制参与风险分担，为信息主体与处理者提供多层次保障。如哈萨克斯坦在《关于个人数据及其保护》中有关“自愿网络保险”的条款是对处理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的突破，其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中设置的自愿网络保险制度具有借鉴意义：以自愿协议为基础，对个人信息泄露等事件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在处理责任之外，为数据主体增加市场化救济渠道。该机制具有非强制性与灵活性，便于针对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开发专项保险产品，有利于实现倾斜性保护与风险社会化分担。

（二）政府监管对信息安全的保障

在政府数据利用场景中，相关国家强化事前授权与全程可控的监管思路。通过建立个人数据访问控制服务，明确公权力部门调取个人信息须经过数据主体实时授权。如，哈萨克斯坦引入了个人数据访问控制服务，公民在政务服务过程中，相关数据库会主动发送核验信息，在公民完成验证确认之前，工作人员无法访问其个人数据，以此实现政府数据调取的可感知、可授权、可追溯，强化对信息全流程的监管。

（三）充分知情对信息犯罪的预防

为强化公民知情权与风险防范能力，部分国家建立个人数据泄露强制通知机制。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事

件，监管部门或处理者须及时将泄露情况告知相关信息主体，便于及时采取止损、防范诈骗、修改密码等应对措施。该机制既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也显著提升老年人等群体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惕性，实现从源头预防信息犯罪与财产损失。

（四）数据包容对群体分层的关注

针对金融场景中老年人易被冒用身份贷款的问题，相关国家形成了数据包容与信贷安全特别保护经验。如，哈萨克斯坦政府在 2024 年引入了自愿放弃银行贷款的机制，公民可以利用电子政务门户网站 egov.kz 或移动应用 eGov mobil 的相关功能在线设置贷款禁令 [4]；同时哈萨克斯坦第一信贷局与“政府为公民服务”国有公司在 2025 年联合推出“电话禁贷”服务。在该项服务中，公民若想保护自己免遭贷款诈骗，可通过电话申请贷款禁令，通过短信验证码的输入并确认操作，防止以自己名义申请贷款；如果某人已设置贷款禁令，但银行或小额信贷机构仍违规为其办理贷款，则贷款机构必须免除客户的债务 [5]。

六、南通市老年人信息权益保护的优化路径

（一）健全信息保护法律机制，探索市场视角

第一，通过构建信息分层管理制度，对所获老年人信息进行一般与重要等级划分，并给予不同主体以阅览权限。对通用的基本信息可供服务人员参考；与隐私相关的重要资料只能由专业医疗人员查阅。如果一定要取得查阅权限，就需要养老平台对开放权限进行审查，从而更好地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6]。第二，发挥市场参与的作用。可借鉴域外自愿网络保险机制，明确企业自愿投保义务并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面向老年人的定制化网络保险产品，将财产损失赔偿与数据安全责任相衔接，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的市场保障。第三，积极引入监护人同意原则。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和失智老人的法定代理人，通常具备更成熟的理性思维与判断能力，能够在个人信息采集与处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监护和决策职能。

（二）打造智能监管体系，强化政策宣导

政府监管需结合智能化手段，并通过多渠道宣传提升政策透明度。可以利用政务新媒体发布“老年人信贷安全指南”，以动画、情景剧等形式讲解信贷诈骗防范措施。公安部门可升级反诈预警系统，当检测到老年人账户异常时，自动触发“96110+ 社区民警 + 亲属”三级响应，并通过短信、语音电话等方式实时提醒。此外，工信部门可建立企业数据安全评级体系，并通过新闻发布会、企业培训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布评级结果，引导市场规范发展。

（三）构建多元共治网络，提升社会参与度

协同治理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志愿者等多方联动，并通过宣传动员增强社会参与。民政部门可开发“亲情守护”App，允许家属远程查看老年人数据访问记录。同时，通过社区公告栏、老年大学课程等渠道宣传数据安全知识。此外，可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开展“1 对 1”智能设备教学，并通过新闻报道、短视频传播典型案例，营造全社会助老氛围。

（四）优化交互设计，加强使用引导

适老化改造不仅需要技术优化，还需通过宣传提升老年人使用意愿。政务 App 可提供大字体、语音交互等功能，并通过线下体验活动、电视教学节目等方式引导老年人使用。医疗、金融等关键场景可引入“语音 + 手势”复合验证。在智慧养老环境中，采用人工智能、视频监控等技术设施作为辅助养老手段，并在选择安装摄像头之前进行评估，判断是否有其他手段能够达到同等的安全目的，唯有在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之后，才能考虑采用摄像头 [7]。

七、结语

智能技术深度融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它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养老便利，也催生了复杂的信息权益保障挑战。本文在权益平衡的视域下，通过对中国南通市的实证考察并结合国外治理经验，揭示了弥合“银色数字鸿沟”的核心矛盾。

研究指出，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虽已搭建起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但在针对老年群体的差异化、精细化保护方面仍存有空白。相比之下，部分国家通过引入自愿网络保险、强化数据访问控制与即时泄露通知等市场与监管相结合的制度创新，为平衡技术效率与个体权利特别是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实质公平提供了有益借鉴。

因此，面向未来的法律保障新“丝”路，应超越单纯的风险防范思维，转向更加积极的权益平衡与能力赋能。这要求我们健全分层分类的信息保护法律机制，鼓励市场开发适老化的安全产品与服务；打造智能、透明的政府监管体系；构建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多元共治的网络；并持续优化数字交互的适老化设计。唯有通过这种“制度—技术—社会”多维并举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赋能老年群体，使其在数字时代中不仅能安全生存，更能有尊严、有保障地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的跨越。

本研究以南通市为样本，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立法实践进行对话，旨在抛砖引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国内不同区域乃至国际的比较样本，并深入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等新一代科技应用于智慧养老，对老年人信息权益带来的新挑战与新平衡之道。

参考文献

[1]MOORE R,CHU L,HANCOCK J,et al.Can nudges reduce the sharing of misinformation （下转 135 页）

广东市域矛盾纠纷化解：阶段划分与经验借鉴

李晓燕

摘要：中央政法委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以来，广东制定并实施《广东省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以“市域”为治理场域，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县域”向“市域”转型。广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由初步试点、深化试点到全面展开的探索中，涌现出了深圳、东莞、珠海和中山等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由此，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提升了广东自身矛盾化解治理效能，更为其他地方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方向。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矛盾纠纷化解；阶段划分；经验借鉴

一、广东省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

广东省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满足基层社会矛盾化解需求”为导向的重要部署。2019 年中央政法委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明确提出市域是“风险防控的主战场、矛盾化解的主阵地、服务供给的主渠道”[1-2]。在此背景下，广东 2021 年制定了《广东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四五”规划》，该规划是以“市域”为治理场域，作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节点，强调“市域”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核心枢纽地位[3-4]，推动资源、政策向市域集聚，构建“省级规划、市级统筹、县级实施”的社会矛盾治理格局，成为广东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模式的创新探索。该规划以“规划引领”推动“治理升级”，明确了“十四五”期间（2021—2025 年）广东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是推动广东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从传统向现代化跃升[5]的重要指导文件。

二、广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演化历程

广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演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初步试点阶段、深化试点阶段及全面展开阶段。

（一）初步试点阶段（2019—2022 年）

2019 年中央政法委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广东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通过统筹规划，系统推进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城市共有广州、汕头、珠海、深圳、江门、茂名等 13 个地市。首批试点的工作重点是在党建引领、智慧治理、多元协同等领域形成一批创新模式，如深圳“最小应急单元”、东莞“智网工程”等，为下一步深化试点奠定基础。首批试点城市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聚焦四方面核心任务：（1）发挥党组织的统筹引领功能，通过推动“支部建在网格上”，将党组织嵌入社区网格、商圈楼宇、社会组织；通过开展“红色物业”“红色商圈”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资源整合、矛盾调解中的关键作用。（2）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聚焦征

（上接 134 页）

online? Experimental evidence across the lifespan[J]. Innovation in Aging,2024,8(Supplement1):1295.

[2] 王海明 . 数智化形塑中个人信息权益的失衡风险与新平衡 [J]. 浙江学刊 ,2023(06):116-128.

[3] 粟丹 . 智慧健康养老模式与老年人隐私信息保护 [J]. 人权法学 ,2025,4(01):113-135,162-163.

[4] 刘良玉 . 智慧养老模式下老年人信息保护研究 [D]. 株洲 : 湖南工业大学 ,2024.

[5] 廖刘义 . 比例原则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J]. 秦智 ,2024(02):48-50.

[6] 刘寅 . 论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数据来源者权的特殊保护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4,26(06):128-141.

[7] 王珏 . 论公开透明原则在老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适用 [D]. 北京 : 中国政法大学 ,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智龄化视域下弥合‘银色数字鸿沟’的法律保障新‘丝’路——基于南通市和阿拉木图市的对比研究”（202410304100Y）。

（作者：曹格睿、郑徐蓉、韩笑、李光升，南通大学本科生；通信作者王晓峰，南通大学副教授）

地拆迁、劳资纠纷、涉法涉诉等重点领域，建立明晰的市域社会矛盾风险清单，创新“广东‘枫桥经验’”，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超过95%。（3）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建设“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整合网格化管理、矛盾调解、公共服务、风险预警等功能，完善升级“城市大脑”“智网工程”等智慧治理项目。（4）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网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志愿者队伍；积极发动企业参与，开展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及平安企业建设，加强各种形式的社会治理宣传。

（二）深化试点阶段（2023—2024年）

中央政法委2023年提出“试点验收年”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广东省制定了《广东省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持续深化试点并总结具有普适性的实践经验。该方案旨在推动全省13个试点地市发展，从“合格”迈向“优秀”，从试点初始阶段走向成熟阶段，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样板，并采取“一市一方案”策略，形成差异化推进路径。例如，珠海以“平安+智慧”为特色，建设“粤心安”社会心理服务站、跨境矛盾调解中心，打造“平安海域”监控系统；东莞以“网格化管理”和“智网工程”为特色，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闭环管理；深圳以“最小应急单元”为特色，发动企业、商场、学校、医院等单位组建应急单元，配备应急装备，实现“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5分钟增援到位”；汕头以“涉侨服务”为特色，建设“涉侨矛盾调解中心”，服务150万名海外侨胞，打造“侨乡治理”品牌。

（三）全面展开阶段（2025年至今）

在初步试点和深化试点的基础上，广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作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江门市形成了基层治理平安联创、矛盾联调、问题联治的良好局面。如在全省建立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孵化中心，率先上线运行“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被列为全省唯一的镇街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示范市。在全国率先研发单兵智能装备和智慧防疫“电子哨兵”，建设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应用示范基地，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智能化水平。在江门市的统筹引领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睦洲派出所入选全国第二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三、广东市域矛盾纠纷化解案例经验与启示

广东省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兼具创新性和扩散价值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治理智慧。

（一）党建统筹：深圳“最小应急单元”

深圳作为超大型城市，面临人口密集、公共场所密集、突发事件风险高的现实挑战。深圳2021年创新推出“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发动企业、商场、学校、医院及景区等单位组建应急单元，每个应急单元都配备对讲机、急救包、防暴器材等装备，通过“深平安”系统与公安110联动，实现“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5分钟增援到位”的快速响应机制。“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在组织架构搭建方面，以“单位自建+政府指导”模式，由商超、学校等单位自主组建应急单元，由公安部门提供装备、培训支持；在技术赋能方面，开发“深平安”App，实现应急单元与公安110、网格化管理平台的实时联动，事件上报、处置、反馈流程的可视化；在制度保障上，制定《深圳市最小应急单元建设规范》，明确装备标准、培训要求、考核机制，确保应急单元“建得好、用得上”。深圳“最小应急单元”建设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理念创新，将“应急管理”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多元参与”，动员社会力量成为基层安全的积极维护者；二是技术创新，通过“深平安”系统实现“人防+技防”结合，提升应急响应效率，将传统110接警到应急单元到场的平均时间缩短至5分钟；三是设计创新，以“标准化+规范化”推动应急单元建设，有效解决“社会力量参与无序”的问题。

深圳“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2023年累计处置突发事件1万起，其中暴力事件、火灾等重大事件300余起，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左右。其经验启示在于，通过“最小应急单元”模式，改变政府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将丰富的社会力量转化为治理资源，构建“全民参与、快速响应”的基层安全网。

（二）科技支撑：东莞“智网工程”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人，社会治理面临“底数不清、动态不明、处置滞后”的难题。东莞2016年启动“智网工程”，将全市划分为2934个网格，配备1.1万名专职网格员，通过“智网”App实时上报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问题。平台自动派单至相关部门，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闭环管理。东莞“智网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网格化基础建设，以“属地管理、规模适度、无缝覆盖”为原则，将全市划分为包含“镇—村—片区—基础网格”的四级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二是智能化平台搭建，建设“智网工程”信息系统，整合公安、城管、应急等30个部门数据，开发“问题上报”“任务派单”“处置跟踪”“考核评价”等功能模块；三是社会化参与治理，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网格治理，建立“网格员+社区民警+城管队员”联合巡查机制。东莞“智网工程”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治理模式创新，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发现”，通过网格员每天不少于4小时的日常巡查，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技术手段创新，利用“智网”App实现“移动办公”，网格员可实时上传问题照片、定位信息，平台自动分

类、派单，问题处置效率提升 50%；三是考核机制创新，建立“网格员考核积分制”，将问题发现量、处置率、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激发网格员的积极性。

东莞“智网工程”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2023 年累计处置事件超过 80 万件，其中安全隐患事件 10 万件、矛盾纠纷处置率达 98%，群众满意度达 95%。其经验启示在于，通过“智网工程”模式，以网格化为基础、智能化为支撑、社会化为补充，构建“科学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的治理体系。

（三）协同治理：珠海“跨境矛盾调解中心”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港澳居民在珠海购房、就业、养老等需求持续增长，房产纠纷、继承纠纷及劳务纠纷等跨境矛盾纠纷也随之呈上升趋势。2020 年起，珠海建立“跨境矛盾调解中心”，针对港澳居民需求，提供“调解 + 法律 + 公证”一站式服务，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平台建设，在香洲区、横琴新区设立跨境矛盾调解中心，配备港澳籍专业调解员、律师、公证员，设置调解室、法律咨询室和公证服务窗口；机制创新。建立“港澳籍调解员 + 内地法官”联合调解机制，对涉及港澳法律的纠纷，由港澳籍调解员提供法律意见，内地法官负责司法确认；服务延伸，开发“跨境调解”线上平台，港澳居民可通过“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预约调解服务，实现“线上 + 线下”融合服务。珠海“跨境矛盾调解中心”的创新性在于：一是治理需求创新，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提供跨境矛盾精准化服务；二是人员配置创新，引入港澳籍调解员，利用其“熟悉港澳法律、贴近港澳居民”的优势，提升港澳籍调解员的调解公信力和成功率；三是法律衔接创新，通过“司法确认”机制，将调解协议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解决“调解易、执行难”的问题。

珠海“跨境矛盾调解中心”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2023 年累计受理纠纷 1000 余件，服务港澳居民超过 5000 人次。其经验启示在于，通过“跨境矛盾调解中心”模式，构建“法律衔接、人员协作、服务融合”的治理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提供支撑。

（四）矛盾化解：中山“和事佬”调解品牌

作为“中国侨乡”，中山面临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传统矛盾纠纷与物业纠纷、网络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交织的挑战。中山 2012 年推广“和事佬”调解品牌，发动退休干部、教师、律师等群体担任“和事佬”，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技能培训，组织“和事佬”参与法院旁听、模拟调解等活动，提升专业化水平；品牌推广，通过“和事佬”工作室、“和事佬”热线、“和事佬”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力，引导群众“有纠纷找和事佬”；队伍建设，招募退休干部、教师、律师等群体担任“和事佬”，设立“和事佬”人才库。中山“和事佬”调解品牌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治理主体创新，将“和事佬”这一本土化称谓转化为治理资源，发动社会力量成为矛盾调解的重要力量；二是调解方式创新，采用情、理、法结合的方式，既讲法律政策，也讲人情世故，如“和事佬”通过“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化解邻里纠纷矛盾；三是文化融合创新，将“和事佬”文化与中山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相结合，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调解品牌，增强群众认同感。

中山“和事佬”调解品牌的成效与启示在于，“和事佬”2023 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过 1.5 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 90%，群众满意度超过 90%。其他城市可借鉴中山“和事佬”模式，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构建“本土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调解体系。

四、结论

以上四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典型案例不仅提升了广东自身的治理效能，更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广东方案”，具有普适性。综合来说，这些案例主要包含党建引领、科技支撑、协同治理、矛盾化解等核心要素：一是党建引领，通过“支部建在网格上”“红色物业”等模式，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二是科技支撑，通过“粤平安”“智网工程”平台，利用大数据、AI、物联网等提升治理效率，实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三是协同治理，动员企业、居民、商场、社区、居民及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四是矛盾化解，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建立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机制，将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

参考文献

[1] 成伯清 . 市域社会治理 : 取向与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1):10-16.

[2] 余钊飞 . 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18(04):384-385.

[3] 陈成文 , 张江龙 , 陈宇舟 . 市域社会治理：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40(01):228-236.

[4] 陈一新 .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 [J]. 社会治理 ,2018(08):5-14.

[5] 黄新华 , 石术 . 从县域社会治理到市域社会治理——场域转换中治理重心和治理政策的转变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学报 ,2020(04):4-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安全背景下的广东市域矛盾纠纷化解迭代机制研究”（GD23XGL015）；2024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千万工程’背景下广州乡村治理迭代机制研究”（2024GZGJ76）；2025 年度佛山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借力‘百千万工程’助推佛山乡村建设水平跃升研究”（2025-GDB10）。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力资源学院教授）

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网络分析：性别差异及教育启示

张　雪

摘要：为探究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在心理结构，本研究对贵州省 6631 名 12~16 岁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与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近 70% 的青少年存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物质中心”维度的相关题项在青少年认知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你是否更喜欢拥有昂贵物品的同龄人”是影响整个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键节点。网络的性别比较结果表明，男、女青少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网络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更倾向于将金钱等同于快乐，而女性则更关注昂贵物品在社交比较中的作用。据此，教育干预应重视辨析物质与快乐、成功的关系，削减物质比较倾向，并实施性别差异化的引导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网络分析；潜在剖面分析；性别差异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媒体传播与社交互动等多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受到以物质为导向的价值观浸染日益显著[1]。传统的好面子文化、现代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与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相互渗透、强化，使得物质的获取不仅关乎个人欲望的满足，更成为一种获取社会认可、维持人际地位的重要途径。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tic Values）是指个体将物质财富视为个人生活的核心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幸福、社会地位与自我成就的主要标准。青少年阶段是自我认同形成与价值观念塑造的重要时期，心理敏感度高、从众倾向明显，且高度依赖同伴认可[2]，这一价值观对正处于心理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影响尤为显著。根据 Festinger 的社会比较理论[3]，个体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倾向于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标准，以维持稳定和准确的自我评价，而物质财富恰恰提供了一个具体且可量化的指标。研究表明，消极社会比较（传统上行比较和下行同化比较）可能会引发焦虑和抑郁[4]。大量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5-6]。物质主义倾向也与多种危害健康行为存在正相关，如吸烟[7]、强迫性购买行为[8]。因此，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难以带来持续的心理满足，反而可能成为损害个体身心健康的风险因素。部分研究揭示了青少年物质主义的性别差异。例如，一项研究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了大学生的物质主义倾向，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物质主义价值倾向水平普遍高于男大学生[9]；另一项研究则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了高中生物质主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水平现状，结果发现，高中男生比高中女生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水平更高，且与抑郁、焦虑水平呈正相关[10]。因此，深入探究物质主义价值观，了解如何减轻这种消极影响对青少年健康发展尤为必要。

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变量出发，将其视为一个单一整体，关注物质主义的总分或各维度的表现，却未能充分揭示其内部复杂的认知结构。物质主义是一个由“以物质为中心”“以物质为快乐”“以物质为成功”等多种偏差认知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认知如何相互关联、哪些认知处于核心位置、各种认知间相互联系的结构是否会根据不同特点的群体产生差异，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方法，能够将变量之间的联系通过高斯网络呈现为一个由节点和边构成的图片，直观地揭示各节点之间的联系（如正相关、负相关抑或是关联强度），从而能够针对性地对其中的“症结”实施精准干预。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网络分析的视角出发，重点探讨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及其性别差异，以深化对其心理机制的认识，并为教育干预提供更精准的方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整群抽样法，在贵州发放问卷 7000

份，剔除规律作答以及问卷内容缺失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631 份，有效率为 94.73%。此次调查，男生 3406 人（51.36%），女生 3225 人（48.64%），年龄在 12~16 岁之间（M = 13.810，SD = 0.923）。

（二）研究工具

采用 Opree 等人编制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c），该量表包含物质主义快乐、物质主义中心和物质主义成功三个维度 [11]。量表包含 18 题，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越高。本研究中问卷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03、0.650、0.691。

（三）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7.0 与 R 4.4.1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 SPSS 软件完成描述性统计与 Person 相关分析。随后，使用 RStudio4.4.1 的 R 包 tidyLPA 对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主要选取了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熵（entropy）和基于 Bootstrap 方法的似然比检验（BLRT）作为指标。在网络分析部分，通过 LASSO 与 EBIC 方法优化边筛选，通过 qgraph 实现可视化，并利用 Bootnet 评估节点中心性指标及网络的稳定性。最后，采用 Network Comparison Test 包进行性别间的网络结构比较。

三、结果

（一）潜在剖面分析及描述统计

表 1　青少年物质主义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指数

	LogLik	df	AIC	BIC	aBIC	pBLRT	Entropy	类别概率
1	−169352.665	36	338777.330	339058.112	338907.713			
2	−162248.253	55	324606.506	324980.479	324805.703	< 0.001	0.840	0.386; 0.613
3	−158821.853	74	317791.706	318294.870	318059.716	< 0.001	0.916	0.339; 0.361; 0.300
4	−158087.556	93	316361.113	316993.467	316697.936	< 0.001	0.876	0.360; 0.304; 0.229; 0.106

根据被试在物质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情况（见表 1），综合考虑 BIC、aBIC 最小值、Entropy 以及 BLRT 的显著性，可将他们分为三组：（1）高物质主义价值观组（33.67%，2233 人），该组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均最高，强烈认同物质财富能带来快乐、成功和社交吸引力；（2）中物质主义价值观组（36.13%，2396 人），该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物质关注，但未成为其生活的核心；（3）低物质主义价值观组（30.19%，2002 人），该组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均最低，对物质财富的关注度和渴望度低。本研究将高物质主义价值观组与中物质主义价值观归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的群体，共 4629 人。对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三个维度的描述统计分析表明（N = 4629），物质主义快乐维度的平均值为 2.488（SD = 0.404），物质主义中心维度的平均值为 2.272（SD = 0.381），物质主义成功维度的平均值为 1.815（SD = 0.336）。物质主义价值观整体量表的平均值为 2.192（SD = 0.236）。

（二）网络分析

不同性别 MVS 倾向群体的症状网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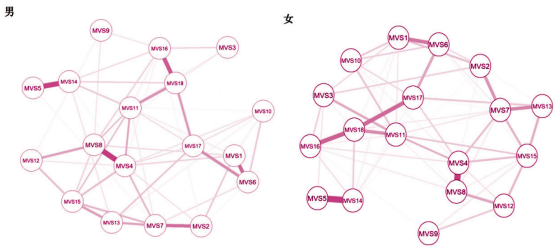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性别 MVS 倾向群体的症状网络

在男性与女性网络中，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强度中心性及预期影响的 CS 系数均大于 0.25，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水平。在男性网络中，MVS 的第 4 项（“拥有很多钱使你开心吗”）与第 8 项（“拥有许多钱对你来说重要吗”）联结权重最大（0.328），其次是第 5 项（“如果你有许多昂贵物品，其他同龄人会更喜欢你”）与第 14 项（“如果你拥有昂贵品牌的东西，其他同龄人会更喜欢你”）（0.307）；在女性网络中，MVS 的第 4 项与第 8 项联结权重最大（0.380），其次是第 5 项与第 14 项（0.377）。在男性网络中，MVS 的第 4 项有最高的接近中心性（1.223）和强度（1.882），第 18 项（“你是否更喜欢拥有昂贵物品的同龄人”）有着最高的中介中心性（1.990）和预期影响（1.321）；在女性网络中，MVS 的第 11 项（“你是否更喜欢拥有昂贵衣服的同龄人”）有最高的接近中心性（1.454），第 18 项有最高的中介中心性（2.249）和预期影响（2.125），第 4 项有最高的强度（1.765）。

为考察物质主义价值观网络结构在男女群体间的差异，本研究进行了网络比较分析（见图 2）。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群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网络结构既存在整体性差异，也在特定节点的中心性上表现出不同特征。首先，网络整体不变性检验结果显著（M 结构 =0.101,p=0.036），表明男性和女性群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网络结构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然而，全局强度不变性检验不显著（S 强度 =0.742,p=0.206），说明两组网络在整体联结强度上无显著差异（S 强度男 =4.223，S 强度女 =4.965）。

四、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 6631 名青少年的调查，揭示了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状、结构特征及其在性

别群体中的差异。研究将青少年群体中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群体，其中高物质主义价值观组和中物质主义价值观组合计占比接近 70%，反映出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在当代青少年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相符，说明在消费社会与媒介环境影响下，部分青少年倾向于将物质占有视为幸福与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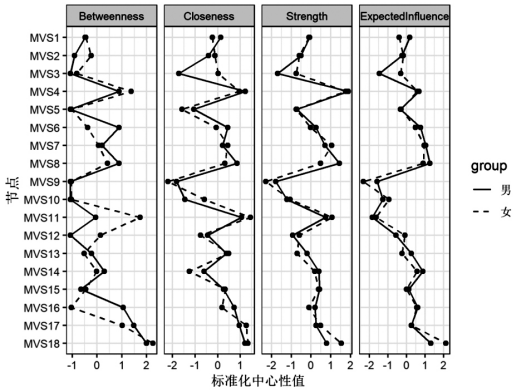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心性指标

网络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各题项之间的心理联结模式。在男性和女性网络中，MVS 第 4 项（“拥有很多钱使你开心吗？”）与第 8 项（“拥有许多钱对你来说重要吗？”）之间均表现出最强的联结权重，说明“金钱”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认知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是联结“快乐”与“重要性”认知的关键节点。此外，第 5 项与第 14 项（分别关于“拥有昂贵物品”与“拥有昂贵品牌物品”对同伴吸引力的认知）之间也表现出较强的联结。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个体在自我概念形成阶段，倾向于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建构自我认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物质财富为青少年提供了最为直观和可操作的社会比较维度，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着通过物质财富来获取同伴接纳与社会认可的强烈信念。

网络比较结果显示，尽管男性和女性在物质主义价值观整体联结强度上无显著差异，但网络结构存在整体性差异。在节点中心性方面，男性与女性网络呈现出部分差异。男性网络中，第 4 项（“拥有很多钱使你开心吗”）与第 8 项（“拥有许多钱对你来说重要吗”）联结的重要地位，可能与传统文化对男性“养家糊口”“事业成功”的角色期待有关，使得他们更早地将金钱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幸福生活的直接工具。而在女性网络中，第 11 项（“你是否更喜欢拥有昂贵衣服的同龄人？”）具有最高的接近中心性，则深刻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外貌与身体管理的规训。此外，第 18 项（“你是否更喜欢拥有昂贵物品的同龄人？”）在两组中均表现出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与预期影响，说明“对他人物质拥有的偏好”是影响整个物质主义价值观认知系统的关键变量，表明个体会通过物质衡量他人。此外，全局强度不变性检验不显著，表明男性和女性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整体表达强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这说明，尽管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结构路径有所不同，但其总体表现强度相似，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取向，其普遍性可能源于共有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如经济增长、消费主义、互联网文化等。性别因素则更像是一个调节变量，塑造了这种普遍价值观在不同群体中的具体表达形式和心理路径。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数据，难以推断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样本均来自贵州省，且均为县域乡镇等较为落后的区域，研究结论的推广性还有待考量；最后，本研究主要关注了物质主义观念本身的内部结构，物质主义的影响因素以及物质主义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仍有待探索。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入纵向追踪研究、纳入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比较、加入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等更多外部变量进行探讨，为教育干预提供更清晰的实证依据。

五、教育对策

首先，以精神奖励为主，以物质奖励为辅。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物质属于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个体对生理、安全的需求。而精神满足属于高层次的需要，满足个体对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低层次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对其需求的欲望就会降低；但高层次需要却是永无止境的。父母应尽量避免用金钱等物质对青少年进行奖励，而应使用情感上的奖励代替，如多进行夸奖或鼓励，或是陪伴孩子学习一项技能。让他们感知到，快乐并不完全来源于外在的物质，而是源于精神上的富足。

其次，关注性别差异，减轻性别刻板印象的诱导。对男生，可以多引导他们反思消费主义文化对“成功男性”的片面定义，通过生涯教育将他们对金钱与成就的关注转向个人能力发展、职业兴趣探索与长远规划。对女生，则需要减轻“物质决定魅力”的固化观念，可借助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其建立坚实的自我认同与身体意象信心，从而降低依赖外在物质获取价值认可的心理倾向。让青少年了解到自己对物质的深层次看法。

最后，可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让青少年意识到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实质上源于心理的不安全感，并对青少年的不合理信念（如将物质等同于成功和快乐）进行干预，引导他们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金钱观。

参考文献

[1] 盛小敏，魏军 . 当代青少年价值观调查及其教育启示 [J]. 教育研究 ,2025,46(01):70-80.

（下转 141 页）

从失序到调谐：萨提亚模式对夫妻互动系统的干预效能研究

陈妍君

摘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离婚率居高不下、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严峻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系统视角，针对夫妻沟通问题进行诊断，分析现今城市背景下夫妻沟通方式的现实困境及其发生机制，发现家庭系统视角下夫妻沟通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体自我价值感不足、不良沟通姿态、家庭角色期望冲突等。随后，探讨萨提亚模式在解决该类问题中的具体干预方式及其效果。研究发现，通过萨提亚模式在增强自我探索与价值感提升、引导夫妻合理需求表达与建设性对话以及厘清家庭整体中的角色与边界方面的有效作用，可以有效改善夫妻沟通质量。

关键词：萨提亚模式；婚姻质量；家庭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婚姻家庭中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民政部 2025 年第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2025 年共有 274.3 万对夫妻登记离婚 , 该数量约占同年结婚登记数据的 40.6%, 比起往年数量亦有增长 [1]。离婚夫妻数量的居高不下，体现出目前我国婚姻内部矛盾问题较为严峻。政府高度重视婚姻家庭建设。截至 2022 年末，我国开展婚姻家庭服务指导的婚姻登记机构比例为 50.8%[2]。2020 年，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3]。因此，如何有效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提升婚姻质量，成为社会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夫妻间的不良互动模式能够直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以及离婚问题的产生 [4]。伴侣之间良好的沟通还能够缓解个体的负向情绪、改善婚姻质量，并有效地提升家庭功能 [5-6]。所以针对夫

（上接 140 页）

[2] 杨茂庆 , 黄茂林 . 青少年价值观类型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5,43(04):41-52.

[3]FESTINGER L.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Human Relations,1954,07(02):117-140.

[4] 赵立 , 白莎 . 数媒时代焦虑、抑郁与社会比较的关系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5,33(01):92-113.

[5]DITTMAR H,BOND R,HURST M,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4,107(05):879-924.

[6]KASSER T,RYAN R M.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optimal functioning and the relative attainment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goals[M]//SCHMUCK P,SHELDON K M. Life goals and well-being: towards a positive psychology of human striving.Göttingen: Hogrefe & Huber Publishers,2001:116-131.

[7]WILLIAMS G C,HEDBERG V A,COX E M,et al.Extrinsic life goals and health-risk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0,30(08):1756-1771.

[8]DITTMAR H.Compulsive buying—a growing concern? an examination of gender,age, and endorsement of materialistic values as predictors[J].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5,96(04):467-491.

[9] 魏祥迁 , 陈子杨 , 李梦文 . 父母婚姻冲突知觉与大学生婚恋观的关系——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19,34(06):1-8,34.

[10] 谢中垚 . 物质主义对高中生抑郁和焦虑影响的研究 [J]. 中国医学人文评论 ,2012(00):94-95.

[11]OPREE S J,BUIJZEN M,VAN REIJMERSDAL E A,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aterial Values Scale for children (MVS-c)[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1,51(08):963-968.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妻沟通方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寻求合理的缓解、应对方法，可以有效改善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分析婚姻家庭中的夫妻沟通问题时，萨提亚模式具备独特的优势，进行积极正向的沟通引导，还有丰富的治疗技术改善家庭成员间的日常沟通与相处方式[7-10]。因此，本文引入萨提亚模式的理论框架，对婚姻中的夫妻沟通问题进行分析及干预。

二、萨提亚模式理论基础及解释框架

维吉尼亚·萨提亚相信，每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能够做出改变。萨提亚模式能够通过系统的介入方式，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改善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帮助人们去建立自尊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强调通过家庭和社会系统实现个人成长。萨提亚模式所使用的技术主要包括：一致性沟通技术、冰山隐喻、家庭雕塑等[10]。不少国内外的学者通过针对萨提亚模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理论在提升自我价值、缓解心理压力及改善人际关系方面具有积极效果，不少实证研究也能够证实萨提亚模式在弱势个体的心理重塑和家庭功能改善方面具有良好的成效[11-13]。

本研究以萨提亚模式作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及干预婚姻中夫妻沟通方式的问题。针对夫妻沟通方式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应用到萨提亚模式中的几种理论框架和治疗技术，通过一致性沟通、冰山隐喻、系统视角这些核心技术，深入理解夫妻沟通问题的形成机制，并生成有效的干预改善策略。具体的理论应用模式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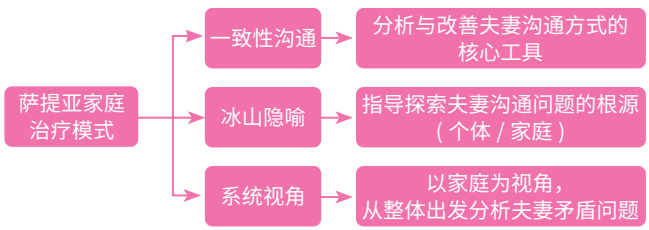


图 1　萨提亚模式理论解释框架图

（一）一致性沟通

一致性沟通是萨提亚模式的核心技术，可以帮助服务对象识别错误的沟通方式（不良沟通姿态：指责型、讨好型、超理智型和打岔型），同时引导服务对象真诚、非评判、平和地进行互动沟通，实现自身、他人和环境的平衡。应用到夫妻沟通问题解决中，即可以通过真诚地交换深层想法，来理解对方，这样的沟通让双方建立更加合理的期望，减少或消除冲突、误解。通过一致性沟通的训练，夫妻双方可以学会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及感受，并尊重对方的需要和感受，从而使沟通效率更高，彼此也更易达成共识。

（二）冰山隐喻

冰山隐喻理论最早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后来萨提亚针对这个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4]。萨提亚模式中的冰山隐喻模型将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比作一座冰山，“冰山”自上而下包含八个层面：行为、应对姿态、感受、感受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和自我，其中只有行为是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更深层其他部分则隐藏在水面之下。模型强调，潜藏在水面下的内在需求（如渴望、期待）对个体行为有着更加重要的驱动作用，需要通过深层次的自我探索来发现[15-16]。所以，通过冰山隐喻，可以深入探索夫妻沟通问题背后个体存在的深层心理需求和根源问题。

（三）家庭系统视角

萨提亚模式认为需要从家庭系统的视角出发，关注家庭中的互动模式和沟通方式，如何对成员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家庭功能产生影响[17]。这样的视角以家庭系统作为整体，把夫妻关系看成处于家庭系统中的关系，全面考察家庭系统结构、功能以及其变化的趋向。用系统的视角对家庭问题进行评估，认为夫妻沟通问题不仅是个体之间的问题，更是家庭系统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通过该视角，可以识别家庭中的互动模式、角色分配和情感连接等方面的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

三、家庭系统视角下的夫妻沟通现实困境与发生机制

（一）家庭系统视角下的夫妻沟通现实困境

家庭是一个功能性的整体，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的行为、情绪、心理都受到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的影响[18]。从家庭系统理论来看，夫妻之间的沟通并不是指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有障碍，而是整个家庭的共同行为特点，有了这种整体性的观念，才能更好地用系统性的思维去思考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后续针对萨提亚模式调整夫妻沟通方式的过程中也会更具目的性。

1. 家庭功能的分化不足

家庭系统中的功能分化是指家庭成员在角色、责任分配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形成清晰且互补的分工，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和成员的心理健康。理想的功能分化，指在家庭中有着非常明晰的家庭成员角色分工和家庭责任分工：如哪些人做家务、谁管理家里的钱袋、孩子的教育培训由谁来负责等。实际上，夫妻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针对这样一些具体内容开展分工的协商，以至于说各个方面的责任被分不清甚至说是各推其责、重复用力。直接的结果就是夫妻双方在表达需求和期望时往往缺乏清晰的方向，导致沟通的无效性。

2. 家庭系统内部的权力失衡

在一个功能良好、相处和谐的家庭中，权力的分配通常是相对平衡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大家通过沟通和协商来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然而，现实中很多家庭的权力分配并不均衡，这种不平衡可能源于传统观念、经济地位的差异，或者家庭

成员的性格特点。

比如，有些家庭中，夫妻一方因为性格比较强势，自然而然地主导了大部分家庭事务，而另一方则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甚至承受着无形的压力。这种权力失衡往往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弱势的一方在面对指责或冲突时，可能会选择沉默或回避，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久而久之，这样的沟通模式会让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结变得脆弱，甚至影响彼此的关系。

3. 家庭系统内部子系统边界模糊

家庭中的边界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清晰的边界可以维护成员的个人隐私和空间，也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支持。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类似问题尤为突出：父母和亲人常常过度介入夫妻的日常生活，包括子女的教育问题、经济上的决策，甚至夫妻之间的矛盾处理。这种边界的模糊会干扰夫妻生活的独立性和私密性，还可能导致伴侣间由于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从而在沟通时更加敏感戒备，外部因素的干扰会进一步影响夫妻之间的沟通质量。

4. 夫妻互动模式僵化及情感隔离

互动模式僵化和情感隔离也是现代婚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互动模式僵化指的是伴侣之间可能习惯了某种不良的沟通方式，难以改变。比如说两人的互动常常以一人指责、一人沉默回避的方式进行，且身处其中时无法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然后持续在生活中应用这样的互动方式。消极又僵化的互动方式不仅会降低沟通的效果，引发夫妻间的情感隔离可能性也会直线上升。情感隔离便是指伴侣之间缺乏深度的情感交流，有的夫妻会因为工作的忙碌或长期的矛盾积累，逐渐降低沟通意愿、减少对对方的期待和关注，情感联结便因此弱化了。

（二）夫妻沟通障碍的发生机制

1. 个体自我价值感不足导致沟通中的情绪化与防御性

在常见的婚姻矛盾中，个体自我价值感的缺失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夫妻在婚姻中习惯将家庭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从而逐渐忽视了自身的内心需求和价值。久而久之，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对方认可时，很可能会用情绪化的方式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这种情绪化的沟通会使伴侣产生一种自我防卫心理，从而让夫妻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升级。

2. 不良沟通姿态与互动循环引发沟通障碍

萨提亚认为，指责型、讨好型、超理智型以及打岔型等不良沟通姿态会导致另外一方产生防卫心态，并进入恶性循环当中[19]。夫妻双方的不良沟通姿态又会诱发另外一方不良的互动姿态，最终使双方都陷入不良的沟通状态之中，导致沟通信息不畅，夫妻双方产生更多的误会和矛盾，并且这种不良的互动又会加重双方的沟通障碍，其中一方采用指责式的话语去交流时，对方也可能会出现避开式的回应或者是反击式的回应，这样的互动只会使双方的情绪变得更加糟糕。

3. 家庭角色期望冲突与家庭边界模糊破坏家庭系统稳定

在大多数婚姻中，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角色期望往往受到传统观念和家庭背景的影响，而这些期望在现代社会中便更易导致婚姻内部冲突的产生。以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经济更加独立为例，很多女性在婚姻里希望获得一定的决策权，而男性则很难接受这样的改变。当夫妻双方对于自己的角色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的时候，沟通产生了很多错误，而且很多过往积累的冲突也会爆发。同时，家庭边界模糊化不利于家庭系统的稳定运行，在中国的家庭当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部分长辈对于晚辈的婚姻过度干涉，忽略边界。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家庭系统的边界越清晰，则个体越容易获得幸福感，家庭系统越稳定越好；但是如果其他成员过度干涉，则会造成影响夫妻双方的正常生活、破坏家庭系统稳定等负面影响[20]。

四、萨提亚模式嵌入夫妻沟通方式改善的具体干预方法

（一）增强自我探索与价值感提升

在个体层面，可以首先通过萨提亚冰山隐喻来指导个人针对自我的深层次想法和需要进行挖掘和探索。因为在夫妻沟通中，个体缺少自我了解，还有自我价值感不足常常是导致情绪化和防御性沟通的重要根源，而这两种因素恰恰是阻碍良性沟通的重要原因之一。萨提亚模式在提升个体自尊方面有着显著效果[21]，萨提亚冰山隐喻能够清晰地指导夫妻二人以行为为依据，对冰山模型中水面下更深层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和自我进行进一步探索。在实操方面，夫妻可以分别在独立的空间内按照冰山隐喻的八个层次逐层进行自我探索及行为分析，了解自己的情绪、行为，还有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同时分析具体存在哪些因素导致了夫妻间沟通问题的产生。通过引导二人探索隐藏在“水面下”感受和渴望，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对方的日常行为、情绪和需求，从而提升对自身及对方的进一步认知，为后续沟通和互动的改善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合理需求表达与建设性对话

在夫妻二人的互动层面，萨提亚模式可以通过一致性沟通和冰山隐喻技术，帮助夫妻实现合理的需求表达和建设性对话。在萨提亚模式中的不良沟通姿态理论认为，消极的沟通方式主要有指责型、讨好型、超理智型、打岔型四种，有效识别不良沟通姿态，有助于服务对象了解自身及伴侣的沟通存在问题，并有意识地进行针对性的改善。萨提亚一致性沟通指导夫妻双方要多采用理智的沟通方式，如一致性沟通鼓励双方在沟通时尽可能使用“I”语言，用“我感觉……因

为我希望……”的句式，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倾听对方的观点，减少其他类别的不良表达方式，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和冲突，增强夫妻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经过冰山隐喻引领自我探索之后，夫妻之间可以交流与分享彼此的探索结果，积极地表达自己对对方的需求和期望，真正理解对方的行为背后究竟有何需求。如丈夫因某件事情发生后表现得非常生气，根据冰山隐喻帮他探究下去，最后他也许会发现其愤怒的背后是因为更希望得到妻子的陪伴与理解，而不是支持。这样对于需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后，才能使夫妻双方有更有效的建设性沟通来解决问题。通过一致性沟通及冰山隐喻，夫妻一方要想把自身的需求说清楚，对方也会懂得自身的需求所在，这对夫妻是较为恰当、适宜的一种沟通方式。

（三）厘清家庭整体中的角色与边界

萨提亚模式认为，家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每个成员的言行都会影响其他人。在分析夫妻关系时，不能只看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还要考虑整个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比如，有些夫妻的矛盾可能并不完全源于彼此，而是因为父母或其他亲属过度介入他们的生活，模糊了家庭的边界，导致关系紧张。通过家庭关系来看待夫妻互动问题，可以帮助夫妻跳出个人视角，看到问题的全貌。他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整个家庭系统如何影响他们的相处模式？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萨提亚的一致性沟通技术，引导夫妻用更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比如，避免指责对方，而是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尊重对方的立场。这样的沟通不仅能减少冲突，还能让双方更理解彼此。通过系统视角和一致性沟通的结合，夫妻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家庭角色，明确家庭的边界，减少外部干扰，从而让家庭关系更稳定，沟通更顺畅。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5 年 4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EB/OL].(2026-02-11)[2026-03-01].https://www.mca.gov.cn/mzsj/xzqh/2025/202504tjsj.htm.

[2] 国家统计局 .2022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统计监测报告 [EB/OL].(2023-12-31)[2025-07-31].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2.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 民政部、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20-09-08)[2025-09-15].https://www.mca.gov.cn/n152/n164/c36071/content.html.

[4] 杨发祥，张肖蒙 . 双重累积与双重转折：城市白领青年离婚的现实诱因及发生机制 [J]. 青年研究 ,2025(02):78-96,195-196.

[5] 王进，日火英支，刘佳佳，等 . 自助式夫妻沟通训练方案对产前抑郁症状及婚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37(12):1045-1051.

[6] 王茜，刘晨曦，吴一波，等 . 中国育龄人群个体、家庭及社会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24,30(06):27-40.

[7] 陈一萌，郭银宁，朱涵菲，等 . 家庭支持视角下萨提亚沟通模式在护理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J]. 中华护理杂志 ,2024,59(19):2413-2419.

[8] 李崇建，曹敬唯 . 萨提亚深层沟通力 [M].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

[9] 成蒂 . 我们之间：萨提亚模式婚姻伴侣治疗 [M].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3.

[10]SATIR V.Conjoint Family Therapy[M].CA: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1983.

[11] 杨晓星，王晶晶，谢昊，等 .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在大学生自杀意念干预中的应用效果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4,40(06):570-574.

[12] 和园园，林菁菁，张雪玲，等 . 基于萨提亚模式的居家帕金森病病人心理教育方案的构建 [J]. 护理研究 ,2024,38(09):1663-1668.

[13] 陈秀珍，杨玖林，杨晓娟 . 萨提亚模式团体干预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提升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30(02):256-260.

[14]D C G.Where did Freud's iceberg metaphor of mind come from?[J].History of psychology,2019,22(04):369-372.

[15] 约翰·贝曼 . 萨提亚：家庭治疗问答实录 [M]. 盈和贝曼项目组，译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23.

[16] 黄琳 . 聆听自己：萨提亚冥想，成就女性的健康、幸福、成功 [M].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22.

[17]MICHAEL P,NICHOLS RICHARD C,SCHWARTZ.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M].王曦影,胡赤怡,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18] 杨烁晨，杜海峰，车蕾 . 依附与脱嵌：家庭系统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研究 [J]. 劳动经济研究 ,2023,11(03):97-119.

[19] 维吉尼亚·萨提亚 .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M]. 聂晶，译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

[20] 向志强，陈盼盼 . 自我披露与边界管理 : 数字时代家庭传播隐私管理行为研究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36(04):141-146.

[21] 史慧颖，苏秋涵，郭大贤，等 .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影响：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1,43(06):168-177.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姜　喆　刘福森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推动“大思政课”建设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当前，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将思政课的教学环境从现实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网络空间与信息空间，并将教学实践体验从单向、静态的平面视听，升级为动态、交互的多维体验，为构建“大思政课”课程体系注入了创新活力。数字技术的增效作用，有助于推动思政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深化教学内容的内涵，并完善教学反馈机制。在数字化技术赋能思政课程的背景下，深化思政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必须坚持聚焦构建“大课堂”、整合“大资源”、拓展“大师资”以及构建“大机制”，以此构建协同育人的新体系。

关键词：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一、引言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这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高校亟须探索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有效路径，以提升育人实效，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深入探究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已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理论逻辑：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学理依据与作用机理

“大思政课”的本质是“课”，核心是“思政”，特色是“大”，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统筹育人主体、激活育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基于数字化赋能可以促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促进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教学方法更新迭代。

（一）价值取向同频共振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全球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深刻驱动着“大思政课”建设的转型与升级。当前，以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支撑思政课教学环境从单一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多维拓展，并推动教学实践体验从传统的单向、静态视听接收向动态、交互的沉浸式体验演进。在此背景下，教育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改革目标，更成为精准高效赋能思政课、回应时代育人需求的关键支撑。

另外，高职院校的教学对象大多数为“05后”的年轻群体，其思想认知和生活习惯已基本与时代要求接轨。成长于信息时代，他们对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平台操作已是习以为常。所以，将数字化技术融入高职“大思政课”的教学活动，能更好地适应其学习方式和行为习惯。

（二）目标体系的双向建构

“大思政课”的目标体系建构，体现在教师教学目标与学生学习目标之间的双向联动和融合，需要通过数字化方式对学生的“学”进行精准地把握，从而设计更符合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教学目标与学生发展目标同向同行。

在此过程中，数字化平台作用明显。一是通过多元的教学工具与资源为教师教学策划与实施提供支持；二是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教师教学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测与评判，并随时向教师反馈教学情况与调整意见；三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将学生学习过程、学习途径、学习资源提供给学生，让其能够更好地发挥能动性、积极互动，并以提升自主学习、健康成长等为目标体系建构“大思政课”，强化“大思政课”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三）教学改革的应有之义

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资源支

撑、保障终身教育，这符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教学改革是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一环。数字化可进一步打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更好地推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数字化是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根本遵循，是迈向教育现代化、学习型社会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实际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更新教学手段、方法，契合时代下人才发展对教学的要求。如通过开发在线课程、搭建虚拟实验室等手段，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学生能够自主随时随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目标；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对学生学习行为结果的科学分析，为每一位学生定制最适合他们的学习计划，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以及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三、价值意蕴：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时代诉求与多维价值

在当今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融入对于“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助推整合教学资源

第一，信息化技术可以丰富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将多媒体和网络资源充分运用到教学中去，使教学内容具体形象化，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兴趣，激发参与热情。第二，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促进教学资源共享、优化配置，打破时空限制，使优质教学资源广泛传播、使用。数字化赋能可依托数字化手段有效地整合校内“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美育等多方面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第三，信息化的产生使线上教学资源和线下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改善了传统教学资源的限制，令学生具有更加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拥有更加多样化的学习体验。

（二）深化教学内容深度

借助数字孪生、全息影像等技术，把真实的资源嵌入虚拟的场景中，将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理论予以具象化呈现，将重要的历史事件、感人事迹和现实成就进行可视化展现[1]，让学生更好地把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结合，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另外，数字化技术能够使得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使学生在了解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社会的发展，提高学生学习实践的意义与价值。

（三）完善教学反馈机制

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思维范式、组织架构与运行逻辑，其引发的系统性变革与重构正加速显现[2]。通过数字技术支持实现对“大思政课”更加精细的教学评估与反馈，通过数据挖掘和智能技术手段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根据学生的实际反馈及时改变教学过程，切实实现因材施教。同时，通过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也能够有效培育学生数字素养与信息处理能力，这对于今后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四、实践进路：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系统构建与实施策略

数字化赋能教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入探究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聚焦“大课堂”

为了更好地落实“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目标，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组建“大课堂”，发挥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合力，将思政小课堂、生活微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三课堂有效结合，强化思政课的亲和力。

思政小课堂注重引导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以及对党的最新理论、政策、方针的解读，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云端思政实践平台”，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虚拟红色场馆以及红色场景如长征路线以及革命古遗址等，以支持学生进行远程沉浸式的学习和研究。

生活微课堂注重从细微生活着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入“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班级和学生公寓，密切联系学生，能及时发现、有效引导学生思想上的问题，让“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与目标，静悄悄地扎根于学生心底，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标。例如，在学生社团中依托元宇宙技术构建跨校协作的“思政实践社区”，支持多校学生共同参与模拟联合国、乡村振兴规划等虚拟实践项目。

社会大课堂为学生提供了拓宽视野的平台，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组织学生参与“大学生讲思政课”“思政短视频”等思想政治类竞赛，分批次走进社会大课堂，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教师也可以采用数字化手段开发实践教学应用软件，支持学生实时上传调研数据并创建实践电子档案，教师则能动态跟踪并提供指导。学生亦可结合专业与企业对接，走近本地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以“新时代工匠精神培养”为主题的访谈活动等。采用直播进入工厂、农村、科技一线实现“现场教学 + 云端研讨”的教学模式，例如工匠直播课堂、驻村支部书记对话等。

（二）整合“大资源”

探索数字化采集存储，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对推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意义重大。搭建统一的数据服务平台，汇集整理社会生产行业企业、政府管理、各类教育等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推进教育数据跨层级、跨部门有序贯通，构筑实践教学数字底座，

沟通汇集形成“大资源”[3]。

首先，利用数字化手段推进“大思政课”教学资源建设，关键在于运用数字技术整合各类教学素材。通过对优质资源进行拍摄、扫描、录像、录音等数字化转换与采集，并依据教学主题、历史时期、存档形式等多维度元数据标准进行系统性分类、结构化存储与高效组织，最终构建起覆盖全面、形态多元、访问便捷的“一站式”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为师生教与学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4]。

其次，借用数字化赋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健全并用好实践教学基地。例如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活动，让学生走到基层去，了解国家和人民的现实情势，激发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设立学生实践成果数字化展厅，如乡村振兴方案设计大赛作品库等，推动资源“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借助数字化手段，还可以推进实践教学资源更新优化，保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

（三）拓展“大师资”

其一，构建基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多空间实时共享课堂平台，突破物理时空限制。相较于传统思政课聚焦单一课堂，“大思政课”的核心特征在于打破教学场域边界，实现课堂内外、校内校外多元主体与资源的深度协同与即时互动。为此，可邀请全国模范、大国工匠、优秀基层干部等优质校外师资入驻云端平台，开设“名家思政”系列云端讲座，并实施预约制跨校授课。在数字化系统辅助下，“大思政课”教学方式将突破时空的限制，构建同一课堂的实时互动平台。以学校教师课堂教学为主，以社会导师网上连线课堂或进校园课堂教学、讲座等形式为补充，延伸课堂教学半径，直面社会一线，让学生触摸社会真实的需求，把握社会的一线变化，真正做到学以致用[5]。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专题上，邀请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讲台线上为同学们讲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国经验。教师理论讲台与社会导员实践讲台同讲，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和亲和力。

其二，借助数字通信技术，构建时空对话的历史空间。数字通信技术的应用，可实现时空穿越，将历史不同时期紧密相连，把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具体清晰地呈现出来。比如借助数字媒体创作与革命烈士的“时光穿梭对话”，让当代青年学生借助自身时代身份与发生在那个时代的革命战士进行问答交流，展示国家发展壮大的壮举，凸显革命先烈的壮举和英雄主义精神，增强当代青年树立中国人的自信心、定力和自豪感。以此种“时光穿梭”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让学生感知每代人为坚持初心所承担的使命。

（四）构建“大机制”

1. 构建教学保障机制

首先，通过制度保障“大思政课”实践教学，需要制定实践教学计划，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标准实现清晰化、制度化，实现有计划、有效率。在教学计划制定过程中，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数字化资源库，可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便于老师制定教学计划，智能匹配技术可能基于学生情况来推荐内容，实现了因材施教。此外，动态更新机制，例如平台自动更新最新的政策或案例，保证内容的时效性。其次，强化实践教学经费支持，保障“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物资或器材供给。经费方面，数字化管理系统会更公开、更高效，如用区块链记账。用 VR/AR 设备还原实践场景可避免实体设备使用成本，使用共享经济形式如实验室预约设备，提高使用效率，使用绩效可视化系统，如数据对比支持经费优化使用。

2. 建立教学管理机制

教学管理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加大实践教学管理和监督力度，定期检测教学质量，并加以调控，让“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更加完善，不断提升实践教学的效率。一是明确合理地设计教学管理制度，明确各级教学管理者的职责和权力，确保“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管理的规范化、高效率。二是强化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过程的跟踪、考察，通过数字化教学管理系统随时掌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进程，采集和分析“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相关的学情数据，及时发现并解决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鼓励教师和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建立教学反馈机制，促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三要强化“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充分借助信息化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有效配置，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管理高效化、精准化的支持。

3. 完善教学反馈机制

教学反馈和改进机制是提升“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质量与教学实效的保证。形成定期的教学反馈机制，听学生的反馈、听教师的反馈，掌握他们的意见、建议，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进而纠正改进。这就需要强化“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反馈和改进举措，构建“思政教师 + 专业课教师 + 辅导员 + 企业导师”的全员评教共同体；教学评价贯穿入学教育、课堂教学、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实现全程覆盖。要以校园文化活动、网络思政平台等实现全方位渗透。如常态化开展师生座谈、组织问卷调查等活动，利用大数据动态收集与分析学生对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反馈意见，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鼓励教师主动进行教学反思，结合数字化反馈结果持续改进教学，提升“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数字技术发展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下转 148 页）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评价及应对策略研究

夏文杰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高等职业院校课堂教学由于教学环境、教学方法等因素，学生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怠学情况，影响了职业技能课程学习目标和效果。本研究围绕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情况开展调研，对课程性质与怠学情况以及影响怠学情况的相关要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怠学评价及改进路径，从职业生涯规划、改变教学策略、加强课堂管理等方面积极应对，以此改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学习效果，并提升职业学生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怠学；评价；控制；策略

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高等职业院校课堂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身为数字“原住民”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在多种综合因素影响下，高等职业院校课堂教学不同程度存在怠学情况，影响了高职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文章以发现和评价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和积极应对并提升高等职业院校课堂教育教学质量为研究目标，从学生正向心理引导、教师改变教学策略、加强和规范课堂管理等方面形成系统的职业院校怠学控制策略，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素质。

一、概念界定

本文中所指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行为主要是聚焦高等职业院校学习阶段的学生，在多种形式的课堂学习中产生的怠学行为。其显性表现为课内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行为，该行为较为严重，影响到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的达成即可界定[1]。本研究以作者所在院校和调研院校的基本情况为样本，研究范围局限于作者及研究团队所在和调研的院校，在研究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2]。

二、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现状调研

（一）调研情况

作者对课题团队所在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怠学行为提供参考依据。在调研中，对特定调研对象进行网络问卷发放，为确保研究的数据有效性，事前进

（上接 147 页）

就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而言，数字技术应用则是实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要重视构建数字化赋能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整合资源强化教学内容，强化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学反馈体系，为思政课的教学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优质的教学服务等，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楷芹 .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驱动逻辑、运作机理和实现路径 [J]. 当代教育论坛 ,2025(02):89-97.

[2] 高苑 . 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N]. 光明日报 ,2024-11-21(06).

[3] 田永静 , 李潇涵 .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06):114-119.

[4] 怀进鹏 . 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3,29(03):3-10.

[5] 彭庆红 . 数字化推动“大思政课”建设的依据、原则与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11):96-10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2024-QNRC-36）。

（作者：姜喆，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刘福森，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负责人、教授）

行了沟通，分别对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进行问卷的推送和问卷收集，基本保证了抽样的代表性，同时结合学习检查等开展相关活动，基本确保了问卷回收的真实和较高的回收率。通过对调研问卷的回收情况数据收集和分析，对比发现，调研中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从入学后，学生怠学情况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课堂教学中三年级怠学比例最高，男生怠学比例高于女生怠学比例。通过问卷，形成调研数据，通过整理形成了调研高职院校的学生课堂怠学调研情况，具体怠学现状情况汇总表格如表 1 所示。

表 1　怠学现状情况汇总

调研分类		主要内容
怠学表现	情绪	考试恐慌； 上课感到不愉快、索然无味、容易疲劳； 上课中被动应付情况持续发生，并不受控制； 上课时感到没有吸引力，总想做一些别的事情。
	行为	迟到、早退或虚假请假等； 上课时，打瞌睡、开小差等； 上课不带课本、不管任何情况不愿意完成作业； 完成作业过程中拖拉、抄袭，总体积极性不高； 上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无目标、无计划； 考试不愿意复习等。

（二）课程性质与怠学情况对比调研

根据所调研院校学生情况，在调研中还进行了走访，区分通识类课程和职业类课程进行怠学情况整理，通识类课程由于学生的重视度不够，更容易产生怠学的情况，而职业类课程受到学生的重视，学生学习态度较端正，怠学情况相对来说比通识类课程较轻一些。通过走访调研和查看基础数据，从显性的数据来看，学生考勤情况总体良好，节假日前后偶尔有个别旷课学生，对于手机存入手机袋存在抵触情绪，需要在督促下完成。上课互动性前后排区别较大，前排学生互动性和兴趣性较强，后排学生存在睡觉、讲话等情况。

（三）影响怠学情况的相关要素

根据调研情况分析，课程的授课形式影响着学生的怠学情绪，特别是学生对所学课程的专业喜爱程度和对课程的爱好程度，都对学生在上课时候有较大影响。调研数据显示，接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学生的积极性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任课教师的授课引导，一旦学生对老师产生不良情绪，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一些学生也表示，自己学习积极性与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等有一定关系，课程设置与时俱进，贴近实际工作会更受学生的青睐。

三、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原因分析

（一）高职学生怠学行为是基础学习阶段学习行为的接续行为

根据 2022 年教育部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职业学校 70% 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2013 年至 2020 年底，累计有 800 多万个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中职招生人数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35.08%[3]。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来源类型比较多，且与前一阶段的学习和管理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是，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不再受到高强度的学习管理和督促，开始变得放松，加之前一阶段学习中的因学科学习的不适应等问题产生的怠学问题，到了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技能学习时变得特别明显，在课堂学习中直接表现为显性的怠学行为，由于该类行为可能还伴随学生的其他情况，因此，这也是学校和授课教师管理的难点和痛点 [4]。

（二）学生怠学行为与课堂管理规范程度有关

根据作者开展的调研，学生首要关心的是课程学习考核与评价结果，因此，整个课程在教学组织中，规范性课堂管理对学生的学习积极与否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在课堂管理中，学生发生显性怠学的行为主要表现在：首先，教师的课程考核与评价标准不统一或执行不严格，是造成高职学生在课堂中怠学的重要因素。很多学生了解了课堂考核与评价情况后，一旦认识到考核评价不需要付出非常多，就会开始做一些与课程无关的事情，形成怠学行为；其次，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管理松软，对待玩手机、睡觉等怠学行为的管理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一旦学生怠学行为形成后不被约束，则会有更多学生模仿并主动加入；三是系统性课堂管理制度的执行有一定难度，比如学校的学生手册对课堂教学中学生出勤是有严格管理规定的，但是出于爱护学生和教育学生，学生虚假请假或者直接旷课的管理和处罚往往是两难的，因此，课堂规范性管理制度的虚设是怠学行为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缺少有效且有吸引力的合理学习规划

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学生面临毕业后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他们在学习中总是面对自媒体对所属行业和学习专业的各种展示，在一些媒体的负面信息引导下，学生在校内往往受到这些就业忧虑的干扰，从而对个人的职业期待产生焦虑，进而影响到校内学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怠学的产生。另外，由于高等职业院校就读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原生家庭和经济情况使学生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课外的一些兼职活动上，课堂学习被忽视。作者通过访谈发现，课堂学习正向牵引力不足也造成了怠学的心理发展，很多学生对所属行业企业认知比较片面，特别是自己在专业学习中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习、实习和工作，对学生本人的优点、能力情况估计不足，因此，学生往往感到学习的牵引力不足，更进一步触发怠学的情绪。

四、怠学行为评价及应对策略

（一）高等职业院校怠学行为评价维度设计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怠学行为是否成立或者怠学程度如何，首先要形成有效的怠学评价体系，通过系统的评价，对怠学情况进行多维度的确定，从而为高等

职业院校教师和教学管理者提供基本的判断标准，为教学中提供有效的改进策略提供基本依据。课堂教育教学管理中怠学评价维度主要从显性和隐性的角度进行指标设计，作者通过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调研和总结，形成学生怠学行为评价维度设计，见表 2，以此开展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课堂学习中的怠学行为进行判定 [5]。

表 2　怠学行为评价维度设计

评价维度 [6]		评价具体表现
显性	学校课堂考勤情况	学生是否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到课和离开课堂等情况。
	课堂中的学习状态	1. 学生在课堂内上课集中学习情况； 2. 学生在上课是否睡觉、打瞌睡； 3. 学生在上课参与及与老师互动情况； 4. 学生在上课学习质量。
	课程结束后作业完成	1. 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作业是否能按规定时间完成以及是否能独立完成； 2. 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情况。
	考试成绩	学生完成学习后，学生学习科目中不及格科目数量。
隐性	学习目标	专业学习和课程学习目标明确，对岗位技能掌握有渴求。
	学习动力	对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专业学习充满信心。
	心理状态	是否漠视学习、对公共学风和氛围表现出无所谓等状态。
	职业生涯规划	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目标，整个学习期间针对职业技能学习和实习等规划较科学，学习路径清晰。

（二）做好职业学习引导教育和课程的适配改革

做好职业学习的引导教育，给学生以科学的个人职业规划引导，增加专业学习的内生动力。首先，开展职业学习的规划意识教育，学生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类的课程，建立职业学习和规划的意识；其次，加强职业实习实训中的职业学习规划教育，学生在校内对岗位和职业的认知是比较浅的，因此，要让学生通过实习接触岗位，在实习中获得岗位和职业认知，进一步形成职业规划认知；再次，做好学生的职业和就业的咨询工作，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学习规划咨询作为辅导员必备的工作，通过辅导员和学生的交流，让学生认识自我的优势和岗位兴趣爱好，系统进行职业规划并形成职业学习良性方案；最后，要做好适配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内容调整，建议在课程中增加与职业规划相关的内容，使学生对职业学习产生内生动力，改掉怠学行为。

（三）强化和规范高职院校课堂教育教学管理

高等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是教学行为实施的重要场所，课堂的规范管理可以形成良好的教学秩序和优良的学风，促进教学活动的积极进行、达成高质量的课堂教学目标和效果，从而有效地避免怠学行为。强化和规范课堂教学管理，可从以下方面开展：首先，教师应该作为规范课堂教学管理主导者，明确课堂的规范要求，向学生阐述和明确规范的学习行为和要求；其次，明确要求以后，教师应该作为执行者对课堂进行细致有效的管理，对课堂的学习行为进行规范和实时纠正；最后，规范的课堂教学管理还应对教师的教学本身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的教学提升，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提升，结合学生学情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优化，比如引入 AI 辅助教学设计，让课堂组织和管理更科学、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

（四）系统的课程管理约束机制

形成系统的课程约束机制，以约束机制建立良好的课堂公信力，让学生敬畏课堂，减少或避免怠学行为。作者在调研的高等职业院校中发现，课程约束是比较完备的，因此，需要关注的是从执行角度形成系统的课程管理约束机制：首先，梳理学校层面的对课堂学习的管理政策，从怠学行为的界定和发生后果方面进行梳理，形成有效的政策网络；其次，建立“学校 + 院系 + 班级 + 教师”四位一体的约束控制系统，以政策为依据，院系执行为主阵地，将教师课堂记录和班级辅导员管理协同进行，对结果进行有效记录并将结果反馈到院系进行处理；最后，建立怠学档案制度，要以制度为依据，形成系统的档案记录，结合当前 AI 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定期进行整理并形成预警制度，及时反馈到教师和学生，最终形成有效的怠学控制措施，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总之，怠学行为在高等职业院校课堂教学中是常见的课堂行为之一，学校针对课堂教学主阵地的管理是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作者希望从规范课堂管理、执行课堂教学制度、职业生涯规划和建立约束机制等方面形成系统的怠学行为控制机制，以高职院校学情为依据，积极控制怠学行为，促进学生学习质量和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6]。

参考文献

[1] 王凤华，李靖靖 . 高职院校学生逃课问题探究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2(10):53-54.

[2] 杨丽娴，连榕 . 学习倦怠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5,6(02):54-5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 [EB/OL].(2022-08-20)[2026-01-15].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0_654207.html.

[4] 范婷婷，助平锋 .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倦怠问题的研究与对策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44(12):45-49.

[5] 张晓明，李红梅 . 高职学生学习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0,41(29):58-62.

[6]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EB/OL].(2019-06-11)[2026-03-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906/t20190618_386287.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基于怠学行为控制的职业院校学生素质提升策略研”（GJXY2025N049）

（作者系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王　平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与建筑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以下简称“建管专业”）作为培养基层建设管理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阵地，其人才培养面临产教脱节、实践能力弱化、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位等突出现实挑战。本文立足产教融合核心内涵，以全国32所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为调研对象，通过实证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剖析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定位偏差、融合不深、师资薄弱、实践不足等问题，结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实践探索，研究提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课程体系、以校企协同为载体创新培养机制、以双师共育为支撑强化师资建设、以质量管控为保障优化评价体系的四维实施路径，为高职院校建管专业培养“懂技术、善管理、能创新”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理论参考与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一、引言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发展理念，也是破解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抓手。《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达31.2万亿元，随着BIM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筑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普及，行业对既懂工程技术又具备现代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作为培养基层建设管理人才的主阵地，当前普遍存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问题：2024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建管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仅68.3%，企业满意度不足70%，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本文基于产教融合理论，结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实践探索，系统构建建管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助力专业建设提质增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二、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

（一）培养定位与产业升级适配度不足

调研显示，72%的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近5年未进行重大修订，课程体系仍以传统工程管理理论为主，对智能建造管理、绿色建筑运维、建筑信息化管理等新兴领域覆盖不足[1]。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3年行业人才需求报告指出，BIM项目管理、建筑碳排放核算等岗位人才缺口达43%，而相关课程在高职院校开课率仅28%。这种滞后性导致毕业生难以适应“双碳”目标下建筑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需求。

（二）产教融合深度存在结构性短板

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实习基地挂牌”“订单班签约”等浅层次合作，实质性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形成。在调研的32所院校中，仅有15%的企业参与专业课程标准制定，8%的企业派工程师承担核心课程教学，校企共建的活页式教材开发完成率不足30%[2]。广东某建筑企业人力资源总监指出：“学校实训设备落后于企业实际应用5—8年，学生到岗后需经历3—6个月的二次培训才能适应岗位要求。”

（三）“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专任教师中具备5年以上行业实践经验者仅占23%，“从学校到学校”的教师占比达65%。部分院校虽聘请企业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师，但存在“重引进轻管理”现象，兼职教师授课课时占比平均不足15%，且缺乏系统化的教学能力培训。2024年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监测数据显示，建管专业教师参与企业实践项目的比例仅41%，产教融合背景下的课程开发与教学改革能力明显不足。

（四）实践教学体系存在断点现象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侧重单项技能训练，如工程测

量、资料管理等，缺乏对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综合模拟。校外实习因建筑项目周期长、安全管理严格等因素，学生多从事简单辅助工作，难以接触项目核心管理环节[3]。某高职院校跟踪调查显示，仅 22% 的毕业生认为实习经历对岗位胜任力提升有显著帮助，实践教学的“实战性”特征未能有效体现。

三、产教融合导向的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一）对接产业需求的课程体系重构

1. 构建“岗课赛证”融合课程体系

在智能建造与绿色施工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课程体系重构遵循“职业岗位能力导向—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模块开发”的逻辑链条。通过召开行业企业专家研讨会，提炼出建筑工程管理员岗位的 12 项核心能力，对应开发“BIM 协同管理”“绿色施工技术与应用”“建筑碳排放核算实务”等 10 门模块化课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实践”赛项中的“智慧工地管理”模块，已转化为“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虚拟仿真环境中掌握无人机巡检、BIM5D 进度管控等前沿技能[4]。广东某高职院校将 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设置 24 课时的考证强化模块，2024 年该证书通过率达 89%，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37 个百分点。

2. 开发动态更新的活页式教材

教材建设实行“双周期更新”机制，基础理论部分每 3 年修订一次，实践案例部分每 1 年更新一次。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中建四局、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智能建造项目管理实务》教材，构建“纸质教材 + 数字资源包”的立体化形态，配套开发 12 个施工管理 VR 动画、8 个企业项目管理流程演示视频[5]。教材收录的广州国际金融城项目智慧工地管理案例，详细解析了 BIM 技术在深基坑监测、装配式建筑进度控制中的实际应用，使学生在校期间即可接触到行业顶尖项目的管理经验。据该教材使用院校反馈，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时，对 BIM 管理平台的操作熟练度提升 60%。

3. 建设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平台

校内实训基地按照“教学做一体化”理念进行场景化改造，新建的“智能建造实训中心”划分为 BIM 技术应用区、绿色施工模拟区、工程管理沙盘区三大功能模块。其中 BIM 技术应用区配备 100 台专业图形工作站，安装 Revit、Navisworks 等 12 套行业主流软件，可支持 1:1 还原真实工程项目的三维管理场景；绿色施工模拟区通过环境控制设备，模拟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节能施工方案比选。校外实践教学采用“双基地轮训制”，学生在中建集团等龙头企业的示范项目完成 3 个月的全流程跟岗实习后，再进入本地中小建筑企业进行 2 个月的岗位专精实训，实现“大企业学标准、小企业练全能”的梯度培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徐州地铁 6 号线项目实训期间，运用所学的 BIM 进度管理技术，发现并解决 23 处工序冲突问题，为项目节省工期 17 天。

（二）创新校企协同的培养机制

1. 产业学院引领的深度融合模式

区域建筑产业学院的建设采用“政府引导、龙头牵头、多元共建”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共建的“鲁班产业学院”，设立智能建造管理、建筑工业化等 5 个专业群管委会，由企业高管与学校专业带头人共同担任主任。产业学院实行“项目化教学周”制度，每学期安排 4 周时间，学生整建制入驻企业项目现场，在工程师指导下完成“建设工程监理实务”等课程的模块化学习。课程考核采用“双维度评价”：专业能力考核由学校教师负责，重点考查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职业素养考核由企业导师负责，包括安全管理执行力、团队协作效能等 6 项指标。该模式培养的“项目管理精英班”学生，毕业起薪达 8500 元 / 月，较同类专业平均水平高出 35%。

2. 现代学徒制的双主体培养

现代学徒制实施“三阶段递进培养”：第一阶段（第 1—2 学期）为岗位认知期，学徒在企业导师带领下参与项目现场观摩，完成“建设工程监理实务”等课程学习；第二阶段（第 3—4 学期）为技能精进期，绑定具体施工岗位（如质量员、安全员），在真实项目中完成分项工程管理任务，累计完成不少于 500 工时的岗位实践；第三阶段（第 5—6 学期）为综合管理期，担任项目经理助理，参与整个建设项目的进度协调、成本核算等工作。江苏某建筑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学徒制班，创新“项目积分兑换制”，学徒每提出 1 项合理化建议可积 10 分，累计积分可兑换企业课程资源或优先录用资格。2024 年该班学徒在企业实践期间，共提出 76 项管理优化建议，其中 12 项被企业采纳并推广，节约项目成本约 120 万元。

3. 创新创业能力的立体化培养

创新创业教育构建“课程奠基—竞赛提升—实战转化”的三层培养体系。在专业基础课中开设“建筑产业创新思维训练”必修模块，引入 TRIZ 创新方法、精益管理理念等内容；在专业核心课中设置“创新案例研讨”环节，分析雄安新区绿色建造创新实践、深圳装配式建筑管理模式等典型案例。校级“鲁班杯”创新创业大赛设置“智能建造管理创新”“绿色施工技术改进”等专项赛道，近三年累计孵化出 23 个创业项目，其中“筑智云——中小建筑企业 BIM 服务平台”项目，已为本地 17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实现营收 80 余万元。学校设立 500 万元“产教融合创新基金”，支持学生团队承

接企业微项目，如某学生团队为社区旧改项目提供的BIM运维管理方案，使项目后期维护成本降低22%，相关成果入选住建部《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集》。

（三）双师共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1.“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

实施“三三制”教师能力提升工程：要求专业教师每3年必须参与1个真实企业项目，每3年累计不少于300学时的行业实践。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双师素质认证中心”，制定包含“企业项目经验”“技术研发能力”“实践教学水平”的三维评价体系，认证通过者享受每月1500元的双师津贴。学院设立“产业教授流动站”，每年选派5—8名骨干教师到中建、中铁等企业挂职担任项目经理助理，参与项目管理全过程。2023年，该校教师在挂职期间主导完成的“智慧工地安全管理系统优化”项目，获得江苏省建设科技创新奖，相关技术改进方案已在12个在建项目中应用。

2.兼职教师资源库建设

兼职教师管理实行“星级评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教学能力、行业影响力等指标划分为三星级（基础教学岗）、四星级（课程开发岗）、五星级（专业建设岗）。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聘请的五星级兼职教师（企业总工程师），需承担三项核心任务：每学期开设2次“行业前沿大讲堂”，指导1个学生创新团队，参与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为兼职教师建立“教学能力提升工作坊”，定期开展教育理论、信息化教学技术等专项培训，2024年累计培训兼职教师216人次，其中35人获得“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教学能力认证”。由兼职教师主导开发的《建设工程招投标实战指南》微课，上线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后，点击量超过50万次。

3.校企协同的教研共同体

校企联合成立“智能建造管理研究中心”，聚焦BIM技术应用、绿色施工管理等前沿领域开展协同攻关。近三年，研究中心承担住建部科技计划项目3项、省厅级课题17项，形成《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报告》等重要成果。在教研成果转化方面，建立“双螺旋”应用机制：技术类成果（如专利、工法）通过企业技术中心转化为生产力，管理类成果（如流程优化方案）纳入学校课程教学案例库。江苏某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研发的“基于BIM的施工进度动态管控系统”，已在56个在建项目中应用，使平均工期缩短12%，该系统的操作流程被转化为《工程项目进度管理》课程的实训项目，覆盖全省12所高职院校的建管专业。

（四）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优化

1.建立动态反馈的培养质量监测机制

构建“数据采集—分析预警—改进实施”的闭环管理系统，通过校企合作开发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测平台”，实时采集学生的课程成绩、技能证书获取情况、企业实习评价等18项核心数据。平台设置三级预警指标：当某课程不及格率连续两学期超过25%时触发黄色预警，启动课程诊断与教学改革；当企业满意度连续三年低于75%时触发红色预警，倒逼专业培养方案重构。2024年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某院校建管专业学生的“施工组织设计”技能达标率仅68%，校方随即联合企业开发专项实训项目，三个月内达标率提升至89%。

2.创新多元参与的毕业综合评价模式

毕业考核实行“1+X+Y”综合评价体系：“1”为毕业综合实践报告，要求基于真实工程项目完成全过程管理方案设计；“X”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需至少取得1项与专业相关的1+X证书；“Y”为企业实践成果，包括在实习期间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参与完成的技术改进项目等。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答辩采用“校企双盲评审”，企业专家占评审委员会的50%，重点考查学生方案的实操性和创新性。2024届毕业生中，有17份毕业实践报告被企业直接采纳作为项目管理方案，6项学生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完善产教融合的长效激励机制

院校设立“产教融合贡献奖”，对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给予三大激励，优先推荐企业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合作单位，优先向企业输送优秀毕业生，优先开放学校科研平台资源。广东某建筑企业因在学徒制培养中表现突出，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示范单位”称号，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享受3%的加分优惠。同时，建立校企合作成本分摊机制，政府对企业投入的实训设备、师资薪酬等给予最高30%的财政补贴，2024年某省共发放产教融合专项补贴1.2亿元，惠及78家建筑企业。

四、结论

产教融合是破解高职院校建管专业人才培养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构建“三维联动·五阶递进”培养模式，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实践表明，这种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就业质量，相关院校建管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提升至85%以上，企业满意度达88%。其核心经验在于，以产业需求为逻辑起点，通过课程体系重构解决“教什么”的问题；以校企协同为实施载体，通过培养机制创新解决“怎么教”的问题；以双师共育为支撑保障，通过师资队伍建设解决“谁来教”的问题；以质量管控为重要抓手，通过评价体系优化解决“教得怎么样”的问题，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未来，高职院校建管专业需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持续优化人才培养路径，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协同，不断完善“岗课赛证”融合课程体系、双师型师资队伍与质量保障体系，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创新，为建筑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落地见效。（下转154页）

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协同构建策略研究

蒋　莹

摘要：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融合教育作为实现教育公平，并推动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理念，正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现已成为特殊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融合教育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已成为教育变革的关键引擎，让特殊学生融入主流课堂、掌握信息技术技能，不仅是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更是帮助其突破生理与认知局限及拥抱数字时代的关键路径。鉴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融合教育下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行动策略，以期构建适配特殊学生的信息技术课堂，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融合教育；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构建路径

近年来，全球教育领域掀起融合教育浪潮，我国积极响应这一趋势，相继出台《“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重点提出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深度融合的理念，以保障特殊学生平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从根本上重塑了传统教育生态，为特殊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当前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仍普遍存在“一刀切”现象，加之教师在融合教育理念下开展信息技术教学的实践经验不足，导致课堂难以实现协同发展。因此，如何基于融合教育视角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1]。

一、融合教育下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价值意蕴

（一）回应课程改革的核心诉求

当前特殊教育课程改革正从传统知识传授型转向素养导向型，核心是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独立生活的综合能力。一方面，《特殊教育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加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引导特殊学生掌握数字时代基本技能。这就需要突破传统课堂中信息技术应用表面化的问题，依据课程标准系统设计教学内容与活动，帮助特殊学生循序渐进掌握技能，切实落实信息化素养培养与融合教育目标。另一方面，课程改革倡导的“以生为本”“分层教学”理念，在特殊教育中尤为重要。特殊学生群体的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差异显著，而传统信息技术课堂“一刀切”的教学模式难以适配需求。借助融合教育优势，引入智能评估系统为不同类型特殊学生量身定制差异化学习路径，才能实现“一生一策”的精准教学，契合课程改革对教学模式创新的要求。

（二）契合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特殊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教育专业化成为核心趋势，构建信息技术课堂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重要实践。在教师专业发展层面，专业化特殊教育对教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不仅需要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更需

（上接 153 页）

参考文献

[1] 魏琼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汽车维修技师 ,2025(10):58-59.

[2] 周娅敏 , 徐圣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生物化工 ,2025,11(02):200-203.

[3] 张行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老年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老字号品牌营销 ,2025(08):223-226.

[4] 仇义 , 方学良 , 李高伟 , 等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新工科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汽车维修与保养 ,2025(04):74-76.

[5] 贾晓松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J]. 质量与市场 ,2025(03):174-1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党建赋魂、数字赋能、实践赋彩：‘四色型’高职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群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JC23249）。

（作者单位：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要掌握先进教学技术与方法。融合视角下的信息技术课堂为教师提供了信息化教学实践平台，促使教师深入学习智能教学工具与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在实践中提升教学能力，推动教师队伍向专家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教学方法层面，特殊教育专业化强调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特点采用科学精准的教学模式。例如，针对听力障碍学生可利用可视化图形、手语动画资源辅助教学；针对智力障碍学生可设计阶梯式、游戏化学习路径。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多维记录学生学习表现，生成精准学习评价报告，为教学改进与个别化教育提供支撑，为特殊教育专业化发展营造良好生态[2]。

二、特殊教育融合模式的实践困境

融合教育的核心要义是为身心障碍学生提供常态化的教育环境，保障其与普通学生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彰显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当前，融合教育在我国实践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短板，主要面临以下现实困境：

（一）实施标准缺失导致教学失序

当前特殊教育中，融合教育面临的突出困境是缺乏规范的实施标准，这一问题会在教学实践各环节产生连锁影响，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现阶段，我国多数普通学校不将特殊学生成绩计入班级总成绩，这种统计方式使得学校与教师在教学资源分配及课程规划时，更倾向于向普通学生群体倾斜，特殊学生的教育资源保障仍有提升空间，融合教育的实施深度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特殊学生在学习中需更多关注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更关键的是，因缺乏规范性衡量标准，特殊学生的学业发展尚未形成科学的评估体系，也未明确清晰的阶段性与终结性目标，“怎样才算达标”“如何达标”仍需进一步细化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特殊学生难以在融合教育中获得精准有效的教育干预，需要通过完善标准、优化评估，推动特殊学生在融合教育中更好地获得成长，进一步彰显融合教育的价值，助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教学适配不足导致质量偏低

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许多教育者已将特殊学生安置于普通班级，实现了形式上的融合，但在日常教学中，特殊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的结合仍需加强。例如，课堂教学中教师多以普通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节奏设计课程，针对特殊学生行为特点开展差异化教学的意识和能力仍需提升，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在教学适配性上仍有优化空间。

从教育管理视角看，普通班级教师往往需要兼顾数十名学生的教学与管理任务，在缺乏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与协同机制的情况下，对特殊学生实施精准化指导的力度仍需加大，特殊学生在部分学习环节仍需更多针对性支持。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教学适配，落实融合教育“平等”“全纳”的宗旨，推动融合教育从形式融合向内涵融合转变，提升融合教育的实际质量[3]。

（三）专业师资匮乏导致融合教育支撑体系薄弱

推进融合教育向纵深发展，需要学校配备具备特殊教育背景的专业教师团队，以精准匹配特殊学生的实际需求，实现教育深度融合。当前，多数学校仍以普通教育师资为主，这类教师具备扎实的基础教学能力，但在特殊教育理论储备及相关实践经验方面仍有欠缺，应对特殊学生复杂多样学习需求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例如，在信息技术课堂中，面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教师对其刻板行为背后沟通诉求的理解仍需加深，结合其特点设计教学活动的能力仍需强化，以更好满足该类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

此外，当下大部分学校受编制、资金等因素影响，尚未建立涵盖多领域的专业教师团队，特殊学生在康复训练、职业启蒙等提升社会适应力的关键环节，仍需更多专业支持，以助力其在融合课堂中获得实质性发展。未来需着力加强专业教师团队建设，补足融合教育支撑体系薄弱环节，推动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实现更高质量的双向融合。

三、融合教育下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构建路径

（一）建立规范的实施标准

在融合教育背景下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建立规范的实施标准是破除发展困境、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当前实施标准不一，导致特殊学生难以获得稳定且科学的教育支持，而规范的实施标准可为融合教育信息技术课堂提供明确行动指南，依据特殊学生的障碍类型及学习能力制定清晰的培养目标，使教学开展既具有普适性又满足个性化需求。具体可从以下角度入手。

一是立足政策引导，结合《“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特殊教育课程标准》等政策文件，明确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建设目标及基本框架，对课程定位、教学目标等核心要素进行标准化界定。同时参考国际特殊教育信息技术教学标准，结合我国特殊学生群体特征及教育实际，制定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实施细则，针对听障、视障和智力障碍等不同类型学生，分别规定信息技术课程的知识技能掌握要求，为教学目标达成设定明确标准[4]。

二是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联合特殊教育专家、一线教师、信息技术工程师及特殊学生家长代表组建标准化研制小组。这一机制可发挥多主体优势：专家从理论层面提供特殊教育与信息技术融合的专业指导，一线教师结合课堂实践反馈实施难点，技术工程师从技术层面提供应用可行性与适配性建议，家长从特殊学生家庭学习需求补充意见。通过多主体的融合互补，从根本上保证实施标准兼具

科学性与实操性。

三是完善配套设施，标准落地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措施。一方面需开发标准化教学资源库，重点整合适用于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课件模板及互动软件，所有资源按学生障碍类型和教学目标分类，便于教师检索使用；另一方面需搭建区域性信息技术教学管理平台，利用平台实现教学计划备案及教学质量检测，动态跟踪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实施情况，并结合教育技术发展趋势与特殊学生学习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优化标准内容，确保课堂始终保持专业性与时代性，实现从无序探索到规范发展的跨越。

（二）推进个性化教学

强化针对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是实现教育公平、提升教学效能的核心路径。特殊学生群体涵盖听障、视障、智力障碍等多元类型，受障碍程度影响，其认知和学习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存在明显短板。因此，基于融合教育视角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必须重视特殊学生个体差异，以“生为本”为核心教育理念，让每位特殊学生在信息技术课堂中获得充分发展，达成融合教育促进特殊学生全面融入社会的终极目标。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方面，建立全面精准的学生评估体系。借助智能化评估工具，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深度分析特殊学生的信息技术基础、障碍类型及程度，明确不同学生的短板与优势，为每位学生生成个性化学习档案，为后续个性化教学提供关键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构建动态分层的教学模式。依据评估结果，将教学内容拆解为不同梯度与呈现方式的学习任务。以听障学生为例，鉴于其听觉信息接收障碍，需将传统以语音为主导的信息技术课堂转变为可视化、视觉优先的教学场域。例如，教授办公软件操作时，教师应摒弃单纯语言讲解，转而制作动态分布图示、三维操作模拟动画，以箭头标注和高亮色块突出操作步骤，将流程转化为清晰的视觉化指南；同时搭配手语翻译数字化工具，将复杂专业术语转化为标准手语动画嵌入教学，帮助听障学生理解抽象信息技术概念[5]。

再如针对唐氏综合征学生，这类学生认知发展缓慢、注意力易分散、动作协调性较弱，课堂教学应简化内容。教授办公软件使用时，可将文档排版任务分解为“调整字体大小→设置段落间距→插入图片”等独立步骤，每个步骤仅包含 1~2 个关键操作，并搭配清晰实物图片和场景化图示辅助理解，降低知识理解门槛。教学方式上融合情景化设计以激发参与度，例如学习基础编程时，引入图形化编程工具将代码转化为色彩鲜艳、形状各异的拼图模块，学生通过拖拽组合模块完成简单动画指令，既简便又实用，使其在愉悦氛围中加深知识记忆，实现信息技术课堂对唐氏综合征学生的个性化适配与有效支持。

（三）增强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是决定教学成效的核心要素。普通教育师资因缺乏特殊教育训练，往往难以精准把握特殊学生的需求及信息技术学习规律，导致教学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状态；而专业特殊教育师资可基于学生障碍类型和认知特点，将复杂信息技术知识转化为适配性强的教学内容，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基于融合教育背景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需构建“职前培养 + 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职前培养阶段，师范生在校系统学习期间需增加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融合的必修模块，使其具备特殊教育基础能力，为融合教育夯实基础。职后培训阶段需进一步深化，开展分层分类培训：针对信息技术教学水平一般且缺乏特殊教育经验的教师，列入基础普及班，培训基础信息技术软件及相关教育 App 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技巧；针对有一定基础但缺乏实践的教师，列入进阶提升班，聚焦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针对基础扎实且具备一定特殊教育经验的教师，开设专家引领班，围绕前沿技术与特殊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展开。通过构建完整的培训体系，保障师资队伍持续发展，为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结语

融合教育是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是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引擎，二者的深度融合为特殊教育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的构建，不仅承载着特殊学生融入数字时代、实现全面发展的殷切期望，也为实现教育公平与全面发展的教育诉求提供关键基础。然而，就当下而言，特殊教育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绝非一蹴而就，未来仍需不断细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而推动融合教育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1] 肖皓月 . 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融合创新的策略 [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2(08):60-62.

[2] 范绕 . 教育信息化视角下听障大学生融合教育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36(09):156-158.

[3] 邓猛 , 张玲 , 张瑶 . 高质量教育发展背景下我国特殊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内涵、特征与方向 [J]. 中国特殊教育 ,2022(08):3-10.

[4] 宗光 . 融合教育下构建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的行动策略 [J]. 生活教育 ,2023(30):56-58.

[5] 刘凤姣 . 中职特殊教育计算机应用专业聋肢融合教学探索——以 Photoshop 中的宣传册设计与制作教学项目为例 [J].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 (学生版),2023(33):172-174.

（作者单位：彰武县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发展的价值转向

刘诗慧

摘要：在产业变革与教育改革背景下，职业院校要积极探索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发展的核心方向。传统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难以适应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探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不仅是摆脱当前团队发展困境的现实需求，更是职业教育顺应产业变革、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旨在为团队摆脱传统发展桎梏，构建与产业同频、与育人过程同步的新型发展模式提供思路，助力职业院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技能型社会建设。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学创新；团队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重塑经济结构，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提质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从数量供给转向质量适配。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作为职业院校推进教学改革、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载体，发展模式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育人效能。然而传统团队发展中存在价值取向与产业需求脱节、功能局限于校内教学研讨、运行依赖行政指令、成果难以转化为教学实践等问题，导致团队难以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推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现深刻的价值转向，不仅是对自身发展瓶颈的突破，更是职业教育主动回应时代变革、深化内涵建设的战略选择，本文将从价值转向的意义、现实问题与构建策略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团队建设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价值转向的意义

（一）顺应产业变革，驱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岗位需求动态调整，对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更高要求，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打破传统教学与产业发展的时空壁垒，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专业建设逻辑。价值转向后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可以主动对接产业发展趋势，通过跟踪行业技术标准、分析岗位能力图谱推动专业内涵升级，既聚焦产业核心领域优化专业布局，淘汰落后专业、增设新兴专业，又重构课程体系。

（二）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可以将团队打造为校企协同育人的桥梁与纽带，推动产教融合从形式合作走向深度共生，不再局限于邀请企业专家讲座、安排学生企业实习等浅层合作，而是主动将企业资源引入教学全过程，同时将学校教育功能延伸至企业发展需求中。围绕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让教师在参与企业技术服务中提升实践能力，让学生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中锤炼技能，为企业提供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1]。

（三）促进教师发展，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成长

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对产业实际情况了解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实践教学，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为“双师型”教师队伍成长提供了集体赋能的平台。教师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依托团队形成互补共进的发展生态，团队会通过校企互聘机制推动教师定期进入企业实践锻炼，同时团队内部会开展传帮带、教研沙龙等活动，让具有丰富企业经验的教师分享实践技能，让理论功底扎实的教师交流教学方法，实现理论型教师补实践、实践型教师补教学的双向提升。

（四）提升育人质量，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与可持续发展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在于回归教育本质，运用团队的教学创新与资源整合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高质量就业与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又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团队还能依托校企协同育人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高

质量的实习岗位、就业机会，运用订单班、定向培养等模式，实现学生“在校学习—企业实习—毕业就业”的无缝衔接。

二、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发展的现状

（一）团队目标多元，价值追求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有待深化

当前，部分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具有一定的多元化，团队价值取向与产业需求缺乏契合度，没有形成聚焦产业、服务育人的统一目标。团队目标多围绕完成教学任务、申报教研课题等校内指标展开，缺乏对产业发展需求的主动对接。部分教师将团队工作视为额外任务，参与团队活动仅为评职称、赚积分，缺乏主动服务产业、创新育人模式的动力，导致团队难以形成合力，即便开展了相关创新工作，也多停留在表面[2]。

（二）结构相对稳定，跨领域协作与创新能力尚需提升

部分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员多以同专业、同教研室的教师为主，企业技术骨干、行业专家没有进行深度参与，导致团队对产业实际的认知局限于理论层面，难以引入产业前沿视角。部分团队以中老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占比低，或职称结构断层，导致团队缺乏创新活力，难以接受新型教学理念与技术，同时团队中的教师多擅长理论教学，具备企业实践经验、技术研发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占比低，团队整体实践能力薄弱。

（三）运行机制有待完善，长效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仍需探索

多数团队在进行运行管理的时候大多由学校或院系指定负责人，民主决策与灵活的分工机制较少，团队活动常依赖负责人推动，成员参与积极性低，且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协作效率低下。学校对团队的考核多聚焦成果数量，忽视成果质量与教学应用效果，且激励方式单一，多以精神奖励为主，缺乏与职称晋升、绩效工资、培训机会等挂钩的实质性激励，导致教师参与团队创新工作的投入产出比低，缺乏长期动力。

（四）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需提高，教学落地与实践应用期待加强

部分团队创新成果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文本层面，难以转化为实际教学效能，实际的成果转化效率较低，部分团队的创新成果是为评奖、结题而设计，缺乏对教学实际场景的考量。部分团队虽提出的教学模式理念先进，但缺乏配套的实施流程、评价标准，难以在日常教学中实施。团队既未建立成果在本校教学中的试点、推广机制，也未形成成果优化的反馈闭环，无法真正解决教学实践中的痛点问题，也无法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产业发展提供实际支撑，背离了团队建设的初衷[3]。

三、推动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价值转向的策略

（一）明确创新导向，建立需求驱动的团队发展目标机制

团队发展目标要建立在“产业需求—人才需求—教师需求”的联动分析基础上，形成“需求调研—目标拆解—动态调整”的闭环机制，以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变革为核心，通过定期走访行业企业、参与产业协会会议、分析职业岗位标准，精准识别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要求，将产业需求转化为团队教学创新的核心方向。职业院校教师要对照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聚焦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不同专业学生在知识结构、技能水平、职业素养上的短板，将人才培养痛点转化为团队的具体攻坚目标。

例如，某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围绕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构建了需求驱动的目标体系，走访本地智能制造企业、访谈企业技术总监，发现产业对具备工业机器人与 PLC 协同编程能力的技术人才具有需求缺口，且企业反映毕业生对柔性生产线调试的实操熟练度不足，据此将团队核心目标确定为“构建‘工业机器人 +PLC’协同教学体系，提升学生柔性生产线调试能力”。对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分析近 3 年毕业生就业反馈，发现学生在工业机器人故障诊断、生产线数字化建模两个模块的考核通过率存在问题，据此将核心目标拆解为 3 个子目标，即开发“工业机器人故障诊断”理实一体化课程、编制“生产线数字化建模”实训指导书、建立“柔性生产线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职业院校还可以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制定教师的成长目标，新教师需参与实训课程教案编写与实训指导，骨干教师需牵头课程开发与教学案例撰写，带头人需对接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同时每季度召开目标复盘会，根据企业反馈调整目标。

（二）优化团队生态，构建结构化、协同化的创新共同体

职业院校在推动教师团队创新时，要打破传统同专业教师扎堆的组队模式，采用“专业教师 + 行业专家 + 技术骨干 + 教学设计师”的多元结构，其中专业教师占比 60% ~ 70%、行业企业专家占比 20% ~ 30%、教学设计师占比 10%。同时根据团队目标进行角色分工，形成全员有分工、人人有专长的结构化布局。同时，学校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如每周 1 次小组例会、每月 1 次全员研讨会、每季度 1 次校企对接会，利用在线协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产业信息的实时共享，建立“任务认领—过程协作—成果共创”的协作流程[4]。

例如，某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针对产业技术更新快、校内实训设备不足、教师技术储备滞后问题，构建了协同化创新共同体。团队包括校内专业教师、本地新能源汽车 4S 店技术总监、

车企研发工程师、学校职教研究所教学设计师，按任务分为课程开发组、实训建设组、成果转化组，确保每个小组均有“教学 + 产业 + 研究”的多元能力支撑。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检测与维修”课程开发中，企业技术总监提供 2024 年最新车型的动力电池故障案例与检测标准，课程开发组教师结合学生学情，将案例转化为“理实一体化”教学任务，教学设计师指导教师采用“情境导入—任务驱动—实操验证”的教学模式，优化课程教案与课件，实训建设组利用企业捐赠的退役动力电池与校内实训设备，搭建“动力电池检测实训工位”，并由企业工程师现场培训教师与学生的实操技能，成果转化组将课程资源整理为动力电池检测教学包。

（三）创新管理范式，完善以贡献为导向的激励与保障制度

职业院校要改变唯论文、唯课题的评价标准，将教学创新贡献、人才培养贡献、产业服务贡献作为核心评价维度，教学创新贡献包括课程开发数量、教学模式改革成效、教学资源建设成果。人才培养贡献包括学生技能大赛获奖情况、毕业生就业质量、“1+X”证书通过率，产业服务贡献包括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人次、技术攻关项目数量。同时采用“过程性评价 + 终结性评价”的方式，过程性评价通过团队日志、会议记录、任务进度表衡量成员参与度，终结性评价通过成果验收、第三方评估衡量贡献值，避免重结果、轻过程导致的急功近利。

例如，某高职为推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出台《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评价与激励办法》。在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的年度评价中，评价指标及权重包括教学创新贡献 40%、人才培养贡献 30%、产业服务贡献 30%。评价过程中，经过查看团队任务台账、验收教学资源与技术成果、访谈企业与学生，最终该团队年度评价为优秀。学校对评价“优秀”的团队给予团队成员职称评审时，“教学创新成果”按省级课题对待，其中团队带头人在评审副高职称时直接获得“教学业绩加分”，发放团队专项奖金，根据成员贡献值分配，推荐团队带头人参评省级教学名师。团队成员每周有 1 个创新工作日，可以自主安排课程开发、校企对接工作，该时间不纳入课时量考核，学校每年为团队拨付专项经费，用于购买实训材料、支付企业专家咨询费、组织外出培训，积极安排团队核心成员参加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研修班，并组织团队赴某高职考察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所有费用由学校承担。

（四）聚焦教学应用，构建成果转化与辐射推广的闭环路径

职业院校要明确团队创新成果的转化导向，聚焦教学实用性与行业适配性两大核心标准，成果紧扣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如课程标准、教学方案需对应岗位技能需求，避免脱离课堂实际，并强调成果需对接产业技术升级趋势，如实训模块、教学设备改造方案需参考企业最新生产流程。同时构建“试点—迭代—定型”的成果验证流程，确保转化前充分适配教学场景，优先选择团队成员所在班级或合作院系作为试点，运用课堂观察、学生技能测评、教师教学反思等方式收集成果应用中的问题反馈 [5]。

例如，某教师团队围绕“智能制造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联合本地智能制造企业开发“基于工业机器人的生产线运维”模块化教学成果，包含课程标准、理实一体化教案、虚拟仿真实训软件、岗位技能测评量表等四类成果，对照教学实用性标准将企业生产中的机器人故障诊断、生产线调试等真实任务拆解为教学模块，参考国家《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职业技能标准》，调整实训项目的技术参数与评价指标，确保成果可直接对接课堂教学与企业岗位需求。团队选取本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两个班级作为试点，1 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2 班应用基于工业机器人的生产线运维成果，经过一学期教学实践收集学生技能数据以及教师反馈，发现虚拟仿真软件在多设备协同模拟功能上存在延迟，模块化课程在课时分配上需向实操环节倾斜。团队在校内通过教学工作坊向机械制造、自动化等专业推广成果，联合省内高职举办智能制造教学成果推广会，共享成果资源包，协助院校完成相关课程改造，在行业层面与合作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员工技能提升课程，将教学成果中的实训模块转化为企业新员工培训内容。

四、结语

综上，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价值转向并非简单的模式调整，而是职业教育回归产教融合、育人为本本质的深刻变革，从传统封闭的教研团体，到对接产业、协同育人的创新载体，团队价值转向的过程既是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主动探索，也是职业教育响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唯有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价值方向，以校企协同为核心拓展功能边界，以动态治理为支撑优化运行逻辑，以教学实效为标准衡量成果价值，团队才能真正成为深化产教融合的纽带、培育“双师型”教师的平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引擎，为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焦李媛，张雪翠，王屹 . 组织行为学视角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路径探索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02):56-65.

[2] 沈中彦，孙丹 .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逻辑、成效与未来向度——基于 32 个团队的研究 [J]. 职业技术教育，2025,46(02):54-60.

（下转 160 页）

新医科背景下药学人才培养的创新驱动实践研究
——以多校药学课程创新改革为案例

张　华　王小娟　陈　钏

摘要：在“新医科”建设背景下，药学教育正面临向跨学科、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本文以教育部“新医科”理念为指导，结合中国药学教育改革实践，探讨如何以创新能力驱动药学人才的培养优化与升级。文章从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创新、产学研融合以及政策保障体系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分析。基于多校案例和相关数据，总结了当前药学教育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适应医药产业发展需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角度进一步展望了未来药学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希望能够对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医科；药学教育；创新能力；人才培养；产学研融合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 4.0 加速演进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药学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产业前沿的先端研究边界不断拓展，新药研发、生物制剂、智慧医疗等新赛道层出不穷。而传统以化学和制药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日益显露出对“跨界”能力支撑的不足。因此，“新医科”的提出并不仅是对学科架构的微调，更是对未来医学和药学人才能力结构的整体重塑期望与方向指引。从课程设置到实践平台、从教学理念到师资结构，一切都在敦促相关教育工作者去思考一个问题：药学人才应如何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进行培养？

二、新医科背景下药学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医科理念的内涵与意义

“新医科”概念是国家层面面对科技飞速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双重压力，基于现实需求提出的一种教育新方向。它不是简单地在原有医学教育体系上进行修修补补的局部调整，而是对现有模式的重塑和指导。有意打破医、工、理、文等原本泾渭分明的学科边界，更加强调学科间的融合与跨界合作。药学领域作为一个涉及生物学和医学的复杂学科，其受到的影响和变革需求尤为明显。以往以化学为核心的培养体系虽然能够为基础药学研究奠定基础，但缺少与最新技术的接触和联动。因为现阶段的新药开发不再是实验室里单方面进行学科内深入研究的事情，而是需要生物技术、信息科学、AI 等多个前沿领域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多维度工作。在这一变化的背景下，以“医药 +X”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也自然地被越来越多地提出。

（二）药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过去十年中国药学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学科建设、课程改革和实践平台打造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与真正适应新医科提出的“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很多高校的课

（上接 159 页）

[3] 张文彦 . 高职院校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36(08):4-5.

[4] 王演艺 , 范春红 , 杨梦莹 . 由“联”到“合”: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链化建构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03):134-139.

[5] 马佳 , 段文美 . 职业院校打造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思考与实践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43(06):32-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铸教育情怀育‘四有’教师——《教学技能微训练》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HNJG-20230445）。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程体系依然带着浓厚的“旧框架”教育体系惯性，理论课的比重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教学权重，而实验和实践类课程则相对偏少。例如，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的调研显示，因现实条件制约，实验课程占比相对较低[1]。这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现场问题解决能力的锻炼造成较大阻碍。同时，在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仍显不足。由于新药研发相关的工作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和相关实验条件，一般学生在本科阶段即无法也无能力完成。

三、课程体系改革：构建创新导向的知识体系

（一）优化课程结构，构建“药学 +X”跨学科知识网络

“新医科”战略提出后原本以化学、生物学为主线的传统药学课程结构越来越显得缺乏对当前时代产业需求的应对能力。面对医药产业不断扩展的健康服务需求，高校药学教育如果还沿着过去那种线性、分科、单向的培养路径开展相关教学工作，是难以持续的。关于这一点的改革探索方向可以在相关政策中找到依据，教育部在 2018 年前后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的意见》和《新医科建设方案》中涉及药学教育的板块都在传递一个共识：未来的医学和药学教育必须强调系统性、交叉性和实践性[2]。这意味着学生被要求具备整合知识和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新疆医科大学做了一些积极尝试，主要做法是将原本分开的“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天然药物化学”三门课程，整合成一个“天然药物科学”模块，使学生能沿从药物来源、药物提取一直到作用机制的相关知识链条进行学习，其整体教学氛围更像是在做一个“项目”，而不是上三门相互独立的课程。

（二）推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增强课程适应性与时效性

过去的药学教育主要靠课堂、教材和实验室这“三驾马车”来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而现在由于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和相关 AI 大模型的不断进步，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拥有了近乎开源的数据量，同时教育的时空限制也被信息技术所打破。这种模式和教学媒介的根本性变化，为信息化教育模式带来了无限可能。需要注意的是，教育信息化并非只是换一种方式上课，而是通过新技术手段重构既有教学模式。对于这个方面，烟台大学在“药事管理学”课程里引入“超星学习通”平台，把课本上的书面法规条文、药品政策，用图文、视频、习题等碎片化方式进行重新组织，降低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时空门槛，同时，通过学校专业师资的审核，保障了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避免了互联网泥沙俱下的非专业知识干扰学习阶段的学生[3]。除了在知识传授方面，部分课程还配套了虚拟仿真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网上模拟完成处方审核、药品审批等流程的全过程模拟操作，通过和部分企业联合研发“toB”严肃游戏，让学生在手动操作过程中完成认知—动手—反馈的闭环，让教学内容变成一个完整的且能够被教师实时观测的系统性闭环。

（三）实施模块化选修课机制，激活学生自主学习动能

为了能够打破传统课程体系中“主课强、辅课弱，必修压倒选修”结构失衡的现状，部分高校采取了选修课模块化改革的方法。新疆医科大学在课程改革中将选修课程比例提升至 10% 以上的同时，也推出“药效学前沿研究”“中试生产实训”“质量标准体系开发”等模块化课程包，对学生进行可选择性的模块教育。学生可根据研究兴趣与职业规划自主选课，实现知识的差异化获取与能力的多路径构建。学校也将课程纳入教学质量激励机制，采取“选课人数 + 学生评价”双维评估模式，在可控范围内提高教学工作的竞争性，促使教师不断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提升选修课程的教育实效与学术水准。模块化选修机制不仅增强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控制感与参与度，更为未来“药学—工程—数据”融合人才的多样化成长路径提供了可能[4]。

四、实践教学创新：提升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在“新医科”理念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实践教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脱离主干课程、作为附属补充的实习环节，而是能够贯穿学生全学习周期、推动知识转化与能力建构并重的关键教学过程。在复合型与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日趋紧迫的现实要求下，其功能已拓展至融合理论掌握、科研训练与行业理解的多维场域。在这方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开展了“三课堂融合”体系实践，将基础与设计实验转化为问题导向与任务驱动式学习场景，并在教师指导下，结合创新创业基地和企业实训平台进行同步教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校在药物研发实操与团队协同项目中引入企业导师与产业真实项目，让学生在角色模拟与任务分工中逐步形成科研思维、职业判断及伦理意识，教师也能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判断。此外，做出类似实践的还有中国药科大学，该校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构建数字化教学环境，学生可以在数字 GMP 实验室内完成从靶点筛选和结构优化到制剂评价等药物开发全过程，通过内嵌的相关教学评估系统获取针对性反馈。除了教学模式创新外，还进一步推出了针对学生、围绕创新创业教育的跨学科赛事平台与案例驱动课程，如“药苑论坛”与“制药工程设计竞赛”等竞赛项目，进一步推动学生在创意生成、市场分析、政策合规等多元维度上的能力融合。更重要的是，区域教育协同的开展使这种实践教学改革不再局限于优质高校内部的“内循环”，而是通过“药学慕课西部行”“虚拟教研室共享”等多方合作共赢机制，将优质资源从东部高校向中西部辐射。

五、质量保障与协同育人：构建药学教育新生态

随着新医科战略的持续深化影响，除教学模式创新外，药学教育评估体系也需逐步摒弃以往静态指标评估模式，转向“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三位一体的动态构建逻辑。药学类教指委制定的《药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临床药学专业认证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中确立了涵盖专业设置、课程目标、师资结构与实践能力在内的系统框架，同时也首次把“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终身学习意识”等柔性指标纳入了评估维度，这些举措标志着教育质量观念从合规性转向生成性。截至 2022 年，已有 36 个药学相关专业完成首轮认证[5]。“三级认证体系”试点的推进，则为不同层次院校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此外，也有学校通过优化校园内部评估机制实现新时期生态构建的案例。在传统实践教学中，学生成绩往往以报告提交或期末实操内容作为评定依据，这类评价方式虽然能反映学生的操作和应试能力，却忽视了学生在实验中展现的探索、团队协作以及创新解决问题等过程性能力，这种测评盲区容易造成“任务完成型学习”与“结果导向型教学”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实践教学的本质内涵[6]。

对此，诸多高校开始尝试建立全过程、全维度的评价体系。中国药科大学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中通过“严肃游戏”内置动态评分机制，实时记录学生在模拟研发过程中的操作顺序、逻辑判断、问题处理能力和反馈质量并打分，使教师能获得更具解释力的评价结果，学生也可以在过程中不断接受即时反馈，并且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或为了更高的评分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步骤上的自我优化。

国际合作亦成为我国药学教育质量跃升的突破口，中国药学会与 FIP 在课程标准对接、师资培训与教育大会机制建设上深度融合，并通过中美药学院校联盟等平台推动联合培养与国际访学，让学生在“3+1+1”模式下接触多元教育体系与科研范式，面向全球健康体系进行知识结构与价值认知的培养。在管理执行层面，信息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大幅提升了质量保障系统的响应速度与覆盖范围。国家药学 MOOC 平台上线课程已逾 320 门，覆盖百万级学习群体。平台通过行为追踪、数据分析与反馈系统动态调节教学策略，评价从“线下抽检”变为“全时反馈”，在提升资源可及性的同时，建立了跨区域、跨高校的标准协同与案例共享机制，为药学教育质量的长期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国家不断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除项目合作起到推动作用外，教育政策也不断推动药学教育质量保障从“事后评估”向“过程监控”转型。各高校结合自身教学需求构建智慧教学平台，并与教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使课程质量数据、学生学习行为轨迹、教师教学绩效等信息得以实时汇聚。这种融合新工具和先进管理方式的进步，不仅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基于证据的决策依据，也为政府、学校与行业组织间的质量协同治理奠定了数据基础。这种数据信息汇总方式也使得跨校资源联动与区域质量共建机制逐渐具备落地的可能。

六、结语

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随着“新医科”理念的深化推进与全球科技革命的加速，我国药学教育正从以往以规模扩张应对市场需求的模式，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教学的核心需求也从传统的技能传授，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人才培养，强调塑造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未来，药学教育改革需进一步深化产教协同与医教协同机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并优化现有教学管理模式，从而构建起覆盖多层次、贯穿全过程、融合多维度资源的创新育人体系。这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药学教育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持续培养兼具全球视野、深厚专业素养、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卓越药学人才，有力支撑“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医药产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参考文献

[1] 李玲，郭伟，黄磊，等. 新医科背景下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与探索——以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为例[J]. 科教文汇（中旬刊），2020(11):100-101.

[2] 李建周，汪丽燕. 新医科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分析[J]. 医学信息学杂志，2025,46(05):98-102.

[3] 何菲，冯桂波，贺春香. 新医科背景下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本科生人文教育的思考[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5,17(09):33-36.

[4] 杜诗佳，王祎，张智慧，等. 新医科背景下基础医学专业培养体系改革的思考[J]. 基础医学教育，2025,27(05):472-476.

[5] 丁达文，崔纯莹. 新医科背景下药学学科的数智赋能建设研究与探索[J]. 医学教育管理，2025,11(02):245-250.

[6] 刘佳，李森，辛萍，等. “新医科”背景下药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激发创新能力的探索[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5,17(03):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四川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新医科’视域下学科竞赛赋能地方院校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探索与实践”（JG2024-0953）；2024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改项目“‘新医科’背景下以学科竞赛培养药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探索与实践”（GJXH2024YB-060）。

（作者单位：川北医学院）

“课、岗、证、赛、研”融合视角下课程标准的制定
——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为例

刘永华

摘要：在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背景下，课程标准作为连接教育教学与职业能力的关键载体，需突破传统学科逻辑框架，构建“课、岗、证、赛、研”的融合育人体系。本文以学前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为例，基于幼儿园教师岗位能力需求，对接学前教育专业“1+X”证书考核标准，融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实践要求，结合学前儿童心理发展领域的最新教研成果，从课程定位、目标重构、内容序化、实施路径及评价体系五方面探索课程标准的创新制定路径。研究提出：通过“岗课对接”明确能力导向的课程目标，“证课融合”嵌入职业技能考核要点，“赛课联动”设计项目化实践模块，“研课互促”更新前沿理论与案例，形成“知识—技能—素养—创新”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该课程标准有效提升了学生职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为培养“善观察、会干预、能研究”的高素质学前教育师资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也为同类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课、岗、证、赛、研”融合；课程标准；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课程针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表现出来的属性规律、不同的趋势状态等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的价值作用相当突出，是一门必修课程，其和“学前卫生学”课程以及“学前教育学”课程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都是不可割裂的[1]。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具备更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对学生形成职业适应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设计思路

1. 总体思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努力实现学前教育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与教育观[2]。夯实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通过组织教育实践，丰富专业体验，从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 设计要点

本课程参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相关内容而设置。本课程无论是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当中还是在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方案规划当中占据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需要提出的就是这门课程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色彩相当强烈，具备“教、学、做”一体化的基本特点。

二、课程目标

（一）课程的总体目标

课程目标是整个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起着导向与引领作用。本课程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导向，通过反复的思考、讨论，将“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课程总目标确立为：树立更科学的儿童观；对学前教育事业有更多的热爱和更深刻的理解，着力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3]。

（二）课程的分项目标

1. 素质目标

（1）热爱学前教育专业，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形成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成为一名有道德、有高尚情操、有爱心的好教师。

（2）扩大专业视野，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具有科学创新的精神，并且在工作当中能够做到细致、有爱心，成为孩子们的“引导者”。

2. 知识目标

（1）了解各年龄段儿童身心发展的表现，理解儿童各阶段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

（2）掌握学前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3. 能力目标

（1）运用理论知识，观察、分析学前儿童的行为，解决幼儿园和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具备研究和反思评价的能力。

（2）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掌握沟通合作技能。

三、课程内容

在选择课程内容时，综合考虑岗位要求、证书要求、赛事要求、科研要求，建立“岗课赛证研”融合的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课程体系[4]。“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岗位，这是工作最根本的落脚点，学前专业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幼儿园教师或者早教机构教师。“证”指的证书，这是某一个行业所必须具备的准入门槛，例如学历证、职业资格证等。通过这些证书能够充分体现持证者自身基础理论的扎实度、实践水平等。该专业的证书主要是教师资格证和育婴师证等。“赛”即竞赛，各级机构组织的各种专业技能比赛，目前规模比较大的竞赛是全国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和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研”即科研，基于教学实践开展课题研究，研究成果直接反哺课程内容更新。综合考虑学科专业特征和知识体系对学生成长需求进行筛选，将关联性不强的内容全部剔除，最终形成7个核心模块。模块一：走近学前儿童；模块二：认知金字塔（认知）；模块三：心理调节阀（情绪情感）；模块四：行为调控台（意志）；模块五：心理拼图板（个性）；模块六：关系建构桥（社会性）；模块七：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常见问题、特殊问题及教育问题。

四、实施建议

立德树人：本课程要求在教学时力求做到两条线并举，既突出理论性的学习，又加强实践性活动，将传授知识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育才”与“育德”协同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形成科学的教育观、儿童观、教师观。

教学设计：本课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以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为指引：（1）遵循系统性原则的要求，实现目标、内容、方法以及评价等诸多要素的整合，综合考虑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2）将学生放在主体位置，学生的学情以及兴趣要被全面关注，这样才能够使学生们学习的内驱力得到释放。（3）科学性原则：依据教育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以及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确保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4）灵活性原则：能够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如学生的反应、教学条件的变化等，适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5）遵循创新性原则的指引，采取更科学以及更先进的方式方法以助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教学实施：在教学实施中，教师首先要按照预先制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教学。这包括精心准备教学材料，如教材、课件、教具等。教学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例如，理论性比较强的内容，讲解法更为适宜；对实践技能要求比较高的内容，则适宜采用实验法或项目式学习法。课堂管理也是教学实施的关键环节。教师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确保学生能够专注于学习，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处理可能出现的纪律问题和突发事件。同时，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对学生全面关注的过程，是教学的方式方法及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是学生的诉求得到满足的过程。教师需借助探究式提问以及课堂练习等多元化的方法强化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针对教学效果所进行的评估工作和反思工作也是教学实施领域关键的组成要素。在课程正式结束之后，教师可以凭借作业批改以及考试测验等多种方法对学生们的学习成果进行测评，挖掘其中的短板，肯定其中的亮点，这样才能够为有效的教学改进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源。

教学手段：本课程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用心体验、充分感受，力争做到专业内容和思政内容自然融合，达到良好的效果。（1）改进教学模式，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5]。在课程中引入信息技术，学习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要让丰富的资源得到便捷传输，通过科技赋能让课前线上自学、课中师生互动、课后分享交流形成连贯的模式。在课程开展之前，教师可以设置任务清单，学生们在网络教学平台上进行预习活动，收集前期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在课程实施环节要将学生们放在主体位置，注重对学生们知识内化能力的培养，在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当中实现思政教育的全面渗透。（2）用更创新灵活的教学方法充实课堂。综合运用情境体验、问题探究、合作学习、榜样示范、实践反思等多种方式，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完成教学目标。

五、课程评价

评价原则：本课程的教学评价，采取“多元主体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等原则。

评价主体：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双方均为评价的主体，实现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及小组内或全班学生之间的互评相结合。

评价方式：全面聚焦教学目标，聚焦学生的成长以及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实现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的高度结合。

本课程重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质量、学习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的评价，以课前准备、课堂参与、作业质量、各类活动参与度等作为评价项，全程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本课程中一些专业性的、陈述性的知识可以通过封闭式考试的方式进行测评，但

对于一些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等抽象且难以量化的指标则无法用数据来衡量，所以可以让学生通过撰写观后感、小组学习汇报、编制访谈提纲等方式加深对该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从而达到该课程的素质教育目标。

这种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方式，既能客观评价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其学习潜能，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最大限度地发挥“学前心理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效用，实现其课程目标。

结果运用：通过对教学目标达成度进行分析，搜集相关的教学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汇总，从而有效地发挥教学目标达成度的意义和价值。（1）教学质量评估：它是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高达成度表明教学活动有效地帮助学生获取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反之则可能提示教学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教学反馈：为教师提供直接而明确的反馈，帮助教师了解教学方法、策略和内容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过程。（3）学生学习状况监测：反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学习进展，有助于发现学生个体或群体在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为个性化辅导和分层教学提供依据。（4）课程设计改进：帮助课程设计者评估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适应性，从而对教学大纲、教材选择、教学活动安排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5）激励教师与学生：对教师而言，高达成度是对其教学工作的肯定和激励，促使他们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对学生来说，能够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6）保障教育公平：通过对教学目标达成度的监测，可以发现不同班级、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的差异，从而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教学大纲及授课计划

根据多本教学参考书目和文献资料，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制订授课计划，组织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编写课程教学大纲，为本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依据。

（二）课程资源包

经过近几年的工作积累，结合所用教材，整理出一套适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课程资料包。该资料包含以下资料：相关章节的课件，相关章节的学习提纲，案例，视频，相关章节的章节习题。

（三）线上教学资源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丰富“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课程教学资源。利用“心理访谈”“最强大脑”“学习通”等，补充、完善“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课程教学体系。利用“樊登读书”App、“壹心理”App、“喜马拉雅”App等，为学生推荐相关心理学书籍。

（四）相关课程及跨学科资源

整合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教材相关的课程资源，比如“学前教育概论”“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游戏”“幼儿园环境设计”等课程，帮助学生建构扎实、丰厚的理论体系，实现课程的多学科整合。

七、其他说明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深化学前教育专业改革，完善培养方案，强化学前儿童发展和教育专业基础，注重培养学生观察儿童、支持儿童发展的实践能力，并在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增加特殊教育专业课程，提高师范生的融合教育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这对于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意义重大。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因子，职业教育也是高素质以及实践型人才培养的摇篮。因此职业教育要在社会经济持续进步、人的素养全面提升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人才培养提质的新需求

高职院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高职院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高职院校的教学活动要和社会诉求紧密相关，人才培养的方案要常态化调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要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

要在强化类型定位以及跨界融通上进行持续探索。育训并重是要遵循的基本理念，这样才能够让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独立性、精准性以及适应性得到提升。未来改革的方向要聚焦于产教融合这个领域，学校应该尽可能地建设在企业附近，专业应该以产业链为基础进行设置，这样才能够使产教融合的层次更深、精准度更高。在新形势下，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标准修订需要努力寻找课堂教学的突破口，适配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人才培养质量是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主线，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常态。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更加关注学生技能服务能力的提升、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总之，“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课程标准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进行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1] 刘森.“课·岗·证·赛”背景下学前心理学课程改革实践路径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24(04):54-57.

[2] 张彩艳,何小轮,白亚波.“岗课赛证”融合下的“学前心理学”课程建设[J].科技风,2022(33):40-42.

[3] 朱龙凤.基于BOPPPS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心理学”课程为例[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下转166页）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下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承德模式研究

李欣竹　李　强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正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研究以河北省承德地区“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育人实践为切入点，构建“地域文化资源整合—三方主体协同联动—数字平台能力支撑”的复合型研究框架。通过实地调研承德高校并结合已有案例分析，系统阐释家庭、学校与社会在价值观塑造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互动机制，进而提出植根于地方特色的“和合文化涵育机制、塞罕坝精神价值引领、非遗项目实践”融合育人路径，以期为高校思政教育体系提供具有创新性、实操性与可推广价值的“承德模式”。

关键词：“家校社”协同育人；大学生价值观培育；承德模式；地域文化

一、时代背景与研究动因

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深度挖掘承德地域文化资源的育人潜能，形成一套既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学生价值观培育模式。理论上，本研究将丰富“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体系；实践上，将为承德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承德经验”，推动思政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一）数字化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困境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价值观多元化趋势逐步加剧。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深受网络环境影响，表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传统的单向灌输式价值观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多样化需求，探索多元化、互动性强的价值观培育路径成为当务之急。

（二）承德地域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

承德作为一座历史底蕴深厚、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名城，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塞罕坝精神中彰显的坚韧不拔与无私奉献、避暑山庄“和合文化”蕴含的和谐共处与包容并蓄以及承德地区众多非遗技艺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均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本土化素材与实践平台。

二、“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根基

“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源于全人教育理论。国际上以隆·米勒、小原国芳等为代表，形成了美国“学校—家庭—社区合作模式”、日本联动机制等实践范式。国内学者的创新发展，如朱永新“新教育实验”通过“家长委员会”“共读共写”构建育人网络；李镇西“民主教育”模式以“家长义工”“社区课堂”推动深度参与等理论研究均为本研究提供支撑[1]。

（二）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研究动态

大学生价值观塑造是高校思政育人的关键环节，日益重视借助多元化、互动式教学手段增强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例如，案例教学、情境模拟及社会实践等途径，已在理论指导与实践应用中展现出显著效果，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育人范式。

（三）地域文化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探索

地域文化作为独特的地方性文化资产，借助文化熏陶与实践参与，能够有效提升学生文化认同并促进价值观内化。具体路径包括：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专题课程，设计并实施文化体验类实践活动，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整合。此外，有必要建立科学

（上接 165 页）

报 ,2023,32(03):81-89.

[4] 阮学兰 . 就业导向下“课岗证”融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学前心理学课程为例 [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4(03):112-116.

[5] 杨云舒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基于课岗证赛融合视角 [J]. 辽宁高职学报 ,2019,21(01):65-6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课、岗、证、赛、研’融合视角下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研究”(2025SJYB1325)。

（作者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第二学院幼教理论教学部主任）

的评估体系，对地域文化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实施效果开展实证研究，从而明确其成效与边界，为后续理论构建与实践推广提供依据。

三、承德市“家校社”同育人机制的现状审视与挑战分析

（一）现状剖析：政策支持、实践探索与初步成效

承德市构建了“1+3+N”“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体系，包括纲领性文件、三类配套措施及高校实施方案[3]。各高校也积极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新路径，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持续开展的青年学生进社区、暑期大家访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仍存在协同机制不完善、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协同育人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面临挑战：家庭教育缺位、协同形式化、文化育人效果不佳

当前，承德市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家庭教育在大学阶段存在缺位现象，家长普遍存在“孩子成年后无需过多干预”的认知，导致价值观引导缺位；二是家校社协同存在形式化问题，沟通多依赖微信群等单向方式，缺乏深度互动与资源整合，影响协同效果；三是文化育人效果不佳，承德地域文化资源尚未充分转化、融入相关课程与实践载体，难以有效发挥其育人作用[4]。

（三）原因深究：认知偏差、机制缺陷与资源利用不足

通过深入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家长对家庭教育在大学阶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参与协同育人的意识；二是“家校社”三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导致信息不畅、资源难以共享；三是高校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不够深入，缺乏将地域文化融入思政课程、家庭教育课程的创新实践载体。

四、“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创新路径与策略探索

（一）课程端创新：融合教学模块与专题课程开发

在课程端，高校应依托开设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开发“承德地域家风文化 + 现代家庭教育技术”融合教学模块。通过设计家长成长工作坊，采用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互动式教学方法，提升家长的育人能力与教育水平。同时，开发“大学生家庭沟通技巧”“塞罕坝精神与家风传承”等专题课程，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解决家庭教育课“重理论轻实操”的问题，提高家庭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实务端创新：三阶四维协同机制构建

在实务端，应发挥辅导员、课业班主任的“家校纽带”职能，建立“三阶四维”协同机制。入学初期，通过“家庭文化档案”动态追踪学生的价值观基础，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与价值观现状。学业中期，联合社区开展“承德文化研学”“家庭—校园双向开放日”等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深入了解承德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环境。毕业阶段，通过融入职业价值观引导，联动企业提供共育实习岗位，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三）资源端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及闭环体系构建

在资源端，整合承德非遗传承人、社区工作者等社会力量，构建“课程输入—实践转化—动态评估”闭环体系。联合超星、今日校园等平台，实现闭环管理。将地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程，组织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转化课程所学，并通过数据评估，及时了解大学生价值观变化及协同育人效果。该体系推动了大学生价值观培育从“理论说教”向“文化浸润 + 行动自觉”的升级，也为高校提供了可复制的“承德模式”。

五、承德地域文化资源在价值观培育中的创新应用与实践

（一）塞罕坝精神：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引领与行动转化

塞罕坝精神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核心，是承德地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精神资源[5]。在高校价值观教育中，可依托这一本土案例，开发“塞罕坝精神与当代青年责任”系列课程，将林场建设者的真实事迹转化为教学资源，例如，通过案例剖析、主题研讨、项目化学习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意义。同时，可组织学生赴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劳动实践、生态调研或参与“绿色守望”志愿服务，使其在身体力行中强化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同，实现从认知到行动的价值内化。

（二）避暑山庄“和合文化”：共同体意识与和谐价值观的培育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作为清代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其蕴含的“和合”理念——即和谐共融、包容互鉴，为大学生处理多元文化共处、人际协作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在实践层面，高校可依托避暑山庄博物院、普陀宗乘之庙等场所建立“和合文化研学基地”，设计沉浸式研学路线，引导学生通过文物考察、场景模拟等形式，深入理解“和合”思想在历史上的实践逻辑及其当代延伸。此外，通过开展“和合承德”主题辩论赛、民族文化交流周等活动，促使学生在互动中建构共识，将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转化为应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素养与能力。

（三）非遗技艺活态传承：劳动教育与文化自信的双向赋能

承德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满绣、滕氏布糊画、丰宁剪纸等）不仅承载着地方历史记忆，更蕴含着手工伦理、工匠精神与民族认同等多重价值。高校可联合非遗传承人、地方文化机构共建“非遗工坊”，开设项目制课程，使学生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体会

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劳动精神。例如，通过“非遗+文创”设计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地域文化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使其在创造中理解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路径。并且通过举办非遗成果展、录制“非遗故事”微纪录片等，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传播责任感，实现价值观教育从“认知—认同—践行”的闭环转化。

六、效果评估与持续改进策略制定

（一）评估体系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双向考察

为系统检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实际成效，需构建涵盖过程与结果的双维度评估框架。在定量层面，可设计结构化问卷，对大学生价值观认知水平、行为倾向进行前后测对比，同时收集家校沟通频率、社会资源参与度等运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客观衡量机制运行效能。在定性层面，应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对家长、教师、社区工作者及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获取其对协同育人过程的切身感受、价值判断与改进建议，从而形成主客观相互印证的综合评估结论。

（二）评估结果分析：成效亮点与瓶颈问题并存

从实践反馈来看，“家校社”协同模式在提升家长教育参与能力、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与价值内化等方面作用显著，尤其在承德地域文化融合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操作经验。但评估也反映出若干深层问题：一是部分家庭对大学生阶段教育责任的认知仍停留在学业辅助层面，对价值观塑造的参与意识薄弱；二是校社资源对接多依赖临时性项目，缺乏长效整合机制；三是地域文化课程与实践活动尚未形成连贯体系，其育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三）改进优化策略：提升认知、机制深化与资源活化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系统优化：

1. 提升认知与协同能力：通过设立“家庭教育学分制”、开发大学阶段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并结合典型案例宣传，增强家长对协同育人的认同与能力。

2. 数字化平台推动制度化转型：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家校社”三方权责，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需求与资源的动态匹配，推动合作从活动式向制度化转型。

3. 文化资源的育人能力转化：围绕承德特色文化资源，构建“文化认知—实践体验—价值升华”的梯度化课程模块，并设计可量化的文化育人成效指标，实现地域文化从资源向育人能力的有效转化。

七、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承德模式的实践成效与范式意义

本研究围绕“地域文化—三方协同—数字支撑”三维互动框架，系统探讨了承德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在大学生价值观塑造中的实践路径与作用机理。通过地域文化的情境化嵌入、多元主体的结构化联动及数字平台的智能化辅助，可有效提升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力、渗透性与可持续性。承德案例不仅验证了地方性知识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凸显了文化资源向教育效能转化的可行路径，也为民族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域的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育人范式。

（二）理论拓展与实践创新：协同育人的双向突破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构建了“地域文化—家校协同—数字赋能”的整合性模型，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中文化资源与协同机制相互割裂的局限，为理解多元主体在价值观教育中的角色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实践层面提出的“三阶四维”操作框架（即入学适应期、学业成长期、社会转化期的三阶段衔接，以及课程重构、实践浸润、资源整合、评估反馈的四维联动），通过地域文化课程化、社会实践项目化、数字管理动态化等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共生型育人生态的转型。

（三）未来方向：数字化、差异化与跨区域协同的深化空间

后续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探索：一是基于高校类型与学生群体的异质性，细分理工类、人文类、职业院校等不同场景下的协同需求，开发专业适配的育人方案；二是深化数字技术在协同育人中的应用，例如，通过大数据动态追踪价值观形成轨迹，利用 AI 算法优化资源匹配效率，构建智能预警与干预机制；三是探索地域文化资源的跨区域流通机制，通过校际合作建立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承德模式”与其他高校所在地方实践互相学习；此外，需持续关注网络亚文化、虚拟社群等新兴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如何适应这些变化，持续发挥其在大学生价值观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朱永新，孙云晓，边玉芳.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研究，2021,42(05):4-16.

[2] 李太平，刘争先. 新时代高校德育的现实挑战与路径创新 [J]. 教育研究，2022,43(08):16-27.

[3]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03):53-58.

[4] 冯建军. 数字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挑战与转型 [J]. 教育学报，2021,17(03):4-15.

[5] 王娟. 塞罕坝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9):78-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承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25年度承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下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承德模式研究”（CDSZYKT-2025012）。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审核评估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芮　彧

摘要：高校教学档案作为系统记录教学活动全过程的关键载体，既是高校教学运行轨道的完整体现，更是衡量教学质量与教学成效的核心标尺，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本文以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为基础依据，针对高校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和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相关论述，并对高校二级学院目前教学档案所呈现的问题展开探讨，重点研究分析如何打造规范化、精细化、高效化的新型教学档案管理机制，最终实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攀升。

关键词：高校二级学院教学档案；教学审核评估；教学档案管理

一、引言

2021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要求在“十四五”新发展阶段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1]。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更加突出立德树人的评估理念，采取柔性分类的评估方法，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旨在聚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促进高校特色发展、分类发展 [2]。二级学院是高校的基层单位，二级学院的教学档案是否能够有效地整理、归档、妥善保管将直接影响着审核评估工作的质量，但是，笔者通过对江苏省 5 所高校 10 个二级学院的实地调查发现：72.8% 的学院存在教学材料分类混乱、电子化率不足 40%、数据孤岛现象突出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现状分析、问题、对策优化三个维度展开研究，以期为高校教学档案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二、审核评估与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的关系

（一）服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原则 [3]，围绕办学特色、办出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一核心目标，聚焦学校办学理念、师资队伍、资源配置、教书育人质量以及学生成长成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全景式的、全方位评价。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框架的价值主线是“以学生发展为本”[4]，把聚焦点放在“学生的学”上，贯穿于评教评学评价的始终；突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挥课堂教学活动中知识习得、能力发展、素养提升的最大化作用，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5]。

（二）支撑评估指标的全链条验证

二级学院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学院是其最为接近教学一线的基层组织之一，那么学院的教学档案也承载着有关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课程大纲的制定与实行、教学计划的不断调整以及学生成绩的全程跟踪等方方面面的教学基础材料，并完整保留了整个学院的教学生态，因此这些都是学院的教学工作的存照，也是专家了解学院的教学质量、掌握学生学习成效的关键原始材料。

三、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 + 深度访谈 + 档案实地核查”的混合研究方法，对江苏省 5 所高校 10 个二级学院的实地调研，结合 150 份教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38 份，有效率 92%）与 200 份学生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76，有效率 88%），访谈教学秘书、教师代表 20 人。结果显示，当前二级学校教学管理档案呈现“教学档案收集整理‘随意性’”“教学材料管理形式‘单一化’”的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一）教学档案收集整理“随意性”

教学材料管理是高校教学运行的“神经中枢”，它是一个贯穿于教学全周期、全方位的系统化管理工作。该工作环节覆盖了教学计划制订、教学过程实施、教学效益检测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但是因为教学任务量大且是较为复杂的逻辑体系，在材料收集阶段，因为平时的教学材料管理者在收集、整理、分类和归档教学材料的时候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地堆积各种收集来的材料或是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地放在一起，并不能依据材料的种类、用途或重要性而对其进行分类排序，使整体的教学材料杂乱无章。

案例一：以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的某艺术学

院的某课程为例，教学材料包括：过程性考核、成果性考核、总结性材料，教学秘书在整理时，仅仅将这些材料按“学期—课程”顺序装入档案盒，未按“教学目标—实施过程—效果反馈”的逻辑分类。

案例二：A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规定“教学材料需在学期结束后 1 周内归档”，但实际操作中，秘书多采用“一本装订法”——将同一课程的材料简单合并为一本，封面仅标注“2023-2024-2《XXXX》”。这种归档方式导致分类检索困难的问题。

（二）教学材料管理形式“单一化”

不同学院调查问卷反映，目前高校各学院教学材料情况如下：

在教学材料存储介质的选取方面，“纸质为主、电子为辅”的模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就二级学院而言，其更倾向于使用纸质存储介质，部分学院调研结果显示：92% 的二级学院选择使用纸质版材料；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二级学院能够做到“纸质版 + 电子版”，且初步实现了电子材料归档。

从目前来看，纸质材料具有压倒性的“统治权”，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性（物理特性）造成了大量的管理和保存问题。除此之外，纸质材料因为自身的属性关系，无法做到及时保存到对应的资源库里面，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以及淘汰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遗失的现象，有时候管理人员并没有发现一些重要的材料已经遗失，等到出现问题以后再也找不到。

相对于纸质材料较为直观地表现“笨重”的问题，电子材料则更加隐秘地带来了“形式化”的问题。从调研情况来看，大多数学院所谓的“电子化”只是完成了简单的“扫描上传”或“拍照存档”，电子材料也存在着格式混乱、元数据缺失的问题。

高校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的“人工主导，自动化不足”管理模式是影响档案效能发挥的重要瓶颈，具体呈现为“三难困境”：难收集，易漏项；不能及时归档；调阅耗时长。潜藏于技术系统支撑力与管理主体行为惯性冲突两大方面。一方面，绝大多数二级学院仍沿用的是较早前开发的教务管理系统，仅实现了文件上传和下载的功能，缺少智能分类等关键模块；各个部分的系统内部的数据标准不统一，造成大量的信息孤岛存在。另一方面，从人员层面看，教师是教学材料的“生产者”，教师普遍存在“重教轻材”的思想，在电子教学材料上不注意规范，如没有以教学目标为原则确定教学材料名称，在规范化上不到位；管理人员不懂技术，在技术上无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至多能做到文件上传与下载这样的最基本的操作，无从实现对系统的数据分析。

四、改进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审核评估“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提出技术、制度等协同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平台 + 数据标准”的技术底座

平台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跨系统融合数据，学校建设一体化管理平台，将教务系统、OA 系统和二级学院子系统的数据汇集到一起（如自动抓取教务系统的课程成绩、科研系统的教研项目数据），实现“一次录入、多处共享”；建设“教学材料管理中心”模块，可实现学校各类电子化资料在线上传，通过智能分类、全文检索及权限分配等进行管理和分享。

二级学院根据学院特色研制个性化的接口并能支持在学院自有系统中的特色材料按照统一的元数据规则被引入平台，同时兼顾学院的需求和个性化的服务需要。

平台旨在建设“教师易用、管理高效、评估便捷”的在线提交（全流程数字化，降低教师负担）、智能分类（多维标签体系，激活数据价值）、全文检索（语义化搜索，秒级定位目标）、权限控制（分级分权管理，保障数据安全）四大在线核心功能模块，实现档案管理从“人工操作”到“智能驱动”的转变。

（二）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机制

学院首先成立由教学副院长牵头、教师代表（覆盖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等不同类型课程）、系主任、教务办负责人、学生代表（选取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共同组成的“教学材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需通过问卷调研（设计《教学档案管理满意度及需求问卷》，覆盖“生成—收集—归档—应用”全流程）、师生座谈（组织 3—5 场专题座谈会，采用讨论法，引导参与者展开深度对话）、案例研讨（选取近 6 年审核评估中暴露问题的典型案例，组织教学材料管理委员会成员、骨干教师进行分析，追溯问题根源）等方式，系统梳理学院教学材料管理的痛点堵点（如归档范围模糊、责任主体不清等），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明确“三要素”——归档范围全覆盖，操作标准具体化，责任边界清晰化，做到有章可循。建立二级学院“检查—评价—整改”的管理机制。二级学院教务办联合档案管理员每学期开展 2 次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材料完整性（如课程材料记录是否缺失）、规范性（如学生材料填写是否准确）、时效性（如归档是否超期），形成《档案管理问题清单》并反馈责任主体；将教学档案管理纳入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占比 10%~15%）、系室年度考核（占比 20%），评价指标细化为“材料完整率”“归档及时率”“更新频次”等量化项，同时引入学生评教、同行互评等主观评价维度；通过教学管理平台实时推送检查结果与评价得分，责任主体需在特定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方案，将整改结果纳入下一轮检查重点；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如电子材料命名不规范），组织专项培训或编制《档案管理操作手册》，从源头减少同类问题发生。

（三）提升人员能力：开展“技术赋能+意识培育”的培训工程

教学档案管理效能的提升，关键在于要构建“全员参与培养”的信息化能力培养体系。二级学院需要突破传统培训局限，将“教学材料信息化管理”深度融入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与管理人员职业成长体系。

把“教学材料信息化管理”纳入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体系之中，在工作坊、案例演讲等形式中重点学习电子材料规范提交、系统功能应用、保护数据安全等设计联合信息中心开展“档案信息化管理”专题培训，增强人员系统运维、数据分析能力和服务意识。按照“1名专职档案管理员+N名兼职档案员”的模式配置队伍，专职管理员须具备档案管理中级以上职称，兼职员优先选拔具有评估工作经验或档案管理兴趣的教师。面向专职管理员，定期组织“评估指标解读”“档案管理系统高级应用”等专题培训；面向兼职员，通过“工作坊”形式培训“材料整理规范”“常见问题规避”等内容；邀请评估专家开展“档案如何支撑评估结论”的案例教学。

（四）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与改进

“用数据赋能教学”的终极作用是要“用数据赋能教学”，高校可以基于教学材料管理系统，建构教学质量动态机制、提供评估材料的智能支撑、打造教学经验共享平台。

1. 教学质量动态监测

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而动态监测则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核心手段。传统教学评价多依赖“结果导向”的事后考核（如学生期末成绩、课程通过率），难以及时捕捉教学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基于教学材料管理系统的动态监测功能，高校可通过课程大纲更新频率、教学日历执行偏差率、学生作业批改及时性三大关键指标的实时采集与分析，实现对教学过程的“可视化诊断”，精准识别“教学内容滞后”“进度失控”“反馈延迟”等不良现象，为“以评促教”提供数据支撑。

2. 评估材料智能支撑

在审核评估“以评促建”阶段，传统人工梳理评估材料效率低、易遗漏。基于教学材料管理系统的智能化升级，高校可实现评估材料准备的精准化与高效化。

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与教育知识图谱技术，解析“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等评估内容，拆解为具体指标，结合政策文件生成包含“课程思政教案”“学生思政作业”等12类材料的定制化清单，明确类型、证据点及格式规范。随后，系统通过OCR、元数据校验等技术扫描现有材料，自动生成《评估材料完整性报告》，以图表展示提交率，标注缺失材料、原因及整改建议，对逻辑漏洞或关键证据缺失材料评级并提供案例参考。

某高校2024年预评估显示，该模式将材料准备时间从2个月缩至3周，人工核查量减少60%，材料完整率从78%提至95%，专家“材料支撑度”评分提高18分，推动教学管理从“被动迎评”转向“主动提质”。

3. 教学经验共享平台

教学经验共享平台的本质是构建“教师—学生—管理者”协同的知识社区，通过“标签化分类—个性化推荐—互动式交流”，推动优质教学资源流动，实现“以经验促进教学”的目标。平台需要建立“学科—课程类型—教学方法—教学成果”等标签体系，确保可以精准检索；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技术推荐给教师；平台设置“评论区”“经验问答”“直播分享”等模块，鼓励教师参与讨论。

五、结语

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深入推进过程中，二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工作实现了由“边缘性事务”到“学校的核心支撑性工作”的“华丽转身”——教学档案不仅是评审专家审核办学质量的证明材料，而且是学校开展教学研究，总结凝练育人经验的珍贵资源库；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融合，未来，教学档案将突破传统的“资料存储”的单一职能，在“资料存储+”的基础上升级成为“教学智脑”，并能够依托教学档案中沉淀的教学信息数据，融合深度语义分析与相关联挖掘技术自动生成教学数据分析报告，并根据历史教学数据预测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从而给学校的专业认证、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分配提供科学合理、准确详尽的数据支持，进而可以大幅提升学校“以档促教”的实效性和精准性，并且能借助“以评促建”的闭环机制促使学校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转变，充分发挥教学档案的作用以及其背后蕴含的教育教学资源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以高质量审核评估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解读 [EB/OL].(2021-02-08)[2025-01-11].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2/t20210208_513001.html.

[2] 李薪茹.高校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的内涵特征、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50-54.

[3] 周新楚，戴飞.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运动解剖学混合式教学改革 [J].大学教育,2025(17):77-81.

[4] 李庆钧.审核评估视域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 [J].教育探索,2025(08):52-58.

[5]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N].人民日报,2014-09-11(01).

（作者系江苏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教育家精神视域下高校师范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张星雨　张　林

摘要：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之下，教育家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凝结着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与师范教育的本质追求，为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引领和科学的实践遵循。本文聚焦当前高校师范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系统剖析教育家精神与高校师范文化的内在关联，提出“五位一体”突破路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为新时代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思路，推动师范教育实现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的转型，从“技能训练”向“精神塑造”的升华。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高校师范文化；路径研究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了对教育从业者的关怀，从“四有”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从“四个相统一”到“经师”与“人师”有机统一，再到“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师德为魂”的教育价值取向。2024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坚持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大力支持师范院校建设，全面提升师范教育水平”“厚植尊师重教文化”，这一理论创新为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教育家精神与高校文化建设的关联成为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学界为此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陆道坤阐述了教育家精神旨在为文化营造等提供支持的“为何”，明确了历程描摹等具体任务的“何为”，说明了基于“三线合一”逻辑展开的“如何”[1]。顾红平解析了新媒体时代高校文化建设“育人”“化人”本质，从精神、物质、制度、行为文化探索路径[2]。

然而，针对高校师范文化建设及其与教育家精神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仍较少，尚未形成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校师范文化建设的具体操作模式。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解构教育家精神与高校师范文化的价值同构性与育人互补性，构建“五位一体”的突破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一、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一）教育家精神的理论溯源与时代界定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系统概括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3]。这一高度概括，从多维度为教育工作者树立精神标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教育从业者应具备的核心品质与价值追求。

（二）教育家精神的核心特征

价值引领性。教育家精神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政治导向，构建起教育家精神塑造的价值坐标系。这种引领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要求为人师者应坚持人民至上，将个人教育实践与民族复兴使命深度绑定[4]；二是道德情操的示范性，通过“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师德要求，将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升格为“价值引领者”。

实践生成性。教育家精神并非静态的理论，而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行动智慧。其生成性体现在：一是经验积淀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如于漪提出的“教文育人”理念将教学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文化思想；二是问题导向的实践品格，针对“教育数字化”等新时代命题，教育家精神催生出“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要求教师与时俱进、学以致用、守正创新[5]。

文化传承性。教育家精神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传承性。一方面，它继承了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将个人成长与家国责任紧密相连，形成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脉络，为教育者树立了高远志向。另一方面，它在新时代实现创新性发展：张晓文

等指出，面对数字化浪潮等新挑战，汲取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中的“因材施教”理念有助于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使得古老教育智慧在现代教育场景中焕发新生[6]。

二、高校师范文化的内涵与构成

（一）高校师范文化的本质界定

高校师范文化是师范院校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本质在于“师范性”与“学术性”的辩证统一。从历史维度看，该文化起源于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现已演变形成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文化特质。在内涵上，它既包含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又体现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既强调教育理论学术深度，又注重教育实践技能培养。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师范文化更突出“育人”导向；与中小学相比，它具备更强的理论性和前瞻性。

（二）多维构成体系

1. 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是师范文化的灵魂，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教育信仰体系，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意识；二是价值规范系统，体现在校训、校歌等文化符号中；三是教育理想追求，包括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教师角色的准确定位。这种精神文化通过开学典礼、毕业教育等仪式活动得以传承，借助优秀教师典型宣传等形式不断强化，最终内化为师生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2. 物质文化层

物质文化是师范文化的有形载体，构成文化感知的物理空间，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教学设施，如微格教室等现代化实训平台；二是文化景观，包括教育家塑像、师范教育主题馆等；三是信息资源，如教学案例库、名师课堂录像等数字化资源。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仿真实验室、智慧教室等新型物质文化形态不断涌现，为师范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3. 行为文化层

行为文化是师范文化的动态展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学行为方面，包括师范生技能训练、教学竞赛等活动；实践行为方面，涵盖教育实习、支教服务等项目；交往行为方面，表现为师生互动、校际交流等形式。这些行为活动具有鲜明的师范特色，既强化了专业技能，又培育了职业认同。

4. 制度文化层

制度文化是保障师范文化落地的重要支撑，包括三个维度：培养制度方面，有师范专业认证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等；评价制度方面，包含师范生综合素质测评、教师教育质量评估等；保障制度方面，涉及实践教学管理、师德建设等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完整体系。

三、高校师范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高校师范文化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多种现实挑战，这些困境严重制约着师范教育特色的培育与发展。

（一）师资建设：能力与机制的双重瓶颈

教师队伍存在个体素养与制度保障的双重短板。在个体层面，部分教师专业理念陈旧，缺乏对师范教育前沿理念的深入理解，教学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制度层面，师资培育体系不完善，专业发展路径模糊，激励机制与考核评价体系未能充分契合师范教育需求，导致教师队伍发展动力不足。

（二）课程实施：体系与方法的转化难题

课程体系构建与教学实施存在明显不足。显性课程方面，师范特色课程设置比例偏低，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衔接不畅。隐性课程层面，校园文化等潜在育人资源挖掘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浸润式育人功能。同时，教学方法革新滞后，传统讲授式教学占主导，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创新方法应用不充分，教学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难以满足新时代师范人才培养需求。

（三）实践活动：规划与落实的深层矛盾

实践育人活动存在形式化与低效化问题。活动设计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实践内容与师范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不紧密，难以实现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在实施过程中，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校地企合作深度与广度不足，实践成果转化机制缺失，导致实践活动难以达到预期育人效果。

（四）制度设计：目标与执行的结构性冲突

师范生培养制度体系仍存在设计缺陷。人才培养方案过于注重专业技能训练，忽视师范教育特色与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考评制度中，评价指标体系不科学，缺乏对学生教育情怀等核心素养的有效评价，专业认证与质量评估标准未能充分体现师范教育特质，难以保障师范人才培养质量。

（五）文化场域：空间与价值的生态性失衡

师范文化生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校园文化景观缺乏师范特色与文化内涵，文化设施陈旧、功能单一，数字化文化空间建设滞后。文化氛围营造方面，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仍然存在，学术氛围不够浓厚，校园文化活动缺乏思想深度与教育意义，受校外文化思潮的冲击，削弱了师范文化的育人影响力与感召力。

四、教育家精神视域下高校师范文化建设的突破路径

（一）教育家精神与高校师范文化的逻辑耦合

教育家精神与高校师范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逻辑关联，这种关系可以从价值导向、育人功能两个维度进行阐释。

1. 价值导向的同构性

政治立场的统一性。教育家精神强调“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政治站位，与师范文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同构性体现在：一方面，两者都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核心目标；另一方面，都要求教师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文化基因的传承性。教育家精神与师范文化共同植根于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在师德传承方面，继承并发扬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范传统；在教育智慧方面，创新发展了“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传统理念；在文化认同方面，通过校史馆、教育家塑像等物质载体，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空间。

2. 育人功能的互补性

精神引领与实践载体的辩证关系。教育家精神为师范文化建设提供价值坐标，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要求，需要通过师范院校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来具体落实。反过来，师范文化为教育家精神落地提供实践场域，师范文化中积累的育人经验，又为丰富教育家精神内涵提供了实践支撑。

个体培养与群体塑造的协同效应。教育家精神着眼于教师个体的专业成长，强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而师范文化则注重教师群体的生态营造，通过“师德师风专题宣讲”等仪式活动形成集体认同。这种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协同培养“完整”的教师。

（二）高校师范文化建设的突破路径

针对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方面现存的困境，本文提出构建“五位一体”系统以实现路径突破：

1. 顶层重塑：构建教育家精神引领的制度体系

高校可立足教育家精神核心要素，构建以“知识储备、专业能力、教育情怀”为核心维度的“三位一体”师范人才培养体系，动态评估培养成效；学校层面应健全保障制度，可设立教育家精神研究专项基金，构建校地协同长效机制。

2. 师资强化：培育专业化引领队伍

一方面，高校应专注于提升教师能力，实施教师教育者专业发展计划，开展师德教育能力专项培训，建立名师工作室联盟。另一方面，学校应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校内选树教育家精神领域的教师典型，开展师德师风宣讲系列活动，建立教师荣誉制度。

3. 课程重构：打造浸润式课程体系

院校应推进显性课程建设，构建“1+N”课程群（1门核心课 +N门拓展课），编写教育家精神案例教学指南；同步应推进隐性课程开发，创设“教育名家工作坊”，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开发数字化微课程资源；组织引导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推广情境模拟教学法，实施项目式学习，开展反思性实践教学。

4. 活动提质：设计进阶式实践体系

院校可构建三层活动体系：基础类的认知体验活动，如“教育经典诵读”计划、“教育家故事汇”展演、“师范历史与文化寻根”暑期社会实践等；提高类的能力锻造活动，如教学技能竞赛、“教育扶贫”志愿服务等；升华类的精神内化活动，如开展“师德承诺”宣誓仪式、“我的教育信仰”主题研讨等活动。

5. 阵地升级：建设立体化育人空间

建议校院两级合力打造三块阵地：实体阵地方面，可打造教育家精神主题馆，建设智慧微格教室，创设师范文化创意街区；虚拟阵地方面，可结合科技的发展成果，开发VR师德体验馆，建设在线名师工作室，打造师范文化云平台；实践阵地方面，可与校外单位联合共建教师发展平台，拓展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乡村教育服务站等。

五、结论

教育家精神为高校师范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而高校师范文化作为“师范性”与“学术性”的辩证统一体，是教育家精神落地的重要载体。当前，高校师范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可通过“五位一体”的系统路径加以突破，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未来，高校师范文化建设应进一步聚焦教育家精神，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为培养新时代“四有”好老师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陆道坤. 教育家精神研究的为何、何为和如何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4(05):36-45.

[2] 顾红平. 新媒体时代高校文化建设的本质、着力点及路径探索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7(07):99-102.

[3]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N]. 人民日报 ,2023-09-10(01).

[4] 肖丙珍 , 赵洪涛 . 教育家精神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4(35):63-65.

[5] 林建辉 , 陈名烨 . 论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弘扬路径 [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3):155-161.

[6] 张晓文 , 赵雨晴 , 徐永坡 . 基于因材施教的教育家精神历史溯源、价值判定及培育策略 [J]. 教育科学论坛 ,2024(29):3-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宁波大学科研专项（思政一般项目）“教育家精神视域下高校师范文化建设路径研究”（XSYB25011）。

（作者：张星雨，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助教；张林，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高中数学如何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教学

唐延文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高中数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发展。探索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策略，对于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的目标包括知识技能精准定位、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教学资源优化配置三个方面，坚持数据驱动、学生中心、动态调整三个原则，实施全程跟踪的教与学、基于数据分析的学生分层教学、应用智能辅助工具、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开展多元教学评价优化五个策略，以此为高中数学精准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分析；高中数学；精准教学；教学策略

近年来，我国各类教育政策文件不断强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改革。在此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正面临着从传统教学模式向精准化、个性化教学转型的挑战。本文立足于国家政策导向，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探讨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策略，旨在为我国高中数学教育改革提供实践路径。

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目标

（一）知识技能精准定位

大数据分析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实现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精确识别[1]。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作业完成情况、考试分数等多维度数据的分析，能准确捕捉到每位学生在数学知识点方面的掌握程度与薄弱环节。基于数据的精准定位，数学教学能有的放矢，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难度和进度下提升数学能力，从而实现知识技能的有效积累与深化。

（二）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核心先需实现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聚焦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六大素养的培育。通过挖掘学生解题过程留痕、思维路径等数据，精准捕捉学生在逻辑推理、直观想象等方面的能力短板，引导学生跳出机械刷题，学会用数学思维分析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同时依托数据精准推送思维训练任务，兼顾个体差异与素养进阶，助力学生形成严谨的数学思维品质，落实“三会”要求，为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核心能力。

（三）教学资源优化配置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高中数学教学资源配置优化提供量化依据，教师借助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挖掘需求与偏好特征，调整教学内容组织形式及方法选择，保障资源利用效率；该技术还可通过教学资源效用评估模型，揭示不同工具与材料的效能差异，辅助教师完成优质资源筛选，进而优化教学实施流程，实现资源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为高中数学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原则

（一）数据驱动原则

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体系中，以数据驱动原则为核心导向，其内涵要求教学决策与实践需严格依托数据分析结果展开[2]。该原则规定，需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作业完成质量、课堂互动频次、单元测试得分等海量数据开展采集、清洗、分析及挖掘等系列操作，并借助科学方法提炼其中包含的学习规律与潜在问题。教师需熟练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把处理后的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表或结构化报告，再依据这些成果调整教学策略与内容设计，让教学活动具备明确靶向性且能提升整体效率与质量。数据驱动理念既对数据采集的精准度提出要求，也着重强调数据解释的合理性与教学策略的适配性，最终在客观层面推动数学教育朝着精准化与个性化方向发展。

（二）学生中心原则

大数据背景下高中数学精准教学中，以学生中心原则为核心，其要求教学设计围绕学生实际需求与个体差异展开，该原则主张依托大数据分析识别学生学

习风格、兴趣偏好、能力水平及认知障碍，据此量身定制学习计划与资源；实施过程中教师需深度解读数据，明晰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使教学活动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促进其主动探索与深度学习，且需关注学生思想状况，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学全过程，保障学生全面成长与发展；同时该原则要求建立反馈机制，依托持续数据追踪与评估调整教学策略，使教学活动始终贴合学生成长轨迹，实现因材施教的目标。

（三）动态调整原则

动态调整原则指出，在大数据支撑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中，教学策略与方案须具备高度灵活性及响应性。因学生学习状态处于动态变化中，教师需依托实时数据分析，快速识别教学成效及潜在挑战，并及时调整教学计划与资源分配。该原则要求搭建高效数据监控与反馈系统，保障教学团队能迅速响应数据变化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动态调整既体现在教学内容及时更新，也包含教学方法与手段灵活切换，例如适时引入数字化教学工具、优化课堂互动模式，以适配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进度，通过持续动态调整，教学活动能不断优化，进而确保教学目标精准达成。

三、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实践策略

（一）全程跟踪的教与学策略

在探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实践策略时，以高中数学人教 B 版必修第四册第十一章《立体几何初步》为例，可以从课前预习指导与准备、课中互动与实时反馈、课后复习巩固与拓展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1. 课前预习指导与准备

教师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深度剖析历年学生研习“立体几何初步”的详细数据。其一，以知识图谱形式呈现章节要点，精准定位核心概念与易错节点，据此选编预习例题，针对学生易对线面角相关知识理解不清的情况，精心设计多类型判断题，引导学生自主辨析；其二，参考同层次学生过往预习效率曲线，结合个体知识短板，为学生划定弹性预习时间区间。基础薄弱的学生分配较多时间夯实平面图形与空间图形转换基础，而学有余力者鼓励其利用剩余时间提前涉猎空间向量在立体几何中的初步应用；其三，联通多元线上资源库，依据学生历史浏览偏好，智能推送预习辅助素材。如针对偏好视觉学习的学生，推送 3D 建模动画演示棱柱、棱锥的结构特征，助力学生在课前搭建起初步知识架构，为课堂高效学习铺就道路。

2. 课中互动与实时反馈

课堂教学进程中，教师凭借智能教学终端实时收集学生学习动态数据。一方面，教师借助课堂即时答题系统、小组协作活跃度量化分析，迅速锁定学生对立体几何关键知识点的理解程度。讲解三垂线定理时，若发现大部分学生答题准确率低、小组讨论陷入僵局，教师应即刻引入工厂车间里光线与工件投影实例，化抽象为具象，助力学生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运用智能摄像头捕捉学生面部微表情、眼神聚焦区域，敏锐察觉学生思维卡顿点。一旦发现学生面露难色、眼神迷茫，当即放慢讲解节奏，补充相似案例强化理解。与此同时，教师需依据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知识掌握节点反馈，自动整合生成阶段性课堂学习简报，辅助教师灵活调控后续教学走向，保障课堂流畅推进。

3. 课后复习巩固与拓展

课后阶段，大数据依旧扮演关键角色。其一，教师依据课堂实时监测数据、课后作业完成详情，为学生量身制定分层复习规划。针对基础薄弱的学生，着重强化基本几何体性质、判定定理的复述与简单运用练习；针对能力较强的学生，安排探究性课题，如利用空间解析几何方法求解复杂立体几何最值问题，实现分层提升；其二，深挖学生课后线上学习足迹，从搜索的关键词、反复研习的资料板块洞察其兴趣趋向，教师若发现学生频繁关注立体几何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顺势推送经典建筑案例剖析、相关设计软件入门教程，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其三，教师定期以单元小测、专项作业形式检验学生复习成效，根据结果回溯优化复习方案，如此循环往复，促使学生扎实掌握“立体几何初步”相关知识并能娴熟运用，切实提升数学素养。

（二）基于数据分析的学生分层教学

在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实践里，依托数据分析开展学生分层教学是落实差异化教学的关键途径 [3]。教师收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作业完成情况及考试成绩等多维度信息后，能对学生数学能力展开细致评估，进而实施科学分层教学。首先，教师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识别学生在数学基础知识掌握、解题技巧运用及思维逻辑形成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将学生划分为基础层、进阶层与提高层等不同层级，此分层过程既参考学生当前水平，也纳入其学习潜力与进步速度，以保障分层结果具备动态性与准确性。其次，针对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群体，教师需规划具有层级差异的教学内容与活动设计，面向基础层学生的教学活动应聚焦基础知识夯实与基础技能打磨，通过安排充足的练习任务并提供实时反馈信息帮助该群体学生逐步建立学习自信心；面向进阶层学生的教学活动需着重开展解题策略的系统训练，指导学生尝试探索多种解题思路与方法以培育其问题解决能力；面向提高层学生的教学活动则应围绕知识深度理解与创新性应用展开，依托设置挑战性学习问题与组织项目式学习活动推动该群体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发展。最后，在分层教学模式推进过程中，教师需构建动态灵活的层级调整机制，参照学生阶段性学习进展状况对其所属层级进行适时调整，该机制的运行能有效维持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且能保

障教学活动开展具备明确的针对性与实际有效性。分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还需结合小组协作学习形式与个性化个别辅导手段，增进不同层级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与协作互动，助力全体学生共同提升数学学科学习成效。

（三）智能辅助工具的应用

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实践中，智能辅助工具能为教学过程提供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帮助教师更高效开展教学活动、学生更便捷地学习[4]。其一，教师可运用数学学科专用智能备课工具，该类工具能依据高中数学各章节的知识体系与教学目标，自动整合历年教学案例、习题资源及多媒体素材，当教师需要设计“函数”“几何”等章节的教案时，可通过工具筛选适配教学内容，同时工具能基于过往教师使用的数据与学生的学习反馈，推荐最优教学方案，减少教师重复性备课工作，让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创新与学生个性化指导中；其二，课堂教学中可引入智能互动教学终端，如电子白板、学生平板等，这类终端能实现教学内容实时展示、学生答题即时提交与数据自动统计，当教师讲解数学难题时，可通过终端向学生推送解题思路引导提示，学生完成答题后终端能快速分析答题正确率与错误类型，教师根据分析结果及时调整讲解重点，同时终端支持学生间实时互动交流，让学生在讨论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其三，课后学习阶段可借助智能作业批改与辅导工具，该类工具能自动识别学生作业中的错误并标注错误原因，同时依据学生作业完成情况推送针对性补充练习，当学生遇到数学问题时，工具能通过视频讲解、步骤拆解等方式提供即时辅导。此外工具能记录学生作业完成进度与错误轨迹，生成个人学习数据报告，教师可依据报告了解学生课后学习状况，调整教学策略，学生也能通过报告明确自身知识薄弱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复习。

（四）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策略

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已成为高中数学精准教学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该策略核心目标在于依据不同学生的认知特征与学习需求差异，定制具有专属属性的学习计划与实施路径[5]。首先，教师借助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学习过程数据进行挖掘，识别出学生的学习偏好类型、认知风格特点及学习节奏规律，再结合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要求与具体教学内容体系，设计出契合学生个体特点的个性化学习方案，比如针对倾向视觉认知的学生，提供包含数学图表、动态演示动画等在内的视觉化学习材料，针对偏好实践操作的学生，设计涉及数学模型构建、实际问题解决等环节的实践性学习任务。其次，搭建学习进度动态跟踪系统，对学生学习状态进行实时数据采集与分析，涵盖知识点掌握深度、课后练习完成质量等维度，依据分析结果及时调整学习路径，保障学习目标的有效达成。最后，教师引入自适应学习算法模型，该模型能依据学生阶段性学习反馈信息与能力进步情况，动态调整学习任务的难度梯度与数量配置，实现学习内容与学生能力水平的精准匹配及学习方案的持续优化。当前教育背景下，学生发展评价维度已突破单一成绩分数局限，时代发展对具备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存在迫切需求，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策略的落地实施，不仅能提升学习过程的针对性与效率，还能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自我效能感得到增强。

（五）多元教学评价优化策略

多元教学评价作为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实践的核心环节，注重评价内容的完整性、评价方式的丰富性及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其一，评价内容突破考试成绩的局限，纳入学生知识理解程度、技能操作水平、思维发展状况及情感态度表现等维度，借助项目式作业设计、口头汇报展示、小组协作研讨等具体形式，实现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全面考察。其二，评价方式融合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既聚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关注学习最终达成的结果，依托日常教学观察记录、课堂互动情况分析、在线测试数据采集等途径收集学生学习信息，开展即时性反馈与持续性评估，助力学生及时调整学习路径与方法。其三，评价主体构建教师评价、同伴评价、自我评价与家长评价协同参与的体系，同伴评价可推动学生间相互借鉴学习以实现共同发展，自我评价能培养学生自我审视反思与自主规划学习的能力，家长评价则可加强家校间的沟通合作以共同关注学生学习成长进程。多元教学评价优化策略的落地实施，能提升评价过程的公平性与结果的有效性，为学生提供更为全面且客观的学习反馈信息，进而帮助学生实现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四、结论

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策略需从教学目标设定、实施原则确立及实践路径构建三方面展开系统剖析。通过对学生课堂答题数据、课后作业完成数据及阶段性测试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在高中数学教育领域能实现对学生知识掌握薄弱点的精准定位，能实现学生数学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的逐步提升，还能达成教学资源在不同学习模块间的科学配置。未来，伴随大数据技术算法迭代速度的加快与教育领域个性化理念的深入推进，高中数学精准教学将进一步聚焦学生个体学习需求的差异化满足，将进一步开展智能备课系统、个性化习题推送工具等教学工具的深度应用探索，将着力构建更为完善且高效的精准教学实施体系，为我国高中数学教育向现代化模式转型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朱印祯 .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高中数（下转 178 页）

“大思政课”视域下粮食行业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宋树梅

摘要：“大思政课”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举措。它强调突破传统课堂边界，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在此视域下，职业院校立足粮食行业特色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构建“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是提升思政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的关键路径。本文系统探讨分析构建“金谷思政”教学体系在丰富思政教育实践形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全面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三大核心要素，提出明确思政教学目标、加强立体化课堂建设、打造多元化师资队伍、构建资源整合平台等具体构建路径，以期为职业院校特色化思政教育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大思政课”；“金谷思政”；职业院校；价值意蕴；协同育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对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并强调办好思政教育要注重与现实结合、与实践对接、与时代同行[1]。这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指明了根本方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类型属性上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行业性和岗位针对性。职业院校开展“大思政课”，必须立足类型教育定位，突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育人特色，将思政教育嵌入实训实习、技能培养、劳动教育等环节，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职业院校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大思政课”理念为引领，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依托自身专业群结构和人才培养特色，探索构建具有职教类型特征的思政教学体系。

一、“大思政课”与“金谷思政”概述

（一）“大思政课”定义

“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旨在突破传统思政课的时空局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其核心在于统筹“大师资”“大课堂”“大平台”等关键要素[2]，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促进理论教育、实践养成与价值引领的协同增效，最终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金谷思政”含义

“金谷思政”是职业院校在“大思政课”理念指引下，依托粮食行业特色资源所构建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它并非一个泛化的概念，而是紧密结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思政教育扎根于粮食行业的育种、种植、仓储、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场景中进行实践创新的具体范式[3]。职业院校构建“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核心在于以“大思政课”理念为指引，立足于粮食行业职业

（上接 177 页）

学精准教学探究 [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24(02):35-37.

[2] 王培 . 大数据支持下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的开展策略 [J]. 数理化解题研究 ,2023(30):23-25.

[3] 葛张勇 .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高中数学精准教学探究 [J]. 数理天地 (高中版),2023(23):20-21.

[4] 杨秀梅 . 大数据技术在高中数学精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J]. 中华活页文选 : 高中版 ,2022(19):51-53.

[5] 李凌 . 大数据背景下高中数学精准教学的策略研究 [J]. 进展 : 教学与科研 ,2022(02):141-142.

（作者单位：威海市第四中学）

院校办学特色，构建的符合职业院校需求、蕴含粮食行业特色的思政育人系统。该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国家战略、行业发展与企业需求为核心，致力于培养兼具“阳光、谦虚、自强、奉献”的“金谷文化”内涵与过硬专业素养的专业人才。该体系的实践体现了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创新方向，即：突出粮食行业特色，重视思政教育实践教学；强化产教融合，整合学校、政府、企业等资源优势并转化思政教育资源，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格局；借助多元化的实践形式，深化学生对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的认识，培养学生重农惜粮、劳动、奋斗、拼搏、奉献等精神品质。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粮食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构建价值

（一）丰富思政教育实践样态，激发学生主体参与

依托“金谷思政”教学体系，职业院校能够将思政教育场域从教室延伸至田间地头、粮食企业、科研院所等真实场景。通过组织田野调研、乡村振兴服务、粮企实训等多样化实践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实践形式，更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生动力。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实践中感悟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锤炼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价值认同转变。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学生使命担当

“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紧密对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象化于粮食行业的特定语境中。通过“金谷文化”的浸润与行业实践的磨砺，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时代意义，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这有助于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其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自觉肩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神圣使命，实现从掌握技能的“从业者”到心怀“国之大者”的“守护者”的价值升华。

（三）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实现知行合一发展

“金谷思政”教学体系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养成的有机统一，有效推动学生知行合一、全面发展。理论教学旨在夯实学生的思政知识基础与专业理论素养，激发其独立思考与探究精神；而多元化的行业实践则致力于深化理论认知，锻造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粮食领域复杂实际问题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在“学中做”与“做中学”的循环互动中，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得以协同发展，从而实现能力与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构建路径

“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充分发挥“大课堂”“大平台”与“大师资”三大核心要素的积极作用。“金谷思政”教学体系实现了理论课堂、社会课堂与云课堂的三堂贯通，史实、理实、虚实“三实”融合，协同、实践、文化“三径”融通，构建起“三堂贯通 + 三实融合 + 三径融通”的一体化教学框架。“金谷思政”教学体系能够更好地突出职业院校专业特点，将行业资源与思政教育进行有效融合，实现了育人要素的系统整合、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理论实践紧密结合[4]。基于此，其构建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探寻。

（一）明确思政教学目标，深化思政育人理念

构建“金谷思政”教学体系，必须首先确立其核心灵魂——即清晰且具有职教特色的思政教学目标。该目标是统领体系构建、确保育人成效的根本前提。职业院校需立足“大思政课”格局，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为方向，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转化为培养政治坚定、情怀深厚、技能精湛、敢于创新、乐于奉献的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具体要求。具体而言，目标的落实依赖于两大核心举措。首先，强化顶层设计，实现目标的具体化与体系化。院校需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时代性回答，将“金谷思政”的目标系统分解为政治信仰、行业情怀、专业能力、创新素养与奉献精神等维度，并据此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育人方向不偏移、任务清晰可执行。其次，深化教学融合，实现理念对实践的全过程引领。必须将思政教学目标深度融入课堂教学、专业实践与校园文化中，推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三者协同并进。特别是在专业课教学中，要深入挖掘“金谷”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实现思政教育从“专人”负责到“人人”参与的转变，从而将育人理念切实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养与行动自觉。

（二）拓展“三大课堂”，构建立体化育人场域

为了有效发挥“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作用，完善职业院校“大思政课”教育格局，加强大课堂建设至关重要。大课堂的建设主要涵盖了三大模块，即理论主课堂（思政课、金谷文化通识课）、社会大课堂（田野调研、乡村振兴服务等实践）、线上云课堂“学习强国”、行业数字化平台等），从而构建立体化育人场域，提高职业院校思政教育水平。第一，完善理论主课堂建设体系。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推动课程体系改革，丰富思政课程教学内容，积极寻找思政课与其他课程的契合点，推动思政课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提高思政课程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政育人价值。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深入理解金谷知识内容，结合地域优势、行业特点与办学特色，打造丰富的金谷文化通识课，从而加强对学生思想价值、道德观念与职业素养的教育，促进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第二，丰富社会大课堂。职业院校要加强与政府机构、社会企业等主体的合作，拓展社会大课堂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如田野调查、乡村

振兴服务、社会实践等，从而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理论知识与掌握专业技能，更好地践行思政教育内容，严格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第三，打造线上云课堂。将信息化技术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已成为思政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构建“金谷思政”教学体系，就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打造线上云课堂。线上云课堂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巧妙地将思政教学内容与其他课程相结合，帮助学生掌握行业先进知识，引导学生树立学习强国理念，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责任意识等。

（三）汇聚“大师资”力量，形成协同育人共同体

“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建设，需要提高师资力量，加强大师资体系建设。大师资体系汇聚了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党政干部、企业导师、行业模范及学生代表等多元主体，形成政、行、企、校、社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首先，构建跨学科融合、专兼职结合的协同育人教师队伍。一是职业院校要通过选拔、引进等方式培养专门的专任教师队伍，保证思政教师具有出色的思政素养，有效胜任“金谷思政”教学体系需求。二是打破学科壁垒，整合不同领域的教师资源，鼓励各专业教师积极探索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提高各专业课堂教学内容的思政资源，实现思政育人协同发展。三是聘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劳动模范、资深从业者，担任兼职教师，借助兼职教师的实践经验，提高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效果，更好地辅助协同育人机制长效运行[5]。其次，构建多元化、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共同体。职业院校要加强与政府、家庭以及企业等主体的合作，构建多元化、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共同体。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文件，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促进各主体有效衔接。职业院校要完善“金谷思政”教学体系建设，重视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家庭则要发挥榜样作用，家长要通过言传身教，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思政学习氛围，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思政理念。企业则要提供实践基地与师资力量，更好地协助职业院校创造良好的思政文化氛围。

（四）搭建“大平台”支撑，促进资源融合转化

职业院校要在“大思政课”基础上，完善“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建设，打造“金谷思政”教学大平台，大平台要整合行业历史、产业实践、科技创新等资源，打造“史实结合、理实结合、虚实结合”的资源支撑与价值引领平台。一是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优势，搭建功能完善的教学平台，分门别类地设置不同的学习资源。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刻画学生画像，根据学生的个性、喜好与需求，为学生定期推送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在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发挥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二是强化大平台的实践育人功能。为充分发挥大平台的实践育人效能，需构建校企协同、社校联动的双轮驱动机制。在校企合作层面，重点是携手粮食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将粮食仓储、质检、加工等一线生产流程引入教学场景，从而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职业认同。在社校联动层面，则应与社区建立长效合作，通过系统开展粮食安全宣传、社区治理服务、公益志愿活动等项目，为学生提供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广阔舞台，使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增强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6]。

“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是应对思政教育时代要求、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重要探索。该体系通过系统整合“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核心要素，创新实施“三堂贯通、三实融合、三径融通”的育人模式，有效促进了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行业需求的深度契合。未来，职业院校需持续深化对这一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尤其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以衡量其育人成效，并探索该模式在农业大类乃至其他行业职业教育的迁移应用可能性。同时，应进一步利用虚拟仿真、元宇宙等技术增强“云课堂”的沉浸感，不断完善其目标定位、内容供给、路径方法与评价机制，从而更有效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德技并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粮食行业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01).

[2]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2(10):8-14.

[3]赵锋.办好立德树人关键课程 上好乡村振兴“大思政课”[J].思想教育研究,2024(11):9-11.

[4]曾令辉.科学把握“大思政课”的本质[N].中国教育报,2022-03-17(05).

[5]蔡小葵.“大思政课”视角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提升路径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04):142-149.

[6]黄昌英,李姮.“大思政课”主题化建设的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2):71-7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度连云港市“十四五”教育规划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金谷思政’教学品牌探索与研究”（GH-B/2024/001）；江苏省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金谷思政’”品牌构建与实践研究（2024SJSZ0270）；第六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院校‘金谷思政’教学体系构建策略研究”（ZDZC303）。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家庭照顾机制优化与实践成效研究
——以天门市困境儿童服务项目为样本

陈兰兰　童声成

摘要：家庭是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撑，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为“家庭化”照顾提供政策依据。当前我国困境儿童保障虽转向“物质＋服务”，但家庭照顾功能弱化、心理健康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突出。本研究以湖北天门市困境儿童服务项目为样本，通过实地走访、测评等方式对446名困境儿童及651名基层工作者研究发现，困境儿童心理问题呈分龄化特征，家庭面临“内生困境”与“外生困境”双重困境，基层队伍存在专业能力薄弱、服务链条断裂等短板。天门市通过构建“政府主导＋专业引导”协同模式，通过“帮扶、支持、营造、完善”家庭照顾四大路径，结合“三级培训体系”与“分龄分层服务”，形成“评估—干预—跟踪—转介”服务闭环，有效缓解儿童心理问题，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本文总结天门市实践经验，揭示“家庭化”照顾的核心价值，为破解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构建本土化困境儿童服务体系提供参考，助力困境儿童服务从“有服务”向“优服务”转型。

关键词：困境儿童；家庭化；心理健康关爱；基层服务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我国困境儿童保护历经从“隐性家庭主义”（忽视家庭）[1]177到“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转变，政策体系从“保障基本生存”逐步向“激活家庭功能、守护心理健康”演进。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首次明确“坚持家庭尽责”原则，将家庭定位为儿童抚养、教育、保护的第一阵地；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新增“儿童与家庭”领域，进一步提出“将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支持与保障作为家庭支持政策的优先领域”，从国家层面确立“家庭功能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基础”的导向。2019年民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号），推动形成“以村（社区）为基础的自上而下、多部门协同、多主体参与的纵横交织的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儿童保护与福利服务体系”[2]71，也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建设搭建了基础框架。

然而，从政策“应然”到实践“实然”仍存在差距：一方面，中央和省级层面政策多为“高度概括性的行动指引，缺乏执行、监督和评估”[3]119，针对“家庭照顾能力提升”与“心理健康服务衔接”的细化条款不足；另一方面，服务供给存在“碎片化和低效率”[4]问题，各类服务或活动未能聚焦家庭功能修复与心理健康需求。同时，政社资源统筹协调不足[5]、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不顺及社会组织专业性发挥有限[6]等问题，加剧服务供需错配，困境儿童难以获得针对性支持。

基层服务能力薄弱更成为关键瓶颈。儿童督导员与儿童主任多为兼职，仅少数人接受过系统心理学培训，且大部分工作精力集中于物资发放，难以开展心理评估与干预；现有服务对心理健康服务重视不足，部分儿童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在此背景下，探索“家庭照顾机制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湖北省天门市困境儿童服务项目为样本，系统分析其“家庭照顾”模式的实践路径与成效，为构建本土化、系统化的服务体系提供参考，助力我国困境儿童服务从“有服务”向“优服务”转型。

二、“家庭化”照顾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机制分析

（一）政策演进：从“忽视家庭支持”到“家庭化核心”的转向

学术界对“家庭化”的研究与政策演进紧密呼应。吴莹（2023）指出，早期困境儿童保障政策落点集中

于儿童个体物质补贴，家庭在承担照顾责任时缺乏制度支撑。这一倾向在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发生根本性转变——该纲要新增“儿童与家庭”领域，明确将“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支持”列为优先方向，标志政策从“保障儿童个体”转向“激活家庭功能”[7]30。黄冠等（2023）通过词频分析验证，2010—2023年国家层面儿童福利政策中，“家庭支持”“监护能力提升”等与“家庭化”相关的表述频次，较2010年前有显著提升，省级政策中“家庭化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印证“家庭化”已成为政策核心导向[1]178。

（二）理论支撑：“家庭化”的本土实践理论框架

满小欧等（2016）基于“积极福利”理论框架，提出“不替代家庭功能，而是通过多层干预强化家庭照顾能力”，包括分龄分级家庭津贴、社工驻点服务和社区支持网络搭建三个维度[8]173。冯元（2022）补充了“文化敏感”与“需求满足”原则，强调政策设计需兼顾城乡家庭差异和服务供给的分龄需求[3]115。冉源懋（2021）等学者从立法视角提出，需明确家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同时保障家庭获取专业支持的权利[9]，为困境儿童保护“家庭化”提供法理支撑。

（三）需求关联：家庭功能与儿童心理的实证关联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家庭是儿童心理资本积累的“首要社会化场域”。吴莹（2023）基于困境儿童家庭实地调研指出，家庭监护能力缺失或不足时，儿童易出现行为偏差等发展风险，而家长的负面情绪会直接传导至儿童，加剧其心理压力[7]34。陈仙歌等（2025）通过OLS回归分析验证，“家庭教育频率”“亲子沟通时长”对儿童权益保护水平的正向预测系数分别为0.061、0.052（$P < 0.01$），且社区专业资源可提升家庭内生功能积极影响[10]。基于此，本研究界定家庭“内生困境”是“源于家庭内部的监护能力、情感支持、经济条件等障碍”，家庭“外生困境”为“源于外部的专业资源、政策衔接、社区支持等障碍”，作为后续机制设计的分析工具。

（四）实践路径：“家庭化”落地的现实挑战与突破经验

王小兰（2025）对多村（社区）儿童主任的调研显示，儿童主任多为兼职，身兼数职导致服务精力分散，缺乏系统专业培训（含心理学、儿童保护等技能），仅能完成基础信息登记、物资递送等事务性工作[2]64。苗政军（2021）在吉林省的多地调研显示，困境儿童家庭中隔代监护占比普遍较高，监护祖辈因年龄偏大、精力有限且缺乏科学教养理念，难以满足儿童情感陪伴与行为引导需求[11]。满小欧等（2016）研究指出，家庭化支持的落地需构建“多层次津贴+专业服务”的综合路径，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困境家庭提供亲职培训、心理疏导等个性化支持，破解传统福利“重物质、轻能力”的局限[8]178。

（五）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家庭照顾”模式建构

基于前文政策演进、理论支撑、困境儿童需求特征及实践路径，本研究围绕“困境儿童心理关爱”核心目标，构建“以家庭为中心，政府托底、专业支撑、社区补充”的“家庭照顾”模式，通过外部支持激活家庭自主开展心理关爱的能力而非替代家庭功能，最终实现“家庭能干预、专业能支撑、资源能获取”的服务格局。

具体通过四大机制落地，针对家庭心理干预知识欠缺、经济压力等内生困境：“帮扶家庭照顾”机制从心理关爱能力培训与心理服务经济补贴两方面双赋能，针对家庭缺乏专业方法、难以对接资源等外生困境；“支持家庭照顾”机制以专业力量下沉为核心，明确社工、心理咨询师固定对接家庭并建立动态档案，同时开展家长—儿童双轨心理疏导，针对家庭心理关爱缺乏外部氛围、临时支持缺位等外生困境；“营造家庭照顾”机制聚焦社区赋能，依托村社阵地开展分龄心理关爱主题活动，组建“家庭心理关爱互助联盟”并招募志愿者提供临时支持，针对家庭政策衔接不畅、资源分散等外生困境；“完善家庭照顾”机制从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两方面保障服务长效运行。

三、天门市“家庭照顾”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实践分析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以天门市446名困境儿童（孤儿27人，占6.05%；事实无人抚养儿童419人，占93.95%）及其监护家庭（隔代监护189户，占42.38%；单亲监护97户，占21.75%；其他亲友监护160户，占35.87%）、651名基层工作者（26名儿童督导员，含3名专职；625名儿童主任，均为兼职）为核心研究对象，覆盖全市28个乡镇（街道）。

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梳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湖北省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实施方案》（鄂民发〔2022〕18号）及天门市《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年度报告（2023—2024）》等政策与实务资料，明确实践框架。

（2）实地调研法：走访岳口镇、蒋场镇等8个乡镇，观察5个村（社区）儿童之家、3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记录活动频次、资源配置数据。

（3）问卷调查法：采用《儿童发展行为评估量表》（0~6岁）《困难和长处问卷（SDQ）》（6~16岁）《90项症状量表（SCL-90）》（16岁以上）测评儿童心理；采用“家庭照顾能力问卷”调研家庭，回收有效问卷208份。

（4）个案访谈法：深度访谈 15 名家长、10 名基层工作者、7 名社工，收集家庭照顾痛点与服务实施难点等质性资料。

（5）数据分析法：用 SPSS 26.0 分析问卷与台账数据，量化心理问题发生率、服务覆盖率等指标。

（二）需求调研分析：家庭照顾困境与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短板

1. 困境儿童分龄心理问题突出，家庭干预能力不足

分龄测评数据显示，0~6 岁儿童中 40.91% 的儿童存在语言迟缓问题，22.73% 的儿童表现出社交互动障碍（如回避眼神交流、拒绝同伴接触），87% 的儿童隔代监护家庭家长表示“不知如何引导儿童语言发育”；6~16 岁儿童中 87.5% 的儿童存在“行为问题 + 情绪问题”叠加，同伴交往维度异常率 6.67%、边缘率 28.75%，59% 的儿童单亲家长“无法应对孩子的叛逆行为与抑郁情绪”；16 岁以上青少年 SCL-90 测评中，强迫症状平均分为 2.10 分、抑郁症状平均分为 1.90 分，均高于常模临界值（1.60），76% 的家庭未察觉儿童的自伤倾向或消极情绪。

2. 家庭面临“内生 + 外生”双重困境，照顾功能弱化

内生困境：38.2% 的家庭存在监护能力不足（如隔代监护家长平均年龄 62 岁，缺乏基础心理学知识），27.6% 的家庭存在情感支持缺失（如亲子沟通每周不足 1 次），21.1% 的家庭因经济压力（人均月收入低于 2000 元）无法承担心理服务费用。外生困境：51.7% 的家庭反映“县域内专业心理机构不足 3 家，且集中在城区”，46.3% 的家庭提及“申请心理服务补贴需跨 3 部门，审批周期超 15 天”，39.8% 的农村家庭因交通不便难以参与线下心理辅导。

3. 基层服务体系存在短板，难以支撑家庭需求

基层工作者能力方面，仅 12% 的儿童主任接受过系统心理学培训，625 名兼职儿童主任平均每人负责 6~8 名困境儿童，68% 的儿童主任表示“主要精力用于物资发放，无时间开展心理评估”；服务资源方面，全市 625 个村（社区）仅 5 个儿童之家（4 个在岳口镇、1 个在蒋场镇）能提供基础心理服务，其余村社年均心理服务不足 1 次；在跨部门协同方面，民政部门“儿童信息库”与卫健部门“心理诊疗库”数据未互通，导致 8 名需转介就医的儿童因信息滞后延误干预 10~15 天。

（三）家庭照顾模式的实践路径：“帮扶—支持—营造—完善”四大机制

针对需求评估发现的核心问题，天门市以“激活家庭照顾功能、强化基层服务支撑”为目标，构建“政府主导 + 专业引导”的家庭照顾模式，具体路径如下。

1. 帮扶家庭照顾：物资保障与监护能力建设

经济支持层面，将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设立“心理干预专项补贴”：对重度心理问题儿童家庭按每人每月 300 元标准发放，2024 年覆盖 16 户 16 岁以上复合症状青少年家庭；通过“天门民政”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上申请—部门联审—资金直达”，审批时限从 15 天缩短至 7 天，降低家庭获取成本。

监护培训层面，依托三级体系开展分龄培训——市级邀请高校心理学教授开展“分龄监护技巧”培训，乡镇组织“家庭情景模拟”实操演练（如模拟儿童情绪失控场景训练疏导方法），村社由儿童督导员每月 1 次上门督导培训效果。2024 年累计开展培训 12 场，覆盖全部基层工作者，培训后家长心理问题识别准确率从 35% 提升至 78%。

2. 支持家庭照顾：专业社工介入与双轨心理疏导

政府购买第三方社工机构服务，为 446 名困境儿童配备“专属社工”，实行“每月 2 次家访 + 每周 1 次线上沟通”，建立包含“儿童心理状态、家长情绪变化、干预措施”的动态档案。

心理疏导采用“家长—儿童双轨模式”：对家长，2024 年开展“情绪管理工作坊”覆盖 208 户家庭，家长焦虑情绪量表得分从 3.2 分降至 2.1 分；对儿童，按年龄实施差异化干预——0~6 岁语言障碍儿童开展“绘本阅读疗法”（每周 2 次，每次 40 分钟），对 6~16 岁行为问题儿童实施“家庭行为训练”（制定亲子契约，如“完成作业后可获得 30 分钟游戏时间”），对 16 岁以上复合症状青少年对接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开展“医疗干预 + 社工跟踪”，2024 年共介入 46 例重度心理问题个案，干预成功率达 89.1%。

3. 营造家庭照顾：社区支持网络与亲情培育

依托现有 5 个儿童之家搭建“正式 + 非正式”社区支持网络：正式支持方面，社工每月入驻主题活动（0~6 岁“亲子感官探索”、6~16 岁“同伴互助小组”、16 岁以上“生涯规划沙龙”），2024 年累计开展 178 场次，覆盖 213 名儿童；非正式支持方面，在岳口镇试点“家庭互助联盟”，组织 15 户有经验的监护家庭与 20 户困境家庭结对，分享照料技巧（如“如何与叛逆期孩子沟通”），同时招募 32 名退休教师志愿者提供“一对一”学业辅导，填补家长辅导能力不足的缺口。

4. 完善家庭照顾：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

政策优化层面，由市民政局牵头，联合教育、卫健等 8 部门出台《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协同办法》：统一困境儿童认定标准，将心理问题儿童纳入重点保障范围；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446 名儿童信息实时互通；明确“儿童主任发现心理危机 → 社工介入评估 → 医疗机构转介”的流程，缩短干预时间。

资源整合层面，财政投入 200 万元用于购买社工服务与儿童之家建设；通过“困境儿童智能平台”发布需求 32 条，吸引天门市慈善总会设立专项基金，定向资助 46 例心理干预个案；链接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天门职业学院资源，建立合作机制——高校提供人才

培训（2024 年开展 4 场心理学实操培训），医院提供诊疗支持（免费心理测评 213 人次），形成资源闭环。

（四）家庭照顾模式下的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实践成效（基于前后测评对比）

1. 儿童心理健康状态显著改善，分龄心理问题得到针对性缓解

0~6 岁儿童语言迟缓发生率从 40.91% 降至 31.2%，社交互动频次（如主动与同伴交流、回应家长指令）平均每周增加 2.3 次；6~16 岁儿童 SDQ 测评正常率从 82.3% 提升至 85.42%，同伴交往维度异常率从 6.67% 降至 4.1%，边缘率从 28.75% 降至 22.9%，如 14 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小李的同伴交往评分从 3.8 分（异常）降至 2.1 分（正常），成功回归校园社交；16 岁以上青少年 SCL-90 强迫症状平均分从 2.10 分降至 1.78 分，抑郁症状平均分从 1.90 分降至 1.65 分，自杀意念发生率从 8.9% 降至 5.1%。家庭亲子沟通频次从每周 1.2 次增至 3.5 次，成为情绪疏导的重要支撑。

2. 家庭照顾能力全面增强，成为儿童心理关爱“第一阵地”

监护能力方面：82.3% 参与培训的家长掌握基础心理干预技巧（如识别儿童情绪异常信号、简单情绪疏导方法），家庭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准确率从 35% 提升至 78%；心理支持意识方面：87% 的家长反馈“学会了控制焦虑情绪，不再将压力传递给孩子”，家庭氛围从“紧张压抑”向“包容支持”转变，儿童安全感评分（采用《儿童安全感量表》）平均提高 1.2 分；在资源获取能力方面，心理干预专项补贴与“一网通办”流程使家庭获取专业心理服务的成本降低 62%，46 户受资助家庭中 91.3% 实现“心理评估—干预—跟踪”全流程服务覆盖，避免因资源匮乏延误干预。

3. 基层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效能提升，形成“政策—资源—服务”协同闭环

服务覆盖广度，依托跨部门数据平台，446 名困境儿童实现“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覆盖率从 42% 提升至 68%，偏远乡镇（如蒋场镇）的服务触达率从 28% 增至 59%；服务响应效率：“专属社工 + 儿童主任”联动机制，使儿童心理危机响应时间从 48 小时缩短至 24 小时，2024 年 12 起心理危机事件干预成功率达 100%；服务质量保障：“月度监测—季度评估—年度报告”体系使服务满意度从 65% 提升至 82%，89% 的监护家庭认为“服务内容贴合儿童心理需求”，76% 的基层工作者表示“跨部门协同机制解决了以往‘单打独斗’困境”（如民政部门与卫健部门数据互通后，16 名转介儿童平均转诊时间从 10 天缩短至 3 天）。

（五）反思与不足

天门市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实践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三方面突出不足：一是资源配置不均衡，全市 5 个儿童之家集中于岳口镇、蒋场镇，仅 0.8% 的村社有基础心理服务阵地，39.8% 的农村家庭需跨乡镇参与线下活动，交通成本占家庭心理服务支出的 35%，且 26 名儿童督导员中仅 3 名专职人员驻市级未保中心，72% 的农村家庭反映社工家访频次低于市区家庭，服务可及性存在城乡差异；二是服务可持续性依赖外部支持，85% 的经费靠市级财政，社会捐赠占比仅 15% 且多为一次性投入；37% 的家长自主干预意识薄弱、仅在社工指导下开展干预，28% 的隔代监护家庭因精力有限放弃后续训练；第三方社工机构人员流动性达 25%，导致 12 名儿童服务衔接断层 1~2 周，家庭内生动力激活不足。三是服务精准度有待提升，全市 446 名困境儿童中 32 名残疾儿童仅 18 人获得“康复训练与心理干预”融合服务，其余 14 人因缺乏专业康复社工无法获取定制化服务，且现有评估侧重心理症状改善，仅 43% 的家庭接受过家庭功能量表（FAD）测评，难以全面衡量家庭照顾模式的长期影响，特殊群体需求未充分覆盖。

四、结论

本研究围绕“如何通过家庭照顾机制优化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的核心问题，以湖北省天门市为样本，验证了“帮扶—支持—营造—完善”四维家庭照顾模式的实践价值。研究发现，天门市困境儿童家庭普遍面临“内生监护能力不足、情感支持缺失”与“外生专业资源匮乏、政策衔接不畅”的双重困境，且儿童心理问题呈现分龄化特征；基于“政府主导 + 专业引导”构建的家庭照顾模式，通过物资保障、专业介入、社区联动与政策协同，有效改善了儿童心理健康状态、强化了家庭照顾能力、提升了基层服务效能，印证了家庭作为儿童心理关爱“第一阵地”的核心价值，也为破解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实践范式。未来通过持续优化，将推动家庭照顾从“地方实践”向“制度性保障”转化，实现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从“有服务”向“优服务”、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型，为我国困境儿童保护体系建设提供更具普适性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冠，乔东平 . 知识与权力 : 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研究 [J]. 河北学刊 ,2023,43(02):172-179.

[2] 王小兰 . 中国基层儿童保护的概念内涵与制度变迁 [J]. 青年探索 ,2025,45(03):61-72.

[3] 冯元 . 我国困境儿童政策优化与精准服务策略 : 文化敏感与需要满足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43(01):115-124.

[4] 刘玉兰 . 城市基层福利治理与困境儿童福利供给偏差的地方实践——基于 7 个民政部试点地区的调查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20(03):5-13.

[5] 谢琼 . 中国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社合（下转 185 页）

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下的基层安全隐患多元共治机制探析

徐飞飞

摘要：伴随城市治理精准化以及安全监管重心的下沉，消防执法工作面临向基层延伸与协同提效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作为一种新兴探索路径，旨在打通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此模式借助执法力量前移、属地化监管与协同联动机制的设立，有力增进了镇街层级在安全隐患方面的感知、应对与整合实力。本文聚焦驻镇街模式的制度架构与运行逻辑，剖析其在探索过程中面临的职责交叉、权责不清、信息孤岛等现实困境，并在多元共治理念引领下，提出完善协同体系、强化数据支撑、拓展社会参与的机制构建路径，为该模式的深化完善与推广提供理论借鉴与机制支持。

关键词：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安全隐患；多元共治；基层治理

火灾隐患呈现复杂与多元化的发展走向，使得传统“以区为主、街镇配合”的消防治理模式显示出响应迟滞、治理分散化等局限。为化解基层火灾防控遭遇的实际困难，本文探索的消防执法模式，是把专业执法人员派驻到街道，达成隐患感知前置、风险管控下沉化。此模式不单转变了既往的垂直管理架构，更助力消防治理体系与基层政务架构达成深度耦合，给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筑牢基础，进一步厘清其制度特征及治理意义，能够为隐患治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借鉴。

一、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的运行特征与制度价值

（一）驻镇街模式的结构逻辑与基本功能

驻镇街模式的核心是把原本集中在区级（或县级）层面的消防执法力量长期安置于镇街一级，让消防监管更贴近治理的第一线，由此提高日常排查与隐患整改的效率，此模式核心主要体现以下结构逻辑。首先，实现组织嵌入相关的系统构建。各辖区消防救援支队选派专职执法人员进驻街道办事处与乡镇人民政府，并在办公场地、执法权能、协作规程等方面确立制度支撑，驻点人员既在业务上接受区级消防部门指导，也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相关事务，造就了“条块联结”的管理格局。其次，按照实务导向实施功能拓展。驻镇街执法人员承担的工作，绝非仅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执法检查任务，还介入安全宣传教育、联合整治实践、网格走访查访、部门联动合作等综合治理事务中，达成了“执法者”向“治理合作者”角

（上接 184 页）

作：实践、反思与重构 [J]. 社会保障评论 ,2020,4(02):87-100.

[6] 徐丽敏 , 陶真 .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保护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35(05):74-84.

[7] 吴莹 . 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对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反思 [J]. 社会建设 ,2023,10(01):29-41,56.

[8] 满小欧 , 王作宝 . 从“传统福利”到“积极福利”：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研究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18(02):173-178.

[9] 冉源懋 , 汤文丽 , 孙庆松 . 家庭教育立法 : 困境儿童权益保护路径探析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40(03):49-54.

[10] 陈仙歌 , 胡毅 . 家庭监护行为、家庭关系与困境儿童权益保护 [J].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2025,35(05):18-24.

[11] 苗政军 .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路径选择——以吉林省为例 [J]. 公共管理理论 ,2021,8(12):22-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社会学习机制及其治理研究”（24CSH030）；鄂尔多斯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课题“社会治理生态下应用型社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2024JGH267）。

（作者：陈兰兰，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教师、高级社会工作师；童声成，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级社会工作师）

色的变更[1]。这种角色复合式的统筹，有利于推动“日常监管—专项整治—应急响应”三位一体机制高效协同。最后，信息协同实现机制创新。经由把镇街网格力量吸纳进消防治理信息链条，驻点人员可运用基层数据开展风险分析以及动态预警事宜，达成火灾隐患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识别”的能力进阶，依托政务信息平台整合，消防数据可与安监、住建、城管等部门达成实时共享，突破协同治理内的数据壁垒。

（二）基层实际运作中的典型成效与潜在矛盾

驻镇街执法机制在提升治理的紧凑度、响应及时性方面成效良好，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可能暴露出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问题。一方面，镇街层级对隐患的整改能力得到强化，依靠常驻执法人员协助，基层单位可第一时间完成隐患登记、风险研判以及初步的督办操作，避免层级传递引发的治理跟进滞后。比如在老旧居民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这类重点领域，采用快速核查与实地教导，切实提高了治理闭环率。而另一方面，执法权责的边界，可能存在模糊情形，部分区域对驻点人员的职能划分不明朗，既要从事专业执法活动，也需承担大量行政业务事项，造成职责边界模糊。另外，驻点人员普遍反馈执法权限受限，一些案件依旧要上报至区级层面处理，妨碍了工作的连续开展与权威树立，更为突出的现象是资源配置碎片化。

二、基层消防安全隐患治理的现实难题与协同困境

（一）隐患治理责任体系存在多头管理与交叉模糊问题

消防、应急、住建、市场监管、城管等若干部门对基层安全风险都有一定监管的职能，在缺少统筹规划的情境里，可能出现执法重复或责任空转这类情况。首先是职能的边界划分模糊，以“三合一”场所、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典型隐患为例，一般牵涉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用电安全等若干风险因素，而负责开展治理工作的部门，如果其职责划分不明晰，可能出现监管范围相互交叉、重叠的局面。部分街区在面对违规搭建或危旧建筑隐患时，消防、住建、城管等单位均有权介入，但由于职责边界未明确划定，容易出现互相观望、迟迟未处理的现象，甚至出现“多部门检查但无人整改”的治理困境。同时，部分职能部门因考核导向偏差，更倾向于“亮点性任务”而非日常基础治理，导致对潜在隐患的持续跟踪与责任落实缺乏长效机制。其次是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由于基层可用行政资源有限，职权范围的界定较模糊，部分镇街可能习惯性地依靠上级部门引领，缺乏主动治理的意识以及相应能力[2]。一旦隐患进一步升级为事故，责任认定模糊这种情况，也容易引发部门之间彼此推脱。

（二）隐患排查与处置机制执行力不足

在治理手段方面，隐患排查与处置机制可能存在制度执行力不足的问题，难以契合高频率、广区域、动态推进的风险治理诉求。首先，依赖人力开展排查的局限性极为明显。隐患排查工作主要借助网格员、社区干部、消防志愿者等基层人力开展“地毯式”排查，但这些力量的专业能力以及风险辨识程度普遍不高。其次，技术赋能能力未展现出应有的水准。尽管部分城市已采用视频监控、物联网探测器等智能设备来实现火灾预警，但在镇街层级的普及率和覆盖率依然不足，且多数设备还未实现与执法调度平台、风险预警系统的数据链条的衔接，难以形成一套高效的“发现—联合—处置”模式，容易引发技防与人防的脱节现象，很难构建起智能联动的闭环[3]。再次，当前镇街层级的隐患治理体系中，普遍缺乏系统化的风险分级评估机制与闭环整治流程，导致“发现—处理—复查”各环节之间存在衔接断点。最后，隐患整改容易流于形式。部分基层的安全整改工作滞留在纸面材料或拍照留档阶段，整改反馈机制在真实性及连续性方面存在缺陷。

（三）多元协作力量联动弱化

实现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的共治格局，是基层消防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路径，然而就现实情形而言，协作体系建设暴露出诸多短板。一是以社区居民、物业运营公司、志愿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虽在安全宣传及协助巡查中有一定参与，然而整体呈现出组织松散、参与形式单一、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的状况。尤其是在应对突发隐患、高风险地带时，群众的积极性欠缺，志愿群体欠缺培训与引导，工作实效难以保障。二是执法链条与网格治理体系可能无法有效衔接。尽管现阶段大多数城市已设立“网格 + 消防”信息协同机制，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网格员一般未接受专业教导，难以胜任对隐患的初步识别及风险研判工作，同时网格信息平台与消防执法系统之间接口衔接不畅，数据割据现象显著，造成前端排查的信息无法及时输送到执法部门，弱化了整体应对的能力水平。

三、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基层隐患治理机制构建路径

（一）建立分工清晰的权责协同体系

面对当前基层消防治理中面临的多头执法、机制脱节、联动不足等现实困境，推动从“单一执法驱动”至“多元共治协同”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首先，厘清镇街与专业执法力量的职责分工。为实现共同治理筑牢制度基础，政府部门需构建起“属地主责、专业指导、多元参与”的责任体系，清晰界定镇街在隐患整治中的统筹职能，消防专业团队充当技术引领及执法辅助角色，赋予专业判定、政策引导及应急干预效能[4]。一方面要制定“基层消防安全职责清单”，囊括辖区内单位、社区、物业、志愿组织等多类主体的权责内容，借助“定性明确 + 定量考核”的方式将责任细化到人、落到岗位。另一方面引导执

法权限“下沉适中”，保证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赋予驻镇人员某些执法决定权、整改督办权，杜绝其成为“上传下达”这样简单工作的信息中转点。

其次，强化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相关机制。比如建立聚焦问题导向的“隐患治理联席会”或“快速响应协作小组”，由镇街主导牵头，消防、安全监测、住建、市场监督等多主体介入，打造具有联合协商、协同处理、责任共担属性的联动平台。可依靠“分级响应、归口管理”原则，各自设立重点领域协同整治体系，比如，针对老旧小区、沿街商铺、“三小”场所等，力求问题精准鉴别、属地推动、结果审视。

最后，强化责任追踪与绩效激励手段。需借由“日常督导 + 事件回溯 + 考核通告”三位一体方式，促使各治理单元积极担起责任，比如，把消防安全治理的实际成效纳入镇街和职能部门年度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内，形成以责任压实倒逼协同治理落地的倒推机制。

（二）构建信息共享与数据赋能平台

目前，部分基层隐患治理中数据分散孤立、流转迟缓、平台重复等问题极大制约协同效果，因此，迫切需要推动数据的共建及共享，建设全流程、全要素、可追溯管理的数字化支撑平台。第一，应打造统一化的数据采集与汇聚平台，通过构建“街道安全治理数据库”或“隐患治理云平台”，把源于网格巡查、群众举报、智能监测、联合执法等多维度的数据进行整合，并搭建多源数据融合模型[5]。第二，应当推进隐患信息的实时流转与直观化呈现，依靠大屏调度系统与移动终端工具，达成隐患地图、风险热力图、隐患整改轨迹图等信息的动态呈现及实时刷新，还应增进镇街干部、驻点人员、基层网格等治理单元在信息方面的掌握能力，使其借助智能化途径进行风险分级与应急调度的联动，实现治理环节的清晰察觉、严密管理与精准施策。第三，应切实强化跨部门信息接口标准的建设工作，就现有平台割裂问题而言，需促进确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及接口协议，达成住建、应急、公安、消防等系统平台的互通互联，促进构建以“数据一张图、风险一张表、治理一张网”为支撑的协作根基。探索以“隐患处置工单制”为核心的治理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保障发现、交办、整治、反馈、复查等环节均具备数据依托以及责任流转。第四，可发展 AI 辅助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对关键区域部署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识别手段，采用图像审视、温感监测、电力异常探查等方式，实现针对高风险场所的实时督察。

（三）培育协作共治的社会参与网络

在促进多元共同治理生态的形成路径里，构建兼具制度化、常态化与可持续性的社会参与网络乃重中之重。首先，构建制度化的群众参与途径。设立诸如居民安全议事日、社区安全协商会等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安全标准制定、隐患分析、整改监督等各个环节，并依靠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数字平台，构建“随手拍、及时报”渠道，鼓励群众积极呈报问题、上传线索、监管整改落实[6]。可构建沉浸式宣教路径，如设置可移动的“模拟逃生体验屋”、开发“火灾 VR 互动课程”，引导居民在场景化情境中习得逃生技能。其次，增强基层组织的合作协同能力。有体系地建设“网格员 + 楼栋长 + 志愿消防员”三位一体微治理小组，驱动其介入日常排查、宣传指引、协助执法等阶段，还需制定有关协作职责的手册及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志愿组织、网格力量采取物质与荣誉方面的双重激励，增强治理参与黏性与组织稳定性。再次，引入市场化专业力量。确定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在隐患评估、整改设计及设施检测等环节的参与途径，以公开招标、服务清单、等级评估等制度，规范第三方力量准入以及监管的相关环节，增进治理在专业层面的水平与公众信赖。最后，增强法治化与制度保障支撑。可采用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厘清社会各类主体在消防治理中的责任、义务及权力边界，开辟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正式途径，促使治理进程从“政策引导”过渡为“制度驱动”局面，同时加强对基层治理人员的培训与能力建设，增强治理行为的法治底色。

四、结语

消防执法驻镇街模式作为基层治理创新方向之一，可以有效地推进消防监管力量前置，让隐患排查精细化，形成协同治理机制。搭建以属地主导、专业协作、数据赋能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参与体系，已然成为提高隐患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未来可进一步对制度设计进行完善处理、对职责配置实施优化调整、强化信息支撑及公众参与，进而推动从“单点治理”到“协同共治”的根本性蜕变，加固基层消防安全保障堡垒。

参考文献

[1] 杨舜，冯凯 . 基层镇街消防工作的困境和出路 [C]// 中国消防协会 .2022 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 .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2:354-357.

[2] 谢旭春 . 基层镇街消防治理体系构建实践与创新探索——以珠海市白蕉镇为例 [J]. 中国应急救援 ,2024(04):76-79.

[3] 朱雄威 . 如何做好基层镇街“最后一公里”消防安全治理工作 [J]. 今日消防 ,2024,9(02):88-90.

[4] 陈其婷 . 镇街消防救援分局在基层火灾防控中的职能定位及作用发挥 [J]. 今日消防 ,2024,9(01):117-120,141.

[5] 霍星铭 . 基层消防监管模式现状与优化改进探析 [J]. 城市与减灾 ,2024(02):62-64.

[6] 县区协调中心 + 镇街消防工作站健全基层消防监管机制 [J]. 安全与健康 ,2022(09):22-23.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乡村治理的协同逻辑与实践进路

张扬南　高　影　刘　冲

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本文聚焦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探索，深入剖析该工程与乡村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耦合逻辑，从战略意义、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三个维度展开系统论证。研究提出并整合构建了“一旗引领、三治融合、五力同向、零距服务”的“1350”现代乡村治理框架，旨在强化党建引领，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协同政府、市场、社会、村民与科技五方力量，并推动服务精准直达，以期为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策略。

关键词：乡村治理；“百千万工程”；协同路径；和美乡村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总体呈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良好态势，但治理能力区域不均衡、现代化转型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百千万工程”的全面实施，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大战略契机和实践场域。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为解决好“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是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

（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方面，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国家政权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用约占 15% 的篇幅，着重部署了“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这些重要决策部署为工作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

（二）乡村治理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抓手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短板。2022 年 12 月，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决定，全面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旨在新起点上更好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2]。广东“百千万工程”2024 年工作要点指出要“深入构建‘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乡村治理现代化逐渐成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与抓手，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潜力板”。

（三）乡村治理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题中之义

投身乡村治理研究与实践，是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教育帮扶单位，高校可立足职能定位及资源优势，通过紧抓“百千万工程”有利契机，聚焦解决乡村治理难点堵点问题，通过加强基层人才培养培训、引导毕业生到乡村实习就业等，厚植支撑“百千万工程”的人才沃土。在此过程中，高校也可提升办学核心能力与社会影响力，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与贡献度。

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举[3]。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经久不衰，但在实践中，部分地区乡村治理存在资源不足、法治缺失、作用乏力等困境，与“治理有效”要求存在差距。

（一）理论研究尚需深化

公共事务治理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难题。专家学者就该主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志在富民”的理想研究中国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论述了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的重要

性；贺雪峰教授编著有《新乡土中国》等，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近年来，学者引入柔性治理、敏捷治理、简约治理等理论，提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应对之道，国外不少学者则从农村问题、社区再造等方面引入“乡村发展”课题，提出了具有参考意义的治理之策。“百千万工程”是在2022年底开始实施的，当前学界对它的研究侧重于宏观政策方面，对其如何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还不够细致深入。

（二）治理实践面临困境

1. 主体弱化

当前基层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镇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其他主体参与度不足。部分地区乡镇政府习惯采用行政手段，注意力资源有限，容易疏管漏管。村民自治组织依赖传统治理方式，缺乏力量补充。村民自治意识薄弱，参与渠道不够畅通。驻村第一书记等外部下沉力量则因治理主体区隔、共同利益缺失与组织成本过高，易引发治理主体间的“囚徒困境”[4]。

2. 内容模糊

部分地区村组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自治形式化、管治趋强化、共治命令化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和阻碍着村组治理取得实效和长效[5]。现实中，笼统强调自治德治法治，但对如何融合发挥作用指向不明。具体来看，议事决策流于形式，村规民约陈旧滞后，自主理事质量不高。乡村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德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公共法律覆盖面窄，村民法治意识相对淡薄。

3. 资源匮乏

随着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部分地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空间变小，加之财政投入有限，治理资源愈发紧张。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存在欠账。农民批量进城务工定居形成“空心村”，资源投入边际效益递减，难以维持可持续循环。

4. 功能弱化

部分地区阵地标准化建设打折扣，“堡垒”功能发挥不充分，党务、村务协商议事、公开公示缺乏场域载体。这些地区的乡村文化站、图书室等阵地设施闲置率高、功能弱化，甚至沦为摆设。部分县市职能部门将职责过度延伸到村一级，悬挂各类牌匾，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

（三）治理模式缺乏系统性整合

在长期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形成了诸多正式与非正式乡村治理模式，如村民代表大会管理模式、监督委员会监督模式、驻村第一书记及大学生村官模式、乡贤模式。但有些模式往往存在资源依赖，缺乏系统性整合，对村民多元需求响应不足。一些学者运用共生性理论及博弈论来观照现实，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框架，但其理论解释力与执行张力之间存在落差。

三、实现乡村和美善治的治理框架

乡村治理是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应然之举，实施“百千万工程”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力举措，为乡村治理提供资源平台。基于二者结构耦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行为共生”理念出发，提出“百千万工程”驱动下现代乡村治理的一种实践进路，即构建党建“一旗引领”、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教育科技人才文化资金“五力同向”、党群服务中心“零距服务”的“1350”现代乡村治理框架，系统性回应乡村治理中方向失准、内容失焦、资源失补和阵地失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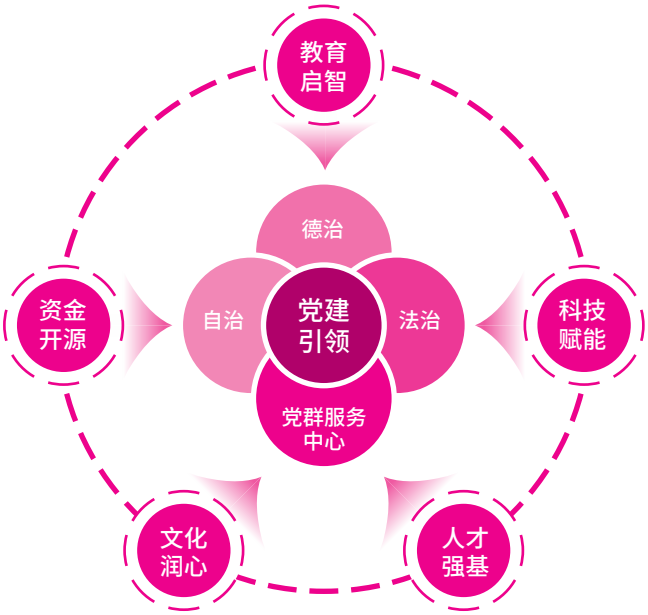


图1 “1350”现代乡村治理框架示意图

（一）坚持“一旗引领”，锚定治理方向

落实党管“三农”工作总要求，将党建引领作为该框架的核心内容，探索“党建+”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形成以党建为核心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党建引领和乡村治理同频共振。对照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要求，在确保支部建在行政村基础上，推动有条件的村级党组织升格为党总支，并将支部建在自然村上，形成贯通有力的组织体系。开展“书记领航”等项目，推动“五级书记”抓乡村治理。深化结对共建，选派优秀党员干部驻镇村帮扶，发挥好驻村第一书记示范带头作用。做好乡村党员发展教育培训与管理，引导争当乡村治理“排头兵”。

（二）坚持“三治融合”，优化治理内容

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自治是前提基础，德治是柔性约束，法治是刚性保障，三者协同互补。

1. 以自治激活参与性

健全村民议事协商制度，推广“四议两公开”，增强议事透明度。创新议事协商形式，建立“微治理”单元，丰富屋场恳谈、围炉夜话、院落自治等形式，

提升参与便利性，打通乡村治理堵点并破解难点。

2. 以德治弥补随意性

弘扬尊老爱幼、谦和礼让、互助共济等传统美德，延续其道德教化作用。建设村史馆、道德讲堂，唤醒共同体意识。评树“好婆婆”“好媳妇”道德榜样，抵制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培育文明乡风。

3. 以法治破解软弱性

实行村规民约备案公示，设立村级法律援助站、咨询台，构建“调解员 + 乡贤 + 法律顾问”多元调解网络，培养“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建立“村组吹哨、县乡报到”应急响应机制，推动司法资源下沉。

（三）坚持“五力同向”，整合治理资源

乡村治理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文化、资金等资源的系统性支撑。以“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百校联百县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以下简称“双百行动”）等为依托，进一步明确“百千万工程”的主攻方向，也要引导社会参与，凝聚“百千万工程”的强大合力[6]。

1. 教育启智

充分发挥教育先导性、基础性作用，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村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能力。健全县域城乡教育一体化治理体系，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差距，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基于“职业教育结对帮扶”“基础教育全口径全方位融入式帮扶”等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在定点帮扶平台流动起来。

2. 科技赋能

与高校院所合作，形成“科技小院”“科技特派员”常态化支持机制，将科技资源嵌入其中并发挥专业作用。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具，发挥其在电子政务、精准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提升互联网 + 治理效能。实际工作中，乡村可利用腾讯现成的“为村开放平台”，免费集约“触网上云”。

3. 人才强基

坚持“本土造血”与“外来输血”相结合，与高校联合重点提升乡村党员干部的学历学位、职业技能特别是基层治理能力。通过定向招录、志愿服务等方式引才，鼓励返乡青年、退伍军人等参与乡村治理。推动“校地合作、村企共建”，建立人才驿站实践基地，健全“积分制”“信用制”“荣誉村民”等激励机制，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4. 文化润心

尊重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肯定宗族、家族和传统组织的治理功能[7]。依托文明实践站所，建立“艺术乡见”乡村工作室，举办“村晚”、民俗节庆、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组织大学生“三下乡”团队到村开展墙绘、植树、手工、捐建书画室等实践，以外部志愿者活力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5. 资金开源

在农民的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行动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8]。因此，应因地制宜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发挥电商销售和消费帮扶力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利用帮扶单位投入首期资金，集合各方力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可持续性的治理资源支撑。

（四）坚持“零距服务”，筑牢治理阵地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托于具体的治理空间[9]。乡村党群服务中心是前述“五力”的最终落脚点和效能检验场，也是党建引领和“三治融合”的物理空间和情感纽带。因此，必须抓住这一柔性治理的重要节点，将其打造成为乡村治理的示范窗口。可将原旧有村委办公楼、闲置村小等升级改造为党群服务中心，周边配建文化广场、口袋公园，打造服务群众综合体。落实惠民利民政策，加强监测帮扶，开展困难慰问，优先聘用困难人员到公益性岗位工作，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落实为基层减负赋能，明确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业务内容，常态化提供党建指导、志愿帮扶、干部下沉挂钩对接以及医疗、教育、助老等专业服务，构建集约开放共享的阵地体系，让“服务中心”真正走进“村民心中”。

实现乡村善治、建设和美乡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350”现代乡村治理框架的提出，是立足“百千万工程”实践、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一次理论探索与实践回应，框架的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回应现实挑战、指向和美善治目标的系统性治理方案。期待该框架在更广泛的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完善，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2] 中共广东省委 .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EB/OL].(2022-12-08)[2025-02-20].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4100997.html.

[3] 孟宪平 , 尚雅彬 . 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4(06):70-77.

[4] 郭晓鸣 , 吕卓凡 , 周小娟 . 整体性治理与乡村韧性发展：一个“四维”理论分析框架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04):13-22.

[5] 高其才 , 池建华 . 村组治理中的自治、管治与共治：规范依据、实践现状与制度优化 [J]. 清华法学 ,2024,18(04):70-87.

[6] 张林 .“百千万工程”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J]. 南方论刊 ,2024(12):57-60.

[7] 景跃进 .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J]. 治理研 （下转 191 页）

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风险挑战与推进路径

李　婷

摘要：伴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协商民主治理效能——发展数智协商民主是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数据驱动、用户中心、智能决策、系统集成、数智督办是数智技术与协商民主深度耦合的内在机理。面对赋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技术壁垒、智能鸿沟及数智安全等现实挑战，需要从打破技术壁垒、弥合数智鸿沟和确保信息安全三个维度进行全面优化，实现对传统协商民主的升级和跃进，助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数智技术；数智协商民主；技术赋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数智技术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协商民主治理效能，核心就在于“数智化”赋能，即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不同协商主体提供一种在智能网络环境下，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社情民意进行协商、沟通和讨论的新型协商模式。这是对传统协商民主的升级和跃进，可以实现更高效、智能、精准的协商。因此，发展数智协商民主是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

一、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在平等对话、理性沟通与凝聚共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传统协商民主囿于协商成本高、效率较低等现实困境，正迫切需要新兴技术的嵌入与赋能。基于此，积极推进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是当前摆脱发展困境、切实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

（一）数据驱动：依托数据支持，强化民意收集

传统决策方式往往依赖人的经验和直觉，但这种方式可能不够准确和高效。由此，数据驱动应运而生，其通过采集海量数据并进行组织、整合和提炼，以此为基础开展决策。基于中国拥有活跃的市场和极其庞大的用户数量，将这种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智模式应用于协商民主的民意收集和处理过程，能充分发挥其独有优势。比如，利用各类主流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大量的社情民意，避免传统方式中的资源浪费、成本过高和时效性不足等问题。同时，与传统协商民主靠人工分析易受主观倾向影响不同，数智赋能可以通过聚类分析、情感分析等科学方法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意见。

（二）用户中心：打破时空限制，拓宽协商渠道

数智协商民主不仅关注技术本身，更坚持以用户需求和体验为中心。一方面，它能突破物理空间的边

（上接 190 页）

究 ,2018,34(01):48-57.

[8] 米格代尔 .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M]. 李玉琪 , 袁宁 , 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179.

[9] 王佃利 , 孙妍 . 脱域流动与情感共生：城乡融合发展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何以可能——基于空间与治理互塑视角的分析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8(03):11-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广东省高校科研平台和重点领域项目“基于‘百千万工程’的视角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模式”（2024ZDZX4147）。

（作者：张扬南，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高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刘冲，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界，让协商渠道从局部封闭走向全域开放。数智协商使协商渠道不再受行政区划、地理距离的限制，可以将物理空间的限制转化为虚拟空间的无限可能。比如，通过 VR 技术真实还原线下协商场景，基层群众可在终端设备前沉浸式参与议题讨论。另一方面，它能打破时间维度的刚性约束，让协商渠道从限时参与变为持续互动。传统协商往往以固定时间的会议形式进行，这就意味着总有无法同步参会的群体存在，而数智协商可以使主体在有效协商时间范围内随时登录平台进行在线讨论。这种时间上的弹性，让协商渠道始终保持在线状态，从少数参与扩展到多元共治。

（三）智能决策：设计辅助模型，助力科学决策

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应致力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有在获得广泛信息，充分关注和了解政策对象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决策才是科学的、民主的，才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1] 基于此，在收集大量民意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系统，使决策过程不再单纯依赖经验，这将大幅提升协商民主对科学决策的助力。因为人工智能不仅能对许多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语义转化与情感分析，自动整合出结构化的政策需求图谱，使决策依据做到精准匹配；还能够基于逻辑推理模型实时识别讨论中的因果倒置等逻辑谬误，捕捉不同主体的语言情绪特征，促进理性对话，减少非理性冲突，提高决策效率。

（四）系统集成：实施数据共享，避免信息孤岛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然而，“有 45.6% 的被调查居（村）民从未被邀请过参加由社区（村）组织的基层协商民主协商议事活动，49.0% 的被调查社区（村）居民实际上从未参加过社区（村）组织的基层协商民主协商议事活动 [2]。”数据表明，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广度和强度受限，与数据隔离、信息孤岛效应是分不开的。而数智赋能恰恰强调系统集成，要求数据共享与信息协同，这就为基层协商民主有效应对信息孤岛效应提供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数智协商平台可以打通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社区治理等领域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集中呈现，从根源上消除因信息碎片化、渠道分散形成的参与障碍，并在持续提升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与时效性的同时，激活基层协商民主活力。

（五）数智督办：构建智能体系，确保效果评估

传统协商模式效率不高、容易流于形式，主要是协商民主绩效评价考核机制缺失导致的。数智技术赋能可以推进协商民主的问责机制变革。目前，“‘数字政协’平台可基于人员考评和委员档案系统对政协工作人员和政协委员的日常履职情况展开跟踪考核评价”[3]，以促成正向激励。而探索立体式的数智督办系统可以进一步强化协商监督。在整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督办提供全面且精准的数据基础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个性化督办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办理时限与质量标准，并通过系统自动发送督办提醒，避免拖延与推诿现象。在系统建成后，不仅要注重对协商成果落实过程进行全程透明监督，还要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督办成果进行量化评估并纳入相关人员工作考核。

二、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风险挑战

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是对传统协商民主的升级和跃进，也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技术赋能过程中，可能面临技术壁垒、智能鸿沟和数智安全的现实挑战，将影响数智协商民主的高效、公平与安全发展，进而制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

（一）技术壁垒：人才数字素养不足可能造成协商低效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4] 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为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带来了技术壁垒风险。

1. 数智协商平台建设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缺失

我国目前既精通数智技术又熟悉协商民主的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这将导致诸多技术难题无法解决。比如，若不能攻克多终端适配技术，平台在不同设备上的显示效果和操作流畅度会存在差异，导致部分主体因设备兼容问题无法正常参与协商。或者由于技术人员不了解在线协商的智能互动需求，可能会影响沉浸式协商、群众意见的自动分类等高级功能的开发设计，进而降低平台的智能性。

2. 相关工作人员的数智认知不足

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地方领导干部对政治业绩的追求、经济条件和富裕程度 [5]。在传统协商民主中，党和政府往往占据着主导权，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数智赋能的认知不足将会直接制约协商的推进与管理。比如不能熟练掌握 SPSS、Python 等数据分析工具，就难以对收集到的多元意见进行量化分析和深入解读，无法及时发现群众意见分歧的焦点和共识的潜在方向，从而降低协商效率。

3. 普通主体的数字素养薄弱

由于文化、年龄、经济、地域等社会性因素，偏远地区群体、老年群体等在智能手机、电脑等数字设备的购置和基本操作方面存在现实困难，难以正常参与线上协商活动。同时有大量真伪难辨的信息在网上传播，部分群众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和片面观点的误导，进而在协商中发表情绪化、非理性的反对意见，协商过程沦为宣泄情绪的“垃圾站”，这不仅会严重干预公民政治参与的秩序，还将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智能鸿沟：城乡数智建设差距可能损害公平正义

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出，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由数

字鸿沟向智能鸿沟的转变。尽管当前我国城乡网络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总体而言数智鸿沟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地区和 60 岁以上人口中的一部分人群远离数智化生活，无法通过‘数智人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等线上渠道参与民主生活。”[6] 这就为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带来了数智鸿沟。

1. 数智基础设施存在梯度分化

通信服务的价格差异与区域收入水平落差形成了叠加效应，导致核心城市与偏远地区在网络覆盖率、基站密度等设施建设上存在显著差距，“北京、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福建、四川、重庆、天津等 10 个地区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7]，而欠发达地区却面临着“最后一公里”困境，构成了技术层面的参与门槛，这种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参与机会的不平等。

2. 数智功能开发存在适配失衡

数智工具设计的城市中心导向使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体面临使用不适的困境，比如缺乏方言语音输入、农事术语联想等适配功能，增加了群众表达转化的难度。有时过度强调实时交互、多媒体呈现等高级功能，却对低网速环境下的基础参与需求有所忽视，导致这类群体即便接入网络，也难以顺利表达个人诉求，亟须开发可兼容城乡用户的个性化数智功能。

3. 数智资源分配存在区域落差

依托完善的信息网络，城市与发达地区的协商主体能够通过多元渠道获取权威信息，掌握公共政策的深度解读、跨领域专家的实时分析、同类议题的历史案例等。然而，农村与落后地区的信息供给呈现出量少质低的特征，多局限于政策条文的直接转述、本地经验的碎片化总结等。这种数智资源分配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加剧主体间的认知鸿沟，危害协商民主的公平正义。

（三）数智安全：潜在协商信息泄露风险可能引发信任危机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动力潜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作为驱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核心赋能工具，成为智能行政的重要助推力量，又带来了诸多数据安全风险与法律规制挑战”[8]。这就为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带来了信息安全风险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公共领域的信任危机。

1. 数据收集环节可能侵犯个人隐私，进而侵蚀协商民主的广泛性

协商民主需要广泛收集各类民意数据，涵盖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偏好、意见等。在此过程中，如果部分平台在收集数据时未能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且在数据管理过程中权限设置混乱，能够随意访问和导出个人敏感数据，这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从而影响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2. 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失真，进而动摇协商民主的公平性

在数智协商过程中，需要在不同设备、系统和平台之间频繁传输协商数据以实现信息共享。然而，当前网络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如未采用有效的加密技术，协商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犹如“裸奔”，容易被截获和篡改，而被篡改的意见数据可能掩盖并扭曲主体的真实诉求，这将直接破坏协商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还会导致国家机密信息的泄露，威胁国家安全。

3. 数据使用环节可能导致信息茧房，进而消解协商民主的多元性

数智协商平台可能会依赖用户画像形成推荐算法，大数据推送同质化信息，看似提升了协商效率，实则在无形中收窄了主体的信息接触面，使其逐渐陷入被算法精心构建的“茧房” 之中。同时，大数据刻意屏蔽不同声音，这将直接弱化协商过程中的观点碰撞，而长期处于同质化信息环境中，会使主体认知逐渐固化，催生群体极化效应，最终导致协商陷入僵局。

三、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中，紧紧抓住协商民主数智化的发展机遇，这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切实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面对技术赋能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要有风险预判化解能力，通过打破技术壁垒、弥合数智鸿沟、确保信息安全的“组合拳”，最终实现协商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一）打破技术壁垒：提高人才队伍的数智协商素养

2024 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 2.49 亿人，占整体人口的 17.7%，相当于每 5.6 个中国人中就有 1 人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9]。数据表明我国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整体发展水平已得到稳步提升。然而，有针对性地提升协商民主领域人才队伍的数智协商素养，仍然是突破当前数智技术与协商民主融合梗阻的核心命题。

首先，可以通过建立跨学科协同培育机制，培育复合型人才。推动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公共管理等专业设置数智素养基础课程，同步在计算机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嵌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共管理等课程，或者招收一定比例的跨专业研究生。这种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能够从认知源头消解技术人员与民主理论研究者的话语隔阂，从根本上弥合技术设计与民主需求的结构性裂隙。其次，要通过实施系统性能力强化工程，提升协商民主干部队伍的数智素养水平。可以通过定期轮训与专项研修相结合，推动干部群体从“技术被动使用者”向“技术主动驾驭者”转型，从权力运行维度消除技术应用的异化风险。最后，应通过构建普惠性技能培训体系，培养普通协商主体的

数智素养能力。可以开展分层分类的数智协商技能培训，重点提升各类群众信息检索、在线表达等基础能力，从全民素养提升层面打破技术应用的准入壁垒。

（二）弥合数智鸿沟：实现全体公民的数智协商包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数智鸿沟，鸿沟可以被弥合，但很难被彻底消除。”[10] 因此出现了“数智包容”这一概念，它强调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数智时代所需的机会与技能，并从中受益。数智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有效弥合数智鸿沟并实现数智包容，最终实现技术进步与民主发展的同频共振。

首先，可以通过推进基础设施的均衡化分布，夯实数智协商的物质基础。可以将数智基础设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核体系，并鼓励开展跨行政区的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同时可采用“以奖代补”机制，激励通信企业向偏远地区延伸网络。其次，应通过建立功能开发的需求响应机制，提升数智协商的技术适配性。数智协商平台要针对弱势群体进行无障碍设计和改造，积极推动平台的界面迭代与操作简化，以缩小数智鸿沟的代际与群体差异。比如，就弱势群体而言，简易化的功能可以降低参与门槛，有效避免因功能复杂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和畏难心理；而就强势群体来说，高级功能会提供更深入的协商辅助工具，有利于提高协商意见的质量。这种适配性优化能够实现数智赋能向民主赋权的价值转化。最后，应通过完善数智资源的统筹配置机制，优化数智协商的要素供给。可以通过深化“东数西算”工程的治理意蕴，在算力调度中嵌入协商民主需求权重，优先保障那些涉及跨区域公共利益的重点协商项目的算力需求，使之得以快速处理海量信息并及时汇聚各方意见。这种资源配置优化可以为协商民主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民主支撑。

（三）确保信息安全：强化数智协商民主的安全保障

我国数据安全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现已出台数据安全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正不断强化相关法律规制。同时，我国的新兴技术安全治理也在不断向着体系化、协同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已初步形成。未来持续深入开展数智技术的信息安全防护，有利于化解信任危机，确保数智协商民主的安全推进。

首先，可以通过规范数据收集，拓展数智协商的主体广泛性。应高度重视个人隐私保护，通过动态授权机制，严格限定仅围绕议题收集协商数据，剔除与协商无关的个人敏感信息，避免因过度收集扩大隐私暴露风险。其次，应通过强化数据传输，维护数智协商的过程公平性。务必利用加密技术筑牢安全防线，防止协商数据在传输途中被拦截、破解，确保传输数据的真实性。并积极建立核验机制，及时发现并排查信息失真问题，一旦出现数据不一致，立即启动溯源程序精准定位失真环节并快速修复，避免因信息差导致的协商不公。最后，应通过优化数据使用，保障协商民主的意见多元性。打造信息破茧机制是核心，不仅需要对数智协商平台的推荐算法进行优化，确保主体能接触到一定比例的异质化信息，为多元观点表达创造空间；还需要搭建安全有序的多元观点对话平台，制定明确的对话规则，规范主体的表达行为，引导主体围绕议题展开理性对话，让数智协商场域真正呈现多元声音。

四、结语

数智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民主政治走向更高水平。然而，民主的有效性并非完全来源于技术赋权，技术本身也存在着治理局限性，过于崇尚和依赖数智技术只会使协商民主陷入“指尖形式主义”和“技术万能主义”。因此，未来在推进数智协商民主过程中，务必摆脱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 陈家刚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46.

[2] 王伟 . 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 [M].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21:149.

[3] 刘伟 , 李昊霖 . 数字技术驱动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变革——基于云南省“数字政协”项目的深度观察 [J]. 探索 ,2024(05):74-85.

[4] 习近平 . 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J]. 求是 ,2025(07).

[5] 何包钢 .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13-21.

[6] 黄文婷 , 罗小莲 , 沈海军 . 数智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性、难题与优化路径 [J].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0(04):32-39,94-95.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 (2024 年)》[EB/OL].(2025-07-30)[2025-09-16].https://www.cac.gov.cn/2025-07/30/c_1755590223034507.htm.

[8] 邹焕聪 , 王庆 .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J]. 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 ,2025,44(07):50-57.

[9] 国家数据局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 年）》[EB/OL].(2025-05-30)[2025-09-16].https://www.nda.gov.cn/sjj/ywpd/sjzg/0530/20250530151342718164521_pc.html.

[10] 左美云 . 弥合鸿沟 : 数字包容的实现路径 [J]. 新闻与写作 ,2025(08):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甘肃样态”阶段性研究成果（2023QN002）。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三维分析框架的基层治理研究

朱逸雨　陈冠宏　朱建一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整体治理理论的核心要旨为依托，建构“体制－观念－技术”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因科层制弊病、需求导向割裂、技术主义倾向等因素引发的体制空转、形式主义、数字阻滞等现实症结。为此，本文提出以体制重构整合政府部门结构与权责，以推动观念归复重塑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以技术正本清源弥合数字鸿沟的三维纾解路径，旨在突破基层治理瓶颈，激发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从“基层善治”走向“大国之治”。

关键词：基层治理；整体治理理论；三维分析框架；治理困境；纾解路径

一、研究溯评

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关乎民生福祉与国家发展，其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多面广，故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所谓基层治理是指乡镇（街道）、村（社区）层级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共治机制协同推进基层事务管理和服务的实践活动。当前，学界研究多聚焦于基层治理困境和纾解路径方面。

在治理困境方面，许欢等指出基层深陷“事多、责大、能力有限”矛盾，效能难以激发[1]；张凯凯等认为，信息隐私泄露与权利失衡为基层治理蒙上了数字阴影[2]；张力伟等提出社会原子化加剧信任危机，共同阻碍集体行动形成[3]。总体看，基层治理面临着多重结构性困境。

在纾解路径方面，学界从多维度进行探究，陈明主张构建“表达－沟通－保障－耦合”链条，以共同利益激活治理动力[4]；张力伟等提出依托治理共同体和相关平台重建情感纽带，推动治理价值重塑；许源源等认为通过“任务－资源”机制匹配权责[5]。

综上所述，学界以多视角深刻阐释基层治理困境与纾解路径的相关内容，但部分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重现象轻成因；二是重微观轻宏观。因此本文期望弥补上述缺憾：在视角上，立足宏观，基于整体治理理论构建“体制－观念－技术”框架，把握基层治理动静态要素；在内容上，着眼整体，将理论框架转变为基层治理一体推进建设的逐项发力点，有力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二、框架构建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公共管理学派日渐式微和数字信息时代来临的背景下，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和帕特里克·邓利维提出了整体治理理论并发展至今。该理论主张以公民需求为根本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整合、协调等方式构建治理体制，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模式[6]，致力于改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强化的碎片化状况，实现政府机构的整体化运行。

整体治理理论的主张包含三大核心要素：一是体制——组织层级、权力布局、运行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二是观念——公民需求导向；三是技术——信息技术。这既体现三者在整体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整体治理深刻的理论视角。回望基层治理的实践，构建基层治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等理念也恰与三者要旨相呼应。因此，以整体治理的“体制－观念－技术”三维视角审视基层治理有其理论适配性。

据此，本文在整体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体制－观念－技术”的基层治理分析模型，旨在为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本土化叙事提供系统性框架。分析框架中的三方关系是动态耦合，协同增效的：治理体制是载体与框架，通过整合和协调构成组织层级、权力布局、运行机制，承载并保障观念与技术的落地；治理观念

是灵魂与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引领体制变革与技术应用的方向；治理技术是赋能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智能化建设驱动体制运转与观念实践的效率提升（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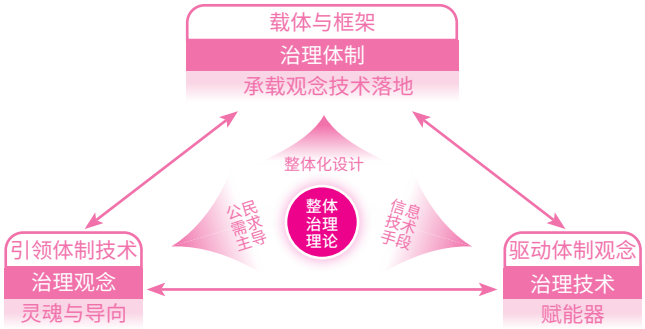


图 1 “体制—观念—技术”三维理论框架

三、整体治理三维框架下的基层治理困境

“体制—观念—技术”分析框架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结合，深刻揭示了体制空转、理念异化、数字阻滞等现实问题，在宏观层面对基层困境予以刻画。

（一）治理体制空转：科层制弊病

基层治理体制空转即形式上的治理体制实质上难掩治理效能颓势，三方负向效应的叠加致使体制空转的出现：一是组织层级横向交互隔阂，纵向传导不畅；二是部门运行机制不完善；三是权责匹配异常。

整体治理理论下政府是以严密有序的科层制为运行基础的，亦难免受科层制权力垄断、本位主义等弊端的影响。首先，科层制的技术崇拜，造成基层政府部门横向条线分割，加之对于越权行为的保守限制，易造成部门本位倾向；各部门壁垒高筑，囿于自身事务，“碎片化治理”等弊端逐渐显露。其次，科层制在纵向划分出等级森严的层级，政令自上而下传导，层级地位、视角、需求等差异决定了落实、传达政令侧重不一，使得政令逐级传导到基层的时间难以预料、内容层层加码，最终由基层消化行政成本。最后，科层制的“条块分割”使权责被非理性划分，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割裂，如盲目根据纵向行政级别确定权力，上级权大责小，基层权小责大；对承担相同责任的横向部门赋权，但缺乏权责清单划分，导致“多头、交叉治理”现象发生。

（二）治理观念异化：需求导向割裂与淡薄

当下，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正侵蚀基层治理灵魂，割裂公民需求与治理实践。一方面是个人能力不足和思想异化的内因，部分党员干部缺乏应对复杂态势的能力以及专业知识，解决问题因循守旧；思想上“官本位”的封建余绪严重，主观主义作祟，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膨胀，政绩观扭曲。另一方面，基层权小责大、工作冗杂的外因，使基层治理形成上大下小的“漏斗形”样态，日常繁重工作之余还需应对上级多样化的考核、督导、调研，客观上耗损党员干部投入基层治理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迫使其以形式主义方式包装工作成果，偏离了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主旨。

此外，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表达需求的意识淡薄。主观上，封建余绪将群众囿于“被统治群体”的思维中，“精英政治”理念则进一步固化了“自我能力不足”的认知误区，致使群众对参与公共事务敬而远之。客观上，群众参与制度内容笼统，体系欠备，缺乏实际指导和操作性；群众参与路径缺乏广度和深度、流于“指尖”形式等都影响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三）治理技术阻滞：技术主义陷阱与鸿沟

整体治理将信息技术视为治理手段，直接表现为信息技术促进部门之间的整合。然而部分基层部门却陷入技术主义陷阱中，忽视资源整合和效能提高的旨归，盲目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建设，造成技术产能过剩，也引发基层部门间“信息化内卷”。碎片化数字建设，导致部门系统间端口互斥、数据标准不一等问题，本质上背离技术驱动体制运转与提升实践效率的初衷。

整体治理手段对外表现为依托信息技术提供行政管理服务，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基层民生信息平台的高效性被部分党员干部异化为技术主义的单一路径，鲜活的民意被转化为冰冷的数据，入户走访、交流谈心等情感治理方式被忽视，干群情感联系难以建立，导致深层次问题得不到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技术鸿沟凸显。公共管理服务的过度数字化，正不断挤压着信息意识薄弱、信息运用能力欠缺的“数字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使其无法真正享受治理信息化带来的便利。

四、整体治理范式下基层治理三维纾解路径

“体制—观念—技术”三方困境既表明宏观视角下基层治理的各项短板，也揭示了各方面要避免“木桶效应”，互为整体、协同共促的发展机理。要由单维探索向体系化建构转变，以整体治理理论为依托，通过体制重构、观念归复、技术正本清源三位一体，找准基层治理整体运作、人民至上、科技赋能的时代定位。

（一）体制重构：整合与协调

整合与协调作为整体治理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政府整体化运作的着眼点，在破除基层体制空转与科层制弊端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1. 三重整合：厘定结构与权责

希克斯将整体治理的“整合”界定为相同或不同层级、功能内部、公私部门三重整合。本文据此进行路向诠释，一是重视层级整合，促进纵向传导畅通。通过减少行政层级、权力下放，压缩垂直层级，以扁平化结构降低政令传导成本。二是功能横向整合，多

元协同治理。以党建引领实现政治整合，将大部门式治理作为整合核心，合并职能交叉重叠的机构成为结构、权责一体的整体；积极探索多元协同治理，与社会团体、企业等非公主体建立整合协同机制。三是明晰权责，避免与整合后的体制运转不匹配。以制度理顺事权，通过权责清单与流程再造，确保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2. 主动协调：健全理念与机制

树立协调理念，完善部门联动机制。缺乏机构间协调这一动态关键基础，仅靠结构与权责的静态整合，会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裂解型治理”。因此，各部门要以动态协同意识强化整体共治思维，探索建立长效部门联动机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多部门派驻制的协同治理机构，打通形式化路径；创新开展部门间文化交流一体化建设活动，建立荣誉和激励共享机制，用情感共识与信任贯通非形式路径。用形式与非形式化协同运行机制，实现整体治理体制高效运转。

（二）观念归复：双向调适和重塑

整体治理立足公民需求导向，通过体制内外的双向调适和重塑彰显基层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1. 统筹基层长效减负，完善考评塑造体系

把准公民需求导向，要从基层减负和人员规训两方面切入。一要推进基层长效减负，返还时效于民。针对上级的考察调研，可由专门部门配额，性质近似或重复的，应当联合归并，减少基层接待频次；探索建立逆向考核机制，把基层评分纳入上级绩效，从而倒逼为基层减负。二是完善基层党员干部常态化培养考核机制，加强反官僚形式主义教育；推行以实效为唯一标尺的阳光考核机制，构建多维立体画像，嵌入公众评议等硬性参数，建立结果公示与申诉复核机制，驱动党员干部聚焦真实群众需求。

2. 破除思想藩篱，聚焦群众参与工作

群众参与和公民需求的互融互促，需要群众思想革新和治理行动感化。思想上，大力宣传群众基层治理的主体地位，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发挥乡贤能人的感召力，广泛团结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行动上，要畅通群众从“想参与”到“能参与”的渠道，结合基层风土、制度人情、线上线下，构建正式化或非正式化的多元群众参与路径，真正将公民需求导向落到实处。

（三）技术正本清源：目标纠偏与鸿沟弥合

整体治理视域赋予信息技术的工具属性，意在实现政府整体化运作的直接目标，究其根本在于赋能基层治理，驱动治理体制观念运转落实。

1. 打破数字隔阂，提升协同效率

在希克斯看来，技术赋能的核心在于政治方向而非工具理性。技术驱动治理并非目的，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整体化运作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手段。基层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技术发展理念，通过设立专职机构统筹数字基建，撤并冗余政务平台，建立统一中枢系统；规范数据共享和数据运行标准，创新将数字协同纳入考核审计范畴，倒逼数字治理向整体化运行转变。

2. 厚植人文关怀，弥合数字鸿沟

治理技术的根本价值是实现具有人文色彩的基层治理，弥合数字鸿沟体现了整体治理下信息技术工具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一是通过技术体现人文关怀，在政务系统中嵌入无障碍标准，提供多样化替代服务模式；二是提高群众数字素养，推动“数字扫盲”真正下沉到基层，建设普惠性数字教育资源，创新数字素养培训方式，建立多元数字激励机制，让信息技术真正成为联结群众与政府的治理桥梁。

五、结语

整体治理理论本土化对基层治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依托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体制－观念－技术”三维框架，从宏观层面系统剖析了基层治理困境及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纾解路径。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需深化三维协同：体制上，以整合协调克服科层弊病；观念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效能；技术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整体治理理论的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期待后续研究能深化理论应用场景，拓展实证检验维度，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

[1] 许欢，魏娜，吴佳正．基层政府信誉坍塌与重塑——对“提灯定损”事件引发基层政府信誉危机的反思 [J]. 公共管理学报，2024,21(03):25-37,168-169.

[2] 张凯凯，胡鹏．数字赋能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路径分析——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 [J]. 现代商贸工业，2024,45(20):21-23.

[3] 张力伟，吴楠．整合与介入：“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逻辑 [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4,26(06):37-46.

[4] 陈明．共同治理：走出“官僚主义内卷”——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实践的理论反思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6):50-55.

[5] 许源源，门垚．在邀功与避责之间：基层政府履责行为波动探微——基于Q县项目资金运作过程的观察 [J]. 行政论坛，2024,31(05):90-100.

[6] 曾凡军，定明捷．迈向整体性治理的我国公共服务型财政研究 [J]. 经济研究参考，2010(65):43-46,50.

（作者：朱逸雨、陈冠宏，浙江警察学院侦查学院本科生；朱建一，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副院长）

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卓赟　马献力 *

摘要：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基层单元，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多元主体参与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社区工作人员多头管理导致任务过重、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社会组织参与存在多维度困境、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差异引发协调难题。基于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理论，结合国内外实践，本文提出优化路径：以党建引领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依托数字化载体与线下场景搭建多元沟通平台，增强居民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参与意识；通过资金扶持、政策保障与人才培育强化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建立利益表达、协商与共享机制，平衡各方利益。

关键词：社区；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组织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社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是社会构成的核心，是社会各项事务包括服务的承载点和落脚点，社区在满足居民的各种需要、联系各种社会关系，乃至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社区治理的结果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秩序，有着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意义，社区的治理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愈发纷繁复杂，传统的治理主体单一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多元主体模式参与成为社区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多元主体参与现状

（一）国内多元主体参与现状

协同治理是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学的耦合，既吸纳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自主性、主体多元性内涵，又吸收协同学中合作、协调与秩序的部分思想。我国的社区治理在西方优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的合作自治、“三社联动”协同治理、“互联网 +”治理等模式。学者王江蓉认为行政指导是政府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常见方式之一，政府作为重要资源提供者，发挥资源调配枢纽作用，统筹公共财政投入和人力物资等资源整合，保障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3]。学者吴晓林剖析中国社区治理历史与现实，挖掘国家、社会、家庭关联，破除“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提出建设“关联社区”[4]。学者江小莉、王凌宇、许安心认为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普遍存在“奥尔森困境”，认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借助个体间的互惠、信誉和信任来克服短视自利时，社区内的群体就能够达到“优于理性”的绩效，可以有效地破解该困境[5]。郑安兴强调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途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社区治理未来的方向[6]。学者沈永东、赖艺轩提出通过数字技术的链接机制、动员机制和整合机制，带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7]。李小博认为社区治理面临多元主体权责界定模糊、利益分配失衡等挑战，达成善治需完善法律法规框架、构建清晰责任体系，确保各主体有序参与、职责明确[8]。李永娜等学者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认为通过重新设计和优化治理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责边界，可以促进各主体之间的协作与融合，从而加速形成高效和谐的社区治理共同体[9]。陈进华和余栋等剖析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与路径[10]。

（二）研究综述

理论支撑层面，国外研究以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理论为核心，明确多元主体参与价值逻辑，强调各方协同互动，聚焦社会组织“桥梁作用”、信任机

制与合作框架的关键价值，同时指出主体多样性引发的权责界定模糊等核心挑战。国内研究立足中国治理语境，初步融合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合作自治、“三社联动”“互联网 + 治理”等特色模式，既剖析政府在资源调配中的枢纽作用，也关注“奥尔森困境”、权责模糊、利益冲突等实践难题，并从治理共同体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等角度探索破解路径，形成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成果。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覆盖核心要素：国外聚焦主体构成、角色、互动机制及社会凝聚力，实证揭示“居住隔离效应”负面影响与社区组织“连接者”功能；国内结合基层制度背景，侧重党建引领、利益协调、居民动力激发、社会组织培育等本土化问题，回应实践需求。

现有研究仍存在显著不足：一是未深入探析社区工作人员“任务过载 + 责任模糊”的核心矛盾与制度根源；二是对居民参与不足的客观制约、认知偏差及差异化激励机制研究欠缺；三是忽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缺陷，对其人才、资源、运行等维度的困境缺乏系统性探讨；四是未聚焦多元主体利益冲突的特殊性与实操协调难点，相关机制研究多偏宏观、缺乏具体路径。

三、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工作人员多头管理任务重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工作人员“多头任务”繁重，本质是行政任务下沉与社区自治功能耦合失衡的外在表现。作为治理“最后一公里”，社区需承接民政、卫健、综治、城管等多部门行政事务，部分任务存在重复填报、时限紧迫问题，导致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挤压服务居民与推进自治的核心精力。更为关键的是，主体责任界定模糊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部门间对社区任务权责划分缺乏统一规范，部分任务存在“谁都管、谁都不担责”的模糊地带，易出现推诿或重复指派；另一方面，社区内部岗位权责体系不完善，部分地区未细化岗位职责清单，导致工作人员对“该做什么、对谁负责”认知模糊，既影响执行效率，也给问题追责带来困难。这种“任务过载 + 责任模糊”的双重困境，不仅会降低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工作效能，更会削弱社区治理的响应能力，进而影响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居民满意度，成为制约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障碍。

（二）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使得人们普遍面临工作压力与时间约束的双重挤压，职业负担的沉重导致其分身乏术，难以投入社区治理的事务中。缺乏对应的激励机制，参与与否对居民自身利益影响不大，导致居民参与动力不足，这种“参与与否对自身权益影响微乎其微”的认知，直接导致了社区治理中居民动力的结构性不足。但社区自治的核心在于居民的广泛参与，居民参与意识不足使得社区自治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难以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导致社区治理过度依赖政府和外部力量，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自治发展模式。

（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多维度困境

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多维度困境：在内部管理环节，人力资源管理受制于薪酬缺乏竞争力、职业晋升通道狭窄等导致社会组织无法产生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使得社会组织人才流失率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呈离散分布，影响服务供给的专业稳定；在资财管理环节，社会组织内部的机构财务管理机制存在机制结构性缺陷，不能有效地对资源配置效能进行最大化，无法进行投入—产出管理，未能有效实现资金使用过程的效率与效益转化存在明显提升空间；在运行环节，因经验与方法论体系短缺，项目策划超前性、实施控制力及成效评估科学性均较弱，导致项目成效偏离目标，减损社会组织治理成效的实际功能。上述缺陷已经成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瓶颈，导致社区治理供需适配的精准度、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等较弱，发挥的功能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的地位较弱，使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环节中处于相对弱势。

（四）主体间利益协调困难

由于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在社区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和主体间利益的差异性。企业参与主体与社区本身利益追求方向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前者是利益的追求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的，后者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二者具有天然的利益冲突，例如企业开展社区商业开发时，若过度追逐短期经济利益，往往会忽视对社区环境及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与居民利益诉求相悖。此外，政府在社区治理政策制定与执行中，需平衡多元主体利益以避免部分主体权益受损，但是有时在具体治理工作中很难平衡多元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性，这成为制约协同治理推进的重要因素。而利益矛盾引发的共识难达困境，进一步导致多元主体各行其是甚至对立，使得社区协同治理缺乏氛围与基础，最终影响治理整体效能，难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四、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问题的对策

（一）党建引领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主体的责任

完善组织体系建设，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机制，搭建社区居民议事平台，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管理与监督，从社区环境整治、设施建设到规章制度制定，充分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

成果共享；整合各方资源力量，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联动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

（二）搭建多元沟通平台，增强年轻居民参与意识

社区可通过互联网技术为拓宽社区治理参与渠道提供支撑，运用科技赋能治理。在线上层面，可构建社区专属 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载体，打破时空限制，实时推送管理通知、活动动态与项目进展，并设置线上议事厅、意见反馈模块，保障居民及社会组织对治理议题的讨论与监督权；在线下层面，需依托社区居民会议、协商大会等实体场景，推动政府人员、居委会成员、社会组织及居民代表共商治理问题，强化主体间协作与信任。加大针对年轻群体社区治理的宣教力度，通过开展社区文化节、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增强青壮年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参与意识；邀请专家学者、社区工作者开展专题讲座，普及治理重要性及居民权责认知。同时，利用社区宣传栏、宣传手册等载体普及治理信息，营造良好治理氛围，推动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提升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培育扶持社会组织

社区中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缺乏一定的能力，这需要加大政府对其培育扶持力度。在资金方面，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引导、鼓励和扶持企业、社会各界捐助社会组织。在政策方面，简化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注册登记门槛，创造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人才的培养，可以联合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等为社会组织提供一些技能培训课程，包含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服务技能等方面，提升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增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四）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平衡主体利益

不同主体对社区治理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差异，因而主体利益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与矛盾，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是平衡不同主体利益、确保其协同治理的基础。首先，建设多元主体利益表达的平台，使多元主体充分表达自己对利益诉求的需求和意见，例如建立各主体利益诉求专门性的服务窗口，举办定期的利益诉求会议。其次，构建协商机制，组织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居民、企业等主体平等对话，共同商议利益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案，也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努力达成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最后，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合作项目的利益分配、合作成果的居民共享等手段，保障不同社区主体也能享受社区治理带来的利益，从而调动社区主体协同治理的积极性，也让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实现利益之间的补偿，有效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保障社区治理的协同发展。

五、结语

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有利于打破一元治理结构和模式带来的局限，提升社区治理的民主性、科学性，提升社区治理的活力与持续性，使多元主体力量更好地集中解决社区治理疑难问题，使社区治理朝着现代化、精细化、人性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2]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党建 ,2017(11):15-34.

[3] 王江蓉 .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对策探析——基于多元主体关系视角 [J]. 时代人物 ,2021(05):155.

[4] 吴晓林 . 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343.

[5] 江小莉 , 王凌宇 , 许安心 .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J]. 东南学术 ,2021(03):105-114.

[6] 郑安兴 .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意涵阐释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03):137-142.

[7] 沈永东 , 赖艺轩 . 撬动资源、凝聚共识与形成规范：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39(04):22-29.

[8] 李小博 . 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关系困境及其破解的法治路径 [J]. 领导科学 ,2020(18):24-27.

[9] 李永娜 , 袁校卫 .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01):18-23.

[10] 陈进华 , 余栋 .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实践路径 [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01):109-116,148.

（作者：张卓赟，桂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审计科副科长；通信作者马献力，桂林医科大学教授）

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中小农户康养模式构建路径探索

李　英　常艳梅　李阳阳　李福林

摘要：为符合现代农业体系的发展诉求，提升榆林市小农户的健康水平与生活水准，本文将小农户设为研究对象，对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性剖析，经由问卷调查、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手段，深度探究小农户的健康情形与康养诉求，基于此设计出契合实际需求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与健康档案管理体系，健康管理体系得以应用，显著提升小农户健康水平，康养服务普及有力地增进了农户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实施有重要支撑意义。

关键词：现代农业；健康管理；康养需求；乡村振兴；小农户

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生产体系中关键的基础单元，其健康状况直接关乎农业生产效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随着社会发展及农村经济转轨，小农户的健康隐患日益凸显，亟须一套系统的健康管理服务，开展针对榆林市小农户健康管理服务功能的研究，探索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健康保障路径，促进小农户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提升，采用科学策略构建健康管理体系，既能够提高农户自我健康管理本领，还可推动农村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拉动农业农村走向可持续发展，具备突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榆林市小农户健康管理现状与康养需求调研

农业是榆林市的经济，小农户是该地区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由于自然环境、交通设施及经济条件的不利限制，小农户在健康管理上遭遇诸多困境。调研数据显示，多数小农户健康水平欠佳，慢性病患者占比偏高，其中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在留守老人群体中尤为突出，这与吴堡县杨家沟村等村落留守老人慢性病管理难题突出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从健康管理现状来看，小农户普遍缺乏科学的健康管理知识，健康意识相对淡薄，主动体检、主动干预的行为较少；同时，农村医疗资源呈现不均衡、匮乏态势，基层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加之健康档案及管理体系的缺位。

小农户遭遇健康问题时，多依赖传统诊疗方式，难以获得及时的健康干预与个性化管理服务。此外，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推进滞后，医疗服务覆盖范围有限，远程医疗等现代技术在偏远农村的推广普及程度较低，进一步扩大了小农户的健康风险范围。为精准掌握小农户的康养需求，本项目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及入户考察等方式开展系统性调研，覆盖榆林市吴堡县、神木市等多个县区的乡村，调研内容涵盖小农户健康状况、常见病症、健康管理习惯、医疗资源使用情况及康养服务需求等。调查结果显示，小农户对健康管理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疾病防控、慢性病管理与健康教育三大领域，其中远程医疗、健康教育及慢性病管理服务的需求突出性最强[1]。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在经济上条件有限，对低成本、易操作、便捷化的康养服务需求迫切。综合调研数据分析，榆林市小农户健康问题的核心特点可概括为：疾病发生率偏高、健康管理意识淡薄、缺少科学健康管理理念、康养服务可及性低。因此，立足榆林市农村实际，构建贴合区域特色、适配小农户需求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成为当前推动乡村康养事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迫切任务。

二、榆林市小农户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构建

（一）小农户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设计流程

本项目要为榆林市小农户打造一套全面且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充分顾及当地地理环境及基础设施条件，此模式将整合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系统、移动医疗设备等诸多方面资源，以技术手段有效改善小农户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模式可操作实施，项目设计中，重点顾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网络覆盖不全面等问题。凭借远程医疗平台与移动健康器械，项目不仅可为小农户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与咨询服务，还可达成实时的健康数据传送与在线看病诊疗，进而大幅提升小农户的健康管理水平[2]，远程医疗平台支

持至少 5000 名用户同时在线操作，保障在纷繁网络环境下的流畅运转，适应偏远地区网络状态的上下波动，维持服务的可触及性和连续性。

（二）医疗、健康管理与健康教育资源整合流程

针对榆林市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分布不均、专业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本项目重点推行远程医疗及移动医疗设备，远程医疗平台能解决小农户因地理位置遥远而无法及时就医的麻烦，农户能与专业医生实现实时对话，取得医疗诊断意见，移动医疗设备借助可携式健康监测工具，诸如血压检测工具、血糖测试用具、心电图分析设备等，帮助小农户在平常日子里开展健康自我检查 [3]。这些设备自带自动上传功能，可实时把监测的数据输送到健康管理系统，由医生进行后续的数据梳理分析，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引，项目预估借助这些设备及远程医疗服务，可让超 70% 的小农户实现健康问题的早识别与及时干预，显著减轻慢性病的健康威胁。

（三）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试点应用与优化路径

为实现对小农户健康状态的长期跟踪与科学治理，本项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一套专门针对榆林市小农户的健康档案管理系统。此系统不光能储存小农户健康资讯，还可依据采集的健康数据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系统将借助便利的健康数据采集模式，归集来自远程医疗设备、定期体检和日常监测等渠道的相关数据，编制全面的健康档案 [4]。系统会利用大数据分析跟人工智能技术，对小农户健康数据开展深度挖掘，预先察觉潜在的健康隐患，尤其针对慢性病的早期迹象，依靠系统的智能剖析，有较高健康风险的小农户可及时接受干预指引，预防疾病进一步发展 [5]，系统设计以支持至少 10 万用户的健康数据存储为目标，保证数据存储安全，实现长期可用。

（四）康养知识普及与培训体系的建立

1. 健康知识普及平台的搭建

搭建线上健康教育网络平台，为小农户普及基础健康管理常识，平台会拿出健康课程、讲座视频及互动问答项目，涉及疾病预防、合理饮食与体育锻炼等范畴，利用手机或电脑完成，农户可随时拿到容易领会的健康知识，每月访问量预估超 5000 次，实现全面触及，助力农户健康意识上扬，辅助其更稳健地管理自身健康情况，减少疾病的出现频次。

2. 线下健康讲座及互动活动的组织

开展定期的健康讲座及互动活动，由专业人员讲解健康管理的技巧与疾病预防要点，每年举办健康讲座，每场活动参与人员数量在 50 人—100 人范畴，依靠面对面沟通强化学习成果，唤起农户积极介入健康管理的意识，提升其健康的整体水平。

3. 健康管理技能培训的开展

实施健康管理技能专项培训，教会农户怎样用便携式健康设备自我监测，诸如血糖仪、血压计之类，每年实施多次培训，参与人数设定为 50 人 / 期，协助农户学会调整饮食及生活习惯，管控健康危机，依托这种方式，农户可实时掌握自身健康情形，切实预防慢性病不断恶化。

4. 宣传材料和健康工具的发放

设计后发放健康宣传册及工具套装，给出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及生活方式的实用窍门，每年将发放宣传册及工具包，让农户拿到简洁易用的健康管理资料，提高其健康管理水平，进一步带动健康知识的普及与践行。

5. 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构建完善的健康教育评价机制，定期搜集农户的相关反馈，评定培训效果后调整相关内容，借助线上平台实时采集数据，保证课程贴合农户需求，优化实施效能，依靠不断反馈，调整授课内容，提高农户的学习成效，驱动健康管理服务持续升级。

三、榆林市小农户健康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一）小农户健康档案管理系统开发流程

本系统开发流程依照了从需求调研至系统实施的全步骤，具体见图 1，借助对榆林市小农户健康、生活习惯及医疗需求等方面的调查研究，采集大约 1000 户农户的基础数据，为系统设计做好了充分铺垫，开发团队凭借分析这些数据，得出系统应具备健康数据收集、查询、报告生成、健康提示等关键功能的结论。为符合农村网络态势，系统采用轻量型的前端框架，比如 React 与 Vue，实现加载速度的提高，还可降低对低带宽网络环境的依赖，就数据库而言，采用 MySQL 作为主数据库配置，同时借助云平台实施备份与冗余操作，以实现数据安全和系统的高度可用，于开发阶段引入多种信息安全技术，以保障农户健康信息隐私的完整性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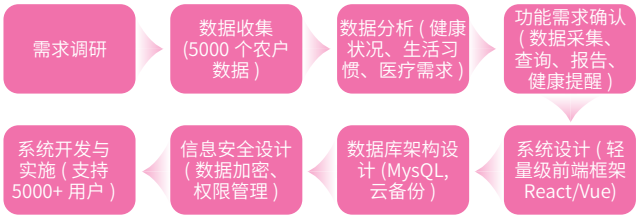


图 1 档案管理系统开发流程

（二）健康数据采集与动态更新机制建设

为实现健康数据的精准采集，项目聚合了多种技术办法，诸如物联网技术及智能硬件设备，农户能借助穿戴设备以及移动设备采集基本健康指标，诸如血压、血糖、心率等相关数据，设备迅速把数据上传至云端，系统会自动把数据存进相应农户的健康档案里。就健康数据动态更新而言，系统制定了以周期性健康体检、常规自我检测及远程医疗监测为依据的更新机制，数据实时上传后便自动开展分析，系统会参照农

户健康数据的变动情形，若体重波动超过 5kg，系统会自动编制健康报告并推送相关建议，动态更新机制让健康档案信息在及时性与准确性上有保障，进一步增强了健康管理的精准性与实效性，系统每日可支持采集多达 1000 条数据，年数据更新量可实现 365 万条。

（三）档案系统在个性化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实践

应用小农户健康档案管理系统，带动个性化健康管理的落实，依靠大数据分析途径，系统根据农户的自身健康数据、既往病历与生活习惯，编制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举措，以管理慢性病这件事为例，系统可依据农户的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即刻推送专属的健康饮食建议及生活方式调整提示，若某农户的血糖水平超出正常范围，系统将推送营养师设计的饮食安排，且提醒农户按时监测血糖的变动，该类健康管理手段可切实预防疾病发生，还能协助农户增强自我保健素养 [7]。

四、农户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应用成效评估与建议

（一）小农户健康状况改善成效

依托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推动，小农户整体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表 1 为小农户健康状况改善成效。

表 1　小农户健康状况改善成效

健康指标	实施前水平	实施后水平	趋势变化
慢性病患病情况（如高血压等）	偏高	明显下降	有所减少
体检普及程度	较低	大幅提升	明显提高
健康问题干预全覆盖	有限	扩大覆盖	明显增强
健康自我管理意识	普遍较弱	显著增强	显著改善

经过系统性健康管理服务实施，小农户在慢性病控制、体检参与、健康干预和自我管理意识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在主动健康行为的提升上，成效较为明显。健康问题的早期发现与及时干预能力显著增强，减少了因延误治疗带来的健康损失。此外，健康档案的建立也为后续服务提供了依据，使健康管理工作更加系统和精准 [8]。

（二）康养服务模式推广成效

康养服务推广有效增强了农户的参与意愿，提升了实际使用频率，表 2 展示了主要服务模式推广前后的变化趋势。

表 2　康养服务模式推广成效

服务内容	实施前使用情况	实施后使用情况	变化趋势
远程医疗服务	较少	明显增多	明显提升
健康教育参与	较低	明显提高	增加明显
慢性病管理服务	有待加强	使用逐步增多	持续增长
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极少	逐步推广	稳步上升

推广工作促使小农户逐步接触并采纳多样化的健康服务工具，远程医疗与健康教育成为使用增长最快的两项服务，反映出数字化康养手段在农村地区的可接受性与实用性持续上升。同时，小农户对慢性病和个性化管理的需求逐步显现，为康养服务的持续优化和延伸提供了方向。基层医疗资源的协同调动和服务响应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形成了较为良性的推广反馈机制。

五、结语

本项目立足榆林市小农户实际需求，结合当地窑洞资源、医联体建设等特色优势，构建了“技术赋能 + 资源整合 + 知识普及 + 档案管理”的创新型小农康养模式，通过远程医疗推广、移动设备下沉、健康档案建设及康养知识普及等举措，有效提升了小农户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增强了农户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伴随项目不断深入与完备，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康养服务的覆盖规模，推动更多区域农民享有便捷的医疗及健康管理服务，凭借技术的持续创新及模式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地区健康服务体系将慢慢完备，催生多元化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模式，未来将探索更多适应性良好、经济可长久维持的创新服务模式，为乡村振兴及农业现代化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杜美玲，祝宏辉，张嘉淇 . 农地规模经营对农户健康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新疆农户微观数据的证据 [J].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24,35(05):54-67.

[2] 韦钦文，张永峰，路瑶 . 数字化、农户医保参与和城乡健康受益公平 [J]. 经济经纬 ,2024,41(05):53-64.

[3] 周为，王睿妍，陆桂萍 . 农户环境健康风险意识对环保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例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03):87-93.

[4] 赵梦媛，张开云 . 农户健康风险管理过程、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以安徽省岳西县 G 村为例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01):106-113.

[5] 翟绍果，丁一卓 . 疾病冲击、代际互动与健康贫困——基于西部三省九县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2):62-75.

[6] 张志芳 .“互联网 + 农业”模式对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经济体系的带动效应分析 [J]. 优质农产品 ,2025(12):80-82.

[7] 赵阳，易欣 . 构建全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湖北省随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调研 [J]. 中国农民合作社 ,2024(05):65-66.

[8] 徐灿琳 . 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29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榆林市科技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中小农户康养模式构建路径探索”（2024-CxY_150）。

（作者单位：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成效研究

张姝妍

摘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系列指示精神的重要实践。经过多年探索，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已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聚焦于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成效，通过案例分析和理论探讨，揭示了其在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民主化，服务创新以及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示范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应突出“一条红线”、做强“一个引擎”，并在健全自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上持续发力。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基层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自2004年起，司法部、民政部在全国组织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截至2024年，共命名九批“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有力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提升了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活动开展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全国广大乡村和基层社区积极履责，勇于实践，社区治理效能持续增强，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总结推广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社区治理的决策部署，对于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对基层治理提出的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政策背景与制度依据

自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明确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纳入民主法治示范村考核以来，一系列中央政策持续推动该项创建工作。2016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发布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要求“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再次明确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法治创建活动。2019年，中央两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要求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为载体，通过典型示范，引领带动法治乡村建设[1]。同时，就“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提出具体指导标准。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2]。2021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要求“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加强动态管理，提高创建质量”。2022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上述文件共同构成了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的制度框架与政策基础。

（一）鲜明的理论条件：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具备在基层治理中示范引领作用的先决条件

第一，认真抓好基层党的建设这条“红线”。党

的建设是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确保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二，把社区治理作为一个体系综合施治，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切实落实民主参与公众监督，凝聚社会治理合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3]。

第四，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强调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它倡导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多方参与，共同构建社会治理的新格局。通过加强合作与协调，形成治理合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这一观点也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强调在治理过程中要尊重各方的权益，保障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第五，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4]。

第六，创造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命题。

（二）系统性的实践探索：总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基本特征

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特点，主要指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坚持民主原则，注重法治建设，通过创新治理机制、完善服务设施、提升居民法治素养等措施，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

1.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2. 注重法治建设，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

3. 突出民主管理，实现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

4. 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

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色和形式

本研究选取了2022年“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山东省Y市Z区C社区作为实践样本，通过分析总结C社区在示范社区创建过程中的实践路径和经验做法，找出社区治理的基本规律和工作方法，以期为发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一）突出抓好党建引领这条红线，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C社区深入贯彻“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的重要要求，用党建这条“红线”串起百姓身边事。社区打造的“情暖社区”党建品牌，坚持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社区居民所想、所盼、所需，就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工作重点。

（二）实行“民事民议，民事民决”工作模式，做到小区事项决策民主化

在社区治理中，就社区事项与居民协商沟通，广泛听取并采纳居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社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所在。C社区在健全民主决策工作机制、畅通诉求渠道、搭建议事平台、引导理性表达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实践探索。

（三）坚持全方位依法治理，实现社区管理法治化

第一，制定社区治理章程和居规民约。社区通过居民代表大会，讨论制定《社区自治章程》和《社区居规民约》。这些居规民约，使社区的管理有章可循、全面覆盖。

第二，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作用。C社区在辖区司法所的组织下，邀请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定期开展法治宣传活动，社区经常性开展普法讲座、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此举能够对各类涉法事项，及时依法、依规、依约予以处理，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中。

第三，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社区设立了法治故事墙、法治文化墙，定期开展普法宣传，社区还开设了线上服务平台，及时利用线上平台宣传社区章程和居规民约，做到人人知晓、户户遵守。

（四）大力发展社区经济，让社区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社区发展红利

在创建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过程中，C社区党组织一刻也不放松抓好社区经济发展这件民生大事，让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的过程中，共享社区治理和经济发展成果。社区积极落实社区居民的各种保险和福利待遇，消除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让社区居民享受到社区改革发展和综合治理的红利。

（五）加强社区居民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社区人文环境

建设文明和谐的社区人文环境对于社区治理的作用不可忽视，要打造人人守法、安居乐业的社区人文环境，更大程度地推进社区工作建设的进程。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践行“社会心理服务”理念，主动思考，积极弘扬正能量，充分运用道德感化、

熟人加亲情等方式感召社区居民。

三、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应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探索涉及方方面面，各地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总结其示范引领作用，应当做到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具体工作中，要突出一条红线，强化一个引擎，在两大治理体系上持续发力。

（一）注重发挥党建这条贯穿社区治理的“红线”作用

在社区治理中，要突出党建引领这条“红线”的作用，从而确保社区治理工作不走偏，合民意，有成效。要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到社区问题有人管，民情民意有人理，问题诉求有人解。

（二）把发展社区经济作为创建活动的重要引擎，让社区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红利

发展壮大社区经济，发挥好社区经济在社区治理中的引擎作用，既是示范社区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治理达到共享目标的落脚点。要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社区原有的条件，选准项目，量力而行，务求取得成果。

（三）深化自治、法治、德治协同，努力拓展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在城乡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5]。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要锚定目标，全力跟进，尤其在推进治理实践中，更要注重同已有的创建成果有机结合。

第一，在“自治”的推进实践中，同基层社区已开展的“民主协商”“民主议事”等基层民主方式相结合。能够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提升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同时，结合“民主协商”“民主议事”，也可以使社区决策更加透明化、民主化，能够有效避免决策过程中的一言堂现象，确保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此外，这种结合还可以促进社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社区的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注重基层治理的法治建设。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宣传机制、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法治监督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一方面，注重法治宣传教育，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治文艺演出等形式，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养。另一方面，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社区法律顾问制度，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有效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社区治理的法治监督，确保各项治理措施依法依规进行，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第三，在“德治”的推进实践中，以有形活动为载体，将社区居民良好的道德风尚及社会习惯等发扬光大，强化邻里间舆论正能量的引导作用，突出“德治”作为非强制手段和治理方式的重要功能。例如可以通过组织道德模范评选、好人好事表彰等活动，树立社区居民身边的道德榜样，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到道德的力量，潜移默化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同时，这些活动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展示自我、相互学习的平台，促进社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社区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让正能量在社区内传递，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这样，不仅强化了“德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也为社区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

第四，注重引入“社会心理服务”。社会工作基于助人自助的理念，坚持尊重、平等、个别化等原则，是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基层发挥着心理疏导、情绪支持、预防矛盾、排查梳理、化解纠纷的作用[6]。通过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心理困扰，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进一步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坚持以人为本，真正践行注重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社会治理新理念。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建设经验有待进一步总结与推广，以促进示范创建活动提质增效，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层基础。

参考文献

[1] 安徽省司法厅.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司法,2022(12):64-67.

[2] 北京市司法局.以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为抓手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22(07):40-43.

[3] 徐殿茗,孙钟伟.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路径[N].安徽科技报,2025-12-05(14).

[4] 胡剑,贾丽红.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作用机理、风险审视与纾解路向[J].重庆社会科学,2024(02):68-81.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

[6] 范斌.发挥专业优势,构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共同体[J].中国社会工作,2020(34):13.

（作者单位：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德江傩文化与乡村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研究

刘金标

摘要：德江傩堂戏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伦理共识与民俗智慧，更是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乡村社会工作则依托专业理念与实践方法助力乡村治理、凝聚乡村合力，二者的深度融合，既是激活德江傩文化活态传承内生动力的可行创新路径，也是拓宽乡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场景、提升乡村治理实效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德江傩堂戏这一首批国家级非遗的传承现状，结合乡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实操特点，深挖二者内在关联，探索兼具文化传承价值与专业服务效能的融合路径，为傩文化活态延续、社工服务本土化及乡村振兴提供务实支撑。

关键词：德江傩文化；乡村社会工作；活态传承；融合发展

一、引言

物质层面的产业发展、生态改善与精神层面的乡风培育、治理优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德江傩堂戏为国家级非遗，承载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智慧，其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需求具有较高契合度。德江傩堂戏最早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傩祭祀活动，是当时影响最大、仪式最隆重的活动之一，《论语乡党篇》中“乡傩，朝服而立于阼阶”的记载，印证了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最初带有巫术的神秘色彩，是古代人民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的一种精神寄托[1]。

当前，德江傩文化活态传承已取得初步成效，校园浸润式传承、各类民俗展演等传播模式已逐步落地，但在实际传承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传承人才梯队断层、文化深层内涵挖掘不充分、当代语境下的转化效能不足等问题，导致其承载的多元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2]。乡村社会工作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社区参与”为核心理念，扎根乡村开展专业化助人服务，借助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等实操方法，紧密对接乡村群众的真实需求，在整合乡村零散资源、化解基层治理矛盾与培育乡村内生力量的过程中，为乡村治理提质和文化建设提供支撑，凸显出自身独特的专业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德江傩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历史发展脉络的追溯和艺术自身特质的梳理上，乡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则多停留在单一实践层面的探讨，二者融合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尚存在明显空白，部分研究既缺乏本土化视角，也缺乏可落地的创新实践路径，无法很好地适配当下的实际发展需求。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德江傩文化自身特质与乡村社会工作的融合路径，推动傩文化在乡村的传承与新生，并拓宽乡村社会工作实践路径，支撑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

二、德江傩文化与乡村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内在契合性

（一）价值导向契合

德江傩文化核心价值为传递人文关怀、培育社区凝聚力，乡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祭祀仪轨、戏剧演绎、民俗展演，承载了土家族群众的美好生活诉求，传递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诚信友善的价值理念，与乡村社会工作的“以人为本”的核心导向具有较高的契合性[3]。

乡村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助力乡村群众摆脱实际困境、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培育其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扎根德江乡村的傩文化作为当地群众共有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寄托，通过傩仪展演、民俗传承等鲜活载体凝聚群众情感、强化社区凝聚力，二者在“服务乡村群众、建设美好乡村”的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为双方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实践目标契合

德江傩文化的活态传承、乡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诉求相契合，两者融合可协同实现乡村振兴，守护乡村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挖掘文化的经济、社会价值，推动傩文化、

乡村旅游、文创产业之间的联动，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建设[4]。

乡村社会工作的核心实践在于整合乡村零散资源、培育乡村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进而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与德江傩文化具有一致的核心导向，即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改善乡村整体面貌、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德江傩文化可为乡村社会工作服务提供鲜活的文化载体与深厚的精神内涵，乡村社会工作服务则能为德江傩文化活态传承提供专业化的方法支撑，最终实现二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服务场景契合

德江傩文化深度扎根乡村语境，传承场景集中于社区、家庭及校园，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深度绑定，凸显鲜明的本土性与群众性。其别称傩戏、傩坛戏，土家语称“杠神”，是一种以面具为核心表演符号的祭祀戏剧，兼具“酬神”与“娱人”双重属性，契合乡村群众精神诉求，其傩技绝活与经典剧目是乡村节庆及民俗活动的核心元素[5]。

乡村社会工作核心为乡村群众真实需求，乡村一线服务具备鲜明的本土适配性、扎实的实践导向，高度契合乡村发展实际语境。乡村社会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中，可精准把握德江傩文化传承态势、群众文化诉求，按照基层实际传承傩文化；傩文化的群众基础、本土场景沉淀可促使乡村社会工作深度融入乡村，具有较高的服务针对性、时效性，帮助两者深度融合，实现“文化服务”“专业助人”的联动。

三、德江傩文化与乡村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模式

（一）“传承培育 + 专业赋能”模式

德江傩文化传承面临人才老龄化、青年传承意愿不足、传承梯队断层的现实困境，依托乡村社会工作成熟的人才培育经验，可构建“传承培育 + 专业赋能”模式，推动两类人才双向培育，其中依托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开展傩文化传承人才培育是核心路径[6]。

乡村社会工作者深入乡村社区，挖掘傩文化传承人及爱好者，以小组工作方法组建传承小组，邀请资深传承人开展傩戏表演、傩技、面具制作等专项培训，同步开展沟通、文化传播及文创开发培训，借鉴岑巩县平庄镇经验联动高校专家，助力传承人整理创新傩戏剧本、提升传承专业度与创新性。将德江傩文化传承融入乡村社会工作人才培育体系，引导社会工作者深耕傩文化历史渊源、艺术特质与民俗内核，提升其本土化服务能力，推动社会工作者主动承担傩文化传承的宣传与组织职责，实现傩文化传承人才培育与社会工作人才专业提升的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二）“文化浸润 + 社区服务”模式

德江傩文化民俗根基深厚，乡村社会工作核心为社区服务，两者可形成“文化浸润 + 社区服务”融合模式，在乡村社区服务各环节中融入傩文化精神内核、呈现形式，推动“文化育人”深度衔接“社区治理”，促使非遗活态传承，为社区发展注入文化力量。

立足乡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乡村社会工作者牵头组织傩戏展演、傩仪体验、民俗文化节等特色社区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傩戏表演、面具雕刻、傩技展示等实践以深化文化认同，借鉴乐安县“祠堂 + 文化”经验，盘活乡村宗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载体，打造兼具展示与体验功能的傩文化阵地。深入挖掘德江傩堂戏承载的伦理道德内涵，在乡村社区养老、邻里建设、青少年德育工作中融入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诚信友善理念，通过傩文化相关特色互动引导群众践行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支撑。

（三）“资源整合 + 双向赋能”模式

乡村社会工作的核心专业优势是整合并精准对接多元资源，而德江傩文化现阶段传承发展正急需此类资源支撑，二者深度融合可实现互补共生、双向赋能，社会工作者可依托专业能力，联动政府、企业、高校及社会组织，为傩文化传承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支持与展示平台。联动文旅部门争取政策与资金扶持，推进傩文化传承基地、展示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接高校及科研机构挖掘傩文化内涵、研发文创产品助力当代转化，链接企业资源推动傩文化与乡村旅游、文创、研学产业深度融合，开发特色产品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双向共赢。

同时，可借鉴德江县焕河村成熟的“抖音 + 古村 + 文化”模式，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广德江傩堂戏，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观赏性的宣传短片，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平台精准推送，展现傩戏独特韵味，拓宽其传播边界、提升影响力。以傩文化传承为核心纽带，整合乡村内生资源，培育乡村文化志愿者队伍与傩文化民间社团，引导群众参与文化传承与乡村治理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依托德江傩堂戏独特底蕴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拓宽乡村社会工作平台、丰富资源，实现文化与社会资源整合、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四）“数字传承 + 专业服务”模式

结合当下数字化发展趋势与乡村社会工作专业化、智能化诉求，可构建“数字传承 + 专业服务”融合模式，借鉴安徽池州傩戏全息影像数据库、清华大学 VR 傩仪体验系统的成熟经验，依托乡村社会工作者专业服务体系，搭建实用且具有感染力的德江傩文化数字化传承平台，推动傩文化数字化传播与乡村专业社工服务协同发力。

统筹社会工作者、傩文化传承人及技术人员协同发力，系统开展傩戏剧目、傩技绝活、面具制作与傩仪流程的数字化采集、梳理及存储，搭建完整实用的傩文化数字资源库保障其永久留存、高效传播，同步

开发线上体验平台与科普小程序，让群众足不出户感受傩文化韵味、体验傩仪乐趣，扩大传承覆盖面。在乡村社会工作各环节中深度融入数字化技术，通过线上平台收集乡村群众需求、吸纳服务反馈，并开展线上文化培训、心理疏导、政策宣传等服务，以提升服务效能，记录傩文化、乡村社会工作融合实践，不断优化融合路径，推动融合工作的专业化、智能化发展。

四、德江傩文化与乡村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人才培育，构建双向赋能的人才梯队

德江傩堂戏与乡村社会工作深度融合核心为人才培育，构建双向培育体系，实现傩文化传承人才、乡村社会工作人才互补赋能，促进两者的融合发展[7]。完善傩文化传承人才培育机制，由乡村社会工作者牵头，联动傩文化传承人、高校专家开展分层分类培育，针对资深传承人提升其文化传播与文创开发能力，面向青年传承人提升傩戏技艺与传承意识，对青少年爱好者开展兴趣培养与启蒙引导，构建“老中青”协同发力的传承人才梯队，打破“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坛规，广纳各民族、各年龄段群众投身傩文化传承。依据本土化核心，结合德江傩堂戏文化底蕴、民俗特色进行培训，引导乡村社会工作者深入了解傩文化内涵，开展乡村服务。

（二）深化资源整合，搭建多元协同的融合平台

德江傩堂戏要和乡村社会工作真正实现相互助力，关键就在于整合各类资源，结合两者融合过程中的实际需要，搭建起一个由政府引领、社会工作者牵头负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协同平台，为它们的深度融合筑牢基础。推动二者深度融合，需优先整合政府资源，对接文旅、民政等相关部门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完善傩文化传承基地等配套设施，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筑牢融合基础。要做好社会资源的链接工作，主动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一起挖掘傩文化的深层内涵、研究二者融合的可行模式，为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联动企业和社会组织，推动傩文化与乡村旅游、文创、研学产业结合，打造属于本地的特色文化品牌。要充分调动乡村自身资源活力，着力培育乡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和傩文化民间社团，引导当地群众自觉参与到文化传承与社区服务中，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其改造为傩文化展示、体验与培训的专用场所，提升各类资源的实际利用效果。

（三）拓展融合场景，打造贴合实际的服务载体

场景拓展可促使两者的深度融合，依据乡村群众的实际需求、傩堂戏文化特质、社会工作服务属性打造融合场景与服务载体，让群众享受融合成果。推动傩文化、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渗透至社区养老、青少年教育、邻里互助场景中，通过主题实践形成文明乡风，搭建傩文化展示体验平台，使其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强化产业场景融合，推动德江傩堂戏独特文化深度融入乡村旅游中，设计独特的研学线路、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并开发文创产品，促使文化价值有效转化为经济价值。

（四）健全机制保障，推动融合发展长效化

全协同联动与资金保障机制可加强德江傩堂戏、乡村社会工作的融合，明确政府、社会工作机构、傩文化传承人、乡村群众的职责，构建协同格局。定期组织协调会议，解决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整合政府拨款、社会捐赠、产业收益构建多元资金筹措体系，支撑傩文化传承、人才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考核评价、宣传推广，定期评价傩文化传承成效、乡村社会工作服务质效、群众满意度，依据评价结果优化融合路径与服务效能，并通过新媒体技术、线下展演呈现出两者融合效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五、结论

德江傩堂戏、乡村社会工作深度融合可为传统民俗文化搭建活态传承的现实载体，促进非遗文化的新生，并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两者在价值引领、实践目标、服务场景上具有较高契合度，可促进后续融合工作的稳步推进、成效落地。结合德江本土实际，本文构建的“传承培育 + 专业赋能”四大融合模式及配套的人才培育、资源整合等四大实践路径，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可有效破解德江傩堂戏活态传承的现实瓶颈，激活其文化生命力与社会价值，同时拓宽乡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提升乡村治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续的文化力量与专业支撑。

参考文献

[1] 张安琪 . 新媒体环境下德江傩文化的现状及保护研究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23):86-87.

[2] 陈岩 . 试析德江傩戏傩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基于艺术文化学视角的思考 [J].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61-64.

[3] 张江林 . 论土家族傩文化“和谐”理念的主要表现 ——基于德江傩堂戏的思考 [J]. 铜仁学院学报 ,2021,23(02):81-90.

[4] 李寿旭 . 新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的开发和保护——以贵州德江土家族傩文化为例 [J]. 枣庄学院学报 ,2018,35(01):124-127.

[5] 韩炎坪 . 论德江“傩堂戏”的文化意蕴及教育价值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34):2-3.

[6] 高婷婷 , 黄雨歇 , 韦志艳 , 等 . 浅谈德江傩戏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J]. 文渊（小学版）,2021(09):603-604.

[7] 袁林 . 贵州德江傩面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J]. 浙江工艺美术 ,2024(17):91-93.

（作者单位：铜仁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访社会工作的多元功能解析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

贺云鹏　张华春

摘要：信访社会工作采用专业方法，并且依靠多方协作，把传统的信访模式转为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纠纷解决、心理调适、资源整合以及社会推动等方面起到作用。社会工作者经由专业交流、心理咨询和资源整合来化解矛盾，巩固社区自治，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增进信访者对制度的信任。应用显示，这有益于改善治理，推动基层自治和公平正义，但是，其发展仍然受到制度衔接、人才不足和认知偏误等因素的限制，应当完善顶层设计和考核机制，塑造专业人才并且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信访者的参与度，让信访社会工作深入到治理应用当中。

关键词：信访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矛盾调解

从新中国成立起，信访制度就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基所在，伴随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中的矛盾逐渐增多，传统的信访工作遭遇诸多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人民信访工作，完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机制，这为信访制度的转型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利益纠纷和群体性诉求日益增多，信访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访是党委和政府了解民情、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途径，也是助推治理体系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关键措施。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加快，信访工作在实践中更显突出，维权和治权成为信访法治化的内在要求[2]。然而，信访积案频发，群众常陷入“上访—补偿—息访—再上访”循环，亟须中介机制解决。信访社会工作因此应运而生，成为化解矛盾、优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本文以信访社会工作的多种功能为切入点，关注其在提升治理效能、化解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并从调解机制、风险管控和诉求回应等角度探讨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对信访社会工作的研究

1. 信访社会工作的概念界定

信访社会工作是通过专业方法介入信访问题的一项实践性工作，它通过情感疏导、政策宣传和资源整合，以改善信访者的消极情绪，重新构建其与政府及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3]。这一工作属于新时代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被纳入党对社会领域集中领导的方针[4]。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推动下，信访社会工作者承担传达、协调和权益倡导等角色，并通过项目外包、第三方介入和个案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体现对本土文化的关怀[5]。这些专业能力和合作机制在情绪调节、问题解决以及制度完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提升了政府的可信度，为社会的持久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信访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信访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相伴发展，随时代变迁不断演进。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重组使信访矛盾复杂化。2005 年，《信访工作条例》修订推动信访与社会工作融合，部分地区（如上海）率先实践[6]。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信访社会工作，推广“枫桥经验”为其整合资源、补足服务短板提供借鉴[7]。2023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促进其落地，社会工作机构日益成为处理信访问题的重要主体，逐步融入现代治理格局。

（二）对相关理论的研究

1. 对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

研究社会治理理论时会发现，该理论重视以人为本，提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解决社会问题并改善资源安排情况，与传统治理模式不同，其更看重规范性和科学性，经由制度设计引导治理行为发展[8]，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和服务供应上起着关键作用，有益于增强公众参与度及其更新改造能力。有关研究表明，

社会工作有利于形成公平而坚韧的社会结构，关注社区与基层治理意义，促使治理朝着科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9]。

2. 对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

研究协同治理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时，发现多元主体携手达成治理目标被视为重要策略。协同治理理论主张通过赋权和认可来加大公众的支持力度，进而推动多方共同治理的实现[10]。有关城市治理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作用尤为突出，但同时需要灵活架构框架来应对复杂需求，这显得尤为重要[11]。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凭借治理理论，协同理论来详细阐述信访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并且选用了两个典型的信访社工案例，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广泛性。

“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张某投保重大疾病险后，因左乳癌申请理赔却被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甲状腺结节病史拒赔并解除合同。张某认为该病史与乳癌无因果关系。社会工作者联动律师和妇联介入，安抚张某情绪并评估其需求；协商无果后协助其诉诸司法，同时持续提供政策咨询和心理辅导。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某10万元保险金和2200元住院津贴，并确认部分合同效力。（案例来源：四川省成都市××区妇女联合会）

“走向有序自治的瘫痪小区”：某小区因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纠纷导致公共服务瘫痪，居民频繁上访。社会工作者采用社区发展模式介入，组织居民参与恢复供水、供电和电梯等公共设施运行。通过司法调解和账务清理，化解了居民与前业委会的矛盾。最终，居民通过协商和分区治理，选举产生新业委会，小区公共服务逐步恢复正常，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案例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4年5月下刊）

三、信访社会工作的多元功能解析

信访社会工作兼具专业性与政策属性，相较传统信访，更强调“社会工作专业+多主体联动+人性关怀”的综合模式，其功能涵盖纠纷化解、心理调适、资源链接和社会促进四个方面。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互动”的要义及社会治理理论中“科学规范制度引导治理行为”的核心，信访社会工作通过“政府主导+社会支持+专业服务”的路径，将传统注重“息诉罢访”的单向治理方式转变为多方协同、持续支持的综合实践。

（一）纠纷化解功能

社会工作者凭借专业沟通与调解，联合多方主体化解信访纠纷，突破了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旧模式。在“走向有序自治的瘫痪小区”群体事件中，他们召集居民、物业、业委会和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调解与财务公开，化解矛盾，恢复供水、供电和电梯运行，实现社区自治。在“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中，社会工作者联动律师、妇联等，安抚情绪、整理证据并推动司法介入，最终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付1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及住院补贴。两案显示，多元协作既能维护信访人权益，也能体现制度化社会治理优势，凸显信访社会工作的协同长处。

（二）心理调适功能

长期被压抑的信访人员常产生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需要心理引导。社会工作者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和共情交流等干预，帮助信访人员调节情绪、保持理性。在“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中，团队既提供法律援助又对张某进行心理疏导，使其沉着应诉。遇到高风险个案或群体事件时，社工及时联系医疗和心理专家进行危机干预，阻止极端行为。专业化干预体现了协同治理体系下的多方合作优势，与社会治理中科学规范的介入原则相契合，有助于当事人顺利度过信访阶段。

（三）资源链接功能

信访社会工作可整合诸多资源来满足各类需求，其主要涉及政府资源、社会公益资源以及企业资源，为信访者提供全面支持和服务，在“走向有序自治的瘫痪小区”案例中，街道办给予应急资金和调解资源，社区组织及志愿者加入重建公共服务之中；而在“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中，社会工作者推动保险公司开启绿色理赔通道以加快理赔进度，还协调有关部门给予政策阐释和法律帮助，整个过程按“需求评定—资源适配—服务供应—跟踪反馈”步骤跟进服务质量，体现多元资源协同合作与持续支持理念，既满足实际需求，又增进对社会服务体系的信任度。

（四）社会促进功能

信访社会工作在解决个案矛盾上成果斐然，而且擅长助力信访者重建与社会的联结，通过纠纷调解与心理辅导，帮助其恢复对制度和公共权威的信任。“走向有序自治的瘫痪小区”之后，居民协商重选业委会，自治意识增强，公共服务恢复，邻里关系改善，提升了政府公信力，证明公平包容治理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凭借专业服务和多方协同，信访社会工作将激化矛盾引向共治，彰显了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创新价值。

四、信访社会工作功能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

（一）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

信访社会工作经由组织社区居民一同参与治理，巩固了基层民主创建和自治能力，在案例当中，社会工作者助力形成起“单元议事—代表协商—全体表决”的三级决策机制，使得居民参与度从35%扩大到78%，业委会选举的投票率更是达到了92%，而且，他们组建了5个社区自治小组，把42项居民诉求转变成

14 个可行的方案，做到了基层多元共治理念的实际操作，这个过程彰显了社会治理中“主体多元”的观念，给社区带来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余地，冲破了传统信访模式下自治很难推动的瓶颈。这种社区赋权冲破了被动上访的限制，为将来集体参与和民主决策奠定了基础，使得基层应对复杂问题时更为从容。

（二）在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中的体现

信访社会工作在矛盾化解过程中起到纽带的作用，可以整合多方资源来推动协同合作，以往常常依靠部门协商或者上级批示，很少关注当事人的心理安抚及其实际需求。“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表现出社会工作介入之后取得的明显成果：社会工作者联系律师，妇联以及司法部门，给予张某情绪安抚，法律咨询以及政策阐释，促使案件转入司法程序，最后法院判定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这个案例彰显了协同治理当中的“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原则，而且兼顾了程序公平和专业干预的融合，社会工作者在冲突调解的时候往往会扮演“调解人”“信息传达者”“情绪疏导者”等多种角色，经由家访、面谈等形式助力信访者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多重角色作用的发挥既弥补了单纯行政介入的不足，又充实了传统信访渠道的功能，还提升了矛盾化解的效率和社会满意度。

（三）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中的体现

信访社会工作通过制度化路径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巩固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工作者协助信访人取证、对接法律并提供心理支持，使其依法获援；在“张某保险理赔纠纷案”中，工作人员帮助张某再申诉并获 10 万元赔付，彰显“以人为本”价值。同时，该工作促使公共资源配置更透明公正。在“走向有序自治的瘫痪小区”案例中，公共服务重建后，物业收支公开，居民参与机会均等。社会工作者介入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冲突，提升制度信任与公平感，通过多主体协作与制度化措施，将激化矛盾导向协同解决，增强治理包容性与稳定性，凸显其捍卫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五、结语

（一）面临的挑战

信访社会工作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制度和认知障碍。现行信访制度过于偏重维稳，行政化特征明显，导致社工缺乏明确制度支持 [12]。首先，部门合作困难，信息孤岛阻碍信息共享，考核制度过分强调“息访”，忽视矛盾跟进，限制社工持续参与。其次，复合型人才短缺，岗位有限待遇低，培训体系不完善，一线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 [13]。最后，公众对社工职能缺乏认知，常误将其视为政府代言人，质疑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影响工作开展 [14]。

（二）对策与建议

要完善政策机制，强化人才培养并提升公众认知。明确信访社工的制度属性，制定相关法规或指导文件，建立联席会议及信息共享机制，将社会效益和信访满意度纳入考核。壮大信访社工队伍，在高校开设信访社工课程、开展在职培训并改善薪酬福利与晋升渠道，提高职业竞争力。通过媒体宣传和社区活动凸显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增加服务流程透明度，完善反馈机制，增强信访人对社会服务体系的信任和参与度 [15]。

参考文献

[1] 张克祯 .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视阈下优化信访工作机制的路径探析 [J]. 理论视野 ,2023(04):52-57.

[2] 任敏 , 严艺文 , 鲍隽 . 需求转译 : 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信访积案的处置 [J]. 社会学评论 ,2024,12(06):158-182.

[3] 康姣 , 李却旦杰 . “气”的消解 : 信访社会工作的情感之维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03):119-126.

[4] 张克 . 从地方社工委到中央社会工作部 : 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重塑 [J]. 行政论坛 ,2023,30(03):72-81.

[5] 李迎生 , 李文静 . 新时期我国信访矛盾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J]. 学海 ,2017(03):107-114.

[6] 吴同 , 陈蓓丽 .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困境——以上海市专业社工介入信访 C 项目的个案服务为例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2):92-100,170-171.

[7] 李永华 , 黄卫红 , 林宝仪 . 信访社会工作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 [J]. 社会与公益 ,2024(08):45-48.

[8] 向德平 , 苏海 . “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06):19-25,2.

[9] 杨丽 , 赵小平 , 游斐 .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06):5-12.

[10] 王力平 . 协同治理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工作路径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4(06):59-67.

[11] 赵冬 , 陈志超 . 城市协同治理的社会组织 : 结构、机理与增效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1,22(02):73-82.

[12] 王仕科 . 新时代信访制度改革创新的实践逻辑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05):23-27,93.

[13] 宋协娜 . 再制度化与格局建构 : 信访治理的创新路径——基于《信访工作条例》的考察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3,27(01):105-114.

[14] 孔凡义 . 信访治理对基层政府履职尽责的双重约束责任制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2(04):36-46.

[15] 谭笑风 . 社会治理背景下信访工作系统化路径研究——基于河南永城信访工作的调查 [J]. 领导科学 ,2019(12):92-94.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

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体制机制优化路径研究

李智军　严爱芳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而市场的招聘需求未能同步增长，因而人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就业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难点问题。创业带动就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解决就业难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听障大学生受自身生理障碍等因素影响，在创业和就业中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进一步解决听障大学生的创业带动就业问题，文章对听障大学生创业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梳理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现实意义，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优化路径，以推动残障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听障大学生；创业；就业；困境

据中国残疾人协会数据统计，截至 2024 年，全国普通高校累计招收超 5 万名听障大学生。听障大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但当前听障大学生在创业就业过程中受生理障碍、市场歧视等影响，就业率明显低于普通大学生，就业质量也存在一定差距。对此，鼓励听障大学生创业成为破解就业难题的关键措施，不仅能够促进听障大学生自我就业的实现，同时还能够带动其他听障人士，甚至普通群体的就业。因此，深入探讨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体制，不断优化实践发展路径，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推动国家残障事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特殊性

相较于普通大学生，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在岗位类型、服务对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特殊性。从岗位类型来看，根据其生理特点，听障大学生的创业就业项目岗位多以不依赖听觉沟通的岗位为主，如手工制作、平面设计、数据录入等。岗位类型需要与听障人士生理特点适配，发挥其能力优势，降低就业门槛。从服务对象来看，残障群体占比较高，要关注残障人士需求，同时与听障大学生的能力适配。如听障大学生设计的创业项目为手语培训班，进行手语教学服务，同时又能够吸纳其他听障大学生或听障教师就业，解决听障人士实际需求的同时为他人提供就业岗位 [1]。此外，从创业带动效应来看，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不仅能为听障群体、残障群体提供就业岗位，其项目运营过程中也会辐射到普通群体。创业项目需要财务、行政等岗位，也为普通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在项目运营过程中，提升社会其他人群对听障、残障群体的正确认知，有助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就业环境，减少社会歧视 [2]。因此，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同时也具备重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二、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听障大学生个体价值

听障大学生创业对其个人而言，不仅能够助力经济独立的实现，更能够满足其对个人价值追求的实现。听障大学生在部分岗位中，容易存在沟通局限等问题，就业压力与问题突出，而自主创业能够为听障大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从而避免就业市场部分岗位存在的沟通壁垒。听障大学生创业选择与自身专业特长、能力等精准匹配的方向，有助于发挥动手能力突出、专注力强等优势，有助于个体技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个人的发展与成长。同时，听障大学生在自主创业实践过程中，能够丰富自身的经营管理经验，提升社交能力，进一步融入社会，增强其社会融入感与自我成就感。听障大学生以创业主体的角色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过程，从就业转为创业，体现个人发展优势与潜力，有助于听障大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

（二）拓宽特殊群体就业渠道

创业能够带动就业，听障大学生创业也能够为听障群体以及其他残障群体提供多元就业路径，以拓宽

特殊群体的就业渠道。听障大学生创业提供的工作岗位相较于普通岗位，更契合特殊群体的就业需求，基于特殊群体的能力短板设置匹配的岗位，构建适配听障大学生需求的工作环境，为其就业提供有力保障。基于此，听障大学生创业能够为更多特殊残障群体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解决特殊群体存在的就业难、岗位适配难等问题。除此之外，创业成功后项目规模不断扩大，产生的就业岗位也能够持续增加，不断扩大创业辐射效应，增加特殊群体就业机会，提升其经济水平，能够为缩小特殊群体与普通群体的差异提供一定的助力。在特殊群体就业过程中，创业项目还能够为其提供相应的提升平台，同时技能指导、工作培训等方式提升特殊群体就业能力，增强职业竞争力，以推动特殊群体高质量就业[3]。

（三）营造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

听障大学生创业实践有助于打破社会群体对残障群体的偏见，提升对特殊残障群体的认可度，在创业带动就业中传递助残理念，有助于构建更加平等、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具体来看，听障大学生创业成功能够向社会展现其能力与价值，改变以往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逐步消除社会对残障群体歧视，充分体现其社会价值与潜力。同时，项目运营期间往往会开展无障碍服务等活动，促进特殊群体与普通群体的交流，增进友好关系，让社会普通群体能够更加了解残障群体，给予包容与理解，同时为残障群体创业就业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听障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够推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营造平等、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体现社会发展的温度[4]。

（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具有特殊性，在促进经济收益提升的同时，能够丰富市场供给，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市场经济注入多元化的活力。听障大学生的创业实践充分结合市场需求，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在无障碍服务、手语翻译、数字设计等领域进行探索与实践，填补当前市场无障碍领域的供给空白，打造更具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服务，以满足多元化的消费与服务需求。在此类特色项目创业实践过程中，也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催生新型就业岗位，推动产业形态升级。例如，无障碍服务创业项目的实践能够带动如无障碍导航设备、智能手语翻译系统等的研发，以及芯片、软件开发等产业发展，催生无障碍出行陪同、公共服务无障碍适配等的出现，为更多残障人士与普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下游可联动公共交通、政务办理等不同场景，带动技能培训等配套服务的发展，助力构建无障碍社会。由此，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实践有助于带动多个产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进社会经济质量提升。

三、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体制机制优化路径

（一）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推动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体制机制的落实，首先需要完善政策保障，优化政策机制。应精准对接学生创业需求，为创业提供有力扶持。制定听障大学生创业扶持办法，明确扶持对象、标准、流程等，将扶持政策落实于创业的全过程，使听障大学生在不同的创业阶段获取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如在创业项目启动阶段，给予场地租金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项目运营阶段，给予技术升级补贴等，对于年营收较高的项目给予相应的奖励。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为听障大学生创办的个体工商户提供税收减免；对于能够吸纳听障人士的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按照人数给予相应的就业补贴，同时也将吸纳听障人士就业补贴政策纳入普通大学生创业项目中，鼓励更多创业项目吸纳听障大学生，解决其就业问题。为保证政策知晓度、提高申请成功率，政策办理部门应设置手语翻译等服务，为听障大学生提供帮助。

教育、残联、人社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建立听障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借助线上平台发布创业相关政策、信息，提供查询、申请等服务，实现各部门政策、资源的协同共享。强化各部门协同，统一规范政策内容，明确各部门职责与工作流程，便于听障大学生进行补贴申请、审核，避免重复工作。为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同时需要强化监督考核机制，对相关扶持政策的申请、审批、发放等全过程进行监督，线上动态监督结合线下及时回访，调查了解听障大学生对各项服务政策的享受情况，评估政策落实，并对一些服务不到位的部门提出通报批评[5]。将听障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调动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强化政策落实效果，给予听障大学生创业活动以充分的支持。

（二）提升学生个人能力

针对创业带动就业受学生个人能力素养的影响，通过教学不断提升听障大学生个人能力，进而提高其创业带动就业的成功率。同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在听障大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中，普通大学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校和地方政府可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活动，鼓励普通大学生与听障大学生共同参与项目开发，同时设立最佳合作奖，奖励残健融合团队中能够发挥双方优势进行项目活动的团队，增强普通大学生的协助、合作意识。组织听障大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活动，企业派出优秀员工对学生进行统一指导，使听障大学生在实践训练中学习市场运营、客户服务等技能，为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开展提供支持。组织听障大学生创业培训讲座，邀请企业家、投资人等专业人士担任讲师，采取案例教学结合分组实战的教学模式，讲师通过文字、配有字幕的视频来讲解实际

案例，为学生布置实战任务，在团队协作互动中，听障大学生积极学习创业知识[6]。还可以组建听障大学生创业互助社群，邀请听障创业与普通创业大学生加入，分享讨论创业经验，互相学习。鼓励群内普通创业大学生给予听障创业者帮助，解答听障创业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互助共赢。

此外，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听障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关键。因此，需要增强听障大学生的心理韧性。组织开展心理辅导活动，邀请听障大学生交流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压力等，还可以邀请普通大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使听障大学生意识到失败、挫折是创业的正常现象，大家都会面临这一问题。在心理辅导活动中，需要有掌握手语的心理咨询师参与，给予学生引导，纠正学生对于创业挫折、压力的认知，提升心理素质，使听障大学生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创业中的挫折，提高创业成功率。

（三）构建社会协同机制

构建社会协作机制，打破听障群体独自创业的壁垒，有助于形成残健融合的创业生态，有效应对现有的创业与就业问题。消除社会群体的认知偏差，使其具备正确的认知十分关键。可通过开展听障创业开放日活动，向大众展示听障创业项目，邀请普通群体参与了解项目，或开展让普通群体扮演听障人士进行客户沟通等活动，体验听障创业者的工作方式，有助于打破普通群体对听障人士的刻板印象[7]。借助短视频平台发起“我与听障朋友”的话题，普通人可以分享自己与听障朋友相处、创业合作的经历，使更多正常群体了解到听障群体，更好地与听障群体合作与互动，构建友好的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可整合听障创业项目服务与产品，建立听障创业消费支持平台，介绍创业项目故事，扩大宣传范围，人们可通过线上购买或支持听障创业项目，为听障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将普通学生帮扶培训纳入公益组织活动，在活动中向普通大学生提供手语教学等无障碍沟通技巧，开设听障创业特点等课程，增强普通大学生与听障创业者的合作能力，为残健创业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优化社会资源供给

大学生创业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资源支持，而听障大学生获取资源资金支持存在一定难度，优化社会资源供给以尽可能为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落实提供支持。拓宽创业融资渠道，为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设置专项资金，提供免息贷款等支持。构建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众筹平台，鼓励社会群体小额投资为创业项目提供支持，给予投资者产品体验、项目分红等[8]。与公益基金会联合成立听障创业公益投资项目，给予一些具有社会价值的项目以资助与支持。建立听障创业人才交流平台，能够为人力资源的获取提供帮助。借助线上平台吸引具有其他技能的听障人群，以及普通大学生等加入创业团队，为听障大学生创业团队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持。学校针对听障大学生创业项目，匹配专业创业指导教师，为学生提供精准的指导，同时可以鼓励校内普通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项目，协助听障学生完成行政事务、活动落实等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开设线上服务平台，可通过文字沟通等方式为一些资源不足地区的听障创业大学生提供远程创业指导，突破地域限制。

四、结语

总而言之，积极推进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机制，能够解决听障大学生个人就业问题，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其他群体就业，进一步增进社会公平性。基于当前体制机制存在的困境，可通过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提升听障大学生个人能力、构建社会协同机制，以及优化社会资源供给等途径，进一步突破发展困境，推动听障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机制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于龙，王瑞，刘文龙，等. 新时期残疾大学生就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实践路径——以黑龙江省为例 [J]. 绥化学院学报，2025,45(07):143-147.

[2] 周泽辉. 文化育人在听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工匠精神培育的视角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07):153-156,161.

[3] 余鹏，黄燕婷. 歧视知觉对听障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社会适应与成就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 [J]. 中国特殊教育，2023(07):25-33.

[4] 顾李杰，韩铖. 高校听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路径探析——以计算机专业为例 [J]. 江苏科技信息，2022,39(29):23-27.

[5] 李芳芳. 艺术类听障本科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西安某艺术类高校为例 [J]. 中国就业，2024(09):113-115.

[6] 孙岩，任伟宁，李晗静，等. 残疾大学生就业环节校企合作的探索和实践 [J]. 绥化学院学报，2021,41(07):128-132.

[7] 姚文婷，李秀义，张晓辉. 新媒体网络时代听障大学生“双创”教育体系研究 [J]. 长春大学学报，2020,30(01):121-124.

[8] 袁秋芸. 听障大学生创业孵化模式研究——电脑编织课程应用实例分析 [J]. 纺织报告，2020,39(05):119-1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专项课题“高校就业创业研究专项课题”“基于残健融合的聋人大学生创业就业一体化模式研究”（XJK23BXJ021）。

（作者系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刘　军

摘要：自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启动以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推进，已实现从理念倡导到实践深化的阶段性转变，形成“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格局。立德树人已经成为基本目标，高校需要以学生为核心，促进学生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形成，创新思政教育体系，激发学生的自我学习意识，解决高校教育教学发展遇到的问题。本文旨在剖析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价值与现实困境，并围绕资源整合、专业融入、评价机制与形式拓展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改进策略，以期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高校发展；课程思政建设；现实困境；解决方案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的战略性举措。在高校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后，课程思政已从理念倡导进入全面深化实践的新阶段，旨在推动所有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高校需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

课程思政是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全过程的教育理念与实践。课程思政和高校所有学科都有一定关联性。

其价值首先体现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在高校教育工作开展中，需要通过专业的理念与方法，突出课程思政的多维性与针对性，完成课程思政教育目标，高校教师需要在教学理念与思维方面作出创新。它要求所有课程都肩负起育人责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其次，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重要抓手。它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致力于在专业知识教育中渗透价值引领。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学生知识理解和获取能力，完成高校阶段性教育目标。高校的专业课程，要突出课程思政理念，全面弘扬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将知识内容传递给学生，实现课程思政显性教育的目标。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需要细化教育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和道德规范功能，专注理论知识的梳理与传授，加强思政教育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联，保证学生全面发展。

二、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思政资源整合与高效应用有待深化

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思政资源整合与应用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各类思政资源分布相对广泛，尚需系统性梳理与统筹规划，进一步健全上下联动、多元协同的资源整合机制。具体体现为高校各部门、各课程的思政资源相对独立，共享渠道有待进一步畅通，可通过优化配置减少重复建设与资源闲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围绕各专业、各学科思政建设目标，加强思政资源应用的顶层设计，对现有资源精准筛选、深度提取与高效转化，更好释放思政资源的育人效能，为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见效提供有力支持。

（二）课程思政教学与专业融合有待强化

提升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适配度，是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的关键路径之一。因此高校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可进一步深化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特色的探索，立足专业特点量身设计思政教学内容，避免同质化实施。紧密结合各专业知识体系、职业发展导向与行业需求，深度挖掘契合专业特质的思政元素，推动思政教学与专业教学有机衔接、同向发力，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的深度融合，确保课程思政更贴近专业、贴近学生，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充分彰显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价值，不断提升

课程思政建设实效。

（三）思政育人反馈体系有待完善

健全多元高效的育人反馈机制，是全面精准掌握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推动育人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保障。现阶段高校课程思政育人评价以课堂评价、学生问卷为主要形式，反馈渠道可进一步拓宽，反馈内容可更具针对性与全面性，全面覆盖学生思想认知、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成长变化。同时应优化课程思政反馈工作流程，推动反馈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与应用高效衔接，促进反馈结果及时转化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化举措，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改进，为课程思政育人质量稳步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四）课程思政实施模式有待创新

丰富创新课程思政实施方法，是适应新时代高校学生个性化需求与认知特点、提升育人效果的重要路径。部分专业课教师可在现有教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多元探索，突破传统讲授式教学局限，减少单一理论灌输，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积极运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互动式教学、项目式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手段，充分依托线上互动平台、数字资源等现代化教学工具，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觉践行正确价值观念，切实提升课程思政育人实效。

三、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

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中，需要在专业课程中合理加入思政教育元素，从而体现引领作用。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遵循德育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整体设计原则。

（一）德育为先原则

高校教育中，德育教育属于灵魂所在。高校在学生培养时，需要围绕“立德树人”目标，把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课程思政建设原则，需要围绕德育开展，根据教育工作的相关任务，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效果。在德育为先理念提出后，需要确定德育的导向，实现价值引领和课程教学的有效统一。高校需要将课程思政教育放在首位，贯穿教育全过程。课程思政需要有效发挥德育的导向职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二）以人为本原则

在实践教育过程中，需要全面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保证学生全面发展。课程思政需要探索全新的途径，对三全育人模式进行优化，并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为了挖掘高校课程中的育人资源，需要确定以人为本的基本目标，并结合教育实践，以学生为中心，体现教育工作的根本宗旨。教师需时刻关注学生的成长，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通过积极探讨的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

（三）整体设计原则

整体设计原则在构建全面、高效的育人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原则强调以全方位、全布局的视角，科学合理地推进“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举措，旨在全面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出既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又拥有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整体设计原则要求打破传统教育界限，实现社会、家庭与学校三者力量的深度融合，共同构建一个协同育人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课程思政不应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应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事业。通过组织亲子活动、社区服务项目、行业专家讲座等形式，将社会的广泛资源和家庭的温暖关怀融入课程思政之中，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课程的具体落实过程中，整体性原则同样不可或缺[2]。在育人的全过程中，整体设计原则还体现在课程、科研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上。这要求在强调课程育人的基础上，不能忽视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实习实训、志愿服务等活动，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拓宽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这种综合性的育人模式有助于打破学生思维的孤立状态，克服单向育人的局限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了有效落实整体性原则，课程思政建设还需注重价值观的塑造与传递。这要求高校在课程目标设计中，明确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案例教学、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在理解、认同并践行这些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步夯实其思想道德基础[3]。同时，课程思政还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与人格成长，引导学生懂得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团队合作、诚信守约、创新思维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整体设计原则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指导理念，它要求高校在育人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全局视野，注重各方面资源的整合与协同。

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突破路径

（一）整合课程思政教育的资源与平台

在课程资源整合过程中，需要重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高校课程思政资源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校内资源和校外资源。在资源整合方面需要利用网络平台，对获得的资源进行积极解读，挖掘所有资源的深刻内涵和育人功能，积极发挥其对学生的教育作用。教学资源整合需要从学生角度出发，始终以学生为主体，创新课堂教学方式。例如，在理论知识指导方面，需要应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频、图片等形式，保证资源融合效果。在使用教学平台时，可以创新教学情境和方式，根据实际教学任务，合理突出思政元素。教师还需做好问题引导，通过案例分析，提升资源整合的稳定性。在资源整合中需要注意，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实践中解决资源闲置问题。例如，教师可以

围绕思政教育打造校园活动，让学生互相交流，提升学生的个人思想素质；主动挖掘学生的特长，帮助学生找准学习方向。对于教师而言，可以推荐与德育教育相关的校外资源，如读物、电影等，让学生拥有主动学习的意识[4]。

（二）强化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的融入

对于高校而言，需要考虑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意义，确定课程思政元素，做好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严格遵循高校的实际需求，提供积极的指导意见。除此之外，在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过程中，需要做好整体设计，打造全新的语言体系，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明确具体目标，形成可行的培养方案。课程思政需要配套严格的考评机制和管理运行机制，由管理部门积极带头，构建完善的课程思政组织架构。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时，需要预防出现“孤岛化”情况，增加对此方面内容的了解，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了打造现代化、专业化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教师需要深入挖掘思政元素的内涵。学校内部要建立专业的培训机构，发挥课程思政的引导作用，严格按照建设目标及相关原则，构建课程思政工作机制，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构建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评价机制

在课程思政评价机制构建过程中，需要考虑与其他课程的融合情况，及时做好评价工作，为系统化课程的建设提供保障[5]。对于教师来讲，应从高校层面进行规划，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在各教育部门的积极协同配合下，完成阶段性发展目标。高校需要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全面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强化科学理论基础，提高各工作团队的综合能力。在高校各类课程评估机制构建过程中，教师需要定期沟通工作经验，通过互相评价、互相听课等方式，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之间要互相学习，发挥课程思政的最大作用。

（四）拓展课程思政育人的内容及形式

高校在教育工作中，需要体现绿色、协调、创新等重要理念，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探索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工作思路，了解课程思政的具体内涵，实现创新教育形式的目标，开拓学生和教师的视野。高校在实际设计中，需要严格遵循共享原则，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重视实践过程，寻找课程思政全新的表达方法，优化现有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6]。高校需要组织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并对教师进行引导，合理推动课程建设与发展。高校还需重点建设跟踪机制与评价机制，以质量评价为核心，发挥课程思政的实际功能。在课程思政建设中需要融入信息技术，鼓励学生及时发现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问题，并且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以应对课程思政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在课程思政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历深刻的教育变革，对思政教育方法进行优化，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从实践角度来看，为了解决课程思政遇到的困境，高校需要突出立德树人理念，做好顶层设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功能，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效果，保证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艳迪，张治远，钟方旭．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J].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4,5(14):94-96.

[2] 陈大勇，沈秀琴，廖建平．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实践指向 [J]. 高教学刊，2023,9(25):9-12.

[3] 李文银，缪祥宇．后疫情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当代体育科技，2023,13(20):130-134.

[4] 王晓婷．理工类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D].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23.

[5] 梁芬莲，程安林．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2(21):70-72.

[6] 杨拓．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着力方向、现实困境及实践进路 [J]. 教育观察，2022,11(19):78-80,1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内蒙古“十四五”教育规划项目“内蒙古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和突破研究”（NGJGH2021234）；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基于学生获得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立体化教学体系构建研究”（22VSZ063）；2023 年包头师范学院课程思政专项（重点）“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协同育人体系研究”（BSJG23Z08）。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少子化背景下高职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常楠静

摘要：伴随我国少子化现象愈发突出，高职院校的生源构成、教育环境以及人才培养方式正发生着重大改变，生源缩减使学校之间竞争更为激烈，还对思政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价值构成了新挑战。传统思政教育在内容、形式及评价上通常着重于政治认同的塑造和价值理念的灌输，却忽略了学生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应对少子化引发的社会转型压力，高职思政教育迫切需要进行价值重构，从“数量导向”过渡到“质量导向”，从聚焦“课堂中心”转向融入“社会参与”，以此提升思政教育的现实感染力与社会回应能力，本文基于少子化背景下的结构变动，探究高职思政教育价值重构的方向与实践途径，为高职院校的教育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少子化；高职教育；思政教育；社会价值重构

少子化现象对高职教育体系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招生规模的缩减，还对学校的教育理念、育人模式与社会功能提出了再思考的要求。生源减少使学校更加重视学生个体发展与教育质量，也促使思政教育从“灌输式”转向“对话式”。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学生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价值取向趋向个体化，传统的说教模式难以形成有效引导。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亟须重新界定，不仅要引导政治信仰，更要引导学生理解社会责任、职业伦理与公共精神的内涵。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少子化背景下探索新的育人路径，使思政教育真正融入学生成长的全过程，成为推动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力量，为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支持与精神引领。

一、少子化背景下高职思政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生源减少导致教育生态变化

当前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高职院校的招生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适龄学生数量持续下降，使得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日趋激烈。部分院校为保证办学规模，不得不降低录取门槛，导致生源结构复杂化、学习基础差异显著扩大。生源数量的减少使得学校在专业设置、经费投入和师资培养等方面面临新的压力。对于思政教育而言，原有的课程体系往往依托于规模化教学，一旦学生数量减少、分布分散，教学组织方式便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师资力量的紧张与经费分配的缩减，进一步削弱了课程创新与教学研究的动力，造成育人效果呈现波动状态[1]。要在新的环境中保持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就必须打破以往依赖课堂规模的教学思路，探索更加灵活与精准的育人方式，使教学质量与生源变化保持动态平衡。

（二）学生个体意识增强，价值取向多元

少子化家庭结构使得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普遍享有较高的关注度，他们习惯于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独立的价值判断。相比以往更具群体意识的一代，新生代高职学生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与个人选择，对权威话语和集体规范的认同度下降。传统思政教育强调整体性与统一性，常以宏观叙事方式呈现社会价值观念，而这种模式在面对学生日益多元的思想背景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心理共鸣。部分学生对国家、社会和职业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对个体责任与社会担当的关系缺乏深入思考。思政教育若仍采用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在价值认同上出现“形式接受、情感疏离”的现象。要回应这一变化，教师需从学生实际出发，运用案例教学、情境讨论与社会观察等方式，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可悟的现实体验，重新激发学生的价值认同感与情感归属。

（三）社会环境变化削弱教育影响力

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双重推动，让社会价值体系展现出复杂多元的特性，学生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世界里接触到大量零散信息，不同价值观念不仅共存，还存在冲突，置身于信息的狂潮中，学生易出现认知上的

混乱，缺少稳固的思想立场与判断准则，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重点依旧主要放在技能培养和就业引导方面，对思政教育的扶持力度较为欠缺。部分企业、社会机构在与学校合作期间，过度关注技术成果和即时效益，忽略了思政教育育人功能的发挥，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让思政教育在社会舆论场里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不断弱化。若要改善这种情形，高职院校得在课程改革以及社会联动上谋求突破，把思政教育与职业能力、社会责任、公共服务等内容相融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体悟其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

二、高职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重构方向

（一）从政治认同走向社会责任

少子化引发的社会结构改变，要求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时更注重社会责任教育，以往思政课程侧重于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然而在当下新的形势中，单一的政治认知无法支撑学生形成稳固的价值体系，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造就能够为社会服务的技能型人才，思政教育应在这一基础上深化内涵，指导学生认识职业劳动的社会意义。借助职业伦理、公共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的系统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期间，构建起对社会运行规则的理性认识，教师需引导学生把个人目标和国家发展、行业需求相结合，在未来工作中用专业技能服务社会、以实际行动展现社会责任感，由此实现政治信仰与职业理想的契合，此种转向有益于让思政教育重回社会现实，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展现思想引领的价值。

（二）从统一灌输走向个性化引导

生源数量降低为教育资源更精准地关注个体差异创造了条件，过去思政课教学采用统一讲授模式，忽略了学生在认知程度、兴趣偏好和价值认知上的多样性，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个性化教学搭建了平台，教师可凭借学习管理系统（LMS）或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学习轨迹开展画像式分析，把握其兴趣偏好和思想动态。运用差异化议题设定、分层研讨和互动式授课，可让学生在契合自身经验的语境里领会价值命题，个性化引导不但展现出教育的人文关怀特质，还推动思政教学从“要我学”迈向“我要学”，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此基础上，教师需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与自我反省的能力，让思政教育真正融入学生思想。个性化思政教学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我表达与责任意识，使教育重回“启发智慧”的本质[2]。

（三）从课堂教学走向社会协同

思政教育若想达成社会价值的重新构建，需打破校园界限，高等职业院校应围绕社会需求这一导向，实现思政课程与社会实践的深度交融，学校可同企业、社区、公益机构构建协同育人体系，打造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实践平台，置身于真实社会环境，学生可直接体会国家政策的实施和社会运行的逻辑，在劳动、服务和体验中强化对责任与奉献的领悟。教师可把学生实践中的观察思考带回课堂，构建反馈机制，让课程内容更贴合时代需求，社会协同既扩大了思政教育的空间维度，又促使学生在社会化学习中理解集体意识与公共价值，凭借“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循环流程，思政教育才能够真正成为助力学生终身发展的精神支撑与职业成长的价值内核[3]。

三、高职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构建“三维一体”的课程体系

若要促进思政教育实现系统化发展，课程体系应具有结构和层次上的合理性。传统思政课程大多侧重于理论讲授，未与现实问题相联系，造成学生理解存在抽象化状况。打造由理论教学、案例研讨和社会实践构成的“三维一体”格局，有利于达成知识传授与思想引导的统一。理论教学需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实际情况为基础，指导学生把握政治制度和时代责任的内在关联，案例研讨需聚焦职业伦理、社会热点、行业治理等实际问题，让学生在剖析问题和碰撞观点时强化理解，社会实践活动借助社会服务、志愿行动和岗位实习，让学生在行动里验证理论的可行性。为保障课程的系统连贯性，学校需构建课程间的纵向衔接机制，让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实现内容互补和价值共振，三维体系的有机融合，既提升了学生的思辨和应用能力，又促使思政教育真正贯穿职业教育的全流程，打造出学用结合、言行一致的育人模式。

（二）推动信息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引入信息化手段，是推动高职思政教育创新的核心要素，数字化学习平台、虚拟仿真环境以及在线交流社区的搭建，让教学方式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教师可凭借平台数据知晓学生学习进度和思想方面的变化，实施个性化引导，运用情境互动、角色扮演等技术手段，使学生可在沉浸式学习中掌握理论内涵，由此增强情感认同度。信息化教学并非仅仅是形式层面的革新，更是理念的更迭，从单向知识传递过渡到双向思维交流，依托数字化平台，教师可构建“微案例”“微任务”“微视频”等碎片化学习板块，促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中不断深入思考，依托网络空间的延展，学生的学习时间与场所得以拓宽，思政教育实现了从“课上”到“课外”的跨越，达成了从集中式灌输到持续性引导的转变，营造出悄无声息的思想渗透态势[4]。

（三）建立多元协同的育人机制

高职思政教育要实现有效运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协同配合，学校、企业、家庭与社区需共同搭建教育支持网络，打造多层次育人格局。学校应在课程规划中整合社会资源，促使学生投身真实的社会项目，凭借岗位实践和社区服务领会社会分工与职业使命。

企业于育人工作中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为学生营造德技兼修的成长环境。家庭应加强价值层面的交流，作为学校思政教育的延伸场所。社区可利用共建活动、志愿项目等形式，为学生打造体验式学习的空间。政府部门还需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推进区域思政教育资源的共享，构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使思政教育摆脱课堂的束缚，在社会互动中汇聚育人合力，推动学生在多维度体验中达成思想自觉与行为转化[5]。

四、高职思政教育的保障机制与发展展望

（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

教师是高职思政教育体系里最为关键的力量，应对少子化引发的教育生态改变，教师应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型为价值引导者与学习推动者。学校要达成师资结构的动态优化，既要重视政治素养与教育情怀，又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构建教师研修制度与校企联合培养机制，引导教师走进社会生产一线，把握产业变革以及青年群体特性，从更贴合实际的角度开展思政教学。教师成长仍需借助系统化的支撑，学校应当定期开展教学交流与案例分享活动，促进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创新，“专业教师思政化”与“思政教师专业化”的双向结合，是达成课程思政全方位渗透的核心，能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技能训练、职业伦理及人生规划的整个过程。

（二）完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体系

政策和制度是思政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应对少子化造成的结构性改变，教育行政部门需结合高职教育特性制定分类引导政策，为院校营造差异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学校需建立完备的目标责任体系，把育人质量、课程改革、师德表现纳入综合考核，做到量化管理与持续提升。资金保障机制同样不可或缺，思政课程数字化建设、社会实践项目以及教师培训均需稳定资金投入。制度执行需融入过程监督和反馈优化环节，依靠设立问责与激励机制，使思政教育在制度框架中形成自我优化的循环系统。

（三）推动社会协同与文化育人共建

少子化现象的社会背景下，整合校外社会资源成为推动高职思政教育创新的关键路径。学校需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社会机构构建合作机制，共同创建社会实践基地，使学生能在真实工作情境里体会劳动与奉献的意义。社区教育与公共文化建设是文化育人的延展渠道，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和职业体验项目，既提升了社会责任感，又在交流互动中体会到社会认可与价值达成。校园文化建设需强化精神引导并打造良好氛围，利用文化节、主题展演以及社团活动构建积极向上的集体认同意识，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持续积累情感认同与价值追求。

（四）展望未来发展的创新方向

高职思政教育的未来走向，要以技术赋能作为根基，把系统协同当作核心。人工智能和学习分析技术的进步，让教育者可更科学地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达成精准指导，教学手段将愈发灵活多样，课程呈现由线下拓展至线上，由讲授转变为体验，应将思政教育进一步渗透到项目化学习和跨专业教学中，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体悟思想力量与社会责任，搭建开放式的社会协同网络，促使学校、企业、社区在共育体系里构建长效机制。未来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会摆脱单一学科的范畴，成为一项贯穿职业成长、社会参与和精神塑造过程的系统育人工程。

五、结语

少子化趋势下，高职思政教育的社会功能开始从“政治化表达”向“社会化实践”过渡，唯有在价值观念、教学手段和制度支撑方面同步开展革新，思政教育才能真正达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效果，凭借打造开放共享式的教育生态，加强校社间的合作，优化信息化支撑体系，高职院校可在生源减少的时代挑战下重新塑造育人价值。要不断促进教育质量和社会服务同步提高，让思政教育成为带领学生成长、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思政教育的价值不能仅停留在理论阶段，需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得以落实，只有使学生在现实社会场景里体会理想信念的力量，方可达成思想引导与职业发展的有机融合。高职院校借数字化改革契机，促进课程创新发展、机制优化升级和文化重新构建，使思政教育在新人口格局里彰显更长久的生命力与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谢含煜，杨慧．少子化进程下家校社协作育人的新思路及路径研究 [J]. 中华家教，2025(01):32-42.

[2] 朱高峰．论科学应对少子化对教育与产业和社会的影响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3):1-5.

[3] 程茹，李飞．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J]. 职业教育，2025,24(12):76-80.

[4] 廖佚．数智传播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策略探赜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07):89-95.

[5] 朱志强．高职“大思政课”善用社会大课堂的实践进路 [J]. 职教论坛，2024,40(12):113-11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少子化时代云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顿与破解研究”（BSZX202504）。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与社会教育力融合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陈姝娅

摘要：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承担着培育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社会教育环境多元化发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被赋予新的内涵，即通过教育链条上下衔接，实现价值观教育的系统化与协同性。本文立足教育与社会资源互动视角，分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基本特征与现实困境，探讨社会教育力融入其中的机制，并提出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认为，教育系统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育，是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统一的关键途径，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启发。

关键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社会教育力；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在新时代，我国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关键目的是消除学段隔阂，打造纵向承接、横向配合的育人模式。思政教育常被框定在校内课堂范畴，社会教育资源未充分利用，造成课程育人的广度与深度被约束。引入社会教育力，给思政课一体化增添了多元要素，其包含家庭教育、社区文化、媒体传播、公共活动等多方面力量，对学生价值观形成起到渐进式作用。这种结合既有利于增强学校教育的连贯性与体系性，又可有效填补课堂教学实践环节的短板，提升思政课在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方面的综合成效。本文试图借助剖析机制与探寻途径，解答怎样达成大中小学思政课和社会教育力的有效融合这一问题，为育人模式创新供给理论依据与实践助力。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涵与价值

（一）一体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思政课一体化在大中小学并非单纯的学段衔接工作，而是一项包含课程整体设计、内容体系谋划与实践路径革新的综合工程，关键理念为破除不同学习阶段的教育屏障，达成小学价值启蒙、中学价值接纳到大学价值自觉的逐级提升过程，该纵向贯通并非内容的生硬重复，而是依照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发展水准进行的逐步推进式安排，让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教材编排和课堂实施实现逻辑递进与有机结合。小学聚焦基础价值观的初步认知和情感体悟，中学阶段聚焦理性领悟与价值判别能力的提升，高校聚焦理论深化及实践转换，助力学生渐成系统且内化的价值观架构，依靠这种理念上的统筹设计，思政课可于教育全流程中持续产生功效，杜绝“前后割裂、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让思政教育切实成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力量。

（二）价值导向的整体育人功能

处于一体化体系当中，思政课不只是课堂里的知识传授，而是包含价值构建、人格塑造与社会责任感培育的系统性工程。凭借纵向连贯的安排，小学阶段学生可开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蒙学习，中学时期慢慢树立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理性认可，大学生则达成自觉的思想自信与历史责任担当。该设计维持了价值观教育的连续性，又推动学生认知与情感协同进步，思政课借助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与网络平台的协同配合，构建起“三位一体”育人模式，保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稳定[1]。

一体化打造突出“价值链条”的整体谋划，课程设计不单单围绕教材编排展开，还涉及师资队伍构建、教学方式创新与评价制度优化。小学教师更倾向运用故事化、生活化方式开展讲述，从而促进学生对真善美的感性领悟；中学教师借助案例讲解、辩论交流等途径，增强学生针对社会现象的思辨本领；高校教师重点引导学生在理论学习进程中提高分析与批判本领，借助社会调查、志愿活动等方式把价值认识转变为具体行动。经由这样构建出的“认知—理解—自觉—践行”完整路径，既提升了思政教育成效，又保障了价值导向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连贯性。

尤为关键的是，一体化构建着重与社会教育氛围开展交互，尽管学校课堂是核心场所，但学生价值判断会被社会舆论、家庭氛围、社区文化等左右，借助贯通教育环节，建立学校与社会的合作机制，思政课可把社会教育力量融入整体育人架构，达成课堂讲授与社会活动相互依托的格局。此种内外融合的价值指引，让育人作用从单一课堂拓展至更广泛的社会范围，达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成效。

二、社会教育力融入思政课一体化的必要性

（一）社会教育环境对学生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

信息传播在广度与速度上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学生价值观不再受限于课堂教学，而是同时受家庭教育、伙伴群体、社区氛围以及新媒体舆论的影响。学生社会化以家庭为起始点，对价值观形成起到无可取代的基石作用；学生成长的关键生活空间——社区，利用公共活动、文化氛围与群体沟通，逐渐塑造学生的思想品质；特别是新型社交平台，凭借高度实时性与大范围覆盖，对学生价值取向造成持久作用。处于如此繁杂的教育情境下，如果思政课与社会力量相割裂，学生于不同场景易接收冲突信息，会造成价值观混乱、认知失稳。把社会教育力融入一体化架构，既能缓和此冲突，还可凭借协同效应提升思政课的引导力与阐释力，让学生于多元信息环境下维持价值稳定与思想坚定。

（二）推动协同育人的战略要求

社会教育能力和学校教育目的在基本方向上呈现出高度契合性，二者均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及公民素养的增强，若能把社会资源高效融入思政课堂，会促使理论阐释与社会实践达成紧密互动，社会教育资源可给课堂教学增添生动案例与现实情境，让抽象理论不再空洞，与学生生活体验相融合，提升课程真实感与时代感。社会教育力量的介入可填补学校教育实践环节的短板，社区开展的志愿活动、社会机构举办的文化讲座以及媒体平台开展的价值传递，均给予学生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的契机，通过这些流程，学生在具体社会情境里体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作用，既强化了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又培育了责任感与公共意识[2]。

（三）适应教育现代化与多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单一依靠课堂教学已难以满足立德树人的系统需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如果脱离社会教育力的支撑，就可能流于“校内自转”，难以形成真正的教育合力。伴随社会分工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学生的思想形成正呈现跨领域、跨场域的特征，这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将社会教育资源引入，才能实现“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推动教育链条不断延伸，拓展课程外延，提升整体效能。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教育力的融入不仅是现实需要，更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抉择。

三、大中小学思政课与社会教育力融合的机制

（一）目标层面的协同建构

在育人目标的设计上，大中小学处于不同的学段，对学生思想品格的培养重点各有差异。小学注重价值启蒙，强调习惯养成与基本规范；中学阶段则聚焦理性认知和价值辨析，帮助学生形成较为稳定的思想判断；大学阶段则注重价值自觉和责任担当，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发展紧密结合。顶层设计的任务，就是在明确不同学段教育重点的基础上，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进行补充与强化[3]。例如，社区文化活动可以为小学阶段提供生动的体验平台，媒体传播能够辅助中学生理性理解社会现象，社会实践则为大学生实现价值转化提供现实舞台。通过这种纵向分层与横向整合的目标建构，不仅实现了教育任务的协同分工，也保证了不同环节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避免了教育内容重复或空白。

（二）内容层面的资源整合

课程内容的革新整合是达成机制创新的要点，不同学段的大中小学思政课应根据学生认知能力与社会关注焦点开展差异化规划，社会教育资源则刚好能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把社会热点事件融入课堂，既能够增强学生对课程的注意力，又能够让他们在认识社会实际情况的过程中强化理论认识。地方文化资源可助力学生从熟悉的生活场景里获取价值养分，强化文化自信和情感归属，引入社会实践案例，给课程增添了鲜活的现实依据，让学生在实际社会问题里思索价值抉择，聚焦环保活动、社区治理工作或志愿公益服务的实例，可使学生领悟社会责任与集体意识的意义，借助此类多维度内容融合，思政课可从抽象转变为具体，由课堂延伸至社会，让教育过程更立体鲜活[4]。

（三）方式层面的互动联动

在方法革新层面，融合机制突出学校和社会主体的双向交流。常规课堂一般困于教师单向传授知识，与社会教育资源整合，能够拓宽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学校可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按周期举办主题论坛，让学生在与社会人士沟通时得到多元观点；依托志愿服务，学生可在实践中强化课堂所学知识，达成知识与行动的契合；媒体平台可作为课程延伸的途径，利用特色节目、网络互动和舆论疏导，加大价值传播的范围和效力。学校需完善反馈体系，迅速把社会实践表现融入课程评估，促使课堂教学与社会体验达成良性互动。借助这种多层面、多途径的协同模式，思政教育摆脱了单一封闭状态，渐渐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舆论引导”相互配合的系统架构，由此构建起名副其实的校内外协同育人力量。

四、大中小学思政课与社会教育力融合的路径

（一）构建协同运行的制度保障

制度搭建是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和社会教育效能深度结合的必要基础，各教育主体合作机制存在分散化与碎片化状况，未形成统一的顶层谋划，为攻克该矛盾，需搭建跨部门的协调体系，带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社区以及媒体等多个主体协同运转。教育主管部门应颁布政策，界定各社会力量参与思政教育的责任范围与协作形式；地方政府可设立合作平台，按周期开展教育与社会主体的对接活动，构建信息互通与任务分配机制，只有依托规范化、长期化的合作机制，才能够保证校内外资源稳定流动，防止出现“临时合作、短期见效”的弊端，真正让制度优势转变为育人合力。

（二）完善多元化的课程资源平台

课程资源平台搭建工作，为思政课一体化和社会教育效能融合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传统思政课多以教材与教师讲授为主，内容更新速率低，无法契合学生对多样、互动学习的要求，打造区域性思政课程资源库，能对社区文化实例、社会实践活动、媒体传播素材开展数字化集成，实现统一存档并支持跨学段共用。区域内的红色教育基地以及地方非遗项目，可利用数字化平台转变成视频课程、虚拟陈列馆或案例文档，供大中小学教师按需选用，此类资源平台可提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适配度，还能于长期运转中持续拓展与完善，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让思政教育切实达成“常教常新”。

（三）提升教师与社会主体的协同能力

教师是思政课的核心把控者，社会教育工作者则是实践环节的关键引领者，若想让两者合作发挥实效，需着重提升协同能力。学校需激励教师深入到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里开展实践活动，掌握社会教育资源的运行模式，进而在课程设计期间更具靶向性地整合相关资源。可促进校本研习与社会实际培训相融合，既提高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以及课程研发能力，又助力社会教育从业者掌握基础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借助定时开展联合教研、共同建设课程和举办活动，教师与社会教育资源可逐渐构建稳固合作机制，防止合作仅具形式，最终真正达成资源和智慧的分享[5]。

（四）健全评价与反馈体系

对评价体系实施科学构建，是保障思政课与社会教育融合成效的关键要素。以往思政课评估重点放在知识把握与课堂表现上，缺少对学生思想认同确立、价值观构建以及社会实践能力的动态追踪，要探寻设立囊括课堂学习、社会参与及价值认同的综合考评体系。评估不能仅依据学生答题分数，需重视他们在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社区治理等活动中的真实表现，借助问卷调查、访谈沟通、实践记录等手段收集多方面反馈。评价系统须具备动态与发展特性，可依据学生成长进程作阶段性变更，让教育流程与反馈系统构建封闭回路。此类科学且合理的评价手段，既有利于课程的持续优化，还可促使学生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提升思想政治素养。

五、结语

社会教育能力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相融合，是新时代教育革新的关键趋向。借助制度规划与途径革新，能消除教育环节的分割，达成价值观教育的全面推进，引入社会教育力，既拓宽了思政课的范畴与内涵，又增进了学生的实践体悟与价值赞同。要在制度构建、资源统筹、主体协同及评价改良等方面持续用功，实现一体化思政教育与社会教育力量的深度融合，逐渐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社会协同配合、家庭积极参与的全方位育人体系，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以真正落实。要将信息化手段与区域教育特质相结合，持续拓展教学形式与社会实践环境，使育人体系更具灵动性和长久性，以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稳固的人才与思想支撑。

参考文献

[1] 李嘉妮，董向芸．系统研究视域下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构建路径研究 [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6(02):40-42.

[2] 秦晨晨．演进、困境、路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三维探赜 [J]. 品位·经典，2024(13):143-146.

[3] 肖坤．协同共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长效机制 [J]. 中国高等教育，2024(07):33-35.

[4] 高迎旭．新时代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问题及改进对策研究 [J]. 才智，2024(08):9-12.

[5] 李苗苗．新时代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建设策略研究 [J]. 新智慧，2023(28):53-5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大中小学思政课‘学段间衔接’优化模式研究”（25GXSZ052YB）；2025 年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项目“大中小思政课‘点—线—面’衔接机制研究”（25YTH13YB）。

（作者单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研究

邓天淋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由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其发展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明确发展方向、激发创新动力、提升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当前，面对阐释效果有待提升、育人模式亟待创新、场域适配尚需加强等现实挑战，需通过提升主体认知水平、强化实践育人、优化场域建设等途径，构建更加有效的价值引导体系，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承担着导向与赋能的重要功能。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或着眼于其与未来技术协同演进的耦合关系，或关注其与劳动教育的价值契合，或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如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向，而鲜有研究关注新质生产力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功能发挥过程中的动力机制。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系统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剖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重要性

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先进价值体系的引导与规范。通过有效的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创新动力和社会效益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提供价值导向，确保正确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伴随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存在盲目追求技术效率而忽视社会价值的风险。若不加以引导，易导致技术异化与发展失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1]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类发展主体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依托科研伦理教育与学术规范建设，提高科研人员道德素养，引导其既要勇于投身重大问题驱动的高价值研究，更需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避免研究方向偏离和资源浪费。同样，“没有新质产业作为载体，生产力的跃迁也将成为无源之水。”[2]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激励企业服务国家大局，践行社会责任，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助力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确保其发展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培育创新精神，激活动力引擎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理论思维是历史的，更是时代的，这就明确了：对理论思维的把握离不开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4]。思想政治教育凭借其精神塑造功能，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借助理想信念教育及宏观愿景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科研工作者、青年学生和企业技术人员等突破原有认知边界，主动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勇于探索未知、敢于攻坚克难。促进个体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它还着力构建激励探索、宽容失败、协同共进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宣传创新典范，激励创新成果，它能有效调动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创新潜力，推动形成崇尚创新、全员参与的良好社会风尚，将精神动力转化为实践动能，并不断延伸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调适发展伦理，协调社会效益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5]，其深层目标是构建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伦理与价值共识。面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需积极回应技术革新带来的伦理挑战，发挥其独特的伦理调适功能。它引导发展主体超越单一经济绩效导向，转向包含经济创新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社会综合福利目标，将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与民生福祉纳入核心价值维度。在企业层面，推动建立员工权益保障、环境责任与社会公益相统一的经营机制，这既有助于赢得社会信任，也能塑造积极的品牌形象；在科研领域，引导形成社会责任导向的研究范式与成果应用伦理规范，严守学术道德底线，维护健康的科研生态。当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责任伦理体系达成内在统一时，不仅能增强其公众认同感，更能实现经济效率、社会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协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价值整合与伦理调适，为新质生产力构建稳健的社会生态基础，使其既彰显技术进步的高度，又体现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温度。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但当前实践却面临多重困境，涉及主体认知、实践执行与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制约了价值引领效能的充分发挥。唯有系统剖析其结构性困境，方能寻求突破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一）主体对新质理念认知不足，价值阐释弱化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质态的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其丰富内涵与多维价值的阐释与传播，是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作用的重要前提。部分行为主体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有时偏向于技术维度。认知偏差导致对新质生产力的丰富价值意蕴未形成准确理解，不利于清晰把握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其价值引领可能只停留在一般性号召层面，未转化为具有感召力和针对性的生动叙事，削弱不同主体间价值共识的凝聚力。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不同主体对于如何理解并接纳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存在认知角度与接纳程度的差异。增进价值共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阐释能力与传播效能提出优化需求。

（二）新型生产关系实践融合受阻，育人效果稀释

高技能人才是连接技术创新和生产实践的关键，要推动高技能人才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持续加强改进、不断向上向好的态势，但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阻滞。少数企业或只注意到企业人才的技能培养，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提升团队协作效率上的意义；或固守陈旧的教育方法，未能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改变其思想政治教育策略，无法将价值引领有机嵌入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中，教育效果不彰。高校承担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但在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未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与学科教育融合不足，甚至在一些学科存在边缘化现象。这导致一些学生虽专业技术能力较强，但价值判断能力薄弱，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社会责任感有待提升，未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

（三）新质场域建设不完善，精准思政落实不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可供其持续发展的现实场域，“场域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场所，属于空间概念”[6]。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特点，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场域是以前沿科技创新与应用为核心活动、以高密度知识流动和网络化协作为组织特征的社会实践空间，这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精准灌溉”提供了价值契机。虽然当前许多场域建设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技术平台搭建和数字化升级，但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创新氛围尚未完全形成，面对新质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需求，特别是年轻科技人员的思想特点和接受习惯，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内容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对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中产生的价值伦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回应也尚需加强。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实践路径

为构建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体系，应遵循从认知奠基到实践赋能，再到场域优化的递进逻辑，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协同作用，形成价值引领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强化思政引领力，深化主体对新质理念认识

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才是基础更是关键。当前，“以人类尊严问题为主的科技道德问题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科技伦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越发凸显”[7]，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人才也需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正确价值观。为此，应着力推动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特别是在理工农医类专业中，教师应大胆创新教学方法，引入前沿技术案例，将科

技伦理、创新精神等价值理念自然渗透至专业教学中，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领悟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鉴于主客观环境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识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成规律、思想意识接受特点”[8]，需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特色思政课程，精准契合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的发展实际，系统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些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课程应重点解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国家战略定位，厘清其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深刻变革，进一步阐明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并选取元宇宙、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形态，深入探讨技术创新的边界、伦理准则及其与社会福祉的协同关系。

（二）加快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强化实践育人效能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进。企业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启智、以文辅政”[9]，在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中激励员工增长才干、提高个人素质，同时锤炼品德修为，筑牢道德根基。高校则需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在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深化学生对投身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的认识，增强其价值判断与是非辨别能力，从而培养出既掌握前沿专业知识、又具备坚定正确价值观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同时，应建立健全有效的反馈机制，依据反馈信息及时优化教育计划与实施过程。广泛听取并整合来自企业管理者、员工、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反馈意见，把握其受教情况的知晓程度、理解层次和践行效果，努力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知责、人人尽责的全员协同育人机制”[10]，以实现价值引领的持续改进与动态优化。

（三）完善新质场域，提升思政工作精确度

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刻改变着信息传播格局，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韧性传播体系。媒体应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先进典型，弘扬创新精神、责任意识等价值理念。通过生动报道科技创新成果、展示科研人员奋斗精神等方式，引导公众形成科学理性的认知和积极正向评价。同时，针对新质生产力相关议题在网络空间中易引发的技术伦理、数据安全、就业影响等焦点争论，要重视网络空间治理，“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11]，需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机制，对涉及前沿技术的争议性话题进行快速、专业的科学解读与价值澄清，及时纠正错误信息和不良价值观的传播。并且，“算法推荐、智慧课堂、数智技术等，可以极大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12]，应促进技术手段与场域特征的有机结合，积极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开发具有沉浸感的文化体验项目，使参与者在模拟的实践情境中直面诸如自动驾驶汽车的电车难题等伦理选择挑战，在具身体验中内化科技向善等价值准则。此外，应当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效融合，培育契合新质场域特点的文化形态，将价值引领融入科技文化节、创新成果展等文化实践，满足人们在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郑永廷，刘书林，沈仕海，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2 版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74.

[2] 王文霞，贾永飞，孙童童 . 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5,41(03):105-11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9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436.

[4] 习近平 . 论党的青年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44.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2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377.

[6] 高山，蒋林 . 网信领域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06):101-105.

[7] 周月华，郝晓琦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5(06):36-40.

[8] 邱洋海 . 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08):47-49.

[9] 杨方捷 . 以先进企业文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4(09):34-35.

[10] 王文华，胡宇慧，刘炯 . 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育人体系的基本原则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04):84-87.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41.

[12] 柯政，卢威，周洪宇，等 .2024 年中国高等教育重大议题与年度热点研究前沿报告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Z1):25-57.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价值引领视域下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苏卫涛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题。传统就业指导偏重技能与岗位匹配，忽视价值观和责任意识培养，易致职业选择短视。思政教育在价值引领和理想信念塑造方面作用突出，但在实践导向和就业转化上不足。价值引领视域下的协同机制，强调在就业指导中融入理想信念，在思政教育中嵌入就业元素，实现深度融合。本文从二者契合点出发，分析课程割裂、队伍协同不足、学生主体性不强等问题，并提出强化顶层设计、共建课程体系、平台融合和完善评价机制等路径。研究认为，通过价值引领实现双向互动，不仅能提升学生职业胜任力和价值认同感，还能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优化。

关键词：价值引领；高校就业指导；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普及，就业已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课题。高校就业指导在职业认知、规划与竞争力提升方面作用显著，但传统做法多停留在技能与岗位匹配层面，忽视价值观与责任意识培养，易使学生在就业中追求短期利益，忽略个人理想与社会需求的平衡。与此同时，思政教育在立德树人、价值引领方面不可替代，却与职业发展结合不足，导致学生在就业中出现“价值迷茫”。如何在价值引领下实现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命题。近年来，国外注重职业指导与人格教育结合，我国提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均强调价值与职业发展的统一。但整体而言，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拟在价值引领的基础上，梳理二者契合点，分析现实困境，并提出协同育人机制构建路径，为高校改革提供参考。

一、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契合点

（一）就业指导中的价值导向需求

就业引导并非单纯的就业咨询输送与职业能力培训，而是引领学生树立职业认知、进行价值选择的重要步骤，鉴于就业环境愈发复杂，学生除掌握简历撰写、面试应对等基础能力外，还需在求职择业时树立正确价值评判，高校学生于就业之际，往往要权衡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若无价值引导，易落入“职位合适即可”的功利思维，对职业蕴含的社会责任和长期发展潜力视而不见。就业指导的效能并非仅停留在回应“如何就业”，还在于引导学生思索“为什么选择这种就业方式”，若对价值导向有所忽略，就业指导将演变成单一化的技能培训，无法满足立德树人的核心要求。高校在就业指导工作中，需突出价值引领作用，引领学生树立恰当的职业理想与责任观念，帮助他们在职业发展和社会担当方面找到平衡状态，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贡献的契合[1]。

（二）思政教育中的职业发展元素

思政教育始终聚焦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培育，其主要任务是造就学生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向往，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思政教育和学生职业发展常缺乏紧密关联，造成教育内容缺少现实针对性，职业理想是人生理想的关键成分，若学生职业选择无理想作为支撑，价值观教育便难以实施。把职业发展教育要素融入思政课程，既能够提升教育的鲜活度与精准度，又可增强学生对就业指导的认可度，教师借助课堂融入就业实例、社会实践及职业伦理探讨，教师能让学生意识到职业选择不只涉及个人前程，还体现着社会责任与国家进步的价值，思政教育不只是理念的传递，而是行动的引导力量，可助力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坚持正确方向。

（三）二者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础

站在教育目标的维度审视，就业辅导和思政教育存在天然契合之处，就业辅导侧重于能力培育与职业成长，思政教育聚焦于价值观塑造与理想信念树立，

若两者独立运作，常引发“能力与价值脱节”状况：能力具备的学生可能在价值追求上出现偏差，有正确价值观的学生却可能缺乏实际就业本领。聚焦价值引领的协同育人体系，是化解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此机制要求把理想信念教育纳入就业指导当中，让学生在职业抉择时拥有价值评判能力；把职业发展元素嵌入思政教育里，让价值观从抽象概念转化，而是融入实际职业活动，借助此双向交互，可促使能力与品德共同提高，强化学生对就业方向的认知、职业的使命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尤为要紧的是，此契合还会助力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社会发展需求达成一致，促使学生成长为兼具职业素养与价值追求的高水准人才。

二、当前协同育人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

在不少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仍然由不同部门分管，缺乏跨部门的制度化沟通与协作机制。就业中心侧重岗位信息发布、简历指导和面试训练，而思政课教师则聚焦价值观教育和理论讲授，二者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这种“两张皮”现象使学生在学习体验中感到二者相互割裂：一方面，就业指导偏重技能层面，缺少价值引领；另一方面，思政教育重在理论阐释，缺乏就业导向。结果是学生在实践中无法将价值观教育与职业规划统一起来，育人效果大打折扣。

（二）课程体系割裂与内容交叉不足

课程体系的割裂是制约协同育人的突出问题。目前，就业指导课程多被定位为选修课或临时讲座，缺乏系统化、持续化的教学安排；而思政课程则以思想理论为主线，课程目标和内容框架较为固定，与就业指导的结合点不多。部分高校虽然尝试在思政课中加入就业相关案例，但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度融合。这种交叉不足的情况，使协同育人目标停留在文件或口号层面，难以落实到具体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反映，课程之间缺少衔接，学习过程中存在“碎片化”体验。

（三）教师队伍结构单一与协同不足

教师群体专业背景的差别，构成了协同育人的实际阻碍，就业指导教员大多出自就业中心或者学生工作部，知晓求职流程与政策规范，然而在思政教育领域缺少系统认知；思政教师擅长政治理论与价值教导，但对就业市场状况、行业发展走向以及职业素养标准缺乏透彻认知，因缺少共同的培训与合作平台，两者之间不易形成稳定的沟通与合作联系，常独立行事，教师协作欠缺，既对课程设计的深度拓展形成制约，又减少了学生得到系统化教育援助的机会[2]。

（四）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

协同育人机制存在的另一突出状况是学生主体地位不充分，目前课堂普遍以教师授课为主导，学生在就业指导课中大多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层面，在思想政治课程里缺少参与积极性和对现实的关注。大量学生表明，就业指导好似“求职技巧培训班”，思政课仿若“价值观理论灌输”，二者皆欠缺互动环节和自我探索的空间，这种由教师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兴趣不高、主动性欠缺，不能真正达成自我认同与价值追求，主体参与缺失的学习，难以引发深入的思想共鸣与职业规划主动性，减弱了协同育人综合成效[3]。

三、价值引领视域下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

协同育人机制高效运作，需要依赖系统的顶层规划，高校在整个育人体系中应界定就业指导和思政教育的双重功能指向，把它们作为人才培养的统一指向而非分散事项，高校可制定中长时段协同育人执行方案，建立跨部门联合机制，把就业指导中心、思政课程小组、学院辅导员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纳入协同框架，打造纵向联通、横向合作的制度格局。教育主管机构应当颁布配套政策，促进资源融合与制度革新，可于人才培养方案当中界定“价值引领 + 就业指导”学分需求，构建协同育人专项经费保障体系，借助考核办法推动学校落实，此方式既能防止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出现“两张皮”现象，又可为协同机制长期有效运转提供稳固的制度支撑。

（二）共建课程体系与融通教学资源

课程为协同育人最直接着力点，高校需促进就业指导课程和思政课程深度整合，联合开发“价值 + 就业”型课程，把职业抱负、职业道德与就业本领有效整合，把爱岗敬业、社会责任相关案例嵌入职业规划课程当中，把就业市场数据和职业发展路径分析纳入思政课，让学生在价值观教育中得到实践指引，在就业辅导中强化价值思索。课程规划需突破学科界限，聚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与体验式学习，杜绝课程目标的单一倾向，构建跨学科教学队伍，达成教师间互助协作与资源互通，让背景不同的教师施展各自优势，为学生给予多方面支撑，资源的整合流通，不但可提高课程成效，还可增进学生对协同育人的认可。

（三）依托平台融合拓展实践渠道

借助信息化方式，为协同育人创造新契机。高校可构建就业与思政教育融合平台，把招聘资讯、职业评估、线上课程和思政教育素材集中整合，达成数据共享与功能协同。依托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可综合学生的学习成绩、职业倾向测试结果、实践经历等多维度数据，为每位学生生成精准的学习与就业画像，进而推送定制化的价值观引导内容和个性化职业规划建议。同时，需要进一步拓宽实践途径，将平台与校企合作基地、社会实践项目深度对接，积极引导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社区基层治理、企业岗位实习等活动。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践行专业知识，既能锤

炼职业技能，又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真切体会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点，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的思政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双重目标[4]。

（四）完善评价机制与反馈调节

评价体系是协同育人落地的重要支撑，常规的就业评价多以就业比率、薪酬水平作为核心要素，思政教育评估却把重点放在理论分数上，两者均未关注学生价值观与职业素养的协同提升。为攻克此难题，高校要建立包含“职业规划能力—价值认同感—社会责任意识—实践参与度”的综合考评体系。评价途径不仅要包含量化指标，还需重视质性剖析，借助学生交流、同伴评估和实践总结，充分体现学生的成长态势，构建动态反馈体系，依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手段，达成“评—改—促”的循环改良，协同育人模式才能摆脱形式化弊端，切实让价值引领在就业指导与思政教育中的核心功能得以展现[5]。

四、实践案例与启示

（一）某高校“价值＋就业”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为推动课程体系变革，某高校积极推进“价值＋就业”一体化打造，专门开设“职业发展与价值引领”系列课程。该课程教学由思政教师与就业指导教师联合参与，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活动”三位一体式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既阐述职业发展路径和行业动态，又增添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等案例，促使学生在掌握就业技能之际，思考职业选择背后的价值指引。学生借由撰写职业规划书、开展社会调研和参与模拟面试等活动，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教学评价显示，该课程体系使学生的职业规划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得到有效增强，大多数学生认为它助力自身在就业抉择时形成更明确的价值评判。

（二）典型就业指导活动与思政教育融合案例

在就业服务开展进程中，该校把思政教育观念融入校园招聘与就业指导相关活动，以举办校园双选会为契机，学校邀请企业代表就“职业选择与社会责任”开展专题分享，表明职业并非仅是个人发展起始点，更是承担社会使命的关键途径，部分企业代表以自身经历为例，分享在职业道路上恪守职业操守与社会义务，使学生深刻领悟就业与价值相契合。学校借助举办“就业与理想”主题班会、模拟招聘大赛等活动，使价值教育与就业训练深度结合，此模式强化了学生对职业操守的领会，使他们在就业抉择时更重视个人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

（三）学生反馈与实践成效分析

为检测协同育人效果，学校对参与课程及活动的学生实施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多数学生觉得“价值＋就业”模式提高了他们的职业规划认知，又提高了对就业指导课程的兴致。近七成学生表明，开展就业探索期间更乐意主动考量“职业选择是否与社会价值导向相符”。部分受访学生表示，课程以及活动促使他们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战略更好地整合，树立了“个人奋斗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价值观念，学校发现部分参与实践的学生对职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求职规划更具长远眼光，基于价值引导的协同育人模式，不仅获得学生的理念认同，而且在实际作用上实现了学生职业能力和价值观的双重增进[6]。

五、结语

新时代教育形势下，把高校就业辅导和思政教育相融合，打造价值引领范畴下的协同育人模式，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办法，借助价值引导，就业指导不只是局限于技能讲授，还可达成对学生职业抱负与社会担当的培育；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理论传授，可在职业发展中落实到实践层面。该协同机制能有效增进学生职业胜任水平、价值认同度与社会责任感，助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全方位跃升，高等院校需不断完善协作途径，强化课程共同建设、平台整合及评价革新，促进就业辅导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创建科学、高效、可持久的育人架构，为社会培育兼具专业技能与价值追求的高水平人才。

参考文献

[1] 吴迪 . “互联网 +” 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创新探索 [J]. 科教导刊 ,2025(06):119-121.

[2] 何雷 . 新媒体时代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的融合探索 [J]. 中国就业 ,2024(11):86-87.

[3] 张程梦 . 高校整合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策略应用 [J]. 就业与保障 ,2024(07):169-171.

[4] 张伟 . 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创业教育协同育人研究 [J]. 大学 ,2024(24):36-39.

[5] 李常花 . “大思政课” 视域下高校的就业育人路径探究 [J]. 四川劳动保障 ,2024(10):97-98.

[6] 高杨杨 . 高职院校就业创业指导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02):186-189.

（作者单位：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朱　颖

摘要：融媒体时代推进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需依托新媒体技术探索实践路径。在构建兼具前瞻性、互动性与实效性的教育模式过程中，同步优化教育内容供给、创新传播载体路径、完善成效评价机制，可切实提升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与针对性，为新时代干部队伍思想建设注入动能，服务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大局。相关研究表明，融媒体技术既重塑信息传播格局与受众认知范式，还催生出互动性共情传导机制，为教育活动精准化、个性化开展夯实理论支撑。据此提出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平台优化与机制完善的实践路径，可为该领域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融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干部；创新路径

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度变革，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与实践场域。随着媒体形态日趋多元、传播渠道持续拓展，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相应转变，如何提升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吸引力与实效性，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突出战略价值，既是提升干部队伍素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的关键，也是支撑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与人才基石。依托融媒体技术突破传统教育局限，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高效创新的教育路径，既能为新时代干部思政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也能助力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融媒体赋能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逻辑

（一）融媒体重塑信息传播与认知模式

融媒体深度重塑信息生产、分发与接收全流程，对干部认知体系建构与价值观塑造具有深远影响。传统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常呈现单向线性特征，受众多处于被动接收状态，反馈渠道亦存在显著阻滞；而融媒体依托即时性、互动性等核心优势突破传播壁垒，使干部信息获取更高效且更契合个体需求，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干部学习与认知特征。教育者需据此创新内容呈现形态，依托短视频、直播等载体贴近干部工作生活实际，强化教育渗透力与辐射力，引导干部在复杂信息场域中构建健康思想认知。信息传递效率与认知体验的双重提升，既为思想引领目标达成提供支撑，亦推动思政教育进一步强化干部媒介素养与独立思考能力培育。

（二）互动性与共情机制的理论构建

融媒体环境中，多向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是激活干部学习内驱力的重要路径。传统干部思政教育多聚焦知识传递，对干部的情感体验及参与诉求关注尚有不足，融媒体技术则能有效支撑深度情感共鸣与思想认同构建，显著提升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1]。这类互动不仅体现为信息交流的便捷，更依托在线研讨、虚拟情境模拟、案例分析等参与形式，推动干部与教育内容建立情感联结，促使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情机制打破教育单向传播壁垒，推动干部成为教育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共创者，既强化教育内生动力、助力思想观念转变与行为养成，促成知、情、意、行有机统一，也让教育内容触达内心，激发学习热情与行动自觉。

（三）精准化与个性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匹配与个性化推送提供核心支撑。融媒体环境中，海量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可帮助教育者深度研判干部学习行为、偏好及需求，据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教育内容以提升实效。基于干部岗位特点、知识背景与思想动态构建的数字画像，能够智能推荐学习资源、定制学习路径，辅以个性化辅导与适应性测评，实现“千人千面”学习体验。这一模式不仅强化教育针对性、

激发干部学习内生动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因材施教与因时施教，还可通过教育资源精细化管理提升育人效能。

二、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构建

（一）创新教育内容：构建思想引领的“数字精品课”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在于教育内容，其质量与吸引力直接影响教育实效的实现。融媒体背景下，教育内容需契合时代发展步伐，依托高质量、具有感染力的“数字精品课”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与针对性[2]。这要求教育内容既需蕴含深刻理论内涵，又要创新呈现形态，贴合融媒体环境下干部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偏好。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且内涵丰富的数字精品课，能有效提升教育吸引力，推动干部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既保障思政教育的实效与长效，为干部成长提供持续思想滋养，也维系教育内容的时效性与鲜活度。

1. 价值导向的多元化呈现

运用融媒体叙事策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创新理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要素，嵌入微视频、H5、互动游戏、动漫、VR/AR 体验等载体，可有效提升教育吸引力。其既将抽象价值理念具象化，方便干部理解接受，潜移默化引导树立正确“三观”；又能把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感悟，推动价值内化，强化教育亲和力与感染力，助力思政教育“入脑入心”，激发干部文化自信与政治认同[3]。挖掘呈现干部身边榜样事迹，以真人真事增强教育代入感与说服力。

2. 知识体系的系统化重构

结合干部在层级、岗位与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搭建分层分类模块化在线课程体系，实现知识精准输送。传统学科壁垒下的知识体系难满足干部跨领域、复合型知识需求，系统化重构需整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专业能力与领导力培育、道德修养、法律法规及国际视野，融入案例分析、专题讲座与研讨交流，保障干部获取适配岗位职责与成长需求的专业知识及理论素养，构建全面渗透知识结构。这种重构兼顾知识广度且凸显深度与系统性，能培育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与履职水平，为担当新时代重任筑牢知识能力根基。

3. 实践体验的沉浸式设计

依托 VR/AR 技术构建情境模拟、红色教育基地线上漫游、虚拟党史馆及典型案例复盘等沉浸式思政学习载体，能有效强化教育代入体验。干部可于虚拟场景中沉浸式体验重大历史事件、典型案例与复杂工作场景，深化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认同，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针对应急管理、廉政风险防控等场景的模拟，干部在虚拟空间完成决策实操，可逐步提升应对复杂局面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体验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强化学习真实感与冲击力，在提升学习效果的同时激发干部责任感与使命感，推动理论学习落地为实际行动自觉。

（二）赋能教育技术：打造智慧互联的“教育大脑”

1. 大数据分析与学习画像

结合大数据技术，针对干部学习行为、偏好、成效、知识掌握、思想动态、职业发展路径及岗位实际需求开展多维度深度研判，构建个性化学习画像。该画像可精准推送学习资源、提供个性化指导，也能辅助教育管理者实时捕捉学习薄弱点、预判潜在思想倾向，通过精准化教育服务增强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海量数据挖掘推动教育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决策”，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撑的同时实现资源精准投放与效益最优，助力思政教育科学化、精细化发展，持续数据分析还能动态优化教育策略，推动教育模式迭代升级。

2. 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与互动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思政教育实践场景，借助 AI 智能导师开展定制化指引、依托智能问答实现即时答疑，搭配自动化批改、情感识别评估与个性化推荐，有效强化教育互动效果。其应用推动思政教育流程智能化与便捷化转型，及时响应干部学习诉求，以“一对一”精准教育赋能优化学习体验，同时弥补传统思政教育师资供给缺口，提升教育覆盖范围与可及性。依托智能分析为教育者提供教学策略优化支撑，助力教学相长与思政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如 AI 智能导师可依据干部学习进度与理解程度，提供定制化反馈协助突破学习难点。

3. 区块链技术保障教育生态

区块链技术可嵌入教育领域的学习认证、学分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教育资源共享、干部档案管理、教育评价溯源与学习成果互认等场景，为构建可信、透明且高效的教育生态提供支撑。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特性，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既保障学习成果真实权威、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以夯实干部思政教育可持续发展技术底座，又可破解传统教育信任与效率困境、拓展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依托去中心化学习履历系统保障干部学习成果终身有效性。

（三）优化教育平台：建设开放共享的“学习共同体”

1. 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空间

O2O 学习模式的构建，需将线上学习的便捷性、灵活性与线下研讨实践的深度、互动性有机融合。线上依托时空延展性，支持干部绕开地域阻隔与时间限制开展自主学习，线下交流能强化学习效果、深化理论认知，推动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的协同统一。线上可设置理论授课、专家专题讲座与在线研讨板块，线

下同步组织专题研讨、实地考察及红色教育基地研学，以线上模块与线下活动的顺畅衔接构建起全域学习场景，既适配干部多元学习需求、优化学习实效，也强化学习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最终达成立体化学习体验。

2. 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共享机制

搭建教育资源多方共建共享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切实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能。传统教育资源常分散于不同部门与机构，育人合力难以形成，依托统一资源平台与协同机制整合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机构及党政机关的精品课程、专家讲座、红色文化资源与实践经验，可推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此过程不仅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还能通过优化配置、规避重复建设提升教育整体效益，更可构建开放协作的教育新格局，保障教育资源公平可及。

3. 干部主体的参与式平台设计

引导干部兼具思政教育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身份，依托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拓宽教育内容维度并激活平台效能。传统场域中干部多被动接收信息，主动参与及创作空间受限，参与式架构可有效激发其主动性与创造力，为平台注入持续活力。干部在内容创作传播中分享学习体悟、制作微党课、参与主题研讨或开展在线答疑，既能深化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也能提升表达能力与影响力，推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角色交融，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以增强教育内生动力，使内容更契合干部实际需求、强化针对性与吸引力，进而提升教育成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学习生态。

（四）完善教育机制：打造科学高效的“评估指挥棒”

1. 多元化、过程性评估体系

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干部思政教育综合评估体系，覆盖学习过程、成效、能力进阶及思想蜕变等核心维度。传统评估多困于结果导向评价，难以完整呈现干部学习投入强度与成长路径，该体系通过整合学习时长、参与度、知识测试结果、行为表现研判，以及思想汇报、实践案例、领导力成果等数据，客观映射学习实效，打破单一指标局限，助力干部全面发展。动态多维度评估不仅能精准研判教育成效、持续优化教育质量，还能通过个性化反馈引导干部自我精进，最终形成干部成长科学档案。

2. 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制度保障

优化学分管理、考核激励及成果转化相关机制，可有效激活干部学习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潜能[4]。将思政教育成效融入干部考核、晋升、评优、职称评定与岗位调整各环节，既能引导干部主动投入学习，又能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进而形成正向激励闭环。对学习标兵、优秀学员开展荣誉表彰，同时配套深造机会与重要岗位优先推荐构成激励维度；将学习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并作为选拔任用重要依据形成约束维度，两类举措协同支撑科学教育管理体系构建，在保障教育实效的同时塑造长效学习机制，为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提供保障。

3. 组织领导与资源配置优化

党组织应重点引领思政教育创新，同步提供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协同推进思政师资队伍建设与教育技术设施升级，夯实创新路径落地基础。此类高位统筹与资源保障，是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政教育创新的关键前提，为创新举措实施提供支撑。健全组织领导体系与科学配置资源，引进高素质思政人才、搭建先进教育技术平台、完善专项管理机构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可确保教育创新方向正确、动力充沛，提升资源使用效能，为干部思政教育持续发展筑牢组织与物质根基，保障创新长效推进。

三、结论与展望

融媒体时代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的系统研究，需纳入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平台优化及机制完善等维度，这对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推动国家建设，强化干部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根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能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保障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5]。该领域未来研究与实践需多维度深化，应对跨文化交流中的思想冲击以平衡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提升干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辨别力，防范技术应用中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及信息茧房等伦理风险，还需细化政策建议确保创新路径实践生效，探索智能评估模型构建并推动思政教育与干部职业发展规划深度融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赋能[6]。

参考文献

[1] 赵军 . 融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实践路径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2,43(06):173-175.

[2] 孙巍 . 融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型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06):56-57.

[3] 崔春梅 . 文化自信视角下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J]. 品位·经典 ,2024(18):5-7,26.

[4] 崔芳智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探讨 [J]. 三晋基层治理 ,2025(01):124-128.

[5] 徐佳佳 , 刘锋 . 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应然、实然与必然 [J]. 中州学刊 ,2023(08):31-35.

[6] 罗茗兮 . 企业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08):79-81.

（作者单位：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以晋中市为例

田　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三新”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社会发展和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该群体在组织覆盖、权益保障及思想引领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已难以适应其流动性强、就业形态灵活的特点。本文以晋中市为例，深入剖析“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问题，针对性探索适应“三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径，提升该群体的政治认同、职业荣誉感与城市归属感，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

“三新”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从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一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社会发展和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出“要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2]等重要论述，为开展“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而针对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宣传党的理论方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确立正确政治立场，更涵盖了通过工会、人社等部门切实维护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实际权益，关注其心理压力与职业困惑以增强城市归属感，以及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将其转化为社会治理积极力量的全方位实践[3]。

一、“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实践背景

（一）国家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三新”群体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因其职业流动性强、组织形态松散、思想观念多元等特征，成为社会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党建引领，把新就业群体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如何在这一新兴领域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推动基层治理的内在需求

“三新”群体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和主要参与者，他们兼具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双重身份。在这些组织和群体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将这些社会治理力量纳入党组织覆盖范围，可以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优势[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5]。所以在“三新”群体开展党建工作，是落实和完善党中央基层治理体系决策部署的内在需求。

（三）群体现实困境的迫切呼唤

“三新”群体在为城市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保障不足、劳动权益受损、职业归属感弱等现实问题。在思想层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之下，劳动者容易产生焦虑、迷茫甚至对抗情绪。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难以完全覆盖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探索适应其职业特点和生活方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径、新载体。

二、晋中市“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截至 2024 年底，晋中市“三新”群体已形成覆盖 4021 个新经济组织、526 个新社会组织、124 个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庞大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其中新经济组织占比近 8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晋中市立足本地“三新”群体发展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形成了具有晋中特色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政策保障，创新服务载体

1. 加强顶层设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6]晋中市出台《晋中市“三新”

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筹协调、行业党委分类指导、基层党组织兜底管理的“四级责任链”，为“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2. 创新服务载体

推行“九有三化”标准（有组织架构、阵地、标志、队伍、版面、制度、活动、典型、记录，规范化、制度化、特色化），全市建成300余个活动站点，形成省、市、县、社区四级服务网络；设立考核激励制度，将“三新”党建纳入市、县、乡三级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权重提升至15%，并设立专项经费保障，2024年市级财政投入达860万元；实施“双招双引”“服务基层”“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典型培育”五大行动，建立1万余人的“三新”人才数据库，分类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选派1000余名“三新”代表担任乡镇街道特约人员，参与基层治理。

（二）加强理论武装，拓展阵地建设

1. 通过“三大工程”，创新理论武装

“头雁领航”工程，组织200余名“三新”领域党组织书记参加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培训，赴大寨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教学，培育“红色CEO”“先锋带头人”。“理论浸润”工程，如组建200余人的“同心圆”宣讲团，创新“情景式+沉浸式”宣讲模式。在平遥古城墙、推光漆器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开展“行走的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晋商精神、非遗深度融合。“数字赋能”工程，如开发“晋心向党”智慧党建平台，设置“云端课堂”“政策速递”“互动问答”模块，上线“二十大精神微解读”等系列课程，截至目前累计点击量超500万次。

2. 拓展阵地建设，打造“15分钟服务圈”

建设实体阵地“暖新驿站”“妇女微家”“司机之家”等服务站点420个，配备休息、充电、急救等设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贴心服务。依托抖音、微信等平台创建“红色直播间”，邀请行业专家、劳模工匠开展线上宣讲。2024年，晋中市妇联通过“晋姐姐直播间”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业”直播活动，吸引12万人次观看。

（三）推动治理融合，探索“三治协同”

一是党建引领自治。推行“支部建在项目上、党员聚在网格里”，在快递物流、电商平台等领域建立功能型党支部。二是法治保障共治。组建“三新”领域法律顾问团，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2024年，举办法律讲座80余场，提供法律咨询2000余次，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300余起。三是德治润化善治。开展“诚信经营示范企业”“文明商户”评选，培育行业新风。如平遥县推光漆器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带动销售额增长20%。

三、晋中市“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困境

晋中市在推进“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下列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有的统筹协调机制不畅，组织覆盖存在盲区

1. 组织覆盖不够全面

“三新”群体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传统的“单位党建”模式难以完全覆盖。全市新经济组织中约30%的小微企业因规模小、流动性强未建立党组织，个体工商户更是普遍缺乏组织依托，大量“隐形”从业者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

2. 条块结合不够紧密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与街道社区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存在“多头管理”或“都在管却都管不好”的现象，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除此之外，部分平台企业（尤其是外包公司）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为额外负担，对党建活动和权益保障工作配合度不高，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导致工作在企业端的“最后一公里”打通较为困难。

（二）有的吸引力感染力不强，内容形式缺乏创新

1. 教育内容过于生硬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多沿用传统体制内的宏大理论框架，语言体系较为生硬，未能充分结合“三新”群体的特点进行转化。对于从业者关心的劳动权益、职业技能提升、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政策解读和思想疏导。

2. 宣传模式缺乏创新

当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仍以“上课、宣讲、读文件、开大会”等传统模式为主，对“三新”群体碎片化时间和互联网工作的特征利用不足。虽然已创新了线上教育，但是手段相对单一，缺乏像短视频、直播互动、情景模拟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导致教育活动参与度低，甚至出现“被学习”“被签到”的应付心理。

（三）有的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权益保障存在短板

1. 职业保障体系不健全

2024年晋中市妇联调研显示，新业态从业者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关注度达82%，但现有服务中相关内容仅占15%。部分“三新”群体面临劳动强度大、社会保障缺失、劳动纠纷频发等现实问题。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导致工伤保险覆盖面低，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群体在遭遇交通事故或突发疾病时，往往难以获得足额的工伤赔偿，医疗负担沉重；另一方面，部分平台企业为降低成本，通过“众包”模式规避法律责任，导致从业者长期处于无劳动合同、无社保缴纳的状态。如果仅强调政治引领而忽视实际困难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就会陷入“空洞化”，难以真正入脑入心。

2. 人文关怀力度不够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线上工作的特性，使得“三新”群体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融入障碍。目前，针对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完善，缺乏专门的心理咨询与疏导机制，导致部分从业者长期积压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法律援助、职业技能培训等赋能服务供给不足，使得他们在面对劳动纠纷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直接削弱了他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基础，使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四、晋中市“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路径

晋中市的实践表明，破解“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难题，需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构建“数字化、分众化、协同化”的新型治理体系。

（一）构建“数字孪生”的党建体系

一是建设开发集党建宣传、学习教育、组织管理、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如 App 或小程序，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广泛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队，发挥新就业群体一线流动、走街串巷、熟悉社情民意的职业优势，引导其发挥“移动探头”作用，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矛盾纠纷化解等 [7]。

二是整合信息资源，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整合调动各类党建资源”“整合党建、政务和社会服务等各种资源”[8] 的规定，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和区（县）级党委社工部门党建资源整合优势，大力整合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党政机构、“三新”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不同性质主体所拥有的党建资源，发挥“1+1 ＞ 2”的资源整合优势，最终实现区域内各党建主体间资源的互通有无和共建共享。

（二）创新“线上 + 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一是丰富线上学习资源，通过制作短视频、动漫、VR 体验等多样化的数字学习内容，以生动形式传播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满足“三新”群体个性化学习需求。

二是开展线下培训活动，通过微课、场景教育等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定期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如在平遥古城、推光漆器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开展“行走的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晋商精神、非遗深度融合，进一步提高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三）建立“供需精准”的匹配机制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需求，从“三新”群体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建立动态数据库与需求反馈机制。依托网格走访、线上问卷、企业座谈等方式，全面采集“三新”群体的职业特点、生活痛点、利益诉求，按年龄、行业、地域等标签分类建档。重点关注群体在劳动权益、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

二是在党群服务中心、行业站点设置“需求收集箱”，开通 24 小时线上反馈渠道（如小程序、热线电话），鼓励“三新”群体实时反映问题。紧紧围绕业务发展需求制定党建工作计划，以党建工作服务业务工作，确保“三新”党组织各项活动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 [9]。

（四）完善“双向赋能”的激励机制

一是完善“三新”群体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可从政治引领、关怀保障、价值认同等维度设计，结合群体特点强化正向激励。如设立“最美骑手”“金牌司机”等荣誉奖项，定期开展评选表彰，将新就业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抢险救灾等行为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爱心商家折扣、生活用品、体检服务、停车优惠甚至子女入学、租房补贴等公共服务资源。二是通过建立清晰的激励机制，解决“担心影响收入”的后顾之忧，提升“三新”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0]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新”群体的结构与需求仍将不断演变。这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思维，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举措，引导“三新”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实现政治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臧秀玲 . 探索“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J]. 人民论坛 ,2025(07):78-81.

[2] 石国亮 . 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有效途径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4(25):14-16.

[3] 李艳 , 张军 . 新时代“三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思考 [J]. 理论导刊 ,2024(11):89-95.

[4] 王冠中 , 代文姣 .“三新”党建的生成背景、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 [J]. 新视野 ,2024(04):34-43.

[5]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EB/OL].(2021-07-11)[2026-01-26].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

[6]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2022-10-25)[2026-01-26].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7] 车磊 , 付汀汀 .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探索实践与深化路径——以深圳市为例 [J]. 岭南学刊 ,2024(01):67-74.

[8]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下转 237 页）

心理关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路径分析

陈晓雨

摘要：为了深度融合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人文关怀，文章围绕融合主题展开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融入路径：树立融合教育理念，完全突破思想引导和心理关怀分裂的认知，在理想信念教育领域渗透情绪管理、压力调适等内容；加强专业队伍建设，采用专题培训手段，大幅提高思政教师心理辅导技能；创新教育载体形式，创造沉浸式情境体验课堂，实现精准引导的目标；完善评估反馈机制，依托定期访谈、行为观察等手段，动态优化融入路径。上述手段实施以后，显著彰显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的协同效能，从而大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关键词：心理关爱；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关乎传递思想观念的深度，影响着受教育人员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现如今，伴随社会环境愈加复杂化，个体心理问题愈渐多元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只侧重于理论灌输，完全忽略个体心理层面的需求。心理关爱形式的出现，强调以理解和共情为核心，格外关注个体心理发展的规律和情感体验，不仅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贴合人性的切入点，还能筑牢思想观念的心理根基。因此，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融入心理关爱，则是当下有关人员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以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关爱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教育实效性，促进认知与情感协同发展

心理关爱强调以尊重个体心理规律为核心，精准了解受教育人员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后，可以为传递教育内容搭建桥梁情感桥梁，促进在认知层面的理解逐步推向更深层次的认同。一方面，采取共情式沟通、个性化疏导等手段，打消心理层面的抵抗，使受教育人员逐步放下心理方面戒备的同时，积极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以深刻认识教育传递的理念和规范。另一方面，心理关爱强调关注和接纳个体情感体验为核心，在肯定受教育人员感受和回应情感诉求后，能在教育人员和受教育人员之间联结情感，使价值引导更具情感温度，潜移默化对教育所传递的内容产生情感共鸣，逐步由被动接收转变成为主动内化层面。

（二）助力个体全面发展，培育健康人格与社会适应力

个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符合社会规范认知价值，还需要拥有健康人格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刚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心理关爱的融入，可以为两者培育提供协同途径。具体来说，采取常态化情绪疏导和心理层面的支持，可以辅助个体对负面情绪进行识别和调整，规避长期心理压力而产生人格偏差的问题。尤其是深刻理解规则意义的同时，还能逐步深化自身责任意识，既能时刻秉持价值原则，更能保障人格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个体对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和行为边界有正确认知，心理关爱则采用模拟情境分析、压力应对指导等手段，切实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进而在价值认同和心理调适协同层面实

（上接 236 页）

设工作的意见 [EB/OL].(2019-05-08)[2026-01-26].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08/content_5389831.htm.

[9] 刘振鑫，王金柱 . 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逻辑理路与优化路径 [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5,41(02):33-42.

[10] 习近平 .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J]. 当代党员 ,2018(19):4-11.

（作者单位：中共晋中市委党校）

现全面发展目标[1]。

二、心理关爱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理念认知存在偏差，重说教轻心理疏导

当前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中，存在理念认知偏差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融合断层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过于依赖以往说教式传递的形式，完全忽略了心理疏导层面的作用和价值。一方面，大多数教育人员仅限于规则传递优先的认知层面，已经习惯了采取单向宣讲、条文强调等形式组织开展教育活动，很少注重受教育人员在整个接收过程的心理状态，这样就完全丧失了教育内容的价值，很难逐步渗透个体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一些教育人员对心理疏导的认知过于局限，认为只需要存在心理困扰问题时介入即可，完全忽略了日常教育工作中心理关爱优先的重要性，造成整个教育活动过于表面化，很难进入深度认同的层面，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专业支撑体系薄弱，缺乏系统方法与人才

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关爱的融入，专业支撑体系过于薄弱，主要体现在缺少系统方法和专业人才。首先，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仅限于经验式探索层面，无法精准判断不同群体内在的心理特征，很难设计出差异化的关爱方案。尤其是并未严格把控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之间的共通点，致使思想引领方向不清晰，削弱心理关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互动效果。其次，现有教育人员固化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对于心理学基础理论、情绪疏导方法、心理状态评估等专业内容很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导致在面临受教育人员提出复杂心理诉求后，通常因缺少专业工具很难第一时间进行回应。最后，当前由于缺少常态化的专业培训体系协助教育人员提高自身能力，特别是不具备有关专业心理人才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员的协同联动机制，造成心理关爱的融入过于表面化，很难向极具深度的层面进行推进[2]。

（三）教育载体形式固化，与心理需求适配性不足

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极为固化，影响了教育载体和受教育人员心理需求之间的适配度。具体来说，个体接纳思想引导的程度，和载体的参与感、贴近感关系密切，若教育载体始终处于被动接收的单一形态，受教育人员很容易在缺少情感互动空间后产生疏离感，阻碍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关爱的渗透，导致受教育人员很难深刻感知内在的关爱理念。此外，不同个体由于自身经历、认知、处境差异显著，同样心理诉求的分化也极为明显。而单一固化的载体形式，不仅无法全域覆盖差异化需求，还不能参照受教育人员心理反馈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优化，导致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过于表面化。

（四）评估机制尚未健全，成效反馈缺乏精准性

现如今，心理关爱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后，由于缺少科学且完善的评估机制，成效反馈数据精准性较低。首先，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强调以是否完成教育流程、受教育者是否了解内容等过于表面化的指标为核心，完全忽略了心理关爱渗透的效能，很难全方位呈现融合工作的价值。其次，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效能拥有内隐性特征，其中不仅涵盖认知层面的细微变化，还包含心理层面的持续优化，但若只是评估阶段性的主观反馈信息，极易在信息偏差后影响判断方向的真实性。最后，现有评估结果和实践优化的衔接存在断层问题，导致心理关爱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很难用于包含实践、评估、改进环节的闭环体系，阻碍融合工作深化和效能提升的进程[3]。

三、心理关爱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策略

（一）树立融合教育理念，构建“思想—心理”协同框架

为完全突破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关爱脱节的认知，应该梳理融合教育理念，搭建包含思想和心理的协同框架机制。一方面，将心理需求作为思想引导的核心，在规范和理念传递的同时，在沟通中深刻了解个体在有关内容的心理预设，进而对传递方式针对性优化和调整。另一方面，在心理关爱层面将思想引导作为导向，避免陷入没有方向的情绪宣泄困境，尤其是在面临疏导心理困扰后，逐步渗透规则意义和责任价值，能实现协同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和思想认知水平的目标。

以“规范履职与责任意识”主题教育活动为例，围绕思想和心理协同框架设计出了多个环节，以深度融合心理关爱和思想引导。其一，教育活动前期，组织思政专员和心理咨询师成立小组，在整个访谈过后，发现一些人员在规范履职层面存有心理偏差，这些都会作为后期设计教育内容的参考依据。其二，在调研过后发现的问题，将教育活动划分成抵触心理、迷茫心理群体的专题座谈活动，以深刻理解规范的灵活性和必要性。其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结束后，组织人员依托模拟履职场景精准测试效果，并且布置了紧急任务，要求依照规范化流程完成多个环节的审批任务。实践证明，为促进规范履职的思想理念突破心理层面的局限，主要原因在于树立了思想和心理层面协同推进的理念，并未将教育作为单向传递的形式，强调以心理调研为核心需求，且采取分层引导的手段进行疏导和阐释，逐步由认同转化至践行层面。

（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者综合素养

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逐步渗透心理关爱，只有增强专业队伍建设力度，才能真正提高教育人员的综合素养。具体来说，依托系统化培训形式后，可以引导教育人员精准掌握心理状态评估、情绪疏导、共情

沟通等基础技能，规避不了解心理规律后产生思想引导固化、心理关爱形式化的问题。同时，带领教育人员学会在不同教育场景下灵活切换思路，显著增强协同运用能力[4]。

以围绕“教育专员素养提升”开展的专项培育计划为例，采用了分层赋能和实践打磨的方式，促进教育人员实现思想引导能力和心理关爱能力协同提升的目标。一是启动培育计划前期，单位采用模拟教育场景测试考察思想引导能力和依托心理案例分析问卷评估心理素养的形式，全面了解教育人员自身能力的不足之处，便于精准定位培育计划的核心目标，应该着重提高心理状态识别、共情沟通、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结合的技能。二是参考评估结果后，细化培训活动为基础普及和进阶融合层级。其中基础层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授课，其中包含了常见情绪信号识别、共情回应技巧等内容；进阶层则创设了“复杂场景处理工作坊”，激励教育人员设计出相对应的流程。三是在整个培训活动结束后，要求教育人员定期组织开展融合教育活动，并且编写过程记录和反思报告，其中应该涵盖受教育人员的心理表现、自身运用心理技巧、思想引导切入时机、最终效果等内容，使教育人员真正拥有懂得思想引导且学会心理关爱的综合素养，进而为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动能。

（三）创新教育载体形式，增强心理关爱的渗透力

将教育载体形式进行创新，不仅能加强心理关爱的渗透力，还能突破传统教育载体和心理需求适配度较差的困境，在思想引导层面自然而然地融入心理关爱。一方面，注重载体和心理需求层面的匹配度，参考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后设计相匹配的载体。另一方面，心理关爱和思想内容的融入，能规避载体形式和内容脱节问题，在载体场景下自然传递心理关爱内在温度，潜移默化地在载体互动中接纳思想理念。

以强调“责任担当与压力调适”为主题开展的教育活动为例，采用了“三维载体矩阵”创新设计的手法，在载体互动中深度融合了心理关爱和思想引导。首先，在数字化互动载体环节，企业开发出了轻量级线上互动小程序，其中增设了压力树洞和责任故事墙模块。整个过程不仅在匿名互动中缓解自身心理压力，还在故事分享中逐步渗透责任担当价值的思想认知。其次，在情景模拟载体环节，同步深化了心理体验和思想理解，参考线上所收集的压力场景，在整个活动中设计出了“责任情境沙盘”的线下体验活动，其中模拟了一些极为经典的场景，参与人员不仅能充分释放在真实工作中的情绪，还在复盘环节深刻理解了责任和支持、担当和方法之间的联系，同步推进了思想认知和心理调适。最后，在个性化载体环节，精准对接了心理疏导和思想内化，为每一位参与人员生成个人成长手册，在参考线上互动数据和线下情境表现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推动心理关爱和思想引导逐步延伸至日常生活范围，营造出长期渗透的效果。

（四）完善评估反馈机制，动态优化融入路径

为进一步保障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效能，不仅要对评估反馈机制进行完善，还需要对融入路径进行动态优化。具体来说，围绕心理状态改善、思想认知深化、行为转化效果层面创设指标，这样既注重了明显的行为变化，还能不断优化隐性的心理和认知；紧密结合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规避单一方法后产生信息偏差问题；将评估结果转变成为优化措施，使评估和改进拥有即时联动的效果[5]。

以面向“安全规范教育中心理关爱融入”的评估反馈机制建设为例，围绕三维评估、分层反馈、动态调整采用了闭环设计手法，不仅能精准识别融合中的问题，还能对实现路径全面优化。其一，在立体化评估指标设计环节，企业强调以安全规范教育为核心目标，围绕心理状态、思想认知、行为转化维度制定完善评估体系。其二，在多元化数据收集和分析环节，安全规范教育活动结束后，企业同步启动了评估体系，整体分析后发现教育互动中虽渗透了心理辅导，但缺少规范和销量冲突的认知困惑和自主践行规范的心理激励。其三，在分层反馈和路径优化层面，企业参照评估结果，面向情绪调节能力无提升、认知表面化、行为转化不足等问题进行持续改进。事实证明，落实完善评估反馈机制，能精准获取整个融合阶段的断层问题，显著提升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适配度，逐步从完成流程转向实效落地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深度融合心理关爱和思想政治教育后，强调以理性引导和人文关怀的协同推进为核心，既能显著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又能在个体认同价值和践行规范引导层面，助力个体心理和思想实现协同成长的目标，从而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稳固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晶莹 . 基于不同阶段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4,45(22):235-237.

[2] 广羽 . 心理关爱为职工思政工作注入“心”能量 [J]. 工友 ,2023(02):17-18.

[3] 赵琳 , 郑涛国 . 将心理关爱融入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J]. 工友 ,2022(07):44-45.

[4] 周丽红 , 杨健 , 邓国锋 . 双机制并举开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J]. 人民公交 ,2021(10):59-63.

[5] 陈梅 , 黄利 . 维护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的探索与实践 [J]. 企业文明 ,2019(09):49-52.

（作者单位：南京市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

“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在应用型高校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与路径

王春艳　双海燕 *

摘要：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在“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社会实践成为培育和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关键路径。本文深入剖析社会实践在坚定理想信念、洞悉国情民情、锤炼意志品格等方面的价值意蕴，系统梳理当前存在的育人主体协同不足、育人过程衔接不畅、育人内容深度不够、评价激励体系不全等现实困境，并从强化顶层设计、优化过程管理、拓展平台载体、完善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探索地方应用型高校社会实践育人的优化路径，为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三全育人”；社会实践；地方应用型高校；社会责任担当；育人路径

社会实践作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理论与实际的桥梁，在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社会实践育人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育人理念尚未完全转变，实践活动流于形式，育人效果难以量化评估等问题制约着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此背景，深入探讨“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价值与路径，对于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育人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立足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实际，系统分析社会实践育人的内在机理，探索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实践育人体系。

一、“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价值意蕴

（一）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社会责任担当的思想根基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地方应用型高校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关键期，社会实践为其提供了检验和升华理想信念的广阔天地。学生在乡村振兴一线目睹脱贫攻坚成就，在企业了解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历程，在社区服务中体会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这些鲜活经历比理论说教更有说服力[1]。走出象牙塔的学生在与人民群众深入接触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一位参与“三下乡”的学生说：“看到村民谈起生活变化时的笑容，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理论与实践结合催生思想升华，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面对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思考教育公平含义，面对环境污染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紧迫性，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飞跃，使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国情社情的深刻把握之上。

（二）洞悉国情民情：激发社会责任担当的内在动力

国情民情教育是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基础，地方应用型高校学生对家乡的朴素情感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升华为理性责任担当。社会实践让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道社区，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一位护理学专业学生因此选择报考乡村医疗岗位：“那些孩子渴望健康的眼神深深震撼了我，我要用专业知识守护他们的健康。”社会实践让学生看到真实的中国——既有现代化成就也有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有创新活力也有转型阵痛，这种全方位认知让学生理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内涵，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到基层就业、到西部建功。在社区养老、特殊教育、环卫服务等实践中，学生真正理解了“人民”二字的分量，培养了深厚的人民情怀[2]。

（三）锤炼意志品格：提升社会责任担当的综合素养

社会责任担当需要坚强意志品格支撑，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了在困难挑战中磨砺成长的机会。山区支教条件艰苦、企业实习任务繁重、社会调研屡遭拒绝等挑战考验着学生的意志力。一个护理专业团队参与农村健康扶贫时遇到医疗资源匮乏、卫生条件恶劣、

村民健康意识薄弱等困难，团队成员发挥专业优势反复修改健康教育方案、争取医疗物资支持、耐心进行健康宣教，历时三个月建立了村级健康档案，让基本医疗服务覆盖全村，学生不仅运用了护理专业知识，更学会了面对挫折和团队协作。意志品格锤炼是渐进过程，学生从初次实践的不适应到逐渐学会调整心态、克服困难，在企业实习中学会严谨细致，在社会调研中学会耐心倾听，在志愿服务中学会无私奉献。团队合作精神得到培养，学生在创新创业项目中学会分工协作、求同存异，培养了尊重他人、信任伙伴、承担责任等未来必备素质[3]。

二、“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现实困境

（一）育人主体协同不足：全员参与的合力格局尚未形成

在实践探索中发现，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社会实践育人工作仍存在协同不够充分的情况。一些高校的团委、学工部门承担了主要组织工作，而教务处、科研处、各专业学院的深度参与还有提升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专业教师参与指导积极性不高成为突出问题，多数教师认为指导社会实践是额外负担，既不计入教学工作量也难以产出科研成果，还要承担安全责任和经费压力，导致社会实践缺乏专业深度。校外资源整合不充分，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支持停留在表面，企业提供的多为简单重复性岗位，政府项目缺乏连续性，社会组织资源有限，这种浅层次合作难以达到预期育人效果。家庭教育作用被忽视，部分家长认为社会实践耽误学习时间，影响考研考公等“正事”，这种功利化教育观念与高校育人理念产生冲突，削弱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功能。

（二）育人过程衔接不畅：全程贯通的链条机制存在短板

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安排缺乏系统规划，多数高校实践集中在寒暑假，平时活动较少，呈现“断点式”特征，学生假期获得的体验回校后很快被课业压力冲淡，难以形成持续教育效果[4]。不同年级之间的实践活动缺乏递进性设计，大一到大四学生参与的活动在内容、形式、要求上差别不大，没有根据学生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进行分层设计，这种“一刀切”做法既浪费资源也影响育人效果，学生反映连续四年重复相似活动缺乏新收获。实践前准备、实践中指导、实践后总结等环节衔接不紧密，学生参与前缺乏必要培训，对实践的情况和任务认识不清，过程中缺少专业指导，结束后总结流于形式，提交报告了事，缺乏深入反思，这种“虎头蛇尾”的做法大大降低了社会实践的育人价值。

（三）育人内容深度不够：全方位融合的实践矩阵有待加强

当前社会实践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倾向，部分高校为完成任务组织“走马观花”式参观考察或简单志愿服务，学生到企业听场报告就算实习，到农村发放问卷就算调研，到社区打扫卫生就算服务，这种浅尝辄止的活动难以让学生真正了解社会、认识国情。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融合不深，理工科学生参与的多是与专业无关的志愿服务，文科学生实践缺乏专业指导，调研报告质量不高，这种“两张皮”现象既浪费实践机会也影响专业能力提升，计算机专业学生反映想用专业知识为农村电商发展作贡献，但学校组织的都是支教、普法等活动。实践内容缺乏时代性和创新性，活动年年相似，社会实践内容更新滞后，难以引导学生关注参与时代发展重大课题。

（四）评价激励体系不全：长效发展的保障机制亟待完善

社会实践育人效果评价体系不健全，多数高校评价停留在参与人数、活动次数、媒体报道等量化指标，缺乏对育人实效的深入评估，学生实践报告流于形式，指导教师评语千篇一律，这种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的评价导致活动陷入“为了实践而实践”的怪圈[5]。激励机制不完善影响参与积极性，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缺乏有效激励，虽有学分管理但学分设置偏低且考核标准模糊，对指导教师激励严重不足，指导工作不计入教学工作量也难作为职称评定依据，这种状况严重挫伤师生积极性。经费保障不足制约活动开展，地方应用型高校经费紧张，投入社会实践资金有限，学生交通费、食宿费、保险费等很大程度需自己承担，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造成压力，有的因经济原因放弃参与机会，这与教育公平理念相悖。

三、“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全员”协同的社会实践育人体系

构建“全员”协同的社会实践育人体系需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配合、院系具体落实、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学校党委应将社会实践育人纳入人才培养总体规划，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社会实践育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教务处负责将社会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设置学分，学工部门组织协调日常实践活动，团委统筹寒暑期社会实践，科研处将教师指导纳入考核，人事处制定激励政策。同时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建立教师担任实践指导的制度，鼓励教师将科研项目与学生实践相结合，如信息工程专业教师将智慧农业信息化项目转化为学生实践平台，既完成科研任务又培养学生能力。

地方应用型高校要主动对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建实践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和公益项目，如与有关部门合作建立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此外，还要发挥家庭的协同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向家长宣传社会实践的意义，建立家校联动机制，及时反馈学生成长情况。

（二）优化过程管理：打造“全程”衔接的社会实践育人链条

打造“全程”衔接的社会实践育人链条需要构建贯穿大学四年的递进式实践体系。大一以认知性实践为主，通过参观考察、志愿服务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大二以体验性实践为主，通过短期实习、社会调研让学生初步运用专业知识；大三以专业性实践为主，通过专业实习、创新创业提升专业技能；大四以综合性实践为主，通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培养综合素质。建立全过程指导机制，实践前组织安全教育、礼仪培训等系统培训，实践中安排校内外双导师指导，实践后开展交流分享和成果展示，如某高校的“实践导师制”为每个团队配备双导师全程跟踪。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践模式，建设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在线化管理，开发虚拟仿真项目让学生通过 VR、AR 技术体验实践场景。建立反馈改进机制，定期评估总结，建立实践育人数据库，每年召开研讨会探讨新思路新方法，形成持续优化的良性循环。

（三）拓展平台载体：形成“全方位”融合的社会实践育人矩阵

形成“全方位”融合的社会实践育人矩阵需要打造专业特色鲜明的实践平台。工科专业依托产学研合作让学生参与技术攻关，医学专业依托医疗机构参与健康服务，如某工科高校与装备制造企业共建“智能制造实践教学中心”，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学习实践。创新实践活动形式，除传统的“三下乡”、志愿服务外，组织参与“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专业 +”社会实践如“法律 + 乡村振兴”“设计 + 美丽乡村”等，推进国际化实践培养全球责任感。构建覆盖校内外的资源网络，整合实验室、实训中心等校内资源，加强与校友企业联系建立“校友导师计划”，拓展国际合作开展海外实践项目。建设数字化资源库，收集优秀案例、调研报告等建设开放共享平台，开发在线课程传播实践经验，建立项目库方便学生选择，如某高校“社会实践云平台”汇集近千个项目和上万份成果。

（四）完善保障机制：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实践育人评价闭环

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实践育人评价闭环需要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与结果、定量与定性、自我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体系，制定科学指标既考察参与程度和任务完成，更关注知识运用、能力提升和品格养成，引入第三方评价增强客观公正性。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将社会实践纳入培养方案设置必修学分，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在评优、推免、就业等方面优先考虑，将教师指导纳入工作量计算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倾斜，设立专项经费保障活动开展，建立风险防控机制购买保险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成果转化应用机制，鼓励将实践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科研论文、政策建议等，如学生调研报告被地方政府采纳转化为政策，建立展示平台举办成果展览扩大影响力，推动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构建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质量标准明确各环节要求，实施质量监测定期督导检查，建立效果追踪机制了解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不断优化方案形成持续改进循环。

四、结语

“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已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社会实践在坚定理想信念、洞悉国情民情、锤炼意志品格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本研究提出了构建全员协同体系、打造全程衔接链条、形成全方位融合矩阵、健全评价保障机制的优化路径。地方应用型高校要将社会实践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育人模式。

参考文献

[1] 赵婷婷，王宇翔 . 应用型高校“三全育人”: 特色定位、制度构建及实现路径 [J]. 高等理科教育 ,2025(01):64-70.

[2] 毋登辉，韩伟，郭雅荣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探究 [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1):156-160.

[3] 何婕 .“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研究 [J].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科研）,2024(03):133-136.

[4] 程洋 .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的“三全育人”实践研究 [J]. 中国军转民 ,2024(09):30-32.

[5] 檀军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实践育人机制创新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5,41(03):130-13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2023 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社会实践对地方应用型高校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的影响及路径探究”（KYZD2023049）；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2023 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类一般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地区高校为例”（KYYB2023062）。

（作者：王春艳，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双海燕，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地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以忻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杨　柳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在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方面起重要作用。高职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其思政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适配性，更影响着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综合素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的丰富内涵，正深刻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地方高职院校应当主动契合新质生产力要求，以改革创新激活思政教育活力，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思想认识，将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创新精神、协作意识融入育人全过程；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过程，结合专业特色设计实践化、场景化思政内容，打破理论与实践壁垒，最终培养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新质生产力；地方高职院校

一、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改革的内在逻辑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是培养能够开展创新性劳动、连接技术发展与实践生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与产业对接最紧密，对经济促进最直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除了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德”。而“立德”的主要教学环节就是思政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提高德育效果，其内在逻辑有以下三点：

首先，新质生产力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建设锚定了发展方向。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创新的主导是人才，人才的摇篮是教育。无论什么形式的教育，都是为了输出人才。无论什么领域的人才，都要与时代的要求相匹配。高职院校承担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无论是学科教育，还是思政教育，高职院校都要在响应时代号召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开展。在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高职院校要适应新需求，把握新趋势，展现新面貌，培养新人才[1]。

其次，新质生产力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涉及的领域更具前瞻性，技术含量显著提升，为思政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等新技术的引入，使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教学资源更丰富、教学内容更优质、教学形式更多样、教学方法更科学、教学反馈更及时。更好的教育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科技来反哺教育和人才输出，最终实现“以新提质—以质促新”的正向循环。

最后，新质生产力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的不断升级，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就像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争议一样，科技创新必将引发观念革新。但是，如何面对新旧观念的碰撞和交替？如何平衡科技发展和人本主义的融合与矛盾？“机器灵长类”的迅猛发展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有何变化？……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数不尽的全新议题，值得广大思政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研究。

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地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提升空间

（一）学生层面

高职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在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海量信息与多元价值观念持续冲击下，虽拥有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

却普遍缺乏成熟稳定的价值判断、理性思辨与信息筛选能力，这对新时代思政教育的精准性、引导力与实效性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现实要求[2]。

高职学生大多都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平时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专业知识、练职业技能上，想凭借多考几个证书、多参加几场考试，为以后找工作多添点优势，可往往没意识到，思政教育对个人品格养成、职业素养提升，以及长远的职业发展都很关键，也需要多引导他们主动去认识、去参与思政学习[3]。

高职学生向来有着强烈的实践意愿，动手操作能力也比较突出，学习中更看重知识能不能用到实际场景、能不能转化为实用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对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开展路径，有着明显的实践化诉求，思政教育也因此需要紧扣这一特点，强化实践导向，精准贴合学生的认知习惯与成长规律，真正把育人实效落到实处。

（二）教师层面

高校思政教育始终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为双轮驱动，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为整体育人工作筑牢支撑根基，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需进一步打破壁垒，深化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各类课程间的协同联动性，让思政育人的整体效能得到充分激活，这一发力方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思政课教师理论功底扎实、教学执行规范，但因面向多专业授课，在内容设计上难以精准匹配各专业实践特征，需结合不同专业属性优化教学素材与案例体系，推动思政教学与专业实践精准对接、有机融合。高职学生注重实操应用，同质化教学内容难以满足不同专业的实践诉求，应依据专业差异优化教学设计，工科可结合工程伦理与工匠精神，商科可围绕行业规范与社会责任展开，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适配性。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只有真正走到一起、共同打磨贴近行业一线的教学案例，才能让思政内容不再悬浮于理论，而是扎根在学生的专业学习之中，让价值引导更实在、更有说服力，从根本上提升育人效果。

高职“双师型”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教学与实践指导能力，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仍处于探索阶段，对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尚显不足，融合设计与实施能力仍需系统提升。部分教师对新时代育人要求的理解仍不够深入，对育德与育才的内在逻辑把握不足，教学设计中对思政元素的融入路径、实施方法与评价机制不够清晰，在课时配置、融合形式等方面仍需优化，以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协同、同向育人。

（三）客观因素

新媒体与数字技术为地方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创新注入了鲜活动力，多数院校虽已主动引入这类新技术助力思政教学，但实际运用中仍存在落地浮于表面、运行保障薄弱、育人成效不明显等现实问题，唯有搭建完善的支撑体系、细化可落地的实施路径，才能让技术赋能真正落地生根，切实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实际成效。

1. 资金保障

新技术的应用依赖软硬件协同升级，地方高职院校虽在积极筹措资金推进信息化建设，但资金投入缺乏稳定长效机制，技术更新步伐较慢。只有完善持续保障体系，加快数字化教学场景建设，才能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作用，提升办学质量，促进区域高职教育均衡发展。

2. 师资力量

地方高职院校新入职教师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新技术接受度高、掌握速度快，能够主动探索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但在教学实践中，仍需进一步深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升教学资源整合能力及新技术应用的实操水平；地方高职院校的资深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夯实了扎实的教学功底，这是他们开展教学工作的核心底气，但面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导向、新要求，其新技术应用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需借助技术赋能打破传统教学的局限，让课堂更具活力，真正实现传统教学优势与现代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教学实效。

（四）观念层面

思政教育提质增效进程中，一线教育工作者正主动探索新技术、新方法与教学的融合路径，但在科技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探索中，仍需进一步明确思路、精准把握应用尺度，摒弃极端认知，让技术赋能真正服务于思政育人核心目标，避免形式化应用。

一线教育工作者在实践探索中，需明确新技术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定位，明确其为提升教学实效的重要赋能手段而非唯一解决方案，同时在学生学习情况分析中，需优化数据采集与分析模式，兼顾定量数据与定性评价，提升教学效果研判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线上思政教育开展的核心是聚焦活动形式创新与内容深化，摒弃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传播优势，杜绝形式化、走过场现象，实现教育途径的拓展延伸与育人实效的稳步提升。

三、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实践路径

（一）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思想认识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侧重简单重复劳动的普通从业者转向能够引领创新的高端人才。但“人无德不立”，国家战略人才不仅要专业技术过硬，更要以德为先。“大国重器”的建成离不开“大国工匠”的付出，以“工匠精神”为代表的思政教育主题，完美契合了当前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导向和国家战略

的需求导向，也与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相一致。“工匠精神”等一系列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学生的思政教育提供重要支撑。因此，各种形式、各阶段和各层次的教育从业者，都应当充分认识思政教育在新时代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高职院校应以育“智”为基础、以育“志”为引领、以育“质”为目标，全面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另外，必须认识到，使用新科技的主体永远是人，是人在发展和使用新技术，而不是新技术在制约人。不是没有新技术，思政教育就不能发展，教学效果就得不到提升。要引导师生正确看待科技创新为人类社会活动包括教育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要利用好新技术，提升思政教育成效。

（二）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过程

一切教育投入都是为了人才输出，只有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人才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因此，思政教育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则要遵循“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建设思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也就是要求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这也是对高职教育的新要求。因此，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方面，高职教育要先进行“反向设计”。

（1）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能力？怎样才算有创新能力？如何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

（2）根据对创新能力的理解，需要设置哪些课程，以及如何开展课程才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比如，增加实践探究课程而减少理论说教课程？用论文或者作品等更丰富的评价形式替代单一考试？如何评价这门课程的教学方式是否真的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

（3）根据对课程体系的认识，应当要求学生在毕业时获得哪些方面的成长？

（4）根据毕业要求的内容，应当设定怎样的中长期人才培养目标？

当明确以上问题之后，就可以开始“正向施工”。

（1）做好顶层设计，对标新质生产力理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设置中长期人才培养目标；

（2）校内每个院系都以新质生产力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根据专业特点，设定毕业要求，明确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水平；

（3）为了充分利用在校期间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达到毕业要求，要合理确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课时学时和课程考查方式等；

（4）制定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科学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实施方式和评价形式，最终面向学生展开教学过程。

以上内容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未来几年的培养纲领，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时的更新和持续的完善。经由上面的过程，就可以自然地将思政教育目标融入人才培养目标中，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基础。

（三）重视劳动教育，推进“学思一体”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这就是说，只有寓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将学科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建立并完善“学思一体”共育机制，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而推进“学思一体”，就需要寻找合适的“学思融汇点”。而相比于其他教育形式，高职教育有其鲜明特点，其中劳动教育可以说是最具特色的教育形式。相较于高等教育，劳动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是“产教融合”的主阵地。赵希彦等提出，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育人”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之需，也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应当加快培育“政校企”协同共育教育生态、完善“专劳融合”育人综合体系 [4]。陈醒和倪淑萍等也分别提到，要将劳动教育有机地嵌入校内日常管理、教学活动、志愿服务、实习实训和创新创业等环节中，培养新质技术技能劳动者，塑造新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技能观和劳动素养观 [5]。

四、总结与展望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极其重要，且影响深远。地方高职院校进行思政教育改革，应当在充分把握新质生产力丰富内涵的前提下，提高站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政育人观念；结合自身实际，精准设定育人目标，科学构建育人体系；有机融合学科教育和思政教育，建立“学思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新质生产力理念将为地方高职院校在思政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新”的提高和“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李科 . 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价值意蕴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5(01):33-49.

[2] 郭宇 . 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进课堂现状与对策 [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24,32(02):40-43.

[3] 陈绮维 . 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心理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02):33-36.

[4] 赵希彦 , 李云飞 , 田晓玲 . 高职院校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育人的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2024(14):66-72.

[5] 陈醒 , 陈凤英 . 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何以实现质变式发展——基于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 [J]. 教育与职业 ,2024(13):31-38.

（作者单位：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心理育人理念下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创新研究

——以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为核心

张　扬

摘要：针对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传统模式与学生心理、思想成长需求的适配难题，本文以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为核心，从新时代心理育人的理论内涵、辅导员思政工作基本原则、创新策略及应用效果四方面展开研究，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分阶段培育、精准帮扶等方式构建“心理＋思政”协同育人体系，最终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思想认知水平双重提升，营造良好校园生态，为社会输送兼具健康心理与正向价值观的优秀人才，也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新时代心理育人；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创新；心理疏导；思想引领

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学生承载着学业负荷、就业竞争、人际往来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心理健康维护与思想培育的现实诉求日益突出，心理育人作为高校育人体系的关键组成，与思政工作的深度交融构成辅导员工作革新的核心方向。本文以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的双重视角，从新时期心理育人的理论内涵切入，探寻心理育人理念下辅导员思政工作需遵循的基本准则，进而提出资源整合、分阶段引导、精准支持等革新路径，分析这类路径在学生成长赋能、校园生态优化及社会人才输送层面的实践成效，为高校提升思政工作实效、培育全面发展的青年人才提供参考依据。

一、新时代心理育人的理论内涵

（一）心理育人的核心指向

心理育人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传统心理干预的局限，向全面人格培育拓展，传统心理干预常聚焦已显现的心理问题，侧重疏解情绪、化解困扰，新时代心理育人则更强调前置性、发展性培育，将心理健康教育嵌入学生成长各环节[1]。既关注情绪调控、压力处置等基础心理能力培育，也延伸至健全人格塑造、价值观念引领、社会适应能力养成等维度，借多元形式助力学生构建积极自我认知、健康人际交往模式与理性人生规划认知，推动学生在心理层面从“无困扰”向“能成长”“善发展”转变。

（二）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的内在关联

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的内在关联，体现在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的功能互补与机制协同中。心理疏导聚焦个体情绪起伏、心理疑难等具象问题，凭专业方法舒缓负面情绪，修复心理失衡，筑牢心理根基。思想引领则针对价值观塑造、理想信念教育等精神层面，借理论阐释、价值引导明晰人生方向，提供精神依托，在实际工作中，心理疏导为思想引领搭建情感桥梁，思想引领为心理疏导提供价值坐标，二者彼此渗透，共同构成思政工作的双重要素，形成兼顾心理需求与精神引导的育人闭环。

（三）新时代心理育人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心理育人的时代价值，体现在精准回应青年成长诉求，借科学的心理疏导方式帮助高校学生缓解在学业、职业规划、人际往来等方面的压力，筑牢成长心理根基，增强应对挑战的心理韧性，其与思政工作的交融可营造尊重关怀的校园氛围，推动良性人际互动，助力校园和谐稳定。从社会维度来看，通过心理育人培育的具备健康心理、正确价值观的青年，步入社会后更易适应节奏、担当责任，还能凭积极心理品质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建设，助力公益事业，契合新时代高素质青年培养标准。

二、心理育人理念下辅导员思政工作需遵守的基本原则

（一）立足学生心理诉求开展个性化思政引导

立足学生心理诉求开展个性化思政引导，需精准把握不同学生群体的心理特征与需求差异[2]。学业关

键期学生易因考试、科研压力产生焦虑情绪，毕业季学生常因就业竞争陷入迷茫，部分学生还会因人际、家庭因素出现情绪起伏。思政引导需摒弃统一范式，结合学生专业背景、性格与成长经历设计方案，为陷入学业焦虑的学生融入学业规划指导以舒缓情绪，为陷入就业迷茫的学生剖析行业趋势、解读职业需求以建立合理预期，让思政引导贴合实际诉求，实现从解决学生心理诉求出发的个性化培育。

（二）整合心理教育与思政资源构建联动机制

协同共育原则要求打破心理教育与思政工作之间的壁垒，整合高校内部各类资源，梳理心理健康中心的测评系统、团辅课程等专业资源，与辅导员思政工作涵盖的主题教育、价值观引导相衔接，构建互补资源库。同时搭建跨部门联动机制，推动辅导员与心理教师开展常态化沟通，通过案例研讨、联合制定方案实现方法互渗，联动专业课教师、行政人员在教学管理环节融入心理关怀与价值引领，使二者在资源共享、流程协同中凝聚合力，保障育人目标高效落地。

（三）聚焦学生成长痛点彰显服务属性

公益导向原则要求以解决学生成长痛点为思政工作着力点，借多元服务彰显公益属性，针对学生在学业、人际、职业规划等方面的痛点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依托校园公益平台开设心理思政咨询专场。为经济困难、学业困难、就业焦虑学生设计专属方案并提供一体化服务，联合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心理机构引入外部资源，开展公益讲座、团辅等活动，将思政教育融入解困过程，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困难，体现思政工作服务学生与社会的公益价值。

三、新时代心理育人理念下辅导员思政工作的创新策略

（一）搭建全员参与的心理思政育人平台

为搭建全员参与的心理思政育人平台，需系统梳理并整合高校内外资源，校内将心理健康中心的专业测评工具与咨询服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理论课程资源、各专业院系的行业前沿案例及校友资源纳入其中，构建覆盖学生心理发展与思想成长的资源矩阵，校外对接地方红十字会、心理健康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引入公益心理讲座、思政实践项目等外部资源，进一步拓展平台服务维度[3]。平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上依托校园智慧思政系统搭建资源共享模块，分类上传心理疏导指南、思政主题视频与公益服务信息，支持学生自主学习与预约服务，线下在教学楼、宿舍楼设立心理思政服务站，配备专业心理辅导员与思政教师轮值，定期组织团体心理辅导、思政话题研讨等互动活动，吸引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学生骨干及社会志愿者参与运营，通过资源有机整合与平台实体化运作，实现育人力量全员覆盖与资源高效利用（见表 1）。

表 1　高校心理思政育人平台资源整合与运营数据表

资源类别	校内资源数量（项）	校外资源数量（项）	线上资源访问量（PV）	线下服务参与人数（人）	资源整合效率（项/月）
心理测评工具	3	2	1200	150	5
思政理论课程	5	1	1800	200	6
行业前沿案例	4	0	1500	180	4
校友资源	2	1	1000	120	3
公益心理讲座	0	3	800	100	3
思政实践项目	0	2	900	110	2

（二）开展分阶段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

在学生成长全程进行分阶段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根据大学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与成长诉求建立梯度化育人体系。在新生入学阶段，聚焦环境适应与角色转变，通过心理普查识别适应困难学生，依托新生导航课程增强学生的集体归属感，结合宿舍人际关系调节、学业规划指导缓解学生面对陌生环境的焦虑情绪，助力学生在大学树立正确的成长目标[4]。在学业提升阶段，围绕专业学习压力、自我价值认知等核心问题开展“学业压力疏导工作坊”，通过分析专业发展前景强化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同步融入工匠精神、学术诚信等思想引领内容，引导学生在应对学业挑战中建立积极心理品质。在毕业就业阶段，针对职业选择迷茫、求职挫折应对等问题和话题，组织职业心理测评与求职压力团体辅导，通过就业政策解读、职业价值观教育传递正确择业观，通过分享优秀校友职业发展案例增强学生的就业信心，让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伴随学生成长的关键节点，形成覆盖“入学—在校—毕业”全周期的育人闭环。

（三）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思政帮扶服务

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全方位精准化思政帮扶，首要工作是搭建动态识别体系，整合学生日常行为表现、学业发展数据、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家庭环境背景，精准定位经济存在困难、学业遭遇瓶颈、心理产生困惑、为就业感到焦虑的各类群体，为每位学生建立专属帮扶档案，清晰界定具体需求与帮扶目标。心理疏导环节需依据不同群体的心理特质制定服务方案，针对经济困难学生开展自尊自信培育工作，使其塑造积极心理品质，针对学业受挫学生开设学习方法指导课程并开展心理调适培训活动减轻其焦虑状态。思想引领环节围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核心痛点设计特色活动，组织为就业感到焦虑的学生参与行业榜样分享活动，依托优秀校友的成长经历传递积极就业理念，为存在心理困惑的学生组建同伴互助小组，深化其正向价值认知。协同学校资助管理中心、学业指导中心、就业服务部门及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提供经济资助

支持、学业专项辅导、就业机会推荐等多元服务内容，构建“心理疏导 + 思想引领 + 实际帮扶”的全方位服务框架，保障各项措施与学生实际需求精准匹配，有效解决特殊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现实困难与思想困惑。

四、新时代心理育人理念下辅导员思政工作的应用效果

（一）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思想认知水平的双重提升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思想认知水平的双重提升体现在日常学习生活的多个维度，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及未来发展焦虑，学生能主动运用心理疏导中习得的情绪调节方法，通过合理宣泄、认知重构等方式缓解负面情绪，而非陷入自我否定或消极回避，心理韧性与抗挫折能力显著增强，校园心理咨询中心的主动求助率提升，因心理问题导致的学业中断、人际冲突等情况明显减少[5]。在思想认知层面，融入心理育人的思政教育活动使学生对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公益事业的理解不只停留于理论层面，还能结合自身专业与成长经历，认识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内在联系，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社区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增强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与践行意识，面对网络谣言、错误思潮时能保持理性判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心理健康与思想成长的同步推进（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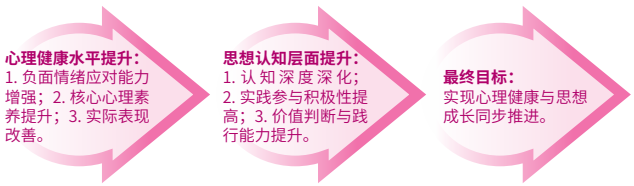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思想认知水平双重提升示意图

（二）形成心理共育与思政融合的良好校园生态

心理共育与思政融合的良好校园生态，体现在校园文化场景中处处渗透心理关怀与价值引领的双重元素。校园宣传栏不再仅是展示思政理论知识，而是增设“心理能量加油站”板块，分享情绪调节技巧与积极成长案例，让学生在驻足阅读时既能接收思想养分，也能获得心理支持。校园广播可开设“心灵树洞 + 思政微课堂”栏目，在倾听学生通过匿名方式讲述心理困惑并给予其温和回应的同时，结合社会正能量事件解读主流价值观，使心理疏导与思想引导自然融入日常校园生活[6]。课堂之外的各类校园活动可围绕“心理 + 思政”主题设计，比如“红色经典观影疗愈”活动，组织学生观看革命题材影片，引导学生分享观影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将对红色精神的感悟与个人心理成长相结合。“公益心理帮扶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走进社区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与心理陪伴，在开展公益服务的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塑造积极心理品质。这种生态下，校园内师生间的互动更注重情感共鸣与思想交流，辅导员与学生进行谈心谈话时不仅关注学业进展，也会主动询问心理状态，用共情式沟通表达对学生的理解与尊重，专业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也会结合学科案例融入心理调适方法与价值导向，使心理共育与思政融合成为校园内全体成员的共同行动，营造相互支持、积极向上的校园成长环境。

（三）为社会输送兼具健康心理与正向价值观的优秀人才

为社会输送兼具健康心理与正向价值观的优秀人才，体现在学生在步入职场后，能以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应对工作压力与人际关系挑战。面对项目攻坚、岗位调整等情况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企业发展注入稳定活力；在基层服务领域，他们凭借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同感与担当意识，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工作，在处理邻里矛盾、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开展帮扶弱势群体等事务时始终坚守公平正义原则，用耐心与责任感服务群众；在创新创造领域，他们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抗挫折能力，敢于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在科技研发、文艺创作等领域勇于尝试，即便遭遇实验失败、作品不被认可等情况，也能快速调整状态持续投入创新实践，同时始终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社会进步相结合，确保创新成果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为社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五、结语

新时代心理育人与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的融合，是回应青年成长需求及社会发展诉求的重要实践。全文围绕理论内涵、基本原则、创新策略与应用效果，建立“心理疏导 + 思想引领”的育人体系，可突破传统思政工作单一化的局限，依托资源整合、分阶段培育、精准帮扶等路径，实现心理健康培育与价值引领的深度协同。此类实践助力学生实现心理与思想双重成长、营造和谐校园环境，还能为社会输送兼具健康心理与正向价值观的优秀人才，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及社会公益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文浩 .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创新研究 [J]. 吉林教育 ,2025(14):82-84.

[2] 杜雪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J]. 时代报告 (奔流),2025(01):159-161.

[3] 方颖 , 游冉 , 陈琳 , 等 .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策略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3,14(16):179-181.

（下转 249 页）

论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

原嘉清

摘要：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募捐平台等众筹平台的出现为中国慈善事业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人们利用互联网募捐平台从事的慈善活动，能够体现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导向、激励和保障功能，有助于拉近社会距离、引领道德风尚、补充社会保障，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有效路径。互联网的普及、熟人圈的传播模式及公众的同情共情心理，共同构成互联网募捐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的传播载体、传播路径和情感认同。互联网募捐平台这类网络慈善模式，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价值引领与行为激励的有效实践载体。

关键词：互联网募捐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

一、前言

互联网募捐平台的诞生，为众多因病无钱医治的患者带来了希望，但其运行中暴露的项目合法性、平台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审核机制等也备受关注。当前关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研究一部分侧重于以经济学视角研究互联网众筹模式，通过分析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过程等，提出推动微公益健康发展的可行性建议。另一部分反映互联网募捐平台运行中所折射的社会现象或法律漏洞，揭露当前慈善众筹的欺诈风险和法律监管不足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的研究，学术界多以其内涵研究和路径分析为主，鲜有文章专谈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将互联网募捐平台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文章较少。本文旨在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现实状况入手，探求当下如何利用网络慈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

二、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社会行为分析

求助者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自主设置募集金额，并提供相关资料证件，平台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提示法律风险和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再通过朋友圈、QQ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正式实施以及部分网络募捐平台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1]，一直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网络募捐平台走向规范化。通过观察众筹案例，发现大多案例呈现短、快、广的特点，即资金筹集时间短，转发量爆发式增长、转发范围广。被助者皆患有重症，多为农村家庭，收入较低或无收入，已筹资金虽未达到目标资金，但均已成功结束治疗，说明被助者急需提取资金治病。捐助者持续关注被助者医治进展的同时，还帮助转发项目并动员身边人为其捐款。项目被大量转发效果显著，能短时间内迅速筹集到一定的资金。

（上接248页）

[4] 杨帆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协同心理育人的实践探索 [J]. 科学咨询 ,2023(09):125-127.

[5] 徐远超 , 向伟 , 赵娅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的困境及对策 [J]. 长沙大学学报 ,2022,36(06):109-112.

[6] 张烜 , 董晓梦 .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心理教育工作课程化常态育人路径研究 [J]. 当代教研论丛 ,2024,10(11):77-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24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新时代心理育人理念下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创新研究——以心理疏导与思想引领为核心”（202423）。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三、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概念，蓝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适应外在社会发展的需求的过程中，也同时在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它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变化发展保持一致的必然要求。”[2] 互联网募捐平台是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如何利用互联网募捐平台展现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程，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互联网募捐平台作为一种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凸显导向功能

第一，拉近人际距离，凝聚社会力量。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海量的救助信息不断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救助信息在大量的分享转发和捐款关注中持续发酵，捐助者和关注者来自全国各地，年龄阶层各不相同，却共同关注求助者，愿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有的捐助者留言激励受捐者，振奋人心的话语能缩短人们之间的鸿沟，拉近距离。互联网募捐平台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土壤。

第二，建立社会互信，引领道德风尚。中国是一个以家本位为核心逐渐形成起来的“熟人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多通过家庭成员，再扩散至亲属、家族和身边的朋友。

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传播方式可以看出，通过朋友圈的转发和亲友的证实实现信息的传递，很好地利用了“熟人社会”圈，使更多将信将疑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这为建立稳定的互信关系增加了可能。对于捐助者和被助者来说，一次简单的行善之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会继续传播下去，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正因为有了这份信任，人人才愿意行善，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人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通过人人慈善，形成互帮互助、扶危济困、共享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

第三，唤起同理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救助活动彰显社会中的友善之手，当网民看到求助者饱含真情的求助信时会被感动，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人性本真的“真善美”被带动，同情心油然而生。英国哲学家休谟指出：“同情是人性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则。”[3] 同情心是人的本能感情流露，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救助活动彰显了人性本真的“真善美”，是公益慈善的心理基础。

新时代下，公益慈善活动不仅能切实有效地解决普通百姓的现实困境，而且能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它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灵魂。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力发展也是“友善”价值观最直接的道德体现。网络慈善是帮助大众树立正确价值观、培育崇高道德理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而有效的重要载体。

（二）强化激励功能

第一，坚强人格，激发双向信心。参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求助者即使饱受病痛折磨，依旧顽强同病魔作斗争，他们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励和鼓舞着每一个人。每一封饱含真情的求助信，除了对家庭背景和患病状态的叙述，无不流露出求助者战胜病魔的决心，他们拥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坚强的人格，是人们的榜样[4]。另一方面，网民的每一次转发和捐款都给求助者带来新的希望，求助者不仅在物质上得到了帮助，在精神上也备受激励，人间真情使他们更有信心和勇气面对眼前的困难。求助者自立、自强、自信的人格特质唤醒网民的善心、点燃内心的光明、重拾人性的善良。

第二，榜样示范，扩大爱心传递。伴随网络信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社会信息的获取更倾向于利用网络。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建立和传播模式增加了人们参与慈善的可能性，能更好地吸引潜在富有爱心的人士，号召更多的人投身于慈善事业中来，这是当代培育慈善观的有效途径。互联网募捐平台是慈善宣传的窗口，它不仅对慈善的理念和政策法规进行宣传，还担负起助人自助、微爱大义等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尤其是微爱行动板块的品牌效应对扩大慈善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转发和留言，使更多人加入慈善事业，让他们的投入与感染力成为社会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慈善观念的传递者和爱心事业的模范者，让慈善走向社会，将慈善随身化、平民化、阳光化。

（三）促推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完善

第一，唤醒良知，促进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合力才能实现。借助互联网募捐平台培养民众奉献爱心、参与慈善的习惯，创造随时可慈善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首先，互联网募捐平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不同地域爱心人士间搭建起互助的桥梁，缓解了由于群体分化可能产生的疏离感与社会矛盾。伴随社会转型期而来的是社会阶层的差异性，网络慈善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群体间互助，从而缓解部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5]。其次，互联网募捐平台所倡导的慈善精神以及捐助者的宣传，唤醒了社会良知，形成社会群体对慈善的关注和认可。所以，互联网募捐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补充医保，助力“精准扶贫”。寻求互联网募捐平台帮助的求助者大多因疾病负债累累，家人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一些农村贫困家庭，本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脱贫，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返贫。当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国家正进一步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全力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互联网募捐平台作为慈善众筹机构，担负社会责任，涵盖事前互助、事后救助，及时帮助大病家庭筹集治疗资金。互联网募捐平台这样的网络救助是对国家精准扶贫的补充，避免了民众因大病再次返贫，也是贯彻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互联网募捐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形成的机制

（一）互联网的兴起为互联网募捐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搭建便捷载体

互联网募捐平台作为网络与公益慈善的结合体，有着区别于传统慈善的优越性。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不断升级创新以及网络自身优势为网络公益众筹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一，参与慈善的门槛低。网络慈善平台没有烦琐的程序，引导求助者发起众筹项目，这对于苦于求助无门的求助者而言无疑降低了准入门槛。对慈善的捐助者而言，网络平台的公开透明性提升了公众的参与感，增强了普通大众的公益体验感，使参与整个慈善活动过程一目了然，更具有“踏实感”。第二，网络公益众筹更加便捷效率更高。由于支付宝、微信钱包等网络支付工具的广泛运用，捐助者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电脑或手机上完成捐助的同时也可轻松完成转发。这种指尖传播信息的速度惊人，捐助者在微信朋友圈或微信群里转发求助信息号召大家参与，信息的传播呈几何式增长，促使项目成功率大幅提升。第三，参与者互动性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通过微信平台的转发，大众对网络慈善的态度也从将信将疑转为信任，公益慈善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更加平民化和触手可及。大众在参与慈善时可以针对性地选择捐助对象，并留言给求助者，自主性的增强使得大众更愿意关注公益慈善，大幅提升了参与慈善的热情。

（二）熟人圈的传播方式为互联网募捐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提供传播路径

互联网募捐平台是基于微信平台传播的网络慈善众筹活动，成立之初在网络掀起几次公益热潮。可见基于微信朋友圈的熟人传播路径是互联网募捐平台成功的最大因素。首先，微信朋友圈是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互联网圈子，是现实生活中熟人交际圈在网络上的投射。求助者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向熟人传播信息，熟人交际圈为项目增添了可信度，且众筹救助项目是公益性质，因此参与的捐助者更愿意帮助求助者。其次，项目中资料图片的展示、求助者个人信息的公开以及亲友的做证为项目的真实性奠定了信任基础，这也为后续依靠熟人圈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最后，互联网募捐平台以熟人传播的模式对身边亲朋好友的影响力更大，相比微博上大 V 等意见领袖的号召，朋友圈对表现出的“意义重大者”的信任度更能激发大众自觉自愿地参与公益活动。这种从熟人到熟人，再从熟人传播给熟人的放射式传播路径恰好符合互联网募捐平台所倡导的理念，影响力远胜于其他网络公益模式。

（三）共情心理为互联网募捐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提供情感认同

公益众筹项目的成功还依赖于捐助人的慈善心理和情感认同。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公益众筹行为，慈善意识和慈善动机推动着慈善行为的发生。人们心理发展的最高级形式便是意识，它决定了行为。慈善意识是慈善行为的基础，慈善行为也反作用于慈善意识，两者相互影响。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都有促进和完善自我的需要。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当下，越来越追求获取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慈善属于高层次需求。在慈善中寻求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平衡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强了人际关系，实现了自我价值，提升了自我效能感，以此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

五、结语

互联网募捐平台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导向、激励和保障三大功能，激发人们内心善念，积聚社会正能量，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对医保的补充。随着互联网 + 慈善的模式不断成熟完善，平台机制的改善及第三方监管平台的介入，互联网募捐平台将更加规范，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关于发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录的公告 [EB/OL].(2018-06-04)[2025-12-31].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37762/content.html.

[2] 蓝江 .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 [M].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3] 休谟 . 人性论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0.

[4] 李丹 , 魏霄 . 创新创业教育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22):130-132.

[5] 顾秋霞 . 社会工作方法在医院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J]. 社会与公益 ,2025(20):94-9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四维‘云思政’培育路径研究”（SK2021A0494）；2023 年校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公共艺术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育人一体化课程研究——以合唱俱乐部课程设计为例”（2023jyxm01）。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创新研究

殷洁如

摘要：文章立足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特征，系统分析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现状及突出问题，重点剖析队伍建设滞后、机制不健全、平台适应性差、话语体系吸引力不足等核心痛点。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创新对策与路径建议：构建统一高效的舆情工作组织机制，重构符合青年特点的主流话语体系，优化以平台为载体的舆情传播结构，引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风险防控能力，建立专业化的舆情工作队伍与教育体系。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与价值引领，推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向科学化、系统化、长效化转型，为高校治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参考与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创新；系统治理；意识形态安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全面渗透社会各领域，我国已正式迈入新媒体时代。高校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不仅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的重任，同时也处于舆情传播和舆论引导的第一线[1]。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壁垒，使高校网络空间呈现出传播快、参与广、互动性强等特征，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表达渠道和信息来源，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舆情生成速度加快、传播路径多元、言论交锋激烈，使得传统的舆情应对模式面临极大挑战。特别是面对大学生群体复杂的心理特征和高频的信息接触行为，如果缺乏科学、系统、前瞻的引导机制与应对策略，极有可能诱发网络“舆情危机”甚至“意识形态失守”风险。

因此，在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下，开展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创新研究，不仅是高校提升治理能力和教育水平的现实需要，更是落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应有之义[2]。

一、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现状分析

1. 舆情意识逐步增强，引导机制初步成形

近年来，随着高校网络事件的频发及舆情风险不断外溢，绝大多数高校已将网络舆情纳入校园治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一些“双一流”高校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设立新媒体工作室，通过校级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微博蓝 V 等渠道，积极回应校园热点议题，努力实现正面引导。部分高校还通过设置舆情日报、周报、重大舆情预警报告制度，初步形成了“监测—评估—研判—引导”的工作流程，为高校网络治理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撑。

2. 舆情平台多元互动，传播内容多样分化

当前高校舆情事件呈现出典型的“去中心化”传播趋势。舆情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而是普遍化地存在于广大学生用户中。高校师生在微博、知乎、小红书等平台上围绕宿舍管理、教学安排、课程考核、后勤保障等话题发起的讨论，往往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共鸣，甚至外溢至全网舆论空间。同时，学生表达形式日益多样，诸如“梗文化”“讽刺体”“弹幕评论”等新兴表达方式，使得舆情具有更强的情绪感染力和传播张力，增强了其引导难度。

3. 舆情教育初见成效，网络素养逐步提升

部分高校开始将网络素养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开设“网络文明课”“媒介素养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观与表达观，逐步增强其对网络舆论的识别与参与能力。此外，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等群体也逐步掌握新媒体工具的使用方法，尝试以“以生为本、以网育人”为理念，开展舆情沟通、情绪疏导工作，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注入人文温度。

（二）高校舆情引导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舆情引导主体协同不足，组织机制碎片化

多数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仍由宣传、学生工作、网络信息中心等多个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存在职责不清、联动不畅、响应滞后的问题。一旦出现突发舆情事件，往往面临“多头管理、协调困难、信息延误”的尴尬局面，导致初期无法快速响应，从而错失“黄金引导窗口”。此外，在日常运行中，部分高校的网络新媒体部门更多扮演“宣传窗口”的角色，而缺乏深层次的舆情监测、研判与危机处理能力，舆情管理体系仍处于“工具驱动”阶段，缺乏“系统治理”的

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

2. 引导内容模式化，话语体系吸引力不足

当前高校在网络舆情引导中存在明显的内容同质化与形式僵化问题。一方面，许多高校对热点事件的回应往往停留于“发布通告—提出要求”的行政逻辑，缺乏情绪同理与语言温度，难以与学生的真实情感形成共鸣。另一方面，高校主流舆论表达方式仍然沿用传统官宣话语，忽视了当代大学生更加偏爱互动性、趣味性、故事性传播形式的现实，导致传播效果“自说自话”，无法有效“破圈”进入学生群体，难以实现正向引导的预期目标。

3. 舆情数据感知滞后，预警机制亟待完善

尽管部分高校已尝试搭建舆情监测平台，但大多数高校仍缺乏专业舆情预警系统。舆情数据的收集与分析高度依赖于人工监控与突发应对，无法实现对网络情绪波动的实时感知与趋势预测。一些舆情事件往往是在“发酵成型”后才引起关注，导致高校在引导上被动应对，甚至陷入“删帖—封号—澄清—平息”的应激循环，无法从源头防控舆情风险、化解舆论矛盾。

4. 舆情引导队伍专业性不足，培训机制薄弱

当前高校从事网络舆情引导的工作人员多为思政教师、辅导员、新闻宣传人员兼职而来，缺乏系统培训与专业积累。许多人员对舆情规律、网络心理、舆论引导技术、平台运营等专业知识掌握不足，难以胜任复杂的新媒体舆情治理任务。同时，针对高校内部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也缺乏持续性的队伍培养与激励机制，专业人才难以稳定。

5. 学生媒介素养不均，参与行为风险外溢

虽然高校普遍已开展网络素养教育，但课程覆盖面有限、内容实用性不强，导致大部分学生对网络舆情缺乏科学认知与行为边界意识。在实际传播中，存在大量“情绪表达失控”“信息误读跟风”“情感攻击放大”等问题，个别舆情事件甚至因学生的“饭圈式”话语传播而引发网络暴力，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网络空间的治理难度。

二、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创新对策与路径建议

（一）构建统一高效的舆情工作组织机制

1. 建立校级舆情引导统筹中心

高校应在党委宣传部主导下设立“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协调中心”，统筹各相关部门资源，实现宣传、学生工作、网络信息、团学组织之间的职能协同。该中心应具备指挥调度、信息整合、舆情研判、风险预警、内容发布等五大职能，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枢纽平台[3]。

2. 明确责任分工与处置流程

应通过制度文件明确舆情应对的工作流程和责任清单，实现“谁主责、谁发声、谁处置”的闭环责任体系。对于突发舆情，建立“3小时初步回应—12小时处理预案—24小时结果反馈”的时间机制，确保快速响应、有序应对。

3. 建立常态化联动协同机制

推动校内舆情引导工作由“事件驱动”向“常态治理”转变，建立定期会商制度、舆情例会制度与风险评估制度，实现事前防控、事中干预与事后评估的闭环管理。

（二）重构符合青年特点的主流话语体系

1. 打造多元融合的话语载体

跳出传统思政宣传话语“说教化、程式化”的刻板模式，结合青年文化、网络语言、二次元表达、热点话题等要素，构建更具互动性、亲和力与感染力的传播语言体系。鼓励思政教师、辅导员与新媒体编辑联合策划“微课程、短视频、热帖评论、校园播客”等创新表达形式，提升主流价值的“可听性”与“可转发性”。

2. 聚焦学生关切，实现内容贴近

高校网络舆情的核心在于情绪与诉求的表达，因此必须紧密贴近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与情感议题。高校宣传工作应避免“虚构光明”，而要敢于回应问题、承认不足、解释原因，在回应中体现理解、责任与温度，增强舆论引导的情感共鸣力。

3. 强化思政话语与网络语境融合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网络语言之间的“互译”机制，在坚守价值导向、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增强话语表达的“网络适应性”。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深入网络一线，开展“思政入网”工程，实现思政理论与网络现实的双向嵌入。

（三）优化以平台为载体的舆情传播结构

1. 建设高校自主可控的新媒体矩阵

高校应建设涵盖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抖音号、B站账号、小红书校园号等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明确各平台的职能定位与分工，形成内容协同、上下联动、横向互补的传播格局。打造“校级主号 + 学院分号 + 学生社团自媒体”的三级传播体系，实现正向舆论的横向覆盖、纵向延伸，扩大主流声音的传播范围。

2. 巩固舆情传播的“主阵地”

高校应主动“占领舆情源头”，掌握话语主动权。坚持“主动发声、权威发声、及时发声”的原则，将校园重大事务、突发事件、重要决策的首发权、话语权掌握在高校官方新媒体平台手中，通过权威发布、背景解读、答疑解惑、进度通报等方式，在舆情发酵初期定调信息、框定议程、稳定情绪，有效遏制虚假信息、负面情绪的扩散蔓延，占据舆情引导的主动地位。

3. 引导学生自媒体参与正向传播

挖掘校园内有影响力的学生公众号、小红书博主、视频创作者等，将其纳入“校园网络正能量联盟”，加强引导与扶持。通过点赞推荐、资源支持、竞赛激励、评优加分等方式，激发学生自媒体参与校园舆情引导、正向议题传播、校园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发挥学生群体的自我引导、自我教育作用，形成“官方引导 + 学生参与”的正向传播合力。

（四）引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1. 建立校园舆情数据感知系统

可与社会第三方平台合作，建立校园专属舆情数据分析后台，实现对微博、抖音、知乎、小红书等平台信息的关键词监测、情绪波动识别、热度走势分析等功能，提升高校对网络舆情的实时洞察力与精准判断力。

2. 运用人工智能实现情绪预警与话题研判

依托情感识别、语义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海量信息中的负面情绪进行自动标注，对潜在“热点舆情”实现趋势预测与风险预警[4]。对“典型群体”“重点舆点”“易燃话题”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到早预警、早处理、早平息，从源头防控舆情风险。

3. 打造“舆情 + 数据 + 治理”一体化平台

将网络舆情工作融入“智慧校园”建设整体布局，推动舆情治理与数字化校园建设深度融合，构建“数据驱动、技术支持、制度护航”的舆情治理格局。实现舆情数据与校园治理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数据分析为校园治理、政策制定、舆情应对提供科学依据，推动高校舆情引导工作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五）建立专业化的舆情工作队伍与教育体系

1. 建设“全员协同 + 专人负责”的工作队伍

树立“人人都是舆情引导者”的理念，将网络舆情引导纳入全校教职工，尤其是辅导员、思政教师、班主任的工作职责范畴。同时，设置专职舆情管理岗位，引进或培养具备新闻传播、网络安全、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复合能力的专业人才，打造一支“专业化、青年化、平台化”的舆情引导骨干队伍，推动舆情引导队伍结构优化、能力提升。

2. 开设舆情治理与媒介素养专题课程

高校可在思政课程中开设《网络素养与舆情辨析》《网络文明与情绪表达》等专题模块，增强学生对网络传播规律、言论边界、舆情风险的理解能力，提升其“自觉明辨、自主判断、自律发声”的媒介能力[5]。

3. 建立培训机制与能力提升体系

定期组织宣传干部、辅导员、网评员、新媒体工作人员参加网络舆情管理专题培训，邀请舆情专家、媒体从业者、新媒体操盘手等授课，重点培训舆情规律、引导技巧、平台运营、风险处置等专业知识，强化实战能力培养。建立跨学科交叉培养机制，推动新闻传播、心理学、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融合，打造“技术 + 思想 + 表达”的复合型舆情治理人才梯队，同时，完善考核激励机制，稳定专业人才队伍，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结论

1. 高校网络舆情已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大学生成了网络舆论的重要生产者、传播者与参与者，高校网络空间逐渐演化为思想表达、情绪宣泄、价值冲突的多维互动场所。网络舆情不仅关乎学校的教学秩序与公共形象，更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6]，亟须纳入高校治理体系之中，统筹规划、系统引导、长效治理。

2. 当前舆情引导机制建设仍存在结构性短板

尽管高校普遍已建立一定程度的舆情应对机制，但在组织协同、平台建设、话语体系、技术应用和专业队伍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短板：多部门协作机制不畅、舆情响应滞后、信息封闭、话语吸引力不足、网络素养教育滞后等问题仍较为普遍，未能形成从源头预警到后期处理的闭环引导体系，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复杂的舆情环境。

3. 舆情治理应转向系统化、协同化、价值导向化

面对复杂化的网络舆论生态，高校舆情治理必须从“事后应急”“被动删帖”的传统模式，转向以系统治理为导向的战略思维。在顶层设计上，需构建统一的舆情管理协调机制；在内容引导上，应重构具有亲和力、传播力和思想力的主流话语体系；在传播平台上，应通过矩阵建设增强正向引导合力；在技术手段上，应引入情绪识别、数据分析等智能技术[7]；在队伍建设上，应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梯队，实现舆情治理的系统化、协同化、价值导向化。

4. 理论构建有助于引导工作模式的科学化

本文在综合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涵盖“组织统筹—平台矩阵—内容建构—技术支撑—队伍保障”的“五位一体”舆情引导框架模型，有助于推动高校舆情工作由碎片化应对向系统化治理转型。该模型不仅具备现实指导性，也为后续的政策制定与机制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是一项关乎教育本质、青年成长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既是一场传播技术的博弈，更是价值理念、治理能力与政治智慧的较量。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环境与日益凸显的舆情风险，高校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立足自身实际，主动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不断创新舆情引导的理念、机制、方式与手段。唯有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与协同路径，破解当前舆情引导工作中的突出难题，才能真正构建起符合时代特征、贴合学生特点、契合国家战略要求的高校网络舆论治理体系，实现舆情引导与校园治理、育人工作的深度融合，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校园网络空间，为高校高质量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刘亚新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提升研究 [D]. 兰州 : 西北师范大学 ,2022.

[2] 王丹丹 .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D]. 新乡 : 河南师范大学 ,2021.

（下转 255 页）

婚俗文化对大学生廉洁文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曹高煜　程晓东

摘要：本文根据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部署要求，总结分析婚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和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现状不足，论证传统婚俗文化中廉洁基因与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契合性。立足现实，提出以婚俗文化作为整合碎片化廉洁教育载体的总体策略，遵循“单方固廉、双方促廉、三方铸廉”层级作用机制，聚焦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师生互动、亲子对话、家校共育实现教育同频共振，凝聚三方力量开展社会实践构建多元育廉生态，最终形成递进式作用链条。在此基础上，整合成果合集、活动方案和实践模式，构建“1+1+1 清廉婚俗”大学生廉洁文化品牌，推动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从单向灌输向浸润式培育转型，为完善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体系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廉洁文化；婚俗文化；协同路径；品牌构建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把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充分挖掘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丰富内容，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1]。这为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创新实践指明了路径方向，充分体现了廉洁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与深层逻辑[2]。这种融合不仅是对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让廉洁教育扎根青年生活实际的必然选择，为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从“单向灌输”向“浸润式培育”转型提供了新的策略选择。

二、研究现状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前，高价彩礼、奢华婚庆、随礼攀比等婚俗陋习仍在不少地方滋生蔓延，这些风气透过家庭生活、社交网络、亲友经历持续渗透到正处于婚姻观萌芽期、价值观塑造期的大学生认知中。部分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下，开始将“彩礼厚度”等同于“重视程度”、将“婚礼奢华度”等同于“幸福指数”，对“勤俭持家、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产生认知模糊，甚至对廉洁文化中“抵制奢靡、拒绝功利”的核心准则产生疏离感，奉“物质交换”为“社会规则”。这种价值认知的错位与廉洁理念的疏离，正是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之一。然而，大学生廉洁教育自身也深受“场域单一化”和“形式主义化”的困扰。在教育场域方面，学校教育孤立运行，缺乏与家庭、社会场域的有机联动，致使大学生廉洁认知与行为实践严重脱节。在教育形式方面，学校的廉洁教育往往流于表面，仅满足于完成既定任务，缺乏对教育实质和效果的深入关注，未能真正触动大学生内心。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察觉到大学生在廉洁教育中知行难以合一、贴近生活不足等情况，并提出诸多理论讨论这一现状。美国新品格教育模式倡导社群主义，主张扩大道德教育的场域，强调学校品格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协作，试图扭转学校品格教育的价值灌输倾向，形成教育合力[3]。同时，美国新品格教育模式既确认了灌输式教学的合法性，又充分借鉴和吸纳了平等对话、社区服务、公正团体等多种间接教育方法[4]。国内学者则研究“推动廉洁教育融入家庭日常生活”，探

（上接 254 页）

[3] 李欣蔓 .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与引导对策 [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23(05):94-96.

[4] 周广 , 胡煜雯 . 警惕高校网络舆情“蝴蝶效应”[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3(09):25-26.

[5] 刘静雅 .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3,14(11):68-70.

[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9:26.

[7] 冯刚 . 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分析的逻辑理路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01):24-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上海理工大学尚理晨曦社科专项项目“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创新研究”（24SLCX-YB-008）。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助教）

索家风建设融入大学生廉洁品质培育的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提出多样化传播家风文化、构建家校协同机制、引导学生主动践行廉洁理念等实践策略[5]。

虽然前述研究提供了多元思路，但相关成果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大学生群体与家庭、社区的黏性减弱、互动减少，且自主意识大大加强，家庭和社区对其思想的教化效果显著降低，故而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呼吁层面，提供的实践思路针对性不够，难以真正落地生根。第二，相关研究尝试拓展的廉洁教育形式仍同质化严重，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勾连，除“廉洁”这一当然主题外，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未能形成体系化建构的品牌文化，以致教育影响仅停留在“单次活动完成即结束”的表层，难以转化为长期持续的行为塑造与文化沉淀。第三，目前以彰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习俗作为大学生廉洁价值观传递的载体较为少见。中华传统习俗中向来蕴含着“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精神内核，但相关研究未能充分挖掘这些天然教育素材背后的廉洁基因，没有实现廉洁教育从“外显说教”到“文化自觉”的升华。

（三）研究意义

婚俗文化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习俗，自先秦发端，始终与社会伦理、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其中蕴含的廉洁观念随时代更迭不断沉淀。西周时期，纳征时的聘礼以“玄纁束帛（绢帛）、俪皮（鹿皮）”等象征物为主，反对铺张奢靡的风气。东汉时期，杨震秉持清正家风，拒绝他人借婚聘等事宜送来的厚礼，其“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的名言，正是对为官清正底色的有力捍卫。唐宋时期，白居易、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以诗文倡导、身体力行，借《议婚》《义庄规矩》等作品呼吁以品德才情为婚姻根基的正道，抵制物质攀比。这些历史实践证明，古人早已意识到婚姻与廉洁价值观的内在关联，将克己守礼、重义轻利的精神融入婚俗传承，反对将婚姻异化为“利益交换”的手段，为当代廉洁文化教育与婚俗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与鲜活的实践样本。

新时代背景下，婚俗改革亦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民政部《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整治“天价彩礼”“铺张浪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这一政策导向折射出传统婚俗中隐含的廉洁风险——当彩礼异化为炫耀财富的工具，婚宴演变成人情往来的“面子工程”，婚俗文化便逐渐偏离了情感联结的本质，成为滋生腐败、助长奢靡的温床。重新审视婚俗文化与廉洁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不难发现婚俗改革对“奢靡主义”的批判，恰与廉洁文化对“功利化价值观”的抵制形成深层呼应。同时，婚姻直接关联“家庭组建”这一人生核心场景，彩礼厚薄、婚礼规模、随礼往来等细节，本质上是对“如何处理财富与情感、私利与公序”的价值选择，而这也恰是廉洁文化“重义轻利、克己守礼”的核心关切。

高校大学生处于生理走向成熟、即将步入婚姻的人生阶段，也面临历久弥新的婚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将婚俗文化融入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基于婚俗文化的“育廉铁三角”实践探索

本研究主张从“育廉铁三角”视角出发，以“教师、学生、家长”三方主体的参与深度为横轴，以廉洁教育的成效强度为纵轴，遵循“单方固廉、双方促廉、三方铸廉”的层级作用机制，结合婚俗文化的主题内核设计大学生廉洁文化实践教育形式并予以实施，最终形成递进式作用链条。

（一）单方固廉：独立主体的廉洁意识培育

一是“师研微课”。由辅导员联合开发“婚俗中的廉洁基因”微课，深挖西周六礼、《朱子家训》等历史典故，构建传统婚俗与廉洁文化的历史纽带；整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对封建婚俗的革新案例、当下“抵制天价彩礼”专项行动等政策实践，揭示婚俗变迁中廉洁价值的演进逻辑。通过课程开发，辅导员系统梳理婚俗文化变迁与廉洁观念传承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婚俗形式是表，廉洁精神是里”的核心逻辑，向学生传递“廉洁重在克制贪欲”的价值理念。

二是“生创漫集”。组建学生文创团队，在研究史实、走访展馆、构思脚本的基础上，以历史典范、时代楷模简朴清廉的婚姻故事为素材，制作有声漫画集《婚俗中的廉洁故事》等可视化作品，并定期更新至学校电子显示屏、社交媒体平台，让创作者、观赏者在线条和声波中深切体悟革命先辈克己奉公的崇高品格与真挚纯粹的婚姻价值观，使廉洁文化以“视听联动”的形式浸润学生群体，实现从历史素材到精神传承的创造性转化。

三是“家调婚俗”。改变过往结构化调查问卷形式，面向家长制作“短文填空型”婚俗认知问卷，在家长回忆并分享自己婚姻故事的同时完成对其彩礼接受程度、婚姻消费水平、廉洁婚风认同感等方面的数据收集。访谈结束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简要报告反馈给受访家长，引导其通过个人记忆的回溯、他人故事的共鸣以及可视化数据的审视，实现对廉洁婚俗理念的认同、内化与践行。

（二）双方促廉：两两协同的教育同频共振

一是师生互动。结合所在校院特点和所辖学生专业，开展特色主题活动。以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为例，学院立足会计学科的专业特点以及“廉商教育”的品牌建设，将廉洁主题、商科背景与婚俗元素有机结合，创新开展“清廉婚礼”模拟策划大赛，组织学生在规定预算下，设计包含“廉洁宣誓”“家风分享”等环节的婚礼方案，并邀请专任教师从多角度进行点评，引导学生将“廉洁风险评估”纳入婚礼筹备阶段。

这种师生互动模式，依托婚俗文化的场景载体，形成“教学相长促廉洁”的育廉新范式。

二是亲子对话。开展“亲子廉洁婚俗对话”，学生通过整理婚俗改革案例、彩礼经济分析等资料，以“如果婚礼预算超支该如何调整？”等开放式提问切入，引导父母共同探讨婚俗消费合理性。对话重点聚焦“婚俗的廉洁边界”，学生与家长一道逐步拆解彩礼支出、婚宴预算等具体事项的廉洁风险点，并初步形成“廉洁婚俗承诺”家庭公约。这种亲子对话模式，既打破代际观念壁垒，又促使廉洁婚俗理念完成“从校园认知到家庭实践”的转化。

三是家校共育。在毕业生家长会中增设“廉洁警示课堂”，跳出传统的案例选择，结合纪委监委通报的真实数据，通过剖析借婚礼收送红包礼金、超标操办宴席等婚俗领域违法违纪案例，向适龄未婚青年家长揭示婚俗背后的廉洁风险。这种家校共育模式，不再局限于人事纪律、商宴规范等方面的常规议题宣教，而是通过真实婚姻案例的警示教育让家长深刻认知“小婚俗”背后的“大纪律”，构建起家校携手抵制婚俗腐败、共育时代清风的长效教育生态。

（三）三方铸廉：多元主体的育廉生态构建

将廉洁教育和婚俗文化深度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摒弃过往社会实践活动中教师“挂名”、家长“缺位”、学生“单打独斗”的困局，充分发挥教师和家长在社会网络中的桥梁纽带和资源支撑作用，帮助学生与社区党支部、婚姻登记处、婚庆产业园等各类社会主体“牵线搭桥”，引导学生开展精准调研，形成涵盖婚俗消费现状、廉洁风险点、改革建议的调研报告，并推动相关实践成果转化为社区的宣传素材和民政部门的决策参考，实现“实践调研—社会服务—育廉传播”的闭环效应，推动廉洁理念从校园实践活动向社会治理场景延伸，让学生、教师、家长在通力合作中更好地将廉洁教育入脑、入心、入魂、入行。

四、构建“1+1+1 清廉婚俗”大学生廉洁文化品牌的基本方略

（一）品牌构建的意义

大学生廉洁文化实践教育的品牌化发展，本质上是摆脱廉洁教育碎片化困境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意义在于以品牌为纽带实现系统性育廉体系建构。通过整合“育廉铁三角”中“教师、学生、家长”三方主体的参与路径与实践成果，可以将原本碎片化的廉洁教育手段用婚俗这一民俗文化串联成线，遵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品牌构建”的思路，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廉洁文化品牌。对比传统廉洁教育模式，这不仅解决了家庭场域与社会场域缺位的协同难题，还突破了同质化和被动式教育的形式主义窠臼，让廉洁价值观借由婚俗这一贴近生活的民俗载体，从空洞的口号说教变为大学生可感知、能参与、愿传播的日常体验，进而在代际对话与社会互动中沉淀为主动坚守的价值准则。

（二）品牌构建的方案

在“育廉铁三角”分层实践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1+1+1 清廉婚俗”大学生廉洁文化品牌。该品牌将使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民俗化实践载体常态化长效化，通过改造婚俗这一生活化场景，使廉洁教育从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具体的文化实践，令大学生在观察、了解、体验婚俗文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建立“廉洁婚俗”的价值认同，实现廉洁理念从认知接受到行为自觉的深层转化。

具体而言，“1+1+1 清廉婚俗”大学生廉洁文化品牌由以下部分构成：一套成果合集，收录教师开发的系列微课、学生创作的有声漫画、家长讲述的婚姻故事，以多元形式生动诠释清廉婚俗内涵；一组活动方案，将“清廉婚礼”模拟策划大赛、亲子廉洁婚俗对话、廉洁警示课堂转化为常态化大学生廉洁文化实践活动，形成周期性实践机制以巩固育人实效；一种社会实践模式，总结归纳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重点难点，撰写实践育人工作案例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未来进一步结合我国南方北方、沿海内陆等不同地区的婚俗习惯，开展有针对性的婚俗廉洁调研，形成更全面的调研报告。

五、结语

当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从婚俗文化中读懂“廉洁”既是政治操守的底色更是浸润生活的智慧时，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对话便有了鲜活的注脚——这不仅是婚俗改革穿透时代的深层意义，更是廉洁文化扎根生活的生命力所在。它既是对“克己复礼”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廉洁文化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当代诠释。这种古今价值的交融，最终将超脱校园场域，在家庭叙事与社会肌理的延展中，编织出廉洁生态的毛细血管，让廉洁文化从抽象的道德符号，蜕变为可触摸、可传承的生活哲学。

参考文献

[1] 杨智淋 . 四川 : 打造“510”廉洁文化品牌推动全域清风劲拂 [J]. 廉政瞭望 ,2024(08):67-69.

[2] 钟镕宇 . 笔谈 | 深挖资源营造廉荣贪耻氛围 [EB/OL].(2024-04-18)[2025-07-02].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404/t20240418_341952.html.

[3] 杨宇轩，柳海民 . 美国新品格教育的关怀批判——兼论多元化时代德育的三重扩充 [J]. 全球教育展望 ,2024,53(03):123-132.

[4] 荆德亭 . 美国道德教育模式的演进研究：历程、主题及逻辑 [J]. 现代教育科学 ,2024(01):149-155.

[5] 王坤 . 家风建设融入大学生廉洁品质培育的价值意蕴及路径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5(02):19-21,58.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的“三进”路径与实践研究

赵静雯　李慧明　陈雪洁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将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引入高校文化育人体系，以其滋养心灵、塑造品格，是筑牢大学生文化根基、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实施、培育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医学素养的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但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体系还存在着认知困境、创新瓶颈、成效挑战等现实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如何挖掘中医药文化中的育人精髓，使中医药文化真正“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文化与高校育人实践的深度融合，构建中医药文化育人长效机制。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文化育人；“三进”路径

中医药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核心智慧与价值理念，其不仅是中华文化谱系中具有典范性的文化成果，更在高等教育领域展现出独特的育人价值。对于中医药高等院校而言，深入挖掘其应用价值，探索创新育人模式，能够有效激活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为高质量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一、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的时代价值

（一）以文化人，赋能时代新人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他指出“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1]。中医药文化映射出中华文明的精深智慧，凭借其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延续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借助人文之力感化人心的优良传统，对培育新时代“五育融合”型人才具有显著助推作用。从德育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意蕴，同时亦承载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如“仁、和、精、诚”的价值观、“上医医国”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培养具有仁爱之心、精湛医术的医学生。从智育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文化有机整合了阴阳学说、五行生克及经络运行等古代哲学智慧，其理论体系蕴含了唯物论思想、辩证思维及系统观，这种将自然哲学具象化为医学认知范式的教育路径，有效强化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与逻辑思维能力；从体育的角度来看，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作为中医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学生以体育心，增强体质；从美育的角度来看，阴阳五行哲学的意象美学、中药的形态与色泽、中医诊疗过程中的艺术性，共同构成了浸润式美育资源，且能够在审美感知力、判断力培养、创造性表达等方面形成教育合力，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审美素养；从劳育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文化蕴含“精勤不倦”的劳动观，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丰富的劳动教育形式，促进心智启迪、道德养成、审美提升以及行为塑造的协同发展[2]。

（二）发挥功效，营造健康文化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纳入了国家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核心，系统阐明了新时代中医药发展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一方面，高校作为知识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场所，通过中医药文化育人，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中医药文化知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正确的健康观念，并能够通过学生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理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向家庭及社会进行普及并有效传承，从而增强全民健康意识与素养。另一方面，通过将中医药文化节、中医药科普讲座、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到社区等社会场所，能够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基层、扎根社区、服务农村，并将其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由此，在中医药文化的浸润之下，追求健康的社会氛围将愈发浓厚。

（三）延续文脉，助力文化强国征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深刻阐释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承载着数千年的健康理念与实践智慧，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助力文化强国的重要载体。一方面，通过系统推进高校中医药文化育人工程，能够深化学生对中医药历史成就及当代价值的理解，激发其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另一方面，高校中医药文化育人工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力，为中医药事业的守正创新注入新生动力，进而以国际化传播为抓手，在提升中医药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实践力量，推动文化自信自强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二、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的现状及问题

（一）认知困境：学生对中医药文化价值认识不足

虽然中医药文化具有巨大的育人价值，但是在运用过程中仍存在各种问题。现有教育体系的局限与文化濡染效能的弱化，使得部分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认识不足，精神归属感与民族自信心尚未被充分激活。医学类院校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将其视为单调乏味且缺乏吸引力的文化形态，甚至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过于保守，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再加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学生接触的文化形态更加多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价值的认知。例如部分同学认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缺乏科学依据，相比之下西医文化更为先进，缺乏中医药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医学生课业压力较大，学生更倾向于将精力放在知识学习与技术实操上，忽视了中医药文化育人对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

（二）创新瓶颈：中医药文化育人方式较为单一

近年来，医学类高校对中医药文化育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通过不断加强校园硬件、软件建设，营造中医药文化育人环境。同时，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教育体系，举办凸显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活动以增强育人效果。尽管部分高校已在中医药特色校园建设上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普遍存在将文化育人窄化为思政课程补充内容或碎片化活动载体的倾向，忽略了从全局出发，将中医药文化置于学校整体办学方向与长远发展规划之中，缺乏全员、全程、全方位发挥育人作用的思维与体系[3]。另一方面，在数字“原住民”群体成为高校主力的背景下，部分院校在中医药文化育人的网络传播矩阵建设上比较落后，未充分激活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效能，导致育人路径单一化、内容供给没有满足学生的真实需求，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

（三）成效挑战：中医药文化育人效果不够显著

当前，中医药文化育人体系建设存在许多矛盾与问题。从教师层面来说，高校更注重教师的专业素养、学术能力等，而对教师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思政育人的教学能力缺乏考核机制，导致教师资源较为短缺[4]。另一方面，当前思政教育模式有待突破，课堂内容更多局限于空泛的理论层面，或是仅靠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与思政引领，中医药文化中的“大医精诚”等思政富矿尚未系统开发，导致专业教育与价值引领难以深度融合，弱化了文化育人实效。

三、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文化育人的路径及实践

（一）系统进教材，将中医药文化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建设

1. 强化中医药文化课程建设

构建科学化、结构化的中医药文化课程体系是高等院校实现“以文化人”战略目标的基础性工程。中医药院校应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依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以及学生个性化发展诉求，系统规划中医药文化课程矩阵，并设置相应学分，让中医药文化真正进入教材和课堂。例如河南中医药大学始终坚持以中医药文化启迪智慧、滋养心灵的教育理念，将仲景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丰富的育人元素，深度融入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以及国学经典等在内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开设了“中医药学概论”“中医食疗药膳与养生”“推拿学”“中医养生学”“中医健康管理”等特色课程。

2. 赋予思政课程中医药底蕴

将中医药文化深度融入思政教育体系，是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一方面，要在思政课程中系统性植入中医药文化元素，有效拓展思政教育的育人维度与文化内涵。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融入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整体观等中医哲学思想，通过“阴阳平衡”对应矛盾统一规律、“天人相应”诠释自然观等案例，让学生在比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代价值；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融入中医药行业“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典范，如李时珍尝百草的科研精神、张仲景“勤求古训”的治学态度等，强化医德医风教育对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塑造作用；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中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融入“四史”教育等，让思政课充满“中药味”。另一方面，要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相结合，在专业课程中挖掘和融入中医药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二）生动进课堂，将中医药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1. 创新中医药文化育人教学培养方式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院校独特的教育资源，应全过程、全方位融入人才培养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多方面入手，创

新课堂教学模式，让中医药文化生动进课堂，于无形之中浸润学生心田。一方面，要突破传统讲授式教学的局限，积极引入翻转课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PBL（项目式学习）教学等生动且实用的教育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中医药文化网络资源，打造线上智慧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环境，助力学生以生动直观且深入的方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如河南中医药大学推行“线上学习＋线上翻转”、分组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智慧化教学新模式。以实际行动创新中医药文化育人教学培养方式，切实地担负起国家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

2. 提升专业教师队伍中医药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作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主导力量，只有自身拥有深厚扎实的中医药文化素养，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文化浸润与价值引领的知行合一。首先，教师自身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较强的大局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将传承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事业发展、运用中医药文化培育新人当作一项伟大事业，积极主动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将中医药文化与课程相结合，不断提高课程思政能力。其次，高校应加大培训力度，通过邀请国医大师开展专题讲座、组织经验交流会、外出学习等，提高教师队伍中医药传统文化素养。如河南中医药大学开展名师专家讲坛、观摩教学等系列校内外培训，组织教师参观河南中医药博物馆、医德馆等，厚植教师中医药文化底蕴。还开展了“仲景教学名师”评选活动，发挥教学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教师提升中医药文化素养和教学水平。

（三）扎实进头脑，将中医药文化教育融入校园活动与文化建设

1. 营造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环境

校园环境蕴含深厚文化内涵，能于无形中助力学生成长蜕变。在校园的硬件设施建设中，医学院校要充分利用中医药文化特色，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将中医药文化基因植入校园各个空间。同时，也要注重校园软环境的渗透作用，将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融入学校的育人理念、校风校训等方面，形成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育人生态。例如河南中医药大学就高度重视特色校园文化景观的构建，打造了中药植物园、人体科学馆及医德馆等主题展馆，涵盖中原文化、药企发展史的多维展厅体系，以及以张仲景塑像为核心的仲景文化广场。校徽中间由红白相间的“太极图”构成，象征古老的中医药生生不息、和谐永久地发展，同时，将中医药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校区内道路的命名之中，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文化韵味的独特环境，以及厚德博学、承古拓新的良好氛围[5]。

2. 开展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医学院校应深度挖掘第一课堂潜能，同时打破课堂界限，融合第一、第二及第三课堂资源。积极组织丰富多彩、格调高雅且富有健康内涵的各类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线上资源，搭建影响力广泛的中医药文化教育新媒体传播平台。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学校充分发挥社团文化的作用，建立中医功法养生协会、推拿刮痧协会、太极俱乐部、中医暖阳志愿者协会等社团，在社团活动中充分践行中医药文化；举办中医药文化论坛、仲景中原中医药文化节、中医药文创大赛、“寻梦仲景 点亮岐黄”中医药文化体验实践等活动，八段锦、太极拳等养生功法比赛，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使他们感受到优秀中医文化的熏陶；组织“暑期三下乡义诊”等社会实践活动，将知识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乡村振兴、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健康中国注入力量。

四、结语

中医药文化不仅需要我们代代传承，更需要我们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高校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价值，通过实施“三进”工程，让中医药文化走进课堂、融入教材、深入学生心灵，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能。要构建“三全育人”体系，将中医药文化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使中医药文化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 杨耀文 , 杨芳 . 中医药文化育人策略研究 [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31(06):130-136.

[3] 张真鑫 . 中医药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D]. 沈阳 :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3.

[4] 王瑛 , 谢汉卿 . 中医药文化赋能高校思政育人路径创新研究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2(05):6-10.

[5] 秦琪 . 中医药文化融入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 [D]. 郑州 :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苗圃项目资助“中华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的思政育人模式探索”（2025MPXG12）；2024 年河南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校中医药文化育人的路径与实践研究——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HZYSZ2024-42）；2023 年河南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研究”（HZYSZ2023-49）。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司晓霞　侯伟男

摘要：本文以问卷调查法探究“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该群体人生目标呈现功利与务实交织的特点，价值观从单一奋斗导向转向自我接纳与多元认同；在学习行为中体现出主动探索的自主性，消费决策兼具理性考量与现实平衡；在心理层面既有自我调适的韧性，也伴随着成长阶段的迷茫；在人际关系中理性择友与情感共鸣并重。究其成因，教育代际差异、家庭教养方式转型构成重要基础，而网络环境浸润、媒体信息传播以及社会价值观变迁与诚信观念冲击，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的思想行为模式。

关键词：“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价值观；心理健康

一、引言

作为新时代青年群体的“00 后”大学生，其思想行为特质深度关联社会发展、家庭教育及网络环境等多重因素，相较于“90 后”大学生，他们在人生目标、价值取向、学习态度与方式、消费观念及行为、心理健康状态乃至人际关系模式上均显现出鲜明变化，本文依托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从多维度解析“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并深挖背后的影响动因，为高校开展针对性教育引导、促进“00 后”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有效样本，共回收有效问卷 208 份，调研对象涵盖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及家庭背景的“00 后”大学生，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详见表 1。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地域	年级	性别
城市：44　21.15%	大一：52　25.00%	男：121　58.17%
城镇：69　33.17%	大二：35　16.83%	女：87　41.83%
农村：95　45.67%	大三：73　35.10%	
	大四：48　23.08%	

（二）调查内容

问卷共设置 40 道题目，围绕“00 后”大学生的价值观、学习态度、消费行为、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家庭教养方式六大核心维度设计，全面覆盖研究所需的关键信息，确保调研内容的针对性与全面性，为后续思想行为特点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梳理数据分布特征、计算相关占比，清晰呈现“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整体样貌，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三、“00 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一）功利与务实并存的人生目标

“00 后”大学生的人生目标呈现出鲜明的功利性与务实性交织特征。调研显示，31.73% 的“00 后”大学生会主动参与学生干部竞选，且在面对不感兴趣的职位时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为特征表明其参与具有明确的个人目标导向，并非盲目参与；59.62% 的受访者将“锻炼综合能力”作为担任学生干部的核心动因，这既凸显了当代青年群体对自我提升的强烈诉求，也隐含一定功利化倾向，即参与活动时更侧重个人收益，对集体贡献的关注度相对较低。28.37% 的“00 后”大学生在社团选择中倾向公益服务类，彰显部分群体对社会责任感的内在秉持；67.79% 会在与老师相遇时主动致意，折射出其对人际关系维护的自觉意识；48.08% 将“个人能力与自我奋斗”认定为社会生存发展的核心支撑，这与前述行为逻辑深度呼应——学生群体普遍信奉能力主导未来，进而在校园活动中主动探寻能力提升契机，呈现出鲜明的选择性与竞争性特质。当代学生的校园参与行为内嵌“目标驱动”与“结

果导向”双重逻辑，既着力通过实践积累核心竞争力，又对无直接价值增益的活动缺乏持续投入的意愿。

（二）从奋斗到自洽的价值观

“00后”大学生人生价值的核心衡量维度聚焦于个人修养、社会贡献与生活舒适三大层面。其中，个人修养占比最高，达到65.55%，是所有选项中最突出的一项；社会贡献次之，占比60.29%，同样处于较高水平；生活舒适度则以55.5%的占比排在第三位。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核心关系。相较于“90后”大学生，他们对社会认可的权重认知有所降低而对生活舒适的诉求呈现明显提升，这一价值取向的动态演变印证了“00后”更侧重内在成长的积淀与生活体验的质感，而非单纯以外部评价体系作为自我价值的核心锚点[1]。47.12%的“00后”大学生选择以拼搏进取之姿奔赴人生、全力耕耘事业，40.38%主张不过分强求亦不自暴自弃，这一认知图景既彰显其对奋斗精神的坚守，又流露对“内卷”的清醒规避，更凸显对人生动态平衡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追求，深藏对心理健康与生活质感的重视；成功观层面，仅1.44%将演艺明星归为成功典范，其余学生约各占三分之一，分别认可企业家、市长与科学家所承载的成功价值内核。这一分布清晰印证“00后”更青睐实干践行与社会贡献导向的成功形态，而非单纯追逐知名度或财富积累，学者王海建的调研亦佐证该群体在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上，呈现出个性化追求、理性化处世逻辑与务实化人生理想的鲜明群体特质[2]。

（三）自主与理性并存的学习方法

“00后”大学生在学习行为中展现出强烈的自主性与理性的学习逻辑，与前代大学生相比，其学习方式更具主动性与规划性。调研显示，43.27%以“合理计划”构建学习逻辑、49.04%坚守学习笔记的知识沉淀习惯，这一数据图景印证了该群体扎实的学习规划能力与主动的知识管理意识；遭遇学习困境时，73.56%的学生选择自主查阅资料探寻解决方案，凸显其根植于成长体验的强烈自主学习倾向；而56.73%认为上网能够“增强综合素质”的认知表达，更折射出他们对网络工具价值的理性研判与成熟把控。他们已跳出将网络单纯视作娱乐工具或学习干扰因素的认知局限，转而以辩证视角审视并接纳网络所承载的多元教育功能，展现出新生代大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的鲜明特质。

（四）理性与现实平衡的消费理念

受经济自主能力限制，57.21%的“00后”大学生月生活费定格在1000 ~ 1500元区间，较弱的经济自主能力让他们在消费决策中不得不精打细算、聚焦基本需求的优先满足；86.06%的学生将“伙食”作为核心消费项，这一分布既凸显生存型消费的主导性，也印证了即便成长于物质丰裕时代，他们仍在有限预算框架下将“吃饱吃好”列为首要选择，尽显务实消费逻辑。面对心仪却无力支付的商品时，34.62%的“00后”大学生会选择“先省钱或赚钱再购买”，而非盲从分期、借贷等超前消费方式，这一选择足见他们对超前消费的审慎态度，更倾向以延迟满足或主动增收达成消费目标；摒弃非理性的消费冲动。其消费行为鲜明呈现“刚性需求优先、量入为出为主”的特征，即便身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仍展现出扎实的自我约束力与清醒的现实规划能力，在消费选择中守住理性底线，不被物质诱惑裹挟。

（五）自我调节与迷茫并存的心理状况

“00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清醒自洽与迷茫困惑交织”的鲜明特征，既具备一定的心理调适韧性，也面临成长阶段的普遍困境。调研显示，80.29%的“00后”大学生会主动涉猎心理健康知识，这一远超前代的占比，在社会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度提升与网络信息普及的双重作用下，印证了该群体心理健康认知水平的显著跃迁，也体现出他们对自身心理状态的主动关注与探索意识；46.15%的学生因“内心空虚、缺乏人生目标”陷入意志消沉，折射出他们成长于信息爆炸与社会竞争加剧的时代语境，却受限于教育体系中人生规划引导的缺位，部分学生在脱离应试轨道后遭遇意义感危机的现实图景。62.5%的“00后”大学生偶发心理困扰却能快速自我化解，60.58%选择以顺其自然的姿态疏解不良情绪，展现出独立的心理调适能力。这组数据直观印证了多数群体具备较强的情绪弹性，他们不依赖外部援助，更倾向于通过自我消化、注意力转移或时间沉淀等内生方式调节情绪；这一表现既勾勒出该群体在心理健康认知、情绪状态及应对逻辑上的鲜明特质，也折射出他们兼具一定心理调适能力，却仍普遍面临目标缺失与情绪管理挑战的代际生存样貌，心理状态呈现出清醒自洽与迷茫困惑交织的鲜明特征。

（六）理性选择与情感共鸣并重的人际关系

“00后”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秉持“理性择友、重视质感”的原则，既注重社交的自主性与选择性，也重视情感共鸣与关系质量，展现出成熟的人际交往逻辑。调研显示，58.17%的“00后”大学生满意自身人际关系，足见多数能搭建适配自己的舒适社交圈；67.31%只与性格相合者交友，显露出他们在社交选择时的自主意识与明确标准——不再盲目求广，更重交往质感；52.4%在家庭分歧中常换位思考，这份表现直白反映出该群体代际沟通里的成熟共情力，懂得以理解化解隔阂、以包容维系亲密。亲密关系选择的调查里，“00后”把性格、感情基础、人格列为最看重的三项，这排序明明白白透着他们的倾向——比起物质、外貌这些传统标准，更在意关系的内核质量；“人格”占比居高不下，更见他们对伴侣精神层面的高要求，渴求价值观上的同频共振，这群清醒的社交者早已跳出传统模式框框，按照自己的心意搭起人际网络，不迎合、不将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搭起兼具舒适度与契合度的人际网络。

四、影响因素分析

（一）父母教育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作为“00 后”大学生成长的核心环境因素，其影响贯穿于思想行为形成的全过程，而教育代际转型的双重底色，构成了该群体思想行为特质形成的重要基础。调研数据显示，59.62% 的“00 后”大学生父母最高学历是“初中及以下”，25% 为“高中或中专”，仅 7.69% 能到“大学本科”，这金字塔般的分布，道尽了他们父母辈受历史条件所限、受教育机会不足的过往；而这种代际教育落差，自然让家庭在学业辅导、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支持力有了结构性欠缺，难以完全跟上子女成长的需求。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家庭经历着剧烈变迁——规模不断微型化，结构愈发多样化，关系转向民主化平等化，家庭风险也同步扩大 [3]；而教养方式调查显示，35.58% 的家庭采用“民主引导型”、31.25% 为“自主发展型”，两者合计近七成，传统“严格管制型”仅占 14.9%，这组数据真切勾勒出当代家庭教育理念的深层转变。

这些数据戳中了关键：“00 后”大学生正站在教育代际转型的拐点，身上既印着父辈教育资源匮乏的旧痕，又裹着当代教育理念革新的新气；摸准这份双重底色，对高等教育精准施策很关键，社会各界需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既懂他们要过的特殊关，也托得住新型教养模式养出的自主底气。

（二）网络环境与媒体影响

作为“数字原住民”，“00 后”大学生的成长全程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环境与媒体传播已深度融入其日常生活，成为塑造其思想行为模式的关键因素。调研显示，41.83% 的学生每天上网超 4 小时、40.38% 独爱内地剧且 2 小时以上上网者超七成，这些数据显示：互联网普及早从根本上改变了“00 后”的生活；作为生在数字时代的一代，他们学习、搜索信息、交朋友都离不开网络，40.38% 的内地剧偏好更显本土文化认同在变强，而他们借网络语言诉情绪、展个性，既释放了压力、寻得文化共鸣，也顺利融入同伴群 [4]。

“00 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活写照；教育工作者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再使用正确的方法，帮他们在数字时代走得稳、长得好；而这份“懂”与“引”，正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既扎进中国土壤、又装着整个世界的新时代青年。

（三）社会价值观与诚信观念

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变迁与诚信环境的复杂态势，对正处于价值观定型关键阶段的“00 后”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既带来了价值认知的多元选择，也造成了一定的认知困惑与道德冲击。调查显示近半数“00 后”大学生因现实不公动摇诚信信念，47.12% 因“同学作弊拿奖学金”心生失衡，45.67% 受社会腐败现象影响对诚信价值生疑，暗显外部环境对青年诚信认知的隐性侵蚀。这一数据显示外部环境对青年价值观的深层冲击——当失信行为免于惩戒反获收益时，部分“00 后”易对道德准则滋生功利化妥协；而他们中小学阶段的德育课程，正赶上新课程改革秉持“以学生发展为本”，既强调内容贴合青少年个体特质与内在主体性，更侧重通过情感价值滋养、生活实践渗透与社会认知引导夯实道德底色 [5]。

该研究清晰呈现“00 后”鲜明代际特征：64.42% 的学生明确学习生活高度依赖网络，印证数字化生存已成为群体常态；41.83% 以“个性张扬”、35.58% 以“做事有主见”界定自身，凸显新一代重独立判断、轻权威盲从的认知倾向，这种特质既为创新思维提供可能，亦可能加剧价值观个体化趋势；数据共同勾勒出矛盾图景——青年在外部环境挑战中重构诚信认知，又在技术赋能下形成强自主性人格。

正处于价值观定型关键阶段的“00 后”大学生，既要应对较前辈更为复杂的道德场域，又已孕育出更强的自主意识，教育者务必深透把握这代人的特质——既要正视外部负面因素对其价值观建构的客观干扰，又不淡化现实挑战，更要笃定相信他们在数字化浸润与新型教养模式滋养下练就的自我调适本领，让理解与引导形成合力。关键要搭起开放的参与式价值观教育框架，让青年人在真实世界的复杂博弈里，既把道德定力扎牢，又练出跟时代合拍的价值判断力；而这种“守原则”与“善应变”的平衡培养，正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培育出既守得住底线、又容得下差异的新时代公民的核心，为社会稳定注入持久活力。

五、结论

数字化时代成长的“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深嵌时代特质：价值观上追求个人成长与社会贡献的平衡，既务实奋进又警觉“内卷”；学习中重自主规划，善用网络资源拓展认知；消费以需求为核心，尽显理性克制；心理健康认知提升，但部分仍陷目标缺失的迷茫；人际关系更重质量与情感共鸣，这些特征皆深深受制于家庭教育转型、网络环境塑造及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叠加影响。

研究证实，“00 后”大学生虽有着突出的自主意识与适应能力，却也遭遇诚信观念受扰、心理调适承压等实际困境，高校教育必须锚定其代际特质，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参与性的引导体系——既充分关注个性化发展需求，又通过扎实的价值引领帮助他们在复杂境遇中筑牢道德根基；未来需更深入地探析技术变革与社会演进对青年群体的深层塑造作用，进而培育出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既懂实干又善创新的新时代人才。

（下转 264 页）

“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

马文清　苏　霞

摘要：顶岗实习作为提高师范生专业素质的重要路径，可以帮助师范生转变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在“互联网 +”理念的引导下人们的工作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帮助师范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拓展自身的教育教学资源，丰富师范生的线上交流渠道，也使其在身份认同以及角色转换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为此，本文首先对“互联网 +”与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关联性进行探究，其次分析“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的实践路径，以期有效提高“互联网 +”背景下师范生的顶岗实习质量，促使师范生顺利完成身份转变。

关键词：“互联网 +”；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角色转换

一、引言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学校教师补充难题，正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关键瓶颈。参与顶岗实习的定向师范生，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从“高校学生”到“一线教师”的身份转变，同时还要承担起班主任、学科任课教师乃至行政辅助人员等多重角色任务[1]。由于这种密集的角色转换，与教育场景本身的特殊性相互叠加，师范生在顶岗实习期间面临的压力，远大于普通教育实习。随之而来的，是师范生身份认同模糊、角色适应困难等问题愈发凸显，不仅会直接影响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实际效果，还可能对其未来的教师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随着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互联网 +”理念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新的路径，可帮助师范生减少在角色适应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逐步建立起清晰的教师职业认同感，最终顺利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过渡，为其未来投身教育事业奠定坚实基础[2]。

二、“互联网 +”与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关联性

（一）“互联网 +”为顶岗实习提供资源支持

对于参与顶岗实习的师范生而言，教学资源的有效获取与教学经验的逐步积累，是其构建教师角色认知的重要基础，而“互联网 +”模式恰好能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高效解决方案。师范院校作为师范生培养的主阵地，可主动搭建校内教育实习网络平台，便捷获取与教育场景高度适配的教学素材，师范生可以提前熟悉任课教师需掌握的课程设计技巧、班主任须具备的班级管理知识等，从而减少正式进入实习岗位后的角色适应阻力[3]。与此同时，师范生可利用微信公众号、专业教育论坛等网络平台，学习最新的教育政策动态、前沿的教学理念以及各地的乡村教育实践经验，帮助师范生打破乡村实习点的地域限制，拓宽教育视野。

（二）“互联网 +”搭建多向交流桥梁

师范生在顶岗实习的过程中，面临的师生之间沟通不顺畅、指导工作出现断层等问题，常常会加大师

（上接 263 页）

参考文献

[1] 万美容，曾兰．“9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策略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12(08):10-13.

[2] 王海建．“00 后”大学生的群体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2018(10):90-94.

[3] 林晓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家庭变迁：轨迹、逻辑与趋势 [J]. 妇女研究论丛，2018(05):52-69.

[4] 徐鹤，郑欣．关系泛化与差序传播：青少年网络语言使用及其人际交往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2018(08):23-31.

[5] 任园，陈宁．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德育课程回顾与展望 [J]. 思想政治课教学，2018(12):4-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2025-ZDJH-489）。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范生的角色转换难度，而“互联网 +”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交流机制，能够有效摆脱这一困境。一方面，各类在线协同平台能够将师范院校导师、实习学校导师与师范生三方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可实时互动的指导体系。其中，师范院校导师可以借助平台的直播听课功能，观察师范生的课堂教学过程，课后通过线上评课的方式及时指出师范生在课堂管理、教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实习学校导师则可利用微信群、企业微信等社群工具，随时为师范生解答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4]。另一方面，参与顶岗实习的师范生之间，也能通过“互联网 +”搭建起交流桥梁，师范生不仅可以在教育类论坛发帖分享自己的实习心得，也能在专属社群中围绕某个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交流解决策略，有效减少师范生在顶岗实习期间产生的角色焦虑，帮助师范生更快适应教师身份。

（三）“互联网 +”可推动角色认同深化

在师范生顶岗实习的过程中，“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实习流程的可视化与精准化监管。以往所开展的实习监督主要依靠师范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提交的实习日志、总结报告等材料，导致院校方难以及时掌握师范生的实习动态，基于“互联网 +”技术，院校可通过对师范生实习任务的进度跟踪、教学视频上传等方面的内容，了解师范生的工作态度以及任务完成情况，充分确保实习质量。此外，院校方也可利用“互联网 +”技术为师范生搭建实习基地，利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模拟真实课堂环境，帮助师范生提前进入教师角色，减少师范生顶岗实习期间的焦虑感。与此同时，院校也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师范生的专业特征，与合作的实习学校进行智能化匹配，继而提升师范生的实习效率，促进师范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实现角色身份的有效转换。

三、“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的影响因素

（一）师范生个人层面

在顶岗实习前，多数师范生对教师角色的认知多停留在“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理想化描述，未充分了解教师职业的实际职责与工作压力。进入实习岗位后，面对教学质量要求、职业行为限制等现实情况，忽视教师角色的责任与义务，阻碍师范生身份认同理念的构建。在专业能力上，师范生虽然掌握了理论知识，但是难以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常出现课前设计不完整、课中语言与提问技巧欠缺、课后无法及时反思等问题。同时，在信息素养方面，师范生受传统书面教育的影响，对“互联网 +”背景下的数字技术掌控力比较弱，难以满足现代教育需求，影响角色转换。此外，部分师范生选择师范专业的原因是专业调剂或外在因素的影响，职业认同感不强，实习中对教师身份的价值感认知不足，进而延缓其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进程。

（二）实习学校层面

实习学校在接收师范生顶岗实习时，常因想要维护原有教学计划、保障日常教学效果，存在不愿接收师范生的情况。接收师范生的实习学校也仅安排其参与课堂观摩、教案整理等辅助性工作，没有为他们提供独立授课、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机会，使得师范生无法通过实践亲身体验教师角色的核心职责，实践技能难以得到锻炼，进而阻碍其对教师身份的认同与角色转换。此外，实习学校普遍未建立完善的指导教师制度，指导教师仅在师范生首次试讲时提供短暂的点评与建议，后续缺乏针对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家校沟通等方面的持续、系统的教学指导与反馈。同时，部分指导教师自身存在教育理念滞后的问题，无法为师范生提供符合现代教育需求的有效指导，不利于师范生提升教学能力与快速适应教师角色[5]。

（三）师范院校层面

在课程设置上，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多侧重教育理论知识的传授。在师范生实习与工作中需要具备的班级日常管理技巧、师生高效沟通方法、信息化教学工具操作等技能方面，缺乏系统的课程设计与专项培养机制。同时，与职业素养相关的课程内容也多局限于宏观的职业生涯规划框架，未深入到人际协调、职业认同感培育等具体能力的训练，导致师范生在进入实习岗位后，面对教学实操、职场沟通等实际问题时常常手足无措，直接增加了角色转换的难度。此外，在实习管理与评价环节，师范院校对师范生顶岗实习的过程管理缺乏实时监控与动态指导机制，未能及时掌握实习生的实际困境并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实习评价体系主要依赖实习学校提交的简单评语，缺乏多维度的综合考量，且评价结果未能及时详细地反馈给师范生，不利于其教师身份认同的构建与角色转换的推进。

四、“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的实践路径

（一）促进师范生自我提升，夯实角色基础

师范生需主动了解教师职业的实际职责与工作内容，可通过阅读教育类专著、定期关注教育部门官网及行业动态等方式，打破对教师角色的理想化认知，理性看待教师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在进入顶岗实习阶段前，师范生要明确自身“准教师”的身份定位，实习中主动承担备课、授课、班级管理等教师职责，以教师的职业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速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认知转变。同时，师范生需持续巩固专业理论知识，积极参与校内组织的教学技能训练、模拟授课等活动，在反复练习中提升自身将理论转化为实际教学的能力。针对“互联网 +”教育需求，师范生要主动学习数字信息技术，如掌握多媒体课件制

作技巧、熟悉在线教学平台操作流程，熟练运用网络教学资源与微格教学系统，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为角色转换奠定技能基础。此外，师范生可通过参与乡村教育志愿活动、与一线优秀教师交流等方式，挖掘并深刻认识教育事业的价值，激发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之情，强化职业认同感。师范生也要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明确目标与路径，针对性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做好角色转换的心理与能力准备。

（二）优化实习学校培养环境，推动角色适应

实习学校需明确师范生“准教师”的身份定位，在安排工作任务时实习学校应结合师范生的专业能力与实习进度，合理分配教学相关任务，让师范生承担部分学科的课堂教学、参与班级日常管理或协助设计教学活动等，为其提供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让师范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感知教师角色的核心职责。同时，实习学校需减少非教学类行政工作的分配，避免物资统计、设施维修等事务占用师范生过多时间，确保其能专注于备课、授课、教学反思等教育教学核心任务，通过实践体验构建清晰的教师角色认知。实习学校也需建立完善的实习指导教师制度，通过选择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以及信息化教学能力强的教师组建指导教师队伍，帮助师范生快速了解实习学校的教学流程，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提升师范生对教师角色和岗位的适应能力。此外，实习学校也要在校内营造良好的实习氛围，不仅要鼓励正式教师对师范生进行帮助并配合他们的教学工作，也要提前向学生与家长说明师范生前来实习的目的，提升学生与家长对师范生教学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师范生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学探讨、教师交流等活动中，增强师范生的归属感与角色认同感，促进师范生向教师角色身份的顺利转换，继而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具有强烈职业认同感的师资队伍。

（三）深化师范院校教育改革，做好转变保障

师范院校需从课程体系、实习保障、管理评价三方面深化改革，为师范生顶岗实习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师范院校要主动调整课程结构，显著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针对师范生的实习需求，开设“班级管理实务”“信息化教学应用”“师生沟通技巧”等实用课程，采用教育案例分析、模拟课堂授课、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让师范生在顶岗实习阶段就能积累实操经验，提升教学实践能力。同时，完善职业素养课程内容，增设人际协调、职业认同感培育、职场适应策略等模块，邀请一线优秀教师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或担任兼职授课教师，结合真实教育场景传授经验，帮助师范生提前掌握应对职场问题的能力。其次，在实习基地建设方面，师范院校需积极推进稳定、优质的顶岗实习基地建设，主动与乡村学校、城镇优质中小学对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在师范生培养中的权利与义务。通过资源支持与利益保障，充分调动实习学校参与师范生培养的积极性。构建“师范院校－实习学校”协同育人机制，由双方共同制定实习计划、全程指导实习过程、联合评价实习效果，为师范生打造持续、优质的实习环境。最后，师范院校要借助“互联网 +”技术强化实习管理与评价，搭建专属的实习管理平台，实现对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实时监控。与此同时，安排院校导师在线开展教学指导、解答疑问，同时共享教学案例、课件模板等资源。与此同时，院校需构建科学的实习评价体系。从教学技能、职业素养、信息技术应用等多维度设计评价指标，采用师范生自评、实习生间互评、实习学校导师评价、师范院校综合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全面的评价结果，并将评价结果及时、详细地反馈给参与顶岗实习的师范生，引导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与改进，助力其加快教师身份认同，并顺利完成角色转换。

五、结语

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师范生顶岗实习的质量，影响其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我国教师队伍后备力量整体水平的提升。为此，师范院校需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课程改革、实习指导等举措，调动师范生主动强化自我提升的积极性，帮助其提升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实习学校的协同合作，推动实习学校优化培养环境，帮助师范生更快地完成从优秀学生到优秀教师的角色转变，为教育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 刘海兰，陈民聪，夏金星 .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视角下顶岗实习模式的创新——H 学校“现代师徒制顶岗实习”的探索与实践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10):51-58.

[2] 欧阳芳，姚林芳 . 角色转变下的师范生教育顶岗实习质量现状与改进策略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05):112-115.

[3] 于敏章，袁梓菡 . 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的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成都师范学院为例 [J]. 林区教学 ,2022(09):43-46.

[4] 谭娟，谭明，安福杰 . 顶岗实习对师范生教学能力影响的调查分析——以湖南科技学院为例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1,5(21):25-29.

[5] 付瑶，朱成科 . 我国师范生乡村“顶岗实习”实践教学模式利弊分析及优化策略 [J].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2):113-1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互联网 +’理念下师范生顶岗实习身份认同与角色转换”（GJJGB339）。

（作者：马文清，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苏霞，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鲍　晶 *　王逸远　刘桂文

摘要：大学生普遍存在“晚睡晚起”的睡眠拖延行为，睡眠作息紊乱与学业任务负担的双重压力，往往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本研究选择宁夏固原市某高校 536 名在校生，针对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睡眠拖延行为表现及自我控制能力三者间的关联性开展系统探究。研究结果表明：①自我控制能力在年级上差异显著（F=4.402,p ＜ 0.05），且随着年级增长而提升；②睡眠拖延行为与未来时间洞察力（r ＝ -0.369,p ＜ 0.01）和自我控制（r ＝ -0.550,p ＜ 0.01）均呈显著负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r ＝ 0.413,p ＜ 0.01）。③自我控制对睡眠拖延行为的负面预测作用显著（β=-0.310，95%CI=[-0.359,-0.261],p<0.001），说明自我控制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之间构建了影响桥梁。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存在双路径机制，不仅通过自我控制间接减少睡眠拖延，还具有直接抑制作用。

关键词：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睡眠拖延行为

一、引言

《2025 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1] 指出，大学生晚睡晚起已成为常态。仅有 21% 的大学生在零点前入睡，25% 的大学生凌晨 2 点后才就寝，另外 32% 的大学生早上 9 点后起床。大学生睡眠不足可能是推迟上床的结果，称为睡眠拖延 [2]，即在没有外部阻碍的情况下，仍无法按预定时间就寝。而睡眠拖延的直接后果就是睡眠时间缩短或睡眠不足，严重影响大学生日常的学习与生活，甚至会产生许多负面后果，包括疲劳、肥胖以及提高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3]。

关于睡眠拖延行为的产生机制中，未来时间洞察力这一心理构念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取向的时间感知能力越强，个体越能够预估和判断当下行为的未来后果，表现出的睡眠拖延程度越低。

除此之外，睡眠拖延行为也与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相关。自控力低的人倾向于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目标，如短期使用娱乐设备获得暂时满足的快感；而自控力高的人能够更好地抵制短期满足的诱惑，并做长期来看最好的事情。

综上所述，睡眠拖延行为的产生与自我控制、未来时间洞察力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存在内部关联因子。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低自我控制力与低未来时间洞察力均影响睡眠拖延行为，然而，自我控制如何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及睡眠拖延行为，目前对此研究尚为欠缺。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对大学生群体中睡眠拖延现象内在机理的探究，并分析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宁夏固原市某高校 536 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参与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线上调查工具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 602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536 份，有效率达 89%。调查对象中，男生 66 名（12.3%），女生 470 名（87.7%）；大一学生 83 名（15.5%），大二学生 101 名（18.8%），大三学生 314 名（58.6%），大四学生 38 名（7.1%）；城市户籍学生 160 名（29.9%），农村户籍学生 376 名（70.1%）。

（二）研究工具

1. 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采用宋其争 [4] 编制的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该量表共有 20 个题目，其维度分别为未来效能、未来意向、远目标定向、目的意识和行为承诺。其中 2、17、18、19 与 20 题为反向计分题项。洞察力水平与表内得分正相关，其中 Cronbach's α 系数在本研究的量表中设定为 0.904。

2. 睡眠拖延量表

采用 Kroese 等 [5] 编制、马晓涵等 [6] 修订的中文版睡眠拖延行为量表，其包括 9 个题目。采取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其中 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

其中第 2、3、7、9 题为反向计分题项，得分高代表个体睡眠拖延行为更加严重。其中 Cronbach's α 系数在本研究的量表中设定为 0.885。

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谭树华等 [7] 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其内容包含 5 个维度，共计 19 个题目，分别为健康习惯（3 题）、专注工作（3 题）、抵制诱惑（4 题）、节制娱乐（3 题）以及冲动控制（6 题）。总分由各项目计分累计得到，得分越高则代表自我控制能力更强。其中 Cronbach's α 系数在本研究的量表中设定为 0.868。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分析。由研究结果可知，其中最大的因子解释量为 25.46%，远低于 40%，故并无显著共同方法偏差的情况。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针对大学生群体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睡眠拖延行为表现与自我控制能力三者间的关系，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未来时间洞察力	睡眠拖延行为	自我控制
未来时间洞察力	56.54	9.04	1		
睡眠拖延行为	29.30	6.74	–0.369**	1	
自我控制	60.85	10.57	0.413**	–0.550**	1

注：* p<0.05 **， p<0.01***，p<0.001。

由表 1 数据可知，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 [（56.54±9.04）分] 和睡眠拖延行为得分 [（29.30±6.74）分] 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自我控制得分 [（60.85±10.57）分]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表现与自我控制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体现；睡眠拖延行为得分则可以看出与自我控制、未来时间洞察力二者的得分均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随年级的变化，自我控制能力出现显著差异：除冲动控制维度外，不同年级群体的自我控制总分及其他维度得分呈现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高年级在自我控制总分及其他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大一年级，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自我控制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M±SD）

	年级（M ± SD）				F	p	事后比较
	①大一（n=83）	②大二（n=101）	③大三（n=314）	④大四（n=38）			
抵制诱惑	11.65 ± 2.28	12.81 ± 2.32	12.69 ± 2.45	12.47 ± 2.49	4.667	0.003**	②>①；③>①
健康习惯	7.99 ± 2.49	8.72 ± 2.21	8.67 ± 2.58	9.71 ± 2.76	4.214	0.006**	④>②>①；④>③>①
节制娱乐	10.11 ± 2.69	10.78 ± 2.24	10.53 ± 2.60	11.53 ± 2.42	2.974	0.031*	④>①；④>③
冲动控制	19.92 ± 4.35	20.98 ± 4.23	20.43 ± 4.80	21.95 ± 4.57	2.052	0.106	
专注工作	8.22 ± 1.73	8.82 ± 1.87	8.43 ± 1.60	9.00 ± 1.64	3.315	0.020*	②>①；④>①；②>③；④>③
自我控制总分	57.88 ± 9.62	62.12 ± 9.45	60.76 ± 10.99	64.66 ± 10.42	4.402	0.005**	②>①；④>③>①

注：* p<0.05 **， p<0.01***，p<0.001。

（三）中介作用检验

将睡眠拖延行为设定为因变量，同时把未来时间洞察力设定为自变量，自我控制设定为中介变量，并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3 所示。

如表 3 所示，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CI 为 [-0.189，-0.108]，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直接路径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对睡眠拖延行为的回归显著 β=-0.131，p ＜ 0.001，95%CI=[-0.189,-0.074]。间接路径方面，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存在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 β=0.479，p ＜ 0.001，95%CI=[0.385,0.567]；自我控制可以明显对睡眠拖延行为进行负面预测 β=-0.310，95%CI=[-0.359,-0.261]，p ＜ 0.001。使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关系进行量化，以中介因子的成分参与回归分析，该类作用通过自我控制变量得以实现。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因子起到的中介效应 SEM（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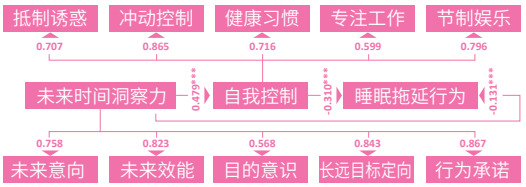


图 1 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间的 SEM 图

四、讨论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的关系中，存

表 3 未来时间洞察力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方程显著性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自我控制	未来时间洞察力	0.419	0.175	56.69	0.479	0.385	0.567	10.291***
	年级				0.859	–0.124	1.842	1.717
睡眠拖延行为	未来时间洞察力	0.577	0.333	88.496	–0.131	–0.189	–0.074	–4.520***
	自我控制				–0.310	–0.359	–0.261	–12.457***
	年级				0.623	0.057	1.188	2.162*

注：* p<0.05 **， p<0.01***，p<0.001。

在自变量增加而因变量减少的情况，因此认为两者之间具有负向预测效应。将自我控制变量引入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其对睡眠拖延行为具有负向预测效应，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自我控制则具有正向预测效应。由此可发现，自我控制这一中介变量，可以将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睡眠拖延行为在回归分析中统一起来进行关系分析。

较低水平的睡眠拖延行为可能出现在那些具有较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大学生群体中。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8]。未来洞察力较强的个体在行为中会考虑到当前行为对未来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之间的潜在联系，并认为自己正在从现在走向未来，个体能够感知睡眠时间的接近性。此外，他们可能对睡眠价值有更高的评估，而规律睡眠的好处只有通过长期坚持才能体现出来。

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睡眠拖延行为，自我控制是睡眠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自我控制力低的人长期面临屈服于诱惑的风险；而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人更有可能抵制睡眠拖延行为。行为的习惯化程度越高，自我控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小。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自我控制起着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一致。长远目标规划行为能够显示出个体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较强，同时更高的自我控制能力得以显现，促使个体做出更理性而非冲动的决定。

五、培养建议

（一）睡前设定明确的未来目标以增强行为调控

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的大学生能够更有效地权衡当前行为与长期目标的关系，追求高价值目标，并通过未来的目标和奖励来引导和支配个人行为。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还对健康行为的维持具有积极影响。基于此，建议大学生在睡前设定具体目标，并附以奖励机制，以强化未来时间洞察力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增强个体自我控制能力。

（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设备以切断拖延诱因

睡前 1 小时接触电子设备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延迟入睡时间。这会严重破坏大学生的睡眠模式，扰乱自身昼夜节律，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日间嗜睡、注意力不佳等认知损害，还可能会产生上课迟到甚至旷课等行为。因此，建议大学生建立“睡前数字宵禁”制度，如手机定时关机、到点自动切换至黑白屏幕模式、将充电处安置在远离床铺的书桌等方式，打破“刷屏—拖延”的恶性循环，切断睡眠拖延诱因。

（三）正念训练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以减少拖延

一般的拖延行为往往是由个体短期情绪高涨驱动的，如过度焦虑或兴奋，这些情绪会耗尽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进而导致睡眠拖延行为。正念干预法已被证实能提升自我控制力，通过系统的正念训练（如三步呼吸练习、躯体扫描训练）可以帮助大学生提升自控力，减少睡眠拖延行为。

六、结论

研究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既可以直接影响睡眠拖延行为，也可以提升大学生自我控制力从而渐渐减少睡眠拖延行为。因此，可以通过心理疗法来增强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使学生能够预见睡眠时间的接近性，从而增强自我控制能力避免睡眠拖延。但由于不同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表现存在显著差异，要达到减少睡眠拖延目的还需要按照年级、年龄为学生设计不同的干预措施。整体而言，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由于研究的横断面设计，无法对所观察到的关联进行因果推论，其次是研究主要关注了年级这一人口学变量，未纳入其他潜在变量（如压力、情绪状态）的影响，最后是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受限。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方法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中国睡眠研究会 .2025 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 [EB/OL].(2025-03-25)[2026-01-30].http://www.zgsmyjh.org/nd.jsp?-fromColId=105&id=945#_np=105_1090.

[2] KROESE F M,DE RIDDER D T D,EVERS C,et al.Bedtime procrastination:introducing a new area of procrastination[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4,5:611.

[3]BROSTRM A,FRIDLUND B,HEDBERG B,et al.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 syndrome and healthcare personnel during the initial visit to a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linic[J].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7,26:568–577.

[4] 宋其争 .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D].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5]KROESEF M,EVERS C,ADRIAANSEM A,et al.Bedtime procrastination: A self-regulation perspective on sleep insufficienc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14,21:853-862.

[6] 马晓涵 , 祝丽巍 , 郭婧 , 等 . 中文版睡眠拖延行为量表在大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29(04):717-720.

[7] 谭树华 , 郭永玉 . 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6(05):468-470.

[8] 谭淑仪 .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睡眠拖延行为的作用机制 [D]. 广州 : 广州大学 , 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支持科研项目“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NYG2024204）。

（作者：通信作者鲍晶，宁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助教；王逸远，宁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助教；刘桂文，宁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表达性艺术疗法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的治疗效果分析

刘嘉文

摘要：本研究探讨表达性艺术疗法对广西高校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的干预效果。共招募 120 名存在社交回避行为的大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n=60，接受 8 周表达性艺术疗法）和对照组（n=60，无干预），并在干预前后采用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ADS）和人际交往能力量表（ICS）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干预后实验组 SADS 总分及社交回避、社交焦虑维度下降，ICS 总分及倾听表达、情绪理解、社交自信等维度提升（P ＜ 0.001）；对照组无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表明，干预效果在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上差异不显著，具有普适性。研究表明，表达性艺术疗法通过非语言表达、象征体验与创造性活动，为社交回避大学生提供安全的情绪与关系探索空间，促进自我觉察、情绪调节和人际能力提升。

关键词：表达性艺术疗法；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广西区域；心理健康干预

随着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普及，广西区域高校大学生社交压力渐增，社交回避行为已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重要问题[1]。社交回避行为表现为个体在社交场景中主动回避与他人接触、拒绝参与社交活动，长期如此会让大学生人际关系受损、学业受阻，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2]。当前，广西区域高校多采用传统认知行为疗法干预，该疗法对语言表达能力要求高，部分广西本土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因方言文化、性格等因素，普通话表达能力相对薄弱，导致干预效果受限。表达性艺术疗法以绘画、音乐等非语言媒介为载体，能帮助个体绕过语言局限，释放情绪、探索自我，为干预提供新路径。本研究以广西区域高校大学生为对象，探讨该疗法的治疗效果，旨在提供本土化、可操作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同时丰富其在民族地区高校的应用研究。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5 所高校，含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职业技术类、高职院校，选取时间为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1 月。用分层抽样法从 5 所高校大一至大四学生中抽取 1500 名初筛，采用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ADS）筛选，标准为：SADS 评分 ≥30 分（依据量表常模与广西区域大学生前期调研数据）；近 3 个月未接受心理健康干预；无严重精神疾病史与艺术过敏史；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最终确定 120 名，用随机数字表法分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名，两组性别、年龄、民族、专业分布相近。对两组人口学资料做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卡方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1. 实验组干预方案

实验组接受 8 周表达性艺术疗法干预，每周 1 次、每次 90 分钟，场所为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团体辅导室，由 2 名经系统培训且有相关认证、5 年以上高校心理咨询经验的临床心理师分别担任主带与辅助教师。方案结合广西区域大学生文化特质与社交回避特点设计，共包含 4 个模块，每个模块持续 2 周：绘画模块（1~2 周），引导研究对象通过自我画像及绘制回避场景，探索并表达内在情绪；音乐模块（3~4 周），让研究对象选择匹配自己情绪的音乐并进行即兴演奏；舞动模块（5~6 周），引导研究对象运用肢体动作表达内在情绪，进行双人互动训练；戏剧模块（7~8 周），由研究对象编写社交剧本，并通过演绎与反思，总结应对技巧。

2. 对照组处理方式

对照组在研究期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健康干预，为保证研究伦理，在本研究结束后，将为对照组研究对象提供为期 2 周的简化版表达性艺术疗法干预课程。

3. 测评工具

（1）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ADS）：由 Watson 与 Friend 编制，共 28 个条目，含社交回避（14 条）、社交苦恼（14 条）分量表，采用“是—否”两点计

分，总分 0~28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交回避与苦恼越重。此表在国内大学生中应用广、信效度好，本研究 Cronbach'sα 系数 0.823。

（2）人际交往能力量表（ICS）：由 Buhrmester 与 Furman 编制，经国内学者修订后适用于大学生，共 36 个条目，含 4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1= 完全不符合至 5= 完全符合），总分 36~180 分，得分越高表示人际交往能力越强，本研究 Cronbach'sα 系数 0.856。

4. 数据收集流程

在干预开始前 1 周（T_1），由经过培训的研究助理向两组研究对象发放 SADS 与 ICS 量表，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填写要求，当场回收量表，共发放量表 120 份，回收有效量表 1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在干预结束后 1 周内（T_2），采用相同方式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第二次测评，共发放量表 120 份，回收有效量表 1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三）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分析。先做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 检验）与方差齐性检验（Levene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与方差齐性要求（P ＞ 0.05）。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在 T_1、T_2 时间点的 SADS 评分与 ICS 评分差异；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自身在 T_1 与 T_2 时间点的评分差异；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两组在不同时间点的评分变化趋势，组间因素为“干预分组”，组内因素为“测评时间”。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为进一步量化表达性艺术疗法的干预效果，本研究引入效应量（Effect Size，ES）指标，采用 Cohen's d 公式计算效应量，具体公式如下：

$$d = \frac{\bar{X}_1 - \bar{X}_2}{\sqrt{\frac{(n_1-1)s_1^2 + (n_2-1)s_2^2}{n_1+n_2-2}}} \quad (1)$$

式（1）中，$\bar{x}_1$、$\bar{x}_2$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量表平均分；n_1、n_2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量；s_1^2、s_2^2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量表方差。根据 Cohen 提出的标准，|d|≥0.8 为大效应，0.5≤|d| ＜ 0.8 为中等效应，0.2≤|d| ＜ 0.5 为小效应，|d| ＜ 0.2 为极效应。

二、结果

（一）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 SADS 评分与 ICS 评分比较

干预前（T_1），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SADS 总分、社交回避分量表评分、社交苦恼分量表评分及 ICS 总分、人际交往能力各维度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实验组与对照组在 SADS 总分（t=0.321，P=0.749）、社交回避分量表评分（t=0.287，P=0.774）、社交苦恼分量表评分（t=0.356，P=0.722）及 ICS 总分（t=0.456，P=0.649）、主动交往维度评分（t=0.412，P=0.681）、冲突解决维度评分（t=0.398，P=0.691）、情感支持维度评分（t=0.435，P=0.664）、自我表露维度评分（t=0.478，P=0.633）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进一步验证了两组研究对象的可比性。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 SADS 评分与 ICS 评分比较（$\bar{x} \pm s$，分）

指标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t 值	P 值
SADS 总分	35.21 ± 4.32	34.98 ± 4.56	0.321	0.749
社交回避分量表评分	17.89 ± 2.15	17.76 ± 2.23	0.287	0.774
社交苦恼分量表评分	17.32 ± 2.08	17.22 ± 2.17	0.356	0.722
ICS 总分	89.65 ± 10.23	88.92 ± 10.56	0.456	0.649
主动交往维度评分	20.12 ± 3.15	19.98 ± 3.22	0.412	0.681
冲突解决维度评分	21.35 ± 3.08	21.12 ± 3.17	0.398	0.691
情感支持维度评分	23.21 ± 3.25	23.05 ± 3.32	0.435	0.664
自我表露维度评分	25.02 ± 3.18	24.77 ± 3.25	0.478	0.633

（二）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后 SADS 评分与 ICS 评分变化比较

干预后（T_2），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 SADS、ICS 评分做配对样本 t 检验，对两组干预后评分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实验组干预后 SADS 总分（[26.35±3.87）分] 显著低于干预前 [（35.21±4.32）分]（t=10.324，P ＜ 0.001），其社交回避 [（12.15±1.98）分 vs (17.89±2.15) 分，t=9.876，P ＜ 0.001]、社交苦恼 [（14.20±1.85）分 vs (17.32±2.08) 分，t=8.765，P ＜ 0.001] 分量表评分亦显著降低。实验组干预后 ICS 总分 [（112.35±12.15）分] 显著高于干预前 [（89.65±10.23）分]（t=9.876，P ＜ 0.001），人际交往能力各维度评分均显著提升（P ＜ 0.01）。

对照组干预后 SADS 总分 [（34.85±4.62）分] 与干预前 [（34.98±4.56）分]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67，P=0.572）；社交回避 [（17.68±2.25）分 vs (17.76±2.23) 分，t=0.412，P=0.681]、社交苦恼 [（17.17±2.21）分 vs (17.22±2.17) 分，t=0.387，P=0.700] 分量表评分亦无显著差异。对照组干预后 ICS 总分 [（89.15±10.68）分] 与干预前 [（88.92±10.56）分] 相比（t=0.612，P=0.542），其主动交往、冲突解决、情感支持、自我表露各维度评分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三）表达性艺术疗法干预效果的效应量分析

根据式（1）计算两组干预后 SADS、ICS 评分效应量（Cohen's d），结果如表 3 所示。SADS 方面，总分（d=2.21）、社交回避（d=2.05）、社交苦恼（d=1.87）均为大效应（|d|≥0.8），表明该疗法对降低社交回避与苦恼效果强。ICS 方面，总分（d=1.98）、主动交往（d=1.82）、冲突

解决（d=1.95）、情感支持（d=1.89）为大效应，自我表露（d=0.58）为中等效应（0.5≤|d|<0.8），说明该疗法对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效果显著，尤其在主动交往等方面[3]。

表 2　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后 SADS 评分与 ICS 评分变化比较（$\bar{X} \pm s$，分）

指标	组别	干预前（T_1）	干预后（T_2）	t 值	P 值
SADS 总分	实验组	35.21 ± 4.32	26.35 ± 3.87	10.324	< 0.001
	对照组	34.98 ± 4.56	34.85 ± 4.62	0.567	0.572
社交回避分量表评分	实验组	17.89 ± 2.15	12.15 ± 1.98	9.876	< 0.001
	对照组	17.76 ± 2.23	17.68 ± 2.25	0.412	0.681
社交苦恼分量表评分	实验组	17.32 ± 2.08	14.20 ± 1.85	8.765	< 0.001
	对照组	17.22 ± 2.17	17.17 ± 2.21	0.387	0.700
ICS 总分	实验组	89.65 ± 10.23	112.35 ± 12.15	9.876	< 0.001
	对照组	88.92 ± 10.56	89.15 ± 10.68	0.612	0.542
主动交往维度评分	实验组	20.12 ± 3.15	26.78 ± 3.56	8.654	< 0.001
	对照组	19.98 ± 3.22	20.05 ± 3.28	0.456	0.649
冲突解决维度评分	实验组	21.35 ± 3.08	28.92 ± 3.45	9.231	< 0.001
	对照组	21.12 ± 3.17	21.21 ± 3.25	0.423	0.674
情感支持维度评分	实验组	23.21 ± 3.25	29.65 ± 3.62	8.987	< 0.001
	对照组	23.05 ± 3.32	23.12 ± 3.38	0.478	0.633
自我表露维度评分	实验组	25.02 ± 3.18	27.00 ± 3.58	3.215	0.002
	对照组	24.77 ± 3.25	24.77 ± 3.31	0.000	1.000

表 3　表达性艺术疗法干预效果的效应量分析（Cohen's d）

指标	效应量（d）	效应强度
SADS 总分	2.21	大效应
社交回避分量表评分	2.05	大效应
社交苦恼分量表评分	1.87	大效应
ICS 总分	1.98	大效应
主动交往维度评分	1.82	大效应
冲突解决维度评分	1.95	大效应
情感支持维度评分	1.89	大效应
自我表露维度评分	0.58	中等效应

三、讨论

（一）表达性艺术疗法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的干预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该疗法能显著降低广西区域高校大学生社交回避水平，提升其人际交往能力，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一致[4]。其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非语言表达路径，帮助存在语言表达社交困境的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绕过语言障碍，释放焦虑，如绘画模块的“社交场景再现”让学生的情绪可视化，有效起到宣泄作用；二是团体互动路径，团体形式的小组分享等环节创造低压力社交环境，帮助学生降低社交恐惧、学习社交技巧；三是自我认知重构路径，戏剧模块的“剧本演绎与反思”帮助学生多角度理解社交，打破认知偏差，重建积极社交认知。

（二）表达性艺术疗法的广西区域文化适配性

本研究干预方案结合广西区域文化特征设计，是干预效果显著的重要原因。音乐模块引入壮族“天琴”、瑶族“长鼓舞”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让研究对象在熟悉的氛围中更放松，增强情感共鸣[5]；舞动模块借鉴壮族“三月三”歌圩集体舞蹈动作，符合少数民族社交习俗，易让研究对象产生“归属感”，降低肢体接触抗拒感。此外，广西高校大学生多具有集体取向，而表达性艺术疗法的团体协作环节恰好契合这一特质，能助力研究对象在适配的文化氛围中克服社交回避。

（三）干预效果的维度差异分析

从效应量结果看，表达性艺术疗法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各维度干预效果有差异：主动交往、冲突解决、情感支持维度为大效应，自我表露维度为中等效应。原因有两点：一是干预活动设计侧重不同，“音乐即兴创作”“社交舞动互动”等环节以“行动导向”为主，直接训练主动交往与协作能力，而自我表露训练依赖“绘画分享”，受个体特质影响大，部分内向研究对象分享有保留；二是自我表露风险感知更高，研究对象担心在团体中表露隐私被评判、嘲笑，抑制表露行为，而主动交往等行为风险感知低，更易尝试改变。

四、结论

本研究表明，表达性艺术疗法能显著降低广西高校大学生的社交回避与苦恼水平，同时可以有效提升其人际交往能力，尤其在主动交往、冲突解决和情感支持维度效果突出。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非语言表达、团体互动和自我认知重构三条路径实现。结合广西民族文化特征设计的干预方案，增强了文化适配性与参与度。尽管自我表露维度改善效果为中等，整体干预仍具良好实践价值。建议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将该疗法纳入常规团体辅导，并因地制宜优化本土化实施方案，以更有效地支持大学生社交能力发展。

参考文献

[1] 简福平，何仕瑞 . 团体绘画艺术疗法对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06):122-132.

[2] 江山秀，蒋培余，俞臻梁 . 视觉艺术疗法在痴呆病人护理中的应用进展 [J]. 护理研究，2021,35(05):856-860.

[3] 李瑶，赵永婷，梁巨锟 . 基于艺术疗法的电子游戏设计方法 [J]. 大众标准化，2021(17):28-30.

[4] 崔蕾，张喆，储成美，等 . 绘画艺术疗法结合社交行为训练方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症状改善的研究 [J]. 精神医学杂志，2022,35(05):521-525.

[5] 吕兵学，梁誉，盘湘龙 . 基于艺术治疗的老年玩具设计应用研究 [J]. 美与时代（上），2022(01):115-11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度校级课题“当代大学生‘社恐’现象的心理机制与干预策略研究”（2024-SKB01）。

（作者系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策略研究

马丹丹

摘要：情绪价值是个体传递积极情绪、缓解负面情绪、促进人际共鸣的核心，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增进人际关系，提升团队合作能力，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本文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结合优势理论、乐观主义理论与情绪智力理论，对大学生情绪价值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梳理，从学校、家庭、社会和个人四个层面提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情绪价值的有效策略，以期通过多主体协同干预，增强大学生心理调适的主动性与实效性，全面提升其心理素质，为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及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大学生；情绪价值；情绪管理；提升策略

一、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与生活节奏加快，大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日益凸显。进入大学后会出现环境适应、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情绪情感、就业与择业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情绪困扰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积极心理学以挖掘个体积极品质、培育积极情绪、实现自我发展为核心，打破了“重矫治、轻预防”的心理健康教育局限，为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框架。情绪价值的提升不仅能帮助大学生有效调适负面情绪、增强心理韧性，更能推动其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因此，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索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

1. 情绪价值：是近年来的一个常见概念，主要出现在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等领域，指个体在情绪方面对他人或自身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它主要涵盖了情绪的传递、共鸣、调节等，能给人带来愉悦、满足、激励等积极感受。良好的情绪价值对促进大学生人际关系、提升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通常是在情感共鸣、语言沟通及有效的行为方式等方面，满足他人的某些心理需求，如安全感、归属感等。

2.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兴分支，注重关注人的积极品质、优势和潜力，旨在促进人的幸福、成长和发展，以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心理韧性、乐观主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积极心理学强调通过培养人的积极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提升其生活满足感和心理健康水平[1]。

（二）理论基础

1. 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较为独特的优势。通过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加以运用，让个体在积极体验的体验中获得满足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增强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积极情绪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情绪价值和生活幸福感。

2. 乐观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乐观的思维方式对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发挥重要的作用，时刻保持积极情绪，将会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压力，提升情绪价值。乐观的心态能够使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看到未来的希望，从而提升自身的情绪价值，更好地调整心态，继续前行。

3. 情绪智力理论：该理论包括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社交觉察和关系管理等能力。高情绪智力通常能够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对管理自己的情绪有重要作用，能够使人及时感知和影响他人的情绪，察觉自己的情绪波动，减少负面情绪，通过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互动，传递积极情绪，从而提升自身和他人的情绪价值[2]。

三、大学生情绪价值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大学生情绪价值现状

1. 情绪管理能力欠缺。很多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不能很好地觉察情绪，同时也不善于运用积极的情绪表达和化解情绪，在遇到情绪问题时习惯于选取默默承受或者消极逃避等方式，导致负面情绪不能及时排解；同时，在情绪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技巧，不能很好地把握调节情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

间，导致情绪价值难以提升，进而对于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过度关注自身情绪。部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只考虑自己的情绪情感，过度关注自身情绪需求，没有进行换位思考和共情，不能理解和体会别人的感受，也不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不传递积极情绪，导致人际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影响了情绪价值的发挥。比如，在团队合作中，部分大学生只考虑自己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从不关心团队中其他人的完成情况和情绪，也不帮助他人，导致团队合作不愉快，影响了人际关系。

3. 缺乏积极情绪体验。很多学生认为“积极情绪主要来源于短期目标达成”，比如考试通过、实现了某个小愿望等，而实际却缺乏基于个人内在优势的持续幸福感。同时，部分大学生由于一些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学业压力、不适应环境、人际关系紧张、就业择业焦虑等原因，自己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同时长时间处于心理亚健康的状态，缺乏积极的情绪体验，无法体会到自身情绪对他人和自己的积极价值，这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成才等方面都存在不利影响[3]。

（二）面临的问题

1. 学业压力。大学课程多样化、专业性较强，学分要求较多，再加上对考试、就业的担忧，使许多大学生长期处于紧张担忧的学习状态，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不利于积极情绪的培养和情绪价值的提升。例如，有些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每天熬夜学习，精神高度紧张，久而久之，出现了失眠、焦虑等症状，学习效率反而下降，情绪价值也随之降低。

2. 家庭期望压力。部分家长仍以“成绩导向”为主要沟通内容，缺乏对子女情绪需求的识别能力，部分家长对子女的高期望可能给大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当学生自身表现与父母期望存在差距时，心理压力会不断增大，容易产生自卑和自责情绪，不利于情绪价值的提升。比如，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在大学期间能够获得各种奖学金、荣誉称号，当孩子未能达到这些目标时，就会受到家长的指责和批评，导致孩子心理压力过大，情绪低落。

3. 社交困境。部分大学生存在社恐问题，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害怕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言语交流障碍或肢体交流障碍等，社交能力不足、社交焦虑等情况，导致他们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无法从社交中获得积极的情绪价值。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表现得过于紧张、不自信，不敢主动与他人交流，错过了许多结交朋友、拓展社交圈子的机会，进而陷入孤独、自卑的负面情绪中，进一步影响了情绪价值的提升[4]。

四、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情绪价值提升策略

（一）学校层面

1.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革新。高校要将积极心理学相关内容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系统地向大学生传授情绪价值提升的理论和方法。融合积极情绪诱导技术（如感恩日记、善意行为练习）、压力接种训练（SIT）及积极叙事疗法，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通过小组互助作业强化实践应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在教学模式上，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学视频、阅读资料等方式自主学习课程内容，课堂上则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活动进行深入学习和交流。通过小组互助作业，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践应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掌握提升情绪价值的方法和技巧。

2. 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高校应积极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兴趣，提高参与度。比如，新媒体时代，组织大学生参加“积极心理短视频大赛”，让他们通过影像记录校园中的情绪价值瞬间，营造正向积极情绪的良好氛围。同时，可以定期举办“个人优势博览会”，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如进行个人才艺表演、学术成果展示、个人特色技能演示等，促进大学生相互了解，加强相互学习，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可以举办“心理健康趣味运动会”等心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积极情绪互动的校园心理环境，让学生在运动中释放压力，获得愉悦感，体验团队合作的乐趣，产生积极情绪价值，学习情绪价值提升的技巧，同时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3. 智能化与人工心理咨询服务相结合。开发“情绪罗盘”AI 小程序，实时开展情绪日志分析，提供个性化调节方案。例如，当学生记录自己处于焦虑情绪时，小程序可以推送相关的放松训练视频、冥想音频或缓解焦虑的文章等。同时高校要加强心理咨询服务队伍建设，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服务。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帮助大学生解决情绪困扰，挖掘自身潜力，提升情绪价值[5]。

（二）家庭层面

1. 营造积极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大学生的情绪价值有着重要影响。一个温暖、和谐、民主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大学生感受到关爱和支持，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家庭氛围应温暖、和谐、民主，家庭成员平时注意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家长应多给予大学生鼓励和肯定，不要给他们过多的压力，当孩子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给予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让大学生在家庭中感受到关爱和积极的情绪价值。

2. 构建良好的家庭沟通模式。家长要主动与大学生保持密切的情感沟通，构建理解与鼓励并存的家庭沟通模式，定期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情绪状态和心理需求。每周固定时间让子女分享情绪体验，家长以“倾听—共情—赋能”回应，以增强心理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当孩子表达负面情绪时，家长首先要表示理解和共情，站在孩子的角度感受他们的情绪，然

后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增强孩子的心理安全感和情绪价值。例如，当孩子倾诉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时，家长可以先表达对孩子感受的理解，然后引导孩子思考解决矛盾的方法，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力量。

3. 合理调整期望。通过家长工作坊，引导家庭从“成绩导向”转向“成长导向”。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对大学生的期望，避免过高的期望给孩子带来过大压力。鼓励孩子追求自身兴趣和发展，多一些尊重，少一些限制，当孩子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进步时，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帮助大学生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提升情绪价值。

（三）社会层面

1. 营造积极社会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开设“青年成长故事”专栏，聚焦大学生通过积极心理调适实现目标的案例，传递“成长型情绪管理”理念；短视频平台实施“情绪价值内容扶持计划”，对传播正念练习、优势应用等内容的创作者给予流量激励。发挥正向引导作用，多宣传积极向上的社会现象和青年人物事迹，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增强对社会的信心和积极情绪体验。

2. 社会实践的情绪胜任力培育。社会各界应主动加强与高校的合作，进一步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机会，为培育他们的情绪胜任力做好铺垫。同时，各企业可以与高校联合开展“积极职场体验”实践活动项目，让学生在实习实践中提高情绪体验，积累成就感和获得感。另外，各社区可以与高校进行联动，积极组织各种公益项目，如社区文化建设、关爱孤寡老人、宣传环境保护等等，让学生在公益活动中建立积极的情绪价值，强化社会责任感。通过各类社会实践，促使大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能力、积累经验，提高自我认同感、满足感和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育情绪胜任力。

（四）个人层面

1. 提升自我认知。在觉察情绪和管理情绪方面，提升自我认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可以通过适合自己的不同方式逐步提升自我认知，比如写日记记录反思、冥想、复盘。向别人获取评价、参与社团活动、积极自我对话、有效阅读等，进一步锻炼对自身情绪的觉察能力。通过提高自我认知，能够促使大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特别是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特优势，进而增强对自身情绪的觉察能力，同时也更清楚自己在不同情境下会采取的具体情绪反应模式。另外，也可以运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优势测试工具，实施“优势发现工作坊”，帮助自己发现在性格、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把这些优势发挥到日常的学习、生活、社交等方面，持续加强自我肯定，进一步增强自信心。

2. 培育积极情绪。积极情绪更有利于完成重要的目标和挑战。大学生在进行专业学习时或各类兴趣活动中应明确目标，让自己进入到全身心地投入状态。当任务目标清晰且具有一定挑战性时，更容易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也就是心理学中的所谓的“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学生能够充分享受学习和活动的过程，获得较强的愉悦和满足感，从而培育积极情绪。还可以通过练习“未来最好设想”技术来积累积极情绪体验，即每天花 10 分钟来想象自己通过努力达成目标理想状态的一些细节，进一步提升对积极结果的预期和展望，增加积极情绪体验。另外，大学生要培养积极的归因方式，要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遇到的各类问题，关注事情的积极面和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机会，提升情绪价值。

3. 提升情绪智力。通过情绪脸谱识别游戏、正念呼吸训练提升自我觉察能力，积极进行情绪表达与调节，不断学习情绪管理的技巧，帮助学会觉察情绪并快速平静内心。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要积极进行情绪表达与调节，学会运用合理的方式释放负面情绪，如通过运动、绘画、音乐等方式宣泄情绪。同时，要不断学习情绪管理的技巧，如情绪 ABC 理论，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同时，注重在人际交往中提高社交觉察和关系管理能力，学会积极倾听和有效倾听，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传递积极情绪，实现情绪价值的双向提升。

五、结语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情绪价值的提升是激活内在积极心理品质、强化多主体协同干预的系统工程，核心在于立足个体优势、培育积极情绪、提升情绪智力。大学生情绪价值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人主动发力，挖掘内在潜能、优化情绪管理能力，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协同合力，构建“学校培育、家庭滋养、社会支撑、个人践行”的四维体系。通过多主体联动，破解大学生情绪管理、社交互动等方面的困境，激活大学生内在积极能量，帮助其实现情绪价值的可持续提升，增强心理韧性与幸福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实证调研，细化不同群体大学生情绪价值的提升路径，强化策略的针对性与落地性。

参考文献

[1] 李婷婷 .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培养路径探究 [J]. 成才之路 ,2019(33):118-119.

[2] 刘倩倩 .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大学生情绪管理训练课程探索 [J]. 科教导刊（下旬刊),2020(33):181-183.

[3] 张彬 .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路径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1(23):117-119.

[4] 孙凤 . 引导青年理性认识与看待情绪价值 [J]. 国家治理 ,2025(05):23-29.

[5] 段俊吉 . 情绪价值与社会连接：青年交往的关系图景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09):31-38.

（作者单位：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教育应对

张　丹

摘要：为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教育应对策略，以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为支撑，以高职高专院校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呈现双向性与隐蔽性，结合高职高专学生心理发展特征特殊及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亟须构建适配的教育应对体系。研究提出，未来高职高专院校可从三方面推进相关工作：动态优化融合社交媒体素养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纳入元宇宙社交等前沿场景的心理调适内容，借助 VR 技术开展沉浸式教学；创新实践形式，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在线行为，搭建智能预警平台，通过“虚实社交对比”主题活动强化学生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认知；深化家校社协同机制，联合网信部门、企业制定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行业标准，开发家长端心理指导工具，形成全链条教育守护网络，持续提升学生社交媒体自我管理能力，实现心理素养与职业素养协同提升。

关键词：社交媒体；大学生心理健康；高职高专；教育应对；协同育人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成为其获取信息、表达自我、社交活动的主要途径。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储备力量，正处于自我同一性构建、社会化进程推进的关键阶段，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度远高于其他群体。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健康资源，扩展了心理疏导和支持的渠道；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虚拟社交、信息过载等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自我认同混乱等。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单一的课堂教育和线下咨询，无法充分捕捉和应对新媒体对学生心理的潜在影响，亟须立足高职高专教育特色，探索兼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教育应对策略，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二、社交媒体的应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的必要性

（一）大学生群体心理发展特征的特殊性亟须针对性研究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处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过渡阶段，该阶段的核心特征体现为自我同一性探索、认知结构的重塑以及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从心理学“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论”来看，年龄在 18~25 岁的青年处于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相冲突的阶段，他们急切需凭借外部反馈完成自我认知的建立。社交媒体是大学生接触信息以及开展社交互动的关键载体，所呈现的多样价值观念、复杂社交环境及虚拟身份打造，均对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造成深刻的影响。与其余年龄的群体相比，大学生还未完整形成稳定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成熟的价值判断体系，对社交媒体信息的筛选能力与情绪调节能力相对偏弱，这让社交媒体里的负面信息（像网络暴力、容貌焦虑宣扬等）更易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冲击。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开展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专项研究，是精准掌握其心理发展规律、进行有效心理干预的必要基础[1]。

（二）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复杂性与隐蔽性

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展现出双向性与动态交互特质，其正向功能不容忽视。即时通讯功能有利于缓解孤独感，知识分享平台可拓展认知界限，兴趣社群给予情感支撑，但从别的方面去考量，负面影响同样明显且存在隐蔽性。算法推荐机制引起的“信息茧房”现象，会阻碍大学生认知视野的拓展，增大认知误差；社交媒体中的“作秀式社交”与“完美化人设”，容易引发过度的社会对比，造成自尊水平走低和焦虑情绪生成；虚拟社交跟现实社交产生的割裂，说不定会引起情感表达障碍以及社交技能的退化。更棘手的是，这些影响并非孤立存在的情形，而

是在个体使用习惯、社交网络结构、内容接触偏好等多个因素彼此作用下动态演变，频繁浏览短视频的用户，也许会因注意力碎片化让学习效率下降，进而产生让自我效能感下降的连锁反应，这种复杂性与隐蔽性表明必须开展系统性研究，才能挖掘出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深层关联机制。

（三）研究成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指导价值

深度剖析社交媒体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可为高职高专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革新提供理论与实践相关的支撑内容。高职高专学生参与专业实践多，课余时间松散、碎片化，研究数据可让院校精准定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情形与风险要素，结合学生情况开发网络素养课程，为电商、新媒体专业学生开设社交平台使用规范及心理调适的课程，基于社交媒体使用时长跟抑郁倾向的关联，设计兼具时间管理与情绪调节的课程。社会治理方面，研究成果的意义同样十分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可借此优化内容审查，降低不良信息对高职学生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门可谋划制定政策，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将成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力军，呵护其心理健康与个人成长紧密相连，能有效促进国民心理素质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研究成果为搭建完整的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做支撑，促使高职高专院校教育目标达成与社会治理效果提升同步实现。

三、社交媒体使用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策略

（一）构建融合社交媒体素养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行为模式的形成，高度依赖于对社会环境中榜样行为的观察、模仿与强化。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频次最高的“虚拟社会场域”。其平台上承载的巨量信息与多元行为示范，如同双刃剑，在拓宽学生认知边界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塑造。基于此理论，高职高专院校可积极探索将社交媒体素养教育有机融入心理健康课程体系，助力学生在复杂网络环境中建立理性认知，培养健康使用的习惯[2]。

在课程理论设计层面，需系统整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相关理论，抽丝剥茧般深入剖析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内在联系。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群体，引入“媒介依存症”概念，详细阐释当下大学生因过度依赖社交媒体，衍生出的信息焦虑、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以数据为例，相关调查显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 4 小时的学生，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其他学生高出 30%。同时，结合“数字原住民”天然对网络环境的熟悉与依赖这一群体特质，运用认知心理学知识，探究学生在虚拟空间的认知模式与行为偏好。深入解读算法推荐机制如何通过不断推送相似内容，导致“信息茧房”形成，让学生清晰认识到长期处于单一信息环境，不仅可能造成认知偏差，还会导致思维局限，如同被困在无形的信息牢笼中。此外，引入“自我呈现理论”，分析社交媒体中普遍存在的“人设塑造”现象，探讨其对个体自我认知与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引导学生深度思考虚拟形象与真实自我的关系。在教学实践规划上，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特色，精心设计“社交媒体与心理成长”主题课程模块，并构建一系列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沉浸式教学案例。以“网络暴力应对”教学为例，教师可预先运用大数据分析，梳理近年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趋势及危害数据，用直观的图表、案例展示网络暴力的严重性，引发学生关注。随后模拟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点争议场景，设置校园生活事件、社会热点话题等多元主题，安排学生分组扮演事件当事人、网络水军、普通网友等角色。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学生通过模拟网友跟风评论、恶意攻击等行为，沉浸式体验网络暴力从产生、扩散到对当事人造成心理伤害的全过程。当学生代入当事人角色，面对铺天盖地的恶意言论时，能更直观感受到网络暴力的无理性与破坏力，从而促使学生深入思考如何在虚拟空间保持理性，避免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或受害者。

（二）开展基于社交媒体情境的心理健康实践活动

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学习者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应主动组合知识与经验。社交媒体营造出的虚拟社交场面，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大量且真实的实践资料，高职高专院校可依据学生日常运用社交媒体的实际场景，用心筹备一系列心理情景剧比赛，通过构建与虚拟社交相关的情境，引领学生借助实践体验强化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强化心理调节本领[3]。

在开展心理情景剧比赛前，教师需深入讲解社交媒体现象背后的心理学原理，为学生创作与表演奠定理论基础。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剖析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追求点赞、关注、评论等行为，本质是对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虚拟投射。当个体过度沉溺于虚拟社交认同，将大量精力倾注于“理想化人设”塑造，极易与现实生活脱节，滋生心理落差与焦虑情绪。同时引入“拟剧理论”，指出社交媒体上的“表演式社交”如同舞台演出，个体通过精心设计的形象展示获取他人认可，而这种表演惯性可能干扰真实人际关系的建立，对心理健康产生潜在威胁。在此理论框架下，以心理情景剧比赛为实践载体，要求学生围绕社交媒体使用中的心理困境进行创作。学生需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象化的剧情，通过角色扮演演绎“人设崩塌”“网络暴力冲击”等场景，在创作与表演过程中，深度思考如何平衡虚拟与现实，从而实现理论认知向行为反思的转化。就实践活动设计而言，高职高专院校推出围绕“打破虚拟滤镜，拥抱真实自我”主题的系列活动，

鼓励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张贴经过精心装点的照片、视频和生活片段，树立“理想模样的人设”，然后记录发布之后所得到的点赞、评论数量以及自身的心理感触。安排学生参加线下面对面的分享活动，要求学生诚恳诉说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如为拍一张完美照片反复折腾的劳累、展现精致生活背后的经济压力、看似光鲜的学习成就背后的付出与磨难等。在参与分享的过程中，学生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在社交媒体所展示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看上去完美无瑕的形象背后，都隐匿着鲜有人知的艰辛和苦恼。凭借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学生深切意识到虚拟社交里“理想生活”与现实的差距，于是对虚拟社交里的行为模式加以反思，学会以更理性、公允的态度去看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攀比与焦虑情绪。高职高专院校采用创新模式开展“网络舆情心理模拟沙盘”活动，模拟社交媒体上的突发舆情事件从起始到终结的全周期。教师事先设定如校园安全事件、学术争议等不同种类的舆情主题，学生分别去扮演事件策划者、网络造势推手、媒体记者、普通网上民众、政府相关部门公职人员等角色。在模拟环节开展的时候，“事件策划者”编排引发争议的话题及传播走向，“网络推手”凭借制造话题、引导舆论推动事件进一步发酵，“普通网民”依照自身的认知、情绪参与讨论跟转发。随着舆情不断升级，各角色需按照事件发展态势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察觉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比如事件当事人应对舆论压力的焦虑和无奈、普通网民在信息洪流中的困惑与迷惘等，通过亲身体会，学生不仅掌握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更懂得在复杂网络环境下理性地思考，提高情绪调控与抗压水平，把实践活动的收获灵活迁移到现实生活的信息处理与人际交往当中。

（三）建立多方协同的社交媒体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个体的成长受到微观系统（如家庭、学校）、中观系统（如家校关系如何、社区环境）、宏观系统（如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多层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在社交媒体深度融入大学生日常的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不再仅仅是学校单方面的职责，而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共同配合，合力搭建全方位、多层级的教育帮扶体系，高职高专院校可按照这一理论，积极摸索并建立多方协同的社交媒体心理健康教育机制[4]。

从实践举措出发，高职高专院校可构建常态化的“家校社共话网络心理健康”研讨会机制，每学期定期组织心理专家、家长代表、企业代表、网络媒体从业者、网络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5]。研讨会上，心理专家结合前沿研究成果，系统剖析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与发展趋势。例如，通过分析最新数据指出，过度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学生群体中，约 40% 存在注意力分散与睡眠质量下降问题。家长代表则分享孩子在家使用社交媒体的实际情况，包括日均使用时长、关注内容偏好及遇到的网络安全困扰；企业代表从人才需求视角，提出对大学生网络素养与心理健康的期望；网络媒体从业者揭秘内容生产与审核标准，网络监管部门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多方围绕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制定《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社交媒体健康使用指南》，明确家庭、学校、社会在各教育阶段的具体职责与协作路径。为强化家校沟通合作，学院可搭建“线上 + 线下”双轨并行的沟通平台。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家长微信群等渠道，每周推送心理健康科普文章、社交媒体使用指导手册及典型案例分析，帮助家长提升网络素养与教育能力。同时开通线上心理咨询通道，安排专业教师实时解答家长疑惑。线下每学期开设家长培训课程，邀请专家围绕 “亲子社交媒体沟通技巧”“家庭网络环境优化”等主题开展讲座与互动研讨。此外，创新开展亲子心理活动，如“家庭社交媒体使用公约制定大赛”，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形式，引导家长与孩子在平等对话中共同制定个性化使用规范。通过家校社协同发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逐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学生社交媒体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四、结语

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形成的影响具有双向性、隐蔽性与复杂性，既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高职高专院校采用课程体系的革新、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协同机制的搭建，为应对此挑战提供了有效方式，教师应不断留意社交媒体发展新情形，实时优化教育策略，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教育实效性，引导学生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培养健康的心理素养与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实现心理成长与职业发展的协同推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元宇宙社交等新兴场景，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丰富高职高专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海萍 . 人工智能在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中的应用初探 [J]. 成才之路 .2025(15):37-40.

[2] 田瑾 , 张津华 .“互联网 +”时代大学生社会性发展心理思政的新模式探索 [J]. 科学咨询 .2025(07):191-194.

[3] 杨淑新 , 韩华 .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路径探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16(02):89-93.

[4] 王文乐 , 陈建斌 , 任鹤平 , 等 . 社交媒体使用中信息超载对大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5,41(01):23-28,33.

[5] 雒君华 .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教育措施探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16(11):32-36.

（作者单位：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构筑三维融合的育人新空间：“一站式”学生社区硬件、制度与平台的系统构建研究

邵希砚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是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重要创新路径，也为高校育人方式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通过探寻相关文献研究现状和国外学生社区管理情况，明晰“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发展脉络，立足“全面育人”理念，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方式，通过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剖析，提出以党建引领为主线、网格化治理为基础、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动力、学生全员参与为特征的一体化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从全过程育人的高度来看，“一站式”学生社区强调“硬件空间、制度体系与信息化平台”三位一体相互作用、深度融合，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及发展特色开展具体的资源配置、运用与创造。因此，构建三维融合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保证教育资源向深层次聚合并发挥出强大的管理服务效能，助力“三全育人”新格局的构建、精准育人平台的打造以及功能完备的育人共同体创建。

关键词：“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三维融合；三全育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高校学生社区作为大学生重要的学习、生活及交往的空间场域，同时又是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场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教育部于 2019 年启动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 [1]，并将其视为加快建设高校思政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就是通过空间重构、资源整合、力量下沉和机制创新，将学生社区打造成具有思想引领、学业指导、生活服务、文化涵养、安全保障等多种功能的育人新阵地 [2]。目前多数高校还处于浅层次探索层面，在理论逻辑建构、实践路径选择以及长效机制打造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 [3]，而从系统化视角出发、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思想，则需要进一步研究“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构建逻辑和实践进路。

二、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相关研究，随着“一站式”学生社区相关政策的推行而开展，中国知网（CNKI）数据显示，从 2020 年起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开始增多，但总体规模并不大，该领域当前属于新研究范畴的重要内容。学者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第一种是模式建构与院校实践类，主要是基于学校的一些经验总结、模式与案例 [4]，如王璁通过以江南大学商学院为例研究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路径；王盈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陈国锋等也从高职院校的角度出发，探讨“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价值意蕴、构建思路及实践理路等。第二种是党建引领、思政融入类，即党组织如何发挥中心作用于社区治理，如李清薇和马妍华通过高校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路径的研究 [5]；林冬冬和徐硕从育人的角度来看待该种模式下的思政教育。第三种是育人功能拓展类，“一站式”学生社区除了思想工作外，在心理、“双创”等领域也都有新拓展，如赵伟等研究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下“双创”教育的开展；江珊等从厦门大学开始构建心理育人的精细化服务体系；罗荣和罗颂则是从“全面育人”角度，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建设展开研究 [6]。第四种是理论反思和问题诊断类，探究引入整体性治理等，如马成瑶在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分析推进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方式，发现目前存在部门壁垒、资源分散、信息化程度不高的一些共性问题 [7]；虽然国外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概念，但一些类似寄宿制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学生事务管理（Student Affairs）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同样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国外一些学者

对于“寄宿制学院”“学习共同体”中围绕住宿空间的学术融入，为了给学生更好地社会支持，注重跨部门合作（如学术支持、心理咨询和生涯指导进宿舍）提供整合性服务的经验介绍，给我国这一领域的尝试探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思路。总的来看，国内现有的研究多是初期的经验描述或是单维度的研究，缺乏从“全面育人”的整体视角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运行机理、基于实证研究提出综合性优化方案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推进学生社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

三、理论逻辑构建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构，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堆砌与服务叠加，而是从“管理”到“治理”、从“分散”到“融合”的范式转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是在“三全育人”思想指导下，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资源通过硬件设施、管理制度、信息化平台等要素聚合到学生社区这一终端场域之中，是实现联动汇聚和协同作用的有效方式。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的关键，是要做好硬件空间、制度体系、信息化平台三者的融合集成、相辅相成，以实现以硬促软、硬软并重的建设效果。硬件空间是实现育人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是确保学校管理运行有章可循、有序开展的规则之基，平台则是助力精准治理、优化服务的工具。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为支撑，在顶层集成中实现统筹谋划、共建共治。本文以“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智慧赋能”“文化浸润”为核心要素，整合形成契合一线实践且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模型及路径方案，以解决当下学生社区建设中存在的“整合难、协同弱、效能低”等突出问题。在本研究构建的框架中，“数字化平台”是承载技术、聚合数据、提供服务的关键工具与载体；“智慧赋能”是数字化平台建设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与功能体现，即通过数据驱动、算法模型和智能应用，为社区治理、学生成长提供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支持。二者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同时，考虑到“数字化”是“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更能体现当前平台建设深度融合、数据智能的特征，故文中将相关表述统一为“数字化平台”。

四、创新实践路径：三维融合的系统构建

“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一站式”设计，需要进行系统推进，从而实现各种思想理念的落细落实。要形成软硬件、制度机制、数智平台深度融合并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每一个方面都不容忽视，并应有专人负责，并且每个部分都要设计好、安排好。

（一）硬件支撑：打造功能复合的智慧育人空间

硬件是教育理念具象化的重要支撑，而学生宿舍是打造功能复合的智慧育人空间的头道大门。所谓“宿舍”，是指以育人理念的实质内涵为依据，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宿舍”，将安全居住环境、学习空间延伸至室内外，探索居住的个性需求、社群的深度交往与创新实践活动场所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成长空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人文性；在居住环境智能化方面，应着重部署环境感知、自适应系统，用温湿度、空气质量、光强、噪声传感器探测的数据，由后台平台对整体环境进行微观监测，并针对局部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结合智能水电表实现精细化节能减排及行为引导；同时结合智能门禁、视频监控、消防感知、紧急报警等物联设备，建立全域覆盖物联安防网。在学习活动空间灵活多样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通过设置可拆卸移动家具、接入高速网络、配置多媒体设备等办法开设一种开敞式研讨室，容纳小组项目协作或者个人化深度学习两种学习场景；开设先进的研创工坊，配备 3D 打印机、高性能计算机等先进硬件供学生实现想法与创意；或者开辟一些多功能的文化展厅或休闲交流区等非正式学习空间，为学生预留出更多的轻松交流、畅谈想法的场所，便于跨学科、跨年级的交流与思维碰撞。这些空间不仅是功能载体，更是进行文化浸润、价值引领的实体场域，通过环境设计、展览展示、活动营造潜移默化地培育社区文化。

此外，所有实体空间智能化的管理功能均应接入同一个平台，并做到线上预定，使用状况透明化，使用过程高效率。

（二）制度保障：构建协同高效的网格化治理体系

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就像一套稳定的“操作系统”，可以保障硬件和平台可持续、高效的运转。其一，要构建由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权责体系，制定明晰的章程，赋予社区党工委、驻楼导师、辅导员、后勤部门和服务部门以及学生自治组织等责任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确立其在管理、服务、育人等方面各司其职、协调运转的关系。其二，积极推进核心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与线上化，在学生办事、活动申请、报修维修等环节，规范处理平台流转的各项事务，形成全流程的可视可追溯闭环，如搭建“学生提交—平台派单—部门处理—在线评价”的全流程服务工单制度，实现即时处理。其三，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制度，既要看重过程指标也要注重结果成效，同时让被评价者尤其是作为受益者的师生，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回报，并将其与教师的贡献挂钩，通过量化认可、课时认定、绩效奖励等方式激励大家内生动力。其四，要筑牢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这一根本防线，规范建立健全制度，在事前采集、事中利用、事后销毁环节对学生数据进行全面保护。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是保障社区有序运行、不断发展的基本点。

（三）平台赋能：建设数据驱动的线上育人枢纽

信息化平台是“一站式”学生社区实现精准育人、高效治理的“数字孪生”和核心引擎，是实现从“功能堆砌”到“数据驱动、智能协同”转变的关键，是打通数据壁垒，以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中台为依托，

集成教务、学工、后勤等多个系统的学生数据资源，形成学校各系统的实时有效应用渠道，将权威、动态的“学生数字画像”以精准方式生成。以“学生数字画像”为核心，打造一体化线上服务大厅，将所有高频学生事务全部接入，实现线上服务大厅“一网通办”。平台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智能赋能，利用数据分析对学生学业进展、消费行为、心理状态等日常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预判性预警；借助推荐算法对学生发布个性化学习资源推送、组织社区活动；开发集成政策答疑、事务指引、情感支持等多功能的智能助手，24小时为学生提供在线服务。平台还要成为学生参与民主治理、构建群落共同体的舞台，设置线上议事厅、提案征集、兴趣社群等功能，让学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当中，促进学生的协作意识培养。平台通过支持兴趣社群、内容分享、榜样宣传等功能，成为线上文化浸润的阵地，助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区风尚和身份认同。同时，还要有专业化队伍对平台进行持续的迭代升级，并通过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完善制度与空间，形成“使用—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在智能空间实现硬件、制度、平台的有机统一，使其成为开展育人活动的“场所”，各项制度为空间平台的顺畅运行提供保障，通过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空间平台信息流通，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让学生看得见自己的成长。

五、实证研究

为了实现关于系统验证与优化的相关理论的构建及实践路径的设计，本文采用了混合研究法（Mixed-MethodsResearch）。通过定量加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尽量保持均衡，一方面通过定量研究得出具有普适意义的总体规律和变量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用质性的研究方式探明其中所包含的现象背后的机理以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实际发生的行为模式，二者有机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加全面和完整地体现研究成果，这对提升研究的解释性和可靠性有很大帮助，并能完成对“一站式”学生社区成效检验多维度的考量。对样本量大且为该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高校，在进行定量层面的数据分析时，将使用问卷星分层抽样的方法向学生派发结构化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学生对社区的了解程度、使用频次及满意度评价（对服务的响应速度、解决速度、参与活动的质量等方面）、对学生心理健康支持、学业辅导、职业规划等方面专项服务的需求强度。通过计算得出各学校的大样本数据量后，对所有大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分别进行系统整体建设实效评价、建设缺陷定位、不同群体需求差别判断，并基于以上各方面结果，对“硬件—制度—平台”三大元素如何作用于学生满意度问题作出初步探讨。基于定性层面，从理论抽样视角选择几所不同建设模式、发展进程、学校类型的典型高校，采用多案例深度研究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并针对管理者、学工干部、驻楼教师、辅导员和学生的管理者等，运用半结构化的访谈加以探讨，辅之以一些参与式的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结合对相关的政策文本、学校内制度文件、工作记录的系统分析，研究模式运行中协同共治模式下的权责分工问题、功能靶向发力的资源配置方式、校园文化建设问题，以及该模式在制度层面或操作层面所存在的深层次障碍。同时，在质与量的数据融合解释和三角互证的基础上，一方面，真正客观地评析“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智慧赋能”三位一体模式的实施效果和学生真实的获得感；另一方面，能够系统剖析该模式的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技术支撑、人员能力等具体难点问题。其次，不同院校由于资源禀赋及办学特色的差异，针对自身情况采取了差异化的实施策略，通过对不同院校的对比分析，能够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更契合特定情境下的优化建议，为实证研究的最终研究结论奠定扎实的经验证据基础。研究全过程坚持科学性和伦理规范性原则，确保数据收集、分析的客观真实。

六、结论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实质上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回应新时代学生成长新需求的一次整体性转型。其实现的关键是在物理空间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育人共同体生态的重塑，即把原来杂乱无序的“孤岛”，转变为有序、高效的综合性共同体。完全意义上的学生社区应该是：在党全面领导下，实现行政、学术、服务和学生自治有机统一的“生活—学习—成长”共同体；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精准化服务与管理的空间；是具有更强凝聚力的、由文化浸润形成的特定文化吸引学子，通过全方位育人打造而成的精神文化家园。将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智慧赋能与“硬件、制度、平台”相融合的思路，是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为路径载体与建设目标的整体框架，是今后长远努力的方向。显然这只是一项阶段性探索，建立成熟稳定运行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无疑是一项长期工程，其长效作用尤其是对学生长期发展的深远影响仍需后续较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对后续研究而言，可以进一步开展相关的拓展。比如：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连续性长期跟进比较研究，探寻不同情境中模式演化动因与优化路径；以模式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促进效果为着眼点开展评价研究，形成更为完善的效能体系；基于关注未来的理念，在不断观察和研究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与演进过程时，研判对未来学习生活空间形态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大胆预判“一站式”社区未来的样态。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深度融合，就是要把学生社区建设成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

（下转 282 页）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分析

苏圣婷

摘要：本文聚焦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首先剖析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指出其相互促进且在技工教育中意义重大。接着分析当前培育的现实困境，包括理念滞后、课程割裂、师资短板和评价单一。随后提出整合培育策略，涵盖理念引领确立目标、课程重构嵌入内容、平台赋能打造场景、文化浸润营造氛围。旨在通过这些策略，实现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在技工教育中的有机整合，为社会培育出更多既具备精湛技艺又拥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工人才，助力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

关键词：技工教育；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全球化竞争加剧与智能制造转型对技术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传承精湛技艺的工匠型人才，也亟盼具备创新能力的开拓者。然而我国技工教育长期存在“重技轻素”“知行脱节”等问题，导致学生虽掌握操作技能却缺乏职业素养与创新意识。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本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双引擎——前者确保质量根基，后者引领变革方向。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这需要突破传统教育模式，从理念更新到课程设计、从师资建设到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本文通过分析现存瓶颈，探索以项目为载体、平台为支撑、文化为纽带的整合培育路径，旨在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提供人力支撑。

一、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剖析

工匠精神是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对技艺精益求精的一种精神，它体现在对细节的严格把控、对质量的不断追求和对工作的专注执着。工匠精神要求技工工作时保持高度责任感、敬业精神，不能放过任何细节，力求完美。工匠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对传统技艺的传承，更表现在对现代工艺的精益求精。工匠精神主要是追求卓越，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砺把技艺发挥到极致。技工教育里，培养工匠精神有益于塑造学生优良的职业品行和职业道德。日后工作时，他们会按照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二）创新精神的内涵解读

创新精神就是在工作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探索新的方法、技术、工艺的一种精神。它重视开拓进取、勇于探究和突破传统，提倡敢于冲破现有局面，不被现有的技术成果束缚。创新精神的核心就是开拓思维，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办法。在技工教育中培养创新精神，能够调动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使这些学生在工作中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此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创新精神有利于人的发展，也是企业竞争力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三）两者相互促进作用

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在技工教育中不是孤立存在

（上接 281 页）

参考文献

[1] 杜宇，黄海明．“三全育人”背景下探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11):133-137.

[2] 徐留金．地方本科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模式的探索 [J]. 山西青年，2025(20):12-14.

[3] 常沛，鲁敏．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的功能优势、定位与实现路向 [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25,38(04):93-97.

[4] 李鑫．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美育创新实践——以南京艺术学院“艺之美”朋辈帮扶工作坊为例 [J]. 美术教育研究，2025(21):87-89.

[5] 石虎，张文丽，李浩杰．红色文化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探究 [J]. 黑龙江科学，2025,16(21):104-106.

[6] 张银爽，孟微．整体性治理视域下“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的路径 [J]. 党政论坛，2025(06):34-36.

[7] 狄娇．“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员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J]. 农业开发与装备，2025(11):76-78.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的，二者相互促进。工匠精神为创新精神打下基础，只有具备精湛技艺和严谨的态度，创新才能扎根落地。创新精神给工匠精神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发展过程中，工匠精神得以传承。在工作中，工匠精神可以保证创新成果的质量，而创新精神可以推动工匠精神打破传统束缚，以满足技术、社会的新变化。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培养出既擅长技艺又富于创造性的高技能型技术工人，从而促进产业升级与发展。

（四）在技工教育中的体现

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在技工教育中很重要，工匠精神可以经由严格的技能训练、师徒传承、职业道德培育等手段塑造，让学生既学好技术，又养成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1]。创新精神的培养可以借助项目驱动、小组合作学习和创新实践活动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技工院校要将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培养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在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手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等方面下功夫，从而实现二者结合的目的，培育更多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二、推进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融合培育的发展契机

（一）国家战略驱动，政策框架提供明确指引

国家对高素质技能人才迫切需要，已经成为了一组非常明确、有力的政策导向。近年来，在“制造强国”战略不断深入的同时，在“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之后，都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激发创新活力。这些政策不单是确定了人才培养的总体方向，在项目资助、资源供给、评价改革等各方面也形成了配套的措施。为技工院校系统性重塑育人目标，把工匠精神的严谨求实、创新精神的开拓进取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行动的依据，从而使融合培育工作可以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之下平稳进行。

（二）产业技术升级，倒逼人才素养结构重塑

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这些产业变革的走向，正在改变生产现场的技术逻辑以及工作方式。传统的单一、重复性操作岗位被智能化设备所取代，对于复杂系统维护、工艺改进、生产流程革新等各方面能力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2]。这就对技工教育的培养规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要求毕业生不但要准确地执行标准化的程序，还要有面对非常规问题时的诊断能力、改进意识、提出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产业端的客观需求，直接促使教育端必须冲破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隐性壁垒，把质量根基的坚守同突破变革的勇气融合起来，塑造起新一代技能人才的职业素养。

（三）教育理念演进，项目化教学成为融合载体

当代的职业教育理念正从知识技能的传授转变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越来越成为共识。在此背景下，项目化教学、综合实践课程等教学模式就具有了很强的融合潜力。它们把设计出来的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教学化处理的复杂任务，让学生在完成项目全过程的时候，自然地、有意识地进行规范化技能的应用和创新探索。这样一体化的学习过程，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追求更好”的创新思维在同一实践场域中相互交织、共生，给两种精神的内化提供了最好的教学载体，有效解决了过去课程体系中理论与实践、守成与求变互相割裂的问题。

（四）校企协同深化，真实情境供给实践平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入，为双精神融合培育赋予了更为宽广和真实的实践场所。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企业实训基地等合作形式的创新，使学生更早、更深地嵌入到真实的生产、技术研发环境当中。学生可以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接触到严格的生产标准、精细的工艺流程，直接体会工匠精神的价值，也可以参与技术改造、工艺调试等低水平的创新活动，体会创新精神的效果。校企协同创建的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学习场与企业的工作场紧密联系起来，给学生提供在真实的职业角色中体验、反思、统合两种精神的宝贵机会，大大提高了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三、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整合培育的策略

（一）理念引领，确立守正创新目标

院校管理层要首先做到理念上的更新和提升，在顶层设计时就把“守正创新”作为全校统一的、关键的育人目的，用来统率各种教育教学工作。所谓“守正”是指守住技艺传承的根本，培养学生敬畏、坚守规范、标准、质量的工匠精神，这是学生安身立命之本[3]。所谓“创新”，就是在技能夯实的基础上进行有批判性的思考、有质疑地提出问题以及有突破性的尝试，给学生以适应并引领未来技术的本领。这种想法绝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变成能够执行并且可以考核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制度文档。比如学校可以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各个专业的教学团队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审视和修订每一个专业的培养方案，把“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作为主要素养，再分解到每一门课程具体的毕业要求上。关键在于出台专项政策，让所有的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都包括“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规范和工艺标准”（守正维度）以及“可以对既定工艺 / 流程 / 方案进行诊断，并给出一个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改进措施或者备选方案”（创新维度）等具体可量化的学习目标。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设定，把整合培育的理念从抽象的观念转变成针对每一个老师教学行为和每一个学生学习成果的实际规定，从而从根本上促使教育教学活动全面转向，保证育人工作始终朝着“培育新时代创新型工匠”这条正确的航向稳稳前进[4]。

（二）课程重构，嵌入双核育人内容

打破原有的学科本位以及技能模块化的课程壁垒，只有把“项目式学习”作为核心载体，才能对课程进

行整体重构，将工匠与创新“双核”育人内容像盐溶于水般，真正融入教学全过程当中。这种重构意味着，设计出一整套贯穿整个学期、复杂程度逐步递增的，既来自实际工作情境又经过教学改造的综合实训项目。这些项目不但要设置明确、高质量的成果输出标准来塑造工匠精神，而且还要让学生成为“调研—分析—设计—实施—优化—反思”这一完整工作流程的体验者，在为其提供创新空间的同时也提供创新的必要条件。如“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传统的方法是让学生按照给出的、一成不变的电路图和工艺要求，焊接组装一个标准的收音机，主要看焊接工艺是否美观可靠，装配是否准确无误（这主要是工匠精神）。经过深层次的课程重构之后，可以将项目任务设为“给寝室里的学生群体设计和制作一个多功能的小音箱”。学生要先扮演设计师，在这个项目中，首先要做的是进行市场的调研以及用户的分析，知道这款产品所要实现的功能定位、产品的音质要求、续航时间的设定等。然后需要他们去运用所学到的电子技术知识，自行选择或者设计音频放大电路、电源管理电路，并且要考虑到结构布局的问题。制作过程中他们需要掌握精湛的焊接、组装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守正”，保证产品能够可靠耐用。也可能为了实现一个新奇的功能，比如触摸开关，而去查阅资料、寻找新的元器件，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看的外壳去学习使用 3D 建模和打印技术。整个项目过程是学生对严谨工艺、质量意识的极致锤炼，更是对学生创新设计、系统思考、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真实考验和提升，两种精神在解决一个真实、复杂问题过程中自然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升华[5]。

（三）平台赋能，打造真实实践场景

要培养出创新人才就不能拘泥于老一套的封闭教室和实验室，一定要大力营造开放、共享、跨学科的实践场所，给学生们打造一个把想法变成现实的“练兵场”和“孵化器”。这样的平台应该超越一般实训室的功能定位，不仅仅是技能训练的场地，更是思想碰撞、创意实现的工坊。

平台必须整合快速原型制造、电子开发、数字化设计、智能控制等先进设备和技术，构建一个近乎仿真甚至直接对接实际生产研发过程的学习环境。比如可以整合资源打造“工匠创新工坊”或者“技术创客空间”，集中采购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小型 CNC 机床、Arduino、树莓派开源硬件、电子测试仪器、金工木工基础工具等。该平台应该对所有的学生免费或者低价开放并有专业的老师或者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大幅缩短了从“产生想法”到“动手实现”的过程。机械专业的学生可以对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工具自己设计 3D 打印优化的零件，电气专业的同学可以用开源硬件和传感器搭物联网控制的原型来验证。通过支持低成本、高效率的“微创新”和应用性创新，平台促成工艺追求和功能突破的融合。在反复地设计、制作、调试、迭代过程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相互融合，使平台成为培养学生复合型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土壤。

（四）文化浸润，营造崇尚卓越的氛围

精神培育要靠文化浸润，技工院校要形成崇尚精益求精、敬业专注的工匠文化和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通过有形活动、无形的机制、环境设计共同营造出强大的文化场域。可以定期举办“大师·创客面对面”之类的品牌活动，邀请行业内资深工艺大师和技术能手或创新创业校友、企业工程师来学校做交流分享。比如，邀请有“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工匠来讲如何用几万次练习把平度误差做到一丝，讲他在搞设备维修时自己研发出工具解决问题而被奖励的事例，传递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真实鲜活的榜样故事比起空洞乏味的说教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要不断地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可以设置“技能大师工作室”“创新成果展”“技能展示周”以及校园里的“工匠墙”“创新榜”等，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敬仰匠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让“守正”与“创新”统一的意识，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处处可见、时时受到激励，将这种理念内化为职业信念和行为规范，成为他们未来发展持久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融合培养已经成为技工教育顺应时代发展所必备的要求。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引导、课程重组、平台赋能以及文化陶冶等措施，克服目前的困境，从而达成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出优秀的职业素养与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在未来拥有一个稳健的职业生涯，而且能给产业带来大量的优质人才以促进社会发展。技工院校要积极落实这些策略，不断探寻新办法，持续改善教育品质，塑造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型工匠人才，助力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文倩 . 技工教育赋能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研究 [J]. 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025(07):24-27.

[2] 吕雄 . 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国际化高技能人才 [J]. 职业 ,2025(07):27-29.

[3] 罗宗叶 .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方法初探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1(29):220-221.

[4] 潘洁 .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分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1,5(02):40-42.

[5] 王中雨 . 技工教育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整合培育分析 [J]. 中国新通信 ,2020,22(03):211.

（作者单位：珠海市技师学院）

社工人
一键服务机

把复杂的线下世界，简化为一个按键

设备键盘上预设**社工**、**跑腿**、**外卖**、**打车**等实体快捷键。

每个按键背后连接的，不是未知的客服，而是平台认证的**本地社区社工**、**商家**或**服务人员**。

老人只需按一个键，需求直接发布至**社工人平台**，由平台调度本地资源响应。

同时具备一键 **SOS**、**健康监测**、**防走失定位**、**日常通信**等全方位功能。

咨询电话：010—68300355/356

线下服务
一键直达

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04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

公益广告